

年度学科综述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郭强

一、202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总体状况

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较往年持平，研究领域较往年更为广泛，涉及诸如实践观、劳动观、自由观、政治文化观、道德观、自然观、时代观以及共同体思想等研究领域。学者们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理论内涵的深度分析，又有紧贴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探讨。总体来看，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深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有新的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02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主题，如实践观、劳动观、自由观、政治文化观、道德观、自然观、时代观以及共同体思想等，均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耕，展开深度的文本解读，从新的视角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的内涵。比如，黄云明教授通过《论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劳动哲学基础》，探讨了法哲学思想的劳动哲学基础。李维意教授通过《论马克思的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论马克思劳动现代性的系统批判思想》一系列关于劳动

现代性的文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视角阐明作为马克思原生态哲学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对时代之问作出了理论回应。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科学地解答时代的问卷，以指出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对“时代之问”的解答中诞生的。从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多是在回答基于“两个大局”的“新时代之问”中研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劳动观、自由观、政治文化观、自然观、时代观以及共同体思想等，以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进行理论概括，并提供学理支撑。比如，时代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张骥教授就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要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新世界观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探讨了恩格斯的实践理论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运用。

张青卫探讨了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学习观。^[1]认为,通常人们多将学习视为一种痛苦的活动。这一现象是对学习本质的误解,不利于学习兴趣的形成。学习是人类求知获能,进而创新的基本手段。从学习的终极目的来看,它不仅表现为一种认识世界的认知活动,也体现为人类改造世界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实践活动。这种具有自发创造性的活动是人与动物相揖别的关键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进行精神生产的重要实践活动。而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由于社会再生产领域评价标准存在扭曲、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速以及工具主义的影响,片面的学习观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异化的谋生方式。人要走向自由王国、实现学习活动向其“好玩”本质的回归,需要转变学习观念、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打牢学习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及制度基础。

陈琳、马静、杨曼从《反杜林论》探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深化与发展。^[2]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诞生标志着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旧哲学中的合理部分,通过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赋予实践观新的内涵。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马克思的支持和肯定下,恩格斯通过《反杜林论》与杜林进行论战,有理有力有节,全文不仅闪烁着科学实践观的光芒,而且对马克思实践范畴进行深化和发展。

此外,陈琳还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补充和深化。^[3]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诞生标志着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19世纪70年代,修正主义频频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攻击和歪曲,恩格斯一方面进行回击批判,一方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成果,恩格斯特别关注劳动实践的重要性,提出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就是劳动实践,证明了人要通过劳动实践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有关实践观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补充和深化。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的基础范畴。王伟探讨了鲍威尔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双重中介作用。^[4]认为,在费尔巴哈的思想被公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时,波兰学者兹维·罗森试图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作出新

解释。为此,他突出了鲍威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全面影响,从而为探讨其他人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却试图消解甚至否定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好像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中是不能并存的。实际上,上至古希腊哲学家,下至马克思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世界观。费尔巴哈和鲍威尔都曾影响过马克思,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促进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

三、马克思的劳动观与劳动哲学

劳动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实践的主要表现形式。劳动观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创建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多位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观和劳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探讨的主要论题有劳动哲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劳动现代性理论、劳动伦理问题,也有学者从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进行了探讨。

黄云明探讨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劳动哲学基础。^[5]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个由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和劳动人道主义价值观构成的哲学体系,其突出特点是将人类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纳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史中把握。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和劳动人道主义价值观是其法哲学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基于劳动哲学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纳入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史去把握,强调法律属于社会精神生产劳动实践。法律是立法者主观意愿的体现,也是对事物法理本质的反映,立法者即使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也不能完全罔顾人民公意;法律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与精神生产劳动实践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伴随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也是社会成员享有合法权利的依据;法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应该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捍卫劳动神圣。

李维意探讨了马克思的劳动现代性重建思

想。^[6]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审视包含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和劳动现代性重建两个维度。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建构共产主义现代性是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的根本旨趣。从历史必然趋势看,劳动社会化发展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物质基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前提,“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社会基础。从实践主体向度看,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劳动现代性重建是建构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基础,把无产阶级确立为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主体,把社会解放理解为由劳动解放走向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中国道路开启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石,中国道路是新时代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此外,李维意还探讨了马克思劳动现代性的系统批判思想。^[7]认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枢轴。马克思的劳动现代性批判紧紧围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展开。现代性的开启表现为资本臣服雇佣劳动和重构劳动空间的过程。现代性的时空布展体现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马克思通过创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和资本再生产论等,深刻剖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对劳动现代性给予了系统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现代性的系统批判,揭示资本之于现代性的决定作用和劳动之于现代性的基础地位,论证了共产主义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必然趋势。

杨刘敏、付梁艳探讨了马克思劳动伦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8]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立足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演进及异化劳动关系,逐渐形成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我们可以将其劳动伦理的基本内涵定义为:(一)自由理性的劳动;(二)平等公正的劳动;(三)和谐幸福的劳动。马克思劳动伦理的当代价值在于: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遵循;为构建平等公正的道德体系提供价值指引;为创造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行动

指南。

张艳玲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9]认为,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理解唯物史观的钥匙,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唯一源泉,人的价值也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享受者,任何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劳动。二是劳动无贵贱的劳动平等观。劳动可以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性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无论哪一类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同等重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是劳动强体、增智、树德、育美的劳动育人观。劳动同德、智、体、美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四是劳动创造幸福的劳动幸福观。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是辛苦的,正是这种辛苦劳动的付出,才有播下种子等待收获的幸福,劳动创造的幸福、劳动奉献的幸福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五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劳动职业观。不能把职业当作副业来做,一个人只有专注于本职工作,守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各种天赋才能,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四、马克思自由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研究活动都是围绕自由问题而展开的。2022年,河北省学者围绕马克思自由概念、劳动自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马克思自由观现实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孟祥林从异化劳动到实践自由的思想演进探讨了劳动自由得以可能的问题。^[10]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劳动论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劳动自由成为关注的焦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而出现劳动异化,资本基于既往的资本积累能够控制无产者的命运,表面的劳动自由遮蔽了劳动不自由,无产者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不幸福。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并向社会贡献智慧,劳动幸福需要通过劳动自由和劳

动权利两个属性得到展现。因此,只有剔除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彻底改变劳动不自由状态。劳动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劳动者在劳动纪律范围内享受的自由,并在劳动者自身全面发展、自由支配劳动时间、建构科学的激励制度、个人发展完成从“现存”到“现实”的转化等向度得到体现。

付梁艳、杨刘敏探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概念的继承与超越问题。^[11]认为,古往今来,人类历史即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看作是自由的归宿,并从辩证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主张主体的自我实现与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对于自由精神的定义,从而使自由精神逐步地从抽象思维领域中得到解脱,马克思将自由精神置于社会领域之中,从生产劳动层面去理解自由,丰富了自由概念的内涵,并力求以唯物史观的视角阐述由自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为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创造机会。

王海从四个维度探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2]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它是具有实践性的科学理论,包含了人的生理层面、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等多重内在规定性。因此,从原初表达、深层进路、基础保障、必然旨归等多维视角系统地梳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对当下社会更好地实现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崔雨童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域探讨了校园网格化管理问题。^[13]作者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域下出发,探析在校园网格化管理中人的自由,进而得出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新理解:在自然灾害面前生命高于自由;个人自由需要尊重他人自由;自由需要受自然环境、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实现自由需要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实际问题,对校园管控制度进行完善,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五、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政治文化观

政治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又给予

社会生活重大影响。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政治文化”的概念,但在对前人政治文化思想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科学的政治文化理论。通过对社会政治意识与社会存在辩证关系的分析,马克思阐明了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揭示了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2022年,河北省学者围绕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政治文化观的核心内容。申文杰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理论及其现实价值。^[14]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多方面深刻阐述了意识形态政治功能:具体论述了意识形态政治批判功能,全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政治教育功能,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政治指导功能,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政治支配功能,多层次揭示了意识形态政治遮蔽功能,深入阐述了意识形态政治推动功能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指导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素建华、张云飞探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涵义及特征。^[15]认为,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属于高频词汇,对其内涵及特征的准确把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式聚合成的综合概念,它是指以语言文字符号为载体的、产生于社会存在但具有独立运动特征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由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构成,具有虚假性、公共性、历史性、相对独立性四大特征。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观念形态,与政治制度发展关系密切。郭强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研究中心,对马克思关于西方政治制度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反思进行了探讨。^[16]认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欧美资产阶级在创建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文明的制度成果。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为中心,考察了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因缺陷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

思通过考察宪法本身号召以暴力消灭自己的事实，揭示主权在资本逻辑下宪法制度的致命缺陷；通过考察从民主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退回到君主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过程，揭示资本奴役劳动逻辑下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命运；通过考察行政权力超常发展的现实，揭示资本统治逻辑下分权制衡制度失灵的秘密。

六、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道德与伦理一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思想中的伦理与道德，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运用马克思思想来分析和观照当今社会现存的道德与伦理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2022年，河北省学者就道德本质、公平正义、科技伦理、激情问题进行了探讨。

宁莉莉、张繁星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道德本质意蕴进行了探讨。^[17]认为，在现如今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道德本质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深入讨论的同时，也在社会生活当中引发广泛关注。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理论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思想不仅仅包括对于道德的起源发展以及规律特征等理论的归纳，还包含马克思对于之前的西方思想家关于道德概念的批判与继承。马克思的道德思想在继承众多哲学家合理内核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崭新的道德观。马克思的道德思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物质利益关系中，道德是其关系的集中体现形式，同时也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本身就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们在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所需要外在客观环境之间所建立的平衡机制，所以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具有选择性，并不存在永恒抽象或者超历史超阶级的道德伦理。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空洞化与虚无化的道德说教主义，更加注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价值维度分析，人本主义思想在唯物史观中蕴含极深，并且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实践人道主义。马克思的道德思想观是人类思想历史上的伟大变革，所以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道德本质问题的探究不仅有利于拓展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道德理论研究，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本质的必然要求，

更好地揭示与理解马克思的道德思想理论体系。

辛智广、辛熙恒从幸福的维度探讨了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发展历程。^[18]认为，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思想贯穿在其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对马克思道德哲学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可以正确认识马克思道德哲学在伦理史上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幸福维度的分析，探索马克思道德哲学发展历程的幸福依据，引导人类追求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幸福的统一、感悟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的统一，力证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是以追求人类幸福为目的的。

孙娅静基于马克思主义公正观视域探讨了大学生公正观存在的问题与培养路径。^[19]认为，公正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社会公正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相应的人们越来越关注公正的问题。而大学生作为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现在正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思想冲击，所以对大学生进行关于公正观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大学生的公正观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公正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韩来平以科技伦理共识问题为抓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理与路。^[20]认为，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实践生存论出发得出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统一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基础，明确了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科技价值目标。马克思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思想，奠定了科技异化与调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当代科技与人文的实质性融合寓于科技利益攸关方多元参与的科技评估与审查中；实质性融合的象征，在于利益攸关方多元参与形成的科技伦理共识。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实践进路，一是构建科技与人文之间有机互动的实践空间；二是确立以基本道德共识为核心的科技伦理语境；最后是以基本道德共识为逻辑起点，通过共识影响要素的调节，形成促进伦理共识形成的引导原则，以此促使科技与人文实质性融合并为科技异化的调控提供依据。

王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依据，探讨了马克思激情理论的思想溯源与初步

形成。^[21]认为,激情是马克思超越以往思想资源,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因素。与斯多亚主义规避激情转而“退居内在城堡”不同,与黑格尔过多地强调激情的否定方面进而要求控制激情相异,马克思把激情视为人对自己对象的积极追求,视为使人由受动向能动转化的支点。作为连接受动和能动的中间项,激情所体现的感性和受动性成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锐利武器,其所包含的能动因素则为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抓住了这一契机,找到了“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进而迈出了哲学变革的第一步。

七、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观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国内外学者纷纷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力求挖掘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探究马克思的自然观。2022年,河北省学者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出发,探讨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也有学者基于现实考量,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观照现代低碳理念。

王伟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文本依据探讨了作为自我意识限制条件的自然。^[22]认为,在以自我意识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由于追求“定在中的自由”而使自我意识成为有限的自我意识,而自然作为自我意识的限制条件便具有了不可取消的客观性,这使得马克思开始跳出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而显露出唯物主义的痕迹。特别是其中使用的“现实自然界”等与自然相关的术语,使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然概念已经具备了成熟时期自然概念的意涵。但是,出于高扬自我意识的需要,马克思暂时搁置了自然而偏向自我意识哲学。客观存在但被边缘化,既是博士论文中自然概念的总体特征,也为马克思超越自我意识哲学、恢复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王伟还探讨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三重关系。^[23]认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可以凝练为三个方面,即生物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两种关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融合关系。其中,生物关系既表明了人无法逃脱的生命局限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自然的依赖,也从发生学的角度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提供了学理基础。但是,如果停留于这种关系,则难

以使人的一般自然存在物区别开来,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的开创与发展。人在“化”自然的过程中,使自己从一般自然存在物中超拔出来,并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转而进入社会关系层面。同样地,尽管自然的人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社会关系层面。人与自然之间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融合才意味着二者矛盾的解决,才是它们关系的出路之所在。

李盛洁探讨了《博士论文》与《手稿》中马克思的生态思想。^[24]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首次谈及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与自然原初统一,人要和其他人形成社会关系并和自然发生关系且人可以实现自然规律下的即“定在”中的现实的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展示了人与自然的本然、实然、应然的关系,认为要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与统一,马克思的这些生态思想体现了从萌芽到发展生成的过程,对指导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杨杰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视域对低碳生活理念进行了调查研究。^[25]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重点阐释和剖析人的日常具体行为要遵循客观实际规律,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点在当代的延伸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视域的引领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内市民低碳生活进行调研,对现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和参考意义。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和生态文明作为切入点,通过调研国内某市市民对低碳生活的认识和了解情况,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SPSS 13.0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从市民对调查问卷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针对低碳问题的回答情况和分析结果可知,绝大多数市民具有低碳意识并且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注意实现低碳。

八、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是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时使用的基础性概念,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2022

年,河北省学者从社会共同体、交往等角度探讨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有的学者还以构建人类命运体的现实角度加以解读。

李维意、闫淑珊以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三元结构论为视角探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26]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世界意义的共同体实践。“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方式决定着共同体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国家主体化主导的专制霸权和资本垄断化主导的资本逻辑,揭露了“虚幻的共同体”的内部分裂和危机关系。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蕴含颠覆资本统治的力量,劳动社会化和生产资料集中的矛盾是推动“真正的共同体”建构的动力机制。劳动只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重新驾驭“物的力量”,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剥夺剥夺者,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理念的传承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巩固劳动主体地位,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发展资本、规范资本,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推动劳动社会化的当代建构;坚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倡导共建共赢共享,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刘振东、张依萱探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交往意蕴。^[27]认为,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交往意蕴应当从历史、现实和理想层面出发。从交往逻辑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准确把握人类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旨趣,有利于全面理解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世界历史特征,有利于牢牢掌握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始于对原始共同体的超越,保持着对虚假共同体的扬弃,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跨越。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人无法摆脱交往而产生生存。研究并揭示原始共同体中的地域交往意蕴,虚假共同体中的世界交往意蕴,最终探寻人类交往逻辑的理想复归,找到推动共同体发展的逻辑密码,完成真实共同体的建构,实现人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九、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2022年,河北省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理论视野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张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要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8]认为,时代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今天我们正处在伟大转变的大时代中,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科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演进趋势,深刻认识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之间的历史性交汇,对我们在世界大变局之下更好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应对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极有意义。

冷宣荣、王飞、田晶晶以列宁环节分析法为视域探讨了百年大党应对重大危机的历史经验。认为,在我们党的百年历程中有很多重要时刻和特殊环节,以列宁环节分析法聚焦百年大党应对重大危机的历史时刻,把握三种类型的环节,即抓住关键环节,解决关键问题,化解矛盾实现突破,增强结构性韧性;找到薄弱环节,补齐功能性短板,防范化解风险;处理好迂回环节,认清困难,在危机中寻找前进方向,实现新的突破。通过分析总结三种环节探索我们党应对重大危机的历史经验,以期在新的征程上,应对各类危机和风险挑战提供借鉴。

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应该看到,放眼全国,目前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第一,研究成果总体偏少,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可知,2022年全国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发文量近700篇,而河北省的发文章则只有近30篇;第二,高端精品成果数量较少。比如,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河北省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上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成果在全部成果中占比不足三分之一。

(郭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张青卫.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学习观探微[J].求索,2022(2).
- [2]陈琳,马静,杨曼.《反杜林论》:恩格斯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深化与发展[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3]陈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J].黑河学院学报,2022(12).
- [4]王伟.鲍威尔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双重中介——兼评兹维·罗森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4).
- [5]黄云明.论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劳动哲学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22(6).
- [6]李维意.论马克思的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2).
- [7]李维意.论马克思劳动现代性的系统批判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8]杨刘敏,付梁艳.马克思劳动伦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J].西部学刊,2022(10).
- [9]张艳玲.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J].理论学刊,2022(6).
- [10]孟祥林.从异化劳动到实践自由:劳动自由得以可能的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11]付梁艳,杨刘敏.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概念的继承与超越[J].文献资料,2022(5).
- [12]王海.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四重维度探赜[J].保定学院学报,2022(3).
- [13]崔雨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域下的校园网格化管理[J].今古文创,2022(41).
- [14]申文杰.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理论及其现实价值探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2).
- [15]素建华,张云飞.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涵义

及特征[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2).

- [16]郭强.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制度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反思——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研究中心[J].思想理论战线,2022(5).
- [17]宁莉莉,张繁星.浅析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道德本质意蕴[J].今古文创,2022(20).
- [18]辛智广,辛熙恒.马克思道德哲学发展的幸福之维[J].品味经典,2022(4).
- [19]孙娅静.马克思主义公正观视域下大学生公正观存在的问题与培养路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4).
- [20]韩来平.马克思主义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理与路——科技伦理共识问题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3).
- [21]王伟.马克思激情理论的思想溯源与初步形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6).
- [22]王伟.作为自我意识限制条件的自然——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文本依据[J].社会科学论坛,2022(3).
- [23]王伟.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三重关系[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
- [24]李盛洁.《博士论文》与《手稿》中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初探[J].今古文创,2022(44).
- [25]杨杰.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视域下低碳生活理念调查研究[J].河北企业,2022(4).
- [26]李维意,闫淑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三元结构论为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27]刘振东,张依萱.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交往意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28]张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要义与科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29]冷宣荣,王飞,田晶晶.列宁环节分析法视域下百年大党应对重大危机的历史经验[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杨春娟

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质量明显提升,且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的深度解读,也注重观照现实和时代诉求的前沿问题分析;既有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度把握,也注重新时代新思想的专题研究;既注重研究问题的多

维视角,也凸显当前热点问题的理论回应。总体来看,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河北学术界从不同视角继续对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度解读,不断拓展深化研

究内容,形成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如:申文杰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整体性研究》,张祥竞、王志民、赵冬云合著的《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齐秀强的《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杨福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等著作,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拓宽了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凸显了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及时作出理论回应。河北学术界对新时代新思想等问题保持高度的敏锐性,能够把握学术前沿及时作出理论回应。如杨春娟、刘书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彰显丰富意蕴》,张青卫的《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柴艳萍、张函慈的《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文明蕴含及深远影响》,沙占华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探索及世界意义》等文章,其研究内容较往年相比,既是学术前沿问题,又是创新性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第三,聚焦社会热点,注重实践应用。河北学术界不仅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也注重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研究趋势表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科研导向不断强化,及时回应现实关切。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当前热点问题,引起河北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张泗考、杜成斌的《数字技术助力提升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能力》,张茂杰、樊瑞科的《理论、现实与实践: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逻辑》,田海舰、冯艳彬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研究》等文章阐明了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应对之策,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坚持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我们党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也引起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河北学者围绕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周振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应了中国革命、建设的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一般规律,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前进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思想路线;第二,坚持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结合,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基本原则;第三,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基本途径;第四,坚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纳世界文明积极成果相结合,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文化条件;第五,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统一,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实践目标。^[1]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时代条件。魏先法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根本在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主要矛盾、时代任务、实践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发生的时代条件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二是人类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

显著特征。杨春娟、刘书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二是体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三是成为了解决实践课题、完成时代任务的指导思想。^[3]

时代价值。杨春娟、刘书越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一是立足解决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二是回答了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三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4]

原创性贡献。魏先法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

意义。魏先法提出以历史大视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

精华；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6]

（三）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

李鉴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二是必须始终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三是必须始终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7]

二、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河北学术界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思想基础。申文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8]

时代境遇。申文杰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形成的时代境遇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西方大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二是一些错误思潮的传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危害；三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言论，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造成多方面干扰；四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很大的腐蚀性；五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难度。^[9]

主要内容。申文杰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问题，完善、强化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二是我们党更加重视理想信念教育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三是我们党注重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国意识形

态建设注入时代内容；四是我们党系统提出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凸显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现实价值；五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增添了新话语；六是我们党深刻论述了爱国主义问题，成为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大力量；七是我们党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问题，丰富发展了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八是我们党高度重视新时代奋斗精神，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注入新内涵；九是我们党特别重视传承红色革命精神，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红色文化内涵。^[10]

基本途径。申文杰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途径主要包括舆论宣传途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文化涵养途径、互联网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途径、队伍建设途径等方面。其具体表现在：一是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前沿阵地作用；二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三是积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特定载体作用；四是有效发挥互联网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阵地作用；五是切实发挥文化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涵育作用；六是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11]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如何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李素霞、付臻认为，扎实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四个着力点：一是把握根本点，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二是聚焦敏感点，抓准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领域和内容；三是突出新兴点，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创新；四是夯实基础点，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保障。^[12]路晓峰提出，以整体性思维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一要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整体方位，认识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重要意义；二要融合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整体资源，明确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主要原则；三要关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整体场域，检验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实际效能。^[13]张泗考、杜成斌提出，数字技术助力提升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能力：一是数字技术帮助准确定位舆情疑点；二是数字技术提前捕捉意识形态风险关口；三是数字技术提升风险信息处理的精准性；四是在数字支撑下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提升意识形态风险信息

捕捉和风险信息处理的便捷性。^[14]

如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赵学琳、王浩宁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全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基础;第二,大力创新网络核心技术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手段;第三,科学开展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第四,持续优化系统科学的评价机制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保障;第五,充分发挥制度和法治的功能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方式。^[15]张茂杰、樊瑞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加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一是引导人工智能价值取向,彰显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属性;二是培育人工智能主体素养,丰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文内涵;三是完善人工智能法规监管,创设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治环境;四是认清人工智能社会本质,筑牢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基础。^[16]张祥竞、王志民、赵冬云提出,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引导:一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二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加强网络空间安全建设;四是充分发挥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中的特殊作用。^[17]

(三)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路径,张祥竞、王志民、赵冬云认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建设:一要准确定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二要加强互联网平台监督管理,通过网络坚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三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向功能,持续推动思政课的改革与创新。开拓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路径:一是全面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二是加强高校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建设;三是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贯穿于高校党建工作的始终;四是发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功能;五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完善协同育人;六是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18]

关于新时代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际遇与现实短板,张祥竞、王志民、赵冬云认为,新时代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际遇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际遇: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民族际遇:中华民族

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三是政党际遇: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发展黄金期。新时代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短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话语叙事风格上:传统话语与网络话语相脱节;二是在话语供给关系上:话语供给与话语受众相背离;三是在话语体系立场上: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相混淆。^[19]田海舰、冯艳彬认为,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环境喧嚣纷乱、主体能力不足、内容“杂乱无章”、技术尚未成熟等现实困境。^[20]

如何提升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张祥竞、王志民、赵冬云认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提升理路表现在:一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指导思想,即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原则、一元主导多样包容原则。三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基本路径,即强化阵地建设管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加强队伍建设、培育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健全机制保障、重视学习借鉴先进经验。^[21]田海舰、冯艳彬认为,构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须在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引基础上,以“认知—解释”为基础,创新话语表达;以“信仰—价值”为核心,凝结话语共识;以“策略—筹措”为关键,掌握话语主动。^[22]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依然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河北学术界持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培育与践行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 主要作用

杨福忠从核心价值观运作机理的角度讨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作用:一是核心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指引和评价作用;二是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意识整合作用。^[23]李颖、豆颖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具有“定盘星”“助推器”“精气神”等价值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知”“情”“行”

三个维度发挥引领作用，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信服，体现创新创业诉求的情感共鸣，引领创新创业实践的行为外化。^[24]

（二）培育与践行

杨福忠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有道德教化和法治推动两条路径。前者注重运用道德规范的运行机制，通过舆论宣传、教育引导、典型示范等具体方式，在道德层面逐步“建立起来内心的应然”，使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进而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后者注重运用法律规范的运行机制，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立法，变成具体的法律规范，这样执法、司法过程以及公民守法用法过程就变成了践行核心价值观过程。他还提出，道德教化和法治推动这两条路径对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都至关重要，但路径选择要根据人们对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具体而言：在核心价值观提出初期，当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时，国家应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使人们了解、认识核心价值观，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当人们普遍知晓了核心价值观内容时，国家应更加重视法治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25]

另外，李颖、豆颖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路径进行了探索：一是因事而化：以知促创求索创新创业真理学问；二是因时而进：以行促创练就创新创业过硬本领；三是因势而新：以文促创筑就创新创业坚定信念。^[26]

李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运用进行了研究，认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说理的功能，降低法律论证的难度，增强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27]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

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河北学术界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斗

幸福观、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人民主体等有关论述进行了探讨。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王伟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也从不同方面以原创性思想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它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本性依赖性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互依赖；它提出的“两山”理念在把自然视为物质财富的源泉的同时，也为这种源泉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它所主张的保护优先的理念契合并强化了整体的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丰富和完善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28]

核心要义与创新性贡献。康振海认为，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八个坚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29]王志秋、任亮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创新性贡献，即提出人与自然协调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全球治理理念。二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创新性贡献，即生态法律制度为生态建设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生态问责制度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生态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发展模式。三是生态文明实现路径的创新性贡献，即发展绿色生产力，打造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统筹发展新格局；生态建设统筹于“四个全面”，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康振海也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核心理念和主体框架；二是为加快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三是为加快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四是为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观引领。^[31]

覃志红还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特征新要求进行了探讨，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提升党的领导发

挥制度优势是根本要求；二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普惠民生特质，始终坚持生态与民生的统一是核心要义；三是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负重前行关键期，整体系统治理是化解叠加矛盾的现实要求；五是生态问题全球性日益凸显，深度参与守护美丽世界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必然趋势。^[32]

另外，苏锐、赵蕾对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与构建价值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从其生成逻辑看，这一理念生成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逻辑下；生成于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历史逻辑下；生成于探索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环境对人类发展桎梏的实践逻辑中。其构建价值在于：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的发展完善，为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33]

（二）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

生成逻辑。张青卫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一是特殊的成长经历帮助习近平体会到奋斗与幸福的契合；二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奋斗幸福观的价值追求；三是新时代的客观社会条件为奋斗幸福观生成奠定了物质基础。^[34]

核心要义。张青卫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核心要义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深化了将个人幸福融入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价值观。其具体表现为：奋斗幸福观揭示了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蕴含了奋斗行为与幸福目标的统一，本质上是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价值观。^[35]

重大意义。张青卫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二是为新时代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理论指南；三是有利于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36]

另外，孙琳琼、丁凯还对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劳动创造幸福”的逻辑进行了探讨，认为从历史逻辑看，“劳动创造幸福”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进程之中，是党始终坚持的执政旨趣；从理论逻辑看，“劳动创造幸福”内嵌于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成过程，是党为谋求人民幸福作出的时代回应；从实践逻辑看，“劳动创造幸福”要求全党上下紧抓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是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的现实路径。^[37]

（三）习近平共同富裕重要论述

价值向度。郝飞飞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价值向度具体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国际上为治理全球贫富差距扩大贡献出中国智慧和方案；国内则是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奋斗目标的行动纲领。^[38]

内容要义。郝飞飞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内容要义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内涵释义：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二是功能特性：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三是制度创新：为共同富裕作出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四是战略地位：要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五是目标导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9]

实践要求。郝飞飞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一是主体的全民性：做到依靠全民和造福全民相统一；二是内容的全面性：做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三是过程的渐进性：做到整体量变和局部质变相统一；四是结果的相对性：做到差别对待和总体标准相统一。^[40]

（四）习近平公平正义重要论述

基本内涵。安巧珍、武娜娜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时代方位，深刻洞察国内外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公平正义、怎样实现公平正义”这一时代主题，聚焦收入分配、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生态文明、民生保障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论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其具体内容包括：一个核心问题，即“实现什么样的公平正义、怎样实现公平正义”。六大创新维度，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新发展理念，强调分配正义；二是在政治建设方面突出法治建设，强调司法公正；三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突出价值引领，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四是在社会建设方面强调改善和保障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五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六是在国际秩序方面积极构建公正的国际关系和世

界格局。^[41]

时代特征。安巧珍、武娜娜认为,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统一、坚持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相统一、坚持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时代特征。^[42]

(五) 习近平新时代人民主体重要论述

基本内涵。王菲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主体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包含五个方面:一是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二是坚持人民的赋权主体地位: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三是坚持人民的监督主体地位: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是坚持人民的利益主体地位:践行人民至上价值追求,不断为人民造福;五是坚持人民的历史评价主体地位:人民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43]

内在逻辑。王菲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主体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表现为: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为核心和起点,逻辑地展开论述坚持人民赋权主体地位、人民监督主体地位、人民历史评价主体地位,以坚持人民利益主体地位为逻辑归宿,实现了人民的利益主体与价值主体的高度统一。^[44]

(六)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

文明蕴含及深远影响。柴艳萍、张函慈认为,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念,蕴含着深刻的文明价值,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一是经济秩序要由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二是生态秩序要由征服索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三是政治秩序要由霸权欺凌转向平等尊重;四是文化秩序要由隔阂冲突转向交流互鉴。^[45]

(七) 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

理论渊源。张笔超认为,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的理论渊源有三个:一是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理论基础;二是中华民族传统家风文化的文化基因;三是革命先辈红色家风的文化源泉。^[46]

主要内容。张笔超认为,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严自律,修身正己;二是以规立根,廉洁齐家;三是以德相融,家国同构。^[47]

(八)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

王菲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表现在: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当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智慧和启示。^[48]

(九) 习近平人类发展重要论述

乔荣生、陈曦、周静莉从哲学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发展重要论述:一是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二是从哲学认识论上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三是从哲学价值论上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49]

(十) 习近平正定人才观

习近平正定人才观的蕴蓄。张素芬、于丽霞认为,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二是人才的集聚需要靠具体政策和措施;三是注重关乎地方未来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50]

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启示。张素芬、于丽霞认为,习近平正定人才观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启示体现在:一是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推动乡村振兴的首要位置;二是筑巢引凤,吸引各类人才加入乡村振兴;三是重视精神激励,筑牢共同的精神支柱;四是重视教育和培训,激发乡村自主式发展。^[51]

五、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2022年,新时代、新思想尤其是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等有关思想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河北学者从多维视角和不同层面不断拓展研究的新内容,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

(一)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牛余庆、牛家骄从三个视角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一是从理论创新视

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新时代;二是从实践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三是从历史创造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52]

魏先法从历史高度认识新时代“必由之路”,认为“五个必由之路”体现了奋进新征程的历史大势,标识了建功新时代的历史自信,彰显了夺取新胜利的历史主动。^[53]

(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何科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张骥认为,一要全面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即全球科技革命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政治重心出现转移,世界经济实力显著变化,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发生巨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调整,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二要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脉搏,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大变局使时代主题发生新扩展;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趋势没有变,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任务仍很艰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但反全球化的逆流给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带来重重挑战;文明交流互鉴大趋势没有变,但“西方中心主义”严重阻碍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进步。^[54]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应对之策:一是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二是发挥引领时代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稳致远;四是守正创新,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55]

(三) 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

形成脉络。齐秀强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系统总结发展经验教训、精准把握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发展战略,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的能力和水平。具体表现为: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我国发展面临突出问题的现实回应、对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科学判断。^[56]

理论基础。齐秀强认为,共享发展理念的理

论基础有两个。一是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享发展思想,具体包括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内容是共享发展成果,关键是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实现路径是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二是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共富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共享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构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思想。^[57]

基本内涵。齐秀强认为,共享发展理念内涵丰富,可从对象、主体、途径、过程四个维度进行把握,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58]

民生意蕴。齐秀强认为,共享发展理念蕴含着强烈的民生意蕴,主要表现在:一是实现教育公平均衡发展;二是着力促进就业创业;三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四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五是坚决消除贫困。^[59]

价值维度。齐秀强认为,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维度表现为: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60]

当代价值。齐秀强认为,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价值在于实现了对传统“共享”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转化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共享共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实现了对西方“共享”思想的借鉴和升华。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内在价值意蕴,有助于更好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新时代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二是其世界意义在于,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61]

实现路径。齐秀强认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一是筑牢共享发展的基础,包括夯实共享发展的价值根基,巩固共享发展的现实基础。二是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表现为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平衡贫富关系。三是健全共享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以

人民为中心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保障共享发展的基本民生制度，完善保障共享发展的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制度。四是完善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包括完善共享发展的联动参与机制，完善共享发展的利益整合机制，完善共享发展的保障机制，完善共享发展的监督评价机制。^[62]

（四）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2022年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河北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刘文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品质、创新性贡献和世界性价值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品质表现在：一是从政治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伟大的政治目标、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坚强的政治保证；二是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而来并锚定未来民族复兴的实践指向；三是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四是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将面向未来证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创新性贡献表现在：一是双循环格局的市场化改革为当代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二是高质量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提供了示范性经验；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大创新性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绩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各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力量与骨气，具有明确的世界性价值。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希望独立自主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选择；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为渴望和平稳定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执政经验；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坚定信仰的力量，创新发展的志气、骨气与底气。^[63]沙占华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世界意义在于：一是成功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有力驳斥了西方现代化的“一元论”

谬误；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向全世界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图景；三是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境界；四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64]

王昆、孙琳琼、解缙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及其彰显历史辩证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进行了探讨。王昆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包括：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三是坚持倡导和平发展的价值取向。^[65]孙琳琼、解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历史辩证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主要表现在：一是新道路彰显了尊重现实个人的主体性维度；二是新道路彰显了立足现实美好生活的价值性维度；三是新道路彰显了把握主要矛盾分析大势的能动性维度；四是新道路彰显了具有普遍性特征个体的现实性维度；五是新道路彰显了坚持运用历史思维的发展性维度。^[66]

沙占华、乔正悦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基本经验及世界意义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开启现代化建设扫清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蓝图。^[67]沙占华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探索表现为：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新发展；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的新部署；三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旨归的新阐发；四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保证的新认识；五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新凝练。^[68]沙占华、乔正悦认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二是坚持走自主现代化之路；三是坚持人民至上；四是坚持全面协调发展；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六是坚持开放包容。^[69]

（五）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

历史演进。沙占华、乔正悦认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演进，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系统阐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与创新的过程。^[70]

特点。沙占华、乔正悦认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具有继承发展性、现实针对性以及深刻的人民性等特点。^[71]

宝贵经验。沙占华、乔正悦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包括始终坚持党对推动共同富裕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始终注重与时俱进地调整推动共同富裕的策略。^[72]郝飞飞、任霏、刘欢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一是根本保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根本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根本原则——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原则。^[73]

任亮提出，共同富裕不是“福利主义”，基于三个维度把握：一是从积累维度看，共同富裕基于共同奋斗与做大做好“蛋糕”；二是从分配维度看，共同富裕奉行量力而行与公平正义；三是从发展维度看，共同富裕指向物质精神兼顾与动态统筹渐进。^[74]乔荣生、安巧珍也认为，我国的共同富裕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75]

张彦台认为，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一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普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分好“蛋糕”，缩小收入差距及生活水平差距；三是通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76]

申文杰、李泽璐提出，要重视文化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文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特定导向力；二是文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深厚鼓舞力；三是文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凝聚力；四是文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支撑力；五是文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77]

（六）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倩认为，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力，一要拓展线上平台；二要加强智库合作；三要创新文化产品。^[78]王菲认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二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三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化、大数据技术，创新方式方法。^[79]戴建兵、赵雪飞还对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思想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助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质增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智慧方案和推动力。^[80]

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李维意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表现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蕴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承载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其精神价值在于：革命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治党兴党的精神钙质、兴军强军的精神基石、铸魂育民的精神资源。新时代弘扬革命文化重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铭记革命文化的光辉史迹、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筑牢革命文化的坚定自信、赓续革命文化的不朽精神。^[81]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题，姜汪维、夏文斌认为，人民主体性的构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理论创新，为构建文化的人民主体性提供理论依据；二是创新发展人民政治，为构建文化的人民主体性提供制度保障；三是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构建文化的人民主体性提供实现途径；四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构建文化的主体性提供组织保证。^[82]

关于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实现路径，王妍认为，文化自信在内涵上主要包括：其一，一定的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肯定性评价和内心由衷的自豪感，并积极传承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其二，一定的文化主体能理性和客观看待自身文化，并对自身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具有坚定的信念；其三，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包容，并在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和竞争中逐步树立自信。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起文化自信的鲜明旗帜；二是推进新时代文化理论创新，注重世俗文化形态方面建设；三是增强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培育不同阶层群体的文化自信；四是促进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加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建设。^[83]

另外，张保同还提出，为文化“走出去”

提供人才支撑：一要加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二要培育人才视野的国际性；三要拓展人才能力的创新性；四要增强人才队伍的专业性；五要提升人才评价的科学性。^[84]

（七）人民至上

王菲认为，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新时代为民造福就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85]

孟庆云认为，《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一书将“人民至上”这条红线一以贯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博大情怀，具体体现在：一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二是以百姓心为心，“始终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做人民的勤务员，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执政理念。^[86]刘兵也认为，学好用好这本著作，可以汲取“人民至上、不负人民”的奋进力量，提升党性修养、强化责任担当，具体表现为：一是感悟领袖从政风范，厚植为国为民高尚情怀；二是感受领袖人格魅力，增强一心为公党性锻炼；三是牢记领袖谆谆嘱托，践行为民服务初心使命。^[87]

任亮提出，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依靠劳动创造，必须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88]

（八）初心使命

李鉴修认为，让初心使命在内心深处真正扎根，既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奋斗实践问题。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滋养初心使命；三要在实践创造中淬炼初心使命；四要以斗争精神砥砺初心使命。^[89]

（九）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邢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意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坚定理想信念是党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撑；其二，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其三，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90]

（十）“两个确立”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历史决定，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杨东广对全面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定位进行了探讨，一是“两个确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奋斗的结晶；二是“两个确立”充分彰显了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三是“两个确立”为走好新的“赶考”路提供了历史动力。^[91]

2022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但也应看到，河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突出表现为：从发表类型看，专著占比近7%，核心期刊类文章占比近20%，报纸类文章占比近30%，普通刊物文章占比近43%，与2021年相比，研究成果质量虽有所提高，但普通刊物发表的文章占比依然较大，高质量研究成果数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研究内容看，尽管对学术前沿问题有所探讨，但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再加上对党的创新理论解释多，创新少，导致高水平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对经济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明显不足。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视域，力争多视角多维度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不断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发表质量，助力推动河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杨春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周振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J].中华魂,2022(2).
- [2]魏先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时代逻辑[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
- [3]杨春娟,刘书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彰显丰富意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4.
- [4]杨春娟,刘书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彰显丰富意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4.
- [5]魏先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时代逻辑[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
- [6]魏先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时代逻辑[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
- [7]李鉴修.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

- [8] 申文杰. 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整体性研究[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 [9] 申文杰. 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整体性研究[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 [10] 申文杰. 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整体性研究[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 [11] 申文杰. 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整体性研究[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 [12] 李素霞, 付臻. 扎实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四个着力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 [13] 路晓峰. 以整体性思维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 [14] 张泗考, 杜成斌. 数字技术助力提升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能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 [15] 赵学琳, 王浩宁.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 [16] 张茂杰, 樊瑞科. 理论、现实与实践: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三重逻辑[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 [17] 张祥竞, 王志民, 赵冬云.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2.
- [18] 张祥竞, 王志民, 赵冬云.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2.
- [19] 张祥竞, 王志民, 赵冬云.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2.
- [20] 田海舰, 冯艳彬.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研究[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 [21] 张祥竞, 王志民, 赵冬云.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2.
- [22] 田海舰, 冯艳彬.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研究[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 [23] 杨福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2.
- [24] 李颖, 豆颖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思考[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 [25] 杨福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2.
- [26] 李颖, 豆颖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思考[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 [27] 李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运用研究[J]. 保定学院学报, 2022(6).
- [28] 王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J]. 观察与思考, 2022(6).
- [29] 康振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理论实践贡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2-23.
- [30] 王志秋, 任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贡献[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2(2).
- [31] 康振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理论实践贡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2-23.
- [32] 覃志红.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特征新要求[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2-23.
- [33] 苏锐, 赵蕾. 试论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与构建价值[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 [34] 张青卫. 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6).
- [35] 张青卫. 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6).
- [36] 张青卫. 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6).
- [37] 孙琳琼, 丁凯. 新时代“劳动创造幸福”的逻辑探析[J]. 宁夏党校学报, 2022(4).
- [38] 郝飞飞.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价值向度、内容要义及实践要求[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 [39] 郝飞飞.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价值向度、内容要义及实践要求[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 [40] 郝飞飞.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价值向度、内容要义及实践要求[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 [41] 安巧珍, 武娜娜. 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和时代特征[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0).
- [42] 安巧珍, 武娜娜. 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和时代特征[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0).
- [43] 王菲.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人民主体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及内在逻辑[J]. 观察与思考, 2022(1).
- [44] 王菲.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人民主体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及内在逻辑[J]. 观察与思考, 2022(1).
- [45] 柴艳萍, 张函慈.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文明蕴含及深远影响[J]. 理论视野, 2022(10).
- [46] 张笔超. 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融入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2(2).
- [47] 张笔超. 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融入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2(2).
- [48] 王菲.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 中华魂, 2022(5).
- [49] 乔荣生, 陈曦, 周静莉. 从哲学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发展重要论述[J]. 共产党员(河北), 2022(24).
- [50] 张素芬, 于丽霞. 习近平正定人才观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启示[J]. 邢台学院学报, 2022(4).
- [51] 张素芬, 于丽霞. 习近平正定人才观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启示[J]. 邢台学院学报, 2022(4).
- [52] 牛余庆, 牛家骄.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J]. 共产党员(河北), 2022(7).

- [53]魏先法.从历史高度认识新时代“必由之路”[J].共产党员(河北),2022(9).
- [54]张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要义与科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55]张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核心要义与科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56]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57]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58]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59]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60]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61]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62]齐秀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63]刘文勇.中国式现代化的遵循与创新[J].天津社会科学,2022(6).
- [64]沙占华.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探索及世界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12).
- [65]王昆.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4.
- [66]孙琳琼,解缙.中国式现代新道路深刻彰显历史辩证法意蕴[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67]沙占华,乔正悦.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及基本经验[J].党政干部学刊,2022(11).
- [68]沙占华.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探索及世界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12).
- [69]沙占华,乔正悦.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及基本经验[J].党政干部学刊,2022(11).
- [70]沙占华,乔正悦.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思想演进及实践经验[J].创新,2022(6).
- [71]沙占华,乔正悦.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思想演进及实践经验[J].创新,2022(6).
- [72]沙占华,乔正悦.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思想演进及实践经验[J].创新,2022(6).
- [73]郝飞飞,任霏,刘欢.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百年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74]任亮.共同富裕不是“福利主义”[N].中国教育报,2022-07-07.
- [75]乔荣生,安巧珍.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16.
- [76]张彦台.推动共同富裕,共创美好生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6-22.
- [77]申文杰,李泽璐.重视文化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16.
- [78]许倩.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01.
- [79]王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中华魂,2022(5).
- [80]戴建兵,赵雪飞.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01.
- [81]李维意.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精神价值和自觉弘扬[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82]姜汪维,夏文斌.人民主体性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
- [83]王妍.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及实现路径[J].才智,2022(2).
- [84]张保同.为文化“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撑[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01.
- [85]王菲.坚持人民至上[J].中华魂,2022(2).
- [86]孟庆云.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J].红旗文稿,2022(13).
- [87]刘兵.人民至上,不负人民[J].红旗文稿,2022(14).
- [88]任亮.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N].光明日报,2022-06-27.
- [89]李鉴修.让初心使命在内心深处真正扎根[N].河北日报,2022-02-26.
- [90]邢帅.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意蕴[J].人民论坛,2022(18).
- [91]杨东广.全面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定位[J].共产党员(河北),2022(9).

精神文明研究

郑英霞 鲍志伦

2022年,精神文明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河北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发展开展深入

研究,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并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政策性

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为全社会研究这一领域问题提供了学术规范、价值准则和创新意识的范本。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精神文明理论,并且推动了精神文明实践向纵深发展。

一、精神文明理论研究

(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颖、豆颖康认为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和根本使命,创新创业教育则应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实践各个环节,转化为师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深入剖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价值引领西化、价值判断物化、价值取向功利化等价值偏差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具有“定盘星”“助推器”“精气神”等价值引领作用,厘清二者间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由情感认同到价值认同、由思想自觉到行为转化的内在机理,运用“三因”理念把握“事”与“化”、“时”与“进”、“势”与“新”的辩证关系,为当前教育价值偏差问题开出以知促创、以行促创、以文促创的“对症下药”。^[1]近年来,学者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杨彦京、王晓明认为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基础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实现路径。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需要增强相关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今后的研究重点是: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基础理论研究视角;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内容研究的系统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实现路径研究的创新性。^[2]

(二) 关于文化软实力

安巧珍、武娜娜阐明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时代方位,深刻洞察国内外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公平正义、怎样实现公平正义”这一时代主题,聚焦收入分配、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生态文明、民生保障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论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

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统一、坚持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相统一、坚持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时代特征,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郝飞飞阐述了习近平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发展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在“两个大局”相互激荡的局势下谋划整个世界和中国发展,彰显了国际和国内相统一的价值向度。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在理论层面阐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释义、功能特性、制度创新、战略地位及目标导向的内容要义,侧重回答“怎么看”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明确了在推进共同富裕实践中需要把握主体的全民性、内容的全面性、过程的渐进性及结果的相对性的实践要求,侧重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为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行动指南。^[4]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以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为主题,揭示了奋斗与幸福的逻辑关联。张青卫论述了这一幸福观的核心要义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深化了将个人幸福融入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价值观,它萌生于习近平知青岁月的特殊成长经历,根植于习近平带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实践,而新时代客观的社会物质、制度条件为人们通过奋斗体会到幸福提供了物质基础,保障了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作为一种革命性实践、创造性劳动、合目的性活动的奋斗本身蕴含着人们对幸福感的体验;在新时代,只要奋斗就能体会到幸福,也只有奋斗才能不断地感受到幸福,保证了奋斗行为与幸福目标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立足于唯物史观将个人奋斗与人民幸福紧紧地联系起来,既提升了奋斗的价值,也抬高了幸福的层次,它以“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精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新时代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科学指南,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勇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力量。^[5]路晓锋阐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不断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既是一个涉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需要以整体性思维加以把握的理论命题。我们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整体方位、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整体资源、现实社会

与网络空间的整体场域等多个层面,把握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重要意义、主要原则和实际效能。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整体方位,认识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重要意义。融合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整体资源,明确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主要原则。关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整体场域,检验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实际效能。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是一个长期性、系统化、渐进式的历史进程。^[6]李素霞、付臻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工程。扎实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因应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势,遵从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规律,针对问题提出有效举措,务求把握根本点、聚焦敏感点、突出新兴点、夯实基础点,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内容上综合统筹、方法上精准发力,从而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把握根本点,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聚焦敏感点,抓准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领域和内容;突出新兴点,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创新;夯实基础点,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保障。^[7]“四个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高度,对党的建设重要经验的科学总结。秦善进、张文彬、郭兆祥认为从党史发展进程看,“四个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理论渊源。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思想中蕴含着跟“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相关的若干元素。新时代加强李大钊思想研究,可以为有效增强“四个意识”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8]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底色。郝飞飞、任霏、刘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经历了长期的奋斗历程,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共富之路。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小康的如期建成,这期间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十四五”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百年诞辰的今天来总结我们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对整个人

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

(三)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青年如何回答好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重大课题?石立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共青团要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共青团要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10]中国特色通识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精神为引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新时代发展之需而生。秦飞、孙正林认为对于理工类院校来说,要特别注意培育中国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特色通识教育,发挥其提升文化自信、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实践育人等功效。对此,文章提出可以通过在顶层设计搭建通识教育的“一把手工程”,课内打造彰显中国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金课”,课外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等路径,切实提升高校通识教育铸魂育人功能。^[11]爱国主义教育永恒的主题,“四史”教育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载体。田颖从历史维度、心理维度、社会维度分析以“四史”教育为载体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从而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自觉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同时,“四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密切关联,具有内在统一性,可以从中汲取爱国主义教育养分,并探索以“四史”学习为载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坚的精神根基。竞辉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依旧风华正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而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本传统”“革新思想”“和合理念”“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等文化基因,借助文化固有的整合与认同力量实现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在新时代,要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就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3]

二、精神文明实践研究

(一) 关于红色文化建设实践

河北省为红色文化的起源地之一,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乔芬、张靖、冯莉莉、李晶、吴艳萍、刘虹伯分析了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体为:有利于青年抵御负面因素的影响,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反驳历史虚无主义,推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有利于战胜利己主义的挑战,增强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将河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为: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实践教学为主阵地,师资队伍为主力军,网络新媒体为载体,协同育人机制为保障。^[14]红色是共和国的颜色,象征着信仰与希望。范欣、韩琳琳、杨静如、寇志霞分析了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光辉历程中铸就的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内涵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生命之魂、生存之根、发展之本,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在思政课教学中注入红色资源,铸牢红色底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增强理想信仰,深化理论认知,陶冶情操情怀,读懂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红色基因密码,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15]“狼牙山五壮士”系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涌现出的一个战斗英雄群体,是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誉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杨倩如认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对于这一英雄集体隆重、盛大、高规格的表彰纪念,以及众多宣传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工作者对英雄事迹及时、迅速地报道和精彩、深入的宣传,都发挥了空前的榜样示范效应,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敌斗志和必胜信念。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涌现出的众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集体,凝聚、升华成为新时期的“狼牙山精神”和“中国军魂”。^[16]红色文化是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核心要素,是建设品质生活之城的重要力量。魏尔雅、曹森旗、刘丽斌分析了保

定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开展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拥有众多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对保定市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以及对开发路径的探析,以期打造“文化保定”品牌,建设“品质保定”生活之城提供有效的助力。^[17]图书馆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任民锋、薛梅通过分析图书馆红色文化的含义,从精神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重要意义三个方面阐述了图书馆红色文化,并提出充分、高效地利用图书馆物理空间和技术设备优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红色文化活动,跨界合作整合资源形成红色文化的保护合力的建议和意见,达到全民保护意识提高和红色文化素养加强的效果和成效,最终实现图书馆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目的。^[18]

(二) 关于领导文化建设实践

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才能认识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亦是如此。姜汪维、夏文斌认为围绕构建文化的人民主体性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沿着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以人民政治保障人民文化权利实现,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四条主线,不断促进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形成彰显人民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的人民主体性文化,以其价值理念的先进性、文明基因的独特性,以及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性,不仅扬弃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而且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精神动力。^[19]

(三) 关于网络文化建设实践

赵学琳、王浩宁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反映与表现,是数字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新领域和新内容。全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基础。大力创新网络核心技术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手段。科学开展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持续优化系统科学的评价机制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保障。充分发挥制度和法治的功能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方式。^[20]

(四) 关于政治生态建设实践

柴艳萍、张函慈分析了近代以来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文明,这种形态在对立

中存在、发展,其局限在大变局中突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世界经济要由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生态文明要由征服索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政治秩序要由霸权欺凌转向平等尊重,文化发展要由隔阂冲突转向交流互鉴,这样一些思想理念,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起着重要作用。^[21]

(五) 关于家风建设实践

张笔超论述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政治建警、从严治警的要求下,优良家风的涵养与培育是优化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培育红色家风文化、完善从严治家制度、树立优秀家风模范典型等实现路径的探究,使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更好融入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并以此构建公安民警情感依托、强化公安民警责任担当、发扬公安民警家庭美德,推动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22]

(六) 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实践

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的集萃,与乡村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高玉敏乡风文明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构建“内生式”建设机制:深挖文化根脉,唤醒乡民的文化自觉,增强乡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家风家训、培育新时代好家风;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乡村儒学,烛照乡村文明的传承;将传承和创新传统耕读文化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人,全面提升人文素质,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3]高玉敏阐述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已经由理论探讨走向实践层面。但在当下的诸多实践中,乡村文化振兴还面临着内涵和目标不清晰、实践主体缺位、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文化活动匮乏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等困境,因此界定和厘清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目标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文化内生性视角,建构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空间—活动—产业”的四维框架,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推进路径。^[24]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乡村风貌、促进乡村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推动和谐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郝赫通过综合来看,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农民在城乡文化认知上有明显偏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应通过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加强农民文化建设主体意识培育、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监管与管理等有效途径,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深入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25]

三、理想信念与时代精神研究

(一) 关于理想信念

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两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牧虹和卢肃在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团结就是力量》。赵会分、李芬首先分析了《团结就是力量》的“力量”;然后阐明了《团结就是力量》之所以如此有“力量”,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最后强调《团结就是力量》之所以如此有“力量”,还体现在它的音乐上。^[26]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埋头苦干、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是中华民族由贫弱到富强的演变进程。安巧珍、武娜娜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即将迎来中华民族强起来。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挖掘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内涵,从内涵演变、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实践经验等内在逻辑维度,系统地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科学总结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解决新发展阶段的新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27]赵文菁、龚志宏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能够助力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引领作用,使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并拓展“课程思政”守正创新的理论载体。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融入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应当从准确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中的思政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师资队伍、健全体制机制几个方面着手,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

谱系融入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效性。^[28]回顾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党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撑。邢帅分析了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坚定理想信念是党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撑,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29]

(二)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奋斗历程,既为我们开创下一个一百年新征程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我们继续前进提供了精神力量。王英杰、王昆对待党的百年历史的基本立场进行了分析,指出: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30]李云霞、杨曼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历经百年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完成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伟大历史性飞跃,对我国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机活力,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和趋势,“双创”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发展进步。^[31]

(三) 关于赶考精神

赶考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内核、为理想拼搏奋斗的意志张力、自我革新的健康密码等。赵雪飞阐述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中,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精神圭臬、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基石、领导人民实现国家持续繁荣富强的力量源泉和拒腐防变的“防火墙”,发挥着重大激励和引领作用。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路上,赶考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的航标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器和实现人民美好向往的压舱石,为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32]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张勇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继续考出好成绩,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33]

(四) 关于北京冬奥精神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鲜活的素材、生动的故事。翟丹丹、张锡指出冬奥会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育人价值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讲好中国百年奥运历程,讲好北京冬奥的巨大成功,讲好北京冬奥精神,讲好“一起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讲好北京冬奥故事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通过给青年大学生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勇挑重担、堪当大任,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世界、展现担当。^[34]

(五) 关于李保国精神

李亚青、孙佳艺阐明李保国精神是在时代浪潮中形成的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将李保国精神融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强化大学生爱国认知、厚植大学生爱国情感、砥砺大学生强国之志,从而使其怀有“精忠报国”之心。李保国精神包含着期盼祖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民族精神与开拓创新的科研精神,与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映射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承载着丰富的新时代爱国主义内涵。李保国精神融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需兼顾好基本内容、群体对象、载体手段以及氛围营造四个方面。^[35]

（六）关于中国女排精神

许珂、冯斌、孙昌辉、陈月认为高等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为目的，将学科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方法融合是“大思政课”开展有效途径之一。将中国女排精神的内容、意义、实质结合进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育教学当中，必然会对培养全面发展的国际化青年人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激发并塑造其牢固的爱国热情、感恩的情怀，肩负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以此来保证在进行高校思政相关教育教学过程当中表现出主体的思想性、事实的理论性、实施的亲和性以及问题的针对性等教育属性。^[36]

（七）关于塞罕坝精神

塞罕坝精神是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不仅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而且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武娜娜认为塞罕坝人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塞罕坝林场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范。塞罕坝精神激励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世界生态文明。以绿色发展为价值追求的塞罕坝精神，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世界人民应携手一起向未来，为建设绿色家园作出贡献。坚持绿色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7]高妍夏、王晖、黄露、马超、李季生、李娜的论文在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塞罕坝精神和承德市绿色发展体系的研究现状，即：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绿色发展面临许多挑战，绿色发展处于重要时期；针对性开展调查和访谈，将社会学科与生态学、农学知识等相结合，多维度进行探究，探索塞罕坝精神指导下承德绿色发展体系构建的主要任务，即：科技创新中注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针对特色资源生态化管理，着力构建多部门配合、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新格局；正确处理“环境要绿”和“百姓要富”的关系，把造林绿化与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相结合。^[38]

（八）关于建党精神

聂艳秀、高晨晓分析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用真理的力量引领时代新人坚守理想、以担当作为锤炼时代新人实践品格、用勇于奉献磨炼时代新人意志品质、以人民的立场锻造时代新人政治定力，为时

代新人培育指路明灯。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养，就要加强教育引导、组织社会大课堂、把握志愿服务契机、建设文化环境、讲好革命故事，增强多方协同作用，强化实践自觉；教育引导青年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理想 and 为人民幸福而永久奋斗的价值追求。^[39]

（九）关于西柏坡精神

郭建、张振杰认为西柏坡精神源于西柏坡时期党的伟大实践，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植根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并在革命文化滋养中形成、发展，与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精神谱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站在历史的新征程新起点，其包含的“两个一切”的人民至上精神、“两个敢于”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善于”的立国兴邦精神和“两个务必”的不懈赶考精神仍然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继续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40]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姚志军、姚雷阐明了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续延安时期相关的思想理论思考，总结升华党带领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推动中国历史转折的历史经验，凝练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两个务必”思想具有丰富鲜活的辩证意蕴，包括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钢铁纪律与优良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到底与经受考验、推动历史进步与阻碍历史车轮前进、预防贪污腐化与防止垮台失败、夺取胜利与巩固胜利、“当官做老爷”与“为人民服务”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两个务必”思想在新时代必将得到永续传承，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41]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刘欢、任霏分析了西柏坡时期，党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斗争精神，将敢于斗争与善于建设、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提升斗争策略与增强斗争本领结合起来，将斗争对象与统战对象严格区分开来，塑造了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形成了坚持敢于斗争的宝贵实践经验。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斗争，必须把握伟大斗争目的，明确伟大斗争内容，提升伟大斗争艺术，同时还要理顺伟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关系。^[42]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奋斗史。民族复兴包括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方面。刘欢、葛玮钰阐明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取得解放战争的决胜性胜利，为人民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根本前提；将革命进行到底、擘画新中国的蓝图，为民族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党领导民族复兴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确保党对民族复兴事业的坚强领导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继续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创造了前提、提供了动力。^[43]

(十) 关于一二九师精神

徐雁红、李怀、侯居在阐述了“一二九师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体现，也是邯郸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支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精神内涵对于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锤炼担当品格、培养创新精神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将“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价值引领，弘扬特色文化，形成协同效应，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和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44]

精神文明研究呼唤科学有效的理论研究支撑。河北学者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实践需要，在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精神文明实践研究和理想信念与时代精神研究等重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展望未来，紧扣时代需要，精神文明理论研究者应坚持学以致用，强化用以致学，拓宽研究视野，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建党精神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探索，贯通历史、理论与实践，提升规律性探究的科学性、指导性，在精神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深融互促中，推进具有中国气派、河北特色的精神文明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郑英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讲师团工作处一级调研员；

鲍志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李颖, 豆颖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思考[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

[2] 杨彦京, 王晓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研究述评[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2(2).

[3] 安巧珍, 武娜娜. 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和时代特征[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0).

[4] 郝飞飞.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价值向度、内容要义及实践要求[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0).

[5] 张青卫. 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6).

[6] 路晓锋. 以整体性思维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7] 李素霞, 付臻. 扎实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四个着力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8] 秦善进, 张文彬, 郭兆祥. “四个意识”视域下的李大钊思想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2(3).

[9] 郝飞飞, 任靠, 刘欢. 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百年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0] 石立国. 回答好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重大课题[J]. 共产党员(河北), 2022(6)上.

[11] 秦飞, 孙正林. 理工类院校中国特色通识教育的育人功能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21).

[12] 田颖. 以“四史”教育为载体加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J]. 大众文艺, 2022(11).

[13] 竟辉.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8).

[14] 乔芬, 张靖, 冯莉莉, 李晶, 吴艳萍, 刘虹伯. 河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8).

[15] 范欣, 韩琳琳, 杨静如, 寇志霞. 红色基因：高校思政课的目标认知与实践路径解析[J]. 邢台学院学报, 2022(3).

[16] 杨倩如. 红色经典中“狼牙山五壮士”的宣传报道与叙事研究[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9).

[17] 魏尔雅, 曹森旗, 刘丽斌. 品质之城建设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析——以保定市为例[J]. 河北科技图苑, 2022(11).

[18] 任民锋, 薛梅. 图书馆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研究[J]. 文化学刊, 2022(2).

[19] 姜汪维, 夏文斌. 人民主体性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2).

[20] 赵学琳, 王浩宁.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逻辑[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29.

[21] 柴艳萍, 张函慈.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文明蕴含及深远影响[J]. 理论视野, 2022(10).

[22] 张笔超. 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融入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

- 育研究[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2(2).
- [23]高玉敏.乡风文明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四川戏剧,2022(7).
- [24]高玉敏.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涵与推进路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7).
- [25]郝赫.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文化建设思考[J].南方农业,2022(6).
- [26]赵会分,李芬.《团结就是力量》的“力量”分析[J].大舞台,2022(2).
- [27]安巧珍,武娜娜.百年党史“三个起来”的逻辑理路[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28]赵文菁,龚志宏.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融入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11).
- [29]邢帅.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意蕴[J].人民论坛,2022(9).
- [30]王英杰,王昆.对待党的百年历史的基本立场[J].共产党员(河北),2022(2)上.
- [31]李云霞,杨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世界历史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1-4.
- [32]赵雪飞.赶考精神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3).
- [33]张勇.新征程上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J].共产党员(河北),2022(8)上.
- [34]翟丹丹,张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北京冬奥故事的路径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9).
- [35]李亚青,孙佳艺.李保国精神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9).
- [36]许珂,冯斌,孙昌辉,陈月.融合中国女排精神培养高校国际化人才的探索研究[J].公共世界,2022(12).
- [37]武娜娜.塞罕坝精神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8-3.
- [38]高妍夏,王晖,黄露,马超,李季生,李娜.塞罕坝精神视域下承德绿色发展体系的构建研究[J].现代农村科技,2022(10).
- [39]聂艳秀,高晨晓.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育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2(6).
- [40]郭建,张振杰.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J].理论视野,2022(6).
- [41]姚志军,姚雷.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思想的辩证意蕴探析[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12).
- [42]刘欢,任霏.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0).
- [43]刘欢,葛玮钰.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复兴的实践探索及其时代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10).
- [44]徐雁红,李怀,侯居在.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田海舰

2022年,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教育等主题和论域,河北省学者展开深入研究,呈现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研究同向同行、理论前沿研究与现实热点研究交织的特点,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王莉的《新时代高校铸魂育人目标导向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吕健的《生态视角下高校教育教学研究》^[2]、张保同的《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3]。

牛余庆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任务、方针原则、基本要求,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4]

张青卫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以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为主题,揭示了奋斗与幸福的逻辑关联。这一幸福观的核心要义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深化了将个人幸福融入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价值观,它萌生于习近平知青岁月的特殊成长经历,根植于习近平带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实践,而新时代客观的社会物质、制度条件为人们通过奋斗体会到幸福提供了物质基础,保障了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作为一种

革命性实践、创造性劳动、合目的性活动的奋斗本身蕴含着人们对幸福感的体验；在新时代，只要奋斗就能体会到幸福，也只有奋斗才能不断地感受到幸福，保证了奋斗行为与幸福目标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立足于唯物史观将个人奋斗与人民幸福紧紧地联系起来，既提升了奋斗的价值，也抬高了幸福的层次，它以“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精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新时代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科学指南，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勇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力量。^[5]

竟辉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坚的精神根基。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依旧风华正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而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本传统”“革新思想”“和合理念”“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等文化基因，借助文化固有的整合与认同力量实现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在新时代，要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就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又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在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中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6]

安巧珍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劳动与教育相互促进。新中国的劳动教育经历了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得到发展”，从新时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到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阶段。19世纪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教育与劳动分离的实践促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形成，该理论推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并形成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进而促进教育强国的实现。^[7]

李亚青、刘欢认为，不同媒体的深度融合折射出不期而至的融媒体时代。融媒体的发展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存在着

诸如言论失控风险犹存、融媒体思维相对缺乏、融媒体实践能力不足等难点与挑战。新时代高校要从把稳融媒体育人方向、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优化融媒体传播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入手，探寻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之道。^[8]

闫晓静等认为，新媒体背景下，面对网络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者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推动教育内容创新、实施多元化教学模式，严格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基本准则，促进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但也面临着新媒体时代多样化趋势、新媒体信息消解大学生的社会认知等挑战。思政教育工作者要积极融入新媒体，探索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创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科技协同发展。^[9]

王雅丽、焦延楠提出，新时代大学生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参与者和生力军，重视规则意识教育，引导他们养成遵守规则、敬畏规则、信仰规则的良好习惯，对于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意义重大。要筑牢规则意识教育的根基、发挥好高校的主阵地作用、创建良好的规则环境，不断提高大学生的规则意识。^[10]

刘艳冬、王岩指出，农村思政工作普遍存在效率低、效果差的缺陷，要立足多维度解析农村社会关键问题，全面解析新时期农村社会主要矛盾，顺应农村社会运转机制，努力培养新型农民为抓手创新农村思政工作机制，突出新时期农村社会政治生态和谐，以丰富教育载体为手段创新农村思政工作机制，确保农村思政教育的风俗改良、品行指导及社会治理等功能良好运行。^[11]

二、思政课教学研究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李双印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思与行》^[12]、解丽君的《高校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与思政课教教学研究》^[13]、李鸿雁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14]。

尹喆认为，深刻把握“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这一论断，需要从内容范畴、作用机理、实践进路三方面加以深入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向学生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发展的最新道理。应不断在道理的透彻研究中,在道理的生动实践中,在道理的网络表达中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如此,才能用科学的思想理论铸魂育人,启发学生明辨是非,勇立潮头,引导学生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从而达到沟通行为、启智润心的效果。^[15]

李海、董利群认为,高校思政课借“他山之石”,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感悟中国奇迹,坚定“四个自信”;克服逆反心理,增强理论认同;提高辩证分析能力,抵制错误思想侵蚀;开拓国际视野,把握世界大势。思政课教师撷取“他山之石”,应坚持紧扣主题、择优选材,严格筛选、去粗取精,分类归纳、加工处理等原则;使用“他山之石”,应坚持材料运用的高度适切性、观点解读的唯物辩证性、价值评判的正确导向性等原则。^[16]

高姗姗认为,教学话语体系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具有很大推动作用。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的学习和表达方式与传统时期相比发生很大变化,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学话语。而目前的高校思政课教学话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抽象理论与丰富实践的背离、话语内容的固化与形式的老旧、话语的供应与学生需求的矛盾等,需要加强改革和创新。^[17]

郝保英、王涛认为,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性体现在教学目标的价值塑造性、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性、教学方法的创新协同性以及教学测评的互动有效性四个维度。落实“大思政课”理念,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增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效果需要从课程体系、工作体系与机制体系等方面着力,进而实现高校思政课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立德树人目标。^[18]

翟丹丹、张锡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鲜活的素材、生动的故事。冬奥会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育人价值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讲好中国百年奥运历程,讲好北京冬奥的巨大成功,讲好北京冬奥精神,讲好“一起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讲好北京冬奥故事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通过给青年大学生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弘扬

北京冬奥精神,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勇挑重担、堪当大任,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世界、展现担当。^[19]

刘子义等认为,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四史”内容总体是零散的碎片化知识,开设“四史”选择性必修课是对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的必要补充和延伸。高校开设“四史”选择性必修课,需要处理好与“纲要”课和“概论”课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四史”课与各门课之间的关系,要注意培育方案和必修性质、授课教材、开课时段、选课和考核、师资招聘和管理等问题,形成“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为补充、互为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以实现思想政治课程效度的提升,弥补高校历史教育的不足和短板。^[20]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引发高校“学什么”和“怎么教”的颠覆性改变。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思政课课堂教学困境,特别是线上教学的现实挑战,魏建丽、侯居荏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为例,探索在有效教学理念指导下基于对分课堂和学习通的教学模式。通过智慧教学工具和教学模式融入教学,重构教学流程、调整教学内容、创新考核评价方式,以提升教学有效性。^[21]

张瑞芳、徐鹏杰认为,高校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建设,具有巩固高校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推进高校教育理念革新,明确高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战略目标的价值逻辑;具有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引领下的“育人共同体”,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的“资源共享体”,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引领下的“德才耦合体”的理论逻辑;具有理念引领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师资引领强化课程思政协同团队,方法引领创新课程思政方法路径的实践逻辑。^[22]

巩竞以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为例,通过分析社会实践教学实施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以政治属性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观”为依据,凸显多元协同创新的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思路;同时,从拓展社会实践教学空间,优化社会实践教学内容,提升社会实践教学水平,共筑社会实践教学共同体等方面探讨了实施路径,为打造思政社会实践“金课”提供支撑。^[23]

高姗姗认为,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的重要原则。守正，即守根本，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守住“意识形态”之正、守住“课堂教学”之正、守住“教师队伍”之正。创新，即创活力，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教学内容”之新、创“教学话语”之新、创“教学形式与方法”之新。警察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要更加强调政治育人与警察意识的培养。^[24]

刘长龙提出，公安院校思政课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要注重知识载体基础上的价值引领，聚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和学生主体地位生成，促进灌输内容和启发方式有机融合，重视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在讲深、讲透、讲活上下功夫，提升讲道理的实效性。^[25]

王璐认为，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构建网络教学平台能够解决学生的工学矛盾，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对提升成人教育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有积极影响。创建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重点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打造精品课程、构建和应用网络教学平台，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成效的关键举措。^[26]

郝瑞斌等认为，当前大学生信教问题比较突出，并且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倾向。这种现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这也是其地位和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程目标要求所决定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不仅不会妨碍，而且有益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关键在于在教学上适当增加相关的内容，锻造出一支信念坚定、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在高校内部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27]

三、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赵文菁、龚志宏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能够助力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引领作用，使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并拓展“课程思政”守正创新的理论载体。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融入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应当从准确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中的思政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师资队伍、健全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融入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效性。^[28]

李凯伦指出，进行《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该课程面临着教学内容陈旧、与思政内容结合度低、教学理念滞后、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部分教师的思政理论研究重视度和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打造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理念、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对该课程的思政教学进行探索和实践。^[29]

张梅认为，“出入境证件鉴别”作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核心专业课，属于文件检验学范畴，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工科课程。目前该课程思政建设在元素凝练及融入路径方面，尚存在单一和“两张皮”的现象。为此，应重塑“宏观—微观”二级思政元素构成体系，构建“基础—高阶”二级映射式思政融入路径的体系化建设思路，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效结合，潜移默化地树立起学生正确的思政观。^[30]

张笔超认为，在政治建警、从严治警的要求下，优良家风的涵养与培育是优化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培育红色家风文化、完善从严治家制度、树立优秀家风模范典型等实现路径的探究，使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更好融入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并以此构建公安民警情感依托，强化公安民警责任担当，发扬公安民警家庭美德，推动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31]

蔡振禹等分析了课程思政融入高校工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以及高校培养工科人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以及工科人才的特征，提出从教师考核制度改革、教师课程思政培训、教师教学模式改革、专业课程设置改革、学生考核制度改革等路径，让课程思政融入高校工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促进工科人才的全面发展。^[32]

吴克燕、杜雅静认为，加强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实施素质教育、培育全方位发展优秀人才的有力举措。然而，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依旧难以突破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针对于此，应用型本科院校须明确课程思政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有根”“有魂”“有效”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加强教师素质能力方面，提高师资队伍的政治

素养、能力素养；在激发学生参与方面，立足学生特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完善机制建设方面，构建领导机制，完善激励制度，从而扎实推进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33]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教育研究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杨福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34]、李文静的《高校教育教学创新与发展——基于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35]、付丁丁的《新时代女工精神》^[36]。

杨彦京、王晓明指出，学者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基础理论、内容、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需要增强相关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今后的研究重点是：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基础理论研究视角，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内容研究的系统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实现路径研究的创新性。^[37]

李颖、豆颖康认为，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和根本使命，创新创业教育应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实践各个环节，转化为师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价值引领西化、价值判断物化、价值取向功利化等价值偏差问题，应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定盘星”“助推器”“精气神”的价值引领作用，厘清二者间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由情感认同到价值认同、由思想自觉到行为转化的内在机理，运用“三因”理念把握“事”与“化”、“时”与“进”、“势”与“新”的辩证关系，为当前教育价值偏差问题开出以知促创、以行促创、以文促创的“对症下药”。^[38]

田海舰、连童指出，新时代加强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的必然要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加强新时代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以《纲要》为指导，紧密结合河北实际，遵循道德建设的规律和特点，从制度层面积极构建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体系，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9]

田海舰、冯艳彬认为，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不仅是应对网络语言范式变换的现实要求，而且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固本之策。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构建面临环境喧嚣纷乱、主体能力不足、内容“杂乱无章”、技术尚未成熟等现实困境。构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须在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引基础上，以“认知—解释”为基础，创新话语表达；以“信仰—价值”为核心，凝结话语共识；以“策略—筹措”为关键，掌握话语主动。^[40]

杨鑫、陈聚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需要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汲取智慧。在认识论中透析弘扬革命精神的前提问题，在价值论中诠释弘扬革命精神的价值理念，在方法论中实现弘扬革命精神的根本转向，在实践论中重构弘扬革命精神的具体要求，以此赓续精神血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与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走向新高度。^[41]

秦善进等认为，李大钊思想中蕴含着与新时代“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丰富的相关元素，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加强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可以为有效增强“四个意识”提供理论借鉴。^[42]

聂艳秀、高晨晓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用真理的力量引领时代新人坚守理想、以担当作为锤炼时代新人实践品格、用勇于奉献磨炼时代新人意志品质、以人民的立场锻造时代新人政治定力，是时代新人培育的指路明灯。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养，就要加强教育引导、组织社会大课堂、把握志愿服务契机、建设文化环境、讲好革命故事，增强多方协同作用，强化实践自觉；教育引导青年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理想和为人民幸福而永久奋斗的价值追求。^[43]

郭建、张振杰主张，西柏坡精神源于西柏坡

时期党的伟大实践，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植根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并在革命文化滋养中形成、发展，与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上，其包含的“两个一切”的人民至上精神、“两个敢于”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善于”的立国兴邦精神和“两个务必”的不懈赶考精神仍然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继续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44]

姚志军、姚雷认为，“两个务必”思想具有丰富鲜活的辩证意蕴，包括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钢铁纪律与优良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到底与经受考验、推动历史进步与阻碍历史车轮前进、预防贪污腐化与防止垮台失败、夺取胜利与巩固胜利、“当官做老爷”与为人民服务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两个务必”思想在新时代必将得到永续传承，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45]

赵雪飞认为，赶考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内核、为理想拼搏奋斗的意志张力、自我革新的健康密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精神圭臬、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基石、领导人民实现国家持续繁荣富强的力量源泉和拒腐防变的防火墙，发挥着重大激励和引领作用。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路上，赶考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的航标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器和实现人民美好向往的“压舱石”，为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46]

闫晓静等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全民族同胞，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伟大革命精神的最好历史见证，将革命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是增强敬党爱国精神、历史责任感、民族情怀的最有效教育途径。革命文化在高中思政课中发挥着正效应，不仅能让高中生在知识理论上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更能在其思想意识上不断清晰、不断坚定，从而形成正确的终身思政观念。基于此，要在思政教学中强化革命文化的精神作用，强化革命文化的爱国情怀，强化革命文

化的教育价值及育人作用，使革命文化在高中思政教育中持续发挥出更伟大的现代化教育作用。^[47]

范欣等提出，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历程中形成铸就的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内涵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生命之魂、生存之根、发展之本，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要在思政课教学中注入红色资源、铸牢红色底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增强理想信念、深化理论认知、陶冶情操情怀、读懂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红色基因密码，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48]

乔芬等认为，河北省为红色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其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体表现为：有利于青年抵御负面因素的影响，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反驳历史虚无主义，推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有利于战胜利己主义的挑战，增强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将河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包括：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实践教学为主阵地，师资队伍为主力军，网络新媒体为载体，协同育人机制为保障。^[49]

徐雁红等提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精神内涵对于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锤炼担当品格、培养创新精神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将“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价值引领，弘扬特色文化，形成协同效应，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50]

陈志环指出，红旗渠精神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财富。立足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但机遇挑战并存，更需挖掘提炼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理论内涵和经验启示，提升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践中攻坚克难的能力。^[51]

戴建兵提出，从荒山造林到生态育林，从提供原木材料到提供生态产品，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塞罕坝人把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创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新典范。对绿色

的追求,深深融进了塞罕坝人的血液里,塞罕坝精神也成为点燃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火种。三代塞罕坝建设者用实际行动创造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铸就了塞罕坝精神。进入新时代,更需要传承好、弘扬好、践行好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52]

安巧珍、武娜娜认为,塞罕坝精神是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不仅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而且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塞罕坝林场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进入新时期,中国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又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为世界生态发展提供范例和中国答案。^[53]

徐凡提出,在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精神谱系里,塞罕坝精神彰显着绿色发展的独特内涵,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是塞罕坝精神的传统基因,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塞罕坝精神的红色基因。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践行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54]

王芳、田鹏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重要灵魂,是新时代企业领导力、凝聚力之所在。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发展于中国,新时代弘扬企业家精神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指引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策、有效之策、现实之需,国家应该形成完善健全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中激发企业家精神来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应该在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中塑造企业家精神来支撑自身高质量发展;企业家应该在自觉践行中培育符合时代发展、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企业家精神来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55]

李亚青、孙佳艺认为,“李保国精神”是在时代浪潮中形成的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将李保国精神融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强化大学生爱国认知、厚植大学生爱国情感、砥砺大学生强国之志,从而使其怀有“精忠报国”之心。李保国精神包含着期盼祖国

人民脱贫致富的民族精神与开拓创新的科研精神,与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映射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承载着丰富的新时代爱国主义内涵。“李保国精神”融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需兼顾好基本内容、群体对象、载体手段以及氛围营造的关系。^[56]

(田海航: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莉.新时代高校铸魂育人目标导向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2.
- [2]吕健.生态视角下高校教育教学研究[M].北京:现代出版社,2022.
- [3]张保同.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
- [4]牛余庆.新时代推进思政工作机制创新的思考[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09):36-38.
- [5]张青卫.习近平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6):55-64,155-156.
- [6]竟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J].北京社会科学,2022(08):14-23.
- [7]安巧珍.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劳动教育”的逻辑进路[J].广西社会科学,2022(03):97-104.
- [8]李亚青,刘欢.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2(01):169-172.
- [9]闫晓静,孟梯清,回娅冬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11):69-70.
- [10]王雅丽,焦延楠.新时代大学生规则意识的影响因素及培育对策分析[J].保定学院学报,2022(02):92-98.
- [11]刘艳冬,王岩.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稻米,2022(01):127.
- [12]李双印.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思与行[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2.
- [13]解丽君.高校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与思政课教学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
- [14]李鸿雁.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M].延边大学出版社,2022.
- [15]尹喆.范畴·作用·进路: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三维解读[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2):209-211.
- [16]李海,董利群.借“他山之石”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02):132-136.
- [17]高姗姗.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机制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2(02):192-195.
- [18]郝保英,王涛.“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性

- 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10):106-112.
- [19]翟丹丹,张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北京冬奥故事的路径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34(09):18-24+37.
- [20]刘子义,刘子奎,吴日升等.高校“四史”类选择性必修课建设路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22(43):109-112.
- [21]魏建丽,侯居荏.基于对分课堂和学习通构建思政课有效教学模式探索[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60-65.
- [22]张瑞芳,徐鹏杰.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理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06):44-47.
- [23]巩竞.基于“金课”建设的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12):91-96.
- [24]高姗姗.推动新时代警察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守正创新的思考——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22(33):5-8.
- [25]刘长龙.公安院校思政课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实践路径[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5):54-58.
- [26]王璐.成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途径[J].科教导刊,2022(12):60-62.
- [27]郝瑞斌,张向军,窦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关系论[J].科学与无神论,2022(01):19-24.
- [28]赵文菁,龚志宏.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融入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11):60-66.
- [29]李凯伦.《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现代农村科技,2022(05):82-83.
- [30]张梅.“出入境证件鉴别”课程思政元素重塑和融入路径构建[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8):80-84.
- [31]张笔超.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融入公安民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2(02):62-67.
- [32]蔡振禹,李亚楠,陈聚芳.课程思政融入高校工科人才培养的路径探析[J].邢台学院学报,2022(01):121-124.
- [33]吴克燕,杜雅静.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有效路径探析[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2(05):52-55.
- [34]杨福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
- [35]李文静.高校教育教学创新与发展——基于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2.
- [36]付丁丁.新时代女工精神[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2.
- [37]杨彦京,王晓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研究述评[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02):37-41,75.
- [38]李颖,豆颖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思考[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118-124.
- [39]田海舰,连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河北实践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55-59,70.
- [40]田海舰,冯艳彬.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49-54.
- [41]杨鑫,陈聚芳.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四重维度[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1-5,19.
- [42]秦善进,张文彬,郭兆祥.“四个意识”视域下的李大钊思想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02):11-16.
- [43]聂艳秀,高晨晓.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育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2(06):10-12.
- [44]郭建,张振杰.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J].理论视野,2022(06):76-81.
- [45]姚志军,姚雷.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思想的辩证意蕴探析[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06):1-7.
- [46]赵雪飞.赶考精神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03):33-37.
- [47]闫晓静,王宝华,姬断萍.革命文化在高中思政课中的正效应及实现路径[J].文教资料,2022(11):33-36.
- [48]范欣,韩琳琳,杨静如等.红色基因:高校思政课的目标认知与实践路径解析[J].邢台学院学报,2022(01):131-136.
- [49]乔芬,张靖,冯莉莉等.河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4):40-44.
- [50]徐雁红,李怀,侯居荏.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48-53.
- [51]陈志环.红旗渠精神的理论内涵和经验启示[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01):1-6.
- [52]戴建兵.塞罕坝精神形成的历史逻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008).
- [53]安巧珍,武娜娜.塞罕坝精神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008).
- [54]徐凡.塞罕坝精神的文化基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008).
- [55]王芳,田鹏颖.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论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118-123.
- [56]李亚青,孙佳艺.李保国精神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1-7.

哲 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中外哲学研究

郝晏荣

一、总体概况

2022年河北省哲学研究,在成果数量上略低于2021年,但是,在北学研究等领域却取得突破性成就。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梁世和、许卉、倪斌等在《中国哲学史》上分别刊发三篇论文,对北学的来由、北学在明代的发展、北学中的心学观念等作了较有深度的挖掘。除上述外,李洪卫分别刊发于《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上重评韦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论文,李振纲刊发于《哲学研究》中的比较孟庄心学的论文,程志华刊发于《社会科学研究》上关于中西哲学本体观念比较的论文,以及姚云刊发于《云梦学刊》上关于康德道德原则有效性的论文,冯月季刊发于《东南学术》上有关智能算法与人类主体性关系的论文,都是本年度河北省哲学研究富有首创意义的代表之作,值得认真研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维意指出,社会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社会共同体的“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不仅揭示了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而且阐明了社会共同体“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内在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阐发了社会共同体“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分析研究了“国家”“资本”“劳动”在社会共同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倡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劳动社会化立场,深刻批判了国家主体化主导和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揭露了“虚幻的共同体”的内部分裂和危机关系。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道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源头活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出场方式,是破解全球性危机和国际关系冲突的中国方案。^[1]

李维意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研究抓住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破解了现代性的“历史之谜”。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审视包含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劳动现代性重建两个维度。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建构共产主义现代性是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的根本旨趣。从历史必然趋势看,劳动社会化发展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物质基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前提,“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是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社会基础。从实践主体向度看,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劳动现代性重建是建构共产主义现代性的基础,把无产阶级确立为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主体,把社会解放理解为由劳动解放走向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中国道路开启了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石,中国道路是新时代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2]

黄云明指出,马克思哲学是一个由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和劳动人道主义价值观构成的哲学体系,其突出特点是将人类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纳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史中把握。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和劳动人道主义价值观是其法哲学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基于劳动哲学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纳入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史去把握,强调法律属于社会精神生产劳动实践。法律是立法者主观意愿的体现,也是对事物法理本质的反映。立法者即使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也不能完全罔顾人民公意;法律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与精神生产劳动实践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伴随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也是社会成员享有合法权利的依据。法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应该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捍卫劳动神圣。^[3]

李维意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现代性批判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包括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等。马克思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系统分析运用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再生产论等。劳动价值论阐明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化的关系。资本家的货币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质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是在等价交换背后隐藏着不等价交换的秘密，隐藏着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秘密。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伟大的理论发现。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秘密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剩余价值论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资本积累论阐明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越扩大，雇佣劳动所得越减少，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越尖锐。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物质财富在生产中转化为资本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的过程，以及工人在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借助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整体分析和系统批判，马克思全面揭露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压迫，为无产阶级颠覆资本空间统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4]

二、中国哲学

倪彬提出，北朝经学是北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当时多因经学中心所在地而以“河北”“邺下”称之。学者也多以“河北之学”目之。关于隋唐统一后的学术大势，《隋书·儒林传》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后世学者对南北学的评价均基于这段描述。最有代表性的是皮锡瑞的看法：“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乃至认为“北学从此绝矣”。其对南北学的分辩，是以学者

“所学宗主”来划分的，即所习章句和治学风格，在治学风格上“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南学胜过北学在于“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皮锡瑞此说被广为接受，但任何观点均有其阐释前提和界限。对此说法，学者早有异见。马宗霍就提出“名宗一家、实采众说”的观点。章群认为“唐代经学，可分为两期：前期曰义疏之学，后期曰舍传求经之学”“皮氏此说谓其指唐代前期经学则可，至于后期经学，实不能以‘统一’说之，亦不能以‘义疏’说之。”北学之内容及形式代有变迁，延续的是北学之风格与精神，北学不仅存续，反而由区域风格融入为王朝学风的主流，上文所涉王元感经滞说、刘知几的疑经、潘好礼之引《公羊》，说明北人学者仍保持了北学不固守师法，自创新意，重事实、重功利的学风，南人张柬之论事也有北学风格。以此来看，北学失其形而存其实。在趋新学术潮流中，李华、啖助、李翱等北人学者的新学探索不能不说蕴含着北学忧患济世的学术取向。以北学存续为视角，不仅能对唐初南北学整合有所反省，对“唐学”向宋学过渡的理路也是一种观察角度。北学精神在唐代已经内化为学者所共有的思想渊源，其次成为形式、内容均自成一体的学术流派，有待于政治与学术中心的复归。^[5]

李振纲指出，《老子》首章在老子哲学及老子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宗明义道出老子道论三个基本问题：一、道言之辨，从道言关系诠释了“道”的形上本体意义；二、有无之辨，从“有”和“无”的关系揭示道之超越性、实存性及其统一性；三、道物之辨，用“众妙之门”隐喻道生生不息的本源性及道生万物、万物尊道的道物关系。这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命世界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一个生命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古今哲学安顿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也是哲学所论究的最根本的问题。老子用“玄牝之门”隐喻道体只是为了借助隐喻的直觉性穿透“道言间隔”，把远古生殖崇拜内含的生命体验衍化成深刻的哲学思想。老子是说有无统一、空阔虚灵、玄之又玄的“道”，犹如源源不断创生天地万物的“生命之门”。当然，老子用“玄牝之门”隐喻道体并非

沉迷于巫风，只是为了借助隐喻的直觉性穿透“道言间隔”，把远古生殖崇拜内含的生命体验从巫风中剥离出来，衍化成深刻的哲学思想。道物之辨内涵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即道生万物与万物尊道。这两个方面在《老子》文本中有两段话，不用修饰，浑然天成，构成宇宙生命之“门”的一副楹联：上联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下联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上联描述“道生万物”由简至繁的过程，下联演绎“万物尊道”从用达体的阶梯。两联前后呼应、珠联璧合、相辅相成，其中蕴含的道物圆融天人合一的义理，在《老子》第五十一章中得以逻辑贯通。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万物之所以能够不靠外在权威强制，自然而然地尊道贵德，这是“道”赋予万物之本性使然。道生万物而万物从道的依据在此！^[6]

李振纲指出，孟子、庄子比较研究通常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哲学、观念史的研究，另一种是历史、思想史的研究。前者注重孟子、庄子哲学观念、范畴、命题的逻辑归纳、比较、辨析，后者突出孟庄思想社会基础、理论宗旨、学脉传承、历史地位的理论还原。能够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应是最好的研究形态。从观念比较与思想史的结合看，“孟庄心学”深层结构的相蕴互补源自一个一向被人们所忽略或未给予充分开掘的理论枢纽，亦即“诚”与“真”的性天本原。孟子常把最高等级的事项冠之以“天”，如天职、天位、天禄、天爵、天民、天吏、天诛等，此类语词，庄子语境中更是比比皆是，如天籁、天府、天理、天钧、天倪、天戮、天乐、天和、天机、天刑……有了“诚”与“真”此种形上本原的默契，孟子的道德心境与庄子的审美心境在方方面面的殊异中总是隐隐约约折射出相蕴互补的精神：一个继承孔子的仁学，走向道德实践和伦理心境的自觉；一个发展了老子道学，走向开放心灵及审美心境的自由。一个雄才善辩，英气勃发，从道德实践的路径张扬其道德主体性，执

意担当仁政、王道，为“王者师”，自信“万物皆备于我”，“舍我其谁”；一个汪洋恣肆、任情放达，走向生命本真自由的审美路径，逍遥齐物，委运任化，为“大宗师”，自许“吾丧我”“不为有国者所羁”“游心于德之和”。一个以道德为“天爵”，从圣人“践形”的工夫路径，不断充实内在人格，集义养气，进达“上下与天地同流”、知天事天之“善”的境界；一个弃“人爵”（卿相）如敝屣，从真人“忘形”的工夫路径，不断净化内心情感，“与物为春”，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美”的境界。如此种种，仔细揣摩，多具有相蕴互补性。譬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舍我其谁”的“我”，是“大体”的我；庄子的“丧我”，是克服“成心”“机心”的小我，成就“真宰”“真君”的大我。孟子的“立大我”与庄子的“吾丧我”，两者工夫路径有殊，内在而超越的心路玄同，用冯友兰的话说，都实现了与“宇宙大全”精神合一的天地境界。这正是“孟庄心学”深层灵犀相通的隐情。^[7]

李洪卫指出，近代以来，关于公民道德、公共道德的论述未曾停息，从梁启超、梁漱溟到李泽厚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公民道德问题的思考既是伦理学内部的议题，但是它也不限于伦理学自身，同时关联到政治哲学的议题，涉及现代民族建构的问题，譬如梁漱溟提出的西方人的“集团生活”方式等，尤其是如果我们将论述的焦点聚集在公德建设层面则更是如此。对于梁启超、梁漱溟甚至李泽厚等的返归考察都涉及这些层面。就当下中国来说，我们试图建构儒学道德价值的新的社会基础，进入民间社会和社区形成儒学教养和公民训练的一体化机制，这正是实践此种“二元一体”理念的有效途径。所谓社会公德不仅仅是在大众的公共场所践行的，更是首先在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中积累和践行的，也是通过这种日常化的训练养成的。就后一点来说，它弥补了个体主义的不足，形成一种更高的道德理想和人格目标追求，这与儒家的士君子人格的目标追求在理想性设定和提升方面是一致的，仅仅从社会功用角度说，这也是今天儒学值得在民间重建的重要依据。^[8]

冯月季认为，从中华民族悠久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历史来看，汉字符号体系对于中华文化的传

承乃至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凝聚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汉字符号体系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表征为一种身份认同。依靠语言符号对过去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的重构而生成的集体记忆,为民族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意义根基;汉字符号体系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二个层面,表征为一种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内涵凸显的是基于历史传统、文化身份和情感认同的有机结合体,其生成和存在的意义根基乃是源于共同的集体记忆,而汉字正是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最重要的符号系统。通过汉字符号的表意体系,我们能够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不断唤起关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汉字符号体系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三个层面,表征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汉字符号表意体系中凝结的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强烈的同质关系。对整个世界文化而言,中华文化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就是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恰恰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文化中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是起源于汉字符号创制之时形成的原则,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密码,而且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源泉。^[9]

李洪卫指出,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伦理造就了政治关系中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将它推向现代的政治官僚制形态,这当然又是这种伦理观念中的非专业化和等级化造成的。正如世袭制在根源上产生于家族的孩子对父辈的权威的孝敬关系一样,儒学是建立在官员对王公、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从属关系上,首先也是建立在臣民对官员和对王公的子女孝顺的基本美德之上的。经文的考试制度究其实质是一种宗教性个体发展的测量,它严重削弱了官僚制本身所具有的工具性的属性,成了一个人格完善的检查方式,但是,由于它的考试录取层面的形式化特征又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对人格成长的真正的核查能力,因为人格培养虽然在经文的阅读理解中有所依赖和增进,但是,诵读乃至背诵经文并不能实质性地改进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反而适应了政治体系本身所内蕴的“二重性”:社会性与技术性之间

的统一与背离。韦伯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他通过文化比较和历史比较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呈现与启示:中国从帝国统一即秦朝以后,从没有认真考察过“商人的利益”,这个思考不在君主和儒家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内,这就是钱穆所谓传统中国之“修道的社会”。而所谓“修道的社会”就是一个士大夫领导的服从于官僚统治实施忠孝一体的自我克制修身的社会,不面向外部世界尤其是面向自然界的对立、冲击与控制,同时将士农工商作为“四民之业”,把商业看作是相对不重要的“获利行为”,固化在小生产和宗法家族的结构之中,呈现为静态循环的社会状态,也是皇权宗法性与官僚政治“二元一体性”的显现。^[10]

冯月季认为,尽管先秦时期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概念和理论,但从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中,却显露出丰富的符号学意蕴。“克己、复礼、成仁”构成了开放的、弹性的三元符号表意结构,这种三元符号结构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了具有超越性和可能性的前提。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也坚持这样的观点,符号、对象之外的解释项使得符号意义具有无限衍义的可能,将符号置于互动交流的意义关系网中。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正是以这种三元符号表意结构为基础,才使得自我向外在世界敞开,避免出现独断主义、绝对主义的自我。先秦儒家也保留了自我人格的独立性,但自我独立人格与外在世界并不是隔绝的,具有自反性的内心对话使得自我反思的逻辑和起点源于对外在世界“他者”符号的承认。“他者”符号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征,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社会文化中的仪礼,也指向具有崇高象征意义的“天道”和“圣人”。其中,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仪礼成为“克己”“修身”的规约符号。由此,自我以“成仁”为终极理想,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性。在此过程中,自我“循天道”而具有了道德责任感,“为了承担起一种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行为的责任,符号动物于是成为符号伦理动物”。先秦儒家的自我观念探索中显露出的充满智慧的符号学思想,不仅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论阐释,而且对于当个体自我的发现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反思价值和意义。^[11]

李振纲认为，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子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代表。受稷下学风影响，荀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非诸子之说，解百家之蔽，成一家之言。其学以儒学为基础，折中综合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思想观念，实现了先秦哲学及思想文化的第一次批判整合，成为先秦子学转向两汉经学的重要环节。孟子、庄子思想在荀学建构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对此议题，经学时代、清代、民国时期及当今学人已有所论及，但总体看来，以往研究对孟荀关系讨论得比较多，对庄荀关系讨论得还不够充分，从观念比较的视角，细微考量孟、庄、荀思想逻辑深层结构上的差异及其相蕴互补性，揭示荀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尚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从荀子与孟子、庄子的关系看，荀子哲学思维的一大特点是由道德理性、审美理性向认知理性（认识论）的转向。《解蔽》提出一系列认识论问题，诸如：第一，世界的可知性：“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第二，“心”的主观能动性：“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第三，认识心境的调节：“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第四，“精于道”优先于“精于物”：“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第五，认识错觉问题：“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跬步之浚也……厌目而视者，视一以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啁啾；势乱其官也。”认识论转向是荀子对先秦哲学的一大贡献。遗憾的是，这一认知理性精神与墨家、名家及后期墨辩逻辑学说一样，由于与中国哲学价值优先的主流思维传统不相契合而被抑制，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没有实现近代转型的认识论根源。^[12]

许卉指出，清初北学宗师孙奇逢令其弟子魏一鳌辑录《北学编》，从汉代董仲舒至明代金铉共辑录35人，形成以燕赵学者学术为主脉的北学谱系。在《北学编序》中，孙奇逢称：“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编中所载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处隐见，立言制

行，虽有不同，要皆愿学孔子不待文王而兴之人，故董、韩而后，若器之、静修、伯玉，学本朱程；克恭、倬鹤、伯顺，力肩陈王。”孙氏称书中所载人物“皆愿学孔子不待文王而兴之人”，后尹会一续编《北学编》指出魏氏以“理学”为编撰的学术根据，从三人对《北学编》学术宗旨的规定来看，皆以“道统”为本而自觉构建起北学谱系：无论是力主程朱，或接续陆王，或参酌朱陆的北地学者只要有助于圣学皆可归入此谱系。同时，《北学编》构建的北学谱系分化出两个学统：程朱的理学之脉和陈王的心学之脉，可见，心学在北地的发展已成其势。纵观《北学编》，其中辑录了若干明代北地学者对于心学的承继、体认和传播。心学以宋代陆九渊为开端，至明代陈献章继以江门心学，从学理上接续陆学；其弟子湛甘泉开甘泉心学，宗师说亦拓以新思；王阳明遥契陆学而成阳明心学，此皆为明代心学主脉。从南北地域来考察，无论是江门心学、甘泉心学，抑或阳明心学，且不论其中翘楚，即使寻常门人，南人亦要多于北人。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透露出心学在北方不甚繁盛之态。即使如此，北学中持心学立场的儒者如贺钦、王崇庆、蔡璠、鹿善继等仍顽强地在燕赵苦寒瘠瘠之地以承续、弘发心学为己任，扩大了心学在全国的版图，扩充了北学的思想容量。^[13]

程志华认为，在蒙培元看来，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故所谓“自由”主要是指“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表现为某种“精神境界”。这是与西方所论的“自由”有明显区别之处。也就是说，西方所论主要为政治社会层面，中国古代所论主要为精神心理层面。因此，在解释“相忘乎道术”时，他说：“‘道术’就是超越世俗人生的‘自然’，亦即庄子所说‘不以人灭天’之天，这是保证人情得以顺遂从而实现自由的根据。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情态、情趣、情志和情操、情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浑然一体的自由境界。庄子向往并描述过的人与动物‘共处’的景象，就是这种境界的真正体现。情感之无束无拘无系缚，就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实现。它不同于道德意志之自由，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自由。”蒙培元认为，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争取作为社会政治

权利的“自由”。不过，不可孤立地理解这种追求，因为“科学”和“民主”是表面的、外在的，背后的支撑观念是“自由”。也就是说，只有有了“自由”，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和“民主”。而且，“精神自由”与“社会政治自由”虽然处于不同层面，但二者有密切的关系——“精神自由”是“社会政治自由”的基础，“社会政治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呈显。因此，近代以来对社会政治自由的追求与古代的精神自由并不矛盾。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传统的“精神自由”包含着“社会政治自由”。蒙培元先生的意思是，由“精神自由”可以“开出”“社会政治自由”。他说：“这虽然不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但是儒家的情感哲学在当代的转换中，未必不能产生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使情感进入现实的生活领域，进入时代潮流，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14]

程志华认为，唐君毅对哲学的建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哲学观”和“本体论”。唐君毅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包括四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分别是：其一，“名理论”，包括西方哲学的逻辑学、辩证法、知识论及印度哲学的因明学。其二，“天道论”，包括西方哲学的形上学、存有论或本体论、宇宙论以及印度哲学的法相论、法界论。其三，“人道论”，包括西方哲学的伦理学、人生哲学、美学、价值哲学及印度哲学的梵行论、瑜伽行论。其四，“人文论”，包括西方的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当然，上述四大部分亦分别包涵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中相应的内容。唐君毅继承了熊十力的观念，对本体论非常重视，并且进行了“心本体”建构，提出著名的“心通三界九境”之说。历史地看，唐君毅的“心本体”建构，既是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其思想的发展。在唐君毅看来，尽管现实世界虚幻无常，但背后却存在“恒常真实”的“本体”。一个方面，由人对超越性形上根源的“诉求”可推知本体存在。即，面对虚幻无常的现实世界，人们常常有“希望”“愿望”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具有“超越性”，由此可以推知形上本体存在。^[15]

梁世和指出，清初北学宗师孙奇逢（1584—1675年），认识到明末理学的弊端，在反思当时

儒学乱象的基础上，建构起以“本天之学”为根基的夏峰北学，并力图重构整个儒学。他认为“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北学编·孙征君原序》），学说是世运的根底，学说兴则世运盛，学说废则世运衰。欲改善世运，必须“黜异端以崇正学”（康熙《圣谕十六条》），重构儒家天人之学。孙奇逢观察当时儒学现状，发现存在种种乱象：“诸不本天之学者，区区较量于字句耳口之习，此为学也，腐而少达；又有务为新奇，以自饰其好高眩外之智，其为学也，伪而多惑；更有以理为入门之障，而以顿悟为得道之捷者，儒释未清，学术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极也。”孙奇逢认为“字句耳口之习”“务为新奇”“以顿悟为得道之捷者”等种种为学乱象，根本原因在于不是“本天之学”。学说晦暗不明，必将导致政治混乱，世道衰微。为此，孙奇逢历时三十余载著《理学宗传》，力图对儒学的混乱情形正本清源，以拯救世运。弟子汤斌称《理学宗传》，“其大意在明天人之归。……天下同志读是书者，无徒作书观也，止由此以复天之所与我者耳。吾之身，天实生之，无一体不备；吾之性，天实命之，无一理之不全”。^[16]

冯月季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一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概念、价值内涵、构成要素、实践路径等进行了多维阐释。然而，在诸多研究理论框架中，尚未见到有人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最热门的研究理论之一，文化记忆理论关注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文化记忆理论的这种研究旨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具有高度一致的理论脉络，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或许更能够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本质、生成机理以及认同逻辑。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三个：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通过符号叙述建构的文化记忆就不再是停留在客观表象的描述，而主要体现为一种情感认同和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其历史基础还是现实情境，本真上都属于民族文化符号通过媒介文本的叙述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认同。只有这种超越个体利益和情感维度基础之上的普遍的情

感共鸣，才能形成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记忆框架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才具有稳定的情感根基。^[17]

李振纲指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学与禅门之学虽然都注重心性工夫，但所言所行心性工夫的路径大有不同。儒家圣人之心本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所言明心尽性，不在天下、国、家、百姓人伦日用之外，是道不远人、成已成物、物来顺应、廓然大公之学。禅家之学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虽然“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思所在，常常把“心”“性”与天下、国、家、百姓人伦日用隔膜开来，“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结论是：“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鉴于儒禅心学之辨，王阳明以质问的口吻表白心迹说：今之为心性之学者，如果是“外人伦，遗事物”，空言心性，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是“圣门精一之学”，天下有这样的禅学吗？文章结尾，王阳明告诫当世之学子，切不可沉迷于举业辞章之学，迷失圣人之心学之真精神；更不要不辨是非、人云亦云、以心学为禅学而惊骇仇视之。否则，明知圣人之学而不知自反，如此自暴自弃，结局一定是可悲可怜的！^[18]

程志华认为，中西哲学“本体”之异：其一，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实现路径不同。“本体”是哲学家建构的，而不是自然摆在那里的，而要探究、建构“本体”，就须有一定的实现路径。就哲学史来看，“本体”的实现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知识论”路径，即基于逻辑学，按照探求知识的理路，探究和建构“本体”。西方哲学“本体”建构遵循这种理路者较多。其二，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超越性不同。所谓“超越”，又指“超验”，指对经验的超越。“哲学”之为哲学，重要特征在于超越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下，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 600 到前 300 年期间，

人类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的“灿烂文明”，塑造了之后几千年人类文明；“灿烂文明”的核心是哲学和宗教的出现，而哲学和宗教以“超越”即对经验的“突破”为特征。在“轴心时代”所涉及的不同地区中，古中国、古希腊是两个重要文明源头——前者“突破”的成果是中国哲学，后者“突破”的成果是西方哲学。其三，部分中西哲学“本体”的对应关系不同。所谓“本体”的对应关系，是指“本体”所对应的对象是什么。通常来讲，在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相对应；在中国哲学，“本体”与“功用”相对应，此即所常言之“体”与“用”。不过，这样一种说法亦不可普遍化，因为西方哲学亦有“本体”与“功用”相对应者，中国哲学亦有“本体”与“现象”相对应者。^[19]

冯月季指出，元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过程中具有文化原型的功能，生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这些文化符号是在民族长期的历史叙述中被创造出来的，今天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历史范畴中经历了不同形态和意义的变迁，民族共同体成员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现有的文化符号进行编码，创造出新的意义解释附着其上，由此生产出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的文化符号。但同时元符号的表意机制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面临着现代性语境转换的压力和挑战。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根基，我们一方面要夯实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域”的意义内核，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和机制，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立场上，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内涵，并且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提供持久的意义资源和文化动力。^[20]

马庆指出，熊十力对王船山易学之根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继承，他不仅将王船山易学之根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概括为“尊生”“彰有”“健动”“率性”四个方面，同时也将此四方面视为自己易学的根本精神与体系框架。熊十力虽对船山易学之根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继承，但在形而上的层面却与船山易学殊异。首先，王船山所尊崇的《周易》的“生”

乃以有形物象为主，而熊十力所尊崇的《周易》的“生”则以为无形之心为要。其次，船山所彰显的“有”属于气化的宇宙论，而熊十力所彰显的“有”则属于“心”的宇宙论。再次，熊十力的“健动”含空宗、禅宗之“空寂”成分，而船山的“健动”则具有“浑沦”的特质。最后，船山之“人欲”“天理”既非截然相分，却又有所差异，而熊十力之“人欲”“天理”则同归之于“心”，而并无分别。由于船山易学之根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偏重于有形现象界，而熊十力易学之根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偏重于无形之心。总之，船山易学之本体论、宇宙论所凸显的还是和合之“物”，因而他的宇宙论与本体论是物的宇宙论与本体论，即乃是属之于现象界的道德形而上学，而熊十力易学却是为凸显“心”的本体论、宇宙论，是超越于有形现象界的道德形而上学。因此，熊十力从形而上的层面超越了船山易学。^[21]

三、西方哲学

冯燕芳指出，齐格蒙特·鲍曼最早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穷人”问题。鲍曼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穷人的形成、角色、构成以及针对新穷人可能的暴行，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批判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虚假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深化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批判，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把是否不断消费作为划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穷人的标准不合理；第二，单靠伦理，无法让新穷人走出困境。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并不像鲍曼描述的那般绝望，但他们依然是出于困境之中；第三，鲍曼没有看到穷人阶层强大的反抗力量。鲍曼基于新穷人工作的不稳定性，认为新穷人无法团结成统一的反抗力量。在这里，鲍曼将新穷人间的阶级利益联系替换成其现实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通过否定新穷人基于相同工作地点的现实交往，否定了其可能基于相同阶级利益而联合的可能性。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工人罢工的频率不如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但也时有发生。在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中，也有大量穷人阶层参与其中。^[22]

孙雯认为，人工智能仅是一个特殊工具，是执行指令集的机器，没有自主性、意识和情感。所谓的机器具有自我意识等，只是使机器“看起来”具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在执行指令中表现出的某种选择性与人类的自主性不是一回事，只是一种“虚假的自主性”。不难看出，人工智能难以处理心智的某些方面，因此很难说拥有“真正的”智能。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人类作为某个个体，其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其认识或可突破这种局限性。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已引起了哲学范式的拓展和变革，涌现出一系列新的范式。比如，人工智能哲学、逻辑机器哲学、计算机哲学、信息哲学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可以比任何计算机拥有更广泛、通用的问题判定与解决能力，因此以可计算性理论为基础的智能计算机无法实现对人类完全的代替。不过，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另辟蹊径、开拓创新，不能把注意力仅局限于智能机器的发展和应用，还要研究人类思维活动中更深层的具体规律，从而提出新的研究纲领，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将新的方法、概念和机制与新的理论或机器模型相融合，以期逐点逐面地创造出新型智能机。^[23]

冯月季认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概念只有在符号学理论视野下才获得了新的意义解释，主体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而被看作具有动态衍义结构的符号。这种符号学转向为主体理论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将人对符号意义的解释和追寻看作是主体存在的根本特征。从宏观角度来说，符号学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旨在探寻文本意义的符号生成和表达机制。尤其在探讨智能算法技术对人类主体性消解问题上，通过符号学理论透视能更深入地呈现问题的肌理，其对问题的阐释建立在元反思的层次上，进而探寻智能算法时代人类主体性复归的符号学路径。这是一个人类主体栖居的意义丰富的符号世界，为了建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不能偏执于数据理性和优化决策，仅仅考量智能算法的技术维度；对智能算法的道德和伦理规约同样重要，因为它关切的是人类主体自身。而人类主体的道德感就来自于符号意识——每一个主体都是符号并与其他符号形成共在主体性，这是一种超主体性的“人类

责任”意识，只有通过“符号具身”行动，在认知和解释符号意义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性才会显现出追求终极价值和真理的伟大光芒。^[24]

姚云指出，道德原则处于康德道德哲学体系的中心位置。道德原则被确立为绝对命令。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性，然而在其他入眼中，道德法则只是康德预设出来的先验法则，就像他预设三大公设一样，现实中它是否真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此外，正因为道德法则是基于理性的法则，不允许行为动机中有感性欲望和偏好的存在，这样的道德法则受到严苛性、形式性、空洞性、忽视真实社会中的自我、否认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之间的内在张力等诘难。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受到质疑，进一步而言，道德原则的有效性也就存疑。笔者认为，造成这些质疑的原因在于康德对法则和准则之间关系的论述不一致。即使这样，实践法则是否一定会规定个体的准则依然存疑。人们虽然都有道德意向和善良意志，但天生的自私性使人很难发挥出道德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对其道德原则有效性的证明并不完全成功。然而，正因为这样，康德道德原则对人才是一种应然性的要求，为人们的道德理想提供了一种向往。^[25]

姚云认为，科丝伽德基于康德道德哲学，创立了实践同一性理论。首先，义务作为规范性，根源于实践同一性，人们出于对破坏实践同一性的拒斥，自律地承担义务。其次，人们依据先验的实践同一性建构出自身的实践同一性，建构途径是有效和自律的行动，建构模式是柏拉图正义模式和康德自律模式的结合。实践同一性理论虽有不足，但是，它实现了他律性的社会身份和自律性的自由意志的有机结合，是公民能够实现道德自律和他律相统一的理论依据。科丝伽德是康德学派，她的伦理学又被称为康德式伦理学。她把康德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拉回到了人间，虽然她依然作的是抽象的论证，而不是对具体的道德实践的分析 and 设计。但是，单靠道德自律显然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因为有善良动机的人未必真会行善，即，动机和效果难以统一。因此，我们在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同时看到道德的他律性和自律性，采用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等方式培养公民的道德自律意识，

进一步锻造公民的道德人格；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的社会制度或体制，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和社会风尚，以保障公民的道德权利，促使公民履行道德义务。^[26]

赵贤指出，模态命题作为相信的对象构成模态信念。模态信念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这是模态信念的辩护问题。若可能性模态命题作为信念对象能够得到辩护，那么，其他模态命题因能够通过可能性命题得到定义也能够得到辩护。但以往诉诸可设想性的策略难以成为模态信念辩护的可行策略。对可能性命题辩护的一个恰当策略应当是：构造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有一个因果链，待辩护的命题对应的事件作为因果链的结果，而它的发生是由于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某个或某些可能事件。一个成功的辩护便是对这个因果链的辩护以及对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辩护。若我们不把模态信念看成是无意义的，我们如何为之辩护？本文表明，以往在学界影响广泛的诉诸“可设想性”为模态信念辩护的策略难以成为可行策略，并试图提出诉诸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因果链的可行策略。^[27]

(郝晏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李维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三元结构论视角[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2] 李维意. 论马克思的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2).
- [3] 黄云明.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劳动哲学基础[J]. 广西社会科学, 2022(6).
- [4] 李维意. 论马克思劳动现代性的系统批判思想[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 [5] 倪彬. “经学统一北并于南”说析论[J]. 中国哲学史, 2022(2).
- [6] 李振纲. 《老子》首章演绎: 道言、有无、道物之辨[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 [7] 李振纲. 比较视域中的孟庄心学[J]. 哲学研究, 2022年(5).
- [8] 李洪卫. 公民权利、公共规则与公民美德的统一——公民道德与当代伦理建构的基础与底线考察[J]. 文史哲, 2022(1).
- [9] 冯月季. 汉字符号体系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5-10(2).
- [10] 李洪卫. 家产制、理性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问题——重审韦伯理性主义考察的进路[J]. 清华大学

-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11]冯月季.论先秦儒家的符号自我观念[J].学术交流,2022(12).
- [12]李振纲.论荀子哲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J].管子学刊,2022(1).
- [13]许卉.明代北学谱系中的心学[J].中国哲学史,2022(2).
- [14]程志华.情感·自由·理性——“情感儒学”的基础概念[J].周易研究,2022(4).
- [15]程志华.唐君毅对中国哲学的贡献[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16]梁世和.天人儒学:夏峰北学之宗旨[J].中国哲学史,2022(2).
- [17]冯月季.文化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9).
- [18]李振纲.心外无教、心外无经、心外无学[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19]程志华.原本体——基于中西哲学本体比较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22(5).
- [20]冯月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21]马庆.尊生、彰有、健动、率性——熊十力对王船山易学之形而上超越[J].湖北社会科学,2022(4).
- [22]冯燕芳.“有缺陷”的消费者与可能的暴行——齐格蒙特·鲍曼新穷人思想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23]孙雯.从逻辑维度把握人工智能的局限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9-6(2).
- [24]冯月季.符号学视角下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思[J].东南学术,2022(5).
- [25]姚云.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J].云梦学刊,2022(1).
- [26]姚云.科丝伽德的实践同一性理论及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2(2).
- [27]赵贤.模态信念如何得到辩护?[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逻辑学、伦理学等哲学问题研究

张燕京 王丽珍 孙亮

2022年,河北省学者在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哲学等哲学分支领域取得新进展,在省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逻辑学研究

(一) 逻辑哲学

张燕京、郑甲平认为,弗雷格的“普遍性”思想对现代逻辑和语言哲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普遍性”是弗雷格概念文字的初始符号。弗雷格有关“普遍性”的探讨其实是关于全称量词的探讨,他基于“普遍性”符号,从现代逻辑的视角对全称量词进行了说明。借助于王路提出的句子图式,可以从语言、涵义和意谓三个层面分析弗雷格关于“普遍性”的思想。从语言层面的“普遍性”来看,弗雷格主要探讨的是全称量词。从涵义层面的“普遍性”来看,全称量词的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从意谓层面的“普遍性”来看,全称量词的意谓是二阶概念,它通过对个体域的限定,从而对一阶概念加以限制。运用概念文字,弗雷格揭示了自然语言中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的逻辑形式。弗雷格关于“普遍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弗雷格

为全称量词这个重要的基本的逻辑概念提供新的形式刻画,由此构建了第一个谓词演算系统,现代逻辑的变革得以实现。其二,弗雷格运用现代逻辑作为语言分析的基本方法,促使“语言转向”的发生,从而开创了语言哲学。^[1]

李月坤、张燕京认为,在现代逻辑视角下,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的区分,是关于语言意义分析的一次创造性的变革。涵义与指称的区分贯穿于弗雷格的整个语言哲学思想。弗雷格依托于现代逻辑思想构建了系统的意义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关于一个语言表达式,要区分它的涵义与指称。弗雷格将上述区分应用于自然语言的结构中,分别分析了专名、概念词、句子的涵义与指称。专名的指称是其表示的对象,专名的涵义是其指称对象的呈现模式,涵义与指称的区分起着媒介的作用,使得我们可以由对语言层面的探讨过渡到非语言层面的探讨;句子的涵义与指称涉及思想和“真”的关系,即思想是真之载体,是我们借以考虑“真”的东西,从而形成对涵义的认识到对真的推进;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与对象的区分以及在对其分析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函数—自变元思想,更是对分析哲学具有工

具性、奠基性的理论意义。通过阐述专名、句子、概念词的涵义和指称，弗雷格论证了涵义与指称的区分是意义理论的理论基础。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形成了对涵义与指称的关系、概念和对象的关系、思想与真值等系列问题的探究，为现代语言哲学开辟了崭新的视域。^[2]

（二）模态逻辑

赵贤认为，以往在学界影响广泛的诉诸“可设想性”为模态信念辩护的策略难以成为可行策略。模态信念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这是模态信念的辩护问题。作者尝试给出对作为信念对象的可能性命题进行辩护的策略，即构建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因果链。若将可能性模态命题作为信念对象能够得到辩护，那么，其他模态命题因能够通过可能性命题得到定义也能够得到辩护。对模态信念的辩护先要确定信念的对象即模态命题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的，也就是可能性命题的真值条件。其次，对可能性命题辩护的一个恰当策略应当是：构造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有一个因果链，待辩护的命题对应的事件作为因果链的结果，而它的发生是由于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某个或某些可能事件。这里，虚拟因果链是指它发生于一个基于现实世界因果链的可能世界之中。这样对某个可能性命题的信念转换成对“（可能的）原因+因果链”的信念。这个可能的原因是可以经验证实的，而因果链是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在这个策略中，预设了可能世界遵循着与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因果性。构建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因果链，并说明因果链上的事件不是必然假的、是可能发生的，这样就能够为某个可能性命题进行辩护，进而为模态信念进行辩护。一个成功的辩护便是对这个因果链的辩护以及对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辩护。^[3]

二、伦理学研究

（一）儒家伦理

秦飞认为，“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让”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和礼治的至德形态，又是德、礼之主，是儒家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首先，“为国以礼”中的“让”。“为政以德”与“为国以礼”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治国理政思想。孔子认为，“让”作为德、礼之主，在

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义，若不能贯彻这一精神，德政礼治将无从谈起。其次，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的“让”。“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价值。“让”除“德、礼之主”外，还具有丰富的礼治思想内涵，表现在辞让之“让”、禅让之“让”、谦让之“让”、卑让之“让”诸维度。二是“让”是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儒家礼学思想涵盖礼义与礼仪，“让”既表示礼义的价值取向，又表示礼仪的行为规范，以“让”的礼义精神和相应的礼仪规范有助化解因利之争。儒家“让”观念对国家治理具有启示。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既是时代课题，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儒家“让”观念意义重大，“让”作为德、礼之主彰显的德性色彩，为中国的合作共赢理念提供了精神滋养；儒家对“让”观念的丰富与补充，启示我们应在内政外交中讲求“文治武功”兼备。^[4]

敦鹏、段姗姗认为，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发展出一套内涵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体系，充分凸显了“行政为民”“行政忠诚”“公正廉洁”三大思想面向。此思想体系在建构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奠定了春秋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行政文化、行政实践的理论基础。首先，先秦儒家行政伦理以行政为民为价值基础。先秦儒家行政伦理，一方面凸显了对民众的关心与爱护，表现在先秦儒家既积极提倡民本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周朝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蕴含着以德行政的价值诉求，以实现仁政、王道为理想追求，提出了具体的惠民、富民、育民措施。其次，先秦儒家行政伦理以行政忠诚为核心原则。先秦儒家将坚持道义、服从国家的忠诚作为儒家行政伦理的主流。儒家认为，政治权威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而君主本人的道德品质亦是臣下效忠与否的基本前提。最后，先秦儒家行政伦理以行政公正廉洁为实践品格。公正廉洁是影响中国传统政治实现行政理想的重要途径。行政公正是有效维持统治秩序的一项重要原则，而廉洁施政的行政美德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和广大民众的安危福祉。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挖掘和阐释儒家行政

伦理思想,理性客观对待其智慧精华,对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5]

(二) 应用伦理

周颖玉、柯平等认为,尽管算法推荐是信息负载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是其技术逻辑与社会伦理间存在张力,应分析算法推荐可能出现的伦理失范,并追问人机共处的应然方式,以防范和纾解算法伦理失范风险。智能推荐系统算法存在伦理风险表现在以下方面:隐私边界模糊,公共信息与隐私信息的边界在算法推荐环境中日渐模糊;用户隐私弥漫,算法推荐伦理失范风险中的隐私泄露问题严重;信息异化蔓延,用户将其思想桎梏于算法推荐构造的“信息茧房”中并逐渐根深蒂固;虚假数据泛滥、数据生态失衡。算法推荐造成伦理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人们的隐私观念的改变,逐渐从静态、封闭转向动态、开放;用户网络数据的资本化,用户在网络环境中留下的数据痕迹,是各类平台、网页创造财富收入的重要资本;法律规约的滞后性,作为伦理意义上的行动底线,法律制度只能对算法伦理失范行为进行事后追责,这为算法提供了更多可操作空间。应尽快建构人机和谐生态。构建人机和谐,需综合性地平衡技术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理性。在伦理维度上,促进并维持人际和谐与人机和谐之间相辅相成的正向相关性;在法律维度上,建构人机责任共同体;在技术维度上,建构人机约束共同体;在文化维度上,建构人机价值共同体。只有正视智能算法技术的两面性,通过人本价值观与技术规范性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进行双重引导与规制,提倡人机共生,建构人机和谐生态,才能实现推送效率与公共责任之间的良性互动。^[6]

田海舰、连童认为,新时代加强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意义重大。一是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二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三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四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就新时代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现状而言,一方面,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成效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主流意识形

态,公民道德组织体系、规范体系、评价体系不断健全等;另一方面,新时代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亦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程度的程度较低、对诚信建设评价较低、对网络道德环境的总体评价较低。为进一步推动河北省公民道德建设深化拓展,务必遵循“九个坚持”,即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坚持以理想信念为“基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中华传统美德为“资源”,坚持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感召”,坚持以道德教育为“引导”,坚持以道德实践为“抓手”,坚持以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为“关键”,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7]

三、美学研究

(一) 中国古典美学

陈玉强认为,中国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中国文学以“韵者,美之极”为审美理想。“韵”是建构中国美学传神写意体系的核心范畴,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建构,揭示“韵”的审美分野现象,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其一,“韵”字的起源及“音和”义的建构。经考证,现存佐证“韵”字始于先秦及汉代的文献或不可信或存疑,至三国曹魏时期才出现对“韵”的释义,以之为“音和”。其二,形神之辨与“韵”之新义的形成。晋人品评人物舍声言韵,将“韵”指向抽象的人物气度,以不和谐的放旷怪诞为大韵;其后南朝画论与文论形成了“舍声”与“即声”论“韵”的审美分野。其三,谢赫《古画品录》“韵”论的哲源及内涵。谢赫《古画品录》所论之“韵”是指形象的生动传神之美,它的哲学基础是魏晋玄学的形神之辨,它契合的是中国美学传神写意的理论体系。其四,刘勰《文心雕龙》“韵”论的哲源及内涵。刘勰《文心雕龙》中“韵”字有33处,基本没有脱离声韵范围,其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刘勰固守“韵”的本义,呼应了当时重视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他忽视“韵”之新义,由此形成了他在韵论上的历史局限性。其五,《古画品录》与《文心雕龙》“韵”论分野之原因。南朝文学“韵”论受儒家思想影响,“即言”而胶滞于形下。这与南朝绘画“韵”论受魏晋玄学影响“舍言”而走向形上之

途完全不同。因此,对“韵”内涵建构的历史性考察以及对“韵”之审美分野现象的探讨,旨在揭示“韵”范畴的复杂面貌。^[8]

郝国澎认为,马麟名作《秉烛夜游图》,涉及人物、花鸟、山水各个画科,淡墨重彩皆有所长,诗情画意熔于一炉,画作中诗意性的带有怀旧意味的审美特质。首先,《秉烛夜游图》堪为马麟代表作品。马麟对深堂廊庑、庭院里缭绕的香雾和若隐若现的花树作了精心的布局和细致的描绘,在这个有限的场景里流露出优美温婉的诗意,让观者的情感随之而波动。其次,北宋“江湖小景”类作品对马麟画风的影响。“江湖小景”以寒汀远渚、落雁凫鸭为描绘对象,清远静深,潇洒虚旷,有诗人思致,至其绝胜佳处,往往形容之所不及,作为南宋画院中后期的杰出代表,马麟绍其余绪,使具有这一特质的绘画样式臻于灿烂;再次,南宋独特的社会人文背景对马麟画风的影响。南宋多有战乱,山河破碎,迟暮落寞占据了士大夫们的心理,对前朝士人遭遇的总结,使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活的感受和充满怀旧情感的表达,《秉烛夜游图》即透露出美好的易逝、生命的短暂的意味。此外,南宋皇室对书画艺术的高度参与,对诗情画意的审美的推崇,也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最后,相较于北宋的伟观山水,《秉烛夜游图》更趋向于一种诗意的表达;相较于“江湖小景”类作品的“人不见”,《秉烛夜游图》中有了“人物”,使得人与自然紧密结合,观者也更容易参与其中并为之共鸣。自南宋以后,文人画逐渐占据了画坛主流,笔墨本体的审美趣味渐为世人所青睐,马麟的《秉烛夜游图》这一类充满诗意、给观者以无尽想象的“诗意性”小品画便迅速式微了。^[9]

贺小敏、刘馨蕾认为,道家以“道”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延续至今,已将其哲理性思想注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道家的美学观念对文艺创作影响至深。道家美学是在“道”的哲学基础形成的独特的美学思维。艺术的最高本质是“道”。在艺术审美中,艺术创造坚持朴素之美。道家美学注重“言外之意”,“言不尽意”成了艺术创作的独特方式。艺术创作所达到的最终目标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道家美学思想在动画作品中的应用是一种道学形式的转化,更是一种审美思维的转化。形而

上的“道”不仅体现在动画作品的本质中,人物形象、台词音效、人与自然的关系、情节发展等具体环节也能深刻反映出道家的美学思想。新时代的动画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依托,以民族审美精神为内涵,传达中国文化价值。当代国产动画跨越了传统动画的技术障碍,而迈向世界领域,动画创作必须以道家美学精神为根基,古今结合,走上民族创新之路。总之,道家美学思想对国产动画电影审美思维、审美风格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无一不展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艺术创作者只有对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审美特色有一个深入的、系统的理解,才能以其为优势进而不断创新,推动国产动画电影更上一层楼。^[10]

许源、陶卓民等认为,历代文人基于文学造诣和艺术素养寄情山水,在诗词中继承并传递了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模式,对于旅游审美的建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们梳理整合庐山历代诗词中的景观信息,通过构建景观典型性指数 K_i 和典型景观指数 L_i ,考察各历史时期中景观系统的发展情况,并运用景观指数、Ripley's K 函数以及地理探测器三种研究方法,分析景观多尺度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其一,诗词中典型景观增长呈迂回式上升发展,出现频数的密集分布情况与区域集群的分布规模较为一致。其二,诗词中典型景观整体上显著集聚,各类景观分别呈现出随机或者均匀分布规律,与诗词构景的景观多样化需求有关;建筑与水文类型景观特征空间尺度大,山岳和生物类相对较小。其三,典型景观出现频数主要受到区域因子和类型因子的影响,各因子两两交互解释力显著提升。诗词中的诗性精神,通过景观的空间布局和历史感营造在现代旅游中进行呈现,对提升旅游者的审美体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学作为“前理解”为旅游审美提供了可期待的空间,游客的审美感知通过人物、往事、情节环境等层面的想象得到理解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从诗词中的景观视角切入,发现诗词的“前结构”不仅对旅游者的审美活动影响深刻,也能够为旅游地建设层面提供经过历史实践的构景模式参考。^[11]

(二) 中国民俗美学

宋薇认为,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冀皮影戏,在戏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冀皮影戏以民间艺术为文化土壤,充分吸收民间音乐、美术、戏曲、方言、雕塑等民俗文化的精华,形成冀东、冀中和冀南不同的影戏审美特色。冀皮影戏的民俗审美文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源:首先,冀东皮影戏中的民俗审美文化。冀东皮影戏以唐山皮影戏(也称滦州皮影或乐亭皮影)为代表,独具艺术魅力和地方审美情趣。冀东浓郁的方言结合独特的“掐嗓唱法”自成一派,冀东皮影将传统的民间雕刻、绘画及色彩等艺术融于一体,民众信仰是滋养影戏的丰厚土壤,文风礼俗是影卷题材的资源宝库;其次,冀中皮影戏中的民俗审美文化。沧州河间皮影是冀中皮影戏的典型代表。冀中影戏慷慨激昂、忠肝义胆的影戏主题和融合了剪纸艺术的影人造型别具特色。冀中影戏的生存、发展自然与该地区的民俗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节日风俗对影戏的表演产生双重影响;最后,冀南皮影戏中的民俗审美文化。冀南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景观,为影戏提供了多样的素材。冀南影戏在演进中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发生碰撞、融汇、贯合,从而形成独具地方艺术魅力的剧种,其发展、繁盛与宗教、民间祭祀、还愿等民众信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皮影戏一直在中国民间流传、发展、繁荣且经久不衰,究其原因,是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它发源于民间,为民间所有,为民间所乐。^[12]

李福成、刘毅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立为例,从工艺美院与工艺美术的兴起、工艺美院“风格”与现代化进程、工艺美术与社会性美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现代审美生活与美育的开端,深入解析中国现代审美的趣味特性与美学内涵。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现代审美生活,进入到社会大众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产生的所谓“工艺美院风格”,其中的要义不在艺术,而是在于面向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建设,开启了中国现代审美生活的序幕。经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诸位开创者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兼顾精英艺术的“形而上”与实用艺术的“形而下”的融合发展模式,对社会性审美教育,以及促进审美观念的形

成与审美趣味的提升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3]

四、宗教学研究

(一) 宗教教材

吴洪成、张美玲认为,唐代国力强盛,伴随当时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的繁荣以及加强中央政治集权的统治需要,各类支持宗教教育发展的政策应运而生。唐代实行儒、道、佛并立的文教政策,设立了专门的宗教学习的场所,开展了丰富的编书撰经活动,出现了大量的专门的宗教教材。其中,道教的学习内容为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列子》以及《文子》等经典教材。宗教教材甚至受到最高统治层面的关注,唐玄宗李隆基注解《老子》,并号令流传天下,要求遍布民间。唐代佛教的基本教材被称为内典教材,教材内容主要是佛教教义。内典教材又被作为两个区分,一是初级教材,即《三宝四谛》《三科法门》《三乘五性》《五乘三性》《法门名义集》等,主要围绕佛学常识的介绍及其讨论、阐明佛教基本主张和相关问题。二是高级教材,主要内容在于说明“三藏”蕴含的宗教义理和观念思想。“三藏”则表现为以经——佛教经典教材、律——佛教清规戒律、论——彻悟高僧对佛教经典的注释和发扬。宗教教材进一步规范了唐代宗教的教学内容,保证了宗教教学的有序实施,从而实现宗教的精神心理价值。唐代宗教教材的发展对中国后世的宗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仅促使宗教教材、义理内容的传承与创新,而且还促进了宗教本土化的发展,并对海外宗教教材实现一定的辐射影响,尤其对日本以及当今朝鲜、韩国境内的新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4]

(二) 宗教与音乐

邓博认为,上海地区的道教在宋代已初具规模。上海道教音乐是伴随道教仪式的传入而逐步发展完善的,与当时的苏南道曲、江西龙虎山道曲都保持着渊源关系。上海道教在适应社会变化过程的传播中,更加注重仪式与音乐的群众性,因此上海道教音乐同民间音乐的关系,尤其与江南丝竹的关系更为密切,形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丰富的表现形式的道教音乐形式,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道教文化载体。2008年,上海道教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上海道教音乐从内容上包含两个部分：其一，道教科仪音乐。主要适用于各种道教斋醮科仪的伴奏，并作为上海道教音乐的主体。其二，表现道家思想的乐曲。主要演奏方式为纯器乐曲，大多单独演奏，不包含在科仪中，旨在宣扬道教的思想观念，传达出恬淡虚无、返璞归真的意趣。上海道教音乐的曲目构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纯道教音乐；二是来源于民间戏曲音乐的曲目；三是流传久远、保存至今，源于宫廷音乐的曲目。在演奏流派上，因曲目、乐队组合、演奏（唱）风格以及法事仪式的内容，上海道教音乐基本分为“西乡”“东乡”“市区”三个不同流派，风格共同表现为细腻委婉、典雅清新，同时又体现出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的文化特色和民俗特色。^[15]

刘东兴以民勤县张家葬礼仪式作为主要的观察和研究对象，通过对河西走廊东部民间宗教仪式的个案考察和音乐分析，阐明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经韵的厚重历史，体现出古朴、典雅的音韵风格，既表现出传统道教念诵类经韵的稳定性，又体现出诵唱类经韵音乐多样化的形态特点和时代特征。作者也认为，河西走廊东部地区民间道教的历史较悠久，宗教信仰氛围相对浓厚，道教的科仪程序相对固定并且带有较强的指向性，兼备功能性和表演性，音声意蕴丰富，显示出独特的风格。民间道教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在道士主持的众多法事活动中，一年中参与最多的活动是葬礼。尽管葬礼中道士需主持的仪式环节有很多，但每一个仪式环节都有其固定的功能与意义，因此每一个仪式环节也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经卷念诵和器乐演奏等行为。道士经文念诵可分为念诵类经韵和诵唱类经韵两类，以道士念诵经文为主，器乐演奏为辅，结合道士踏罡步斗行为而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质的宗教艺术展演活动。不同类型的经文念诵行为展示了不同仪式音声场域的特色，还体现出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文化的独特性品质。器乐演奏包括单曲体和曲牌连缀式，其中曲牌连缀式演奏较为少见。器乐曲音乐形态分析又分为曲牌连缀式与曲牌连缀体之异同、曲牌连缀式的选曲原则、曲牌连缀式视域下不同乐曲之间的连接。^[16]

（三）宗教与考古

陈灿平认为，从墓葬考古的视角分析，唐墓

出土的道教镜存在仍需关注的现象：整体数量较少；时间以九世纪的晚唐墓为主；个别出土状况或位置存在特殊，可能反映了某种葬俗；目前很难确定墓主与道教信仰的关系。因此，唐代道教镜出现的年代以及在丧葬中的功能实现等问题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从唐墓出土材料看，唐代道教镜的创制年代与《宝鉴图》所记载的第二种镜图高度吻合的《古镜记》的“古镜”样式的来源问题高度相关。《上清长生宝鉴图》所载第二种镜图的年代应不晚于七世纪后半叶，而主张《古镜记》的“古镜”年代或属七世纪后半叶，因此就必须解释此类“古镜”实物目前只见于中晚唐的问题缘由。目前的考古材料的支撑还不足以否定王度《古镜记》及其“古镜”的年代为初唐或盛唐早期的可能性，《宝鉴图》第二种镜图或它所代表的实物年代可能不晚于七世纪后半叶。而这份镜图或它所代表的实物才应该是《古镜记》之“古镜”的真正来源。原因在于：相比俗世用镜，道教镜的数量本应该就不多，所以唐代人很少用其作为随葬。时至中晚唐，可能是因为某些特殊的丧葬习俗的需要或者其他的原因，道教镜最终才较多地出现在于墓葬之中。这是目前所见某些道教镜“行”于初盛唐，却“葬”于中晚唐的重要原因之一。^[17]

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一）科学哲学

齐晓晨认为，元奠基问题是奠基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它要求奠基理论回答奠基事实本身被何物所奠基这一问题。在当代的讨论中，对奠基之地位的追问通常体现为对奠基事实之地位的追问，即奠基事实是否被奠基以及被何物所奠基。由于这一问题关心的是奠基本身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它被称为元奠基问题。简单还原论和关联主义是回应这一问题的两种主流方案，但这两种回应都有各自的缺陷，简单还原论无法满足奠基的解释性要求，而关联主义会破坏奠基理论转变本体论基本问题的努力。奠基理论在元奠基问题上的困难来源于两方面的混淆。首先，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生成，从而将奠基看作实在中的某种关系，并承诺了奠基事实的存在，这导致了元奠基问题的产生；其次，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解释，从而认为如果奠基事实需要被辅

助条件所解释,那么它就需要被辅助条件所奠基。因此简单还原论认为自己需要否认辅助条件对奠基事实的解释作用,这导致了它无法满足奠基关系的解释性特征;而关联主义由于坚持辅助条件的解释作用,因此将辅助条件纳入实在的奠基链条之中,但它无法成功地说明辅助条件在这一链条中的位置。取消主义则澄清了这两个混淆,从而能够成为一种更加合理的理论。取消主义观点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直觉与常识。^[18]

(二) 科学政治学

韩来平在《科学政治学——范式、纲领及其困境与出路》一书中认为,科学与政治关系研究迫切需要自身语境的确立与建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整合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等相关学科内容,形成了科学政治学新的视野。该书在传统科学观下,通过对繁杂的科学与政治关系研究进行考察和典型分析,提炼和构建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纲领,梳理了科学政治学的基本内容,从而确立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与实践语境。这一语境表征为以科学为民的价值观为统领,建制化科学的“三角结构”理论为核心,社会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和“边界组织”工具为手段的科学政治学研究范式。由研究范式进一步延展为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宏观可调控性、公众参与民主调控的研究与实践纲领。以范式为指导,对研究纲领的历史主义宏观整体论特性与具体科学实践的微观阶段性之间的理论疑难和实践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揭示。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利用“边界组织”工具构筑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有机边界,实现合目的调控的科学研究系统“自组织”演进的方案,从而完成了科学政治学范式的论证。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对中国化科学政治学的实践经验与启示进行研究,从科学政治学的视角对新型举国科技体制进行诠释,提供了科学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方案。^[19]

(三) 科技与人文

韩来平、陈璇认为,要让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不再停留在观念和逻辑上,就要深入探索实现融合的有效路径与方法。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实践生存论出发得出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统一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基础,明确了人

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科技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科技与人文的实质性融合寓于科技利益攸关方多元参与的科技评估与审查中,实质性融合的表征在于利益攸关方多元参与形成的科技伦理共识。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实践进路在于构建科技与人文之间有机互动的实践空间,确立以基本道德共识为核心的科技伦理语境,以基本道德共识为逻辑起点,通过共识影响要素的调节形成促进伦理共识形成的引导原则,以此促使科技与人文实质性融合并为科技异化的调控提供依据。马克思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思想智慧与强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理与路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是让人民进一步分享新兴科技所带来的红利,有力应对不确定风险,以确保科技与社会的创新发展和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20]

(张燕京:河北大学教授;
王丽珍:河北大学博士生;
孙亮:河北大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 [1]张燕京,郑甲平.弗雷格的“普遍性”思想——基于句子图式的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2]李月坤,张燕京.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区别的论证——基于现代逻辑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22(9).
- [3]赵贤.模态信念如何得到辩护?[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4]秦飞.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J].东岳论丛,2022(9).
- [5]敦鹏,段姗姗.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三个向度[J].保定学院学报,2022(4).
- [6]周颖玉,柯平,刘海鸥.面向算法推荐伦理失范的人机和谐生态建构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10).
- [7]田海舰,连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河北实践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8]陈玉强.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
- [9]郝国澎.诗意的怀旧——马麟《秉烛夜游图》的审美特质[J].美术观察,2022(3).
- [10]贺小敏,刘馨蕾.道家美学思想在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应

- 用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17).
- [11]许源,陶卓民,荣慧芳.庐山诗词中典型景观时空特征及旅游审美研究[J].旅游学刊,2022(5).
- [12]宋薇.冀皮影戏的民俗审美文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13]李福成,刘毅.工艺美院风格:中国现代审美生活与美育的开端[J].美育学刊,2022(2).
- [14]吴洪成,张美玲.唐代宗教教材初探[J].教育与考试,2022(3).
- [15]邓博.上海道教音乐:浓郁的地方色彩 丰富的表现形式[J].中国宗教,2022(7).

- [16]刘东兴.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仪式音乐形态研究[J].中国音乐,2022(2).
- [17]陈灿平.关于唐代道教镜的年代问题[J].中原文物,2022(5).
- [18]齐晓晨.元奠基问题与奠基事实——一种取消主义的观点[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5).
- [19]韩来平.科学政治学——范式、纲领及其困境与出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20]韩来平,陈璇.马克思主义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理与路——科技伦理共识问题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3).

经 济 学

经济理论研究

田学斌 刘蕊

2022年,河北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颇丰。河北学者重点围绕创新创业、数字经济、低碳经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等主题展开理论研究,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根据。2022年,河北学术界围绕政治经济学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深入分析美国经济金融化,为发展中国家防范过早金融化提供重要启示。近年来,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与金融化相互作用,深度交汇融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化扩张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马锦生和刘华光基于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对美国经济金融化进行分析,指出金融化具有体现资本主义适应性与导致不稳定性的双重属性,深刻揭示了“金融化悖论”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中的具体演进形态,对于深刻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防范过早金融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

二是高度关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促进

社会 and 经济发展提供良好保障。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以维护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青川认为政府规制是劳动力市场自由、高效运行的保障;劳动力市场失灵是企业存在和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政府规制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中的效率,并解决其存在的公平问题。^[2]

三是深度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方向指引。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收入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杨文杰和韦玮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并使其向上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构筑橄榄型社会结构、规范和调节高收入并鼓励高收入人群参与第三次分配等措施,使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相互协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

二、西方经济学

受社会、历史、阶级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必然随着历史时代的更迭而发生变化。2022年,河北学术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就业、投资、财政金融、创新、数字经济等方面,在保持传统领域研究上又立足该领

域的学术前沿,展现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新成果与新趋向。

(一) 就业问题

灵活就业是对传统劳动关系和劳动法的突破和肢解,王利军和涂永前通过对中德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比较,发现中德两国主要在劳动者的工作社保是否与雇主脱钩、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统一度及覆盖率、特殊灵活就业群体的针对性补助以及养老保险抵税四个方面存在区别,建议我国政府在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积极借鉴德国实践经验,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政策环境不断激发灵活就业群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4]魏熙晔和郭东杰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用机制的差异,并分别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系统研究生产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发现生产率提升可能对就业总量有负向冲击,但影响相对轻微。^[5]宋凤轩、王丽、孙颖鹿通过对新业态下的就业问题与促进就业财税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在针对性与落实度、税收优惠同财政支出间的预算平衡性以及职业培训政策的供给度和瞄准度等方面还有待改进,提出完善新业态就业财税政策的优化路径:以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双效促进就业、强化新业态就业财政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提升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度、深化新业态就业培训财政支持、构建全国统一的数字税收平台等。^[6]

(二) 投资问题

杨栋旭和于津平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对 FDI 的具体效应和影响机制,国际层面的研究表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一国 FDI 增长,且对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 FDI 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国内层面的研究表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中国各市 FDI 增长。^[7]宋宝琳、王丽、宋凤轩利用三阶段 DEA 方法分析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不同区域政府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差异可体现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不同区域和时间跨度下政府投资效率也有差异。^[8]李惠茹和陈兆伟从 FDI 与 OFDI 双向技术溢出“共生效应”视角出发,探究双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制造业动力变革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提出精准实

施双向投资空间差异化策略,发挥好双向技术溢出通过科技、人才等要素推动制造业新动能培育的路径作用的政策建议。^[9]李敏和陈兆伟通过考察 FDI 与 OFDI 技术溢出协调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发现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已形成良好惯性;FDI 与 OFDI 技术溢出协调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呈溢出增强效应;受 FDI 和 OFDI 投资规模及吸收能力影响,技术溢出协调的拟合作用呈显著非线性特征。^[10]

(三) 财政金融

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是拓宽老年人收入渠道、缩小老年人群收入差距、实现高质量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成新轩和冯潇通过分析借鉴瑞典、智利和美国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运行经验,提出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待遇,财政保障共同富裕;做实个人养老账户,多渠道融资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升级资产型养老保险转型,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激励实现共同富裕。^[11]尹成远和王珠存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公众三个角度分析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美国个人退休账户计划、德国里斯特养老金计划和日本社区养老的先进经验为借鉴,有针对性地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和用户三个角度提出推动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12]

(四) 创新研究

经济政策会影响企业创新。李恩极、张晨、万相昱认为企业韧性水平的差异会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产生门槛效应,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情境下的创新活动会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但对企业破产的影响并不明显。^[13]许楠和刘雪琴运用动态面板阈值模型检验了减税降费力度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现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认为政府在干预减税降费政策的施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减税降费政策发挥其作用。^[14]邢会、张金慧、杨子嘉、谷江宁指出在有关“营改增”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营改增”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税负、增加投资、深化分工三个方面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企业特征、企业内部治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调节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从创

新倾向、专利数量和经济绩效三个视角全面考察企业创新,以检验其效果,为后续政府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15]李媛媛、陈文静、王辉认为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类和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从政策制定角度和企业策略角度就如何优化科技金融政策提出建议。^[16]

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竞争优势提升意义重大。董志基于 718 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对双向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本组态效应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三者关联进行探究,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智力资本组态效应显著增强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17]邢会、贾胤婕、陈园园认为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影响,同时提出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式创新,更加注重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保持自身创新能力独立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适当增加低碳节能创新产品溢出等政策建议。^[18]温科、李常洪、徐晓肆以 2010—2020 年上市的中国 A 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探析中国企业特定优势在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提出中国企业需要坚持国际化进程进而获取创新绩效、重视重资产运营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发挥“人”在国际化和创新进程关系中的有效作用。^[19]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宁金辉、苑泽明、史方以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环境经营决策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大气污染防治考核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0]张艳丽、许龙、王建华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驱动路径进行模拟仿真研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受到政府规制、市场需求与竞争、绿色创新意愿、组织管理和技术因素等多种因素的驱动,并从加强政策支撑、提高预期经济收益和增强环保意识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21]叶陈毅、黄灿、王上以 2015—2019 年制造业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通过分析企业战略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双维度探究绿色创新与制造企业价值的关系,发现绿色创新与制造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22]

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域创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田雅娟、田戈扬、宋剑应用半参数地理加性模型考察了区域创新能力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发现除研发人员投入外,研发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技术差距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23]杨胜利、冯丹宁、段佳柯认为我国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保障能力作为资本的内生变量时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时间推移,科技创新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保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凸显。^[24]王余丁、王蓓、席增雷基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视角,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维度探究外部环境变量对产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的空间调节作用,发现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模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目前高新企业并没有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导致创新要素资源配置失调,使得企业创新活力受到抑制。^[25]

(五)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具有创新性、渗透性和广覆盖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高振娟和王智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链式中介渠道加快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26]秦建群、赵晶晶、王薇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 2004—2019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两者存在倒“U”形非线性特征。^[27]张岳和易福金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中小银行生产率的提升,但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低,未完全构建数字技术的互补体系,从而提出加大数字技术投资力度、加快构建数字技术互补体系、强化金融监管等政策建议。^[28]王智新、高天、王若男对国内外关于数字

创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学界对于数字创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认识仍处在初级阶段,认为今后如何将西方发达国家数字创新、数字经济的先进经验与我国现实国情相连,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数字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是我国学者应当研究的重点问题。^[29]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李小青、何玮萱、霍雨丹、周建将数字化创新和数字金融纳入整合研究框架,认为适度的数字金融水平有利于强化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抑制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30]王智新、朱文卿、韩承斌认为引导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和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加快发展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提升。^[31]宋宝琳、张航、胡欣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并且这一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提出扎实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区域消费水平、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等对策建议。^[32]

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2022年,河北学术界主要针对人口、低碳经济、资源经济、环境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 人口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深度都将持续加剧,合理的人口死亡率预测有利于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吴晓坤、雒水棵、苏雯、高建伟利用调整后的CBD模型对未来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研究了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面临的长寿风险。^[33]王金营、李庄园、王冬梅从增强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提出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范围和方向,认为应积极改变人口长期发展轨迹,以接近更替水平为目标努力提升生育率,促进人口向着规模相对稳定、结构逐步优

化、素质不断提升、空间分布合理的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的方向发展。^[34]王朋岗和黄强通过探讨人口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对社会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认为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政府应在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做到“以人为本”,进行现代化社会治理,以“服务治理”理念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充分利用好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回旋空间。^[35]

提高老年人群健康养老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耦合度,不仅可以应对老龄化加速带来的社会压力,同时也能够激发养老消费潜力,提振内需。隗建华基于耦合度模型,定量评估我国各省份健康养老供需耦合度,研究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健康养老供需耦合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老龄化水平、城乡差距以及人口流失会加剧供需失调的问题,市场化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我国城乡健康养老需求递增与供给不足的矛盾。^[36]刘淑娜和柳清瑞从家庭负债角度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率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杠杆率上升会促进老年人退而不休和减少医疗支出,进而降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37]范庆祝、吴宇凤、刘淑彦探讨了新农合对我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保健消费的影响,结论表明,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代际支持是重要中介渠道,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38]

(二) 低碳经济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张琨和蔡树勋认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在东部省份更为显著。^[39]王殿茹和李敏认为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体现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建议从政府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促进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等方面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40]陈兆伟和李惠茹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国内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路径考察对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价值链的垂直分工

表现为缩小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的“碳协同”效应，而水平分工则表现为拉大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的“碳沉淀”效应。^[41]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现实背景下，杨林、郝新亚、沈春蕾、安冬认为中国海洋渔业碳汇增长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实际贡献可能十分有限，建议推动中国海洋渔业碳汇的增长模式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不断提高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持续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出贡献。^[42]

（三）资源经济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促进资源节约集约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侯孟阳、邓元杰、姚顺波通过构建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气候条件则在“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粮食生产”的路径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43]韩冬梅、汪刚、田晓喻基于“短板理论”构建了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指数，分析了2010—2019年我国29个省份的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及短板要素，研究表明，耕地资源承载风险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养殖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且存在较高的风险集聚性；水资源约束是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的最大短板；养殖重点发展区域普遍资源承载风险较高，存在资源要素短缺的风险。^[44]

（四）环境问题

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效益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是关键。周勋章、邵红岭、杜英娜、路剑在分析我国中部地区家庭农场主绿色认知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入农业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农业环境规制政策对家庭农场主绿色认知——绿色生产行为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45]李国柱和李晓壮通过探究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遵循成本效应”占主导地位；空间溢出效应显示，环境规制对邻近城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提出积极引导京津冀地区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增加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46]牛晓耕和田振兴认为环境规制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且环境规制强度尚未到达拐点，提出从优化协同创新顶层设计、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健全创新资源共享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四方面促进环境效益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47]王树强和杨恒以国家针对“2+26”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施加的环境治理措施为外部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了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科技创新效应，研究发现，传输通道环境治理协作能够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提出升级产业结构、优化金融环境、增加政府创新资助可作为完善环境治理综合配套体系的重点突破方向。^[48]

四、世界经济

面对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国贸易竞争力，对促进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持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白湧汎和罗伊玲以“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管理为核心，分析了国家出口潜力、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出国家出口潜力、贸易效率的发掘是提升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认为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时应考虑上述两方面因素，以期为提升国家贸易竞争力提供一定支持和帮助。^[49]赵立斌、范鹏辉、张梦雪、孟涛利用产业关联指标比较分析京津冀参与生产网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河北融入京津冀助力“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构建要与GVC及“一带一路”区域、次区域生产网络发生更多产业关联并进行充分融合，从而打破在GVC中被低端“锁定”的状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50]刘新霞从基建合作、产业合作及多元政策出发，分析了“冰上丝绸之路”视角下中俄贸易路径的开拓策略，提出在开展经贸合作交流过程中，中俄应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支点港口建设，以产业合作为核心，以多元政策为保障，明确经贸合作交流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实现互利共赢。^[51]

五、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及乡村振兴是重要议题。2022年，

河北学术界围绕此方面提出了不少新思路、新观点,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整体上呈现积极进取、欣欣向荣的研究局面。

(一) 农业、农村、农民

过去几年,部分学者尽管强化了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但就目前而言,在农业科技方面存在例如资源不均衡分布、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应用较低等各类问题。袁伟民和赵泽阳认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陷入内卷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供给旨趣错位、运行机制沉痾固化、企业和平台发展滞后、协同创新与集成转化水平低下,提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质量的有效提升,迫切需要从科研评价体制、内生动力、转化主体,以及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的重构,进而跳出内卷化怪圈。^[52]贾冀南、郭晓磊、王金良通过构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我国 2019 年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其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各地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现象,提出加强农业绿色发展观念,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注重优质农作物的生产,形成效益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方式等建议。^[53]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段晓亮和王慧敏指出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意识淡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粗放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未根本扭转等现实困境,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需要解决制约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层次障碍。^[54]申琳、孙茹雪、刘海燕、孙佳慧、李华军以河北省 11 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发现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民生活条件准则层,具体表现为饮用水和住房状况共同制约了人居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提出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因地制宜地整治各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推动生态宜居美丽农村建设。^[55]

高素质农民队伍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同时也是“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议题。刘奉越和李洪岩探讨了“田间学校”“阶梯递进”“多元联动”“数智循环”等较为

典型的模式,剖析了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行动逻辑,以希为其提供一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56]张亮和樊梦瑶深入剖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机制,提出融合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利益联结的方式增强双方的协调性和稳定性,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决定了“两新融合”的不同类型,因而“两新融合”必须通过要素融合、市场化运作、三方协作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57]

(二) 乡村振兴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逐步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因此河北众多学者试图从数字金融这一角度为促进乡村振兴作出有益补充。李凯伦、贾冀南、盖一博采用 Tobit 模型估计法实证分析河北省数字金融对乡村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乡村绿色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也对河北省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8]康书生和杨娜娜认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基本呈现“东高西低”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中,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乡村产业振兴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数字化程度促进效果更好。^[59]张寒蒙、张子杨、汪昌阳运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其中财政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果最强。^[60]徐运红、胡琳琳、周君君、赵莉、王华东对河北省农村地区新型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单一、贷款产品种类少、金融机构针对农户贷款意愿不足、农业保险机构设置少,提出应该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政策改革,鼓励各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向下延伸,在农村地区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性金融格局。^[6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的支撑。薛楠、韩天明、朱传言对 30 年来平台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依据文献研究和现实案例,设计了农业平台生态系统画布,提出借助生态平台赋能,依托价值创造、价值分配、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让农户重新组织起来,真正实现分散的农户集聚在

生态平台模式下进行自主经营,帮助农户走上共同富裕发展之路。^[62]冯赵建和肖桐郡指出,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作为“政府、企业、高校”三方互通的桥梁,能够促进创新创业信息交互融合和科技资源共享,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瞄准农村科技创新创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让科技创新创业赋能,助力乡村振兴。^[63]张京京、刘同山、钟真指出,利用网络对外推介或开展电子商务的网络营销可以显著提高乡村旅游经营效益,认为政府应当加快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引导支持乡村旅游经营者进行网络营销,并对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的乡村旅游经营者实施网络营销技术培训。^[64]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也离不开医疗保障、农产品流通、乡村产业发展等。倪志宇和曹群对稳定脱贫背景下精准医疗帮扶的现存困境进行分析,并根据精准医疗帮扶的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省、县、乡、村”四级联动精准医疗帮扶模式以及进一步优化精准医疗帮扶路径。^[65]徐运红、黄钰龙、王华东通过对我国农产品流通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脱贫攻坚中,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力度不足、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不足,提出应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不断优化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农产品流通业态、整合农产品供应链、加强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建设等多种方式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66]杨宾宾、魏杰、宗义湘、王俊芹基于熵值法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分维度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分为发展实力较强、发展实力中等和发展实力较弱三个梯度;从四个二级指标分维度视角研究发现,各地级市发展指数不同,在产业融合发展中各具优势和劣势,应依据自身禀赋,补齐短板,促进多形态、多业态的产业融合发展。^[67]

推动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瞻远瞩的科学理论指导。河北经济学者立足时代需求,对当前河北省重点任务作出理论阐释,总体而言,2022年是经济理论研究大步推进、成果丰硕的一年,但不可否认的是,高质量研究成果

总体偏少,理论研究常常落后于实践发展。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越来越多新情况新问题,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对经济问题的解释力越来越弱,要真正实现通过理论研究推动政策建构与实践发展的宏大目标,还需要各位学者顺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势,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以高水平的研究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田学斌: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

刘蕊: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马锦生,刘华光.难以跨越的“金融化悖论”——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金融化分析[J].人文杂志,2022(12):71-77.
- [2] 袁青川.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关系中的政府规制研究[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2,36(01):60-66.
- [3] 杨文杰,韦玮.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推进共同富裕[J].理论探讨,2022(06):149-154.
- [4] 王利军,涂永前.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J].广东社会科学,2022(06):248-257,283.
- [5] 魏熙晔,郭东杰.生产率提升对就业的影响——挤出效应还是溢出效应[J].当代财经,2022(04):15-27.
- [6] 宋凤轩,王丽,孙颖鹿.新业态下促进就业的财税优惠政策: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经济论坛,2022(03):86-93.
- [7] 杨栋旭,于津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FDI增长——国际和国内的经验证据[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03):51-67.
- [8] 宋宝琳,王丽,宋凤轩.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评价与比较[J].统计与决策,2022,38(18):156-160.
- [9] 李惠茹,陈兆伟.双向技术溢出推动我国制造业动力变革的共生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22(05):116-128.
- [10] 李敏,陈兆伟.FDI与OFDI技术溢出协调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22,38(05):82-88,120.
- [11] 成新轩,冯潇.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研究[J].理论探讨,2022(04):161-166.
- [12] 尹成远,王珠存.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对策[J].河北金融,2022(11):3-9.
- [13] 李恩极,张晨,万相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企业韧性视角[J].当代财经,2022(10):102-114.
- [14] 许楠,刘雪琴.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政府干预程度的非线性调节[J].财会通讯,2022(21):24-29.
- [15] 邢会,张金慧,杨子嘉,谷江宁.“营改增”政策与企业创

- 新关系研究述评[J].财会通讯,2022(02):27-32.
- [16]李媛媛,陈文静,王辉.双重网络效应下科技金融政策创新绩效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03):55-62.
- [17]董志.智力资本组态效应、双向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J].财会通讯,2022(15):63-68.
- [18]邢会,贾胤婕,陈园园.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24):40-49.
- [19]温科,李常洪,徐晓肆.企业国际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2010—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J].企业经济,2022,41(06):66-79.
- [20]宁金辉,苑泽明,史方.大气污染防治考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36(12):58-70.
- [21]张艳丽,许龙,王建华.绿色创新视阈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模拟[J].企业经济,2022,41(03):13-23.
- [22]叶陈毅,黄灿,王上.绿色创新对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研究[J].会计之友,2022(19):117-124.
- [23]田雅娟,田戈扬,宋剑.区域创新影响因素的效应测度与分解研究——基于地理加权模型和夏普里值法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43(03):51-59.
- [24]杨胜利,冯丹宁,段佳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01):1-10.
- [25]王余丁,王蓓,席雷雷.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43(02):90-99.
- [26]高振娟,王智新.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2,38(23):23-27.
- [27]秦建群,赵晶晶,王薇.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与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2,38(11):99-103.
- [28]张岳,易福金.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22(11):19-38.
- [29]王智新,高天,王若男.数字创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科学管理研究,2022,40(05):91-97.
- [30]李小青,何玮莹,霍雨丹,周建.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24(01):80-95.
- [31]王智新,朱文卿,韩承斌.数字金融是否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科技论坛,2022(03):52-61.
- [32]宋宝琳,张航,胡欣蕊.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J].财政科学,2022(05):122-133.
- [33]吴晓坤,雒水稞,苏雯,高建伟.中国人口CBD死亡率模型的参数再调整[J].统计与决策,2021,37(23):41-44.
- [34]王金营,李庄园,王冬梅.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J].人口研究,2022,46(04):40-54.
- [35]王朋岗,黄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及其可能的社会经济影响[J].人口与健康,2022(02):36-40.
- [36]隗建华.城乡老年人群健康养老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耦合度评价[J].商业经济研究,2022(10):63-66.
- [37]刘淑娜,柳清瑞.家庭杠杆率的老年健康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2,28(03):99-113.
- [38]范庆祝,吴宇凤,刘淑彦.新农合、健康异质性与保健消费——基于我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分析[J].农村经济,2022(02):117-125.
- [39]张琨,蔡树勋.碳排放权交易、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异时DID方法的讨论[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10):61-67.
- [40]王殿茹,李敏.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碳减排效应[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45(04):104-109.
- [41]陈兆伟,李惠茹.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工网络与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缩小还是拉大[J].宏观经济研究,2022(11):104-121.
- [42]杨林,郝新亚,沈春蕾,安冬.碳中和目标下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与潜力评估[J].资源科学,2022,44(04):716-729.
- [43]侯孟阳,邓元杰,姚顺波.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10):160-171.
- [44]韩冬梅,汪刚,田晓喻.基于短板理论的中国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评估[J].资源科学,2022,44(10):2074-2088.
- [45]周勋章,邵红岭,杜英娜,路剑.农业环境规制情境下绿色认知对家庭农场主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基于我国中部地区家庭农场的调查[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3):32-43.
- [46]李国柱,李晓壮.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J].统计与决策,2022,38(18):26-31.
- [47]牛晓耕,田振兴.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45(06):98-107.
- [48]王树强,杨恒.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传输通道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02):93-99.
- [49]白湧汎,罗伊玲.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管理影响因素分析——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J].社会科学家,2022(03):98-107.
- [50]赵立斌,范鹏辉,张梦雪,孟涛.生产网络视角下河北与京津协同对接“一带一路”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22(03):33-43.
- [51]刘新霞.“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视角下中俄贸易路径的

- 开拓研究[J].价格月刊,2022(06):63-67.
- [52]袁伟民,赵泽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卷化:困境表征与破解进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2):104-113.
- [53]贾冀南,郭晓磊,王金良.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J].农业经济,2022(08):6-8.
- [54]段晓亮,王慧敏.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J].农业经济,2022(04):62-63.
- [55]申琳,孙茹雪,刘海燕,孙佳慧,李华军.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2022,26(04):1-8,59.
- [56]刘奉越,李洪岩.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演进、模式及行动逻辑[J].职教论坛,2022,38(12):84-91.
- [57]张亮,樊梦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机制构建[J].河北学刊,2022,42(04):154-161.
- [58]李凯伦,贾冀南,盖一博.“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助力乡村绿色产业振兴研究——基于河北省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乡村科技,2022,13(21):5-9.
- [59]康书生,杨娜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2(02):110-118.
- [60]张寒蒙,张子杨,汪昌阳.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35(05):13-19.
- [61]徐运红,胡琳琳,周君君,赵莉,王华东.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下河北省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研究[J].山西农经,2022(13):184-187.
- [62]薛楠,韩天明,朱传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农业振兴:农业平台生态系统的架构和实现机制[J].西南金融,2022(03):58-67.
- [63]冯赵建,肖桐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探究——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J].灌溉排水学报,2022,41(06):159.
- [64]张京京,刘同山,钟真.网络营销提升了乡村旅游经营效益吗?——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2(03):67-83.
- [65]倪志宇,曹群.稳定脱贫背景下精准医疗帮扶的困境、创新与保障[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7(05):120-127.
- [66]徐运红,黄钰龙,王华东.以农产品流通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J].现代商业,2022(27):151-154.
- [67]杨宾宾,魏杰,宗义湘,王俊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J].统计与决策,2022,38(02):125-128.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

陈志国 席增雷

一、2022年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总体状况

2022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致力于分析研究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为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从研究数量来看,2022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视阈呈现多元化特征,具体研究涵盖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竞争力、城市经济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部门经济中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商贸经济等各个具体领域;同时,一些研究选题具有新意和时代性,深刻探讨数字经济、碳排放等当前学术热点问题。总体来看,2022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立足区域经济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度研究。2022年研究的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竞争力、城市经济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均属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范畴。河北省学者以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结合数字经济大背景,对数字经济的空间集聚进行探讨。

第二,学者们紧扣时事热点,通过当前学术热点的研究并赋予了学术成果高度的现实意义。较为热门的话题有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2022年,数字经济以群体突破、交叉融合等多种方式实现了与实体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并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

二、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由支柱性产业及产前产后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等,协调配合而形成的经济系统。其强调有效资源的合理空间配置与有效利用,进而促进地区总财富和总福

利的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随着我国进入区域协调深化期，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区域发展研究逐渐成为目前学界的关注重点。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角度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农业、物流业、制造业和数字产业等部门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空间计量研究；县域、市域、省际、城市群及国家层面的产业、创新、城镇体系和人口等要素分析，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是研究的主要区域；以碳排放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研究。

田雅娟、田戈扬、宋剑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半参数地理加权模型考察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异质性分布，并基于夏普里值法对相关因素在区域创新差异中的贡献度进行分解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除研发人员投入外，研发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技术差距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在控制上述要素与时间趋势后，尚有未知的潜在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较强影响，江苏、浙江和广东三地的潜在创新环境最优。基于夏普里值法的贡献度分解显示，研发资本投入、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化进程是造成我国创新能力区域差异的三个主要因素。^[1]

户艳领、刘燕灵、武海波采用面板熵值法和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结合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对河北省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对测算结果进行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比分析，最后就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河北省各地市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绿色创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城市间绿色创新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冀东地区创新效率相对更高；单个因素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决定整体绿色创新效率，效率水平由环境质量和创新水平共同决定。^[2]

杨栋旭基于200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HCW方法评估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绩效看，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从影响渠道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

性、经济结构优化、创新能力、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等均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个别地区也存在政策“失灵”的情况；从横向比较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效应和影响渠道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此，应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细化顶层设计，因地制宜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3]

赵巧芝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技术创新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莫兰指数为正且不断上升，“高—高”和“低—低”类型发挥着主导作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对本省份技术创新有显著的驱动作用，而空间溢出效果不明显；研发投入的空间溢出效果则显著为正值；公有制经济对自身和相邻省份的技术创新均为正向驱动。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主导的高质量技术创新发展应更注重高质量、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空间溢出通道的完善也是加速创新系统构建的重要方向。^[4]

李秋杰、朱婧、孙新章从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角度分析我国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造成区域差异的因素。构建包含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资源环境3个层次共27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可获得有效数据的161家实验区为研究对象，测算其2014—2018年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得分，识别影响实验区可持续发展差异指标，并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指标，识别影响实验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1）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新登记注册企业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影响实验区可持续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2）导致实验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因素是纯技术效率与技术效率，即制度与结构发展因素；（3）实验区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主要源于技术进步；（4）实验区经济发展协调性总体呈改善趋势，其中浙江省的实验区协调发展水平较强，可为其他地区的实验区发展提供参考借鉴。^[5]

祁红梅选取2010—2019年中国29个省份数字经济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DEA-MI动态指数模型与Dagum基尼系数对各省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

济产出效率 Malmquist 指数整体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 29 个省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 Malmquist 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 七大区域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差异存在不同程度变化态势, 且区域间差异是导致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存在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鉴于此, 应打造“政府+市场”双管齐下的共治模式, 发挥社会非营利组织与市场组织等的作用, 协调好经济与社会间的关系, 从而实现数字经济产出效率提升。^[6]

彭晓静利用 Malmquist 方法对 2010—2019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中 38 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来反映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 “十三五”时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发展态势好于“十二五”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大城市群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动态变化存在差异, 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处于提升状态,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略有下降。同时,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受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据此, 文章提出要加快区域工业企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加大经费和人员等创新要素投入, 完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等建议。^[7]

梁晨、曾坚、丁锬媛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机制, 分别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与相对发展度模型解析了 2011—2019 年福建省 9 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过程与时空演进规律。结果表明: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通过复杂的耦合协调机制共同构成人居环境可持续系统, 其演进具有整体性、阶段性和连锁性。研究期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显著, 虽然二者关联性已达高位, 但协调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各市生态文明建设普遍同步或超前于城市化, 省域南北两翼城市化水平滞后是制约系统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 相对发展度在中后期出现良性收敛趋势, 但耦合协调演进表现出一定波动性; 三是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演进具有阶段性、传导性和全局性特征。区域经历了复杂的空间组织重构, 呈现出沿海带动内陆、中轴辐射两翼的“T”字形发展格局。^[8]

李军峰选取 2015—2018 年河北省 11 个地市

的空间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市域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 (1) 河北省各地市科研创新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 (2) 科研经费投入是影响各地市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3) 河北省各地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在时间上表现为相互促进的趋势, 在空间上表现为相互竞争关系。这说明进一步加强各地市之间的政府协调和科研创新合作是提高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9]

杨胜利、冯丹宁、段佳柯建立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特征、空间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 (1) 我国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 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保障能力作为资本的内生变量时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 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度相对较小。(3) 随着时间推移,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保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凸显。科技创新保障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高于科技创新投入能力与产出能力。因此, 注重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的综合提升, 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协调发展,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0]

三、区域竞争力

区域竞争力指一个区域综合利用并不断改善本区域的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制度体系等而获得的与其他区域相比所具有的能够促进本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是一个区域实现资源配置的能力, 强调的是在一个区域充分、有效利用区域内全部资源的同时吸引、控制和转化区域外部资源, 有效挖掘区域发展潜力, 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区域竞争力研究是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和评价, 对于确定区域的综合竞争能力, 发现竞争优势, 从而制定发展战略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2022 年, 河北省学术界从区域创新竞争、区域产业竞争、区域财政收入竞争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潘涛、王丽华、郭芳辰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协同创新的机制,构建了协同视角下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创新水平进行了比较。^[11]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水平随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水平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差。基于此,研究者从基础设施投入、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和竞争优势、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发展。

宋宝琳、王丽、宋凤轩对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12]利用 2011—2020 年有关地方政府投资规模数据,选用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与环境变量作为研究变量,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区域政府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差异可体现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不同区域和时间跨度下政府投资效率也有差异。研究者以提升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协同发展为目标,提出调整投资结构,加大科技投资,加大政府扶持,缩小区域投资差异,兼顾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共同投资的建议。

董志基于 718 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会双向开放式创新、智力资本组态效应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三者关联进行探究。^[13]研究者以河北、山东、天津、北京等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为 2013—2019 年,以可持续竞争优势为被解释变量,双向开放式创新为解释变量,治理资本组态效应为调节变量,企业年龄、产权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三个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双向开放式创新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且两者协同效应越好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越好;智力资本组态效应与可持续竞争优势显著正相关;智力资本组态效应显著增强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针对研究结果结合调研企业发展现状,得到如下启示:企业应重视开放式创新在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智力资本中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三要素的协同与组态效

应;以及政府层面应从研发费用方面对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引导形成“创新型”社会。

秦建群、赵晶晶、王薇分析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及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14]研究者采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 2004—2019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模型设定偏误、“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两者存在“倒 U”形非线性特征,当前阶段主要表现为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稳健;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更突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等路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在其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今后的发展应充分认识加大互联网投资力度、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满足创新过程中的人才需求。

刘立军、刘义臣构建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模型和耦合协调路径模型,测算京津冀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探明京津冀科技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15]研究者选取 2010—2019 年北京、天津和河北 11 市的统计数据为考察样本,构建耦合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逐步优化态势,天津 2015—2016 年耦合协调度等级提升后又出现回落现象,考察期内实现耦合协调度等级提升的仅有 6 市,内部呈现显著分异特征,协同水平有待提升;路径研究显示,京津冀科技金融投入通过效益发展、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路径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基于此提出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加大科技金融投入度,提高河北承接能力。

宋宝琳、张航、胡欣蕊探究数字金融能否促进地方政府征收,其传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16]以2011—2019年我国28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地方财政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为核心解释变量,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为中介变量,创新能力、财政支出、失业水平、“营改增”政策为控制变量,运用面板数据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介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中、低财政收入城市的财政增收作用更加明显。基于此适当放松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约束,加强高新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积极培植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

四、城市经济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重要产业和大量人口就会向城市集中,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正是由于城市的这种特性,使得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和城市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现代城市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中居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城市经济对其腹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扶持、引导和推动作用。经济本身具有辐射、带动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必须依靠城市这样一个载体来实现,城市经济是各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集合和重要纽带,这种集合和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部门经济协调发展的外部条件。城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热点,其覆盖方方面面的研究,种类丰富。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就城市产业、城市生态安全、城市发展布局等方面进行研究。

李丽红、张敏、李洪燕、李桢客观评价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承载安全对于推进功能突出、优势互补、协调有序的城市群发展布局思路,提升整体区域综合承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依据年鉴数据,基于PSR模型构建生态承载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法和TOPSIS方法评价京津冀生态承载安全状况。基于实证分析,从横向上定

量分析各城市生态承载安全状况,纵向上分析其演变趋势,剖析城市群竞争力、凝聚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生态承载安全优势与短板。最后基于实证分析探索了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承载安全保障的思路。^[17]

李敏、王雷针对京津冀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构建了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对两个系统开展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在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上领先于天津和河北,京津冀三地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逐渐提升的状态。在耦合度方面,北京和天津处于高耦合阶段,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进入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阶段,河北一直处于良性耦合阶段。在耦合协调度方面,北京进入了中度协调阶段,天津和河北处于基本协调阶段。基于以上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18]

王雅洁、张嘉颖从主体协同参与能力和区域协同配置能力出发,基于创新参与能力、主体协同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协同共享能力四个方面构建城市群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和改进的TOPSIS动态评价法对2009—2019年中国五个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从城市群内部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差异最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差异适中,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差异性较低;从城市群之间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速度放缓,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稳步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势头远超其他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经历了明显波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基础最弱但后发增长动力较强。^[19]

李峰、王科、赵毅以中国30个省(区、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空间条件收敛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直接和溢出的双重促进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东、西部区域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差距稳态趋同的作用,对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20]

张英良利用 2008—2018 年间的相关数据,以京津冀地区 13 个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关联性指标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通过引入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市场潜能变量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整个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为负,特定地区周边地区人均 GDP 每提高 1%,该地区人均 GDP 将下降 0.85%。应当加快推进区域内地区间的相互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21]

王韶华、赵暘春、何美璇、张伟、刘熙宁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要素供给、产业供给和制度供给 3 个维度构建供给侧改革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分别测度 2012—2018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供给侧改革效率和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并运用变形地图识别二者空间关联,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 2012—2018 年各市供给侧改革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承德等均有所提升,其他城市呈先减后增的发展趋势,受制度供给效率影响较大。(2) 2012—2018 年各市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指数大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且增速具有趋同趋势。(3) 供给侧改革效率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高值中心的空间格局,而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呈现以北京和天津为低值中心的空间格局。(4) 供给侧改革效率不是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的格兰杰原因,而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是供给侧改革效率的格兰杰原因,但京津冀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尚未对供给侧改革效率产生显著影响。^[22]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大思路、大战略,要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意义重大。2014 年 2 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决策。9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前进方

向、提供根本遵循,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一新,不断谋划高质量发展新篇章。2022 年,河北省学术界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出发,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环境、科技、工业、旅游等行业,对优化生产力布局、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郭会斌、薛婷婷、何苗、刘东华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对孵化器绩效进行实证研究。^[23]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拓宽了河北省发展空间,有效促进了河北省孵化器发展。研究者实证检验了河北省域内 2013—2019 年的孵化器绩效,以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为投入指标,构建经济效益、孵化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维模型。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源对孵化器经济效益、孵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物力资源对孵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但对经济效益具有负向影响;财力资源对孵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均未产生正向影响。对各变量间的差异化影响进行解释,提出提升孵化器绩效的对策建议,助力河北省域经济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启示:形成人才鲑鱼效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营造良好的财力资源引入环境;正视规模经济效应。

王树强、杨恒基于传输通道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对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进行了研究。^[24]认为深化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需要科学评价其科技创新成效,不断完善环境治理协作的综合配套体系。研究者以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及北京和天津共 13 个城市为研究样本,以国家针对“2+26”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认定)施加的环境治理措施为外部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了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科技创新效应,提出了完善环境治理的综合配套方案。研究发现,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促进了科技创新发展;更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质量、融资便利水平和政府支持力度三变量对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具有强化作用,升级产业结构、优化金融环境、增加政府创新资助可作为完善环境治理综合配套体系的重点突破方向。

张新宁、刘娜、贾文学、张子清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背景下,探究京津冀科技投入产出均衡。^[25]研究者为找出京津冀地区内科技投入产出差距及其原因,构建科技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2020年相关代表性数据,运用对比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京津冀地区内和河北省各地市间科技投入产出的均衡性。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科技投入产出存在明显差距,河北科技投入产出落后是主要原因;河北各地市科技投入产出强度存在较大梯度差,大致以石家庄为核心逐渐向冀南冀北减少,这是制约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从发挥北京辐射作用和促进河北发展两方面提出建议,以促进雄安高质量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促进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要加强北京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河北各地市科技投入产出均衡发展。

王韶华、杨志葳、张伟、刘晔对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测度及障碍因子进行诊断。^[26]根据要素协调和区域协同建立工业绿色协同发展的概念示意图,参考权威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的绿色发展内涵构建工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考虑动态性、兼顾主观与客观计算权重,综合运用AHP和引入时间加权向量的粗糙集理论,并设置分级标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局部协同度模型对2012—2018年京津冀13市工业绿色协同发展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识别关键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除天津有所下降外,其余市域工业绿色发展及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绝大多数市域工业增长质量下降较快。(2)除承德仍处于勉强协调区外,其他市域工业绿色要素协调均已跨入协调区,其中沧州、衡水、邯郸、邢台、唐山、张家口等处于初级协调区,但沧州和衡水上升趋势不明朗。(3)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及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的区域协同已分别跨入良好协同区、中级协同区和优质协同区,但与河北11市工业资源利用区域协同的差距不断扩大;增长质量区域协同由中级协同跌至勉强协同但有回升趋势。《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城市功能定位,着眼于整体和长远利益,但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会降低个体要素协调水平以及区域协同水平,应加强京津冀内重要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在市

域间的分工协作,完善GDP分计、财税分享机制等。

郭子雪、曹秀萌从低碳视角出发,研究了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27]认为,低碳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者基于低碳化发展的背景,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建立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构建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并引入耦合协调弹性系数作为分析关键影响因素的重要依据,对京津冀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还存在巨大的优化空间;第三产业产值与碳排放量成为影响京津冀地区物流产业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区域间合作、提供产业政策等有助于促进京津冀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京津冀地区应加强物流产业低碳化发展的意识,继续强化物流产业对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

邢慧斌、李君虹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出发,对河北省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28]认为,随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河北省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旅游业高质量转型升级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研究者首先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发展动力以及发展理念上界定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然后从优势和瓶颈两方面对河北省旅游业现存状况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区域合作、制度建构、科技创新、品牌营销、精准扶贫、生态保护六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推进河北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田小燕、张海燕、韩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大背景下,对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9]认为,金融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活动,研究京津冀三地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建立模型和实证分析,计算三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弹性系数。研究得出,三地弹性系数的相同点

都是正向的影响,但是,三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效果不一样,其中,河北省的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最小,天津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最大,北京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居中。通过计算京津冀三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弹性系数,可以发现,三地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都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京津冀三地应构建有效的金融体系,推动三地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六、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指同一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在某一地区或区域内密集聚集,形成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互联关系,并在这种互联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正向反馈的正循环模式,从而提高各方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现象。2022年,河北省产业集群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一方面,河北省加快了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步伐,促进了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冀南地区,由于其良好的交通和区位优势,集聚了不少产业集群,例如石家庄国家级高新区,邢台特色农产品产业集群等,为当地的经济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河北省仍然存在着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不够快、产业发展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同时,生态环境和区域协调发展也需要更多关注和投入。因此,河北省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完善产业链条和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工作,以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且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产业集群研究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理解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2022年,产业集群在河北省的发展备受关注,相关的文献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学者们不断探索产业集群的特点、问题和优势,为研究地区的产业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王余丁、王蓓、席增雷基于产业集群的外部性视角,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了中国30个省域高新技术产业不同的集聚模式对区域创新能

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及对外开放程度三个环境变量调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模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目前高新企业并没有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导致创新要素资源配置失调,使得企业创新活力受到抑制。此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模式与环境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带动区域创新的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及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高新企业竞争关系,进而优化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创新活动的发展。^[30]

秦建群、夏春玉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T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从市场分割视角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但却显著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的约束条件下存在差异。在克服内生性和考虑统计偏误后,结论保持稳健。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分割在交通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之间分别发挥部分和完全中介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效利用应成为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重要举措。第二,深化市场改革,推进要素市场整合和实行一体化发展战略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第三,全面认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质,加强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31]

杨胜利、王媛、陈欣基于广义分层线性模型,从微观、宏观两个角度分别使用问卷调查及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对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失业的个体影响因素趋于多元化,原因较为复杂;不同城市间流动人口失业存在显著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城市产业升级因素不同造成的;男性、年轻、学历高、已婚、跨省流动、参加失业保险、居留意愿强、人际关系较好的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不易失业;产业升级对不同流动人口群体失业存在显著筛选作用。并由以上结论引发了以下几方面

的思考：首先，流动人口失业问题应当引起当下学者与政府的高度重视，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相较于户籍人口而言其更容易失业，且在产业升级背景下此现象愈发突出，亟待解决；第二，不同城市间流动人口失业现象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如何促进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合理化、协调各城市人口流动与产业升级已成为当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三，产业升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内流动人口失业问题，因此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较慢的地区，应着力思考如何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换；第四，产业升级对低素质劳动力存在筛选作用，如何提高流动人口整体素质以适应城市产业升级要求，值得进一步研究。^[32]

戴雅娜认为近年来，我国交通设施结构发生了划时代改变，高铁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设施，其便捷、高效、准时，降低了区域经济的交易成本，活跃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为缩小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基于高铁的经济特性，文章选取了1999—2019年31个省份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高铁开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后通过产业聚集从而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研究同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具有显著的时滞效应，对缩小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逐步增强的作用。该结论为有效发挥高铁的使用价值提供了科学理论参考。因此，从政策层面来说，应进一步大力发展中西部高铁的建设，发挥其缩小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第一，强化区域规划，增加相对落后地区的高铁线。第二，发挥高速铁路的产业聚集和扩散作用。第三，提高地方政府在高铁建设中的参与度。^[33]

刘肖、金浩认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是实施高质量内涵式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和政府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主体在产业协同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并利用数值仿真分析各类政策不同执行力度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结论表明：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对企业协同

具有积极影响，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积极协同意愿能够相互强化；协同成本对主体协同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各类产业政策对系统均衡策略存在差异，高强度的激励和惩罚环境型政策以及适度的供给型政策对产业协同的促进效果最为明显，仅提高需求型政策执行强度对产业协同系统产生消极作用。^[34]

郑涛、杨如雪基于1997—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时序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如何影响产业韧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制造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且对冲击韧性的正向效应更强；在中介效应角度，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对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存在技术创新通过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产业韧性的间接效应，且对断裂韧性发挥的中介效应强于冲击韧性；在门槛效应角度，产业韧性能够做为门槛变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高产业韧性水平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增强。研究结论为高技术制造业增强产业韧性水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政策启示。启示如下：（1）产业韧性与外部冲击存在相互依存关系；（2）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抓手增强产业韧性水平；（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三者存在良性循环关系；（4）以高技术制造业为突破口，驱动制造业发展，增强整体产业韧性水平。^[35]

Gao, L; Guo, JX; Wang, X; Tian, Y; Wang, TL; Zhang, JR 运用超效率全局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DDF)模型，对中国西部12个省份2006—2020年的生态效率及其变化进行了评价。然后利用两个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模型详细分析了不同产业集聚形式对当地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总体上呈动态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生态效率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南高北低”“南慢北快”“三极分化”的特征。西部地区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在生态效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和非相关多样化集聚均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西部地区集聚相关多样性与生态效率呈“U”形关系。本研究结果也可为第二轮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产业转型和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因此,本研究对推进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工作具有基础性意义。^[36]

Chen Kai, Guo Feng, Xu Shuang 认为数字经济集聚非均衡布局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显著。本研究旨在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效果两个方面探讨数字经济集聚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差异的影响。首次证实了数字经济集聚与地区GTFP差异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同,该研究的产业升级机制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空间演化。该研究呼吁关注欠发达城市“低端锁定”的产业瓶颈。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验数据,运用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集聚如何影响地区GTFP差异。研究发现:中国GTFP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城市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数字经济集聚对GTFP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溢出效应,但由于非均衡的产业升级机制,数字经济集聚也加剧了地区GTFP的差异。^[37]

李涛、李国平、薛领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选取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具体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对城市自身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直接效应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工业生产率、知识存量和市场环境三条路径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但存在异质性;(3)知识存量和市场环境两种中介效应均存在双重门槛,且两者在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绿色经济效率中表现出“由抑制到促进,由微弱到增强”的阶梯性特征。该研究不仅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中具体的影响路径;同时,也证实了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存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人才集聚,提升城市知识存量。第二,积极优化城市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第三,推动互联互通水平,增强空间溢出效应。^[38]

李涛、薛领、李国平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2)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3)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4)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39]

陈肖、王彦梅、王瑞华认为随着政府出台一揽子促进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跨境电商是实现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而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也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特色产品和产业支撑,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基于此,首先阐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然后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四个方面,对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环境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推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路径。^[40]

七、农业经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障。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农业经济的研究范畴日益扩展。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就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态系统、农业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变动和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张敬伟、靳秀娟、涂玉琦为探索农村绿色创业实践背后的理论规律,选取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目报道的42个创业故事,应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归纳和提炼出农村绿色创业的逻辑框架和实践路径。^[41]研究表明:(1)农村绿色创业的逻辑框架沿循“驱动因素——行动策略——结果表现”这一主线展开,其中,驱动因素包括市场、制度、自然和个体等四类,这些因素引发了农村创业者对绿色创业机会的识别;行动策略包括三种创新策略(开发产品功能、创新生产流程、优化基础设施)和两种常规策略(沿循传统流程、基础资源保护),农村创业者通过不同的行动策略来利用绿色创业机会;结果表现包括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农村创业者通过绿色创业实现了企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基于创业过程中价值创造逻辑的差异,农村绿色创业呈现保守型、直接型和渐进型三种实践路径。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农村绿色创业研究,并启发农村绿色创业实践。

高雪、尹朝静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质量内涵的变化,并根据新时期的新发展理念,对我国农业发展质量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42]文章根据新发展理念,构建农业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分析我国农业发展质量的时空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前,农业发展质量的重点是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经济开放度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重点在于“好不好”。进入新时期,农业发展质量的重点是全方面与多维度的。据此,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测度结果显示,2012—2018年中国农业发展质量指数呈逐渐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是6.3%。其中,协调发展指数对农业发展质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绿色发展指数次之,共享发展指数再次之。分区域看,农业发展质量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且这种差距具有收敛趋势。得出结论: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农业技术创新,重视农业的提质增效与区域间统筹发展。

苑甜甜、王俊芹、赵邦宏基于组态分析的视

角,根据438位小农户的深度访谈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心理感知(农户认知和参与意愿)——外部情境(组织联结和政府规制)——行为效果模型,揭示心理感知和外部情境因素影响小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和多元路径。^[43]结果表明:单个行为决策因素并不是驱动农户有效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的必要条件,多个决策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三种提高农户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分别概括为参与意愿主导模式、内外联合约束模式及外部情境主导模式。可通过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等为农户提供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及信息,积极引导农户进行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产品品质提升。

薛楠、韩天明、朱传言对平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依据文献研究和现实案例,设计了农业平台生态系统画布:平台通过标准化的供给侧接口作为基础,品牌建设的需求侧接口作为抓手,赋能架构输出商品化服务,数据、人才和技术体系作为基石。^[44]借助生态平台赋能,依托价值创造、价值分配、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让农户重新组织起来,真正实现分散的农户集聚在生态平台模式下进行自主经营,帮助农户走上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韩冬梅、汪刚、田晓喻基于“短板理论”构建了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指数,分析了2010—2019年我国29个省份的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及短板要素,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省域风险的集聚性。^[45]研究表明:(1)耕地资源承载风险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养殖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且存在较高的风险集聚性,整体来看风险呈下降趋势,华南和西南地区风险高于其他区域;(2)水资源约束是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的最大短板;(3)养殖重点发展区域普遍资源承载风险较高,存在资源要素短缺的风险。由此,提出如下建议:构建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长期评估和预警体系,将最稀缺的“短板”要素作为最重要的警示要素,在区域养殖规划中采取“以短定养”;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坚持种养结合是降低耕地资源承载风险的重要途径;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与资源环境协作机制,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尤其应关注风险较大的养殖重

点地区。

李军峰、韩佳利通过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构建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选取河北省 11 个地市 2008—2018 年的面板数据,利用 Geode 软件对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利用 Matlab 软件计算杜宾模型估计的空间效应。^[46]结果显示:(1)河北省各地市粮食产量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2)河北省各地市粮食产量增长仍然依赖于农机总动力增加、增加农用化肥施用量以及增加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量;(3)市域增加农机总动力只在时空不固定和空间固定的情况下在市域间才产生明显正的溢出效应;在时空均不固定的情况下市域推广农作物收获机械化作业对其他地市粮食生产表现出正的溢出效应;农作物良种播种面积增长率对市域粮食产量增长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表现为显著负效应。最后为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刘义臣、沈伟康研究了数字经济和农民收入结构动态耦合变化规律和耦合差异来源,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运用 2014—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47]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民总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但其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最低;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优化态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东部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远远领先于中、西部;数字经济与农民总收入、非农收入耦合协调差异来源相似。对此,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数字经济与非农收入耦合协调度和加速中、西部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马凤娟、崔佳慧从“三权”分置的视角出发,将目光聚焦在新时代我国农民的转型研究。^[48]首先指出农民的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一步,是新时代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接着提出我国农民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包括阶层分化趋势逐渐明显,社会公平受到挑战;“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已成必然,但依然存在制度瓶颈;农民市民化是大部分农民转型的最终归宿,但土地规模经营“触顶”对农民转

型形成挑战;知识化农民正逐步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但农村劳动力留农务农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最后,从制度矫正、剥离土地保障功能、建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和建立政府主导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等方面总结了我国农民转型的现实路径。

八、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它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时工业经济也存在着污染严重等问题,需要探究工业经济的绿色转型。因此为了进一步强化工业经济,需要对其深入研究。2022 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就工业转型发展、工业国际竞争力、工业技术创新、工业效率、工业园区建设、工业绿色协同发展等对工业经济展开了探讨。

刘倩认为河北省产业结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如农业从业人口数偏高,但产能低,产值贡献小;工业占 GDP 的比重高,但有疲软态势;服务业增长速度较快,但规模仍需进一步提升,使得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49]基于 2012—2019 年河北省各地区的的面板数据,在使用熵值法测算了河北省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间接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

陈兰杰、侯鹏娟提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的关键时期,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50]基于案例分析法、归纳演绎方法、内容分析法等,基于数据整理和对比间接反映数据要素市场状况,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两个视角,从政策引导、发展现状和战略规划三个维度,梳理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关键内容。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六大趋势,即政策体系逐渐完善、公共数据治理先行、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趋势明显、数据多元化治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受重视和跨境数据交易的积极探索。

陈兆伟、李惠茹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

新发展格局下,探讨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工网络与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的关系是决定“双碳”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环节。^[51]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国内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路径考察发现:垂直分工呈现缩小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的“碳协同”效应,而水平分工则呈现拉大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的“碳沉淀”效应,这两种相反力量相互强化,其中垂直分工起主导,使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工网络对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总体上具有缩小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区域间价值链有利于强化垂直分工“碳协同”效应的主导作用,但会加剧水平分工作用的区域分化;行业内的价值链会抑制垂直分工的“碳协同”效应,而跨行业间价值链可以最大化垂直分工的主导作用,并显著改善高碳行业水平分工的“碳沉淀”效应。并在政策启示部分提出通过促进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聚焦培育高值低碳的新动能和低碳化改造传统行业,发挥垂直分工的减排降碳外部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减少同质化生产竞争。

赵立斌、范鹏辉、张梦雪、孟涛从生产网络视角,研究了河北如何在与京津融合过程中实现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助力“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构建过程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52]认为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必须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规划,让沿海地区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和政策扶持优势,与京津及全球产业技术和创新体系对接,并构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格局与发展链条,推动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在河北各地区的梯度转移与循环利用,将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充分融合,带动全省各地共同发展。

郑林昌等利用GIS等技术提取已开通高速铁路站点周边、线路两侧土地利用数据以及部分城市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重心,从不同空间、城市类型、开通时间等角度对提取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图形对比。^[53]结果表明:高速铁路能通过促进各类型土地向建设用地转移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高速铁路对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影响要大于对线路两侧的影响;高速铁路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因城市规模类型不同而不同,对站点周围土地利用的影响总体有城市规模越大影响越大的特

征,对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县线路两侧土地利用的影响大于大中城市;高速铁路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在时间上有递延性,在空间上有衰减性。高速铁路能够导致设站城市住宅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以及工业用地价格的上涨。

秦建群、赵晶晶、刘超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54]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以人工智能、云计算、5G技术、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运用,引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形”的非线性特征。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九、商贸经济研究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逐渐渗入传统商贸流通业,促使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流通创新逐渐加速。同时,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流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新零售、智慧物流、智能消费等新业态逐渐出现,刺激了流通业迅速发展。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就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商贸流通业的评价体系与测度方法、产业结构优化、电商与物流企业的发展、区域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等课题进行了探讨。

赵莉琴、高敏、刘敬严利用区位熵和就业密度分析城市的物流业发展现状,并且运用PSM-DID分析高铁通车后对沿线城市物流的聚集影响。^[55]认为高铁对沿线城市物流业集聚的影响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对制度环境、城市规模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均不明显;高铁对沿线城市物流业集聚的影响在不同规模的城市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对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而言,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于大城市,高铁开通促进了物流业集聚

水平,但是影响并不显著。

郭子雪、杨雅旭、贺泽芳提出了一种基于概论语术语集改进 TODIM 法的评价方法。^[56]该方法针对应急物流的特点,从快速响应时间、物资质量、成本控制、企业服务和企业内外部条件五个维度,构建应急物流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将概率论语术语集与 TODIM 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改进 TODIM 方法的评价模型,对应急物流供应商进行评价;最后,通过实例分析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张春艳、陈如智结合数字经济时代流通业发展特征,构建了智慧流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 2015—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域智慧流通发展水平进行实证测度。^[57]指出我国智慧流通总体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区域之间、省际间的发展并不均衡且存在显著差异性;区域方面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省域方面表现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五个省市最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各区域与省域之间的智慧流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张晓阳、徐晓肆、温科通过梳理商贸流通跨渠道整合的内涵,划分出统一、共享、协调与互惠四个结构维度,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开发基于新零售的商贸流通跨渠道整合初始测量量表。进一步利用二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初始测量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包含 12 个测量题项在内的修正后测量量表。^[58]结果显示,修正后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充分反映商贸流通跨渠道整合的维度,可弥补已有研究测量量表不足,为后续商贸流通跨渠道整合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刘小艳、苏炜、刘景芝具体分析了我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技术升级与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互动关系,并为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59]研究表明,城镇化程度每提升 1%,则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 0.593%;技术升级每提升 1%,则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 0.425%;城镇化和技术升级的协同作用更能推动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城镇化对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中,中部作用强于东部,而西部最弱;在技术升级对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中,东部作用强于中部,西部最弱。

刘景芝、苏炜、耿晓分析了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六个省 2015—2019 年的农村电商与生鲜物流相关数据,据此计算出农村电商发展秩序程度、生鲜物流发展秩序程度,以及两者协同发展水平。^[60]提出中部地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最高,且发展速度最快,东部地区发展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中部地区生鲜物流发展水平最高,且发展速度最快,东部地区发展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中部地区农村电商和生鲜物流协同发展水平最高,且发展速度最快,东部地区发展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王英辉、吴济潇、赵书润、张庆红结合变分不等式与拉格朗日乘子构建整合运输模型,将第四方物流整合后的运输成本与第三方物流的运输成本进行比较。^[61]结果显示在需求地相同的运输网络中,使用第四方物流比第三方物流节约了 28.6% 的成本;在需求地不同的运输网络中,使用第四方物流比第三方物流节约了 7.5% 的成本;即通过第四方物流整合后的运输成本比通过第三方物流的运输成本要低。

孙佳勇、宋亚军、李海军分析了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与成本会计核算的关系,介绍了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成本构成与核算方式,并通过分析传统成本会计核算体系中存在的缺陷,探讨了商贸流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创新的策略思路。^[62]研究认为,针对传统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存在的缺陷,应当采取树立企业成本会计体系的整体核算理念以细化企业经营管理环节成本核算、重视会计成本核算数据的价值开发以促进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决策水平提升、分类实施企业成本会计核算以精细化商贸流通企业的成本管理的创新策略。

刘志强、贾世通、郭彩云以区域农村电商物流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分析为视角,构建了有关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障碍度模型,以河北邯郸为例,对农村电商物流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状态进行测度,并分析了影响协同发展的障碍因素,随后引入 GM(1,1) 灰色模型,对农村电商物流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趋势进行灰色预测。^[63]研究结果表明,2015—2019 年农村电商物流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2024 年二者发展将由中级协调走向优质协调;农村货运量、农村移动电话用户、单

位面积农机总动力和有效灌溉率为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赵雨萌、靳玮丽、景瑞蓉、杨春白雪从便利性、响应性、移情性、经济性四个维度出发创建指标体系,评价邢台市物流服务水平是否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64]结果显示移情性和经济性方面满意度较差,不同行业在物流服务的经济性方面存在差异,最后从政府、社会、物流企业不同角度提出了应重视物流服务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整合物流企业防止抱团抬价、加大物流信息平台建设资金投入、加强物流设施建设、加强物流人才的培养。

张亚强、桑秀峰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法测算模型,利用灰色关联法计算物流与经济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加权计算物流与经济的总体协同度以及各物流子系统与经济的协同度。^[65]进而分析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关系,发现唐山经济的总体协同处于中度偏上水平;物流需求子系统和物流可持续能力子系统迅速适应了外需不足的挑战,与经济的协同高度协调,而物流供给子系统的经济协同处于中度水平并有下降趋势;物流从业人员、货物周转量、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四个指标对地区经济协调有拉低作用。此外,研究认为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物流供给体系很强的调整刚性往往是传统工业城市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田杰等结合改进的蚁群算法对农产品智能供应链的体系结构进行了研究,采取了改进蚂蚁个体的路径搜索,改进信息素更新策略,提高选择概率,改进蚂蚁的动态生长机制等策略来避免陷入局部最优或局部收敛。^[66]并采用 VRPTW 数学模型、数据集 TSPLIB 以及农产品智能供应链的运营数据进行测试验证。通过验证可以得到,实验结果更接近最优解,并且算法的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据此指出通过对蚁群算法的改进和优化,非常适合农产品智能供应链系统的求解和优化。

(陈志国:河北大学教授;

席增雷: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1]田雅娟,田戈扬,宋剑.区域创新影响因素的效应测度与

分解研究——基于地理加权模型和夏普里值法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43(03):51-59.

[2]户艳领,刘燕灵,武海波.河北省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变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1):40-47.

[3]杨栋旭.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 HCW 方法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2(05):60-66.

[4]赵巧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发展驱动力研究——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软科学,2021,35(12):15-21.

[5]李秋杰,朱婧,孙新章.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18):150-156.

[6]祁红梅.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的动态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2(03):112-118.

[7]彭晓静.中国三大城市群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比较[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04):30-34.

[8]梁晨,曾坚,丁锬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2,37(03):112-118.

[9]李军峰.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市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江苏商论,2022(02):71-75.

[10]杨胜利,冯丹宁,段佳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01):1-10.

[11]潘涛,王丽华,郭芳辰.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基于科技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11):42-47.

[12]宋宝琳,王丽,宋凤轩.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评价与比较[J].统计与决策,2022,38(18):156-160.

[13]董志.智力资本组态效应、双向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J].财会通讯,2022(15):63-68.

[14]秦建群,赵晶晶,王薇.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与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2,38(11):99-103.

[15]刘立军,刘义臣.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以京津冀为例[J].经济问题,2022(08):96-102.

[16]宋宝琳,张航,胡欣蕊.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中国 28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J].财政科学,2022(05):122-133.

[17]李丽红,张敏,李洪燕,李祯.基于 PSR 与熵值-TOPSIS 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承载安全评价及协同发展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9(02):57-62.

[18]李敏,王雷.京津冀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

- 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05):72-77.
- [19]王雅洁,张嘉颖.城市群协同创新动态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2,38(08):168-173.
- [20]李峰,王科,赵毅.互联网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空间计量的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03):145-152.
- [21]张英良.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邯郸学院学报,2022,32(02):49-58.
- [22]王韶华,赵暘春,何美璇,张伟,刘熙宁.京津冀供给侧改革效率与供给侧改革区域协同的关系——基于变形地图和格兰杰因果检验[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41(02):20-26.
- [23]郭会斌,薛婷婷,何苗,刘东华.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孵化器绩效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05):22-29.
- [24]王树强,杨恒.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传输通道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工业技术经济,2022,(02):93-99.
- [25]张新宁,刘娜,贾文学,张子清.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科技投入产出均衡性探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2,(14):65-70.
- [26]王韶华,杨志葳,张伟,刘晔.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01):34-44.
- [27]郭子雪,曹秀萌.低碳视角下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以京津冀为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16-24.
- [28]邢慧斌,李君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大舞台,2022,(01):88-94.
- [29]田小燕,张海燕,韩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J].投资与创业,2022,(06):43-45.
- [30]王余丁,王蓓,席增雷.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43(02):90-99.
- [31]秦建群,夏春玉.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基于市场分割视角[J].财贸研究,2022,33(05):31-44.
- [32]杨胜利,王媛,陈欣.基于HLM模型的产业升级对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研究[J].统计与咨询,2022(06):2-6.
- [33]戴雅娜.高铁开通、产业集聚与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社会科学家,2022(05):100-107.
- [34]刘肖,金浩.产业政策视角下产业协同三方演化博弈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08):85-90.
- [35]郑涛,杨如雪.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J].技术经济,2022,41(02):1-14.
- [36]Gao Lei, Guo Junxuan, Wang Xu, Tian Yu, Wang Tielong, Zhang Jingran.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Wester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1).
- [37]Chen Kai, Guo Feng, Xu Shua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sparity: Evidence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2).
- [38]李涛,李国平,薛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2,40(11):1968-1978.
- [39]李涛,薛领,李国平.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理研究,2022,41(04):1092-1106.
- [40]陈肖,王彦梅,王瑞华.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2,43(08):6-7.
- [41]张敬伟,靳秀娟,涂玉琦.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村绿色创业研究——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J].技术经济,2022,41(01):33-42.
- [42]高雪,尹朝静.新发展理念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01):75-83.
- [43]苑甜甜,王俊芹,赵邦宏.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何以有效——基于组态分析视角[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02):95-106.
- [44]薛楠,韩天明,朱传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农业振兴:农业平台生态系统的架构和实现机制[J].西南金融,2022(03):58-67.
- [45]韩冬梅,汪刚,田晓喻.基于短板理论的中国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评估[J].资源科学,2022,44(10):2074-2088.
- [46]李军峰,韩佳利.科技创新推进河北省农业现代化空间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2022(12):6-8.
- [47]刘义臣,沈伟康.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动态耦合差异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2,44(11):60-68.
- [48]马凤娟,崔佳慧.“三权”分置视角下我国农民的转型趋势及现实路径[J].农业经济,2022(03):74-76.
- [49]刘倩.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基于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J].河北企业,2022(11):59-61.
- [50]陈兰杰,侯鹏娟,王一诺,孙耀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12(06):31-43+57.
- [51]陈兆伟,李惠茹.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工网络与省域——行业间碳排放强度差距:缩小还是拉大[J].宏观经济研究,2022(11):104-121.
- [52]赵立斌,范鹏辉,张梦雪,孟涛.生产网络视角下河北与京津协同对接“一带一路”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22(03):33-43.
- [53]郑林昌,Shikha Thapa Magar.中国高速铁路是否显著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来自站点、线路和典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回答[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 版),2022,47(02):62-75.
- [54]秦建群,赵晶晶,刘超.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0):104-115.
- [55]赵莉琴,高敏,刘敬严.新发展格局下高铁对城市物流业集聚的影响[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43(03):101-109.
- [56]郭子雪,杨雅旭,贺泽芳.基于概率语言术语集改进TODIM法的应急物流供应商评价研究[J].运筹与管理,2022,31(06):196-203.
- [57]张春艳,陈如智.数字经济时代智慧流通发展水平的实证测度[J].商业经济研究,2022(13):23-26.
- [58]张晓阳,徐晓肆,温科.新零售背景下商贸流通跨渠道整合的结构维度与测量[J].商业经济研究,2022,(08):29-32.
- [59]刘小艳,苏炜,刘景芝.技术升级与城镇化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机制——以物流业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22,(10):186-189.
- [60]刘景芝,苏炜,耿晓.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电商与生鲜物流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2,(12):130-133.
- [61]王英辉,吴济潇,赵书润,张庆红.基于第四方物流的运输型物流枢纽整合优化[J].铁道运输与经济,2022,44(06):56-62.
- [62]孙佳勇,宋亚军,李海军.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商贸流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创新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2(05):123-125.
- [63]刘志强,贾世通,郭彩云.区域农村电商物流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分析与预测[J].全国流通经济,2022(13):15-18.
- [64]赵雨萌,靳玮丽,景瑞蓉,杨春白雪.招商引资视角下邢台市物流服务水平评价研究[J].物流科技,2022,45(14):68-71,74.
- [65]张亚强,桑秀峰.京津冀传统工业城市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关系的新特征——基于对唐山市协同度的测算[J].当代经济,2022,39(07):67-78.
- [66]Bian Xueyong, Tian Ji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Supply Chai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J]. 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 2022, 2022.

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

孙健夫

2022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凡一年。河北省财政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结合自身的专业工作和研究领域深入探索财税理论以及本省的制度与政策实践创新,取得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总体来看,这些成果主要分布在全省高校、科研单位的经济管理学科和河北省财政厅以及部分市级财政部门。其变化比较大的方面是,青年学者所作的贡献逐渐加大,非财税专业的学者在自身相关专业领域,如农业经济学界、工商管理学界、公共管理学界,跨界研究的内容有显著增长。这些成果既有发表在《财政研究》和《税务研究》等财政学界顶级期刊的学术论文,又有政府财政部门在管理工作中的调研报告,对于扩大河北省财政学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以及支持政府职能部门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财政税收基本理论研究

随着财政压力与日俱增,财政政策空间问题

也愈发不容忽视。河北金融学院任爱华等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以两个被普遍研究的财政政策规则为分析对象,从“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新视角探索财政政策空间问题。研究发现:(1)前瞻性支出规则的政策空间大于一般支出规则,但在财政部门更希望避免政策过度波动的情况下,一般支出规则却赋予了财政部门更大的反应自由度;(2)央行行为偏好会对财政政策空间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央行货币政策逐渐由宽松转向稳健,前瞻性支出规则相对于一般支出规则的政策空间优势将更加明显;(3)微观消费惯性和市场价格刚性的增大都会为政策空间带来更大压力,而税率的提高却可以释放较大政策空间。论文最后认为在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日趋稳健以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新形势下,前瞻性支出规则将会赋予财政部门更好的政策空间。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和当前的宏观经济现实提出如下建议:当前经济反弹动力不足,结合本文研究发现,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前瞻性支出规则可以释放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

进而财政部门对刺激产出增长和稳定通货膨胀有更大的反应自由度，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好转，财政政策要适时转变为一般支出规则，避免产生政策过度波动而引起通胀风险，因为一般支出规则在政策平滑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建议财政政策的实施要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研判，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增强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要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力度和发力点，在当前经济形势重点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短期内要进一步做好重大财政政策阐释工作，可以借鉴货币政策前瞻预期管理的做法，如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报告、说明财政政策操作安排，或者以吹风会、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等方式加强与市场方面的沟通，进而阐明财政政策立场，释放财政政策信号；中长期要强化预算机制，避免财政政策大幅度波动，强化在财政资金分配、重大制度构建等方面的政策管理力度，加强与市场沟通，逐步建立制度化的财政政策沟通机制，从而改善预期，进而稳定宏观经济。^[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税制的结构优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占比较低，推动税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直接税结构。河北大学李梦娟、袁佩莹将税制改革与国家治理能力相结合，提出推进直接税改革要有全局意识，要以提高税收治理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现代税收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首先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重塑征管机制。实行“劳动、资本公平税负”政策，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其次要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降低实际税率。针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的重叠部分，要使企业所得税比重适当降低，使个人所得税比重适当提高。制定明确的政策防止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矛盾的扩大，缩小企业所得税的征税范围，扩大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再次要完善财产税制度体系，推进税收立法。完善财产登记制度，构建合理的财产估值体系；优化税制要素设计，使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此外，还要考虑以规范税费征收机制为前提，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基本社会保障。^[2]

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税收在地区间转移，使得一个地区税收收入与

税源分布脱节，即拥有税源的地区没有获得相应的税收收入，无税源的地区反而获得税收收入的税收分配扭曲现象，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税收收入归属与税收收入来源的不一致和税收收入归属与税负归宿的不一致。河北大学谷彦芳认为解决好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是建立科学财税体制的必要内容。在我国现行分税制基本框架下，通过税收分配方式加以解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思路。在政府税收划分的中间环节解决，利用地区间税收再分配机制确保税收分配的公平；税收再分配后仍然存在的差距再进入财政转移支付环节进行均衡，最终实现财政均等化目标。这一思路注重的是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将税收利益配置于税收分配环节解决，通过横向税收分配矫正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实现地方政府税收收益与税源贡献的匹配，在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税收收益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实现过程公平；对经过地区间税收分配和再分配仍然存在的差距再通过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解决，最终实现结果公平。该项研究论文是谷彦芳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3]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也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减税降费之所以成为有力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主要是因为减税降费能够提高资本密集度、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河北金融学院李桂萍等利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借助差分方程组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员工薪酬、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31.52%、38.85%和14.86%；异质性分析发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国有企业、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结论从企业微观视角评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经济效应，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该项成果的主要贡献为：第一，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基础，揭示个

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弥补了学界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的缺失,而且也从企业层面验证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有效性。第二,以往文献从投资、资源配置、融资约束等方面实证分析减税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没有关注到员工薪酬可能发挥的作用。本文实证结论表明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不仅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发挥了中介效应,员工薪酬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这一发现扩展了现有理论,既为决策者深入了解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提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从个人(劳动者)层面提供了减税能够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数据支持。第三,不同于已有减税降费文献所采用的实证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本文构建了差分方程,如实地反映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及路径,结论的稳健性更强。^[4]

2020年中国成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现阶段,中国已进入“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已成为防返贫工作重心。区别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指的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个人或家庭收入虽然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却无法教育、医疗、娱乐等多元化社会需求的状态。一定程度上,相对贫困表达的核心在于相对剥夺及排斥,是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间分配情况的体现。河北大学杨文杰等提出,在破解相对贫困过程中,除了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还需利用好政府“有形的手”调节功能,即借助财政再分配制度调整初始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赋能。作为中国主要区域补偿政策,中央转移支付是国家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采取的财政政策。中央转移支付是均衡地区间财力的重要手段,统筹资源空间配置是驱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生力量,二者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动能。他们的研究将资源空间配置纳入到相对贫困分析框架,探讨中央转移支付缓解相对贫困的主要路径。基于CFPS数据库及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央转移支付、资源空间配置与相对贫困缓解间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央转移支付有助于缓解相对贫

困;资源空间配置是中央转移支付促进相对贫困缓解的重要机制。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及北方地区相对贫困缓解的提升作用更大。收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相对贫困缓解的区域收敛性客观存在,中央转移支付已成为促进其区域收敛的“助推器”。据此,提出深化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改革,统筹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建立健全转移支付监督评价体系,进而有效缓解相对贫困。^[5]

政府投资是国家宏观调控、协调发展和推进社会事业建设的重要手段。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步伐减慢,政府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抓手,在“稳增长、促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北大学宋宝琳等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进行分析与评价,得出以下结论:(1)不同省份的政府投资效率存在差异,大部分省份政府投资效率达到最优状态,而部分省份的政府投资效率较低;(2)不同省份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益看,只有少数省份的政府投资经济效益达到最优;(3)不同省份的政府投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目前我国只有近1/3的省份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政府投资效率达到标准;(4)不同省份的政府投资对科技进步产生了不同影响,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投资效率相比,科技领域的投资效率最低,我国仅有两个省份的政府科技投资效率达到最优;(5)从政府投资的区域角度看,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投资效率具有明显差异,其对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产生的影响也不同;(6)从时间角度看,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缓慢波浪式增长趋势。^[6]

河北大学宋宝琳等注意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财政收入遭受严重冲击。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加大债务举借力度,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开辟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成为地方财政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此他们提出,数字金融为保障地方财政收入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

显著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介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中、低财政收入城市的财政增收作用更加明显。^[7]

二、促进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研究

共同富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重要关注点。报告在总结过去十年成就时，强调“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其中之一；在部署今后任务时，包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河北大学杨文杰等基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阐述了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理念与途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收入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并使其向上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构筑橄榄型社会结构、规范和调节高收入并鼓励高收入人群参与第三次分配等措施，使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相互协同，才能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8]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目前，按照世界通行标准计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4亿人，形成了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河北大学孙伊凡分析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财政税收政策效应，认为财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可忽视的基本变量。促进经济增长的财税政策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奠定了基石，教育财政投入政策有效提升了劳动者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素质，直接或间接增加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塑造了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友好环境。^[9]

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是拓宽老年人收入渠道、缩小老年人群收入差距、实现高质量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如何正确处理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改革中公共养老保障兜底功能发展滞后、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个人养老金推广困难等问题，以及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关系，给老年人群通过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构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巨大挑战。河北大学成新轩、冯潇提出的保障思路是：（1）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财政保障共同富裕。平抑由于一次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充分发挥基本养老保险再分配功能，是公共财政保障全民共同富裕的职责所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必须更加重视养老金制度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高、待遇低，地区间养老待遇差异较大，是当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短板。一方面要通过适时建立非缴费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向城乡低收入居民提供基于国民待遇的养老补贴类保障；另一方面，要降低当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额度，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2）做实个人养老账户，多渠道融资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再分配是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但公共财政托底居民养老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基础上。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造成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形成的隐性债务，是影响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因此，多渠道融资做实个人养老账户是养老改革的基础，可借鉴国际经验将隐性成本显性化为转轨成本。（3）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激励实现共同富裕。对于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要加大对企业及个人缴费及领取养老金环节税收优惠力度。这不仅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劳动激励机制，也有利于提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待遇，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方法。（4）升级资产型养老保险转型，金融助力共同富裕。^[10]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是新形势下迈向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河北省以国家开展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为契机，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省财政厅对创新扶持方式、推动抱团发展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本着坚持边实践总结、边改进创新的原则，河北省重点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创建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区，增加村集体抗御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加快融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集中连片推进。为解决单村扶持效果不明显，村集体经济发展持续性差的问题，2020年，河北省提出“围绕重点产业、突

出集群效应、集中连片推进”的工作思路,开始引导各地统筹谋划3—5个村集中联合扶持。通过实践我们发现,多村联合的扶持方式,能够干成单个村想干却干不成的事,带动作用强、村集体收益相对较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22年,印发《关于开展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采取集中连片创建示范区的方式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示范区集中在1—2个乡镇,规模为10—30个村,全省扶持的1500个村集中创建90个示范区,发挥整体综合效应。二是整体谋划项目。示范区以县为单位按一个总体项目整体谋划,整体编制方案,整体组织实施。项目县以优势主导产业为依托,在扶持村项目经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议事通过的基础上,将一个或两个乡镇连片村统筹谋划布局,发挥各村资源、产业和地域优势,不具优势的予以资金支持、整体带动,使各村项目成为示范区整体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优势产业带动。示范区将具有农业产业为主的优势主导产业且能够覆盖大多数村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以此发挥集群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和融入产业链条的功能。^[11]

三、支持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胡一诺等对河北省11个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科研投入处于领先地位,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廊坊、邯郸、沧州等中游城市对成果转化不能提供有效支持;承德、张家口等城市在科技创新环境和投入方面均处于落后地位,与石家庄、唐山等存在巨大差异,存在资源、区位瓶颈。不同地市在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投入力度、科技产出能力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推动不同地区科技创新的因素也不相同,主要体现为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万人输出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为提高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缩小区域间差距,提出建议: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优化科技创新资金配置。将科研经费适度向承德、张家口、邢台等落后地区倾斜,在其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加大投入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引导科研资金向高新技术产业流动。同时,加

大对科研人员的投入和培养,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科技创新人才流入,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建设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12]

河北工业大学许楠等认为,目前的财税政策多是普惠性的,且过度依赖税收优惠单一政策工具,较少针对企业科技创新不同阶段及不同工具组合的政策设计,导致部分财税资源产生冗余或不足,未能发挥最佳的作用效果。因此,从财税政策工具单一模式和组合模式出发,探究企业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最优财税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不仅可在理论上丰富财税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可为针对性地出台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提供参考。他们以我国省级行政区的科技创新财税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选取新型财政补助、风险补偿金、间接税收优惠、人才引进和政府采购5种财税政策工具为条件变量,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最优财税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研究发现:不同财税政策工具在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不同阶段的重要程度不同,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财税政策工具组合有8个,其中4个核心组合为研发阶段的“风险补偿金+人才引进”“新型财政补助+间接税收优惠”,成果转化阶段的“新型财政补助+人才引进”,产业化生产阶段的“间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因此,应根据企业科技创新的不同阶段,选择针对性的单一财税政策或财税政策组合,以提升政策的精准性,高效配置政策资源。^[13]

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其“高投入高风险”特征以及“双重外部性”使得企业研发积极性受损。河北金融学院林妍等认为,环境规制的出现,将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成本,由最初让整个社会承担转变为需要企业承担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者选取河北省2012—2018年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来探寻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并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以下建议: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应该积极去探索环境规制强度的边界,寻找刺激企业积极进

行绿色技术创新研究与维护企业利益的平衡点,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政府需要不断完善与明确环境规制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企业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有准则可依,并能够保证环境制度及标准得到有效执行。考虑到环境规制对企业的资金存在一定的挤占影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经济补贴等多种方式来鼓励与支持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研发,避免企业因研发资金不足而放弃技术创新的情况发生。^[14]

生物科学技术对农业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无论从国家还是河北省的情况来看,农业先进技术发展水平对于确保经济社会稳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为此,政府财政政策鼓励生物育种企业积极申报政府补助,增强绿色创新能力。但是,政府补助能推动生物育种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吗?政府补助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生物育种企业绿色创新?河北农业大学张云峥等分析了生物育种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资金以及实施绿色创新现状,查阅了 2011—2020 年生物育种行业企业数据共得到 150 组可观测值,运用 stata 16.0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指标设置、模型构建、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得到政府对生物育种企业补助资金呈上升趋势,政府补助每增加 1%,会引起生物育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平均增加 0.2233% 的研究结论;从提高政府补助水平、鼓励生物育种企业积极申报政府补助、加大政府补助项目审计 3 方面提出建议。^[15]

河北金融学院李桂萍等以 2009—2020 年沪深 A 股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与农业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持续性、自主性均存在 U 形关系;减税降费有效激励了农业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持续性和自主性。^[16]

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的关键阶段,各项改革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各个城市而言,交通一体化、环保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京津冀地区的增长速度却依然乏力,纵观全国各地区来看,增速依然处于中下游。这里的

原因何在?河北金融学院任爱华等指出,归根结底,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端阻碍了经济发展,导致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同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相对于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特点,财政政策具有更好的结构调控特征,尤其是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具有明显影响。然而,作为经济发展一体化的京津冀地区,其内部任何一方的财政政策都会对彼此的产业发展产生非线性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非线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地区城市的“体量”不同,因此每个城市对彼此的溢出水平存在差异性;二是财政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会遵循一定的传导路径,而这种传导路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背景下具有差异性,进而会导致溢出水平不一。基于此,从非线性的角度探索京津冀地区财政税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措施,进而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步提升。作者以北京、天津、河北的地方财政税收为冲击变量,以相应的产业高级化指数为响应变量,通过三维脉冲分析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从区域结构、时间维度、政策结构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的地方税收财政税收政策确实对内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影响,但影响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从影响方向上来看,北京和天津的税收增加对北京、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而河北的税收增加会对北京、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产生阻碍和推动并存的效果。可能的原因在于,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虽然得到了十足发展,但大部分聚集于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而税收收紧有利于达到传统产业去产能、去杠杆的效果,使得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并对河北产生溢出效应,而不同的是,河北的经济发展并不像北京、天津一样高速,不仅新兴产业未得到发展,传统制造业也并不过剩,其紧缩性税收政策对产业的发展作用不明显,且对北京和天津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这种现象较为明显,而在近几年,河北经济和产业结构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传统制造业也出现高杠杆、高库存现象,因此其紧缩性税收政策在 2015 年之后也会对北京和天津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从影响时间上来看,在

2005 年左右的经济高涨时期,北京和天津的税收增加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河北的税收增加会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在 2018 年左右的经济平稳时期,天津和河北的税收增加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北京的税收增加会对区域内产业结构产生强烈的拉动效果;在 2020 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北京税收政策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较弱,但天津和河北的税收增加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产生较强的拉动作用。从影响幅度来看,北京税收政策对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最强,内部排名从强到弱依次是河北、北京、天津;河北税收政策对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最弱,内部排名从强到弱依次是河北、天津、北京;天津税收政策对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适中,内部排名从强到弱依次是河北、北京、天津。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北京的经济体量比天津和河北庞大,其政策溢出效应也相对较强;另一方面,北京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针对产业结构不平衡弊端的政策更及时、更精确,进而对天津和河北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就越显著,同样的,天津的经济发展较好,政策溢出效应仅次于北京。基于以上认识,作者建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北京采取稳健的财政税收政策,天津和河北采取宽松型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而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7]

装备制造业在河北省工业体系和工业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经形成涉及装备制造业的 8 个大类、61 个中类、213 个小类的 3000 多个品种的具备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整体实力还有差距。河北大学于强将这些差距概括为:近年来行业增长波动显著,利润贡献率偏低,行业发展不平衡;与其他行业相比,经济效益相对落后,与京津两市相比落后程度更为明显。如何进一步提升河北省装备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也直接关系到河北省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于强提出,要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支持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在财政政策方面,设立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基金、设立与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相关的专项补贴,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在建设用地、资金筹措、项目建设、技术和人才支持等方

面的政策倾斜力度,重点支持一批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支持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在税收政策方面,制定和落实对装备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与高新技术企业有关的所得税减免、出口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允许技术开发费用税前列支、加速研发仪器和设备折旧等政策措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18]

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和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会对企业尤其是服务行业企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燕山大学周高仪基于 2011—2019 年服务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和生产效率两方面解释优化升级,以增值税负衡量间接税负担,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间接税负担与企业优化升级三者内在关联。研究证实:间接税负担对服务业企业优化升级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服务业企业优化升级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显著增强间接税负担对服务业企业优化升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间接税负担与优化升级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根据研究结论,结合我国服务业企业优化升级现状,作者提出以下启示:首先,间接税负担会对优化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优化税制结构,使税收征管机制成为推动服务业企业优化升级的动力因素;其次,环境规制是实现自然与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服务业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同时也应避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等要素的挤出效应;最后,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各项机制,降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间的区别,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非国有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良营商环境。^[19]

“营改增”作为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政策效应不仅限于减税,更重要的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了考察增值税改革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河北工业大学邢会等以“营改增”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 2009—2018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营改增”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分组回归的

方式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1）增值税改革能够通过增加优质服务要素投入等四个方面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2）增值税改革对所有制、生命周期、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在服务化水平改变上存在差异。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以及与服务业关联程度大的企业更明显。^[20]

在老龄化快速到来的形势下，养老服务产业得到政府和社会资本的重视。河北工程大学王爱峰和董尧的研究表明，从整体数据中可以看出，河北省老龄人口系数的增长速度高于京津地区，由于河北省与京津地区在经济水平上的阶梯性差距，劳动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外向转移也将继续。老龄化进程数据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问题，还反映出民生问题。京津冀三地在老龄化进程同步的情况下，又存在明显差异，京津冀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但互补性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要协调老龄化应对政策，科学预测老龄群体需求演变，科学应对、互通互利、化害为利。夯实财政储备，大力发展银色经济通过改善河北省收入分配制度，优化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模式，增加养老金的资产储备，建立一种公平、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老年产业的发展为先导，积极引导企业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投资，提高老龄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地位，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21]

五、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财政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财政的一项重要使命。河北省财政厅李存英和马源禾分析了财政在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涉农支出面临严峻挑战；财政资金监管力度不到位，使用效率不高；财政资金补贴结构不合理，工作效率不高；政策性保险制度不够健全，风险保障不高；财政资金带动作用不明显，撬动能力不足。作者提出了“五新”对策建议：建立多措并举的财力保障新机制；施行协调共治的资金监管新格局；完善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新机制；制定保

障有力的农业保险新制度；支持创建乡村振兴投融资新机制。^[22]

河北农业大学崔元培等强调，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乡村数字化治理基础。他们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可通过样本经验复制，从数字惠民、产业融合、科技创新、智慧治理角度，夯实乡村数字化治理。第一，深耕数字惠民工程。地方政府应加快“双基共建”建设，扩大4G甚至5G网络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积极探索现代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在乡村养殖、仓储物流、电力水利方面的应用，以高精尖数字技术覆盖乡村数字治理；第二，推进产业融合工作。政府方面可通过建设企业、农民、银行、保险、研发为一体的产业振兴平台，引导乡村地区农业产业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打造“区块链产销溯源+溯源保险”模式，因地制宜培育新型融合性产业业态；第三，提升科技创新力度。地方政府应在发挥引领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科技创新供给。相关企业应聚焦乡村居民需求，研发更具适用性的应用终端，促进数字技术与“三农”深度融合，持续丰富乡村产业应用场景。在此过程中，市场方面可遵循乡村综合效益，避免资源虚配、空配、错配等现象。第四，延伸智慧治理工作。地方政府联合村级基层组织积极探索“互联网+村务”“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党建”等数字治理模式，驱动涉农治理服务线上办理，利用终端设备动态采集各项数据，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提质增效。^[23]

河北大学陈丽莎等在研究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问题时，对财政政策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们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力扶持，河北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但当前河北省尚未全面实现农村消费转型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河北省农村消费现状和潜力，她们分析了制约农村地区消费升级的主要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特别提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具体说，主要包括：（1）培养新型农民，转变农民传统消费观念。通过提升农民综合素养，引导农民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国家财政要将农村义务教育列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确保农村适龄人口全

部入学。同时,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拓展农村劳动力培训规模,适当提升政府补助标准,以吸引更多农村居民参与培训活动,强化其就业能力。随着农民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其消费观念定然会发生巨大改变,这对推动农民消费升级具有极大促进作用。(2)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农民消费。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如用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充分满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需求。加大乡村振兴精准扶持力度,制定完备的财政扶持政策,不仅能提升资金整体利用率,还能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条件与质量。(3)发挥财政资金特有导向作用,促进农民合理消费。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财政资金要明确自身引导及杠杆作用,整合各方资金用于农业与农村建设,并制定多种奖励政策,激励农民自主筹资,改善农村原有消费环境,潜移默化地让农民形成合理消费意识,推动农村消费市场长足发展。^[24]

可持续扶贫实践证明电商供应链是发展农村电商扶贫的重要依托。农村电商扶贫的本质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的补贴支持。河北工业大学康凯、栾新风研究了政府分别补贴农户的生产成本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的销售努力成本对供应链决策和农户利润增长的影响,探究了政府对可持续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政府补贴能提高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的销售努力水平和佣金,激励农户产出更多农产品。当政府补贴力度较小时,政府选择补贴农户能提高销售努力水平、佣金和产量;反之,政府选择补贴农村电商平台对增加农户利润更有利。(2)政府补贴能同时增加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的利润,提高社会福利,利于实现可持续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3)适度政府补贴能增加农户的利润,过多政府补贴不利于可持续扶贫。政府补贴农户时,农户的利润增加较多。研究发现了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的最佳额。(4)农产品的销量影响农户的利润增长。当农产品的销量较低时,政府补贴农户情形下农户的利润增长额较少;当农产品的销量提高后,政府补贴农户情形下农户的利润增长额小幅增加。当农产品全部售罄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平台能使农户获得

更多利润。也就是说,农产品的销量不是很高时,政府补贴农户利于增加农户利润;农产品热销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平台更利于增加农户利润,可持续扶贫效果也更好。^[25]

河北农业大学郭素文和赵慧峰关注了新冠疫情对农牧业的影响。他们指出,疫情之下,饲草料供应不足、饲料价格上涨、劳动力短缺等使牧场经营成本上升,牧场经营利润受损。目前,国内对奶牛场的补贴主要是依据规模大小,多为一次性补贴,缺点是不能灵活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且在疫情防控期间缺乏对牧场经营损失的补贴。美国通过直接付款、可免除贷款和可免除预付款帮助农场经营,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资金支持的对象,如美国的冠状病毒食品援助计划(CFAP)分两轮为牧场主和农民提供资金支持,每轮资金支持的对象存在差异。鉴于此,我国也可以探索多元化的牧场补贴政策,分阶段研究制定浮动补贴政策,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贴标准,提高奶业补贴政策应对风险的灵活性;在充分考虑养殖场户的风险防范需要和生产成本变化的基础上,构建保险保障水平的动态调整机制,以提高牧场主的生产积极性。^[26]

河北农业大学宗义湘等探讨了欧盟国家农业补贴支出对我国的启示。他们特别提到了两点:一是政策设计理念侧重权责对等。欧盟交叉遵守机制设计坚持农民权责对等,在获得农业补贴的同时,需承担相应环保义务,使得农业补贴兼顾环境保护和农民收入。而中国当前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侧重对生产者的给予,对获得补贴的绿色限定条件设定不足。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变,主要能动因素在于生产者,只有生产者在农业生产中切实采取清洁生产方式,才能够改善农业环境,才能够促进环保法规的有效实施。因此,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创新也应贯彻这一理念,农业支持政策植入环境要求,逐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全面发挥政策效能。二是探索可选择性交叉遵守机制试验。由于我国农业补贴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不到5%,与欧盟近50%的收入占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目前全面实施强制性交叉遵守机制的基础薄弱。但是也应看到,农业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这是不可避免的。欧盟交叉遵守机制也历经了从可选择到强制的阶段。因

此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选择适当区域如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针对新型经营主体,或省级以上区域公用品牌使用者试行可选择性交叉遵守机制试验,在试验区以现有环保法规为基础结合农业特点制定遵守要求,以最低环保标准为目标,创设激励性奖补政策,在运行中总结经验教训。^[27]

六、减税降费政策研究

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从 2018 年的 1.3 万亿元到 2019 年的 2.4 万亿元,再到 2020 年的 2.5 万亿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然而,尽管减税降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仍有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升反降。那么,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究竟如何?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河北工业大学许楠、刘雪琴利用 2013—2020 年中国制造业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构造面板阈值效应模型,考察不同减税降费力度下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具体结论如下:(1) 减税降费力度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关系并存在门槛效应。(2) 门槛效应受政府干预水平的调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在干预减税降费政策的施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减税降费政策发挥其作用。^[28]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减税与退税并举,延续实施扶持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提升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是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目标,目前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尚未达到政策预期效果。找出影响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因素并探明作用路径,是提升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关键。河北工业大学许楠等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对 25 家小微企业进行深度访谈以及在税务局网站上手动搜集整理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方面的问答资料,收集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构建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作用路径模型。研究发现: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结构分为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五个维度;影响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的因素有政策层面、企业自身层面、宏观因素层面和税务服务层面;四种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推动、支持、影响和辅助四种关系;四种因素通过五大类八条路径具

体作用于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结构。研究结论旨在为提升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29]

近年来经济社会对新业态就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新业态为当前经济环境下就业提供了新的增长点。2021 年 7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应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关于促进新业态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密集出台,但也存在具体政策目标缺乏针对性和新业态主体适用性不足等问题。河北大学宋凤轩等着重研究了新业态背景下支持就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促进就业财税政策的针对性有待提升,当前的财税政策涵盖内容较为宽泛,缺乏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减税降费力度同财政就业支出有待平衡,面对中央出台鼓励新业态就业的财政支持政策时,地方可能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新业态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存在困难,新业态下就业人员同雇佣企业间的关系并非严格劳动雇佣关系,部分企业利用政策设定漏洞尽量减少企业责任。职业培训政策供给度和瞄准度有待强化,当前财政职业补贴资金还无法实现企业培训的全覆盖。^[30]

河北金融学院何倩等基于沪深 2013—2020 年非金融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效率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然后从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研发效率与经营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挖掘不同财税激励组合下税收优惠调节效应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研发效率的提升能显著促进经营绩效,因此上市公司在实施研发战略的过程中,应在保障研发投入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技术引入等多种途径提升研发效率,将研发产出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在最根本上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不同的财税激励选择会对研发效率的经济后果产生差异化影响,相较于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助能通过其直接性和计划性参与到研发每个环节中,会显著增强研发效率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应积极响应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等,制定更为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研发战略,从而获得更好的财政补助支持;在不同的财税激励组合中,上市公司不应一味以获得财政补助为主,而是应通过财政

补助保障高质量研发效率,使得研发战略更为贴合市场需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在研发创新中的激励作用,从而真正实现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31]

七、支持环境治理的财税政策研究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特征具有复杂性,在不同治理模式下往往涉及多个参与主体,融资主体也不相同。刘江帆等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属性、商业模式、融资主体和资金供给方等涉及项目投融资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投融资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建立不同模式下的融资渠道,为政府和治理企业提供参考和分析方法。一是以第三方治理商业模式为主的融资路径。目前,工业污染治理主要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或者自行治理。配套治理设施的投资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类是由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投资,然后自我运营或者委托有资质的、运营经验的治理企业进行运营,治理企业通过每年收取相关费用来获得利润;另一类是由治理企业提供配套治理设施,通过污染排放企业支付费用的方式逐年收回成本和收益。中央政府鼓励污染治理企业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污染排放企业有承担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的义务。二是具备使用者付费基础的项目融资路径。此类项目具有使用者付费基础,以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为主,虽然有一定的收费基础,但由于收费限制导致项目自身现金流不足,通常通过政府财政资金补贴,采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并获得收益。对于这类项目可考虑逐步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可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激发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三是不具备使用者付费基础的项目融资路径。此类项目的融资主体在不同治理模式下包含三类融资主体,政府、社会资本和开发企业,由于融资主体性质不同,从而有不同的融资路径。此类项目对政府财政依赖程度较高,重点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融资问题。^[3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关键性贡献,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河北省财政厅张硕的研究表明,在整体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财

政资金投入中,与中央支出相比,地方政府支出的资金量占比较高,其支出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着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效果,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作为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突出地区,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运行情况兼具代表性和普遍性。作者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河北省相关领域财政资金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还存在资金总量有待增加、结构有待优化,预算编制准确性不高、执行完整性不足、年度间均衡性不强,资金管理使用分散、绩效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及财政部门调控手段有限等问题,提出提升整合决策层级、扩大资金整合空间、系统制定整合方案、筑牢常态整合基础、增强整合内生动力、激发积极性创造力六个方面的整合思路及具体措施。^[33]

河北金融学院林妍和李桂萍基于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对环保费改税、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可持续竞争力三者关系进行检验。经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工业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显著正相关;(2)环保费改税显著提升工业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并显著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作用;(3)环保费改税会由于企业规模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为环保费改税对规模较大工业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对规模较大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在可持续竞争力关系中起到更显著正向调节效应。^[34]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21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去产能、调结构、治污染的巨大压力,河北财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深化改革创新,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驾护航。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范资金管理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深化改革,颁布了河北省《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河北省财政厅将这次改革归纳为三方面的探索。一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多元化补偿,创新建立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和排污权交易改

革,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二是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全面落实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税费,实施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严格落实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制度,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向低碳、环保、节能等领域集聚,支持金融机构加大绿色领域的信贷投放,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作用。三是完善相关领域配套措施,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有序开展省级层面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试点,加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探索降碳产品价值核算,研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指标体系。^[35]

2019年,廊坊市被确定为河北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唯一设区市试点。廊坊财政把污染防治资金绩效管理作为重点突破领域,全面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从体制机制、工作程序等方面实现预算和绩效一体化管理。廊坊市财政局对此作了系统分析。一方面,对环保资金强化预算绩效评价。构建绩效指标标准和预算支出标准“双体系”,努力实现以标准核定预算的目标。严格落实绩效任务和结果应用“两清单”,实现绩效结果真应用。创新引入全成本绩效管理,通过核成本、定标准、评绩效,优化支出结构,清理整合散碎项目、压减低效预算,为部门架起了绩效“高压线”,部门由“争资金指标”转为“拼项目效果”,污染防治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对环保项目开创性实施“财政专管员+第三方专家联评联审”模式。在编制2022年部门预算过程中,廊坊财政大力推进财政专管员与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联评联审,生态环境部门项目负责人深度参与,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指导,重点围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是否符合政府工作要求、是否符合部门职能,项目需求是否充分,投入和产出效益是否合理,是否契合“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等方面开展评审,根据资金预期绩效决定是否安排资金,完善预算申报机制,强化部门主体责任,预算项目质量显著提升,为部门精准高效使用财政资金奠定基础。^[36]

唐山市因煤而建、因钢而兴,是资源型重化工业城市。近年来,唐山市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唐山,实现由“黑”到“绿”的美丽嬗变。唐山市财政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增投入、转方式、建机制方面狠下功夫,全力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唐山市财政局总结的经验是: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发力点”,持续强化资金保障;以试点建设为“切入点”,积极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以共担共享为“结合点”,凝聚共同防治强大合力;以制度建设为“突破点”,构建污染防治长效机制。^[37]

长期以来,邢台市因为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较为单一,企业布局不尽合理,城区周边电力、钢铁、焦化、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排放污染物量较大,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排名全国倒数,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任务艰巨。邢台市财政局就近年来治理污染环境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他们认为,该市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用好用足环境保护支持政策,助力邢台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退出全国倒二十,实现历史性突破。他们的经验是:(1)健全制度机制,明晰生态环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中央、河北省改革总体部署,紧密结合邢台市实际,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与县(市、区)财政关系,形成依法规范、权责匹配、运转高效的市与县(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体制机制。(2)加强财力保障,全力推动圆满完成“退后十”任务。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用足用好上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积极统筹地方配套资金,坚持把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退后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力提升财政保障水平。(3)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进治污工作落实。重点围绕水环境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整治污染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实现所有污染项目达到符合国标的水平。^[38]

张云峥和李名威提出,应加大项目审计,确保政府补助资金用于提高绿色创新产出效率。监管部门要完善政府补助审计机制,一方面要充分了解生物育种企业相关信息,合理选择被补助企业,合理确定政府补助标准,进而提高政府补助的精准度,营造公平有效的政府补助氛围,现行

监管手段可以与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相结合,增强审计的透明度,防止出现以权谋私;另一方面,实行补助项目跟踪审计,监管部门应当检查资金拨付到企业后,企业是否将政府补助资金用于提高绿色创新产出效率,结合具体项目检查相关凭证、合同、业务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于补助资金用于绿色创新以外的地方要严肃处理。^[39]

八、财税制度与管理优化研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中,构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业务性强。保定市财政局刘建强等认为,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评、申、审、监、评、用”六个环节,或可以表述为“六字”方针。“六字”方针,系统而又全面地概括了预算绩效管理的全过程,构建了首尾闭合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所谓“评”,是指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就是对申请列入财政预算的金额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财政支出政策和预算支出项目,根据部门职责、事业发展规划等内容,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事前绩效评估应突出解决好“评什么”“如何评”“怎么用”等问题。所谓“申”,是指预算部门向财政部门申报财政项目资金。做好申报工作,要坚持三个“必须”:即必须树立绩效理念,必须设好绩效目标,必须符合申报要求。所谓“审”,是指财政部门对部门申报项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工作要做到三个“明确”:明确审核依据,明确审核内容,明确审核流程。所谓“监”,是指绩效运行监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政部门、预算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依照职责对已批复项目资金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一系列的管理活动,要做到“三个强化”:强化责任主体,强化监控重点,强化平台支撑。所谓“评”,是指绩效评价。年度预算执行完毕,财政部门、预算部门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和指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所谓“用”,是指绩效评价结果在预算管理、政策调整、综合考评等各方面中的应用。评价结果的应用是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落脚

点。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权责统一、绩效奖惩与问责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一果多用”和“多果并用”。^[40]

河北省财政厅白志平等通过分析河北省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与问题,对如何做优财政重点评价提出了看法。将财政重点评价定位在政策效用、运行机制、投入领域、投入方式、分配方法、资金效益等评判上,重点评价资金投向的精准性、安排使用的有效性、投入方式的科学性、资金支出的及时性,解决好“评什么”的问题。资金投向的精准性,即评价资金投向是否体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决策部署,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资金安排是否合理、可持续,是否符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要求。安排使用的有效性,即评价是否建立了规范高效的资金分配使用机制,项目安排是否存在散碎现象,项目支持力度是否合理,资金用途是否符合项目实施内容和工作任务,支出内容是否准确合理,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厉行节约,资金投入是否与产出和效果相对应匹配,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等。投入方式的科学性,即评价资金投入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行业、领域项目特点,是否选准支持项目的关键环节,是否更好地发挥了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是否实现了少花钱、多办事等。资金支出的及时性,即评价资金分解下达是否符合预算法规定期限,项目细化是否满足相关时限要求,资金拨付是否符合项目支出进度相关规定,是否与项目实施进度或合同约定相匹配、相衔接,是否存在资金滞留、拨付不及时或突击用款现象等。^[41]

河北省财政厅马源禾以衡水市冀州区为例,对“十三五”时期财政教育投入情况及“教育小康”质量提升工程成果进行研究,发现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财政政策发力不精准,教育惠民政策与人民期望不协调。在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下,农村青年为了生计,需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因户口不在城市或者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无法让孩子在所在城市就读,只能把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或送入本地寄宿学校就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孩子家庭教育的缺失。第二,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学校布局与人口布局不协调。由于城乡教育资源条件差别明显,致使城区学校大额班拥挤,乡镇学校就读学生稀少。第三,项目

论证不全面,资金投入与项目绩效不协调。作者就此提出了完善财政教育投入与推进的意见建议。^[42]

河北省财政厅孙华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王增梅研究了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认为随着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实施,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导致原有的地方税体系弊端进一步凸显。论文以河北为样本,对地方财政收入受影响概括为三个方面:地方税收收入增速下降,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地方主体税种亟待培育。据此她们从加快地方税法建设、完善地方税制结构、推进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构建税收共治格局等方面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的建议。^[43]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为了进一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河北省财政厅课题组先后到唐山、秦皇岛、石家庄、邯郸等地国有企业进行调研座谈,了解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经验教训,剖析河北省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搜集整理先进地区改革的成功经验,汇总分析河北省“十三五”期间国有企业决算数据,全面展现了河北省国有企业发展情况和并基于此提出了后续发展建议。课题组提出,“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努力实现五个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提升质量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国有企业规模实力的持续增长;二是科技自立自强展现新作为,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发挥好国有企业的引领作用;三是布局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推动国有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地位更加巩固,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加大布局力度;四是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新成效,全力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加灵活高效,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更加健全;五是党的领导得到新加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44]

(孙健夫:河北大学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任爱华,刘玲,张龙.财政政策空间探析:基于宏观经济调

控能力视角[J].财政研究,2022(07).

- [2]李梦娟,袁佩莹.国家治理视野下的直接税制度优化研究[J].商业会计,2022(11).
- [3]谷彦芳.我国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22(04).
- [4]李桂萍,刘薇.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22(03).
- [5]杨文杰,韦玮.中央转移支付、资源空间配置与相对贫困缓解[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2(12).
- [6]宋宝琳,王丽,宋凤轩.中国省际地方政府投资效率评价与比较[J].统计与决策,2022(09).
- [7]宋宝琳,张航,胡欣蕊.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J].财政科学,2022(05).
- [8]杨文杰,韦玮.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推进共同富裕[J].理论探讨,2022(11).
- [9]孙伊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财税政策效应分析[J].预算管理与会计,2022(11).
- [10]成新轩,冯潇.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研究[J].理论探讨,2022(07).
- [11]河北省财政厅.坚持党建引领 创新财政扶持方式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J].当代农村财经,2022(08).
- [12]胡一诺,张冬燕,王冬至.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提升对策[J].科技和产业,2022(07).
- [13]许楠,刘雪琴.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模式研究[J].经济纵横,2022(08).
- [14]林妍,闫佳堃,韩素芬,李惠.环境规制对河北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2(11).
- [15]张云峥,李名威.政府补助对生物育种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22(06).
- [16]李桂萍,刘薇,翟冠雄.减税降费对农业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J].当代农村财经,2022(09).
- [17]任爱华,刘洁,陈小荣.京津冀财政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10).
- [18]于强.河北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现状与提升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
- [19]周高仪.环境规制、间接税负担与服务型企业优化升级[J].财会通讯,2022(07).
- [20]邢会,张金慧,谷江宁.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产业经济评论,2022(01).
- [21]王爱峰,董尧.基于灰色理论的京津冀老龄化趋势对比及老龄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 [22]李存英,马源禾.财政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研究[J].当代农村财经,2022(03).
- [23]崔元培,魏子鲲,薛庆林.“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J].宁夏社会科学,2022(01).

- [24]陈丽莎,钱宇.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南方农业,2022(09).
- [25]康凯,栾新风.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 [26]郭素文,赵慧峰.美国奶业政策调整及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22(12).
- [27]宗义湘,崔海霞.环境规制如何嵌入农业政策:欧盟交叉遵守机制经验[J].世界农业,2022(01).
- [28]许楠,刘雪琴.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政府干预程度的非线性调节[J].财会通讯,2022(11).
- [29]许楠,牛美佳.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J].河北企业,2022(10).
- [30]宋凤轩,王丽,孙颖鹿.新业态下促进就业的财税优惠政策: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经济论坛,2022(03).
- [31]何倩,李桂萍,刘莎.财税激励选择、研发效率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财会通讯,2022(10).
- [32]刘江帆,唐臣臣.构建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投融资机制分析框架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22.(10).
- [33]张硕.“双碳”目标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财政资金的整合思路及具体措施——以河北省为例[J].财政科学,2022(06).
- [34]林妍,李桂萍.环保费改税、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可持续竞争力[J].财会通讯,2022(06).
- [35]河北省财政厅.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驾护航[J].中国财政,2022(10).
- [36]廊坊市财政局.强化财政保障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实支撑[J].中国财政,2022(10).
- [37]唐山市财政局.综合施策 推动由“黑”向“绿”的美丽嬗变[J].中国财政,2022(10).
- [38]邢台市财政局.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再上新台阶[J].中国财政,2022(10).
- [39]张云峥,李名威.政府补助对生物育种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22(06).
- [40]刘建强,祖红,刘萍,范培峰,田坤.坚持“六字”方针 构建项目支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J].预算管理与会计,2022(03).
- [41]白志平,孙如喜,许婷.基于河北实践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财政监督,2022(01).
- [42]马源禾.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探析——以衡水市冀州区为例[J].西部财会,2022(01).
- [43]孙华良,王增梅.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税体系构建探析——以河北省为例[J].经营管理者,2022(09).
- [44]闫同湛,曹春芳,董树志,王宁宁.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2(01).

金融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重润 李中秋

一、2022 年金融学理论与政策研究总体进展

2022 年河北省学者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公司金融、资本市场、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货币利率与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支持、国际金融等方面。收录的研究成果 61 项,其中 C 刊(含扩展板)论文 26 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14 篇,其他 9 篇,外文文献 9 篇,专著 3 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和河北经贸大学。

其中,在公司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石晓飞的《河北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研究报告(2022)》;宫兴国、于月莉等的《战略激进、市场化进程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池国华、朱俊卿等的《EVA 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在资本市场方面,代

表性成果有:李延军、李孝文等的《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互联网公司股票流动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和马源源、刘晏泽等的《中国投资者多角度舆情分析及其在股市预测中的作用》;在数字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小青、何玮萱等的《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王智新、韩承斌等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宋宝琳、张航等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中国 28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在科技金融方面,代表作有王艳芳、赵鹞的《金融科技新业态对传统金融中介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房颖、叶莉等的《金融科技合作如何提升银行效率——基于城商行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创新的实证证据》以及金浩、安明等的《微分博弈模型下的金融科技服务合作创新——基于消费者反馈视角》;在绿色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卞

晨、初钊鹏等的《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仿真——基于政府干预的演化博弈视角》和李敏、王雷的《京津冀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在货币、利率和商业银行方面，代表性成果有：辛兵海、张琳的《流动性冲击、利率衍生工具和商业银行期限转换功能》和孟维福、刘浩杰等的《货币宽松、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在保险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刘念、张兆强的《健康和收入不确定性、时域性特征与基本医疗保险幸福感》；范庆祝、吴宇凤等的《新农合、健康异质性与保健消费——基于中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分析》；张国梅、金浩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参与者驱动研究》以及陈凯、赵娜等的《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筹资责任分担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在金融支持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刚、徐以强等的《金融技术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中国 30 个省（区、市）2008—2020 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和随力瑞、金浩的《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在国际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邢会、杨子嘉等的《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准自然实验》。

二、公司金融

2022 年河北省学者在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区块链与企业金融安全、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经营风险、上市公司筹资结构、资本结构、筹资模式、股权回购、企业面临的筹资约束，并且就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企业信用水平与资产转移策略、信用风险评估、公司治理、公司内部控制、关联交易、企业创新绩效等进行了研究。

作为一种电子化、平台化的综合服务，在线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建筑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然而，如何有效评估在线供应链融资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已成为金融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Liu Jia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模型链的在线供应链风险评估方法，即极限梯度提升 (XGBoost)、名义连续合成少数过采样技术

(SMOTENC) 和随机森林 (RF)。在模拟仿真阶段，他们以中国建筑业供应链中的上游中小企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文章提出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比学术界常用的评估方法性能更佳，评估准确率平均提高 6.39%。他们的研究对融资服务平台的资金监控系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以提高融资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1]

区块链技术给企业带来金融安全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共享服务模式。Yaming Zhang 等认为，对于大型机构来说，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统一多个国家和地区实体的财务活动进行记账和报告，已成为财务和管理优化的趋势。基于此，他们选择证券公司 A 作为案例，以新兴的区块链技术 (BCT) 为核心，将其嵌入到金融共享中心的概念中，试图从理论角度探索 BCT 下的金融共享服务模式的新模式，对原有服务模式进行优化。^[2]

发行债券是企业重要的筹资方式之一，债券信用风险备受投资者关注。近年来，河北省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迅速，Jie Tian 等人专门就河北省的企业债券信用风险进行了研究。企业债券的相关研究较多，其议题范围和参与者不断扩大和发展。它在丰富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下行周期，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改革和创新。企业经营中存在诸多问题，信用风险日益严重，导致违约现象增多。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债券市场已发生 80 多起债券违约事件。随着信用违约浪潮的到来，信用评级下降，信用风险传导效应更加显著，市场稳定性也随之下降。随着赎回高峰期的临近，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从信用违约事件的不断爆发中，他们看到了中国公司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防范体系的发展滞后。完善信用风险防范体系，防范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势在必行。^[3]

尚颖、贾士彬等认为资产驱动型经营模式的出现，为寿险业带来了新的风险；而新风险的凸显又使寿险公司寻找新的解决途径，提升或降低资产驱动程度就是其中一种。那么，不同驱动模式下，寿险公司资产驱动程度与经营风险究竟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以及有何差异？基于此，选取 55 家寿险公司 2013—2019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

PVAR 模型,分析并比较了资产驱动型和负债驱动型经营模式下,资产驱动程度与经营风险相互冲击的影响。脉冲响应显示,不同驱动模式寿险公司经营风险受资产驱动程度冲击的影响不同;在面临不同经营风险冲击时,两类公司对于资产驱动程度的选择也有所差别。方差分解显示,两种经营模式下,系统中的各变量均对变量自身的预测方差贡献度最大,资产驱动程度对三种经营风险的贡献度不大。^[4]

公司融资方式主要是两大类即债权和股权融资,由于它们融资成本差异较大,因此公司筹资决策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梁秀娟、郭周琪提出,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企业价值最大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石家庄市民营上市公司 2018—2020 年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资产负债率、负债结构、所有者权益结构以及股权集中度 4 个角度对企业资本结构进行动态和静态分析,发现石家庄市民营上市公司主要存在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负债结构不合理和股权集中度高等问题,从企业自我完善、改善融资环境和政府助力 3 个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5]

现实中筹资模式众多,各有其特点,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当的筹资模式,并不断创新,是打破筹资“瓶颈”的关键。李男、王岚等提出,文创产业迎合了我国居民精神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的关键渠道。由于企业的特殊性,文创企业的筹资存在诸多“瓶颈”,创新其筹资渠道,对文创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创新传统筹资渠道的筹资方式,拓宽财政资源在筹资活动中的支持路径,充分利用互联网筹资平台,能够有效缓解文创企业质押物少和投资者资金安全问题,为文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6]

冯雪莲、郑楠认为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条款较多出现在风险投融资的商业约定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对赌协议“股权回购”的讨论颇为热烈,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文章从财务学视域,首先在梳理对赌协议“股权回购”的理论依据基础上,探讨对赌协议“股权回购”的财务治理效应;然后重点分析对赌协议“股权回购”对各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利益纷争,试图准确找到各种利益矛盾的焦点;最后文章提出

对于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条款的价值取向,并提出了实践中财务处理要点,旨在支持促进构建多元化资本市场。^[7]

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宫兴国、于月莉、林春雷以 2011—2020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市场化进程为调节变量进行混合多元回归以检验企业战略激进度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战略越激进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在市场化的影响下,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从产权异质性角度分析,非国有企业中这两个问题更加显著。经过机制检验,代理成本、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在战略激进度影响融资约束的过程中均起到了中介作用。^[8]

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和企业信用水平以及资产转移策略紧密相关。Yuan Qinglu 等认为京津冀地区是资源环境与发展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基于 2010—2019 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了战略认同度面板模型,揭示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战略转型程度。结果表明,该地区的环境和信贷政策主要侧重于保护和支助商业型的企业。上市公司通过资产负债表上的可用项目将货币资金和部分业务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阻碍了京津冀推进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希望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企业非法使用资金的问题,并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来纠正资产错配的趋势。同时,环保部门和商业银行将协调配合,共同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业务发展。^[9]

公司信用风险是上市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也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研究点。2020 年 10 月以来,中国多家企业信用债发生违约,这更加引发了学者们对信用风险如何度量这一问题更多的思考。王佳、曹琼予在传统 KMV 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引入风险资产价格的跳跃因素,构建跳跃-扩散 KMV 模型。分别从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和公司规模三个角度,对我国 126 家上市公司的跳跃风险进行估计,并对其信用风险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以测算的违约距离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周期、跳跃风险及反映企业自身经营情况的财务指标为解释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使用跳跃-扩散 KMV 模型度量上市公司信用风

险的效果较好,测量结果与中国实际情况较吻合;同时企业的信用风险与其自身的偿债能力和跳跃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其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及宏观经济状况呈显著负相关。^[10]

石晓飞就河北省上市公司治理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研究报告。该研究依托于河北经贸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成长研究中心完成。以河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详细展示了2017—2021年河北上市公司的发展概况,从股权结构、独立董事治理、高管薪酬和激励、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她”力量和ESG七个重要的公司治理维度,系统地剖析了河北上市公司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提升内在价值和企业绩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从而为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贡献力量。^[11]

池国华、朱俊卿等认为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系统中,内部控制处于一种更为基础性与主导性的地位。文章以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为背景,以2010—2020年为研究窗口,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对内部控制是否影响EVA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EVA薪酬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具有激励替代效应,且内部控制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发现这一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实现的;分组检验发现,EVA薪酬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激励替代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商业类企业、产权制度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及2013版《考核办法》修订之后更为显著。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补充了业绩考核制度发挥约束功能有关影响因素方面的理论成果,对促进内控、考核、合规的融合提供一定的启示。^[12]

曲京山、代琳琳等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关联交易已成为现代经济市场的普遍现象,由于关联交易的复杂性、多样性,导致其成为部分上市公司用以粉饰财务报表以达到虚增利润、扭亏为盈等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正是由于其复杂的交易过程导致审计人员无法有效识别关联交易是否规范、是否按规定披露,增加了审计难度,加大了审计风险,需要审计人员增加更多的审计成本。针对上

市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需要更多的审计程序来检验其是否存在问题。同时,审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否规范也需要注册会计师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态度,需要更有效的审计程序以及技术方法来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保驾护航。^[13]

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除了上述企业债券信用风险、上市公司筹资结构、资本结构、筹资模式、筹资风险、企业面临的筹资约束,以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企业信用水平与资产转移策略、信用风险评估、公司治理、公司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就企业国际化与互补性资产和企业价值网络与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国际化程度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温科、李常洪等认为现阶段,国际化已经成为影响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文章在引入企业特定优势作为调节变量的基础上,运用2010—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国际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U形关系;无形资产特定优势中的研发特定优势与营销特定优势在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有形资产特定优势中的固定资产特定优势与人力资源特定优势在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我国企业需要坚持国际化进程进而获取创新绩效,重视重资产运营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发挥“人”在国际化和创新进程关系中的有效作用。^[14]

除了国际化程度,互补性资产和企业价值网络也会影响企业创新的绩效。温科、李常洪等认为拓展以互补性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平台创新理论和以知识冗余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基础理论,分别引入企业价值网络和知识冗余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216家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实证研究在企业价值网络中随着知识冗余的变化,互补性资产促进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机理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价值网络生态中可以利用的互补性资产越丰富,网络的运行越稳定,网络稳定性的增强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一定水平的知识冗余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企业价值网络在互补性资产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知识冗余调

节了互补性资产与创新绩效、企业价值网络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创新型企业创新及其价值网络构建,提出重视利用互补性资产,关注价值网络关系的积极作用,保持适当的知识积累,并注意知识冗余与互补性资产、企业价值网络的交互作用的不利影响等对策建议。^[15]

三、资本市场

2022年,河北省学者就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研发投资的影响、股市预测、股票价格预测方法、股指预测方法、利用公众情绪对波动性和趋势性城市股指预测的可靠性、金融关联、信贷违约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自留比例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上市企业股票的流动性是备受关注的指标之一,与企业研发活动息息相关。李延军、李孝文等从企业生命周期这一新的视角下探究互联网公司股票流动性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和效率的关系。他们选取2014—2019年在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于研发效率研究得到119家公司样本进行研究,使用描述性统计、全样本随机森林回归等方法进行研究,得到研究结论: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股票流动性与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股票流动性对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在初创期与成长期最大,对研发投入效率的影响在成长期最大,两种影响都在衰退期达到最低,表现出周期性规律;相应地,随着股票流动性变化,其对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在初创期并不明显,但在成熟期和成长期表现为积极的正向影响,随后进入衰退期出现较大起伏和阶段性负向影响。文章研究结果为互联网公司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合理安排研发投入提供参考,帮助互联网公司更有效地进行研发投入的分配和优化。^[16]

马源源、刘晏泽等提出股市中存在与投资者舆情有关的非理性现象,舆情与股市关系的量化研究对发掘股市规律和辅助投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论坛中的投资者发言,创新性地建立CNN-TLDA混合模型对舆情进行多角度量化分析,从积极度和关注主题两方面探究投资者舆情和股市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基于长短时记忆(LSTM)网络对舆情在股市预测中的作用进行

探讨。研究表明:首先,考虑舆情因素可使模型预测的MSE降低38%;其次,与传统的情绪二元分析量化相比,文章提出的多角度舆情量化方法对预测模型的优化效果更好,MSE降低至LSTM模型的41%。说明多角度的舆情分析能够使模型更全面地解释股市中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投资者的情绪积极度和关注重点都能够对股市预测起到辅助作用。^[17]

不同的方法在股票价格预测中略有差异。Zhang Liqin等为了提高动态系统预测建模的效率,提出一种基于高阶正态微分方程的预测模型,以获得显式模型。对高阶常数微分方程模型进行简化,采用数值方法求解预测值。结果表明,该方法实现了模型建立和参数优化的同步,大大提高了建模效率。^[18]

另一个研究提出了一种多尺度建模策略。Ranran Li等认为股票市场的互动性和不确定性对交易者和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由于金融市场中收益和风险并存,股票价格预测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把握股价的复杂波动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为了引入可靠的预测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多尺度建模策略。在识别时间序列不同频率分量的基础上,利用优化后的支持向量机实现股票价格的非线性特征。由于低频子序列统计模型的优势,它更适合捕捉线性特征。该研究以中国不同行业三个公司的股票收盘价序列为样本数据,横向比较分析表明,多尺度策略对提高预测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Diebold Mariano检验验证了所提出模型的统计显著性。此外,该文还深入讨论了预测结果对优化方法的敏感性。多层次的比较和讨论表明了多尺度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19]

除此之外,有研究考虑了非理性因素在股指预测中的作用。Ma Yuanyuan等讨论了基于公众情绪的波动和趋势市场的股票指数预测的可靠性。他们利用word2Vec和LSTM对东方财富股票论坛挖掘的75.4万条文本数据进行情绪分类,并构建公众情绪指标;然后,选择上证综指收盘价、北向资金流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等特征参数。引入情绪指标并构建LSTM模型,探讨在单边上涨、单边下跌和市场波动情况下,公众情绪因素对上证综合指数预测的影响。研究表明,利

用公众情绪预测单边下跌和市场波动的可靠性很高,误差最小。但由于“处置效应”的存在,在使用公众情绪因素预测单边上涨时,误差显著较大。^[20]

郭江山、秦蓉使用 2013 年到 2020 年 8 年的数据,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面板模型,研究信贷资产违约对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自留比例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违约风险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自留比例存在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上升,盈利水平低、资本充足率低、国有性质和流动性风险低的商业银行风险自留比例更高。建议短时期应细化和完善我国现行 5% 的风险自留政策;长期应依据商业银行个体风险与收益特征对该政策进行调整,选择差异的风险自留比例,降低资本占用,提高经营效率,同时有效激励发起机构对资产证券化资产池的监管。^[21]

四、数字金融

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较快,已经成为金融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2022 年,河北省学者就数字金融对企业发展、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地方财政收入、对出口技术复杂程度、企业绿色创新等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李小青、何玮萱等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2015—2019 年沪深 A 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2]

刘颖、张高明等选择 2017 年的 CHFS 数据库样本,覆盖了全国 29 个省份(不含新疆、西藏、港澳台地区)的 355 个县(市)的家庭微

观数据,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23]

康书生、杨娜娜基于 2011—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全国 30 个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全国 30 个省份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差异较大,大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保持一致。第三,在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中,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指标均对乡村产业振兴有正向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促进效果,且数字化程度促进效果更好。^[24]

数字金融除了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外,对地方财政收入也有重要影响,只是这一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宋宝琳、张航等认为受经济增速放缓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出现疲软现象,财政可持续性遭受严峻的考验。随着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继而可能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破解财政收支困境。鉴于此,基于 2011—2019 年我国 28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介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中、低财政收

入城市的财政增收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数字金融发展政策,平衡地方财政收支提供参考借鉴。^[25]

数字金融对出口技术的复杂程度也会产生影响。王智新、韩承斌等提出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综合考虑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市场均衡、自由贸易均衡等建立数理模型,据此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数据进行线性估计和门槛检验,并就地区性质和地理位置做异质性效应分析,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26]

数字金融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样具有积极作用。王智新、朱文卿等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及背后的机制。文章通过机理讨论提出研究假说,数字金融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通过非线性机理讨论提出假说,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异质性机理分析之后提出研究假说,数字金融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在中部地区、发达地区 and 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更加显著;和研究假说,数字金融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两职合一企业更加显著。使用面板数据对这些研究假说进行递进回归和门槛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是提升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驱动力量。引导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和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加快发展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提升。^[27]

数字金融对于下一代的金融素养也有推动作用。霍靖雯、王晓曦基于1171份面向河北省青年群体的调查问卷数据,以数字时代背景下占有可能优势的Z世代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对其在知识型和技能型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的作用机制,了解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Z世代群体金融素养的影响。实证表明:金融素养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技能型金融素养的提升程度高于知识型金融素养,其中学历是影响知识型金融素养的重要因素。为加快提高河北省居民金融素养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匹配度,应当以提升Z世代群体的技能型金融素养为切入点,以金融科技数智化为载体,完善学校金融知识教育的教育体系,确保社会金融实践与其有效衔接和有机结合。^[28]

五、科技金融

近些年,“科技+金融”模式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发展和应用,2022年河北省学者就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对传统金融中介的技术外溢效应、对银行效率、企业创新绩效、政策创新绩效等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并讨论了金融科技背景下应用人才的培养和老年人金融风险防范等问题。

刘立军、刘义臣提出科技金融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重要支撑。基于京津冀13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和耦合协调路径模型,测算京津冀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探明京津冀科技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京津冀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逐步优化态势,天津2015—2016年耦合协调度等级提升后又出现回落现象,考察期内实现耦合协调度等级提升的仅有6市,内部呈现显著分异特征,协同水平有待提升;路径研究显示,京津冀科技金融投入通过效益发展、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路径

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29]

金融科技新业态对传统金融中介的技术外溢效应。王艳芳、赵鹞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中介的理论模型,考察了金融科技新业态的技术溢出对传统金融中介效率的影响。理论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新业态的技术溢出提高了传统金融中介的效率。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金融科技新业态显著提高了2011—2018年全国1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分析,发现:(1)金融科技新业态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动态变化的,且依赖于其对传统金融中介的“破坏性效应”是否得到有效抑制;(2)如果传统金融中介主动缩小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效率差距,将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协调、融合发展。^[30]

房颖、叶莉等认为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开展创新,逐渐成为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突破人才与技术桎梏、提升经营效率的主要途径。文章基于理论分析,建立起“金融科技合作创新-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银行效率”的影响机理框架,同时以2014—2019年城商行的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创新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合作创新能够显著提高银行效率,且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赋能创新模式与共建创新模式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后者释放的效率提升效应更大;机制研究表明,资产端风险结构、负债端存款结构与中间业务收入结构是金融科技创新作用于银行效率的决定性机制。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有序合作、充分发挥合作的效率提升作用具有重要意义。^[31]

科技金融除了影响传统金融中介之外,还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王荣、叶莉选取2011—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企业数据,聚焦“融资约束→企业自身研发投入”链条与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链式传导作用,探索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文章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分别提出4个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这些假设。研究发现:一方面,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创

新绩效,且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有更加显著的提升效应;另一方面,企业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在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金融科技→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0105,企业创新绩效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其中有0.0105个百分点是通过该链式中介路径实现的。文章为实体企业如何借助金融科技发展获得更强的创新推动力提供新的解决方案。^[32]

李媛媛、陈文静等尝试从企业网络特征视角研究科技金融政策如何进一步释放科技金融效能,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运用LDA聚类算法将我国2011—2020年国家层面科技金融政策划分为宏观导向类、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和专利保护类,同时运用同期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相关数据,深入挖掘各类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及资金网络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4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资金网络中心度增强了宏观导向类、资金支持类和专利保护类这3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基于研究结果,从政策、网络与企业角度出发,提出维持绩优政策供给力度、扩大资金网络规模、把握网络核心地位等对策建议。^[33]

李媛媛、陈文静等提出科技型企业是创新活力之源,科技金融政策是创新助推之器。资金网络将企业与资金供给方紧密连接,知识网络将企业与知识元素相互匹配,两者都是企业满足创新需求的重要媒介。然而,科技金融政策能否借助双重网络——资金流与知识流的力量以实现创新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有待研究。文章在界定宏观导向类、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和专利保护类四类科技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将宏观政策、中观网络和微观企业相结合,深入挖掘资金网络和知识网络特征在科技金融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和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资金网络中心度增强了资金支持类和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导向类政策的不足之处;知识网络中心度增强了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和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

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34]

金浩、安明等认为数据要素时代下,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加强金融科技技术融合和应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与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合作创新已成为主流趋势。文章立足消费者中心原则,应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创新问题,构建基于技术创新的金融科技服务供应链动态博弈模型,比较集中式决策、无契约的分散式决策和两种合作契约的分散式决策下的均衡结果。研究表明,消费者反馈对开发商和供应商的定价策略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开发商的技术创新投入和金融科技服务内在技术先进度;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或对技术先进度敏感时,较高的收益共享契约和较低的成本分担契约有利于稳定合作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供应链内部成员不会同时选择同一合作契约,此时可以考虑一次性转让合同使双方决策行为一致。^[35]

随着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发展,金融移动终端的应用更加普及,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随之而来的老年金融风险日益凸显,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李媛媛、张春蕾等基于 CHARLS (2018) 数据,采用 XGBoost 算法识别出中国情境下影响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的关键因素,并使用 ISM 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级结构关系,深层次挖掘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基于此模型辨识出影响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的前 35 个重要因素。遵循从因素辨识到模型重构的思路,按照各因素之间由浅入深的逻辑构成,重构了兼具代际关系、人情关系与社会保障的因素层级,并将其归纳为浅层诱导因素、中层影响因素、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上述研究,进一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预防中老年家庭金融诈骗风险的对策建议。^[36]

六、绿色金融

2022 年河北省学者关于绿色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京津冀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等问题上。

绿色金融会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卞晨、初钊鹏等构建了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仿真技术分析实现“政银企”绿色技术创新协同演化稳定均衡的政府干预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在兼顾银行和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动机和利益前提下,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实行预先拨付企业研发补贴与环境税减免,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先行放款与贷后监督的奖惩措施,对于形成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合力的机制设计和调控干预是有效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双重政策协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政策冲突,但银行监督效率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有助于缓解和解决政策冲突问题,调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目标能够得以实现。该研究结果为政府干预形成外部激励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分类施策提供了借鉴。^[37]

李敏、王雷针对京津冀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构建了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 2013—2020 年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对两个系统开展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在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上领先于天津和河北,京津冀三地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逐渐提升的状态。在耦合度方面,北京和天津处于高耦合阶段,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进入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阶段,河北一直处于良性耦合阶段。在耦合协调度方面,北京进入了中度协调阶段,天津和河北处于基本协调阶段。基于以上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38]

七、货币、利率与商业银行

2022 年河北省学者在流动性冲击,利率衍生工具和商业银行期限转换功能,利率期限结构与银行风险,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LPR 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以及工业信贷错配等角度展开研究。

辛兵海、张琳基于 2006—2020 年沪深股市 37 家上市银行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文章以久期缺口反映银行期限转换程度,实证检验使用表外利率衍生工具对银行期限转换功能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具有减弱流动性冲击对银行期限转换负向影响的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多元化银行组内和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组内,利率衍生工具调节效应更为显著。该研究证明了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的积极影响,为进一步发展利率衍生品市

场提供证据支持。^[39]

辛兵海、徐红艳等以我国 2008—2020 年银行—企业匹配数据为研究样本,使用银行信贷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敏感性定义银行风险承担,实证考察短期利率下行和长期利率下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短期利率下行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长期利率下行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经济显著性而言,长期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短期利率。第二,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获得收益机制是长期利率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主导机制,而追逐收益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久期缺口越大、权益比率越低的银行,长期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越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推动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应基于收益率曲线全面认识利率变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注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加强对商业银行久期缺口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40]

孟维福、刘浩杰等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通过改变银行竞争环境引起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对 DLM 模型进行拓展改进,通过内生银行竞争,探究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国 78 家商业银行 2003—2018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银行竞争在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加剧银行间的竞争程度使得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此外,资本约束和金融创新能够抑制货币宽松对银行竞争的促进作用,其中资本约束对全国性银行的调节效应较区域性银行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而金融创新对区域性银行的调节效应较全国性银行更为显著。为此,中央银行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应适度关注货币政策变化对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的影响,同时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使得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与风险水平维持在合理区间。^[41]

Yuan Qinglu 等认为银行信贷跨行业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收集了 2007—2017 年中国 19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深入分析了信贷错配对行业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各行业都存在银行信贷的结构性错配。特别是,中国工业信贷偏离程度逐步下降,但结构性波动仍然较大。大量资本流向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资本相对稀缺。此外,信贷错配对产业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并表现出微弱的加速效应。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政府应积极引导行业间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促进自主创新。应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以确保市场有效运行,降低信贷错配的程度。^[42]

王重润等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他们基于 2005—2018 年 31 个省份面板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不利于银行稳定,房价是人口老龄化与银行稳定性关系的重要中介变量。引入人口流动与人口老龄化的交互项,发现人口流动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银行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取消户籍限制等,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43]

八、保险

十九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保险在居民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并提出努力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新保险事业的要求。2022 年河北省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市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的关系、新农合健康异质性与保健消费、养老保险、长期护理险等方面。

互联网对居民家庭的保险参与有重要影响。王培辉、李梦玉运用 2017 年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文章理论分析得出研究假说,即假说互联网使用增加了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性以及保险市场参与度;假说互联网通过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可以促进家庭保险市场的参与;假说互联网通过提高社会互动水平可以促进家庭保险市场的参与;假说互联网通过提高网络交易水平可以促进家庭保险市场的参与,并使用 Logit 模型检验假说。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意愿和程度;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提高社会互动水平以及增加网络交易概

率三个渠道来提高家庭保险市场参与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户籍、学历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表现出差异性。^[44]

刘念、张兆强指出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缓释健康和收入不确定性的机制,在保障居民健康、收入和提高幸福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构建基本医疗保险无套利模型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健康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进基本医疗保险所带来的幸福感的提高。进一步,文章主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工具变量法和中介变量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基本医疗保险所带来的幸福感随着年龄、退休等因素以及健康和收入不确定性增加而增加的时域性特征和作用机制。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和优化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在居民幸福感中积极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45]

在农村地区推广新农合以来,对农村老人健康状况起到了正向的影响。范庆祝、吴宇凤等认为我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利用CHARLS数据和Tobit模型分析发现,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远大于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并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这一结论还能说明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尚未建立起“治未病”的保健消费观。内生性的讨论和检验进一步巩固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最后,利用逐步因果法探讨了新农合影响保健消费的中介渠道。研究发现代际支持是重要的中介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意识、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在物质支持的基础上鼓励子女给予更多的货币支持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46]

张国梅、金浩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背景,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确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三方主体的最优空间存在状态,运用软件仿真刻画不同主体之间策略选择的动态发展过程与最终演化结果,为最终实现基金可持续发展提供执行依据。研究表明: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与其各自的成本收益密切相关,政策执行力

度通过系统传导可以影响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假设条件不同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从中得出启示: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考评机制,建立垂直管理的业务经办体系,适当降低企业的养老保险费用,完善统一共享的信息管理系统。^[47]

尹成远、王珠存认为我国实施的养老策略是建立在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为拓展、以个人养老金计划为补充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保障体系。根据此体系的执行情况,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公众三个角度分析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美国个人退休账户计划、德国里斯特养老金计划和日本社区养老的先进经验为借鉴,有针对性地从政府、金融机构和用户三个角度提出我国应该从加大政策优惠、加强政府监管和促进产品创新、完善养老金投资、培育专业人才、丰富个人养老金来源、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发力,推动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48]

陈凯、赵娜等针对青岛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面临的筹资责任优化及财政补贴动态调整问题,文章以灾难性支出发生率为参照指标,结合适度保障理论,首先构建了目标保障水平测算模型;进而构建了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筹资责任分担动态调整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仿真实验,测算了保障范围扩大过程中筹资责任分担动态调整情况,得出了一系列有政策参考价值的调整结果。^[49]

韩笑、吴宇凤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参保者健康预防行为的影响,可以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存在“健康抑制”和“健康促进”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存在“事前道德风险效应”,它降低了参保人在失能后面临的边际护理成本,从而使其降低了防范相应疾病风险的投入,对健康预防行为起到了负面作用;另一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存在“风险认知提升效应”,它能够提高个体的健康意识和对自身所患疾病的认知,从而增加其健康预防行为的动机。文章建议,我国在推行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时,对潜在风险群体进行预防宣传、早期干预及相关培训,建立延缓失能预防医疗保障金,帮助个体提前管控与失能相关的疾病风险。^[50]

九、金融支持

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研究了普惠金融的技术效率、金融支持对农业碳补偿率、农业生产率等的影响,以及金融创新保证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等问题。

李刚、徐以强等通过广义似然比统计检验来确定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生产函数,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2008—2020年的金融技术效率,并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FTP)和前沿技术利用效率(TE),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等方面分析了金融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金融技术效率的变化主要由前沿技术利用效率(TE)引起;(2)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前沿技术利用效率的均值最高,中部地区最低;(3)政府干预力度对前沿技术利用效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前沿技术利用效率呈现正“U”形关系,而科技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对于前沿技术利用效率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以上影响因素通过对金融前沿技术利用效率的作用,间接影响着中国金融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51]

农业金融支持对农业碳补偿率具有重要影响。Niu Xiaogeng等基于农业碳排放和碳汇的双重属性,该研究测量了2006年至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碳补偿率(ACCR),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金融支持对ACCR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金融支持与ACCR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加大农业金融支持力度有利于ACCR的提高;(3)农业金融支持对东部地区ACCR的影响最为显著;(4)农业金融支持对ACCR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5)农业技术进步是影响农业金融支持ACCR的中介变量。因此,建议通过协作、创新金融支持机制、实施差异化金融支持战略、发挥金融支持农业的辐射效应、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等措施促进农业减排。^[52]

随力瑞、金浩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揭示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直接效应的作用路

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路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可以基于地理和经济联系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立系统化的长期性政策保障体系,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53]

王宪明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在重量新区的建设路途上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雄安新区的发展不仅事关河北省的发展,还事关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事关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战略。通过对雄安新区金融服务创新开展深入研究,分析雄安新区金融服务发展的现状和金融创新资源,针对性地开展一系列金融创新手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服务创新路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服务雄安新区发展。^[54]

十、国际金融

2022年河北省学者在人民币国际化、其他国家货币政策、主权信用评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中美金融周期交互影响、“金融化悖论”、金融开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也有了较大发展。牛风君就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模式进行了探讨。其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热点问题,但迄今为止,人民币中亚区域化的研究少之又少。该研究选取中亚作为研究视角,构建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模式与路径的研究框架。因此,该选题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通过现有文献及实践可以发现,推进人民币中亚区域化的难度较大。而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模式与路径研究是基于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模式选择的现状,对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模式选择进行综合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并为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探索出创新型的模式与深化路径,进而为人民币中亚区域化实践提供一定的学术理论支持。^[55]

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在日本受到如此多的排斥或追捧,这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裴桂芬、樊悦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的通货膨胀目

标制货币政策在抑制高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政策框架摇身一变似乎成为一些国家或经济体摆脱通货紧缩、提升物价水平的政策“神器”,尤其在日本更为突出,通胀目标制不仅成为央行、政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更成为不同时期日本银行设法规避或执着追求的对象。文章首先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发展历程,梳理通胀目标制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实践及其效果,通过对比金融危机后美国与日本通胀目标制实践,归纳其在抑制通货膨胀和提升物价水平中的作用;其次分析黑田东彦行长任内标准通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实践以及预期传导路径;最后基于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差异,从利率与投资、货币规模与信贷、汇率与出口以及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展示了货币传导机制遭遇的“梗阻”,并揭示“梗阻”的深层次原因。^[56]

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了主权信用评级披露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金融周期的国际交互。

王培辉、赵梦怡通过构建中国金融状况指数,采用动态溢出指数模型考察中美金融周期交互影响。研究发现:(1)中美两国金融周期具有显著的时变性;(2)从溢出指数角度来看,以次贷危机为分界点,次贷危机之前中美两国的溢出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次贷危机之后中美两国的溢出指数呈现较低水平;(3)在样本期间内,美国金融系统对中国金融周期的净溢出时间较长,美国金融周期具有溢出特征,中国金融周期则具有接受特征;(4)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对美国金融周期溢出指数呈现显著上升趋势。^[57]

马锦生、刘华光提出如何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防范过早金融化,成为时代课题。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聚焦于金融扩张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更迭中的关键作用,利用基于金融资本形态的“流动性霸权”概念,揭示了金融扩张“既连续又突变”的特征。金融扩张既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内生动力,又是其体系不稳定性的来源,形成资本主义难以跨越的“金融化悖论”。这一“金融化悖论”将美国经济必然走向金融化,以及金融化必然导致体系性混乱,统一于其逻辑架

构之中。这一具有纵深历史视角和广阔体系视角的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金融化悖论”形成以及具体演进形态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对于规避资本主义金融化中出现的问题,防范依赖性金融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58]

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跨国金融往来日益增长,引发学术界对金融开放问题的关注。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金融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和股市的影响、其他国家的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邢会、杨子嘉等认为外部融资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文章从这一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启动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全部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引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融资约束和盈利能力在金融开放影响研发投入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确实具有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作用;(2)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是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并且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在金融开放改革中获得的红利越多,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更为明显;(3)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自贸区金融开放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更强,更有利于其加大创新投入。^[59]

闫屹、张答认为目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推进全面金融开放是其必然选择。四十余年来,我国金融开放进程稳步推进,正在从局部开放走向全面开放。金融开放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证券市场是金融开放的重要领域,金融开放对股票市场的存在直接、间接等不同的影响机制。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使用1996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的上证A股指数收盘指数共5577个,深成A股指数收盘指数共5577个数据样本,并利用GARCH模型对金融开放对股市波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逐步推进的金融开放政策在整体上能够稳定股票市场的波动,而且不同时期的金融开放水平决定其对股票市场波动抑制作用的强弱。因此,建议把握金融开放的力度,坚

持稳步推进的策略；完善金融开放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金融开放在多领域同步进行。^[60]

其他国家金融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能够为后来学者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启示。闫屹、刘佳田选取巴西 1979—2020 年的季度经济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在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三个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巴西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进一步衡量巴西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巴西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不同。在金融规模维度，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整体表现为促进作用，其中金融市场规模的提高有利于改善金融结构从而扩大金融开放的积极作用。从金融机构效率的角度来看，不同阶段金融开放表现出促进和抑制的不同影响，只有金融机构效率达到一定水平后，金融开放才能促进经济增长。^[61]

闫屹、卜鹏荣根据阿根廷金融开放历程与数据可得性，选取 1980—2017 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lnGDP），构建金融开放水平（Financial Openness, FO）和金融发展水平（Financial Development, FD）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代入 STR 模型，并将三变量滞后一期一同代入模型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转换变量筛选结果为金融发展水平（FD），且确定了模型具体形式为 LSTR1 模型，即扩大金融开放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随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变化是渐进的过程。分析阿根廷的金融开放历程，探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62]

（王重润：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李中秋：河北经贸大学讲师）

参考文献：

- [1] Liu Jia, Simin Liu, Jian Li, Jianzhao Li. Financial credit risk assessment of online supply chain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a hybrid model ch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2022.37(6):8790-8813.
- [2] Yaming Zhang, Chaozhuo Zhang, and Muhammad Arif.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Financial Security in Supply Chain Integrated Business

- Intelligence[J].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2022(7):1-8.
- [3] Jie Tian, Zhaoyang Jia, Xiwang Lai. Research on Credit Risk and Market Supervision of Corporate Bond in Hebei Province [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2.6(1), 151-157.
- [4] 尚颖, 贾士彬, 许维维. 寿险公司资产驱动程度与经营风险的关系研究——基于不同驱动模式的分析[J]. 会计之友, 2022, No.684(12):68-76.
- [5] 梁秀娟, 郭周琪. 石家庄市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01):68-73.
- [6] 李男, 王岚, 李冉. 文创企业筹资模式创新研究[J]. 财会通讯, 2022, No.902(18):171-176.
- [7] 冯雪莲, 郑楠. 财务视域下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条款的价值选择[J]. 财会通讯, 2022, No.908(24):107-110.
- [8] 宫兴国, 于月莉, 林春雷. 战略激进、市场化进程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2, 19(02):50-59
- [9] Yuan Qinglu, Sun Yan, Liu Cui-xia.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rporate Credit Level and Asset Transfer Strategy: Based on the Data of Beijing-Tianjin-Hebei Listed Companies [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22. V. 202: 145-151.
- [10] 王佳, 曹琼予. 基于跳跃-扩散 KMV 模型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估[J]. 技术经济, 2022, 41(01):160-168.
- [11] 石晓飞. 河北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研究报告(2022)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
- [12] 池国华, 朱俊卿, 王蕾. EVA 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J]. 科学决策, 2022, No.298(05):35-56.
- [13] 曲京山, 代琳琳, 张婷.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审计探讨[J]. 会计师, 2022, No.377(02):75-77.
- [14] 温科, 李常洪, 徐晓肆. 企业国际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J]. 企业经济, 2022, 41(06):66-79.
- [15] 温科, 李常洪, 徐晓肆. 互补性资产、企业价值网络与创新绩效: 基于知识冗余的调节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04):105-115.
- [16] 李延军, 李孝文, 王诗惠. 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互联网公司股票流动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J]. 金融发展研究, 2022, No.482(02):51-58.
- [17] 马源源, 刘晏泽, 刘呈隆等. 中国投资者多角度舆情分析及其在股市预测中的作用[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3(08):1201-1208+1216.
- [18] Zhang Liqin, Tian Xiaojing, Chabani Zakariya. Application of Higher-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Model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Stock Price Forecast[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onlinear Sciences. 10. 2478/amns. 2022.

- 2.00114
- [19] Ranran Li, Teng Han, Xiao Song. Stock price index forecasting using a multiscale modelling strategy based on frequency components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J]. Applied Soft Computing. Volume 124. 2022.
- [20] Ma Yuanyuan, Liu Chenglong, Zhang Jie Liu Yanze. Reliability study of stock index forecasting in volatile and trending cities using public sentiment ——based on word2Vec and LSTM models [J]. Applied Economics. 2022, 1-20.
- [21] 郭江山, 秦蓉. 信贷违约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自留比例的影响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2, No. 513(04) : 78-89.
- [22] 李小青, 何玮莹, 霍雨丹等.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24(01) : 80-95.
- [23] 刘颖, 张高明, 孙婉若.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J]. 武汉金融, 2022, No. 265(01) : 33-41.
- [24] 康书生, 杨娜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效应分析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2, No. 511(02) : 110-118.
- [25] 宋宝琳, 张航, 胡欣蕊. 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中国 28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J]. 财政科学, 2022, No. 77(05) : 122-133.
- [26] 王智新, 韩承斌, 朱文卿.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 No. 342(08) : 26-42, 135-136.
- [27] 王智新, 朱文卿, 韩承斌.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 No. 311(03) : 52-61.
- [28] 霍靖雯, 王晓曦. Z 世代金融素养与数字普惠金融关系研究——基于河北省微观调查实证分析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23(06) : 191-193.
- [29] 刘立军, 刘义臣. 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J]. 经济问题, 2022, No. 516(08) : 96-102.
- [30] 王艳芳, 赵鹞. 金融科技新业态对传统金融中介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22(02) : 136-160.
- [31] 房颖, 叶莉, 温国锋. 金融科技合作如何提升银行效率——基于城商行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创新的实证证据 [J]. 金融监管研究, 2022, No. 124(04) : 17-39.
- [32] 王荣, 叶莉. 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路径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 No. 307(02) : 58-62
- [33] 李媛媛, 陈文静, 王辉. 科技金融政策、资金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 [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06) : 28-35
- [34] 李媛媛, 陈文静, 王辉. 双重网络效应下科技金融政策创新绩效研究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2, 36(03) : 55-62.
- [35] 金浩, 安明, 卢颖. 微分博弈模型下的金融科技服务合作创新——基于消费者反馈视角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 No. 227(05) : 145-164.
- [36] 李媛媛, 张春蕾, 方会琳. 中国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预警与因素层级研究——基于中国情境下的辨识与重构 [J]. 西北人口, 2022, 43(02) : 15-27.
- [37] 卞晨, 初钊鹏, 孙正林. 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仿真——基于政府干预的演化博弈视角 [J]. 管理评论, 2022, 34(10) : 122-133.
- [38] 李敏, 王雷. 京津冀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2, 41(05) : 72-77
- [39] 辛兵海, 张琳. 流动性冲击、利率衍生工具和商业银行期限转换功能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2, No. 421(05) : 55-63.
- [40] 辛兵海, 徐红艳, 程栋. 利率期限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 [J]. 南方金融, 2022, No. 553(09) : 35-49.
- [41] 孟维福, 刘浩杰, 王璟怡. 货币宽松、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J]. 经济问题, 2022, No. 510(02) : 42-51.
- [42] Yuan Qinglu, Zhou Huan. The Spatial Economic Effect of Industrial Credit Misallocation in China,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22. 1-15.
- [43] 王重润, 庞晓宇. 人口老龄化、房价波动与银行稳定性关系研究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 43(04) : 23-33
- [44] 王培辉, 李梦玉. 互联网使用提高了保险市场参与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分析 [J]. 武汉金融, 2022, No. 267(03) : 20-27.
- [45] 刘念, 张兆强. 健康和收入不确定性、时域性特征与基本医疗保险幸福感 [J]. 宏观经济研究, 2022, No. 280(03) : 116-137.
- [46] 范庆祝, 吴宇凤, 刘淑彦. 新农合、健康异质性与保健消费——基于中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分析 [J]. 农村经济, 2022, No. 472(02) : 117-125.
- [47] 张国梅, 金浩.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参与者驱动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07) : 88-96.
- [48] 尹成远, 王珠存. 中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对策 [J]. 河北金融, 2022, No. 543(11) : 3-9.
- [49] 陈凯, 赵娜, 焦阳. 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筹资责任分担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J]. 运筹与管理, 2022, 31(03) : 163-170
- [50] 韩笑, 吴宇凤. 长期护理保险与居民健康预防行为——来自中国试点城市的证据 [J]. 天府新论, 2022, No. 225(03) : 108-122.
- [51] 李刚, 徐以强, 吴岩等. 金融技术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中国 30 个省(区、市) 2008~2020 年的面板数据为例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2, 41(09) : 145-153

- [52] Niu Xiaogeng, Liu Meiyu, Tian Zhenxing, Chen Anguo.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Financial Suppor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Compensation Rate, Sustainability, 2022, 14.
- [53] 随力瑞, 金浩. 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 37(04): 110-118
- [54] 王宪明. 金融创新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2年
- [55] 牛凤君. 人民币中亚区域化模式与路径研究[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2
- [56] 裴桂芬, 樊悦.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日本宽松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梗阻”[J]. 日本研究, 2022, No.182(03): 42-53.
- [57] 王培辉, 赵梦怡. 中美金融周期交互影响研究[J]. 河北金融, 2022, No.540(08): 29-34, 59.
- [58] 马锦生, 刘华光. 难以跨越的“金融化悖论”——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金融化分析[J]. 人文杂志, 2022, No.320(12): 71-77.
- [59] 邢会, 杨子嘉, 张金慧. 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准自然实验[J]. 工业技术经济, 2022, 41(06): 71-77
- [60] 闫屹, 张答. 金融开放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J]. 河北金融, 2022, No.536(04): 20-25.
- [61] 闫屹, 刘佳田. 巴西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金融发展视角[J]. 河北金融, 2022, No.538(06): 45-51.
- [62] 闫屹, 卜鹏荣. 阿根廷金融开放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J]. 中国外汇, 2022, No.449(11): 74-76.

法 学

法学理论研究

董颖

2022年,河北法学理论研究继续围绕新的理论热点展开,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学界不断挖掘理论资源,并对河北的红色法治实践进行探讨,撰写了多篇理论文章。通过对晋察冀、晋冀鲁豫及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以及民事、刑事、劳动、婚姻家庭方面的法治实践研究,梳理出可贵的历史经验,并提出其现实意义。在法制史研究方面,学术成果也较上一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并体现出自身特色。通过对古代监狱的功能演进、长城的法治化治理、清代漕运的法律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其历史的必然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在法律教学的研究方面,继续探讨实践性教学的意义和改进方式,推进法律教学与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

一、法治中国理论

夏淑云、刘新凯探讨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导意义。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定位、法治布局、法治立场,指明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是法治中国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作为引领中国法治实践的法治理论和科学法治理论,作为引领中国法治实践的科学法治理论和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科学指南,将为法治中国道路提供指引。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精髓,深植于中国大地。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更契合中国实际。这一思想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准确把握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的论述、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地位的论述、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的论述、全面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的论述、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关系的论述以及全面依法治国重要保障的论述等等,都深刻诠释了中国特色的良法善治,它根植于中国,立足于中国,也适合于中国。习近平法治思想呈现着中国法治理论对国家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对中国之治的明确指引。只有深入领会、切实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才能有效冲破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束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话语体系。^[1]

二、河北的红色法治实践研究

王艳宁回顾了晋察冀边区人民民主的历史与

法治实践,总结了其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局部执政中进行了人民民主的历史实践,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晋察冀边区对人民民主广泛的实践探索,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民主建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主政权,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创造性地建立了“三三制”制度,体现了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高度智慧。民主选举:人民广泛参与充分行使选举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运动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民主的内容。民主执行:多措并举保证民主制度真正执行。民主监督:权力受到广泛监督和制约。晋察冀边区善于运用法律推进工作的开展,运用法律法规保证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和严肃性,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各级政权的构成和人员选举作了详细规定。晋察冀边区创立的民主制度、完善的民主建构、丰富的民主实践,为当今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宝贵的法治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同时要坚持用法治保障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进行。^[2]

靳志玲探讨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婚姻法治的历史价值。认为婚姻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安定边区秩序,保护妇女,促进妇女解放,破除歧视和虐待妇女的社会陋习,改善婚姻家庭关系,动员广大群众共同抗日,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的婚姻法治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宝贵经验。两边区婚姻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坚持党的一贯主张,继承苏区婚姻立法的基本原则。其次,根据抗战需要和现实状况灵活具体的规定,使婚姻法规更具有适用性。第三,立法体例较苏区更为成熟。立法技术的不断成熟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1950年婚姻法立法体例基本延续了两边区的婚姻条例,两边区婚姻法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婚姻立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富有代表性、创新性、区域性的立法成果,是人民自主、婚俗改革、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制度保障,为新中国婚姻立法提供了立法经验与制度蓝本。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从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到1980年的婚姻法,再到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与时俱进并不断完善。这对于新形势下实现男女平等,维护女性婚姻权益,构建和谐自由的婚姻关系,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蔡欣欣、刘勇对晋冀鲁豫边区劳动法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其当代意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社会现实为依据,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和工人运动规律,公布施行了《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真正代表并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民众的利益和意志,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热忱,维护劳工利益,促进劳资双方关系稳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新中国的劳动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典范。借鉴吸收晋冀鲁豫边区劳动法治的经验做法,对于在新时代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站位,其次是制定法律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和战争条件,保持了工人阶级彻底的革命性这一优势。第三是侧重劳动者倾斜保护。基本实现了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真正成为调整劳动关系和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第四是促进劳资关系健康发展。晋冀鲁豫边区劳动立法没有盲目加重工厂主的负担,主张兼顾雇佣方利益,共同保护工人阶级和资方各自的利益,促进劳资关系健康发展,合理安排及一并促进劳资双方的利益,认可并充分满足资方正当的利益追求,有效发挥劳动法促进经济和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双重使命,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4]

尹建兵、李靖探讨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法制建设的当代启示。晋冀鲁豫边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其土地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章认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法律制度自主性演变的历程,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目标与策略相结合的产物,是外在影响与内在自主探索相互交织碰撞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土地制度与政策的不断探索,奠定了晋

冀鲁豫边区土地法制建设的基础。土地法制建设现代启示始终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晋冀鲁豫边区土地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法治建设,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晋冀鲁豫边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功解决了土地问题,有效巩固了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起适应根据地发展的土地制度,为团结抗战、增加生产、改善民生等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边区政府在民主与法制建设道路上向前迈出的新里程。晋冀鲁豫边区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显示“良法善治”是推动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途径。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推进,始终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5]

骆艳青研究了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调解制度的特点及历史演变,认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确立的调解制度,在完善我国调解工作、建立多元化调解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方面仍有着历史借鉴意义。在政策层面,华北人民政府在调解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强调调解重要性方面取得的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调解工作乃至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实践层面,华北人民政府确立的调解制度,为我国调解工作提供了丰富经验。以“枫桥经验”为例,其初创阶段,在调解组织、调解方法等方面都深受华北人民政府法律法规制度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区在治保委员会下设立了调解小组,其成员由治保干部、派出所民警、群众中有威望的长者组成,调解小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维护稳定。在具体工作方式、方法上,接受枫桥法庭的培训和指导,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经验。“枫桥经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不断探索灵活多变的调解方式、方法,开创了社会化调解、法治化调解、专业化调解、智能化调解等模式,逐步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确立的调解制度,在完善我国调解工作、建立多元化调解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等方面仍有着历史借鉴意义。^[6]

刘淑娟对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刑事法治实践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其历史传承意义。指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刑事法治实践为新中国的刑事法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首先是颁布多个刑事方面的法令通令,法律法规与政策相结合,严厉打击各种犯罪,保卫新民主主义政权和社会秩序。采取法律法规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惩治犯罪,为维护新民主主义政权和革命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了经验。第二是坚持“少杀、慎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严格死刑复核。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惩治反革命运动中得到延续,并随着形势变化逐步演化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载入1979年《刑法》,刑事法治的格局逐步形成。第三是贯彻“群众路线”,建立轻微刑事案件调解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其初衷均是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达成和解,解决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也体现出对于轻微刑事犯罪以教育为主的刑罚目的。第四是重视程序公正,建立一系列诉讼程序和制度,规范刑事案件处理华北人民政府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与完善,集中凸显了程序公正优先、以程序法治保障实体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为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7]

麻新平对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总结,认为西柏坡时期在法治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不仅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国推进法治建设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首先体现在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探索。一方面,根据西柏坡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起草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治建设做必要的铺垫和准备,西柏坡时期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积累了实践经验,法治政府雏形已经显现。为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华北人民政府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司法道路,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司法体系,也更注重司法程序正当性和合法性,建立一系列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案件质量。特别是死刑

执行核准程序，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少用、慎用死刑的思想也成为现阶段我国对待死刑的重要刑事政策。重视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其所确立的调解应依靠群众、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等原则，对新中国的调解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华北人民政府还积极开展司法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具有司法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法律人才和骨干。筹备设立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法学研究院，加强了中国法学研究工作。^[8]

董颖探讨了石家庄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石家庄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由普通群众行使民主权利，选举人民代表，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石家庄市通过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因此称为“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功探索，对于全国其他城市甚至第一次全国政协的召开都具有可贵的借鉴意义。首先是党的民主理念和施政纲领在城市全面落实，对政权建设具有深刻历史启示。第二是体现强烈的人民性。选举期间，群众踊跃参加选举，真正体现了公平、平等、和睦、团结。选举产生的政府委员和代表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将人民的监督提到了崇高位置。第三是提出实行普选。第四是建设地方性人民民主政权。石家庄市在新中国成立前成功地召开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取得的经验与创立的会议议程，为全国各地提供了蓝本。石家庄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环节中都遵循严格的程序，这些程序成为以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运行的基本程序。提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注重民生的务实作风，成为人民民主传承至今的宝贵财富，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

三、法制史

唐芳对秦汉时期长城区域的法律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大量出土的居延、敦煌汉简以及其他古籍文献中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不仅大规模修筑长城，而且在长城周边地区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治理活动。秦汉时期长

城周边的法律调控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对内协助惩罚犯罪活动，帮助维持国家的社会治安，对外重点打击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此基础上，秦汉长城区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长城军事行政法律制度、长城烽隧管理律令、长城屯戍法律制度和长城边塞贸易律令，共同成为王朝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在长城区域治理过程中广泛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大量的律令方针，既是传统法治文明进程中道、墨、儒等学派自然法思想的展现，也是法家、兵家学派中丰富法治思想的诠释和实践。同时秦汉长城区域的法律治理活动是古代“德礼为本，刑罚为用”思想的一种表达，是传统法治文明的充分体现。秦汉在长城区域构建了周密和完善的军事法律制度，实施对长城区域的法律调控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决策的延伸，是对传统法治实质意义上的一种表达，体现了传统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教与罚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手段以及追求和谐秩序的目的。秦汉对长城区域的法律调控，由多种法律形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全面提升了封建王朝中央的治理能力。秦汉时通过制颁和实施一系列律令加强对长城区域的调控和治理，是古代国家“以法治国”“外儒内法”统治策略的延伸，是汉代“霸王道杂之”治理手段的体现，不仅使封建王朝的法律体系愈加完备，而且对巩固边防，安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10]

崔嘉欣以北京监狱为中心对近代中国监狱罪犯作业功能嬗变进行了考察。近代监狱罪犯作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发挥这两种功能尤其是后一功能，是实现由传统“苦辱刑”向近代教育刑转变的重要标志。被称为近代中国“模范中之模范”的北京监狱罪犯作业功能，经历了从1912年到1922年初步发挥、1923年至1928年双双衰退、1928年至1948年逐步异变为榨取罪犯劳动的嬗变。这种嬗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近代中国监狱罪犯作业和监狱转型走向的缩影。北京监狱在民国初期和北洋政府时期，为中国监狱从传统劳役制度向近代罪犯作业制度转型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在中国最早建立和实施了比较系统的罪犯作业制度，并在民国初期十几年间使罪犯作业功能尤其社会功能得到了较好发挥，促进

了中国由传统劳役制向近代罪犯作业制、由传统监狱向近代监狱的转型。尽管其罪犯作业制度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与清末前传统劳役制相比是一巨大进步。民国时期北京监狱作业功能，走过了从初期发展到衰落再到异变的下行过程。在1928年6月至1937年后，北京监狱作业的经济功能逐步膨胀，但其社会功能逐渐萎缩。近代中国监狱作业功能的衰退和异变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于作业功能的二重性矛盾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对作业社会功能的制约。北京监狱作业功能由初期发挥到衰落再到异变的嬗变过程，正是这一必然性作用的结果。^[11]

郭凯峰、牛革平对清代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进行了研究。清代大运河漕运被视为“南北之咽喉，军民之命脉”。为了保障漕运的可持续性畅通及其重大职能的实现，清朝制定了涉及漕运管理各环节的法律制度，构建了以“律、例、典、令”为主要内容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满足了大运河漕运管理的需要，无论是作为漕运主体法的《漕运全书》，还是《大清会典》中的漕运管理行政法规，抑或《户部则例》里的漕运管理部门规章，对大运河漕运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完备而细致的规定，繁杂而细密，几乎达到了事无巨细都予以具体规定的程度。使具体执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大大限制和压缩了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随意出入人罪以及枉法裁判的弊端。清代建立了完备而细致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达到了封建制时代大运河漕运管理立法的最高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取决于清廷将漕运提升到“国之政”的战略高度。因而无论是清朝帝王，还是朝廷重臣，抑或专家学者，对于大运河漕运管理，无不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清王朝才会高度重视运河漕运管理立法，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运河漕运的畅通性、可持续性与安全保障性。清代的漕运管理法律对当代大运河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12]

王青芝、途慧娟围绕《刑案汇览三编》研究了清代未成年人的罪与罚问题。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依据，梳理出清代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概貌，分析清代未成年人犯罪及其定罪量刑，总结经验教训。清代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依据

案情有杀伤人、偷盗、犯奸等，依据犯罪的主观意识又有主观故意、过失、缘坐等类型。细研这些案例，可知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教育医疗水平低下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因。清代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继承了传统，尊重人的生理、心理的发育规律，体现了“恤幼”精神，清代法律在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前提下，也体现了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规律的一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清代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按年龄分为三个阶段，不同年龄阶段的定罪量刑存在差异。这些客观的案例都说明清代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更多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保护统治者手中的权力，而不是用来保护个人权益。在威胁到社会统治秩序、君主安危、纲常伦理的重大案件中，即使是没有参与犯罪的无辜的未成年人也被处以极刑。在司法程序方面，体现了清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罪犯定罪量刑的灵活性。清代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也表现出了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其审判过程充斥着审慎和武断的矛盾。^[13]

王雪峰对中国古代的狱神庙及其功能进行了研究。狱神庙在文化史上一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戏曲、笔记小说和话本中多有相关信息。从监狱文化的视角来看，狱神庙的出现时间、祭祀对象及其功能都是理解监狱背后文化问题的重要线索。根据文献记载，狱神庙大致出现于东汉，至民国渐趋湮没。狱神庙供奉的神祇主要有皋陶、萧何、阿世图等，清代出现了狱神泛化的倾向。狱神庙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心理需求。囚犯在此祈求神灵护佑，狱吏狱卒通过这一处所敛财，官方通过它恐吓震慑囚犯、警示狱吏狱卒。狱神庙对不同心态囚犯发挥的功能带有整合性特征，这种整合性功能就体现于对他们的教化和规训。另外，狱神庙还时常充当监狱中的“优待室”。探讨狱神庙香火绵延千年、不绝如缕的原因，有助于中国监狱文化研究的深化。^[14]

张倩、黄康轩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的管理体制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借鉴意义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的创立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监所制度上的一次创举。自1932年2月19日，在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会中，梁柏台提议创办劳动感化

院，之后劳动感化院便在革命根据地开始建设。同年6月颁布法律明确县省两级裁判部须设立劳动感化院，8月颁布了《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制度立法，自此，劳动感化院的设立与具体运转有了法律上的保障。作者考察了劳动感化院的管理体制，劳动感化院的组织架构，劳动感化院的管理制度，包括收押与看押制度、日常管理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劳动感化院虽然对后世监狱制度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还不够系统，部分史实仍存在争议。对劳动感化院的创办与运行进行深入考察，可以明辨史实，以史鉴今，完善监狱制度。在法律层面推进《监狱法》的完善，我国《监狱法》在修改完善过程中可以借鉴《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的做法，加强对于“监狱本身”的立法。在制度层面巩固完善监狱体制改革成果。^[15]

胡文宇论述了小河滋次郎的监狱学理论及其对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影响。认为在我国近代监狱改良过程中，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先生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小河滋次郎的监狱学理论在我国近代监狱改良过程中的指导和应用，如小河滋次郎对监狱户外劳动规则的丰富完善以及社会救助问题提出了建议，同时提倡将对罪犯的教育和感化作为监狱法律的基本精神，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感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应当对正在服长期徒刑的罪犯，给予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等人道主义层面的基本保障，这将有利于罪犯身心健康的发展。针对相对封闭的监狱管理模式，他建议对身心健康的罪犯通过劳动的形式进行改造，这样可以扩大罪犯的活动范围，增加他们与外部社会的接触机会，减少与社会脱节的程度。在《大清监狱律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小河滋次郎也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在近代监狱官制改革方面，小河滋次郎提出要建立相应的考试制度、考核制度，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制度；在近代实体监狱的建造上，小河滋次郎也力主参考西方近代监狱，建立分房和杂居模式。其观点对于中国监狱学理论和制度的近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16]

四、法律教学

高国其探索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背景下法学

教学改革的路径。认为大学法学日常课堂教学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当前法学教学存在职业导向性不足、教学资料的考试匹配性差、理论教学内容难以适应职业资格考试要求等问题。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背景下进行法学教学改革，要明确法学教育的职业性导向，强化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衔接；注重教学用教材的多样化，拓宽专业教学资料的来源；丰富法学教学的理论内容，适应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强化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提高法学教学的职业性效果。通过开展教学改革，使法学教育适应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法律职业发展的需要，提高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作者提出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背景下法学教学改革的路径：一是明确法学教育的职业性导向，强化法学教学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衔接；二是注重教学用教材的多样化，拓宽专业教学资料的来源及知识资源；三是丰富法学教学的理论内容，适应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四是强化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提高法学教学的职业性效果。针对当前法学职业教育的不足，要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引导下采取具体举措进行相应的改革，使法学教学更好地适应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检验，促进法学毕业生就业的健康发展，实现法学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良性互动。^[17]

吕庆明、邢楚晨提出了高校法学教育中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观点，认为当前高校法学教育中存在学生主体地位弱化的倾向，这主要是法学教育中流行的“主体—客体”认知模式造成的，其根源在于法学研究中采取的“外在视角”和“旁观者立场”。致使关于法治主体性的研究不足，造成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割裂的倾向，导致依托于法学研究的法学教育实践同样存在忽略学生主体性和“育人”宗旨的偏离。而对学生法治观念的培育也不够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也有待加强。法治是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感性、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实施法学教育应尊重法治自身的规律，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实情。在实施法学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应秉持辩证法的理念原则，从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感性、手段与目的的对立统一入手，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在认识论层面厘清爱国主义和法治精神间的辩证关系，在方法论层面将形式

与内容统一，理性和感性、手段与目的平衡的方法论原则应用于法学教育实践，防范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法治精神培育相割裂的错误倾向。^[18]

孟庆瑜、黄博涵对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进行了思考。提出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完成“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任务的必经之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培养法治人才的重要环节，在教育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近两年的时间里，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成果颇丰，但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理念转变不彻底、忽视对于教师队伍思政能力的培养、课程思政考核标准失能、课堂讲授内容轻视思政元素等问题限制了法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发展。在法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深化思政元素、关注教师思政能力的培养、优化课程思政考核标准、调整课堂讲授内容，是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法学课程思政建设是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法治队伍的德才兼备来源于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德法兼修。这就需要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训练学生过硬的专业能力，强化思政元素与法学专业的有机结合。法学教育天然承载着法学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的双重使命。法学教育以法学专业课程为显性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素养，传授给学生法学专业的思维方式方法，使学生具备严密的法学推理能力和判断力，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的法律人才；以课程思政为隐性教育，着重传授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培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在潜移默化中树立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19]

冯建生等探讨了静态实践教学法对于拓展法学人才培养的意义和路径。根据教育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要求，在法学专业教学中采用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方法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法学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应不断拓展静态实践性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静态实践教学法能克服动态实践教学法在时间、场地和成本费用方面的限制，充分利用课堂现有条件为学生提供实践技能培训，为动态实践教学法提供协助、奠定基础，并和动态实践教学法一起为培养法律职业技能型人才服务，这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培

养是非常有益的。为保证静态实践教学法能够顺利进行，静态实践教学法对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教学中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善于调动学生的思考能力。而学生要具有较为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要积极主动地对待静态实践教学，要树立团体观念、协商合作的意识。为保证该教学活动顺利实施，教师和学生应相互配合、积极主动地全心投入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20]

冯军、郑艳菊以空间理论的视域审视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及优化路径。认为空间对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有着前提式的基础和意义。在空间理论视域下对大学生法治教育进行审视后发现，现有的大学生法治教育模式虽然有着明确的合理性，但却疏离于个体的经验与生活之外，学生的“身体在场”和“心理脱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空间的裂隙，较大地影响了法治教育的实效性。现阶段的法治教育内容更多地偏向于知识性介绍和理论性解读，单向性的知识“漫灌”使学生们所需要的具象化知识在无形中被遮蔽了。在此时空区隔下，大学生法治教育虽然几经变迁却依然呈现出教育效果弱化的趋势。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传递效果的弱化。二是法治运用能力的式微。三是大学生法治情感的疏离。因此，需要借助空间的力量重塑法治教育的时空维度，通过教育资源的空间协同以增强大学生法治教育功能的实效。通过建立项目化运行机制，为法治教育供需双方的空间交汇提供制度保障，鼓励高校法学专业师生、公检法等社会部门面向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开发并设置主题法治教育课程并提供法治教育空间；发挥校园公共空间的隐性教育作用，开展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打造智慧教育系统，实现多重法治教育空间的协同；积极协同校内外育人空间，推动异质性资源空间的良性互动等优化路径，统筹规划家庭、社会、公检法等部门的异质性空间教育资源，破除育人空间的壁垒，实现大学生法治教育空间实践由一元多样到多元立体的转变，以期实现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提升。^[21]

牛竟凡、张凯基于 OBE 导向分析了智慧矫正背景下的社区矫正课程改革。认为基于 OBE 导向的高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是顺应时代发展，

利于高校完善和优化教育机制的一种实践活动。现行社区矫正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模式及教学评估等滞后于新形势下智慧矫正工作的相关要求。因此,基于 OBE 导向的理念,结合智慧矫正背景下的信息化人才需求,探讨如何在高校社区矫正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更好地将社会需要、学校发展、学生受益融会贯通,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结合当前智慧矫正建设背景和学校社区矫正专业的现实情况,从基于 OBE 导向的课程体系设置、课堂教学设计和培养质量评价机制这三个层次,探讨如何开展基于 OBE 导向的社区矫正课程改革,并针对性地提出课程体系框架设计应基于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应基于学生成果导向,专业课堂教学应注重教学模式、教材和实践环节的改革,培养质量评价主体和方式应趋向多元化。社区矫正专业课程设计既要从专业培养目标的角度,完善当前培养目标中与学生实际发展不符的愿景性、期盼性、空想性目标,着眼于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行业实用性和适用性问题,以此来丰富和完善课程体系设置,增加应用性、实训性课程的设置,注重学生相关业务能力的实习、比赛等环节的开展;同时又要以学生为中心的角度考虑课程设计的针对性和受众接受度,进行充分的调研访谈,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求学需求和期望,真正使学生认可课程的专业性、实用性、丰富性和必要性,并以此作为课程设计和开设的关键依据。^[22]

(董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 [1] 夏淑云,刘新凯.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科学的法治思想[J].中国司法,2022(7).
- [2] 王艳宁.晋察冀边区人民民主的历史实践与法治经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3] 靳志玲.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婚姻法治的历史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4] 蔡欣欣,刘勇.晋冀鲁豫边区劳动法治的当代启示[N].

-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5] 尹建兵,李靖.晋冀鲁豫边区土地法制建设及启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6] 骆艳青.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调解制度特点及历史演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7] 刘淑娟.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刑事法治实践及历史传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8] 麻新平.西柏坡时期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9] 董颖.石家庄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9.
- [10] 唐芳.秦汉时期长城区域的法律治理问题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1).
- [11] 崔嘉欣.近代中国监狱罪犯作业功能嬗变——以北京监狱为中心的动态考察[J].中国监狱学刊,2022(1).
- [12] 郭凯峰,牛革平.清代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刍议[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13] 王青芝,途慧娟.清代未成年人的罪与罚——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 [14] 王雪峰.中国古代的狱神庙及其功能,犯罪与改造研究,2022(9).
- [15] 张倩,黄康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研究[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2(4).
- [16] 胡文字.小河滋次郎的监狱学理论及其对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影响[J].中国监狱学刊,2022(4).
- [17] 高国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背景下法学教学改革的路径[J].高教论坛,2022(12).
- [18] 吕庆明,邢楚晨.法学课程思政建设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探析[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年(1).
- [19] 孟庆瑜,黄博涵.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3).
- [20] 冯建生,张皓健,路振国,陈健誉.静态实践教学法拓展于法学人才培养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1).
- [21] 冯军,郑艳菊.空间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22] 牛竟凡,张凯.智慧矫正背景下的社区矫正课程改革探究——基于 OBE 导向的分析[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4).

部门法学研究

肖辉

2022年,河北省法学界在部门法学研究方

面一如既往,重调研、重应用,领域较广、内容

丰富,基础性理论研究也有一定厚度,数量和质量基本延续以往的规模和水平。

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研究围绕宪法实施、公民权利、民族制度、立法制度、监察制度、国籍制度、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但数量有所下降;国家安全研究较为突出,公民权利、立法制度研究保有一定数量,而公民权利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保护层面。行政法研究种类较多,政府建设、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备案、行政监管、公共服务、行政处罚、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移民管理等均有涉猎,与2021年相比较为驳杂,侧重实践领域较多,学科色彩不浓。诉讼(程序)法研究继续围绕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领域展开,民事诉讼研究成果较多,行政诉讼研究成果较少,公益诉讼研究保持一定数量,仲裁制度研究萎缩。民商法方面,民法典专题研究热度虽有所减缓,但仍保有较大规模,包括民事活动、物权、合同、侵权责任、婚姻家庭,内容涵盖民法典大部分领域,主要围绕公民用法展开,重在普及民法典的适用,其学术性研究则集中于居住权制度;其他方面主要涉及物权、侵权责任和知识产权,人身权和合同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商法研究则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刑法研究包括刑法理论、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三个方面,数量比例较为均衡,质量也有一定保证,刑法分则研究的理论性进一步增强,数量尚可。经济法研究内容丰厚,经济立法、企业制度、金融法治、环境法治均有涉及,其中,企业制度成果丰硕,金融法治和环境法治保持既有规模,但相比较而言,专门性的保险法治研究有所增加,而环境法治研究则有所减少;整体看,经济法研究的总体规模继续下降,种类更趋减缩。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延续以往特点,数量、质量适度,但仍待学界关注。军事法研究延续院校职能调整及转型影响,数量下滑,种类减少,边缘化色彩浓郁,模糊性倾向呈现,内容减缩至军事行动、边防及警卫三个领域,但各自的数量相对来说较为均衡。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范围广阔、种类繁多,司法制度继续保持以往势头,规模较大;警务机制研究有所起步,律师制度研究有所关注;监狱制度、社区矫正、犯罪预防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数量众多,其中,社区矫正数量大幅增加,这虽与社区矫正法的实施不无关联,但也体现了学

界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纠纷解决、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继续延续往年热度,数量多、规模大,而其中,社会治理研究更为突出。国际法研究领域,国际公法研究、国际经济法研究、国际私法研究均有涉及;其中,国际公法研究较为可观,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外国法的研究也呈上升趋势。

总体上看,2021年热度较高的民法典专题研究、刑法分则各具体犯罪研究、社会治理研究仍属热门领域,但环境法治研究却是风光难再;监狱制度、社区矫正研究均进入热门板块,司法制度研究延续原有优势,国际公法研究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而2022年度热度最高的除社会治理研究外,社区矫正研究也成功入围。

一、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研究

(一) 宪法实施

徐丹彤、张悦新研究了我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问题,认为警察使用武力是一项重大而特殊的国家公共权力,影响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理应受到宪法的规制,但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问题却被普遍忽视,极少得到关注和研究。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是警察使用武力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具有制约警察武力使用权和保障公民生命权的双重作用。警察使用武力的核心内容应当作为宪法保留事项,由宪法加以规制。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宪法对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作出了直接、明确的规定,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宪法规制警察使用武力的理想模式是:宪法在确认公民生命权并规定保障生命权的同时,将警察使用武力作为保障公民生命权的一项例外情形,并且明确设定使用武力的原则和情形。^[1]

(二) 公民权利

姜野基于由静态到动态的视角,研究了人脸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同意”重构问题,认为人脸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具有内容丰富性、高度敏感性、难以保护性及强社交属性等特征。对人脸识别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使用一旦超越原初个人同意的场景,可能会对信息主体的人格、财产甚至人身安全造成损害,应当对人脸识别信息施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我国当前对于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仍停留在静态的知情

同意阶段,虽然创新性规定了单独同意和同意撤回规则,却难以有效协调人脸识别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意困境。有必要在人脸识别信息保护同意规则构建中引入场景理论,对人脸识别信息收集利用适用动态同意制度,动态配置择入择出机制并保证信息主体知情权,形成兼顾人脸信息保护、流动与利用的动态同意模式。^[2]

王千石就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数据合规管理路径作出探析,认为网络平台处理用户个人信息时违法违规的行为不但侵害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也会给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国家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立法的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亟须构建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数据合规管理模式。企业应充分考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建数据合规团队、完善数据合规流程、提高技术保障水平,对个人信息等数据处理中的法律风险形成预防—监管—应对“三位一体”的数据合规管理制度。^[3]

(三) 民族制度

于春洋立足于比较视野,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将国内不同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塑造成国家民族,确保多元民族认同一体国家,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性来源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族际政治整合。族际政治整合的效果好坏会深刻影响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民族关系与前途命运,迫切需要学界推进族际政治整合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世界各国族际政治整合实践经验的梳理,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问题研究贡献理想的类型分析视角、国别比较的研究方法与民族政治的理论借鉴,为我国族际政治整合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他国镜鉴;同时,还需要梳理近代以来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历程与经验,为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提供来自中国方案的价值与启示。^[4]

(四) 立法制度

李清章、樊文玲、贺小溪就地方立法方法与技术研究的历史借鉴展开研究,认为地方立法权的扩大是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密切相关的,必须加强地方立法方法与技术研究。在这方面,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也必须善于和勇于借鉴我国历史上的立法方

法和立法技巧,切实增强我国地方立法的中国特色和历史遵循。^[5]

孟庆瑜、李汶卓则结合立法工作实际需要,对立法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下,我国立法人才培养问题亟待审思与机制创新。新时代立法工作呈现数量多、领域广、分量重等新特点,各领域对于立法人才的需求愈发旺盛、要求不断提高。立法人才从事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因此在法治人才应然具备的共性素质以外,还应当具备立法工作所要求的特性职业素养。通过综合分析40所目标院校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现实状况,发现多数院校对立法人才需求重视不够,缺乏相应教育教学设计,人才培养亟须改革转向。由于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和立法人才培养之间内在具有协同逻辑与供需逻辑,因此立法人才培养应当遵循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在政治引领机制、要素协同机制、资源共享机制、运行保障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的共同牵引下运行展开。^[6]

(五) 监察制度

牛忠志、李泽君研究了我国监察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监察法律制度,如财产公示制度有助于事前预防公务员及其近亲属的腐败行为,检举人制度通过将高额罚金回报检举人并给予其特殊保护以鼓励检举人的检举行为,监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监察机关“监守自盗”,加重对贪污贿赂罪犯的财产刑以震慑制裁腐败分子等。这些是业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全人类的反腐法律瑰宝,可为我国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监察立法所借鉴,以推进我国监察法治的现代化。^[7]

(六) 国籍制度

吴清翠、王甜、徐宽就我国国籍管理的实务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在跨国人员流动频繁、“大进大出”明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现行国籍管理制度显现出一些不足。在保持单一国籍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专业的国籍管理队伍,不断完善国籍管理法律体系,完善并利用国籍管理信息化平台,统筹协调外交部与公安部职能管理分工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国籍管理实务问题,更有利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8]

(七) 国家安全

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国际背景下,构建

符合我国实际的生物安全法律制度既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国际法治的必然要求。对此,宋阳研究认为,生物安全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价值环节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构建科学、有效的全球生物安全机制是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法治”与“全球治理”两种工具进路无疑是最为可行与有效的方法。我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构建科学、中立、有效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承担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历史使命。^[9]

孟庆瑜、张思茵对流域生态安全的法学逻辑与法治保障展开研究,认为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和深入推进,流域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区域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方面的重要地位已经获得普遍认同。但作为一项跨学科议题,不同学科关于流域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认识仍存在明显分歧,造成了流域生态安全法律保障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法学视野下的流域生态安全强调的是流域法律关系和流域空间法律秩序,其法学内涵是指国家保障人类所处流域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由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衍生性、跨域性特征及其客体属性所决定。实现流域生态安全法治保障目标,需要进一步完善流域立法体系、推动流域法律的生态化变革,以流域法治为载体推动法律的生态安全价值客观化,以流域生态功能保护为核心建构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10]

郭永良就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实践类型及其战略指引作出研究,认为海外利益是兼具国家性、公共性和个体性的复合体,对其开展保护需要综合多种力量资源。根据不同的资源分配逻辑,我国主要采取了自助模式、被动维护模式和主动保护模式三种实践类型。上述实践是为满足我国拓展海外利益所产生的迫切安保需要,在不同阶段演化形成的反应机制,并非战略规划的产品,因而具有先天的经验取向,不足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海外安全面临复杂风险的整体挑战,亟须体系化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实现我国海外利益安全提供了思想指引,其海外利益战略环境观、布局观

和能力观是当下及未来开展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根本遵循。走进世界舞台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11]

二、行政法研究

(一) 政府建设

高艳、肖娜、周其鑫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作出展望,认为“十四五”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结束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开“后门”的隐性膨胀历程,迈入了走“前门”的规范发展阶段。相应地,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也经历了从冷门到热门、从主题分散到核心聚焦的演化历程。回顾“危机后”的研究历程,有利于准确地展望“风险下”的研究趋势。地方政府债务研究是对债务发展现状的关注和回应,债务实践长期处于解决旧问题和出现新问题的循环中导致了研究数量持续处于增长、回落、再增长的往复中。研究主力多为与“债务”主题直接相关的财经类高校学者,研究学科集中于经济、金融、财政等学科;研究主题众多,呈现“嵌套结构”特征,内容聚焦于债务内涵、主体、风险、成因与对策等;研究热点或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或与国家政策高度耦合;研究前沿不断变化,但风险问题贯穿研究始终,各类风险和危机频繁成为不同阶段的前沿问题,隐性债务和金融风险是最新的前沿问题,未来则要加强债务研究的多学科性和融合性。^[12]

(二) 行政主体

高瑞祥以人民警察法修订为视角,研究了人民警察的性质,认为我国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人民警察的性质,是人民警察法修订的重要理论基础。首先,人民警察具有特定的主体性,其与警察及警察机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并不影响人民警察法的“综合法”定位。其次,人民警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之相适应,政治建警方针应然纳入人民警察法的总则之中。再次,人民警察具有双重的职能性,人民警察法应当予以明确,这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3]

余欣朋对我国警衔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进行探究,认为我国警衔制度是1992年参照军衔制度所建立,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很多制度规范已

不符合公安机关发展需要。尤其是随着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相关规定实施以来,现有警衔制度已无法体现各职务职级间的差别。警衔评授工作不受重视、政策解读随意性强、高层次警衔评授局限于现职领导层面、警衔培训针对性不强等矛盾日益突出。对此,需要从增强领导干部业务认识、强化法规建设、警衔工资纳入退休待遇保障、丰富培训内容层次、构建以警龄为标准授衔模式、体现倾斜基层等方面入手,切实完善我国警衔制度。^[14]

(三) 行政行为

徐丹彤、赵桂民、张宽广就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法律保障进行研究,认为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有别于其他法定情形下使用武力,中外法律和国际法对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通常作出了直接和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的阶位较高,大多将应对袭警行为作为警察使用武力的独立情形,甚至置于法定情形的首位,体现了立法者对运用法律手段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高度重视。法律中还设定了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特殊规则,例如警察可以先行使用武力,不经警告直接使用武力,使用更高等级的武力手段,使用一切可行的武力手段,不受比例原则的严格约束,不受使用武力禁则的限制等,这对于保障警察生命权、维护法律秩序和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15]

(四) 行政备案

杨霞研究了行政备案的性质定位与规范进路,认为行政备案作为放松管制理念下的实践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中。由于对其法律性质认识模糊,实践中有些行政备案成为变相的行政许可,不当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在保障国家形态下,行政备案是因国家负有对公民人格尊严和市场秩序维护的保障责任,由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自治活动进行的合规监管,属于行政调查行为。通过要求市场主体告知与国家保障责任相关信息,行政管理部门既能及时掌握市场变化的信息,为政策调整收集信息;也能监督市场主体行为合规,培育良好秩序。由于备案信息掌握在相对人手中,在相对人未尽告知义务时,行政机关不得不借助于强制力获取信息,有鉴于此,行政备案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16]

(五) 行政监管

刘文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演进进行研究,认为高质量“走出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基调经历了由“严格审批”“放松规制”再到“主动作为”的演化;新时代以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特征的中国对外投资政策体系日趋走向成熟。从国内国际环境视角分析,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是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基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关系变化的视角,分析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促进工业化发展与释放工业化产能是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内在宗旨之一,对外投资政策是国内市场化制度改革的线索之一,对外投资政策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阶段,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特征为目标价值的多元化、体系功能的“综合优势”以及原则理念的“两个结合”。^[17]

(六) 公共服务

黄华基于公平视域,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明了保障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重视分配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指导京津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应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物质基础。同时,构建利益共享“一体化”体制格局,加强政府间联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户籍制度等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制度保障;兼顾公平与效率,推行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区域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区域递进发展,探索适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路径。^[18]

(七) 行政处罚

蒋冰晶、马立民对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行政处罚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数字经济正推动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会计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软基础,所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加直接。《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会计改革与发展必须持续强化法治化和数字化“两个支撑”。数字化带来的是精准,法治化意味着明确。借助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优化处罚信息共享机制,是改进财政行政处罚机制的必由之路。^[19]

(八) 交通管理

孟庆瑜、李汶卓对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政策审思与优化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发展绿色交通是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交通强国重大战略决策的全面贯彻实施,中国绿色交通政策密集出台,政策的综合性、适用性获得显著提升。然而,绿色交通政策在日益完善的同时仍然存在权威不足、综合不强、成本效益失衡等问题。中国应当在统一绿色交通政策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明确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政策优化路径,即完善政策规范体系、深化交通运输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成本效益分析机制、完善配套制度保障体系,以科学、完整的绿色交通政策推进绿色交通深入发展。^[20]

范海玉、李汶卓则就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展开研究,认为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骨骼系统,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社会经济要素的交流效率,降低环境资源成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区域公平发展环境现实需要、交通一体化纵深推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深化实施,均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当前,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存在制度保障不充分、体制机制壁垒、投融资机制缺失、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与矛盾。为此,基于适应区域长远发展、依靠创新动能转换、着眼绿色交通社会再生产体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用的目标导向,应当从顶层设计完善、体制壁垒破除、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创新、运输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实现进路。^[21]

(九) 应急管理

郭晖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展开研究,认为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

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22]

(十) 移民管理

王雪姣对我国外籍劳务移民制度的构建展开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在外国人来华务工方面面临着一些困境,即:来华工作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与我国外国人就业制度滞后之间的矛盾,国内劳动力结构性缺失与我国外籍劳务移民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现象愈发严重与国家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梳理分析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劳务移民配额制度、配套制度,提出我国外籍劳务移民制度的构建建议:在遵循国家利益主导性原则、国家主权排他性原则、国家政策引导性原则基础上,通过配额制引进外籍劳务移民,科学合理设计签证制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通过合作增强国际协调性等。^[23]

马振超、戴成对雄安新区国际技术移民人社服务管理创新作出研究,认为雄安新区国际技术移民人社服务管理创新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开展国际人才服务管理改革探索、激发国际人才创新活力和积极性等具有重要意义。雄安新区国际技术移民人社服务管理的创新定位、思路和措施存在一些不足,应遵循科学化、国际化、特色化、规范化和智能化的定位,创新国际技术移民人社服务管理的体系、模式和机制,并通过设立免签制度、制定平台政策、建立服务管理中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加强社会保险协议谈判等措施,推动雄安新区国际技术移民人社服务管

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24]

三、诉讼法研究

(一) 民事诉讼

张亮、黄茂醒对我国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的体系性应对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随着审级职能改革的深入,民事审判重心下沉至基层法院已成定局,与之而来的是案件审理周期长期化、当事人诉讼解纷成本高昂化、一审民事案件上诉常态化、司法关系进一步“行政化”、案件“终审不终”普通化等问题。为避免诸多负面效应的出现和加剧,宜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一是完善民事审限制度,杜绝“隐性超审限”现象,确保案件及时审结;二是优化非诉解纷机制与民事诉讼的衔接,彻底激发多元解纷机制的卓越性;三是对审前准备程序予以系统完善,充实案件审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案件上诉率;四是限制当事人撤诉权的滥用,降低被告和法院的诉讼负担;五是构建实质性的双向制约机制,实现上下级法院间司法的真正独立。^[25]

张亮还以重复起诉禁止的边界为视角,就民事诉讼上诉审反诉机制的现状与建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民诉法解释第326条的规定为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反诉提供了法律依据。该规定本身不但存在利益保护不平等和程序割裂等弊端,而且由于反诉与重复起诉禁止存在一定的交叉,导致在二审中如被告不提出反诉则将失去司法保护的權利。法学界对该规定存在较大争议,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也较少援用。建构规范、包容、开放的二审反诉制度妥当的做法是将当事人的诉讼协力义务与法院的释明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辅以完善的证据交换机制。^[26]

王晓娟则对既判力抗辩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进行了区分,认为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既判力制度,民诉法解释第247条将既判力抗辩纳入了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但是既判力和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含义不同、作用和效力根据亦不同,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效力根据是诉讼系属效力。诉讼系属效力与既判力虽有联系,但也存在诸多区别。将既判力抗辩纳入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不仅不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惯例,而且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将既判力抗辩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相区分。^[27]

王金瓯、郭雪慧、郭雅洁对检察机关提升民事虚假诉讼监督质效进行研究,认为虚假诉讼侵害司法秩序,损害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打击虚假诉讼、维护司法秩序的重要职责,但受到线索发现渠道不畅、调查核实运用不足、内外部协作不力等因素影响,监督实效不佳。因此,有必要加大检察监督力度,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对虚假诉讼案件的监督质效。^[28]

失信惩戒是民事执行制度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但也应重视对失信惩戒对象的权利保护。对此,刘广明、陈易佳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考察对象,对失信惩戒对象权利保护的缘由、文本及其路径完善作出研究,认为基于失信惩戒实施目的和运行架构的分析,应当对失信惩戒对象的权利予以应有保护。从立法实践来看,已有省级地方立法不仅将失信惩戒对象权利保护确立为立法目的之一并作专章规定,而且对知情权、异议权、修复权等核心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同时存在权利保障措施粗陋、权利救济途径缺失、责任约束机制羸弱等问题。为有效保护失信惩戒对象权利,应当完善失信惩戒对象权利保障机制、健全失信惩戒对象权利救济机制、强化失信惩戒实施责任约束机制。^[29]

(二) 刑事诉讼

陈玉忠、胡子君研究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去”与“留”问题,认为探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的去与留,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价值分析和对法律文本的梳理与正确解读,更需要司法实践中有效数据的支持和深入的实证分析。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或对上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不仅会使认罪认罚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雪上加霜,而且也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进而危及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相关实证数据表明,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保留上诉权并未明显造成诉讼效率的减损;同时,保留上诉权还有助于通过落实量刑协商、精准量刑、繁简分流、保障机制的健全等,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统一。^[30]

仲崇玲、夏伟琦就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侦查中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软暴力犯罪虽然不

是一个具体的罪名，但是作为一种犯罪手段，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比较突出。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案件具有案件线索有限性，涉案证据分散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共同造成了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案件的侦查较为复杂和困难。为此，应当着重从案件定性、证据的需求、证据的收集等方面，对当下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案件侦查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并从完善法律规定、准确划分犯罪行为、广辟线索来源、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等方面入手，探寻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31]

（三）行政诉讼

高景芳、王静静对学位授予纠纷中纪律处分的司法审查展开研究，认为纪律处分原本属于高校内部日常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但对于学位授予纠纷中的纪律处分，人民法院无法完全避开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有的案件径自对纪律处分进行了事实上的审查；有的案件则借“证据”的名义对纪律处分进行了审查。对学位纠纷中纪律处分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是否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是否与学位授予不当联结；是否合乎比例原则；是否穷尽了校内外申诉程序。对学位纠纷中纪律处分的司法审查，难以回避的疑难问题包括：纪律处分本身的可诉性；被忽略的权利救济时效。^[32]

（四）公益诉讼

梁平、潘帅基于制度本质回归的视角，审视了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问题，认为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33]

孟穗、柯阳友研究了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问题，认为我国《民法典》第 1232 条关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否适用于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理论与实务争议的焦点之一。目前，司法

实践已通过裁判方式支持了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依然难以消解其在理论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正当性是制度建构的基石。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论证从三个维度进行：在经验维度上，惩罚性赔偿具有民法典、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认同性；在功能维度上，惩罚性赔偿具有赔偿、制裁和威慑功能的综合性；在理论维度上，惩罚性赔偿在检察权、环境权和诉的利益理论层面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34]

四、民法研究

（一）民法典专题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同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只有走入生活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只有当每个公民都能够运用《民法典》来规制自身民事行为时，《民法典》的价值与作用才真正体现。为此，扈春海结合相关案例，系统梳理了民法的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的基本类型、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行为、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公民了解民事权利及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提供有效帮助；^[35]张明梳理了物权通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等相关法律规范，为公民了解、理解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所有权制度及百姓身边的财产权法律问题提供权威参考；^[36]伦海波梳理了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转让、终止、违约责任等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公民了解和理解合同法原理与规则、运用合同法规范维护自己的权利、解决合同纠纷提供支持；^[37]司景辉、陈胜梳理了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产品责任等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公民了解侵权责任法律问题明晰依据；^[38]高志明梳理了结婚、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离婚、收养、亲属关系、继承等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公民了解、理解婚姻家庭法律问题指明方向。^[39]

陈佳、李佳清则结合《民法典》，研究了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认为居住权作为民法典中一项新增的用益物权，实现了房屋居住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对实现物尽其用的价

值追求以及解决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居住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规定较为粗略,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中,其实践性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于居住权证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与所有权和抵押权冲突的问题,在借鉴域外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完善合同内容,明确居住权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冲突解决规则,平衡权利冲突。^[40]

(二) 物权制度

徐超、王肖楠在2021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三权分置”下承包地抵押及其登记的法律逻辑,认为为破解新形势下承包地流转和利用的困境,中央提出“三权分置”政策,但由于土地改革的渐进性和现实中各地区的差异性,承包地的抵押及其登记制度存在理论与制度上的困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入推进。鉴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经验,应当从“三权分置”的现实需求出发,将“三权”置于土地经营法律关系运行中加以分析,厘清土地经营权抵押及登记的法律框架,切实解决承包地流转和利用的难题。^[41]

(三) 侵权责任

刘轶通过法经济分析,对人机共驾事故的侵权责任与保险制度展开研究,认为作为人工智能落地的重点领域,自动驾驶技术未来将大幅减少交通事故,降低保险赔付。但自动驾驶汽车难以快速跨越人机共驾阶段,实现完全无人驾驶。机动车事故侵权损害赔偿与保险赔付具有显著协同效应,人机共驾汽车事故的侵权责任分配影响着未来交通事故的保险应对,而互动良好的事故保险可以强化侵权法效力,降低人机共驾汽车事故侵权责任不确定性。法经济分析具有独特的责任和风险视角,把人机共驾汽车事故成本细化为直接成本、风险分散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为实现驾驶人、生产人和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提供工具借鉴。针对人机共驾汽车事故,应该以事故成本为目标调整归责原则、以过错为界限定位侵权法与交强险的功能,并利用无过错保险调整交强险。^[42]

(四) 知识产权

肖辉研究了特色小镇建设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及对策,认为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特色小镇的特色要求本身就

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强烈的趋同和渴望,因此构成特色小镇的立身和发展之本。对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的界定和梳理,需要区分以知识产权为主题的特色小镇与其他非以知识产权为主题的特色小镇两种情形。前者承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特色小镇战略双重职能,内含或定位产业特点以区分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型,确保知识产权的有效转移、承接及集聚,推进国际化发展;后者则涵盖各类主题及类型的特色小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而更具普遍性。特色小镇知识产权是一个集合体,蕴含的知识产权类别及形态可能存在交叉和重叠,知识产权因素与非知识产权因素相互叠加,故甄别起来存在一定难度,难以穷尽,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而加强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既要有氛围上的营造,也要有机制上的构建,更要有法律上的保障,需要营造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建立相对独立、统一运行的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则体系和法律保护机制。^[43]

夏妍就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种子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展开研究,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种植规模居于世界首位,近年来种业市场规模庞大,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发展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种子市场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亟需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监管。世界各主要国家农业种业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大,而中国种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农业种子发展和整体实力都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对比国外种业相关政策,中国农业种子市场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为种子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基础。^[44]

宋慧献、田丽艳从单方允诺著作权许可入手,研究了开放性自愿授权与限制机制,认为开放著作权是著作权保护不断强化过程中的一种“逆向性”理念。开放软件、创作共享已取得广泛影响。作为著作权法基本框架下的变通机制,单方允诺许可有助于构建灵活多样的著作权交易机制。单方允诺之债的效力得到民法学界普遍认可。单方允诺著作权许可是自愿许可,不同于法定的强制性付酬许可;著作权人一旦发出单方允

诺,就具有法律效力。国外著作权纠纷判例已明确支持这种单方允诺的有效性。著作权法可明确承认单方允诺模式的法律效力,既便于著作权行使,也可保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并达到促进交易效率、维护交易秩序之目的。^[45]

(五) 商法研究

赵德勇、Li Xing 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适用与完善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在权利主体、行使条件、行使期限、行使后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完善空间。未来《公司法》修订应当将权利主体限缩为异议股东,即曾经行使同意权的股东不再享有优先购买权,同时将公司以及公司指定的人纳入主体范围。行使条件应当尽量予以简化,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宜根据情况区分处理,具体长度也应做类型化处理,行使效果应强化物权效力,以保护权利人利益。^[46]

赵德勇、张顺凯还对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决策机构进行了研究,认为营利性民办学校决策机构有理事会、董事会等多种形式,在学校经营管理领域享有完全决策权。对外而言,公司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权益保障优先级不同,公司权力机关和学校决策机构的差异集中体现在职权内容、人员组成及议事机制方面。对内而言,学校决策机构与举办者的权力来源不同,法律适用同样存在差异。基于此,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厘清决策机构职权定位,优化学校监督和退出机制,突出教育公益属性,实现决策机构规范、透明和民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实现国家教育事业有序发展贡献力量。^[47]

赵树文对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主导公司资本分配规制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清偿能力测试标准是一个与资本维持原则相对称的概念,其旨在以公司满足对其到期债务的清偿能力作为公司资本分配的先决条件。“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清偿能力测试”与“资本充足率测试”构成该标准嵌入公司资本规制体系的三种具体模式,各种模式关注重心明显有别,但又存在紧密关联。该标准的建构从多维路径优化对公司资本的分配规制,包括规制理念的修正、规制目标的拓展、规制方式的改变、规制程序的转换以及规制缝隙的填补。鉴于我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的未来发展,

有必要对该标准进行借鉴,建构综合性清偿能力测试模式,同时还应拓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完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以及发展商事估值技术制度,以构建完备的清偿能力测试标准制度体系。^[48]

赵树文还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系统论视阈下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修正及其制度实现作出研究,认为范式转换意味着研究方法的系统性革新,对研究目标的实现具有突破性指引。比较而言,系统论范式不仅继承了资本信用范式与资产信用范式的核心特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整体性、层次性、协同性以及开放性突破,避免了公司资本规制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因此,应确立系统论范式在公司资本规制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指引,沿着公司设立阶段资本形成规制、经营阶段资本流转规制以及破产阶段资本退出规制,为我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改革的系统化推进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49]

王思琪、聂田田研究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合理性及其改进问题,认为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规定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我国也紧随其后制定了该制度,以平衡票据权利时效到期或者权利失效时,在票据权利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差距。虽然我国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但是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应当给予该制度一个明确的定性,将其定义为票据法上的特别权利。为了制度的统一和完善,我国还应当在原本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明确该制度的适用条件、重新择取请求对象的范围、明晰该制度的时效问题,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50]

五、刑法研究

(一) 刑法理论

于鸿晓、牛忠志就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当代刑事法治的建构展开研究,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立场为要旨,引领法治建设各环节表达对人民的充分尊重。在推动法治建设重心由依法而治到良法善治,由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由秩序本位向和谐秩序的嬗变过程中,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也发生相应调整。在理念维度,根据人民现实需求逐步树立以预防型立法、裁量型司法、宽缓型治理为价值取向的刑事法治理念;在

实践维度,通过积极修正与增设规范以回应人民社会关切、稳步推进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公正诉求、塑造和谐犯罪治理模式以实现人民自由憧憬。最终破解刑事法治建设制约瓶颈,推动刑事法治建设达到时代新高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治新格局。^[51]

牛忠志还研究了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问题,认为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我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52]

张元鹏、田艳会、高崧对刑事合规研究的进展及展望作出梳理,认为目前关于刑事合规在我国学界及实务界俨然已是热门话题,实践中主要以检察院为主导开展试点,呈现单一性特点。理论层面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角度覆盖特点。未来我国必然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合规制度,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共同推进,使实体法与程序法形成呼应,并进一步加大实践当中的合规试点实施力度,推动刑事合规制度的体系构建。^[53]

韩玫对新时代刑法学教学改革的路径展开分析,认为刑法学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刑法学教学改革是法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一环。当前刑法学教学中,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应当对刑法学教学现状加以反思,针对刑法学教学中对思政元素的融合和运用不足、对学生实践能力等的综合培养不足、对学

科间的融会贯通不足、对社会和学生的需求考虑不足等问题,本着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技术为辅助的原则,优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改革教学内容,贴近实际情况;创新教学评价,实现教学相长,以此推动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有效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培养优秀的复合型法治人才。^[54]

(二) 刑法总则

苏永生就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展开研究,认为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既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张,也是我国司法实务界的惯常做法。支撑将前科作为从重处罚情节的基本观念是,前科增大了再犯可能性和初犯可能性。然而,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既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使得量刑活动建立在假设和司法拟制之上,并且不符合量刑基准和量刑思考方式,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立法不协调。必须将前科作为从重处罚情节类型化与法定化,将与本次犯罪属于同一类(种)犯罪的前科作为本次犯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并在刑法分则中予以规定,以此弥补累犯制度的不足。^[55]

李天发对终身监禁制度作出研究,认为终身监禁制度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但是我国却是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才开始建立和适用。作为一种新的刑罚制度,我国的终身监禁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无论是司法适用还是立法规划,很多方面亟须规范和完善。对此,应当从终身监禁的概念、特征入手,详细把握立法、司法和执行等三层意义上终身监禁的含义,并对它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对外终身监禁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和廓清。了解对外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情况、实际执行情况和立法情况,针对当前我国终身监禁在司法适用、具体执行和立法规范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分别加以修改,切实完善我国的终身监禁制度。^[56]

赵亮则研究了中国的减刑制度,认为减刑制度是指被宣告自由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因具备法律规定的良好表现,由执行机关提请,经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裁定,缩短原宣告刑的变更刑罚执行的制度。我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规范均对其有明确规

定,充分展示了我国减刑制度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发展历程,从特殊预防论、一般预防论与报应论的角度,全面、深入挖掘减刑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为此,了解减刑制度的现状以及减刑制度和减刑限制的理论基础,准确把握减刑制度中的司法与行刑关系,对我国减刑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57]

(三) 刑法分则

牛忠志、王顺安从刑事法学角度对《反有组织犯罪法》进行了研究,认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验而制定的关于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专项法律。该法既有实体规定又有程序规定,既有行政法规范又有附属刑法和特别刑事诉讼法规范,因而是一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综合法”,而不是单行刑事法。对该法中具有实质意义的附属刑事法规范的理解与适用,需要从刑事法学视角加以分析,以确保其受国家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引和当代刑法理念的约束,并使该法有机地融入我国刑事法秩序的统一体中。^[58]

牛忠志、李泽君还就非法使用兴奋剂参赛罪的设立提出了建议,认为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虽为规制体育赛场上滥用兴奋剂行为而增设了妨碍兴奋剂管理罪,弥补了法律漏洞,但仍未将运动员非法使用兴奋剂参赛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范围之内。运动员非法使用兴奋剂参赛行为不属于自损行为,其妨害体育公平竞争,玷污体育精神,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及刑罚制裁的必要性。同时,帮助行为正犯化中需对正犯科刑等理论都证成该行为应当入刑。故建议设置独立的非法使用兴奋剂参赛罪,将其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可表述为:运动员故意非法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妨害体育公平竞争,玷污体育精神,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59]

敦宁、任学婧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因果关系作了研究,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该罪的实行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在刑法学中,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其以一般生活经验和科学证据法则为判断基础,目的是寻求一种可以证实的、确定性的因果关联。由于传染病的传播

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实现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极其困难。为化解司法困境、实现合理规制,可以在该罪的因果关系判断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即运用统计学概率论原理和流行病学法则来认定因果关系。其基本的判断逻辑为:第一步,确定行为和结果的时序性;第二步,确定行为场所、活动轨迹和接触史的重合性;第三步,确定因果关系的合规理性。在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实现司法判断的规范化和精细化。^[60]

任学婧、敦宁还就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进行探究,认为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该罪的有效适用面临一系列亟须解决的解释论问题。本罪的保护法益不是国家对外来物种的管理制度,而应当是生态利益。“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生物安全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不法行为方式包括引进、释放、丢弃,行为对象是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性质是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客观要素,而不包括主观的责任要素和其他与犯罪行为无关的人身危险性要素,从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次数、种类、地点、造成损失的数额、引起传染病的传播这些方面认定“情节严重”。^[61]

任学婧另又研究了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目的与边界,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单独入罪,严密惩治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直接目的是维护药品管理秩序,而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明确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四种行为类型,是界定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范围的前提和基础。运用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借助专业的司法鉴定,合理解释“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含义,以厘清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边界。^[62]

尹彦品、韩啸立足于现代法治视域,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展开思考,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作为法律拟制的抽象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纳入刑法规制视野,对这一类型的犯罪化处遇契合了我国当前风险治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刑法在公共安全领域法益保护前置化的立法目的,提升了民众安全感。应在立法、司法实

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刑法谦抑原则,构建多元处遇、防控结合的一体化治理模式,实现醉驾治理最优化。^[63]

尹彦品、王艳荣还就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回顾与完善进行讨论,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只要是符合制造法益侵害危险的类型化行为,即为可罚。对醉酒驾车这一类型的犯罪化处遇,实现了法益更为周延的保护,有效发挥了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作用,提升了民众的安全感。但现行立法对抽象危险犯扩张带来的处罚早期化、严格化和扩大化则需要进行反思。为提升醉驾治理的司法智慧,实现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在醉驾入刑十年后进行回顾,并对司法现状进行实证考量的基础上,主张建立醉驾案件立体动态模式,对情节轻微的醉驾人附条件不起诉,允许个案进行反证,建立与轻罪相配套的刑罚处罚方法,建立易科罚金制度,增加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完善行刑衔接,搭建多维治理平台,以实现醉驾治理的一体化防控。^[64]

六、经济法研究

(一) 经济法立法

孟庆瑜、刘婷婷就法典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法的立法回望与发展前瞻进行研究,认为《民法典》的颁行开启了中国法典化的新征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立法历经初创、深化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立法聚焦领域不同,所呈现的立法特点亦是各异。全面审视中国经济法的立法实践,经济法立法不能有效因应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经济法学研究不能为经济法立法提供充分理论支撑,加之经济法立法的自身局限,经济法立法乃至经济法法典化依然遭遇阻滞。聚焦经济法法典化目标,吸收借鉴《民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经济法立法的目标定位和未来走向是:将法典化作为长期奋斗目标,抓住法典化带来的体系化契机,通过强化理论共识、夯实实践基础、厘定相关关系等,切实增强经济法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65]

(二) 企业制度

赵树文对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准入权立法保护的检视与重构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对市场平等准

入权的立法保护是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点,其内在逻辑源于市场平等准入权在民营企业经济权利体系中的高级位阶即核心序位,外在动因源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竞争政策贯彻、国有企业治理以及营商环境塑造等多元化需求。当前我国对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准入权的立法保护呈多元化情形,具体可划分为宣示性保护模式、抽象性保护模式、竞争性保护模式、行政性保护模式以及清单性保护模式等五种类型。上述多元化立法保护模式对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准入权提供了多层级的制度支撑,但是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包括专门法律制度缺失、主体实施法规位阶较低、制度体系建构欠缺、民营企业参与程度不足以及配套关联立法发展迟缓等等。因此,有必要沿着立法模式的改进、立法位阶的提升、立法内容的拓补、立法程序的优化以及立法保障的升级等路径,推进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准入权立法保护的重构。^[66]

米萍、刘东涛对农村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与法治保障进行探析,认为市场格局的不断变化,导致市场经济复杂多样,给农村中小企业带来较大挑战。资金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但不稳定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小企业融资的结果。由于多种原因,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需要在普惠金融市场环境下解决该类问题,并为此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67]

米萍、刘东涛进一步就现代民营企业在金融视域下的融资困境纾解展开研究,认为秉持金融思维,现代民营企业需有的放矢地盘活资金、扩容资本,继而找寻到效益增长的最适合路径。由此,融资问题演变成金融视角下民营企业所应抓住的核心问题。然而,民营企业在市场领域中相对缺乏融资层面的竞争实力,呈现出明显的融资难现状。在趋利欲求难以正常被满足的情况下,为了纾解融资困境,部分民营企业容易钻入不当融资手段的狭径。这类极端情况是市场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应立足于法律视角,探讨合理转变民营企业融资境况的方法和路径。^[68]

王乃成、李钦培、韩露瑶对民营企业法治保障制度的重要价值及系统化建构进行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以政策导向为主要手段民营企业的法律规制模式带来了立

法层级低下、立法体例混乱等问题，行政权力的膨胀、司法观念的落后等问题制约了民营企业发展。为了持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与国家法治化建设，需要明确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法治化国家的核心内涵以及法治应用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要求。为解决阻碍民营企业良性健康发展的制度障碍问题，需要以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方面为切入点，探索以法治为内核的系统化保障民营企业发展路径。^[69]

庞敏英则就企业合规的监管框架予以了构想，认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是否合规经营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发展。近年来，关于企业合规问题成为比较关注的问题。我国也在多个方面对企业合规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刑事司法领域检察院的合规不起诉制度，行政部门的行政监管制度，企业自设的内部合规部门等，但这些监管手段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因此，需要厘清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形成主次分明、相互衔接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企业合规监管体系。^[70]

（三）金融法治

宋阳、聂田田就金融科技监管的创新向度作出研究，认为科技创新的变革使得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出了以“数据”为核心、以“网络”为平台、以“算法”为驱动的新型商业化模式，推动了金融产业的变革。金融科技作为传统金融需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全新金融服务类型，可以有效减小金融交易成本，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但金融科技自身的一系列特质也给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模式带来了诸如算法与数据的“模型风险”、对法律保护价值的潜在破坏、去中心化交易的系统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唯有转变监管思路、引入新的监管工具、采取新的监管方法，才能有效预防金融科技产生的系统风险，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71]

聂田田、王思琪对新时代下的金融衍生交易及其法律规制进行研究，认为金融衍生交易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新的合同类型，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金融衍生交易与传统的民商法存在较大冲突，尤其是在场外的衍生规则方面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充分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发

展，加大对场内和场外交易的研究，更好地把握金融衍生品。而对金融衍生交易存在的射幸性质，我国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并已产生积极作用，同时注重对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交易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72]

刘广明、刘帅就绿色信贷“政策驱动”模式的检讨与优化展开研究，认为我国绿色信贷模式以“政策驱动”为显著特征，其助力了绿色信贷的快速发展，但仍存在授信管理滞后、正负激励欠缺、外部监督羸弱等突出问题。美国“潜在责任人”制度拓宽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责任形式，于我国绿色信贷模式的优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解决现存问题，应当从绿色信贷授信管理制度完善、正负效应激励机制健全、绿色信贷外部监督强化等方面对绿色信贷“政策驱动”模式予以优化。^[73]

（四）保险法治

刘轶、董敏对区块链赋能下保险欺诈规制的路径优化作出研究，认为保险欺诈逐渐成为金融业顽疾，规制保险欺诈面临信息成本和法律成本障碍。区块链技术形成的代码环境加速保险智能合约落地，打造机器信任，从而提升保险欺诈的违法成本，但区块链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协同法律规范以完成技术使命。同时，技术规制与法律规制的逻辑关系也需要澄清。文章从保险业反欺诈的痛点切入，搭建区块链赋能的理论框架，研判区块链规制与法律规制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保险合约智能化、如实告知代码化和欺诈行为分类化的规制路径。^[74]

刘轶还就智能网联汽车保险的路径规划展开研究，认为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前景广阔，但自动驾驶的事故风险不能忽视。保险作为责任风险分散的有效机制服务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但驾驶智能化对机动车保险体系提出了挑战，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保险制度建设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通过分析智能网联汽车在人机共驾下被保险人内涵的变化、车联网带来的保险利益变化以及驾驶自动化后的保险制度需求，借鉴英国、德国、美国等域外智能汽车保险经验，规划适合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保险创新发展的路径，包括坚持单一承保模型、拓展机动车保险范围、调整机动车保险模式，以期完善机动车保险体系，化解智

能驾驶风险,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战略有效实施。^[75]

(五) 环境法治

高景芳、邸卫佳、张祖增对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法治构造进行研究,认为推进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是我国统筹污染防治与确保“双碳”愿景实现的优选进路。该进路立基于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同根同源的自然科学属性,《大气污染防治法》与《美国清洁空气法》以不同立法体例的形式对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具有可协同规制的内在同一性进行了法律证成。在理论溯源上,成本效益分析理论和整体系统观为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法治进路提供了基本理论面向。循此逻辑,成熟且自洽的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法治构造应从以下三个体系予以形塑,即推动形成既创制新法又优化旧法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规范体系,管理性机制与激励性机制协同发力的法律实施体系,兼具预防和救济双重价值功能的司法保障体系。^[76]

黄锡生、李汶卓从属地治理到统分结合的角度,研究了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的应然进路,认为针对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在属地治理运行体制下基层政府的治理疲态和治理动力不足、流域治理效能大为缩减的现实问题,建立统分结合管理体制既要求科学规范属地治理,又强调建立流域管理机构以实现各主体、各要素在流域空间单元的交流互通,是破解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困境的应然进路。面向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再造,应当从法律定位、法定职责以及与属地政府间关系三个方面搭建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机构雏形,并以明确白洋淀流域省、市、县、乡镇(街道)四级政府的职责分工为出发点,阻断“分锅避责”的责任转嫁路径;还需从法规完善、强化协同、资金保障、信息互通、科学决策五个方面对夯实统分结合管理体制的关键事项加以明确。^[77]

七、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

(一) 劳动法律制度

孟祥林对劳动自由得以可能的路径和方式作了思考,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劳动论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劳动自由成为关注的焦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下因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而出现劳动异化,资本基于既往的资本积累能够控制无产者的命运,表面的劳动自由遮蔽了劳动不自由,无产者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不幸福。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并向社会贡献智慧,劳动幸福需要通过劳动自由和劳动权利两个属性得到展现。因此,只有剔除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彻底改变劳动不自由状态。劳动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劳动者在劳动纪律范围内享受的自由,并在劳动者自身全面发展、自由支配劳动时间、建构科学的激励制度、个人发展完成从“现存”到“现实”的转化等向度得到体现。^[78]

贾玮莉就当前环境下劳动关系的调处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是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依靠劳动力关系的协调机制来保持稳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近些年,党和国家对于劳动关系及其调处机制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需要对当前环境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进行总结,并对当前劳动关系变化中存在的调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劳动关系调节机制不够完善、劳动法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应当通过完善劳动法及其现代化发展和建设的方式,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我国生产关系的稳定发展、社会的和谐建设等奠定良好的基础。^[79]

(二) 社会保障制度

王利军、涂永前研究了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问题,认为灵活就业是对传统劳动关系和劳动法的突破和肢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经济新业态的出现,我国的灵活就业群体不断壮大,他们工作形式多样、用工关系复杂,这使得其社会保障成了一大难题,当前主要存在社会保障水平低、可选择参保险种少、参保率低、断保现象严重等问题。借鉴境外经验,我国可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完善相关法律:实行“个人工作账户”,推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与雇主脱钩,拓宽灵活就业者可参保范围;打破区域壁垒,提升社会保险的可携带性;适当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考虑针对特殊灵活就业群体的特别补助。以制度完善更好地应对我国不断扩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及其社会保障问题,推进劳动

权利的实现,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80]

刘淑娜、柳清瑞对家庭杠杆率的老年健康效应及传导机制作出研究,认为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家庭杠杆率对城乡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避免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差,以家庭杠杆率一期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家庭杠杆率的上升会显著降低老年人口的身心健康水平,在不同类型的负债中,住房负债杠杆率对老年健康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家庭杠杆率对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根据城乡、性别、家庭人口类型以及资产水平的不同,家庭杠杆率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杠杆率上升会显著促进农村老年人延长工作时间并降低医疗支出水平,这是家庭杠杆率影响老年健康的作用机制,但家庭杠杆率并未通过增加吸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对老年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在合理防控家庭杠杆率的过度增长以及降低家庭杠杆率老年健康成本的公共政策选择方面作出正确选择。^[81]

贾志民、任莉媛就职工稳就业的因素和对策展开分析,认为稳就业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处理好职工再就业需求,安排好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增强职工再就业竞争力,才能有效化解职工结构性失业对职工稳就业的影响。当前影响职工稳定就业的因素复杂多元,建议从提高就业质量,完善困难企业和职工的生活保障,创新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的制度保障,引导人才激励和竞争,构建职工稳就业的实践机制等方面综合施治,充分发挥信用治理劳动用工的效能,把影响职工队伍稳定的问题化解在初期,形成职工队伍长期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82]

八、军事法研究

(一) 军事行动

何银以东帝汶维和行动个案为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的条件进行研究,认为管理冲突和建设和平是联合国多层维和行动的两项基本功能,也就是在维持和平的同时,消除冲突根源、建立持久和平。评估维和行动成功与否,主要看维和结束后东道国是否保有稳定的局面以及和平的前景。维和行动的成功有赖于三个条件,即联合国尽责、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以及具备包容性的

建设和平规范;其中,前两者是基础性条件,后者是核心条件。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产生于西方文明实践经验的自由和平所主导,其结果往往建设的是“虚幻的和平”。产生于泛东亚地区中华文明圈实践经验的发展和和平可以弥补自由和平的诸多不足。东帝汶维和行动的成功案例表明,建设持久和平需要借鉴基于各种文明实践经验的和平规范,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地方性知识,需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东道国等各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83]

李炜、刘志勇就维和警务情报源维度构建的基础理论作出研究,认为维和警察行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情报工作的有力支撑,维和警务情报源是维和警察情报工作的基础,加强维和警务情报源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有利于优化维和警察情报全链条工作。基于维度视角,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理论依据,以维和警察情报工作为实践依据,构建由时空、内容与形式维度组成的维和警务情报源三维结构,才能把握维和警务情报源本质结构和内在规律。维和警务情报源维度的构建,为维和警察全面准确利用与开发维和警务情报源提供了新方法,有助于对维和警务情报源系统实施有效控制,更好地为维和行动决策服务。^[84]

(二) 边防管理

刘志勇、范耘铭研究了俄罗斯跨境反恐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认为俄罗斯跨境反恐虽然实践上并不多,但效果上却形成了跨境反恐的一面旗帜,赢得了广泛认可。俄罗斯的跨境反恐是其从国内安全、履行国际反恐责任以及国家利益战略突围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在实践中采取了法律、军事、外交、舆论等多种行动手段,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也体现了其统筹全局、多措并举、重打轻防的特点。我国可借鉴其跨境反恐经验,从战略统筹与创造性介入、法律体系建设、力量体系建设、舆论体系建设等环节入手,探索针对我国海外利益恐怖威胁的应对方法与策略。^[86]

刘铁峰还对《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修正案进行了解读与研究,认为近年来,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深入,内蒙古自治区“五大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战略作用愈加突出,在经济快速发展及对外贸易日益扩大背景下,影响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违法犯罪因素

持续增加,边境管理问题隐患日益凸显。鉴于此,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进行第二次修正并于2020年11月26日起实施。该修正案较好地适应了边境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需要认真学习、研究和思考,以期对相关职能部门更好地开展边境管理工作提供指引。^[87]

王亚宁、孟立君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再边界化问题进行研究,再边界化是通过临时恢复或加强边界管控方式以维护欧盟安全,再边界化是欧盟应对安全威胁的理性反应,再边界化与去边界化虽然在表象上看似矛盾,但在本质上却辩证统一于欧盟的安全发展。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再边界化问题,有助于为我国边防管理有效应对安全威胁找寻国际借鉴。^[88]

王亚宁、边振辉还具体研究了欧盟内部再边界化与抗疫方式的关系,认为欧盟的正常运行以成员国间的去边界化为前提,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却迫使欧盟开启再边界化实践。从抗疫与欧盟内部再边界化关系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欧盟内部再边界化方式主要有恢复欧盟成员国间的边界管控,在欧盟内限制人员流动,在欧盟内部署警察、军队等安全力量维持防疫秩序以及广泛使用防疫通行证。^[89]

马振超则基于对广西靖西市的田野调查,同时基于亚文化视角,对中越边境地区吸毒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吸毒不仅使边境部分地区毒品泛滥,而且也容易造成吸毒人员妻离子散、家庭破裂,严重扰乱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稳定,同时容易引发艾滋病传播等社会问题。中越边境地区的吸毒问题与当地的吸毒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亚文化群体是中越边境地区吸毒问题形成的前提,亚文化认同是中越边境地区吸毒问题形成的基础,亚文化空间是中越边境地区吸毒问题形成的条件。为有效治理中越边境地区吸毒问题,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扶助,筑牢主文化的认同基础,实施有针对性的“文化禁毒”。^[90]

(三) 警卫工作

李全庆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的警卫安全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大国政要是大国竞争战略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的领导者,其人身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略竞争的走向与成败,大国竞争给各国警卫安全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敌对国

家可能运用政治手段、军事手段、派遣间谍、支持恐怖组织等手段威胁他国政要安全。因此,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必须营造“人民警卫”的警卫态势,建设科学的防控体系,营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真正做到以面保点,实现以大环境的安全保证警卫核心安全的最终目标。^[91]

冯跃东立足于反恐斗争背景,对我国警卫安保工作的强化路径进行探析,认为恐怖主义是人类安全和国际合作的公敌,也是警卫安保工作的重要防控客体。正确应对和化解恐怖主义威胁,是警卫安保工作开展的必要条件。在反恐斗争趋于常态化背景下,我国警卫安保工作如何顺利开展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从加强反恐情报机制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构建复合型人才发展模式等方面,探索反恐斗争背景下我国警卫安保工作提升和改革的路径。^[92]

九、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

(一) 司法制度

冯兆蕙、梁平对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问题作出研究,认为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形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93]

王勇研究了人民陪审员改革的价值导向,认为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影响着人民陪审员改革的价值导向,社会公众的观念认知和利益实现也对制度改革提出价值需求。通过考察人民陪审员改革的立法和实践可以发现,强调法官和陪审员角色分工与协作、强化法官职权对陪审程序干预、回应现实司法需求、制度功能设计趋于分化是改革的价值导向。对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暴露出难题的化解以及未来人民陪审员制的发展均应围绕改革的价值导向稳步有序推进。^[94]

王勇还研究了人民陪审员改革的实践困境与

出路,认为人民陪审员改革实施中暴露出陪审员选任呈泛民主化、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区分模糊、制度功能发生异化以及陪审员参审欠缺程序保障的问题。对这些实践难题应围绕制度改革的价值导向,经由优化陪审员选任程序、明确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区分规则、合理厘定陪审案件适用范围以及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程序保障机制的路径来消解。^[95]

蒋若薇则研究了人民调解员培训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建设,认为高质量的调解工作,需要一支高质量的调解队伍,而培训是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重要途径。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民调解员培训。近年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扎实推进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为此,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人民调解员培训体系,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进而提升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推进调解工作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96]

唐晨、贡太雷就“直播+司法拍卖”机制的探索与完善进行研究,认为随着互联网司法治理现代化纵深推进,全国各级法院不断尝试网络司法拍卖。对“直播+司法拍卖”机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记录直播司法拍卖流程环节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主动了解相关参与者的态度,归纳出当前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立法滞后、直播开展难、第三方平台安全性低和相关部门联动不足等。基于此,应当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培养专业人才、自建合法平台、加强部门联动等措施来完善“直播+司法拍卖”机制。^[97]

李进基于对 H 省法院 323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运用展开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运用日益增多。基于此,法官要熟练掌握释法说理的方法,同时,人民法院应当构建重点案件识别、法官教育培养、裁判文书考评激励和问责等工作机制,客观上提升法官识别、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理能力。^[98]

(二) 警务机制

韩国柱、唐勇对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警务合作机制展开研究,认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严重犯罪类型。近年来,随着国际警务合作的不断深化,对于这一类型犯罪的打击力度

逐步增大。这就需要从警务合作机制的角度出发,认清当前我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形势和警务合作机制的现状,梳理当前机制存在的不足,从联合打击、区块链技术、情报共享、反诈宣传及人才共育五个维度,建立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机制的途径。^[99]

魏晨、赵丽娟就社区警务工作及情报融合技术的应用作出研究,认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社区警务工作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打通警务信息流转渠道。情报融合是大数据环境下挖掘社区警务情报价值的重要手段。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应用情报融合技术,可以缓解社区警力不足现状,实现信息去噪、精准打击犯罪,提高情报综合研判能力。在此基础上打造社区警务共同体,推进社区警务信息化决策,构建社区安防感知立体化体系,加强社区网络空间安防力度。^[100]

(三) 律师制度

胡建伟就法治化营商环境视阈下律师参与企业合规管理的价值及功能展开分析,认为随着企业合规不断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能够为企业提供合规服务的律师业务日益引起重视。2021年9月3日,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在第三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峰会上明确指出,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成员应该包括律师。据此,律师在企业合规管理中具有的独特地位愈加凸显。^[101]

(四) 监狱制度

张倩、黄康轩、霍建云基于与联合国《曼德拉规则》的比较,对新时代中国《监狱法》的完善与借鉴进行研究,认为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司法行政改革的纵深推进,法律实施内外部运行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监狱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现行《监狱法》的某些条款已经与监狱发展极不适应,针对《监狱法》修改完善的呼声此起彼伏。《监狱法》的修订应当参考域外规范意蕴,坚持以我国国情为本,立足国际视野,汲取《曼德拉规则》的丰富元素,强化其基本法律的地位,完善监狱法律制度,提升监禁刑制度的执行力。^[102]

包法宝、吴正治对提升监狱人民警察执法行

为规范作出研究,认为近年来,全国监狱系统按照司法部的部署和要求,着力提升监狱执法规范化水平,综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矛盾,确保了监狱安全稳定。从工作实践来看,深入开展监狱规范化执法学习,深化监狱执法规范的科学建设,严格坚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提升监狱人民警察的公信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103]

李雨聪、孙延庆以犯罪的原因、机会为视角,对狱内脱逃犯罪的形成与预防进行研究,认为监狱承担着执行刑罚、改造罪犯的重要职责。罪犯在服刑过程中,在严格监管的重压之下,易产生逃离监管的思想,一旦出现犯罪机会,思想就极有可能转化为实际行为,发生脱逃犯罪。这就需要从实际工作出发,以狱内犯罪的原因及机会为视角,分析狱内脱逃犯罪发生的风险,提出相应的脱逃犯罪的预防策略,为狱内脱逃犯罪的预防提供依据。^[104]

崔嘉欣通过以北京监狱为中心的动态考察,研究了近代中国监狱罪犯作业的功能嬗变,认为近代监狱罪犯作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发挥这两种功能尤其是后一功能,是实现由传统“苦辱刑”向近代教育刑转变的重要标志。被称为近代中国“模范中之模范”的北京监狱罪犯作业功能,经历了从1912年到1922年初步发挥、1923年至1928年双双衰退、1928年至1948年逐步异变为榨取罪犯劳动的嬗变。这种嬗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近代中国监狱罪犯作业和监狱转型走向的缩影。^[105]

王雪峰对监狱文化建设加以研究,认为开展监狱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罪犯改造质量,有利于做好犯罪防治工作。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监狱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也面临诸多问题。立足扎根理论,采用深度访谈法获取经验材料,通过三级编码确定核心范畴。结果显示,人的因素是监狱文化建设的首要影响因素,资金状况和使用制度是制约性客观因素,文化建设偏离监狱中心工作、深度不够、系统性差、特色不鲜明是主要问题。监狱文化建设与所在地区文化水平、监狱领导的文化观念具有一致性,文化建设水平是地区和监狱整体发展水平的反映。监狱文

化建设关键在“人”,文化影响人的精神并体现人的精神,为“改造人”服务是监狱文化建设的最高追求。^[106]

章恩友、翟中东对新文科框架下监狱学学科的回顾、推进与展望展开研究,认为中国监狱学在内部建构、外部建构两个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内部建构而言,学科知识生产渠道单一,未完成核心知识系统的建构与整合。学科外部建构较为封闭,与相关学科、相关学术组织缺乏密切联系。在新文科框架下,监狱学的推进需要以涵盖法学、社会学在内的跨学科知识系统为基础,以应用知识与操作技术为重要支点。跨学科知识系统不仅能够服务支持监狱工作,而且能够服务支持社区矫正工作、强制戒毒工作等司法行政工作,还能服务支持公安工作、检察院法警工作、法院法警工作,服务支持整个刑事执法工作。国家可以考虑整合刑事执法领域内的各学科,推进刑事执法学发展。^[107]

翟中东还就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背景下的监狱行刑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是一个对监狱行刑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规定。随着这一意见的出台,监狱不仅面临举证能力问题,而且面临罪犯激励管理调整问题。在新形势下,监狱需要考虑这些工作:提高举证能力,开发假释罪犯危险评估工具,推进低度监狱、开放监狱探索,开发其他激励措施。^[108]

(五) 社区矫正

任建通、沈福金认为,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进入了崭新阶段。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社区矫正存在社区发展、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矫正资源是开展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并贯穿和保障农村社区矫正运行的全过程。借助矫正资源运转视角,农村社区矫正面临资源供给不足、配置不平衡、良性更新滞后等问题,为此,应大力筹集、整体布局、持续更新农村社区矫正资源。^[109]

翟中东对国外社区矫正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其现状及模式演进作出梳理,认为社区矫正产生于19世纪中期,大体经历了重视“改造”阶段、关注“矫治”阶段、强调重返社会的阶段、重视“惩罚”阶段、关注“社区安全需要”

阶段。当代社区矫正已经成为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从刑罚执行的阴影区走向刑罚执行的中心地带，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社区矫正演进模式可以归纳为：传统模式、个案模式、经纪人模式、监督公正模式、综合模式。^[110]

关于当代西方主流的罪犯矫正目的观，翟中东认为，国外罪犯矫正理论与实践关于罪犯矫正的目的表述不尽一致，但是，根据求同存异原则，可以将罪犯矫正的目的概括为：报应、威慑；改造、矫治；剥夺；帮助罪犯融入社会。报应与威慑是同等意义的目的，而改造与矫治也是同一意义的目的，它们与剥夺、帮助罪犯融入社会共同构成罪犯矫正的多元目的。^[111]

翟中东与孙霞对社区矫正法实施两年来的相关问题展开思考，认为社区矫正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社区矫正法实施两年来的实践看，社区执法（程序性执行）工作受重视程度比较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控关涉社会安全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地位，而矫正关涉社区矫正的最终价值。因此，随着社区矫正工作资源的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积累，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控工作、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需要纳入实质性发展的视野，从观念、制度与技术层面分别进行问题分析与问题解决思考，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发展。^[112]

张凯、张延琦则对社区矫正法的实施效果、实践难题及解决思路作出具体研究，认为社区矫正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法律。自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及社区矫正机构积极落实，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体制机制逐渐健全，机构建设有所突破，社会力量规范参与，矫正措施不断创新，智慧矫正展开应用，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实践中，社区矫正仍面临工作原则贯彻的偏差、工作经费保障的困难、工作机制协调的困难、工作队伍专业的薄弱、社会调查适用的压力以及特殊类型对象的单一化等阻碍，需要社区矫正机构树立科学的社区矫正工作理念；确立分级式的工作经费分担体制，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社区矫正专门机关及相关部门树立一体化、整体化的理念，各司其职，规范执法；社区矫正主管部门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专业人才对口就业；决定

机关、调查部门以及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社会调查制度的运行；社区矫正机构不断深化未成年人等特殊类型矫正对象的制度创新，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113]

杨涵、张凯另以环境矫正为抓手，研究了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认为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监控”与“矫正”这两种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传统范式均为针对“犯罪倾向”设计，对于“机会”的犯罪生成机制关注不够充分。“环境矫正”理论则主张关注犯罪机会以重塑重新犯罪预防理念，评估犯罪机会以明确重新犯罪预防指向，监督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规避、抵制犯罪机会以实现重新犯罪预防标本兼治，有望成为我国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114]

牛竞凡、张凯还研究了社区矫正的课程改革问题，认为基于 OBE 导向的高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是顺应时代发展，利于高校完善和优化教育机制的一种实践活动。结合当前智慧矫正建设背景和学校社区矫正专业的现实情况，需要从基于 OBE 导向的课程体系设置、课堂教学设计和培养质量评价机制这三个层次出发探讨社区矫正课程改革。由此，课程体系框架设计应基于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应基于学生成果导向，专业课堂教学应注重教学模式、教材和实践环节的改革，培养质量评价主体和方式应趋向多元化。^[115]

牛忠志、晋泽禹则就社区矫正法的公法性质及其展开作出研究，认为社区矫正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法治化进程。但缘于成文法的抽象性，立法所表述的社区矫正机构和管教工作人员的管理监督权不够明晰；理论界也存在对社区矫正对象是严管还是放任其自愈之争。社区矫正法是以特殊的四类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改造为目的的法律规范集合体，本应属于公法范畴，故必须以管理和监督作为基底逻辑。该法对于管教工作人员的授权欠明晰，可以通过对法律条文的扩张解释来扩大管教工作人员的管理权和监督权。这种扩张解释既有必要性，又有法律根据和合理性，因而是可行的。^[116]

（六）犯罪预防

杨涵基于对 479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就暴力抗拒疫情防控犯罪的现实样态与预防对策进

行研究,认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也会受到疫情波及。与疫情防控期间犯罪整体数量的下降趋势相背离,暴力抗拒疫情防控等“涉疫犯罪”逆势上升。日常活动理论可作为分析暴力抗拒疫情防控犯罪适宜的理论框架,犯罪人、犯罪目标、犯罪监控者、犯罪时空条件在疫情防控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出新的样态。提供社会支持以抑制犯罪动机、落实被害预防以降低被害概率、强化社区治理以提升监控水平、推进情境预防以瓦解犯罪情境,这些都有助于预防暴力抗拒疫情防控犯罪的发生。^[117]

杨涵还研究了暴力伤医犯罪的情境预防对策,认为现有暴力伤医犯罪预防研究突出刑罚威慑,侧重以医护人员为中心设计预防对策,缺乏情境视角;而情境预防重塑预防理念、明确预防目标、拓展预防主体,为暴力伤医犯罪之预防对策提供了新思路,包括分析暴力伤医犯罪数据以打牢预防基础、强化医护人员职业培训以降低被害概率、运用犯罪情境预防技术以瓦解犯罪情境等。^[118]

李雨聪则对利用虚假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诈骗犯罪及其预防展开研究,认为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学生提升自身能力、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各高校学分认定和评优评奖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其缺乏统一的活动管理及学分测评标准,不法分子经常假借社会热点时事,冒用组织单位名义或虚构组织单位,引诱学生参加虚假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诈骗。因此,有必要研究并把握该类案件的特点、危害及产生原因,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防范此类犯罪发生。^[119]

(七) 纠纷解决

任建通就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展开研究,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

“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120]

为有效解决居高不下的医患纠纷,吴英旗研究了法国医疗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认为自2002年以来,法国通过立法施行了无过失补偿医疗伤害以及法庭外调解机制,建立医患互信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确定医疗纠纷调解条件、补偿范围及补偿内容。该制度因具有医疗鉴定信服度高、审议补偿时间短等优点而能够有效缓解法国医疗纠纷问题。为此应考虑将该制度的有益经验融入我国相关制度下运作,厘清医疗风险责任予以补偿、建立健全医疗风险救济制度、构建完备的多层次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和官方医疗纠纷风险管控平台等举措,以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与补偿机制。^[121]

葛飞扬以陕西省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事处Y村为例,对拆迁安置背景下“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进行了探究,认为在Y村实施拆迁安置工作之后,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传统的社会关系相对疏远,村民的收入多元且有所增加,处事规则开始融入现代城市理念,这也导致Y村的纠纷与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变迁。通过对男女平等观浸润下的纠纷、征地与户口纠纷、养老纠纷、墓地搬迁纠纷等调解情况的调查,发现传统的人民调解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诉讼与调解紧密结合,公共法律服务的积极参与对纠纷的解决有着积极的影响。Y村实施的“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符合村民传统的观念,也融入了当代诉讼制度的权威。^[122]

(八) 社会治理

孟祥林从中心地博弈与空间发展布局出发,研究了城市化进程的小城市战略转向问题,认为大城市战略转向小城市战略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需要通过调整资源布局方式促进城市发展战略的转向。资源空间布局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目标而进行的区位选择,大城市通过职能疏解带动小城市发展,在帕累托改进中完善中心地的空间布局构架,区域经济实现从非均衡布局到均衡布局的转向。小城市是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底层支撑,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中心城市的发展状

态。因行政区划限制、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惯性、交通网络通达程度不高以及城市间过度竞争等问题,小城市与大城市的互动水平较低,不同层次中心地间的协同发展程度不高。小城市是连接中心城市的节点,也是促使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过程中建构微中心的基础,前瞻性地思考小城市发展战略转向中面临的问题与实施对策就非常必要。^[123]

孟祥林还从“聚”与“散”的关系角度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省会城市拓展模式的相关问题,认为省会城市通过兼并近域腹地内的设区市,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在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度。但设区市是一个独立的城市,与省会城市简单拼接并不能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城市体系,城市发展的质量因而受到负面影响。拉美地区城市化的“大跃进”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城市发展模式可以在“摊饼式”或者“飞地型”方式间做出选择。腹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形成“一主+多次”的城市体系发展格局,需要在行政力量干预下保持适度规模,正确处理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聚”与“散”的关系,为省域城市体系的建构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124]

高艳、韩志明从城市治理的图景出发,研究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前景及未来,认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应用,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应用到城市治理中去,推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热潮。借助于强大的数字技术,城市治理穿透多样而繁杂的社会要素,逐步实现了从粗线条清晰到细密度清晰、从局部清晰到整体清晰、从静态清晰到动态清晰、从低度清晰到高度清晰的持续升维,将城市社会的各种要素尽收眼底。但数字化治理也面临着清晰化的限度,具体是数字弱势群体不可识别、基本治理单元间仍有缝隙、部分治理数据的不够充分、城市治理算法还存在黑箱等模糊性问题,整体呈现出清晰与模糊相互交织的状态。持续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平衡清晰化与模糊性的张力,寻找信息技术应用的均衡点,其中既要发掘数字技术的清晰化潜力,也要维持城市要素的适度模糊,使城市治理变得更加轻便、敏捷和智慧。^[125]

窦竹君则站在历史的视角,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进行研究,认为影响传统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包括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几个方面。文化建设形塑国家认同,奠定社会治理文化基础,并以价值观指引、评判社会治理;组织建设重在选任品行高尚有威望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福利凝练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治理共同体;制度建设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进而实现因地、因时、因俗而治;官府为基层治理提供最终保障。这些都对今天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借鉴。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化礼成俗、善恶评判加强道德建设;把好基层组织用人关,大力发展治理微组织,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共同体基础;增强人们的熟悉度,以筑牢基层治理的感情基础;增强村规民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126]

唐芳对秦汉时期长城区域的法律治理问题作出研究,认为从大量出土的居延、敦煌汉简以及其他古籍文献中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不仅大规模的修筑长城,而且在长城周边地区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治理活动。秦汉时期长城周边的法律调控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对内协助惩罚犯罪活动,帮助维持国家的社会治安,对外重点打击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此基础上,秦汉长城区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长城军事行政法律制度、长城烽隧管理律令、长城屯戍法律制度和长城边塞贸易律令,共同成为王朝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27]

杨福忠、姚凤梅就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的维度及风险法律防治展开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具有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提升公共政策的精准度、全方位升级政府治理系统,提升治理效能。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风险,包括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新型社会纠纷、赋能政府治理进程中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技术不完善造成社会公害等。防治人工智能风险,在防治策略上要坚持法律规制与保障并重,在出台规制措施时必须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在防治手段上,要做到软法与硬法同向发力,既要发挥软法的价值引领作用,更要发挥硬法的刚性约束作用;在防治方式上,要强化权力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128]

王子立、黄伊霖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出发,对

德国的禁毒国际合作进行探析,认为近年来,德国活跃在禁毒的国际舞台上,积极对外推广德国毒品战略的理念和方案,致力于与相关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在国际禁毒领域推广以发展、健康和人权为导向的禁毒政策,并推动使之成为新的禁毒国际规范。德国的禁毒国际合作以支持基于规则和信任的多边主义为基本策略,以发展目标推广替代发展方案,以健康为导向推广减少危害方案,以人权为基本要求在合作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诠释了全球治理视角下禁毒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29]

李妍立足于扫黑除恶背景,对套路贷犯罪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套路贷犯罪作为新型黑恶犯罪的一种,从团伙架构、暴力形式、证据特点等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以往黑恶犯罪的新特点,同时在实践中存在犯罪黑数大与案件发现难、犯罪过程隐蔽与证据链组建难等治理难点。这就需要结合套路贷犯罪的新特点和打击难点,从打击力量提升、侦查线索拓展、侦查手段运用等角度综合找出治理对策,并为侦查实践提供指引和帮助。^[130]

徐为霞、孙延庆从社会安全治理的角度,考证了我国罪犯释放的历史,认为罪犯的释放是调节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枢纽,对罪犯释放制度的科学设计和有效落实是社会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对古代罪犯释放中的暂行释放和具保释放,民国时期罪犯释放的出监教育和安全管控,新中国罪犯释放的留场就业和安置帮教等史料的梳理,可以考证出我国罪犯释放的变迁过程,了解历史上罪犯释放中的改造效果、释放方式、出监教育、刑释安置、释后管控等核心内容,进而为完善我国罪犯释放制度提供经验。^[131]

(九) 法治建设

冯军、郑艳菊基于空间理论视域,就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状与优化路径作出研究,认为空间对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有着前提式的基础和意义。在空间理论视域下对大学生法治教育进行审视后发现,现有的大学生法治教育模式虽然有着明确的合理性,但却疏离于个体的经验与生活之外,学生的“身体在”和“心理脱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空间的裂隙,较大地影响了法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上述问题,拟

通过建立项目化运行机制,为法治教育供需双方的空间交汇提供制度保障;发挥校园公共空间的隐性教育作用,开展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打造智慧教育系统,实现多重法治教育空间的协同;积极协同校外育人空间,推动异质性资源空间的良性互动等优化路径,以期实现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有效提升。^[132]

冯兆蕙研究了乡村振兴法治化的时代价值、基本框架与实现机制,认为《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乡村振兴法治化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政策引导型向法治保障型的转变。以该法为中心,推进乡村振兴法治化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该法从规范、内容和治理三个维度确立了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其实施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促进多元规范有效衔接、通过政府推动多元共治以及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制度等,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133]

(十)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尹巧蕊认为数据要素与数据治理构成数权世界的双核驱动,由数字信息科技引领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将当代社会推向以“数据+算法+算力”为新型构架的“数权世界”,作为数权世界发展基础与核心动力的数字经济只有基于被誉为“新时代石油”的数据要素的有益利用才能获得强劲生长的可能。同时,这也必将引发围绕数据要素延展而来的亟待重新调整与创新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甚或风险、矛盾等。因此,保障“数权世界”健康成长的数据治理,不仅属于法治领域的新阵地,更是赋能我国乘势而上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弯道超车”的新机遇,并力求在以平衡“技术之治”与“良法善治”双重治理效能释放的过程中,希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顺利搭载数字科技的战车,从而更快实现大国战略之梦。^[134]

程钰琪就大数据深度服务狱内侦查工作的路径进行研究,认为为了预防狱内犯罪,提高狱内犯罪侦查效率,确保狱内侦查员行动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应使大数据深度服务狱内侦查工作领域。通过数据分析、文献思辨和规范梳理可发现大数据深度服务狱内侦查工作的原因。据此,应

完善监狱可操作性工作细则, 加强人才储备, 提升数据挖掘能力, 进而搭建细致完善的狱内犯罪预防、狱内监控制度体系, 以提高监狱安全性, 维护社会稳定。^[135]

刘校麟、赵慧广、陈蕾基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 对公安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作出研究, 认为公安大数据在新冠疫情防控及公安工作中的实战应用中作用巨大, 但也存在困难和问题。公安大数据应用发展需要政府主导制定建设性规划, 多部门合作实现信息有效整合, 运用云计算、视频技术、数据挖掘等新技术做支撑, 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做保障。公安部门在大数据时代要顺应发展趋势, 让公安大数据驱动决策, 支持警务实战, 服务公安管理, 使公安大数据赋能公安工作取得新突破。^[136]

十、国际法研究

(一) 国际公法

钱江涛就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困境及发展展开研究, 认为国际人道法作为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 在与国际人权法区别的同时, 也同样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在分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所适用的国际法渊源时, 发现往往会因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实践类别而影响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如维和部队的参与以及第三国干预的情形。基于国际人道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产生的具体问题, 一方面, 应发挥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 应完善国际人道法体系中有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个人责任及追诉机制, 以应对现实困境并进一步发展国际人道法。^[137]

宋阳、张开就重塑生物武器关联行为的全球治理进行研究, 认为生物武器的危害时间长、面积效应大, 多具有传染性、隐蔽性强等特点, 致使在研制、储存、使用生物武器的各个阶段都极易引发大规模传染病蔓延, 威胁或损害一国甚至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使用生物武器作战是对国际法的违背, 防御目的不能抵消使用生物武器大规模杀伤对方平民的非人道行为, 因此对研制、储存、使用生物武器等行为进行规制是紧迫且必要的。虽然国际社会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 从而形成了《生物武器公约》, 但该公约的执行困境以及国际机制的失灵促使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路

径以达到禁止生物武器关联行为的目的。务实的做法是重塑生物武器关联行为的全球治理, 将生物武器关联行为定性为危害人类罪, 追究实施者个人责任, 并对其进行国际追诉; 辅之公约、国际机制、执法多面向的治理革新, 从而维护全球生物安全与国际秩序。^[138]

耿亚波、刘志勇对欧洲刑警组织情报信息的共享机制作出研究, 认为情报信息共享是欧洲刑警组织的核心功能, 在推动欧盟成员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欧洲刑警组织依靠坚实的法律基础、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高效运行的情报信息共享机制, 有力地推动了执法安全合作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国开展地区执法安全合作, 可借鉴欧洲刑警组织情报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经验, 进一步筑牢情报信息共享的法律基础, 完善情报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体系, 加快情报信息共享技术的应用进程, 提高情报信息安全管理能力。^[139]

王琳、徐涵就里加周期内欧盟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启示展开研究, 认为欧盟各国于 2015 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共同确定了里加周期 (2015—2020 年) 职业教育与培训 (VET) 改革的五个优先领域 (即里加结论)。欧盟各国根据里加结论分别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法律保障、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合作、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标准、职业教育关键能力、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等五个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 以促进本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 加强欧盟成员国内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合作。借鉴其经验, 应当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学徒制、建立企业参与学徒制的促进机制, 促进多部门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契合度, 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关键能力模型。^[140]

项靖航基于 GTD 数据, 对东南亚地区恐怖袭击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分析, 认为因恐怖袭击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从 2014 年到达顶峰后, 至 2019 年已经连续五年呈下降趋势。虽然各国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 恐怖主义仍在全球蔓延, 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的特征和趋势。在这种背景下, 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增强态势。以 1970—2019 年 GTD 中东南亚地区 14079 次恐怖袭击事件为样本, 选取时空分

布、袭击目标与手段、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恐怖袭击具有宗教极端主义与分离主义交融、区域性聚集与横向联动合作、意图多元化与袭击手段极端化的三大恐怖袭击特征和趋势。中国在反恐怖斗争中应当推行去激进化政策,维护边境安全,加强与东盟反恐合作,维护“一带一路”倡议安全,推进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141]

梁秀波、张弛对美国基于移民政策的单边制裁措施及其反制作出研究,认为随着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制定、调整移民政策作为单边制裁措施限制中国公民海外流动,并与经济制裁、军事挑衅等手段配合使用,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打压。我国应通过建立出入境类反制措施配套法律规定、扩充移民政策反制工具箱、加强移民管理动员能力建设和拓展多边经贸合作等途径予以反制,冲破单边制裁对我国公民海外流动的限制和影响。^[142]

王子立则研究了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逻辑及其启示,认为德国近年来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转变为事实上的移民输入国,其移民法律体系演进艰难,伴随着长久的争议和保守化倾向。这是一个国家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其移民法律体系演进必经的范式。从非移民国家到移民国家,德国在接纳外来移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可分为初设探索、调整推进、转型重塑、完善规范四个阶段。这一历程遵循持续受保守化影响的逐步开放的演进规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演进动力,呈现“拒绝——勉强——积极”的演进趋势。上述逻辑阐释能够为中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如下宏观性的启示:体系构建坚持法治移民建设的基本方向,立法重点以技术移民为优先和主要着力点,主体法律移民法典的出台条件与时机当前尚不成熟。^[143]

(二) 国际经济法

胡海涛就国际经贸规范领域存在的竞争中立原则,并对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治理适用展开研究,认为竞争中立原则发端于澳大利亚防止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的国内改革,藉由 OECD 的系列指引而成为国际上关于国有企业规制的软法体系,美国将其引入国际贸易投资领域,作为其进行贸易战、打压贸易竞争对手、整合其系列

贸易措施的理论支点。经比较研究,国际经贸规范领域存在着澳大利亚、欧盟和美国三种版本的竞争中立原则。澳大利亚版本的竞争中立规则相对中立、公平,和我国国内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存在交集。因此,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版竞争中立原则中的合理因素,打造中国版的竞争中立规则,用以指导我国国内第三轮国有企业改革,并在国际上作为中国话语表达的重要内容。^[144]

(三) 国际私法

宋阳对国际投资仲裁准据法的平衡适用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于准据法的选择大多采用复合模式,带有很强的“战略模糊性”,因此,有必要研究投资争议中国际法与东道国国内法各自的法律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从已有投资仲裁判例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来看,应从利益分配的实体视角出发,在投资协定的框架下追求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最大化。仲裁庭在准据法适用时,应承认和尊重东道国国内法中所体现的公共利益,通过形式判断、实体解构和程序保障三个维度,实现准据法的适用平衡。^[145]

(肖辉: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徐丹彤,张悦新.论我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2(01).
- [2]姜野.由静态到动态:人脸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同意”重构[J].河北法学,2022(08).
- [3]王千石.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数据合规管理路径探析[J].文教资料,2022(06).
- [4]于春洋.比较视野中的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 [5]李清章,樊文玲,贺小溪.地方立法的方法与技术研究之历史借鉴[J].公关世界,2022(06).
- [6]孟庆瑜,李文卓.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下我国立法人才培养的问题审视与机制创新[J].河北法学,2022(10).
- [7]牛忠志,李泽君.论我国监察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J].肇庆学院学报,2022(01).
- [8]吴清翠,王甜,徐宽.浅议我国国籍管理实务问题[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5).
- [9]宋阳.构建生物安全法律机制的全球视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 [10]孟庆瑜,张思茵.论流域生态安全的法学逻辑与法治保障[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06).
- [11]郭永良.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实践类型及其战略指引[J].公安学研究,2022(05).

- [12] 高艳,肖娜,周其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脉络与展望[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03).
- [13] 高瑞祥.论人民警察的性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为视角[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9).
- [14] 余欣朋.我国警衔制度现状及发展探究[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2(05).
- [15] 徐丹彤,赵桂民,张宽广.论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法律保障[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03).
- [16] 杨震.行政备案的性质定位与规范进路[J].浙江学刊,2022(06).
- [17] 刘文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演进[J].上海经济研究,2022(04).
- [18] 黄华.公平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19] 蒋冰晶,马立民.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行政处罚机制探讨[J].财务与会计,2022(15).
- [20] 孟庆瑜,李汶卓.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政策审思与优化[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
- [21] 范海玉,李汶卓.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J].河北学刊,2022(06).
- [22] 郭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J].河北法学,2022(02).
- [23] 王雪姣.我国外籍劳务移民制度构建研究:困境与出路[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3).
- [24] 马振超,戴成.雄安新区国际技术移民人社服务管理创新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5).
- [25] 张亮,黄茂醒.我国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的体系性应对[J].河北法学,2022(07).
- [26] 张亮.民事诉讼上诉审反诉机制之审视与建构——以重复起诉禁止的边界为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22(05).
- [27] 王晓娟.既判力抗辩与禁止重复起诉制度的区分[J].法制博览,2022(15).
- [28] 王金瓯,郭雪慧,郭雅洁.找准发力点提升民事虚假诉讼监督质效[J].人民检察,2022(09).
- [29] 刘广明,陈易佳.失信惩戒对象权利保护:缘由阐释、文本分析与路径完善——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考察对象[J].征信,2022(06).
- [30] 陈玉忠,胡子君.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去”与“留”——基于二审相关数据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2(08).
- [31] 仲崇玲,夏伟琦.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侦查中的法律问题[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5).
- [32] 高景芳,王静静.学位授予纠纷中纪律处分的司法审查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
- [33] 梁平,潘帅.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基于制度本质的回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34] 孟穗,柯阳友.论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J].河北法学,2022(07).
- [35] 扈春海.百姓身边的民法宝典——民事活动篇[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36] 张明.百姓身边的民法宝典——物权篇[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37] 伦海波.百姓身边的民法宝典——合同篇[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38] 司景辉,陈胜.百姓身边的民法宝典——侵权责任篇[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39] 高志明.百姓身边的民法宝典——婚姻家庭篇[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40] 陈佳,李佳清.论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J].邢台学院学报,2022(01).
- [41] 徐超,王肖楠.论“三权分置”下承包地抵押及其登记的法律逻辑[J].农业经济,2022(12).
- [42] 刘轶.人机共驾事故侵权责任与保险制度的法经济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02).
- [43] 肖辉.特色小镇建设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及对策[J].河北学刊,2022(01).
- [44] 夏妍.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种子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研究[J].分子植物育种,2022(02).
- [45] 宋慧献,田丽艳.单方允诺著作权许可:开放性自愿授权与限制机制[J].电子知识产权,2022(04).
- [46] 赵德勇,Li Xing.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适用与完善(英文)[J].China Legal Science.2022(01).
- [47] 赵德勇,张顺凯.营利性民办学校决策机构研究[J].经济论坛,2022(11).
- [48] 赵树文.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主导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解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
- [49] 赵树文.范式转换:系统论视阈下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修正及其制度实现[J].学术论坛,2022(01).
- [50] 王思琪,聂田田.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合理性及其改进[J].河北企业,2022(06).
- [51] 于鸿晓,牛忠志.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当代刑事法治的建构[J].河北法学,2022(03).
- [52] 牛忠志.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J].政治与法律,2022(09).
- [53] 张元鹏,田艳会,高崧.刑事合规研究进展述评及未来展望[J].法制博览,2022(25).
- [54] 韩玫.新时代刑法学教学改革的路径分析[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下旬刊),2022(02).
- [55] 苏永生.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法商研究,2022(05).
- [56] 李天发.终身监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57] 赵亮.中国减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58] 牛忠志,王顺安.从刑事法学角度解析《反有组织犯罪法》[J].山东社会科学,2022(10).

- [59]牛忠志,李泽君.论非法使用兴奋剂参赛罪的设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01).
- [60]敦宁,任学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因果关系判断[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2(02).
- [61]任学婧,敦宁.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探究[J].政法学刊,2022(01).
- [62]任学婧.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刑法规制的目的与边界[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
- [63]尹彦品,韩啸.现代法治视域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后思考[J].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2022(01).
- [64]尹彦品,王艳荣.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回顾与完善刍议[J].河北法学,2022(04).
- [65]孟庆瑜,刘婷婷.法典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法的立法回望与发展前瞻[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
- [66]赵树文.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准入权立法保护的检视与重构[J].甘肃社会科学,2022(05).
- [67]米萍,刘东涛.农村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与法制保障探析[J].法制博览,2022(07).
- [68]米萍,刘东涛.现代民营企业在金融视域下的融资困境纾解[J].法制博览,2022(30).
- [69]王乃成,李钦培,韩路谣.民营企业法治保障制度的重要价值及系统化建构研究[J].法制博览,2022(13).
- [70]庞敏英.企业合规监管框架构想[J].法制博览,2022(20).
- [71]宋阳,聂田田.论金融科技监管的创新向度[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 [72]聂田田,王思琪.论新时代下的金融衍生交易[J].河北企业,2022(07).
- [73]刘广明,刘帅.绿色信贷“政策驱动”模式的检讨与优化[J].潍坊学院学报,2022(04).
- [74]刘轶,董敏.区块链赋能下保险欺诈规制的路径优化[J].江淮论坛,2022(04).
- [75]刘轶.智能网联汽车保险路径规划[J].区域金融研究,2022(09).
- [76]高景芳,邸卫佳,张祖增.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法治构造[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 [77]黄锡生,李汶卓.从属地治理到统分结合——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的应然进路[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06).
- [78]孟祥林.从异化劳动到实践自由:劳动自由得以可能的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79]贾玮莉.当前环境下劳动关系调处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21(35).
- [80]王利军,涂永前.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J].广东社会科学,2022(06).
- [81]刘淑娜,柳清瑞.家庭杠杆率的老年健康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2(03).
- [82]贾志民,任莉媛.职工稳就业因素和对策分析[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3).
- [83]何银.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的条件——以东帝汶维和行动为个案[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03).
- [84]李炜,刘志勇.维和警务情报源维度构建基础理论研究[J].情报杂志,2022(08).
- [86]刘志勇,范耘铭.俄罗斯跨境反恐实践评述及启示[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2).
- [87]刘铁峰.《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修正案解读及启示[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2(02).
- [88]王亚宁,孟立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再边界化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1).
- [89]王亚宁,边振辉.欧盟内部再边界化抗疫方式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11).
- [90]马振超.亚文化视角下中越边境地区吸毒问题研究——基于广西靖西市RZ乡的田野调查[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11).
- [91]李全庆.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警卫安全问题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1).
- [92]冯跃东.反恐斗争背景下我国警卫安保工作强化路径探析[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1).
- [93]冯兆蕙,梁平.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J].法学评论,2022(01).
- [94]王勇.论人民陪审员改革的价值导向[J].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2(01).
- [95]王勇.人民陪审员改革的实践困境与出路[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02).
- [96]蒋若薇.浅议人民调解员培训的常态化规范化建设[J].人民调解,2022(05).
- [97]唐晨,贡太雷.“直播+司法拍卖”机制的探索与完善[J].法制与经济,2022(01).
- [98]李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运用研究——基于H省法院32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J].保定学院学报,2022(06).
- [99]韩国柱,唐勇.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机制研究[J].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22(01).
- [100]魏晨,赵丽娟.社区警务工作中的情报融合技术应用研究[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22(02).
- [101]胡建伟.法治化营商环境视阈下律师参与企业合规管理的价值及功能分析[J].中国司法,2022(03).
- [102]张倩,黄康轩,霍建云.新时代中国《监狱法》的完善与借鉴——基于联合国《曼德拉规则》的比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4).
- [103]包法宝,吴正治.提升监狱人民警察执法行为规范初探[J].中国司法,2022(12).
- [104]李雨聪,孙延庆.狱内脱逃犯罪的形成与预防——以犯罪的原因、机会为视角[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02).
- [105]崔嘉欣.近代中国监狱罪犯作业功能嬗变——以北京

- 监狱为中心的动态考察[J].中国监狱学刊,2022(01).
- [106]王雪峰.监狱文化建设遇到了什么问题?——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探索[J].犯罪研究,2022(06).
- [107]章恩友,翟中东.新文科框架下监狱学学科的回顾、推进与展望[J].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02).
- [108]翟中东.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背景下监狱行刑的思考[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2(03).
- [109]任建通,沈福金.矫正资源运转视角下农村社区矫正的困局与优化路径——基于Z省D镇的个案考察[J].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2022(01).
- [110]翟中东.国外社区矫正的历史回顾、现状及其模式演进[J].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2022(01).
- [111]翟中东.当代西方主流的罪犯矫正目的观[J].中国监狱学刊,2022(04).
- [112]翟中东,孙霞.《社区矫正法》实施两年来若干问题的思考[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2(04).
- [113]张凯,张延琦.《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实施效果、实践难题及解决思路[J].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2022(04).
- [114]杨涵,张凯.环境矫正: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03).
- [115]牛竞凡,张凯.智慧矫正背景下的社区矫正课程改革探究——基于OBE导向的分析[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4).
- [116]牛忠志,晋泽禹.《社区矫正法》的公法性质及其展开[J].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2022(03).
- [117]杨涵.暴力抗拒疫情防控犯罪的现实样态与预防对策——基于47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05).
- [118]杨涵.暴力伤医犯罪的情境预防对策研究[J].医学与法学,2022(05).
- [119]李雨聪.利用虚假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诈骗犯罪的研究[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2(11).
- [120]任建通.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 [121]吴英旗.法国医疗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医学与哲学,2022(11).
- [122]葛飞扬.拆迁安置背景下“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探究——以陕西省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事处Y村为例[J].西部学刊,2022(11).
- [123]孟祥林.中心地博弈与空间发展布局:城市化进程的小城市战略转向[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124]孟祥林.“聚”抑或“散”:城市化进程中省会城市拓展模式的理性思考[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
- [125]高艳,韩志明.清晰与模糊交织的治理图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前景及未来[J].浙江学刊,2022(03).
- [126]窦竹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以历史借鉴为视角[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
- [127]唐芳.秦汉时期长城区域的法律治理问题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02).
- [128]杨福忠,姚凤梅.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之维度及风险法律防治[J].河北法学,2022(11).
- [129]王子立,黄伊霖.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德国禁毒国际合作探析[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1).
- [130]李妍.扫黑除恶背景下套路贷犯罪治理问题研究[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2).
- [131]徐为霞,孙延庆.我国罪犯释放的历史考证[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1).
- [132]冯军,郑艳菊.空间理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
- [133]冯兆蕙.乡村振兴法治化的时代价值、基本框架与实现机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学报),2022(06).
- [134]尹巧蕊.数据要素与数据治理——数权世界的双核驱动[J].学术交流,2022(02).
- [135]程钰琪.大数据深度服务狱内侦查工作之路径[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2).
- [136]刘校麟,赵慧广,陈蕾.浅析公安大数据应用发展——基于新冠疫情防控[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2(07).
- [137]钱江涛.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困境及发展[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3).
- [138]宋阳,张开.重塑生物武器关联行为的全球治理[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03).
- [139]耿亚波,刘志勇.欧洲刑警组织情报信息共享机制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
- [140]王琳,徐涵.里加周期内欧盟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启示[J].现代教育管理,2022(01).
- [141]项靖航.基于GTD数据的东南亚地区恐怖袭击特征和趋势分析与启示[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22(01).
- [142]梁秀波,张弛.美国基于移民政策的单边制裁措施及其反制研究[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01).
- [143]王子立.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逻辑与启示[J].德国研究,2022(01).
- [144]胡海涛.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治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145]宋阳.国际投资仲裁准据法的平衡适用论[J].现代法学,2022(03).

政治学研究

汪远忠

2022年河北省政治学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经统计,研究范围主要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地缘政治、政治民主、国家治理等不同领域。

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广泛,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融入课堂教学实践是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趋势。其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政课程的内容和形式等是成效较为显著的做法。针对日常教学中学生看见知识的三种状态,戴木茅等从人文科学经典文献阅读课程建设的角度提出高校教学工作的追求应是启发学生看见人类知识的边界,即要突破原有经典文献课程以提升专业知识为目的的狭隘局限,结合三校政治学本科生经典阅读论坛实践,从而定义了一种广义的经典文献阅读教学模式,为不同学科的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理论框架:课程设计解决的是“看什么”的问题,教师通过对文献的精心选择和系统展示,达到“勾勒人类知识边界”的目的;教学设计解决的是“如何看”的问题,教学实践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通过讲述、辩驳、表演、研讨环节实现学生的沉浸式阅读,达到“呈现人类知识边界”的目的;教学测评解决的是“看到哪”的问题,通过评价学生和评价教师两个维度来衡量教学效果,为学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奠定基础。^[1]针对新媒体网络迅猛发展对于大学生政治观念和价值观的重要影响,闫晓静等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从创新大学生教育途径、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健全校园网络信息安全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新媒体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让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融入新媒体,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创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with 新媒体科技的协同发展。^[2]

红色文化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闫

晓静等通过阐述革命文化在高中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正效应,指出革命文化在高中生思政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以及深远的教育价值,革命文化进入思政教学不仅是树立高中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要教育工作,同时也是培养高中生爱国情怀与自豪感的全面性实践活动,革命文化进入高中思政课中有利于促进高中思政课程的内涵化发展。^[3]红色文化是蕴含着厚重人文历史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一座有待开发和利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宝山,王丽媛等认为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引领、斧正学生思想和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红色文化的感染性、实践性、实效性为依托,从课堂、课程、基地三个方面加强建设,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为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从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对思政课程的教学方法、内容、过程等加以创新,真正将红色文化与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基本素质相结合,立德树人。^[4]

二、党建研究

党建研究是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史学习与教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王军超提出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强调“学史明理”,主要是让党员明晰党产生及发展壮大的必然性,理解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悟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道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够实现信心。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好地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达到明理的目标要求。^[5]

刘新圣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不同,即中国共产党是“主义党”而不是“派系党”,是“使命党”而不是“选票党”,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部

署最终探索出了一条依靠制度和法律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准确道路。^[6] 竟辉认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自觉担负起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的历史使命, 当前防范党的建设中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应该增强斗争意识, 始终保持昂扬的斗争意志, 掌握合适的斗争方法, 要根据风险挑战的不同特征, 明确具体的斗争任务, 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 全面做强自己。^[7]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而要长期执政, 我们党就必须具备百年大党应有的清醒和成熟, 坚定历史自信。刘新圣认为, 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定长期执政的信心, 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历史成就, 一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基础和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具有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8] 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张青卫针对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督难题进行调研分析, 认为加强对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十分必要, 但目前对于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十分薄弱, 迫切需要建章立规, 突出重点, 把握关键环节, 充分发挥监督合力, 构建长效监督机制。^[9] 刘新圣结合雄安新区“智慧党建”的实际, 提出了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智慧党建体系的必要性和具体路径。智慧党建是以党章党规为基本遵循, 通过智慧党建平台, 构建全面感知、精确研判、全网协同、全面评价、迭代进化的党建共同体, 把现实中的党组织体系映射到智慧空间, 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 通过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 有效发挥基层党委的核心引领作用。^[10]

三、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研究

从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的视角来解读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进步与发展的相关问题, 是具有较强的学术分析能力和学术创新的方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研究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和奋斗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思想文化渊源。习近平总书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关于“命运共同体”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发展体现, 这一理念蕴含着深邃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苏锐、赵蕾从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这一理念生成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逻辑体现, 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环境对人类发展桎梏的实践总结,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11] 张若甲、吴孟恩认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和延续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共产党人精神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2] 在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精神谱系里, 塞罕坝精神彰显着绿色发展的独特内涵, 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意义。徐凡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探寻了塞罕坝精神的文化基因, 认为塞罕坝精神包含了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地域基因,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可以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激励、思想引领、文化支持, 可以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强劲精神动力。^[13]

儒家学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文化, 秦宁波通过深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演变, 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理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孕育、雏形、发展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的,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与改造的过程, 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 理论思维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演进具有重大的经验启示, 即要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

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14]戴木茅以萧何买田为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古代迎合型自污的政治生存策略,研究视角很有新意。古代皇权建立、君臣秩序下臣属奉行盛极而衰的哲学而及时以辱求全,本质上是释放一种避免威胁君权而建构的象征性、交流性、重复性的政治符号,尤其是从君臣交往的偶然事件,结过史家有意无意地篆刻,逐渐剔除了其中原有的道德评价,甚至忽略了君臣关系的压力、政治上的算计与虚与委蛇、臣属内心的扭曲等因素,最终只剩下保全自己的“手段——目的”简单关系,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示范效应,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15]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编年体史书,以其清晰还原历朝得失而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参考书。丁万明的《全注全译资治通鉴》宣纸线装版,全套30函147册,煌煌八百三十多万字,刷新了《资治通鉴》出版的高度。这套书从策划、组稿到成书,历时十年。这套书不仅有益于《资治通鉴》和相关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更有助于增强普通国民和青年学子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丁万明认为,《资治通鉴》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要表达的治国思想,被其表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分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资治通鉴》所倡导的“立政以礼”与“为政以德”的治国模式与与人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16]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提出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胡海晓、王艳贞从乡愁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自信,认为中国的乡愁文化中与生俱来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时间维度、民俗维度,乡

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包含了“家国情怀”的人文素养和“民族自强”的激励人心的力量。乡愁文化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精神内核,通过唤起民众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传统文化自信的活态传承,同时又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建立与发扬,从而实现“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因此,对文化自信政策的引导、制度的建立、观念的形成、民众的接受度等,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只有不忘过去,记住乡愁之“根脉”,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上不惧未来,实现文化之“自信”。^[17]

四、地缘政治研究

当前国际局势变化莫测,全球地缘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地缘政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现在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合作的重要路径。张骥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塑造型大战略,“一带一路”在地理上贯穿亚欧非大陆,一边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边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这条经济走廊既能给沿线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极,也将有利于地区安全稳定,是中国调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战略布局,将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深远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一带一路”合作发展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因素,如地缘政治、沿线国家政治安全、跨境威胁传播、经济风险、生态风险等,中国必须与中东欧、俄罗斯等国家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来主动应对,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同周边国家构建“战略互信与利益交融”的新外交,通过良好的国家治理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伙伴关系中,一方面强调中俄、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在对欧方向中也把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不接受欧盟方面所谓“分类欧洲”的说法。^[18]张爱丽、闻思雨认为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政策实施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中俄双方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中俄两国经济体量巨大、产业互补性较强、市场空间广阔,并且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地缘优势与人文交流优势,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俄经贸合作动

力十足,前景广阔,愿景可期。^[19]郭小丽从中俄两国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对话的现实意义出发,认为中俄两国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以促和平、谋发展的态度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20]

冷战时期,美国利用公共外交大打意识形态战争,拉拢拉美公众的民心,对抗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宋晓丽对冷战时期美国对于智利公共外交的目的、手段、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具体研究。与传统外交手段不同,美国对于智利的公共外交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针对智利历届政府不同政策而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美国通过信息交流项目和教育交流,抑制智利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利用公关活动和人员交流,支持智利中右翼政党,防范智利左翼政党上台。虽然最终因智利国内政局变动导致美国对智利的公共外交式微,但之前受到美国“智利项目”资助赴美学习的“芝加哥弟子”此时进入政界,引领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成功推广了美国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可见,美国对智利实施的公共外交策略是相当成功的,防止了冷战时期智利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维护美国在南美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21]美国在拉美的公共外交政策是其全球称霸的重要手段之一,宋晓丽的研究对于应对美国霸权主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俄罗斯是平衡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等词汇出现的频率开始越来越高,耿海天通过历史分析欧亚主义政治学对斯拉夫派和本土派的影响,认为新欧亚主义代表了近年来俄罗斯新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这个思想已经开始重塑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使其政治意识形态上越来越远离西方,这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强烈影响世界,尤其是对中俄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22]徐凡选取新中国“156项工程”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以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国营华北制药厂”为例,分析“156项工程”项目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认为“国营华北制药厂”具有重要产业发展、工业化城市规划建设、中苏关系等重要历史意义。以华北制药厂为代表的“156项工程”的建设,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一历史渊源

可以为新时期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助益。^[23]

欧盟是世界局势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力量。王军、王晓琨从中欧政党比较的视角翻译了挪威学者阿斯比昂·瓦尔撰写的关于欧洲左翼政党危机一文,有助我们了解西方主流政党的现实困局。当前,欧洲各国主要左翼政党对于欧盟政策的不满与日俱增,与欧盟的关系也变得难以预测,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当前脱欧运动的主导力量,最终导致种族主义、仇外主义以及右翼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左翼政党面临诸多内部问题,在欧盟选举中劣势明显,社会支持率不高,因此欧洲左翼政党需要做出自我变革,必须对欧盟的作用和特征进行研究和剖析,必须制定真正的反资本主义战略,以改变目前其所面临的严重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但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左翼政党的激进化。^[24]

五、其他研究

民主政治研究。人民政协是我国专门的协商机构,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平台。哈伯先、吴杰华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人民政协是我国践行全过程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人民政协与人大二者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支点完成逻辑衔接,呈现出内在的理论互嵌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人民政协需要完善人民政协议程设置、增强人民政协协商包容性、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效能、加强人民政协协商监督,从而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回应性、参与度、实效性和民主责任,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25]王江波研究英国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积极作用、弊端与缺陷、过滤机制及未来发展等问题,认为英国议会监察专员制度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民主和进步的内在要求。^[26]

国家治理研究。数字化政府建设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杨梦、李艳认为,当前新技术发展推动政府建设数字化转型是克服传统政府治理局限性、满足公众需求的时代要求,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信息交流与共享存在阻碍、相关技术人员匮乏、大数据安全不够完善等弊端,提出通过制定政府数字化转型整体规划、构建系统完备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人才的培养与吸引等方

式优化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27]

总体来看,2022年河北省政治学研究中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展望未来,需要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深入进行持续性的专题性研究,形成研究特色。

(汪远忠:河北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戴木茅,田菊会.看见人类知识的边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献阅读课程建设略论[J].现代大学教育,2022(06):102-108.
- [2]闫晓静,孟梯清,回娅冬,贾耀忠,刘德华.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11):69-70.
- [3]闫晓静,王宝华,姬断萍.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J].文教资料,2022(11):33-36.
- [4]王丽媛,杨昕,张彦琼.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的三重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09):43-45.
- [5]王军超.党史学习教育中“学史明理”的内在逻辑探析[J].北京教育(德育),2022(Z1):53-57.
- [6]刘新圣.“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的领导和执政认识的历史性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22(01):41-48.
- [7]竞辉.防范化解风险挑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J].党建参阅,2022-10-01.
- [8]刘新圣.坚定长期执政的信心[J].党建参阅,2022-10-01.
- [9]张青卫.强化对“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督[J].党建参阅,2022-07-01.
- [10]刘新圣.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智慧党建体系研究[R].雄安新区管委会研究咨询报告,2022-02-01.
- [11]苏锐,赵蕾.试论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与构建价值[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1-8.
- [12]张若甲,吴孟恩.共产党人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内在逻辑

[J].长安,2022(04):70-72.

- [13]徐凡.塞罕坝精神的文化基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
- [14]秦宁波.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15]戴木茅.古代迎合型自污的政治哲学阐释——以萧何买田为例进行的考察[J].文史哲,2022(04):156-164,168.
- [16]丁万明.全注全译资治通鉴[M].北京:华龄出版社,2022.
- [17]胡海晓,王艳贞.基于乡愁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03):7-8.
- [18]张骥.“一带一路”与中东欧、俄罗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
- [19]张爱丽,闻思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经贸合作的新机遇[J].河北企业,2022(09):45-47.
- [20]郭小丽.聚合性与命运共同体(Соборность как единая судьба)[J].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022-10-22.
- [21]宋晓丽.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公共外交的历史演变及特点[J].拉丁美洲研究,2022(01):103-119,157.
- [22]耿海天.欧亚主义政治学对斯拉夫派和本土派的影响[C].莫斯科-圣彼得堡国际俄罗斯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22-09.
- [23]徐凡.“156项工程”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探析——以国营华北制药厂为例[J].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03).
- [24]阿斯比昂·瓦尔,王军,王晓琨.房中象:欧洲左翼政党的危机[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04):14-27.
- [25]哈伯先,吴杰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中的人民政协:理论回应与实践形态[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2):53-57.
- [26]王江波.浅议英国议会监察专员制度[J].人大研究,2022(08):47-52.
- [27]杨梦,李艳.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对策探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11):37-42.

党的建设研究

郑时雨 张勇

2022年,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及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党的建设”这一主题,主要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互联网+”党建等重要领域进行研究探讨,形成了一

系列研究成果。

一、党的政治建设

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和根基,是管总、管根本的,对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具有统领提

携、纲举目张的功能。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把握历史主动等课题进行了研究。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建设走向纵深的必由之路。刘新圣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阐明了党的领导“全面性”和党的执政的“长期性”，廓清了理论上的迷误。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过程，党创建和领导政权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主义党”而不是“派系党”，是“使命党”而不是“选票党”。要着眼于“长期执政”加强“全面领导”，警惕陷入西方理论中“执政-在野”的逻辑陷阱。^[1]

杨东广认为“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历史决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奋斗的结晶，充分彰显了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为走好新的赶考路提供了历史动力。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2]

刘欢和葛玮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奋斗史。民族复兴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方面。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取得解放战争的决胜性胜利，为人民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根本前提；将革命进行到底、擘画新中国的蓝图，为民族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了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党领导民族复兴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确保党对民族复兴事业的坚强领导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继续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创造了前提、提供了动力。^[3]

康豫和李迎春等认为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构筑“育人领导力”“育人精神力”和“育人凝聚力”三轮驱动的“三力”育人矩阵，对提

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践行“育人领导力”，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践行“育人精神力”，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践行“育人凝聚力”，全过程强基固本，全方位立德树人，全员聚焦服务，形成“大思政”格局，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4]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王宝治和何晓岳认为党群沟通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元的形式和渠道，向群众传达方针政策，并接收群众的所思所想，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行为，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就决定了党群沟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分别发挥了凝聚革命力量、稳固意识形态、整合多元利益和引领民主治理的不同功能。党的十八大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要形势的变化，完善新时代下的新型党群沟通功能，应该在深入基层社会调研、增强互动机制建设、发挥新媒体沟通优势和强化制度化沟通渠道上下功夫。^[5]

（三）把握历史主动

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和经验的深刻认知，更是对遵循和运用历史规律内在要求的极大彰显。

魏先法认为党的百年成就和经验的意义，一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团结全党做到“两个维护”，步调一致向前进，三是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斗。^[6]他提出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从严治党上升到“必由之路”的高度进行新概括，这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思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历史大势、建功新时代的历史自信、夺取新胜利的历史主动。^[7]他强调要把“十个坚持”同“九个必须”等结合起来，一体学习理解、一体贯彻落实；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更

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遵循，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增强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定力、魄力、能力；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重大政治是非的重要依据，在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自觉对标对表；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思想境界、道德水平。^[8]

牛余庆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揭示了我们党发展由小到大的基因密码，吹响了我们党引领当代中国由富到强的前进号角，是激发党员干部使命担当、步调一致向前的强大动力。深学细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一个“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要着力实现“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情感贯通，激发党员干部承担历史使命的思想自觉；要着力实现“党性、人民性、革命性”的价值贯通，激发党员干部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自觉；要着力实现“党、党员、领导干部”形象贯通，激发党员干部承担历史使命的行动自觉。^[9]

安巧珍和武娜娜认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即将迎来中华民族强起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埋头苦干、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是中华民族由贫弱到富强的演变进程。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挖掘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内涵，从内涵演变、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实践经验等内在逻辑维度，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科学总结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解决新发展阶段的新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10]

二、党的思想建设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思想建设在党

的建设中具有贯通性、支撑性的作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奥秘所在。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就革命精神、红色革命文化、理想信念以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展开研讨。

（一）革命精神

聂艳秀和高晨晓认为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用真理的力量引领时代新人坚守理想、以担当作为锤炼时代新人实践品格、用勇于奉献磨炼时代新人意志品质、以人民的立场锻造时代新人政治定力，是时代新人培育指路明灯。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养，就要加强教育引导、组织社会大课堂、把握志愿服务契机、建设文化环境、讲好革命故事，增强多方协同作用，强化实践自觉，教育引导青年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理想和为人民幸福而永久奋斗的价值追求。^[11]

姚志军和姚雷认为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续延安时期相关的思想理论思考，总结升华党带领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推动中国历史转折的历史经验，凝练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两个务必”思想具有丰富鲜活的辩证意蕴，包括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钢铁纪律与优良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到底与经受考验、推动历史进步与阻碍历史车轮前进、预防贪污腐化与防止垮台失败、夺取胜利与巩固胜利、“当官做老爷”与为人民服务等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两个务必”思想在新时代必将得到永续传承，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12]

郭建和张振杰认为西柏坡精神源于西柏坡时期党的伟大实践，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植根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并在革命文化滋养中形成、发展，与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党的精神谱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站在历史的新征程的新起点，其包含的“两个一切”的人民至上精神、“两个敢于”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善于”的立国兴邦精神和“两个务必”的不懈赶考精神仍然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继续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3]

徐兰英认为团结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

历程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增强民族归属、凝聚民族力量、激发民族自信的重要法宝。团结精神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时代价值。新时代，必须在传承团结文化、厘清团结内涵、稳定团结关系和融合团结力量实践中，继承和弘扬伟大团结精神。^[14]

徐雁红和李怀等认为一二九师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体现，也是邯郸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支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精神内涵对于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锤炼担当品格、培养创新精神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将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价值引领，弘扬特色文化，形成协同效应，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15]

刘欢和任霏认为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西柏坡时期，党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斗争精神，将敢于斗争与善于建设、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提升斗争策略与增强斗争本领结合起来，将斗争对象与统战对象严格区分开来，塑造了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形成了坚持敢于斗争的宝贵实践经验。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斗争，必须把握伟大斗争目的，明确伟大斗争内容，提升伟大斗争艺术，同时还要理顺伟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关系。^[16]

（二）革命文化

竟辉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坚的精神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依旧风华正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而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本传统”“革新思想”“和合理念”“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等文化基因，借助文化固有的整合与认同力量实现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在新时代，要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就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7]

李维意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躯镌刻的

红色记忆。革命文化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蕴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承载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革命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治党兴党的精神钙质、兴军强军的精神基石、铸魂育民的精神资源。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深刻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做到铭记光辉事迹、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文化自信和赓续革命精神。^[18]

李涛认为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时代发展中具有思想、意识引领作用。红色文化与教育的融合衍生为红色文化教育，其彰显的社会价值及教育价值，成为我国每一名公民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如何运用红色文化教育促进人们全面性发展，成为社会发展及教育领域较为关注的话题。对此，应从红色文化教育的育人性、思想性、革命性、民族性等维度，分别分析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及教育价值，提出红色文化教育在社会及教育中的具体实践路径。^[19]

（三）坚定理想信念

邢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党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撑。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20]

王军超认为党史学习教育突出强调“学史明理”，主要是让党员明晰党产生及发展壮大的必然性，理解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悟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道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够实现的伟大道理。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好地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达到明理的目标要求。^[21]

（四）思想政治工作

牛余庆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认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创新，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传家宝和生命线作用、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是指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和内在调节的方式及过程。把“机制”引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就意味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机能和特性。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内化于心、注重外化于行、健全领导体制来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22]

郝飞飞和刘欢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表现形式,总是需要凭借话语载体来表达或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掌握并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关键。高校作为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接班人的根本场域,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聚合、辐射的前沿阵地,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一直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高校在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工作中,应充分把握时代发展的历史际遇,找准在话语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短板环节,以问题为导向探清补齐短板的实践理路,筑牢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坚实堡垒。^[23]

三、党的组织建设

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围绕贯彻落实新时代的党组织路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一) 基层党组织建设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彭澜认为破解党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使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客观分析“两张皮”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炼有效方法,创新工作举措,探索完善破解党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的教育学习、工作联动、引领激励、督导督查、考核评价、干部选拔任用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构建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要找准新时代党建与业务工作的契合点,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进一步深度融合、协调发展。^[24]

韩金佐和代阳认为党建引领已成为高校治理研究和实践的根本指导,探索具有理论支持的、符合青年特点的高校党建引领新范式,已成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学习型组织理论在底层

逻辑、运行原则与目标价值上与高校党建具有内部统一性,为探索构建高校党建引领新范式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学习型组织理论构建党建引领新范式,基于双向信息交互畅通,构建扁平化的信息沟通结构,优化组织民主化氛围;利用多层次自组织的建构,强化三类带动作用,建立自主管理的运行机制,组成以学生党员为核心的政治学习基本单位;通过构建四种行为模范,明确个人努力与组织优化的具体维度,推动实现个体超越与组织优化。^[25]

吕健和陈洁认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关键在党。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立德树人”视阈下,不断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崇高政治使命。应从提升组织政治领导力、优化组织结构、强化组织队伍、完善制度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升组织力,确保高校基层党组织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26]

尹莎莎和王海燕等认为高校党建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当今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引入积极心理学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增强学生积极情感体验,塑造学生积极人格特质,营造积极组织文化氛围,积极拓宽组织建设模式等方式,改进工作思路,创新管理模式,从而提升高校学生党建的工作成效。^[27]

贾世要、加鹏飞、黄丽颖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需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与建设中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提升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组织力与领导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通过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发现,要从强化党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带动党员干部人才建设,将党的阵地建设覆盖群众,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等多维度建设来助推乡村振兴发展。^[28]

邵文英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坚持和实现党对农村领导的组织保证。通过解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涵,分析了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制约因素,包括对自身政治功能认识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凝聚力、制度建设不完善。从优

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强化其政治功能、提升其社会动员力三个方面论述怎样提升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对于推进基层党建科学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9]

（二）干部队伍建设

重视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我们党一路走来，始终把选贤任能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与时俱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孙英臣、傅建芬、李聪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干部队伍提出了既要提高政治能力又要提高治理能力的新的要求。我们应该探索建立新时代干部队伍政治能力与治理能力共同提高机制，因为良好的机制能够起到基础性、长期性的作用，对于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30]

陈秀梅、杨玉冰、王海英认为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内部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各种风险都有可能相互触发、叠加、共振。县处级干部在应急处突工作中承上启下，大多担任直接“指挥官”的角色，其统筹调度、情势研判、临危决策、善后处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到突发事件的治理效果。在对县处级干部进行了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认为县处级领导干部应该从体制机制到预案建立、从实践经验到处置水平、从知识获取到观念更新、从整合协作到管理格局各方面提升应急处突能力，以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要求。^[31]

王英杰和施扬认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接班人和生力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干部的重要论述中，特别强调年轻干部对党忠诚第一条、政治能力第一位、走好从政第一步。^[32]

梁瑞英认为河北省处于京畿要地，是拱卫首都的“政治护城河”，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河北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认识河北省面临的现实基础、宝贵机遇、发展优势，进一步发挥本省的区位优势，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

的政治环境。这就需要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解放思想、担当作为、狠抓落实，阔步迈上新的时代征程，从而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力量。^[33]

四、党的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新时代，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通过对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并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从而为党的其他建设提供基本遵循和制度保障。

吕健和赵国龙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也全面开启了探索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进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路子”。一是突出党章的核心地位和方向引领作用；二是初步建立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确立党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健全和完善管党治党的原则制度，明确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严格规范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健全和完善党的内部监督和纪律检查制度；四是规范和完善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回顾、梳理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探究制度管党治党的制胜“法宝”，坚守管党治党的制度初心和使命，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协调，坚持党内法规建设的系统性和次序性，为完善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供借鉴。^[34]

梁瑞英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制度执行力是重要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力如何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执行力不断加强，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治理。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不仅要从价值理性上进行分析界定，对其理论和系统进行逻辑框定，而且还要在对党内法规执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有效机制进行科学设定，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35]

五、“互联网+”党建

“互联网+”技术为高校智慧党建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使得党建工作更加数字化、

精细化、智能化。

柴素芳和姜旭认为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伴随新媒体时代到来,微电影逐渐成为高校立德树人新载体。以微电影为载体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既具有突出的优势条件,又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以微电影为载体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形成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良性互动、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的互融互通、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的双向建构的实践特色,彰显了政治性和学理性的有机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的有机统一以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的实效与价值。^[36]

哈艳和刘天骐认为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网站、电视、报纸、自媒体等不同媒体在内容、途径、资源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的新型媒体,其出现对新时代高校党建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党委紧抓融媒体发展趋势,构建导向亲民、内容开放、平台联动、信息可视、管理智能的融媒体智慧党建系统,是新时期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37]

2022年河北省关于党的建设研究成果,既深化对党的建设的学理性认知,也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与执着。面向未来,党的建设研究者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高度,聚焦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拓展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容,优化研究方法,及时洞察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深入把握党的建设基本规律,以提升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回应与阐释力度。

(郑时雨: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部讲师

张勇: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建部教授)

参考文献:

- [1]刘新圣.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关系认识的历史性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22(01).
- [2]杨东广.全面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定位[J].共产党员(河北),2022(09).
- [3]刘欢,葛玮钰.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复兴的实践探索及其时代意义[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24).

- [4]康豫,李迎春,蔡佳鑫,褚飞亚.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构筑高校“三力”育人矩阵初探[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
- [5]王宝治,何晓岳.功能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党群沟通百年回顾及路径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6]魏先法.总结党的百年成就和经验的意义[J].共产党员(河北),2022(01).
- [7]魏先法.从历史高度认识新时代“必由之路”[J].共产党员(河北),2022(09).
- [8]魏先法.科学对待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J].共产党员(河北),2022(13).
- [9]牛余庆.激发党员干部使命担当内生动力的路径选择[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2(01).
- [10]安巧珍,武娜娜.百年党史“三个起来”的逻辑理路[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
- [11]聂艳秀,高晨晓.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育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2(06).
- [12]姚志军,姚雷.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思想的辩证意蕴探析[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06).
- [13]郭建,张振杰.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J].理论视野,2022(06).
- [14]徐兰英.伟大团结精神的历史意蕴、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28).
- [15]徐雁红,李怀,侯居荏.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
- [16]刘欢,任霏.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4).
- [17]竞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J].北京社会科学,2022(08).
- [18]李维意.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精神价值和自觉弘扬[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
- [19]李涛.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及教育价值研究[J].公关世界,2022(18).
- [20]邢帅.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意蕴[J].人民论坛,2022(18).
- [21]王军超.党史学习教育中“学史明理”的内在逻辑探析[J].北京教育(德育),2022(Z1).
- [22]牛余庆.新时代推进思政工作机制创新的思考[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09).
- [23]郝飞飞,刘欢.新时代提升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时代际遇、现实短板和实践理路[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06).
- [24]彭澜.破解“两张皮”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为例[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2(01).

- [25] 韩金佐,代阳.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构建高校党建引领新范式[J].高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22).
- [26] 吕健,陈洁.调整与创新: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逻辑[J].南方论刊,2022(09).
- [27] 尹莎莎,王海燕,赵静.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路径研究[J].成功,2022(4).
- [28] 贾世要,加鹏飞,黄丽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维度与实现路径[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2).
- [29] 邵文英.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J].党史博采(下),2022(4).
- [30] 孙英臣,傅建芬,李聪.建立新时代干部队伍政治能力与治理能力共同提高机制[J].求知,2022(05).
- [31] 陈秀梅,杨玉冰,王海英.提高县处级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J].共产党员(河北),2022(12).
- [32] 王英杰,施扬.年轻干部成长必须牢记的“第一”[J].共产党员(河北),2022(18).
- [33] 梁瑞英.科学把握机遇 开创新局[J].共产党员(河北),2022(13).
- [34] 吕健,赵国龙.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意义[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2(05).
- [35] 梁瑞英.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执行力提升机制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04).
- [36] 柴素芳,姜旭.以微电影为载体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与实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
- [37] 哈艳,刘天骥.融媒体视域下高校智慧党建模式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02).

社会学研究

田翠琴

2022年,河北省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市域治理、环境治理、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增加许多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人口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尤其在生育率与生育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出版了多部社会学专著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如《公平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黄华)、《数字经济与环保服务业发展研究》(王小平)、《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谷更有)、《家庭茶文化》(宁静)、《公共服务供给的数字化转型——以京津冀为例》(白翠芳)、《共享视域下的首都“护城河”治理研究》(韩立红)等。学术著作的数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2022年度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社会治理研究

(一) 社区治理

如何平衡从常规治理向应急治理的转化张力始终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问题。林顺利、蔡璟浩认为,在风险社会和治理重心下沉的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使得社会行动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愈来愈高。以新冠疫情事件为例,由于科层制的制度刚性,最初的社区应急治理处于多重掣肘之中,最终表现为模糊性治理和

硬性技术识别的方式与特征。而在应急防控后期,社区应急治理则凸显出党建引领、市场参与、关系网络和技术组合四种结构性特征,重塑了社区各主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科层制所带来的诸多矛盾,治理过程富有弹性与情感。通过多种策略促进社会关联,在科层化的形式之下补充了应急治理体系的实质化内容,推进了治理有效的现代化进程。科层制作为一种过程性视角,体现了合法性、有效性和治理成本三者支撑的转化张力。促进社会关联的多种策略最终指向了“一体两面”的应急治理体系建构,回应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导向与现实议题。^[1]

(二) 市域政府治理

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市域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支撑。市域政府在科技治理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效,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相关制度体系不健全、算法决策和信息泄露的风险、人才缺乏和外部环境的不成熟等实践症结。韩梦娟、张丽丽认为,需要从制度体系、主客体要件和外部环境上进行优化,从而提升市域政府科技治理能力,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提升市域科技治理能力的路径主要有三个:一是构建多层次市域政府科技治理体系。二是重新激活市域政府科技治理的主体性要件。三是打

造优质的市域科技治理环境。^[2]

政府数据治理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白献阳、邝苗苗采用内容分析法,全面梳理政府数据治理的概念内涵、框架模型、治理内容(政策法规、组织机构)以及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挑战等研究主题。研究发现,政府数据治理研究中很多观点尚未形成共识,需要在概念内涵、治理领域、治理政策与组织、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的内容主要有:(1)政府数据治理概念内涵应该协调技术与治理之间的关系。(2)政府数据治理应该把握核心治理领域,加强评估与监督。(3)落实政府数据治理政策,细分政府数据治理组织。(4)拓展政府数据治理研究内容与方法。^[3]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应用到城市治理中去,推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热潮。借助于强大的数字技术,城市治理透过多元复杂的社会要素,逐步实现了从粗线条清晰到细密度清晰、从局部清晰到整体清晰、从静态清晰到动态清晰、从低度清晰到高度清晰的持续提升。但数字化治理也面临着清晰化的限度,具体是数字弱势群体的不可识别、基本治理单元间仍有缝隙、部分治理数据的不够充分、城市治理算法还存在黑箱等模糊性问题,整体呈现出清晰与模糊相互交织的状态。高艳、韩志明认为,持续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平衡清晰化与模糊性的张力,寻找信息技术应用的均衡点,其中既要发掘数字技术的清晰化潜力,也要维持城市要素的适度模糊,使城市治理变得更加轻便、敏捷和智慧。^[4]

(三) 智能化社会治理

互联网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其社交场域特征、成员身份和社会关系纽带等均呈现新特点,也带来社会信任和多重身份等问题。加快构建适用于网络空间的伦理和社会治理体系,通过法律和技术营造更健康安全的社会生活空间,是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王凤丽认为,为促进网络空间与社会生活空间的良性互动,应在以下两方面继续推进治理:一是加快构建适用于互联网社交空间的社会伦理和治理体系。二是以法律和技术调适数字身份和现实身份的关系。赋予网络世界“仿生”特质,让数字生命也有生长、发展、消亡期,以便更好地界定网络空间的场域边界,

平衡人们的数字身份和现实身份,建设更完整、更安全、内涵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空间。^[5]

人工智能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具有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提升公共政策的精准度、全方位升级政府治理系统,提升治理效能。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风险,包括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新型社会纠纷、赋能政府治理进程中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技术不完善造成社会公害等。杨福忠、姚凤梅认为,应该积极防治人工智能风险,在防治策略上,要坚持法律规制与保障并重,在出台规制措施时必须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在防治手段上,要做到软法与硬法同向发力,既要发挥软法的价值引领作用,更要发挥硬法的刚性约束作用;在防治方式上,要强化权力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6]

(四) 日常生活治理

饭圈以共同喜爱的偶像为纽带交流情感、建构认同,但强烈的情感投入也导致粉丝群体之间时常爆发激烈的冲突,“日常极化”成为追星模式的常态。他们采用“爆吧”策略形成视觉冲击效应,借助隐喻修辞进行意义争夺,并通过有组织的分工合作完成冲突的规模化生产。崔志梅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网络社群行为模式,饭圈的日常极化是内部圈层结构、情感动员和外部资本运营形塑的结果,提供了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青年群体集体行动的新逻辑。但万人刷屏的人海战术也容易使参与者陷入图像狂欢和网络民粹主义,阻碍深度交流和政治沟通。崔志梅从极化理论出发,重点就饭圈交流实践中冲突的表现形式、发生机理与演化效应进行分析,丰富了对青年亚文化领域冲突心理与行动的理解,为饭圈乱象治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7]

二、人口社会学

(一) 人口发展趋势研究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将会受到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劳动力数量减少而抚养负担加重给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王金营等在对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论证了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所需要的人口发展状态,提出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发展

战略目标的范围和方向,明确了人口规模在战略取向上的核心与基础地位。提出应积极改变人口长期发展轨迹,以接近更替水平为目标努力提升生育率,从而到 21 世纪末使总人口规模能够维持在 9~12 亿人,促进人口向着规模相对稳定、结构逐步优化、素质不断提升、空间分布合理的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的方向发展。^[8]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对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口迁移流动成为人口数量变化的主导因素。吕红平、吕沫含认为,东部地区在极低生育水平下,由于接受大量流入人口,人口数量却能有较大增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显著升高;西部地区生育水平虽然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但人口自然增长率远低于人口流出率,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中部地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稍高于东部地区,但由于人口大量流出,导致了 2010—2020 年的人口负增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大幅度下降。^[9]

随着政策效应不断累积、长期低生育率下人口惯性持续影响,中国人口发展迎来了关键性的重大转折阶段。王朋岗、黄强以第七次人口普查 1—8 号公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征:人口增速减缓,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但人口规模仍然较大;家庭户规模缩减,但家庭的价值并未改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等十个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征,探讨了人口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可能影响。^[10]

(二) 生育水平研究

生育水平历来是我国人口形势分析和生育政策等相关研究的关键和热点。王广州、胡耀岭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 and 再认识。研究发现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 28.98 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 28 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 4 年缩短到 3.11 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

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1]

适度生育水平是在适度人口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现实国情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微观和宏观领域均需追求的理想生育状态。吕红平认为,推进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贯彻落实生育新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长期保持人力资源优势的前提条件。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生育政策调整文件精神,确定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和适度生育新观念,构建与生育新政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适度生育水平,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12]

(三) 生育政策研究

近十年来,我国改革和调整生育政策的步伐不断加快,生育政策发生了由控制向鼓励的根本性变化,与生育政策相配套的鼓励生育的社会支持政策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0,已步入“极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如何加快生育政策调整、应对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快的现实难题,已经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育政策调整紧紧围绕最突出的人口矛盾,始终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相伴相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向同行。任兰兰、向东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生育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近 3 年出台的最新政策文件进行深度挖掘,分析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展成效,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路径,为推进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家庭发展提供借鉴。^[13]

(四) 人口流动研究

城市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作为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资源,新生代流动人口对社会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研究新生代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有利于各地区吸引青年流动人口流入,对于推动经济与就业结构完善、发挥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李国柱、刘美晨基于全国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探究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采用有序聚类对全国八大经济区社会融入进行类别划分,同时对社会融入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普遍较低,心理和经济维度融合较好,行为和文化维度融合相对一般;根据综合评价得出长江中游经济区流动人口融入度水平最高,西北地区融入度最低;社会融入主要受到生命历程、流动特点、能力与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影响。^[14]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既关乎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幸福,也关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王朋岗等基于迁移过程压力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利用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生活压力和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活压力与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社会排斥所带来的影响更大;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没有群体差异,而生活压力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应减轻流动人口的住房负担,完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制度,解决流动人口在老家的后顾之忧,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以及社会融合障碍,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从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15]

(五) 性别研究

在当前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影响婚姻匹配质量的因素越来越多,其中教育和年龄为核心要素。王立军等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构建教育年龄婚姻供给匹配模型,对中国教育获得性别差异逆转及相应婚姻匹配失衡问题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传统城市、镇和乡村“男高女低”的教育获得差异趋势渐次发生逆转,“女高男低”的性别受教育差异新格局已经形成,并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

势。(2)中国婚姻有效供给匹配失衡问题严重,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越难嫁与男性受教育水平越低越难娶的现象并存,尤其是22—35岁的小学及以下男性、初中男性和本科女性有效供给匹配比均低于0.70,意味着该群体中将有超过30%的人口难以找到理想的婚姻匹配伴侣。(3)中国婚姻有效供给匹配失衡问题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16]

近年来,女性作为重要的创业者群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张敬伟等以43个农村女性创业案例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探究并构建了农村女性创业者身份构建的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创业者的身份构建涉及身份感知、身份冲突、身份工作和身份实现4个阶段;农村女性在内外外部诱发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创业需求,但由于创业需求与个体自我境况感知存在差异,由此引发身份冲突;在个人信念和个人责任感的影响下,选择继续创业的农村女性会开展身份分离、身份塑造和身份认证等一系列身份工作,并最终通过身份巩固和身份延伸实现其创业者身份。^[17]

三、老年社会学

学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全国统筹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但还面临着经济、制度、利益和技术等方面的障碍。张国梅、金浩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背景,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确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三方主体的最优空间存在状态,运用软件仿真刻画不同主体之间策略选择的动态发展过程与最终演化结果,为最终实现基金可持续发展提供执行依据。研究表明: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与其各自的成本收益密切相关,政策执行力度通过系统传导可以影响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假设条件不同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从中得出启示: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考评机制,建立垂直管理的业务经办体系,适当降低企业的养老保险费用,完善统一共享的信息管理系统。^[18]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作为老年人日常就医的重要空间载体,其适老化分布会对老年人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倪丽丽等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网络服务区分析、高斯改进两步

移动搜索等方法对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的老年可达性及其适老化布局的合理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布局密度与老年人口分布密度高度匹配，市内六区的设施服务分布明显优于环城四区。设施的老年可达性呈现“南开区北部—和平区—河西区西部”轴线沿线偏高，轴线两侧向外逐渐降低的趋势。在设施的老年可达性均衡性方面，市内六区同样明显优于环城四区，且设施老年可达性高的居住小区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19]

成功老龄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策略，它是指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处于认知功能良好、身心健康状态。杨青建等采用一般资料问卷、成功老龄化量表、健康坚韧性量表、SOC 问卷，抽取承德市 391 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并通过 Bootstrap 方法对 SOC 在健康坚韧性对成功老龄化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城乡老年人的健康坚韧性和 SOC 是成功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并且 SOC 在健康坚韧性对成功老龄化之间存在中介效应。^[20]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日益明显，但不同地区老龄化进程、特征存在差异。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王爱峰、董尧选取京津冀三个地区的人口结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 GM (1, 1) 模型分别对未来十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行预测，数据显示河北省老龄化速度明显超过京津地区，其次从三地历年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可支配收入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对河北省老龄化的应对和老龄产业发展提出建议。^[21]

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一) 城市转型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城乡空间组织逻辑正在随之迭变。城市的集聚扩张与结构分化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体两面，而城市边缘区的出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与乡村系统交互作用中最敏感的区域，呈现了较为典型的空分异特征，经典规划范式对其的不适应性导致其空间矛盾日渐激化。梁晨首先归纳了城市边缘区外缘开放化、内部空心化以及要素多元化的空间演变趋势，进而阐明空间发展表象与深层发展逻辑转换的空间映射规律，包括城乡融合引起的空间系统渗透、增长转轨带

来的驱动机制重构以及资源配置推动的空间功能更新。在此基础上，针对经典规划范式的机械理性局限提出“重塑城乡关系、动态过程引导、理顺结构脉络、协调多元主体”的规划响应机制。通过知行范式的双重转型，为城市边缘区的国土资源统筹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22]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马林靖等采用 2006—2017 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 (SDM) 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23]

(二) 乡村振兴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已经由理论探讨走向实践层面。但在当下的诸多实践中，乡村文化振兴还面临着内涵和目标不清晰、实践主体缺位、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文化活动匮乏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等困境，因此界定和厘清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目标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亟须解决的问题。高玉敏认为，乡村文化振兴就是挖掘乡村文化在当代仍有生命力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全面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依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智慧源泉。基于文化内生性视角，建构了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空间-活动-产业”的四维框架，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新路径。^[24]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农村发展主体逐渐减少，随即形成了农村“空心化”现象。王华东、姜伟芝以中国知网收录的 645 篇农村“空心化”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

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式对我国农村“空心化”研究现状与趋势进行知识图谱解析。研究发现,开展农村“空心化”研究的作者数量较少,而且现有研究大多为独立研究;研究内容、角度相对单一,同时缺乏理论体系的梳理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今后相关学者应加强跨学科、跨地域、多途径的合作与交叉研究,并将理论和实证、定量和定性、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更加深入地研究与阐释我国农村“空心化”问题。^[25]

人际社会化指建立人际联结并扮演一定社会角色,自我解析为自尊与自信。留守导致亲子分离的消极体验阻碍儿童确立自尊自信,对人际社会化的负面影响深远,容易出现童年逆境的“深井效应”。封文波等提出留守经历者人际社会化与自我成长的系统干预:(1)开展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培训,增强父母角色和责任意识,促进亲子关系和谐;(2)强化校园心理关怀,增强师生、同伴等人际社会化的替代和保护作用;(3)开展社区替代机制,挖掘社区心理支持的潜力,完善未成年留守者心理成长的社区警示、预防和干预机制;(4)评估筛查留守经历者的心理创伤,借助专业心理辅导消除“深井效应”的持久影响;(5)推广留守经历者心理发展的信息网络共享与支持平台。^[26]

五、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 环境治理研究

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要求,从总体上为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了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路线图。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是共管共治,切入点是转变政府职能,落脚点是促进公平正义,基础是制度建设,基本方式是法治,本质特征是民主。王宏斌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多维视角中的环境治理进行有机结合,从新时代新使命、环境经济、环境政治、中国之治、美丽世界等不同维度,搭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路径,展现出一幅立体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图景。^[27]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可为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提供对策,以补充现有研究对国土空间优化实践指导的不足。冯琰玮、甄江红、田桐羽以内蒙古呼

包鄂地区为案例,识别城镇、生态源地,构建源地扩展阻力评价体系,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划分安全格局小区;基于电路理论识别国土空间保护修复重点区域(生态廊道、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优化生态安全格局,提出国土空间保护修复建议。主要研究结论有:研究区城镇源地适宜扩展区远小于生态源地,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有较大潜力;安全格局小区中生态保育区生态空间面积最大,其次是优化缓冲区生态空间,生态防护区生活空间最小;识别135条生态廊道,12个生态“夹点”,6个生态障碍点,164个生态战略点,架构生态安全网络,形成“多核四区三带一屏一流域”的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格局,以达到提升生态景观完整度与连通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目标。^[28]

禁养区即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养区政策是国家为治理畜禽养殖污染、防范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引导畜禽养殖业科学发展出台的禁止在法律法规规定区域内建设养殖场或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政策。但禁养区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现象表现出的政策执行偏差,严重影响了环境政策治理效果。程慧、秦晓依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框架,认为政策自身缺陷、政策执行主体的复杂性、对目标群体重视不足以及政策环境因素的限制,导致了环境政策执行“一刀切”现象。提出完善政策、改进政策执行机构、推动目标群体及改善政策环境等4个方面建议,提高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促进环境治理政策目标实现。^[29]

王小平以数字经济和“双碳”战略目标为背景,在梳理和界定数字经济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环保服务业数字化、数字环保产业化和环保平台经济等数字环保服务业发展问题。基于产业数字化基本理论,研究了环保服务业数字化的内涵与特征、环保服务业数字化模式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类型及其产业效应;基于数字产业化基本理论,研究了环保数字产业化内涵与特征、环保数字产业化模式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主要类型、实现机制和产业效应;基于平台经济基本理论,深入研究了环保服务平台模式的构成与类型、形成原因及其产业效应。最后,基于数字环保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分析和现实困境,提出了促进数字环保服务业发展的

对策建议。^[30]

（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创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以“八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康振海认为，“八个坚持”指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方向、总要求、总目标，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与发展导向，是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价值包括四个方面：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核心理念和主体框架；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为加快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观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一是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型；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方式的转型；三是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转变。^[31]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显著实践成效：一是构建起以“四梁八柱”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体系；二是推进以“五大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三是构建以“七个体系”为主要目标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田翠琴认为，新时代要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体系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标准化建设。要以有力举措确保生态文明制度全面实施：一是完善考评奖惩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导向；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为制度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政府环境决策和生态环境督察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三是加强环保督察执法，增强制度刚性约束力，全面提升环境管理质量。^[3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和内在规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与中心任务。田翠琴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全面指导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南、行动纲领和路线引领。加快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该优化“四条路径”：一是转型，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二是减污，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是扩绿，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四是降碳，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33]

张妮、赵晓冬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结合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特征，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行内涵与影响要素进行理论阐释，以我国内地 31 个省市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方法，结合可持续创新种群结构、可持续能力和可持续创新潜力 3 个维度，重点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高水平可持续运行建设路径。根据维度要素的不同组合构型，归纳出 4 条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实现高水平可持续运行的建设路径，其中创新种群新颖性与政府创新投入对系统高水平可持续运行更重要。^[34]

（三）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研究

为了优化生态环境的发展，研究人口密度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十分必要。王殿茹、薛少冰基于 2005—2019 年共 15 年 30 个省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 Hausman 检验以及对所有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最终选取了考虑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有效估计了我国人口密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对生态环境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居民人均支出对生态环境起到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起到负向作用，每万人公共交通工具和国内专利申请量都对生态环境起到正向作用。此外，将我国划分为六个区域的实证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人口密度对生态环境起到正向作用。提出了优化人口资源、提升人口素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同发展的建议。^[35]

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品，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达到平衡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的难题。李国柱、李晓壮基于中国 30 个省份 1994—2018 年连续 25 年面板数据，引入 VAR 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系统内部动态影响，并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其结论是：地方政府竞争整体上对环境规制产生正向影响；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竞争中技术创新竞争和经济增速竞争之间存在着“U”形关系，而与财政竞争存在倒“U”形关系；城镇化水平和失业率等关键的社会评价指

标,将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进而改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36]

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有力抓手和重要保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措施和有效途径。如何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既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实践创新。齐心认为,《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从经济变迁的维度研究环境治理转型,探讨经济变迁对环境治理转型的影响机制,探讨环境治理转型的历史过程、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对构建环境治理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价值。认为经济变迁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影响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并以“四条主线”为研究线索和分析框架,构建了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综合研究的范式,分析了环境治理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转型。^[37]

六、消费社会学

(一) 新型消费

近年来,我国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迅猛发展。新型消费塑造出新的消费主体、消费模式及全新的消费形态。新型消费模式涵盖绿色消费方式、平台消费方式、共享消费方式和新型借贷消费等内容。田翠琴、赵乃诗认为,培育新型消费模式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塑造新型消费主体,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二是构建新型消费政策体系与制度机制。加快新型消费立法及政策评估工作,构建多方共同参与的监管治理体系;三是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促进新型消费品的提质扩容。加强新基建,以信息网络赋能新型消费发展;四是培育新型消费文化,构建新型消费模式的社会支持系统。^[38]

我国农村电商化的态势非常明显,在农村地区“淘宝村”等载体不断兴起和壮大。刘艳冬、王岩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方法,重点围绕居民消费现实和消费潜能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电商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农村电商化既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实际消费规模扩大,也有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潜

能释放,从而获得更大的消费增长后劲。农村电商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挖潜力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其中对消费现实水平的影响程度以中部地区最高,而对消费潜能的影响程度以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化在挖潜农村居民消费方面的作用则不强。^[39]

(二) 能源消费

随着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也逐渐凸显。厘清能源消费、雾霾污染与居民健康支出之间的关联,有助于为健全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有利的理论证据和政策建议。李国柱、陈祎璇以2002—201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为基础,首先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影响居民健康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次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在雾霾污染对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是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PM_{2.5}浓度对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都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同时,由于不同省份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存在差异,也会影响各省份居民健康支出。^[40]

(三) 体育消费

全面激励大众消费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驱动力。王立等采用理论分析、逻辑分析方法对当前大众体育消费的理论基础及制约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体育产品或服务供给力不足、体育消费税制体系激励缺位、微观主体税负沉重、政府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制约了大众体育消费。激励大众体育消费不仅需要政府规制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而且需要提升市场机制对体育消费的资源配置作用,实施“科技+体育”和“互联网+体育”深度融合,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大力培育体育消费市场,扩大体育消费人群规模,达到助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激励调控目标。^[41]

(四) 青年消费

青年是引领新型消费发展的主体与推动消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赵乃诗、田翠琴通过对河北省青年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分析河北青年的消费现状、特征和

社会影响因素,探寻河北青年消费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和发展趋势,为引导青年合理消费、科学消费和创新消费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河北青年不同群体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消费分层。从消费能力、消费支出方式、消费收支平衡状态到消费结构与奢侈品的消费,从吃穿住用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到消费理念与消费选择,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地区的青年都存在着明显的消费差异。河北青年消费具有以下特征:(1)消费分层比较明显。(2)影响河北青年消费结构与消费模式的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收入、学历、年龄、就业状态等因素是影响青年消费的重要因素。(3)河北省青年的超前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不是很突出。^[42]

(五) 养老消费

提高老年人群健康养老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耦合度,不仅可以应对老龄化加速带来的社会压力,同时也能够激发养老消费潜力,提振内需。隗建华基于耦合度模型,定量评估我国各省份健康养老供需耦合度。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健康养老供需耦合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并且区域差异明显。老龄化水平、城乡差距以及人口流失会加剧供需失调的问题,市场化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我国城乡健康养老需求递增与供给不足的矛盾。^[43]

七、公共服务研究

黄华基于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全面探索和分析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发展过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在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均等化的构想,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44]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八年以来,三地多个领域区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大,依然是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新发展阶段河北与京津公共服务差距呈现“一缩小两扩大”特征,兜底保障性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逐步缩小,财政补贴类公共服务及高品质优质服务资源区域差距呈扩大态

势。郑萍认为,河北亟需精准对接“两翼”带动新格局发展,聚焦重点领域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以优质公共服务带动河北公共服务整体水平提升,创新跨区域服务衔接机制,完善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制度,充分释放市场潜能弥补投入短板,与京津错位培育公共服务新增长点。^[45]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区域协同合作进入纵深推进的新阶段,公共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合作亟待深化,而数字化转型则是一条必然之路。白翠芳等分析了当前京津冀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和障碍,提出需加强区域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以公共服务协同场景化应用为突破口、促进区域数字化创新实践的交流扩散等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策略建议。^[46]

(田翠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林顺利,蔡璟浩.从“治理失灵”到“动员有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社区应急治理体系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6).
- [2]韩梦娟,张丽丽.提升市域政府科技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22(11).
- [3]白献阳,邝苗苗.政府数据治理研究进展[J].文献与数据学报,2022(1).
- [4]高艳,韩志明.清晰与模糊交织的治理图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前景及未来[J].浙江学刊,2022(3).
- [5]王凤丽.互联网社交重塑社会生活空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7-20.
- [6]杨福忠,姚凤梅.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之维度及风险法律防治[J].河北法学,2022(11).
- [7]崔志梅.饭圈的日常极化:表现形式、发生机理与演化效应[J].中国青年研究,2022(10).
- [8]王金营,李庄园,王冬梅.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基于增强经济实力的认识[J].人口研究,2022(4).
- [9]吕红平,吕沫含.中国人口区域分布:变化态势与原因分析[J].人口与健康,2022(10).
- [10]王朋岗,黄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及其可能的社会经济影响[J].人口与健康,2022(2).
- [11]王广州,胡耀岭.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J].人口学刊,2022(6).
- [12]吕红平.适度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J].晋阳学刊,2022(1).
- [13]任兰兰,向东.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演进与优化路径[J].人口与健康,2022(5).

- [14]李国柱,刘美晨.新生代流动人口多维性社会融入研究[J].江汉学术,2022(3).
- [15]王朋岗,吴润贤,马文腾.生活压力和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社会,2022(6).
- [16]王立军,王玥,胡耀岭.中国教育获得性别差异逆转下婚姻有效供给匹配失衡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2(3).
- [17]张敬伟,李琪琪,靳秀娟.中国农村女性创业者的身份构建过程研究[J].管理学报,2022(5).
- [18]张国梅,金浩.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参与者驱动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2(7).
- [19]倪丽丽,鄯茗,周志宇.基于老年可达性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适老化布局研究——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J].城市问题,2022(8).
- [20]杨青建等.基于选择、优化和补偿模型理论的城乡老年人成功老龄化与健康坚韧性的关系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22(14).
- [21]王爱峰,董尧.基于灰色理论的京津冀老龄化趋势对比及老龄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22]梁晨.转型时期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分异——发展逻辑映射与规划响应机制[J].城市规划,2022(7).
- [23]马林靖,李培速,伍亚红.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省际面板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22(6).
- [24]高玉敏.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与推进路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25]王华东,姜伟芝.基于 Cite Space 的农村“空心化”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J].乡村科技,2022(8上).
- [26]封文波等.留守儿童及留守经历者人际社会化与自我成长干预研究[J].西部学刊,2022(7下).
- [27]王宏斌.多维视域中的环境治理现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28]冯琰玮,甄江红,田桐羽.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保护修复优化——以内蒙古呼包鄂地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2(11).
- [29]程慧,秦晓依.基层环境政策“一刀切”执行逻辑与改进策略——以禁养区政策执行为例[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30]王小平.数字经济与环保服务业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1]康振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理论实践贡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2-23.
- [32]田翠琴.加快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步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2-23.
- [33]田翠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河北经济日报,2022-11-26.
- [34]张妮,赵晓冬.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行建设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6).
- [35]王殿茹,薛少冰.中国人口密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5).
- [36]李国柱,李晓壮.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动态影响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2).
- [37]齐心.河北经济变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N].河北经济日报,2022-5-14.
- [38]田翠琴,赵乃诗.培育新型消费模式的有效途径[N].河北经济日报,2022-7-2.
- [39]刘艳冬,王岩.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2(16).
- [40]李国柱,陈祎璇.能源结构、雾霾污染与城市居民健康支出关系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22(6).
- [41]王立,罗帅呈,郑志强.我国大众体育消费:理论探源、制约因素与实施策略[J].企业经济,2022(2).
- [42]赵乃诗,田翠琴.河北青年消费现状与社会影响因素分析[C].载《河北青年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43]隗建华.城乡老年人群健康养老消费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耦合度评价[J].商业经济研究,2022(10).
- [44]黄华.公平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45]郑萍.河北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选择[J].经济论坛,2022(6).
- [46]白翠芳,王勃,苏炜.京津冀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探索[J].中国国情国力,2022(4).

教育学

教育学研究

薛滩

一、2022年教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2022年省内教育学研究成果总体上较多,

有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或地方教育发展有一定指导或借鉴价值。表现为:研究报告主要针对河北域内实际问题进行,相当一部分成果得到领导

的批示,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较好参考;学术论文数量总体可观,涉及面比较广泛,理论价值比较高,有的具有一定的研究、指导和实践价值;专著或编著一方面对学科建设有补充或提升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河北的教育现实,有助于操作实施。这些成果的取得,既是研究者努力的结果,也是学科需要或者地方建设使然,对于提升河北教育质量,促进河北教育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教育社会生态和基础教育

教育是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基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以,规范性的基础教育应该从孩子进入幼儿园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初期,基本上到高中毕业为止。可见,基础教育贯穿了人的幼年、少年、青年初期等各阶段。对人和社会发展有基础性作用,不可小觑。

傅松涛等从教育理论角度,对社会差异、社会差别与教育公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1]认为“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分的社会现象、理念和话语,是正确感知、认识、反映、建构和实践教育公平直至社会公平的科学前提、元素和元论。教育理论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对此似乎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认识。教育社会生态体系能够积淀、传承、促进和优化社会差异,不断提升和增进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形态与质量;也可能被动退行地把社会差异强化、扭曲、嬗变、固化和拉大社会差别,沦为不断降解和阻隔人类社会生态生存发展质量的帮凶。健全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立足和遵从社会差异的平等实质,遵从和建构科学有效的社会公正本质,不断激发、推进和生成社会差异的全质融合,激活、提升和优化教育社会生态体系的生机与活力。

武海英等通过调查发现,目前的家庭教育理念相对滞后,教育内容不够全面,学校和社会支持严重不足。^[2]认为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是教育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奠基性作用。家庭教育从存在状态看,需由内隐回归外显;从传递方向看,需由单向度转向双向度;从内容和宗旨来看,需由科学化转为综合化;从教育对象看,需由侧重培养儿童转为

兼顾家长;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关系看,需由割裂向综合统一转化。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和家长的主体作用,有力发挥学校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支持作用,形成“家校社”三方联动机制,推动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

范明丽等认为,教师工作投入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园的保教质量,进而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3]通过对394名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工作生活质量与组织承诺的总体水平较高,且呈显著正相关;工作生活质量当中的福利待遇、领导管理、教学特性三个维度能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在工作生活质量和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两个维度达到显著性水平。所以,幼儿园的领导管理应以人为本,为教师减负增效,并着力提高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同时应注意增强教师的情感承诺,提高其规范承诺。

王艳芝等认为,教师数学语言的使用对幼儿的数学学习具有重要作用。^[4]通过对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动进行视频分析,借鉴TIMSS1995师生言语编码将教师数学语言划分为提问类、信息类、指示类和领会类数学语言,发现教师数学语言具有情境性、准确性、简洁性和重复性等特点。教师在使用数学语言过程中,封闭型提问过多;信息类数学语言缺乏层次性;指示类数学语言具有表面性;领会类数学语言缺乏针对性。教师应重视数学语言的教育作用,在活动前做好精心的设计与预设;在活动中利用教育机智把控数学语言;活动后及时反思,在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的循环过程中建构和提升自己的数学语言。

薛国风认为,为了取得更好的育人效果,有必要反思现有劳动教育。^[5]要重新认识劳动教育所具有的身体教育、生存教育和社会教育基本性质;也有必要把握“真”劳动、体系化、联盟性等行事原则;有必要重构多方面策略,比如突破劳动教育认识上的局限、加强劳动教育制度保障和资源共享配置机制、重视劳动教育师资培训与社会化师资招募、构建有生命力的劳动教育体系等。

薛国风认为,少先队组织作为我国促进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力量,应积极参与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6]少先队组织要立足培养中国“红孩子”的政治立场,遵循主动性、革新性与协作性原则,以积极融入和主动创新方式参融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并可通过系列可行举措着力开展实际行动,在做出特色贡献的同时为中国儿童打造幸福成长路径。

江雪梅认为,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一定冲击。^[7]“双减”政策中明确提出:一减“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二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教育部针对中小学生的“体质”“睡眠”“手机”以及义务教育学校“作业”“考试”“课外读物”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从贯彻落实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双减”政策。

王永颜等认为,在“双减”背景下,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双减”后增效、提质的重要途径之一。^[8]“双减”为开展劳动教育留出时间和空间、为家长关注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提供机会、为学校 and 教师实施劳动教育开辟新机。在“双减”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全面实施面临着家长和教师劳动教育的责任意识不强、分数至上的传统观念难以很快消除、在学校的具体实施中仍然存在诸多困难等挑战。全面有效实施劳动教育,应家校配合使劳动教育成为“双减”共识,深化劳动教育评价改革以适应“双减”要求,多渠道使劳动教育在“双减”后做“加法”。

薛彦华等认为,学校改进作为当今促进中小学校发展的一种重要策略而备受关注。^[9]当前学校改进仅仅依靠外援支持显得有些动力不足,学校更应该从内部寻求改进和发展的动力。在学校组织架构中,校长处于领导地位,校长负责制的实施、组织赋予校长的职责以及校长良好的个人素质,使校长领导力作为学校改进内生动力成为可能。为了推动学校改进持续有效进行,可以从校长愿景领导力、课程领导力、团队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四方面做出努力,以期促进学校向更高水平发展。

潘新民等认为,基于信息化的优质教学资源供给是提升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10]当前资源供给主体参与程度不足且协同性

差、供给内容缺乏多样性和乡土性、“在地化”资源库缺乏、网络学习空间与同步直播课堂普及度低,资源供给与教师使用存在供用矛盾。破解供给难题,需要坚持政府在优质资源供给中的主导地位,调动各方协同积极性;以乡村学校教学需求为导向开发适切新资源;加强“在地化”教学资源库建设;开展教师培训,提高乡村教师信息化理念和实践能力。

三、教师教育

于川等认为,“双减”政策是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重要战略决策。^[11]从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但也将不可避免地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所以,以风险管理理论为依据,搭建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管理框架,通过识别和分析这一政策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外显型风险和内隐型风险,提出了以学校层面的风险控制为基本核心,以家庭层面的风险分散为基础保障,以社会层面的风险分散为必要补充的三方联动式风险化解之策。

史晓燕等认为,教师教学评价是一种对教师教学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活动,应强调教师组织教学的一面。^[12]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的运用价值表现为,对教师个人而言,能够在教学与评价中发生学习;对学校组织而言,可以重构学习生态,实现增值评价。“嵌入”反映了评价与教学的关系,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以“共域”“融入”“互动”为基本特征。由重工具价值趋向强调目的性价值、从重视外在价值转向追求内在价值、多元主体价值替代单一主体价值是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对传统教师教学评价的价值重构。构建多元主体的信息支持系统、信息技术与教学及评价的深度整合、教师个体的反映性实践是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的实践逻辑。

周文佳认为,网络技术发展形成了崭新的教育环境,教师要理性认识新的环境变化,才能在时代潮流中找准定位、有效应。^[13]网络环境下教师的教育理性应该包括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等。但从实践来看,很多教师在网络环境下缺乏理性,因此,管理者需要从多方面促进教师的教育理性发展:深化技术功用理解,正确定

位自身角色职责；加强个体对技术的掌握，夯实教师的认知基础；全面提高个人素养，以便教育系统审视问题；落实人本理念实践，端正个体教育价值追求。

四、职业教育

刘奉越等认为，产教融合已成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国家战略。^[14]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北大中文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作为数据来源，以929篇文献作为样本，综合采用文献计量法和文本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已有成果基本沿着“内涵和机制研究-问题和对策研究-改革发展研究”这一脉络演进，“政策保障研究”贯穿于始终，形成了由产教融合本质、动力因素、模式、保障机制和效应评价构成的话语体系。未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深化专业群建设研究、关注产教融合的组织形态、彰显区域特征和运用实证研究范式。

韩喜梅等认为，职业院校参与第三方评估是推动职业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改革的关键力量。^[15]在第三方评估实践中，职业院校存在评估态度淡漠、评估“意愿力”不强、评估信息封闭、评估“供给力”不足以及评估监督疲弱、评估“保障力”不佳等实践困境，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估实践的推进。为此，职业院校要转变评估观念、增强主体意识和专业认识，以“新”评估理念提振评估意愿；要规范信息统计制度、创新信息管理方式和信息公开制度，以“全”管理机制来提升评估供给；应完善内部监督、建立信息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以“强”制度设计来增强评估保障。

朱文富等认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16]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因此，高职院校要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劳动教育合力，筑牢课堂教学阵地、增强劳动意识，创设多元教育实践平台、提升劳动技能，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建立科学评价体系，通过上述策略全面推动劳动教育，切实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五、成人教育

薛国凤等认为，实践教学对于高校成人继续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17]高校成人继续教育实践教学存在顶层思想认识上缺乏足够重视、课程设计上缺乏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创新、师资配备上缺乏有足够情怀和胜任力的指导教师、基地建设上缺乏与周边社区的密切联系和有效沟通等问题。服务学习作为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施行的高影响力实践教学理念与方式，对高校成人继续教育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高校可通过更新观念、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与项目开发、设立专门服务学习中心等有效对策，在成人继续教育实践教学领域加以推进和开展。

常志伟等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满足社会和个体需求为根本出发点。^[18]其40余年发展历程聚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注重自学考核评估；初创办学体制，调动社会人员积极性；严控办学质量，培养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扩大服务范围，优化农村高等教育；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搭建学习型社会平台五个阶段。通过挖掘其价值逻辑可以发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逐渐简政放权、关注个体、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重、规范化统整。展望未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趋向媒体技术、扩展服务领域、持续深入农村、拓宽职业教育范畴。

刘奉越等认为，高素质农民培育是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是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19]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一个逐渐演进的历程，是在职业农民培育、新型农民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并不断得以深化和升华。在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有“田间学校”模式、“阶梯递进”模式、“多元联动”模式和“数智循环”模式。高素质农民培育遵循一定的行动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专业人”为目标、以政企为主体、以产教深度融合为抓手、以数字赋能为支持等四个方面。

六、高等教育

哈明虎等认为，校训校风文化工科类高校在工程教育实践和校园文化遗产创新中有着重要作

用,^[20]是胸怀“国之大者”,传承工匠精神,汇聚师生员工和校友大认同、大愿景,凝练形成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大工程文化的核心。校训校风文化的提出及意义、概念、特征、育人实践及成效,对工科类院校校训校风文化理论探究及其育人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肖广德等认为,数字化已经成为新时期推动教育变革的关键力量。^[21]教育需求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重塑其新能力,事关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根据高等教育的业务范围及人员主体构成,需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与服务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领域,以数字化的基础数据、环境、业务职能、组织结构及体系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进行数字化创变,从保障、行动与操作三条路径共同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落地。

顾岩峰等认为,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适度集聚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2]应当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着重考量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高等教育集聚的邻域关系表明知识存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高等教育集聚对于区域和区际间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以河北省为例的内部关系分析表明,在高等教育资源的总体发展程度及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但反映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均等化程度的洛伦兹曲线表明,在考虑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情况下,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仍有待改善。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河北省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应当重点加强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机械、环保、经济管理等产业相关专业,从学科总量、适应性结构、功能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王喜旺等认为,在“双一流”建设中,一流人才培养是最主要的目标。^[23]一流人才的培养需要依赖大学中的“从游式”教育。所谓“从游式”教育,是学生在学校的日常实践中自觉追随教师,与教师进行充满生机的互动,二者共同分享从容自在的精神状态等要素的综合。这一教育形态不仅对于学生完善的知识结构的形成、思维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学生德性的养成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想使“从游式”教育在一流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就需要学校聚集一

批智性与德性上堪为学生楷模的教师、学生具备自觉的个人素质提升意识、增加师生在课外的接触机会、学校具备游刃有余的精神空间、师生关系亲密等条件。

段洪君等认为,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以本为本”: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要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四个回归”:回归常识——学生要刻苦读书学习;回归本分——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回归初心——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回归梦想——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是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基石。^[24]“怎样培养人”是高校提升本科教育水平与人才培养能力必须回答的问题。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思路与举措: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立德树人;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加强内涵建设,建设高水平本科专业;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卓越创新人才;建设质量文化,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王喜旺等认为,新建本科院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5]经历了新建发展阶段后,正在积极探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从关注办学条件以及硬件建设聚焦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上来。因此,回归课堂教学,开展“课堂革命”成为现阶段新建本科院校的首要任务。从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内涵入手,明确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的背景及动因,进而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四个实践操作层面指出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的取向,以期能够为新建本科院校更好地开展“课堂革命”提出有益的参考。

薛文飞等认为,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阵地。^[26]随着考生数量和招生计划不断扩大,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自命题科目安全问题;自命题科目与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统一划线,存在竞争公平性问题;同专业考生考试内容不同,对择优复试选拔工作造成困难。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通过优化学科体系建设,统一命题,完成初试基础能力的选拔;通

过“招考分离”，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强化复试选拔环节，增加复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保障生源质量。

七、中国教育史

王喜旺等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已经陷入理论上非常重要但事实上极其次要的窘境。^[27]主要原因是当前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学意义”得到充分彰显，而“教育学意义”却被遮蔽了。教育史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之所以会被遮蔽，其根本原因是教育史研究从业者是用“史家的逻辑”来支配其研究。因此，就需要教育史研究者从“史家的逻辑”的运思方式转向“事件的逻辑”的运思方式。要想使“事件的逻辑”的运思方式真正落到实处，变为研究者的学术实践，需要教育史研究者确立历史上的行动者必须依赖大量非理性因素采取行动、古今行动者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显著等认识前提，切实掌握无立场思维、运用古人的概念思考问题、返回主流与边缘开始分叉的原点观察历史等思维技术。

吴洪成等认为，南朝时期各类思想交织复杂，玄学及佛学势力上升。^[28]南朝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同时，兼及玄学、文学、史学、律学及数学的发展。中央官学教材以《三礼》《孝经》《论语》《周易》《毛诗》等儒家经学教材为主；私学除了采用儒学经典外，尤其重道家学派和易经的教学；南朝蒙学教材《千字文》为教材史上的杰作。南朝教材呈现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化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唐代实行儒、道、佛并立的文教政策，统治者重视道教、佛教的教育。^[29]吴洪成等认为，唐代不仅设立专门的道教学校，而且编书撰经活动丰富。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寺院纷纷建立，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宗教教材。唐代宗教教材对中国后世的宗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对海外宗教教材有一定的辐射影响。

李占萍认为，近代小学教育惩戒制度经历了新式学堂、清末小学教育和民国小学教育的演变过程。^[30]小学教育惩戒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对学校管理发挥了规范和引领作用，小学体罚问题也同时引发了社会关注，逐渐成为研究主题，最终促成了民国废除体罚的举措。所以，正确分析政策文本及其能力限度，加

强制度理解是制度实施的基础；健全制度，激发自育意识，培养良好习惯，吸纳全社会的关注力量，推进小学教育惩戒制度的实施；加强小学教育惩戒制度研究，有利于小学教育惩戒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吴洪成认为，壬戌学制对职业教育的办学目标、学制编制、课程设置以及实习训练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31]力图解决中等教育中升学与就业的矛盾，实现普通学科知识技能与职业专门教育的有机结合。尽管将职业训练提前至小学阶段存在着操之过急之嫌，但这体现了对学生学习与未来求职关系认识的积极取向。另外，职业教育课程的选科与学分制度设计能有效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

刘京京认为，民国时期师范生开展了修学旅行活动。^[32]师范生修学旅行活动得以广泛开展，受益于相关制度的支持和经费政策的保障。民国时期六所高师开展了以参观考察国内外教育及实业发展状况和自然风光、文化史迹等为主的修学旅行活动。师范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兼具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双重特性，活动目的兼顾参观学习与社会调查，活动空间广涉国内外多场域，活动保障源于经费政策和相关制度的多方支持。师范生在参与修学旅行活动的过程中，构建了理论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实现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真正结合。

刘京京等认为，抗战期间高校将自身影响逐渐渗入内陆地区的过程中，高校教师成为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承担者之一。^[33]在爱国精神的驱动下，高校教师立足社会实际需求，充分发挥智识优势，开展了以社会教育、科研推广、改良风气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活动，发挥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教师所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成功推动了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了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进一步唤醒了民众爱国热情。与此同时，教师们也在投身社会服务事业的过程中增进了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了自身的专业发展。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简称河北女师学院）抗战时期西迁陕甘并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办学。王永颜等认为，家政系是河北女师学院唯一建制迁入，并一直独立办学的学系，^[34]为传承河北女师家政教育血脉作出重要贡献。西

迁时期,家政系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不畏艰辛、潜心学业。种类丰富的专业课程、形式多样的实习实践以及规范的日常管理,体现出家政系的办学特色,保障了培养的学生质量。学习之余,学生们积极参与自治、体育、文艺以及抗战救国等各种活动,并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积极向当地民众宣传家事教育,开展家事讲习、讲演和普及活动,为西北地区家政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永颜等认为,西北联大在抗战烽火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兴学强国、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为精髓的西北联大精神。^[35]伟大的西北联大精神对今天的教师教育发展也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在教师培养体系、师范生培养质量、扎根乡村的教师培养方面出现了诸多现实问题。回顾历史,立足时代,传承西北联大精神,培育矢志爱国奉献的新时代师范生,创新高质量师范生培养的实践路径,强化师范生扎根乡村的时代使命与担当是西北联大对发展高质量教师教育的重要启示。

王喜旺认为,西南联大“从游”教育是当时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36]从生成来看,“从游”教育从理想变为现实需要一系列条件相互支撑,这些条件包括学识与德性兼美的“大师”高度集中、教师课堂教学与日常生活中的魅力展现、师生共同的价值取向以及学校领导“从游”教育思想的自觉倡导。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学生才会由发自内心地敬重转变为师生充满生机的“从游”。而梅贻琦的“从游”教育思想是其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一大贡献。^[37]所谓“从游”是学生参与到教师在学校的日常实践,与教师进行充满生机的、自在的互动,最终受到教师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对于学生的“明明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学生完成“新民”的重任也不可或缺。要想使“从游”这一过程从理想变为现实,就需要教师自觉承担启智与育德的双重职责、教师自觉讲求品格修养、增加师生在课外的接触机会、学生具备自觉的个人修养意识、学校具备自由的氛围等。

八、比较教育

李文英认为,发端自苏联、兴盛于中国的辩证唯物论流派是比较教育学的的一个重要理论流

派,^[38]在比较教育学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创始人克鲁普斯卡雅的比较教育思想有助于深入认识比较教育辩证唯物论理论流派,弥补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克鲁普斯卡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比较教育学,主张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重视比较法和历史因素分析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呼吁中小学校大力开展国际主义教育,对资本主义教育实质和弊端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克鲁普斯卡雅的比较教育思想不仅对苏联比较教育影响重大,而且对世界比较教育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薛国凤等认为,增强组织光荣感是新时代我国少年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少先队组织对少年儿童培养的应有之义。^[39]捷克共和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先锋组织”作为捷克国内重要的少年儿童组织,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少年儿童光荣感培养的主要途径,通过开展以促进团队合作为宗旨的体育竞技活动、促进个人价值实现的助人利他活动、强化组织归属感的俱乐部活动以及专门服务特殊儿童的主题活动等,推进少年儿童组织光荣感的发展,表现出教育实践多样化与强调情感体验性、人文关怀性、开放性等特点。可借鉴其经验,通过在实践中践行荣辱价值观,以社会服务为实践载体,以全纳性为实践活动设计原则,以组织间合作为实践活动重要纽带,大力培养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组织光荣感。

王文利等认为,2017年日本创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机构——专门职大学。^[40]专门职大学突出高水准实践性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聚焦培养具备丰富创造能力和卓越实践能力的专门职业人才,以校企合作育才为范式建立人才培养新机制,以服务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为导向规划学科专业布局,以实践性为特质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以实务型与研究型并重为原则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初步构建起具备教育类型独特性和职业教育层次高水准双重内涵的人才培养模式。专门职大学的职能定位、制度设计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益参照和启示。

朱文富等认为,日本已逐步建立了并行且互

通于普通教育学位体系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41]在该体系中,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基于不同动因而先后建立,且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也面对着各自的新旧问题。深入探究日本职业教育学位体系的构建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历史经验,提出对“重普轻职”问题的缓解应有必要前提、在职业教育框架内开发职业教育学位、保障职业教育学位的“学术性”等经验以资借鉴。

朱文富等认为,法国国家官僚主义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监管等负有主要责任。^[42]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法国地方分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加速,加上经济转型对于政府放松管制的内在需求以及政府解决青年高失业问题的迫切需要,法国曾经高度集权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逐步向分权和共同协商管理体制过渡。目前,法国教育部与其他部委、行业、私营机构等共同参与了职业教育的创建和管理过程,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合作者也在职业教育的创建和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法国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当代变迁主要是由国家力量驱动的,由于各利益团体参与变迁的范围和程度仍然非常有限,加上许多体制机制问题难以解决,进一步变迁成为必要。

朱文富等认为,专科大学是韩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3]与普通四年制大学共同搭建起韩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专科大学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在政府推动下由初级大学、专科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改编而成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科大学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得到快速发展,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办学模式日趋成熟;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应对一系列内外部挑战,专科大学持续开展了以“特性化”为核心特征的改革,办学水平和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专科大学形成了办学定位明确、学科设置科学、产学研合作紧密、多元职能共存等显著特色。

张栋科等认为,通过实施高质量的职业预备教育促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44]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在2010—2020年期间启动了首期“教育链”职业预备教育行动,

通过把潜力分析、职业定向和职业入门支持等三种手段有机结合来实施职业预备教育行动,进而有效帮助青少年群体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过渡。德国职业预备教育行动的经验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秉持个性化、包容性的职业预备教育理念,完善多层次、系统化的职业预备教育实施路径,打造多类型、专业化的职业预备教育师资队伍,建构多主体、协同化的区域教育链支持体系。

薛彦华等认为,为提高大学生自觉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识,美国学者采用实验研究法,进行了主观无意行为干预、主观故意行为干预和综合干预三种类型的干预研究。^[45]研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干预阶段、验证阶段。结果显示:写作练习和案例教学对减少无意的学术不端行为发挥了显著作用;诚信教育能显著提高大学生学术诚信水平,减少故意的学术不端行为;综合干预也有效减少了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建议:一是开展案例教学,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二是立足中国国情,规范高校诚信教育;三是开展跟踪研究,保存跟踪研究数据。

九、教育技术

张攀峰等认为,人工智能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46]以STEAM教育理念为基础,在充分探究STEAM教育的前提下,发现STEAM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融合STEAM教育的人工智能教育具有多种教学优势,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STEAM教育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模式”:创设情境,思考问题,组织探究,展示评价等。实施策略为: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策略;采用多元评价方式的策略;转变教师思想与角色的策略。希望能够为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发展提供支持,以改进和完善人工智能教育模式,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

薛文飞等认为,疫情防控背景下,教育信息化2.0环境下在线教学为高校师生互动教学提供了新思路。^[47]通过对部分全日制研究生在线学习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从网络教学开展情况、学习适应性、在线互动、监督管理及学习体验五个维度对学习者在线学习满意度进行分析,得出大多数研究生对于线上教学形式的灵活便捷予以肯

定, 学生认为线上课堂互动与传统授课差别不大, 线上授课的教学督导更加严谨到位, 学生线上学习积极性较高, 多数教师线上教学会主动收集学生主观意见。提出了重构网络教学新“生态”、更新评价反馈方式、重视课堂交互有效性及加强督导检查职能来进行有效在线学习实施。

徐莉等认为,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为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勾勒了一幅宏伟蓝图,^[48]其终身教育理念和构建服务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社会转型开启了智慧之旅。从传统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型的过程是教育理性化过程, 随着时代变迁教育理性与教育价值从博弈经历耦合再到趋同, 终身教育理念以重新审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逻辑起点, 反思和批判传统教育之弊, 重构教育新形态, 其理性与价值始终辩证指向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发展。

总之, 2022 年河北教育研究成果彰显了其学科研究的能力和实力, 理应受到重视与肯定。但是, 理性分析就会发现其研究层次和成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表现为: 第一, 在全国或者同行业内有重大影响的教育科研成果比较少。尤其是专著或编著类图书, 不但数量少, 也与已出版的图书内容重复较多; 第二, 教育特色研究不足。京津冀一体化教育研究、雄安新区教育研究成果鲜见; 第三, 河北革命老区教育研究较为缺乏。已有的研究成果倾向于我国西南、西北地区, 而且以高校为主。河北相当一部分地区是革命老区或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绩斐然, 这其中教育的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而专门专项研究匮乏; 第四, 教育研究成果针对性不足。因此, 河北教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除了一般性研究、学科专家针对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之外, 特色研究、专项研究、应用研究等应该经常化、持续化, 并逐步提升其研究价值。

(薛淮: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傅松涛, 王冉. 社会差异、社会差别与教育公平[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3).
- [2] 武海英, 赵蕾蕾. 新时期家庭教育的内涵、现状与对策[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3).
- [3] 范明丽, 刘佳. 幼儿园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J]. 学前教育研究, 2022(08).
- [4] 王艳芝, 徐丹丹. 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使用数学语言的问题及对策[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09).
- [5] 薛国风. 青少年劳动教育实施的认知与策略重构[J]. 中国德育, 2022(09).
- [6] 薛国风. 为“红孩子”打造幸福成长路径: 儿童友好理念下少先队组织教育及实践活动的开展[J]. 少年儿童研究, 2022(04).
- [7] 江雪梅. “双减”后的学校与家庭教育[J]. 河北教育(综合版), 2022(06).
- [8] 王永颜, 孙欣雅.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劳动教育全面实施研究[J]. 教育评论, 2022(08).
- [9] 薛彦华, 李佳. 校长领导力作为学校改进内生动力的内涵、依据与策略[J]. 教学与管理, 2022(03).
- [10] 潘新民, 金慧颖. 乡村学校信息化优质教学资源供给困境与出路[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07).
- [11] 于川, 杨丽乐.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分析及其化解[J]. 当代教育论坛, 2022(01).
- [12] 史晓燕, 赵利曼. 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 价值重构、实践逻辑与运用价值[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09).
- [13] 周文佳. 网络环境下教师的教育理性探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11).
- [14] 刘奉越, 王丽婉, 高婷婷.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话语体系构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2).
- [15] 韩喜梅, 陈沛西. 基于职业院校视角的职业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估探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19).
- [16] 朱文富, 赵秦.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意义、特征及策略[J]. 教育与职业, 2022(05).
- [17] 薛国风, 纪宏茹. 服务学习: 高校成人继续教育实践教学改进的新理念[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13).
- [18] 常志伟, 李洪岩.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演进与未来展望[J]. 成人教育, 2022(08).
- [19] 刘奉越, 李洪岩.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演进、模式及行动逻辑[J]. 职教论坛, 2022(12).
- [20] 哈明虎, 刘胜, 王彦林. 校训校风文化理论探究及其育人实践——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 2022(01).
- [21] 肖广德, 王者鹤.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领域、内容结构及实践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11).
- [22] 顾岩峰, 何森.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集聚”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与策略选择[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6).
- [23] 王喜旺, 陈博. 一流人才培养与“从游式”教育[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17).
- [24] 段洪君, 郭戈. 提升本科教育水平与人才培养能力的路径[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2(09).
- [25] 王喜旺, 陈博. 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探论[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3).
- [26] 薛文飞, 张浩, 李晓雅, 赵记龙. 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 试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 [27]王喜旺,马鑫丽.事件的逻辑:开发中国教育史研究思想潜能的工具[J].河北学刊,2022(04).
- [28]吴洪成,张美玲.南朝学校教材初探[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
- [29]吴洪成,张美玲.唐代宗教教材初探[J].教育与考试,2022(03).
- [30]李占萍.中国近代以来小学教育惩戒制度的演变及启示[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2(04).
- [31]吴洪成.壬戌学制与现代职业教育[J].教育史研究,2022(04).
- [32]刘京京.民国时期师范生修学旅行活动的产生、开展及其特点——以六所高师为中心的考察[J].教师教育研究,2022(03).
- [33]刘京京,付延.抗战时期内迁高校教师社会服务活动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2(01).
- [34]王永颜,韩旭帆.西迁时期河北女师范学院家政系学生生活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05).
- [35]王永颜,韩旭帆.西北联大精神意蕴及其对新时代教师教育的启示[J].教师教育论坛,2022(01).
- [36]王喜旺.“从游”教育的生成机制:以西南联大为个案的阐释[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19).
- [37]王喜旺.梅贻琦的“从游”教育思想新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04).
- [38]李文英.比较教育辩证唯物论理论流派的开创——克鲁普斯卡雅比较教育思想初探[J].比较教育研究,2022(05).
- [39]薛国风,王明.少年儿童组织光荣感的社会化培养——基于捷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先锋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的启示[J].少年儿童研究,2022(12).
- [40]王文利,苏月.日本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制度建构与人才培养实践——基于14所专门职大学的考察[J].中国高教研究,2022(07).
- [41]朱文富,孙雨.日本职业教育学位体系的构建历程与经验[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05).
- [42]朱文富,荣艳红.法国国家官僚主义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当代变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2).
- [43]朱文富,葆乐心.韩国专科学校的演进历程与办学特点[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44]张栋科,王泽,陈娜娜.德国“教育链”职业预备教育行动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2(07).
- [45]薛彦华,张小宁.美国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干预研究及借鉴[J].煤炭高等教育,2022(02).
- [46]张攀峰,张楠.基于STEAM教育的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模式设计研究[J].中小学电教,2022(01).
- [47]薛文飞,李军,张攀峰.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全日制研究生在线学习满意度分析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03).
- [48]徐莉,肖斌.新时代终身教育的理性遵循与价值诉求[J].中国电化教育,2022(06).

课程与教学研究

闫树涛 张天添

2022年,河北省在课程与教学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成果的数量比较多,研究者所涉及的学校覆盖面比较广,除了师范类高校和综合大学教育学院之外,很多其他类型的高校开展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人数也比较多。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既有课程与教学理论方面的深入分析,也有本土实践的探索论证。三是研究的主题密切跟踪当前教育领域改革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既有对外在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分析,也有课程和教学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研究。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高水平的课程理论和教学改革分析成果比较少,对规律性、本土性特征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等。

一、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

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是对课程与教学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和高度概括,是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基础,对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既体现在对我国本土教育领域课程与教学规律与特点的认识和总结,也体现在对国外先进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吸收和借鉴。

王喜旺等针对新建本科院校提出了“课堂革命”的主张,认为回归课堂教学,开展“课堂革命”成为现阶段新建本科院校的首要任务并有着深刻的背景及动因,“课堂革命”的取向是努力解决课堂教学实践操作层面存在的实际问题,确保改革有的放矢。具体而言,就是要推进教学目标革命,从低阶目标向高阶目标转变;推

进教学内容革命,从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转变;推进教学方式革命,从传递灌输式向对话参与式转变;推进评价革命,从片面评价向全面评价转变,实现教学评价的全方位转变,能够为持续性改进课堂教学提供更具价值的信息反馈。^[1]

崔佳将课程参与度作为一个独立场域,通过对国内外课程参与度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厘清课程参与度的构成要素,并构建了包含“两维五要素”的课程参与度构成模型,研究并分析各构成要素的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关系。^[2]在另一项研究中,崔佳、罗萍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访谈和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构建涵盖6个维度、15个方面的本科生课程参与度影响因素模型,提出了提升参与度的对策建议,包括:关注学习过程,促进本科生深度参与;重视学习心理,激发本科生自主参与;精准设计教学,引导本科生自然参与;完善教师自我,引领本科生有效参与。^[3]

薛国风借鉴服务学习理念的核心思想,分析了其对我国高校文科实践教学的意义和适切性,以及当前我国高校文科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实践教学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过程性管理和评价要求比较随意;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缺乏支撑力,教师培训和资金支持不够稳健;实践教学中学生实际参与度低,实践过程指导和结果反馈不到位;实践教学整体设计缺乏多边共赢理念,合作意识与互动协作机制有待提升。薛国风认为,我国高校可以主动学习和借鉴服务学习理论基本思想推进文科实践教学改革,具体对策包括转变指导理念,从“知识学习”走向“服务学习”;转变目标朝向,从“单一化”走向“综合化”;转变教学实施过程,从“松散型”走向“紧密型”;转变教学效果评价,从“随意化”走向“科学化”。^[4]

史晓燕等认为,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评价理念的转变,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应运而生。“嵌入”反映了评价与教学的关系,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以“共域”“融入”“互动”为基本特征,奠基于对传统教学评价的价值重构,体现在由重工具价值趋向强调目的性价值,从重视外在价值转向追求内在价值,多元主体价值替代单一主体价值。评价过程涉及评价信息的供给及接纳机制,反映了评价的实践逻辑,体现为构建

多元主体的信息支持系统,信息技术与教学、评价的深度整合,教师个体的反映性实践。嵌入式教学评价对教师个人和学校组织都具有重要价值,对教师而言,能够在教学与评价中发生学习;对学校组织而言,可以重构学习生态,实现增值评价。^[5]

二、课程建设研究

课程体系的构建是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教学实施的基础,研究发现,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成为近年来课程建设的关注点之一。戴俊等研究了新工科背景下机械类专业主干课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的课程体系重构,主张以实践能力和岗位需求为核心进行课程体系的重构,增强大学生的自主参与性和实践能力,推进理论教学 and 实践能力培养的深度整合,推进工科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着重从五个方面推进新课程体系的改革,即以岗位需求为目标进行课程内容的重构,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为目的进行教学模式的重构,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实践能力的重构,以网络为依托进行教育资源共享的重构,注重学习过程进行评价体系的重构,通过教学改革与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6]赵心研究了地方高校广告学专业实训课程体系的构建问题,通过深入实例分析,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三位一体”的实训课程科学布局、适应媒介融合的专业技术革新等内涵建设,师资队伍知识技能迭代、教学环境软硬件升级等外延建设两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探究地方高校广告学专业实训课程体系构建的空间与价值。^[7]王颖等采用访谈法、德尔菲法经过两轮专家函询,探讨了这一特定背景下应急护理学课程体系的构建,新体系包括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26项和三级指标72项,体系特色更加突出、可靠性较好、实用性较强,相较原有教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8]

潘新民等对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现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成果导向理念下提升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品质的主要路径:应以落实“学生中心”理念为基础,涵育教师教育工作者的课程实施观;以师范生的产出能力为抓手,建立灵活的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管理机制;以提升职业适应性为核心,强化教师教育课程实施过程的实

践属性；以培养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探索多元化的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方法。^[9]李保勤等以高中概率课程为例，分析了基于学习科学的 UbD 课程设计（重理解的课程设计）。这是一种以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为学科基础，指向理解和素养的课程设计。研究提出，以学习进阶基本逻辑模型为脚手架的学习科学和重理解课程融合设计，通过初拟核心问题、澄清理解事项来聚焦学科意义理解，学生可借助优质资源，获取大概念而迁移学习，教师则可从学习进阶研究中搭设脚手架而优化教学。^[10]

崔崑对专业认证背景下大数据专业机器学习课程群建设展开实证研究，分析了课程群建设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基于“反向设计/正向实施”理念整合课程资源、根植“学生中心”理念打造特色教学、着眼人才培养打造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等课程群建设实践，并从学生成绩和课程群目标达成度两个方面验证了机器学习课程群建设的成效。^[11]张海霞等探讨了新环境下中医师推拿专业的基础和主干课程——“经络腧穴学”的课程建设，主张要强化课程内容实际，创新教育方法，开展科学评价，要注重课程的前后衔接与延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中医临床思维，提升中医药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质量。^[12]

王群等探讨了护理学专业课程中如何融入 3D 打印技术的新课题，分析了这一技术在护理学理论课、实验课及临床实习中的应用，这种创新性探索与革新，不仅可以发挥传统课程设计的优势，还可以充分展示科技发展对教学的推动作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直观了解所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可以有效提升医患沟通的效果，深化产学研合作。^[13]

三、教学改革研究

质量是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永恒话题，改革是推动教学质量的重要动力。研究者围绕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教学改革提升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杨亮的两项研究对中学地理课程的教学设计给予了重点关注。一篇文章是以人教版“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为例，分析了学习进阶视域

下的地理教学设计，以期为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和新课程改革提供有益借鉴。以学习进阶理念为指导，分析了地理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即在宏观尺度上通过时空结合提升整体思维，在中观尺度上借助角色扮演提升教学趣味性，在微观尺度上结合生活经验提升学生的感性认识。在“人地关系思想演变”学习进阶设计上，强调要围绕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有针对性地进行地理教学设计，在深度思考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知“地”明“理”中将人地观念内化于心，在观念与生活融合汇总将人地观念外化于行。强调要使高中学生真正掌握地理学科思想和学习方法，教师在进行设计时应根据学生的进阶起点和所要达到的进阶终点对教学目标和教学活动进行设置，站在学生发展的角度，通过学习进阶的教学设计分析，实现由知识教学到能力教学的发展。^[14]另一篇文章则以“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为例，分析了单元教学理念下的地理教学设计，认为单元教学有着独特的优势，可帮助教师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教材、学情、课标三个方面展开单元教学分析，按照“确定单元教学主题、明晰单元教学目标、探究单元教学过程、创设单元教学情境”的路径进行单元教学设计。^[15]

成新轩等研究了地方高校经济学类本硕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认为这应成为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探索，成为地方降低人才引进成本、推动区域教育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路径。研究从本硕博贯通人才培养的实施现状入手，揭示了当前地方高校经济学类本硕博贯通人才培养在横向拓展连贯性、横向制度障碍、横向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借鉴重点高校经验，提出地方高校应以核心能力框架为目标，实现纵向与横向统一的发展理念，完善本硕博学科资源配置，制定学科融合激励政策；探索本硕博一体化大平台建设，统筹课程贯通发展；秉持服务地方理念，建立人才保障机制，推行错位发展战略。^[16]

王英辉等通过研发多方协同“立体教学”平台，将教学、工程单位、专家进行组织和流程对接，让学生在“新工科”建设的课程中体验立体教学模式，并以某大学土木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为例进行了应用设计，其优势是利用互

联网技术将课堂教学与工程一线的实践进行对接,并通过第三方专家的现场点评对学生形成多元化的知识点刺激的教学方式,更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具体实践进行融合。^[17]赵金秀等以“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为例,结合土木类专业课程特点探索了新型的“三三四”教学模式,即“线上平台与线下课堂相结合、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三结合教学设计,“课前导学+课中内化+课后提升”的三阶段教学过程,“课前自测+课中表现+课后绩效+试卷测试”的四环节考核方式。通过对该教学模式应用前后学生成绩、竞赛效果、教师成果几方面对比分析,验证了“三三四”教学模式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18]

刘金霞等提出需要以提升临床医务人员的岗位胜任能力为目标,实施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研究借助新发传染病防控的教训和经验,重组传染病学教学内容,构建新的教学方法,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重点等多方面全方位进行传染病学教学改革与实践,为培养临床医务工作者、公共卫生人员甚至有医学基础的行政管理人员等各类医务工作者对传染病的防控意识、防控知识和实践能力提供有效策略。^[19]付大安等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问题,调查三个有代表性的新建本科院校 ESP 教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情况,调查显示:大多数通用英语教师已经意识到 ESP 教学的重要性,已经有从事 ESP 教学的思想准备,但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知识严重缺乏,对“一带一路”了解很少;ESP 教学效果不佳,ESP 师资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基于此,研究主张要构建两个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体系:具有校本特色、基于 ESP 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和具有校本特色、突破 ESP 语言属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教学体系。^[20]

四、高校课程思政研究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的课程育人成为新时代高校育人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既注重认识课程思政建设对高校育人工作的重大意义,又注重结合学校特色以及学科专业要求进行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张秋山等对新工科背景下“滴灌”式课程思政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的实质是以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且具备创新意识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传统工科教育模式中最本质的问题却是忽略了课程本身的文化意义,导致了工程技术人才内心对工程文化的缺失。研究认为,“滴灌”式思政教育模式能够挖掘新工科教育课程自身的思政价值,与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的本质相契合,具体改革路径包括革新新工科学生的认知思维、内化优秀工科文化以及提升工科学子文化素养三个方面。^[21]吴克燕等分析了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路径,认为目前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依旧难以突破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必须明确课程思政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有根”“有魂”“有效”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加强教师素质能力方面,要提高师资队伍的政治素养、能力素养;在激发学生参与方面,要立足学生特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完善机制建设方面,要构建领导机制,完善激励制度,从而扎实推进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22]

阴冬胜以河北大学为例,对“课程思政”育人实践进行了探索。该校注重“课程思政”育人,一是依据专业特色,构建和实施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工科类课程、医学类课程、艺术类课程的多元化“课程思政”育人模式;二是结合实际不断完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例如完善“课程思政”工作机制、积极开拓“课程思政”育人资源建设、树立“课程思政”育人典型;三是着力强化“课程思政”育人实效。调查研究认为“课程思政”关键在教师,课堂教学模式仍需改进。^[23]

焦亚辉等研究了“三全育人”视域下外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在“三全育人”视域下,研究充分挖掘了外科护理学课程内容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课程思政实践方案的制定、课程思政德育目标、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并将其有效融入课堂教学,获得了外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应用效果评价及反馈。提出以课程思政建设为契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育人评价体系;完善实验课思政元素融入环节的三条改进路径。^[24]李凯伦等对课

程思政融入金融学课程进行了探索,指出当前金融学课程思政建设存在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手段和方法落后以及授课教师思政能力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可以从加强金融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深入挖掘金融学课程思政元素、创新金融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和手段等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25]艾蓉等对文化旅游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了探析。研究分析了高校文化旅游类课程建设课程思政的背景,厘清了文化旅游概论课程的课程思政整合建设思路:多学科整合和专业课程整合。根据这一思路,研究从教学目标设计、师生情况设计、课程内容设计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了该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设计路径,以更好地推进“文化+旅游+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创新,将专业知识融入“课程思政”中,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和文化旅游所共同承载的育人功能。^[26]

刘雪彦等着力探索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研究对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必要性展开了论述,并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建构应坚持科学的评价理念,遵循导向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根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相关政策要求,结合高校教育教学特点,坚持以人为本,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聚焦点和着力点,考量目标理念、课程建设、队伍建设、教学实施、激励机制、教学效果等影响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要素,细化考察要素和明确指标点,最终构建了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体系。^[27]

五、实践教学研究

郭应彪等基于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各门课程的选题具有提出时空延展性、聚焦区域历史文化遗产、重视学科交叉、选题方向多元等特征,课程建设单位主要位于中东部地区,且以师范类院校为主。历史学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存在数量偏少、实践性不足、技术层次有待加强、未形成独立课程体系、推广不足、登录程序繁复和费用收取等问题。研究提出了四方面的改进措施:强化学科交流,挖掘多元主题;推进课程理论建设,围绕学科核心建设点,形成系列成果,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实验操作环节,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并推

行有效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案;及时进行设备与技术更新;优化推广手段,扩大使用对象的范围,最大限度降低使用者承担的实验费用,最大限度满足浏览者和使用者的学习需求。^[28]

刘艳俊等分析了中医学专业“一二二三”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认为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重实践,强技能。通过对中医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加以分析,构建中医学专业的“一模式,二课堂,三实践,三考核”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是以提升中医学专业学生临床技能及临床思维能力为核心,以提高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注重学生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的提升,为培养出具有较强临床实践技能和较高创新能力的中医应用型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29]田利娟等分析了新文科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认为新文科对市场营销专业的教育理念、目标和实践教学体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要掌握依托互联网的新媒体影响、大数据影响等新营销模式,能熟悉运用信息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进行数据分析、辅助决策,实践教学应遵循“品德”与“责任”兼备、“深度”与“广度”并重、“创新”与“实操”并重的基本原则,提出要构建具有实效性和可移植性的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模型,主要包括目标体系、主体内容体系、资源保障体系,以期为社会培养出复合型人才。^[30]

冯建生等对静态实践教学法在法学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要达到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提出的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技能型法律人才的目标,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法学中的静态实践教学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电教观摩庭审、模拟法庭和起草、书写法律文书等教学方法,它侧重于在课程设计等教学活动中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和加强运用实践性教学手段,能克服动态实践教学法在时间、场地和成本费用方面的限制,充分利用课堂现有条件为学生提供实践技能培训,这对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和学生应相互配合、积极主动地全心投入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31]景远以电路实验课程中RC一阶电路响应测试为例,深入研究了Multisim仿真软件和科大奥锐仿真平台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两款仿真软件都可以在特殊时期学生无法返校时,作为应

急手段完成实验教学任务。研究分析了仿真软件在实验教学应用中的优势和不足,主张在日常实验教学过程中,仿真软件可作为辅助手段服务于实验教学,强调学生可以针对自己想要深入了解的知识自行设计实验并使用仿真软件验证,这样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锻炼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32]

张宝健等以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控制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的产学研融合式教学为例,对自动化课程的产教融合教学创新进行了分析,提出利用企业丰富的资源以及优秀的管理模式,构建“以产助教、以教促学”的互助互利的综合培养模式,建立了新型且高效的高校实践教学培养系统。在产教融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间建立的教师沟通循环和师生示范循环是教学中的必要环节;企业与学生之间建立的人才所需循环和人才所求循环是依据企业的运行模式、管理经验和各种资源,建立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科技孵化基地以及各种的微型公司,不仅为各企业选拔优秀人才扩展了平台,也为应届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33]贾晓梅等分析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大背景下师范生教师技能课程教学中的“以赛带训”模式,认为“以赛带训”作为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让学生参与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比赛从而带动实训,把技能大赛中的项目、解决问题的思路、注意事项带到实训课堂中,通过“以赛带训”,将教学过程与技能大赛相结合,促进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有效达成实践教学的目标。^[34]

六、教学方法研究

在国家大力倡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的背景下,研究者对教育改革中的教学方法创新与应用进行了持续研究。

吕小纯等探讨了基于引导性问题的生物学阅读指导教学问题。研究认为,学生获取信息生成生物学概念离不开阅读能力的支撑,阅读能力对生物学的学习至关重要。引导性问题是一系列的框架式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串联知识的内在框架,突破教学中的探究难点。因此,运用引导性问题来促进生物学阅读指导教学成了

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情境式引导问题的生物学阅读指导、基于层级式引导问题的生物学阅读指导、基于反击式引导问题的生物学阅读指导、基于发散式引导问题的生物学阅读指导。^[35]

段洪君等研究了工科专业大课群教学创新方法问题,认为工科专业高校教师目前面临诸多困境,如课程的知识结构体系涉及多学科、授课学时缩减、教学要求提高,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考核方式重理论轻实践、课堂教学知识更新滞后于实际应用,学生高阶思维技能训练缺失、问题意识不强、动手能力弱、专业工程审美能力差。为此,从本科生的培养方案出发,根据通识类、学科基础类、专业方向类三大主要课群的特点,分别提出教学创新方法的思路与举措,并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价,最终引导学生达成“知识、能力和素质”三维培养目标。针对通识类、学科基础类、专业方向类三大课群的教学“痛点”问题,提出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主题教学、项目驱动、成果展示等诸多教学创新方法为导向的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路径,为信息时代工科专业的课程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36]

闫冰等通过学生考试答卷得分情况,对医学基础课多元化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教学效果差异进行研究探讨。以一年级入学平均成绩基本一致的同专业两个班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同一门医学基础课程分别用多元化和传统教学方法对两个班授课,对结课考试答卷得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多元化教学方法效果总体优于传统教学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同一教学方法用于不同教学内容效果不同。多元化教学方法效果具有优势,教师应依据课程内容及目标要求灵活选择课堂教学方法。^[37]薛晶等研究了应用数字切片库的角色互换法在病理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认为传统的形态学实验的教学模式一直采用以教师的“灌输式”讲授为主,加上传统的显微镜教学的局限性,使学生上课兴趣降低,感觉枯燥。由于教师的主动性及绝对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因此大大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及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该项研究中,首次尝试“角色互换”结合数字切片库在形态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教学

效果,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38]

七、在线教学研究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资源逐步共享,信息化教学模式成为教学新趋势。众多课程将雨课堂、腾讯课堂、超星学习通等具备丰富功能的智慧工具,与 OBE、翻转课堂、BOPPPS 模型等先进教学模式结合,丰富和拓展了教育资源和教学空间。信息化教学变革与信息化教学模式成为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李立等研究了建构主义理论下的移动网络教学模式的发展。围绕我国教育现状,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依据,阐述了移动网络课堂在建构主义四要素要求下体现的优越性以及在学习情境中移动网络课堂无法避免多任务切换行为的弊端。基于建构主义四要素的移动网络课堂教学设计,移动网络课堂教学的模型设计要素包括:明确学习者的适用范围;加入情感信息;课堂情景创设;符合结构化原则;减少反馈延时。移动网络课堂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包括:学习契约评价;学习材料评价;分阶段自我评价;学习者学习轨迹分析。^[39]

高丹阳等构建了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 AI 双师精准教学模式。在对 AI 双师教学形态必然性和精准教学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基础上,以更具教育性的精准教学为目标,以 AI 双师教学为框架,立足于人机协同、精准教学两个层面,对 AI 双师精准教学模式进行构建。人机协同层融合了教师的创造性思维、学生的个性化思维、智能机器的工具性思维,师生为主,智能机器为辅,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精准教学层以“九精准”——精准预习、精准问题、精准教学、精准理解、精准协作、精准研学、精准测评、精准提升、精准帮助为核心目标。最后就该教学模式提出充分发挥师生的教学主导地位、提升师生协同智能、增强智慧校园建设、加强对教师教学活动数据的采集分析的实施建议。^[40]

张明明以《综合商务英语》课程为例,对“互联网+教育”下任务驱动式混合教学展开了研究。研究介绍了《综合商务英语》课程采用的是一套比较成熟的“线上学习——线上自测——线下见面课——线下考试”的任务驱动式混合教学,梳理了该课程任务驱动式混合教学

的教学设计方案,分析了混合式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提出任务驱动式混合教学的实践策略:进行课前的线上学习;加强线下课堂的答疑解惑;保证课后的教学活动。^[41]方艳辉等基于微信公众号-SPOC 建设探讨线上线下“六种方式”混合式医学微生物学课程,教学实践表明微信公众号-SPOC 和“六种方式”混合式教学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探索混合式课程建设路径提供新思路。^[42]

张瑶等对学习通和 BOPPPS 模型的教学模式在“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中的应用展开了研究。从“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教学现状出发,阐述了学习通与 BOPPPS 模型的内涵与环节,设计了基于学习通和 BOPPPS 模型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互动与参与,依据模型对教学过程划分为导言、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 6 个模块。经过实践教学检验,该教学模式能够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教学联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升教学效果,是构建良好课堂生态的有益探索。^[43]

吕清等基于中国知网(CNKI)2012—2022 年的文献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演变展开了系统梳理和研究。研究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演变、内涵和研究基础入手进行了综述,并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中应用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不同学习阶段,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存在差异;不同课程类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各具特色。研究发现,当前职业教育中翻转课堂教学内涵呈现出“模仿”向“创新”的转向,职业教育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由“单一”向“系统”的转向。^[44]

八、教学评价与课程考核研究

王瑾等对共建式大学课堂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建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共建式大学课堂生态范式是未来大学课堂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对有效教学价值标准的重新界定,确立了“共同学习、共同发展、师生共建”的价值取向。以教师和学生为评价主体,对学习的目标、内容、方法、生态建设等方面展开评价,针对师生外显性的学习行为和内隐性的情感思想,设计操作性评价指标与提示性评价指标,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

合、过程与结构兼顾的方式达到促进师生专业发展,推动教学革新的作用。^[45]张岩等对高校在线信息化教学能力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在线教学能力与学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明确了高校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和大学生在线学习能力的现状。经过分析发现目前高校在线教学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46]

刘雪彦等分析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评价标准问题,认为构建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是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评价的关键一环,是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保障措施。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导向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从目标理念、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实施、激励机制、教学效果等方面,构建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体系,科学有效地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精准评价。^[47]窦新宇等提出依托OBE理念,探索建立应用型高校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融合的体系,以“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为实现途径,通过构建课程思政评价对象、指标和评价过程,实现OBE视野下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搭建。评价指标涵盖人才培养目标中的全部内容,评价过程采用四结合立体化的评价新机制^[48]。

李艳灵等分析了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问题,认为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开展专业培养质量评价的基础,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常见方法进行评价,针对实践领域存在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不足、课程质量评价多维性、全方位考察不够、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与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和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关联度重视不够等现实共性问题,提出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实施策略:构建面向产出的分阶段课程质量评价标准,构建课程质量评价反馈及持续改进机制,构建基于质量评价的持续改进闭环体系。^[49]杜军霞等分析了基于“增负”提效与学生主体的实验课程创新性考核方式问题,认为现有实验课程考核方式逐渐降低对课程教学效果的客观反馈作用和促进作用,制约着课程的持续改进和质量提升。以食品营养学实验为例,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基础上,探索基于“增负”提效和压力转换思路的“生生互考”创新性实验课程考核模式和方法,其经

验为实验课程和理论课程的期末考核评价改革提供思路和参考。^[50]王莹等对中医学类专业阶段性综合考试改革及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结合实际制定了阶段性综合考试计划,分阶段进行中医基础综合考试、中医经典等级考试、中医临床综合考试和中医毕业综合考试,认为阶段性综合考试有利于培养学生中西医临床思维和激发学生学自动机,同时也与高校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相契合。^[51]

九、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河北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中职为基础、以高职为骨干、以职教本科为牵引,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科教融汇,加快建设技能型人才强省。职业院校课程与教学改革作为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方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马斯琪等对思维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在中职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实施对策进行了研究,当前中职学校计算机专业仍然沿用传统教学模式而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实践能力低等普遍现象。为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以“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为具体实例,结合“学习通”平台与思维过程系统化教学模式相融合的特点建立了思维过程系统化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融合的教学模型,对课前预热、课中探索、课后知识系统化、教学评价四个阶段的实施对策进行了分析。^[52]

张磊等对新工科背景下具有地方应用型高校特色的给排水专业课程改革路径进行了探究。通过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归纳出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课程建设存在问题:一是学科知识架构清晰度不足,缺乏交叉学科知识融合,课程与行业新技术结合度不高;二是实践能力培养不突出,综合性实践环节设置偏少,工程思维锻炼方面需要加强;三是教学方法略显传统,考核方式有些单一。基于此,以新工科理念为指导、以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相关指导规范为依据,坚持以课程改革原则为指导,探索出具有地方应用型高校特色的给排水专业课程改革路径:建设以提升专业核心能力和知识综合能力为目标的理论课课程体系;建设以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实践课课程体系;以学生

为中心丰富和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53]

谢勇旗等对职业教育“双主体”育人教学模式展开了研究。研究界定了“双主体”育人教学模式的内涵,包括双目标、双导师、双资源、双评价、双场地,选取资源依赖理论、翻转课堂理论和行动教学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教学目标、学习任务、问题清单、教学流程、教学方法、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几个方面构建了“双主体”育人教学模式整体框架。该框架把教学流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教学实施分为“学”和“教”两条主线,教学管理依据网络教学平台,课程思政按照两条主线融入“学”和“教”的全过程。为使该教学模式有效支撑“双主体”育人,提出提升教师综合素养、改革教学考核办法、完善教学网络平台的运行保障措施。^[54]

李杰等研究了1+X证书制度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问题。研究对1+X证书制度的内涵、符号意蕴进行了充分解读,明确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充分利用1+X证书制度这项创新举措能够重构课程目标、调整课程结构、盘活课程内容、鞭策课程实施。针对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及改革中存在课程设置与产业企业脱节、课程评价与育人标准偏离、教材教师教法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探索出了适合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路径:以1+X证书制度为基准,课程改革要融入课证融通;以校企合作为载体,构建课证融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课证融通为导向,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以学生为本位,建立课证融通的课程评价机制。^[55]

十、创新创业课程与教学研究

创新创业教育是为实现国家战略规划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思维、创业意识和能力为目标的一种新型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越来越成为高校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研究者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与教学体系建设展开了深入研究。

梁丽红对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路径进行了探究。研究首先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专创”

教育融合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需要、应用型高校办学目标的定位、专业综合改革的选择、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的动力,二者在理念和内容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的路径,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坚持创新理念引领,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保障体系建设。这既是创新创业教育纵深发展的需要、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的选择,也是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56]

宫明龙等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为例,融入OBE理念和思政元素构建了适合新工科专创融合人才培养教学体系。在OBE理念下,制定了体系中各环节的教育目标,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目标和德育目标。在总目标及工程认证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大学生为中心的创新创业平台,该平台通过专创导师载体把创新及专业课程、专业培训及创新创业活动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专创融合教学体系。最后对某高校在专创融合教学体系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这种专创融合教学体系使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57]

丁宁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有效构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路径:构建立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大力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建设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引进创新创业项目;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积极氛围。^[58]

(闫树涛:河北大学教授
张天添:河北大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王喜旺,陈博.新建本科院校“课堂革命”探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 [2]崔佳.学习者建构与环境赋能:本科生课程参与度影响因素探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
- [3]崔佳,罗萍.本科生课程参与度影响因素与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03).
- [4]薛国风.服务学习:高校文科实践教学的新理念与对策——基于美国服务学习理论的启示[J].教育文化论坛,2022(02).

- [5] 史晓燕,赵利曼.嵌入式教师教学评价:价值重构、实践逻辑与运用价值[J].中国教育学报,2022(09).
- [6] 戴俊,张凤梅,魏云平,高崇一.以实践能力和岗位需求为核心的“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课程体系的重构[J].科技风,2022(07).
- [7] 赵心.地方高校广告学专业实训课程体系构建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2(03).
- [8] 王颖,张荣,薛翠翠,封桂英,田建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应急护理学课程体系的构建[J].护理学杂志,2022(10).
- [9] 潘新民,吴冠斌.论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策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24).
- [10] 李保勤,陈雪梅.基于学习科学的 UbD 课程设计——以概率为例[J].数学教育学报,2022(05).
- [11] 崔崑.专业认证背景下大数据专业机器学习课程群建设研究与实践[J].保定学院学报,2022(03).
- [12] 张海霞,张永鹏.医学专业认证背景下“经络腧穴学”课程建设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22(38).
- [13] 王群,秦殿菊,徐静.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护理学课程设计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2022(03).
- [14] 杨亮.学习进阶视域下的地理教学设计——以人教版“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为例[J].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22(12).
- [15] 杨亮.单元教学理念下的地理教学设计——以“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为例[J].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22(08).
- [16] 成新轩,刘超,赵紫凤.地方高校经济学类本硕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12).
- [17] 王英辉,王肖红.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工科”多方协同“立体教学”模式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
- [18] 赵金秀,周红星.新工科背景下土木类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为例[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03).
- [19] 刘金霞,王瑞婷,李玉红.基于岗位胜任力探讨传染病学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2(16).
- [20] 付大安,陈健.“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J].中国 ESP 研究,2022(03).
- [21] 张秋山,王耕.新工科背景下“滴灌”式课程思政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 [22] 吴克燕,杜雅静.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有效路径探析[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2(05).
- [23] 阴冬胜.“课程思政”育人实践与探索——以河北大学为例[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2).
- [24] 焦亚辉,白雪冬,田建丽,洪查理,李青.“三全育人”视域下外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J].科教文汇,2022(08).
- [25] 李凯伦,赵莉,韩光辉.课程思政融入金融学课程的探索[J].现代商贸工业,2022(13).
- [26] 艾蓉,宋建伟.“文化旅游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析[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2(04).
- [27] 刘雪彦,杜君楠,王红娟.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02).
- [28] 郭应彪,贾丽英.高校历史学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探索与思考——基于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数据的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8-16.
- [29] 刘艳俊,张永鹏,王莹,张淑萍,张萌.中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一二二三”实践教学体系[J].山西青年,2022(03).
- [30] 田利娟,甘丽,李峰.基于新文科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22(08).
- [31] 冯建生,张皓健,路振国,陈健誉.静态实践教学法拓展于法学人才培养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01).
- [32] 景远.仿真软件在高校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22(03).
- [33] 张宝健,梁丽勤.自动化课程的产教融合教学创新分析[J].集成电路应用,2022(01).
- [34] 贾晓梅,卢玉妹,何富强.“以赛带训”培养模式在教师技能课程中的实践与探索[J].保定学院学报,2022(03).
- [35] 吕小纯,李秋石.基于引导性问题的生物学阅读指导教学[J].中学生物学,2022(01).
- [36] 段洪君,马廉洁,魏永涛,蔡凌,杨乐.工科专业大课群教学创新方法探究[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2(05).
- [37] 闫冰,王红杰.医学基础课多元化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效果比较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2(07).
- [38] 薛晶,陈永良,张建伟,严晓丽,严鹏,刘振虹.应用数字切片库的角色互换法在病例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承德医学院学报,2022(01).
- [39] 李立,赵佳.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计算机教育——移动网络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新通信,2022(04).
- [40] 高丹阳,李冉.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 AI 双师精准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06).
- [41] 张明明.“互联网+教育”下任务驱动式混合教学研究——以《综合商务英语》课程为例[J].海外英语,2022(11).
- [42] 方艳辉,谢广成,杜奕英.基于微信公众号-SPOC 建设线上线下“六种方式”混合式医学微生物学课程[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2(06).
- [43] 张瑶,佟建楠,王喜强.基于学习通和 BOPPPS 模型的教学模式在“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中的应用[J].科技与创新,2022(19).
- [44] 吕清,赵常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基于 CNKI2012—2022 年文献的研究[J].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22(03).

- [45]王瑾,谢振宇,吕清.共建式大学课堂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建构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04).
- [46]张岩,赵红梅,闪茜.高校在线信息化教学能力评价研究[J].2022(06).
- [47]刘雪彦,杜君楠,王红娟.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标准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02).
- [48]窦新宇,王建龙,王玉娜.基于 OBE 理念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22(02).
- [49]李艳灵,郑建辉,刘毅玮.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理论阐释与实施方略[J].高教学刊,2022(33).
- [50]杜军霞,朱秀敏,宫彬彬,张宏杰,武宇红.基于“增负”提效与学生主体的实验课程创新性考核方式探索[J].高教学刊,2022(36).
- [51]王莹,韩亚飞,赵坤,马圆,张永鹏.中医学类专业阶段性综合考试改革及实施效果分析——以河北北方学院中医学类专业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
- [52]马斯琪,赵华,王洁.思维过程系统化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以中职“计算机网络”课程为例[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2).
- [53]张磊,周红星,赵金秀.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给排水专业课程改革路径探究[J].唐山学院学报,2022(03).
- [54]谢勇旗,孙青.职业教育“双主体”育人教学模式的内涵、框架和保障[J].职教论坛,2022(04).
- [55]李杰,邢世凯.1+X 证书制度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意义、痛点及契机[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
- [56]梁丽红.应用型人才培养视域下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路径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2(01).
- [57]宫明龙,刘凤芳,屈福,高秋志,梅瑞斌,张亚辉,罗绍华. OBE 理念下突出思政的新工科专创融合教学体系——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为例[J].高教学刊,2022(29).
- [58]丁宁.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22(10).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贾文彤

高校是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经调查 2022 年度河北省 33 所高校的科研成果发现,有 17 所高校参与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总计完成各类科研成果 93 篇。其中,中文期刊论文 78 篇(有 41 篇已在中国知网发表),英文期刊论文 2 篇(有 1 篇已在 Web of Science 发表),专著 5 篇,研究报告 7 篇,政府文件 1 篇。通过对这些科研成果的研究主题、发文机构和发文作者三方面入手,回顾 2022 年河北省各高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情况,探寻未来河北省体育社会科学科研工作的发展趋势。

1 河北省高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现状分析

1.1 科研成果的研究主题分析

体育社会科学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在体育实践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河北省高校学者从多维度对体育展开了研究,聚焦于体育的各个领域。

在学校体育领域,有的学者对体育教学进行了研究,甘海霞等探讨了自然环境资源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价值和工作方向,提出要通过自然环境资源促进体育教学活动的生态化与现代

化;^[1]刘惠喆研究了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工作,建议采取强化课堂体育教学、抓实课外体育活动以及开展假期体育锻炼等手段,促使大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意识;^[2]同时,刘惠喆还以“互联网+”为背景,探析了高校体育教学混合学习模式,认为混合学习模式能够促使体育教学由封闭走向开放、体育学习途径由单一走向多元以及教学方式由灌输走向主动,提出要对混合学习模式提高重视、创新混合学习模式应用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体系和转变各界对混合学习模式的错误认知;^[3]曹英等发现高校体育课与课程思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契合性,针对体育课程思政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加强对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重视、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政能力、做好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完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和做好疫情常态化下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优化措施;^[4]国新然等认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对青少年的心理、身体和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建议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5]刘春燕阐述了义务教育阶段健康教育的特点和育人价值,根据各阶段学生的身

体发育特征,提出了健康教育教学的落实措施,即培养健康行为为核心素养、丰富教学手段和拓展学习路径;^[6]李文作分析了翻转课堂在高校体育舞蹈课程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应用方式,评价了黄艳等人编著的《形体与体育舞蹈》一书的实用价值。^[7]有的学者对体育课程设置进行了研究,徐延丽等分析了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发展历程、发展经验和发展困境,提出健全课程目标取向、优化课程内容设计和构建特色课程结构是未来课程设置工作的方向;^[8]吴立柱等以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为出发点,探讨了大学体育课程设计的原则和思路,建议挖掘体育的美育功能,实现“体美融合”;^[9]司鹏巧等在“金课”标准下研究了大学体育交谊舞课程的重塑工作,建议对课程内容设置和课程评价方法进行改革创新,注重审美教育,提高课程质量;^[10]南子春等通过分析当前高校运动生理学课程存在的问题,从学生需求、市场需求、课程目标需求三方面探讨了运动生理学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路径。^[11]有的学者对体教融合进行了研究,李燕等阐述了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新内涵,对体教融合的动力和困境进行了分析,建议打造体教融合共享平台和再生体系、变革评价体系以及强化统筹部署,为体教融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12]韩立明等介绍了美、德、澳、日体教融合发展的现状和我国体教融合的相关研究,认为在体教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体育与教育部门工作弥合难度较大、教育系统内体育资源配置差距较大、社会支持力量有待加强和双减政策的落实对体教融合保障效果的延滞性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13]而也有学者的研究聚焦于整个学校体育领域,赵旋炳和田菁等从社会、学校、考试制度、教学和学生五个层面分析了河北省体育中考改革对学校体育产生的影响,针对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单一和学生体能水平较低的问题,建议学校体育要掌握体育中考改革政策的正确观念,推动素质教育发展。^[14]

在体育产业领域,有的学者对冰雪产业进行了研究,张晗等分析了冬奥会前后河北省冰雪产业的发展现状,发现在人才供给、品牌树立、场地设施和冰雪设备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15]李子彪等阐述了产业链整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从

政府和企业纵向整合、横向整合和跨链整合三种模式中发挥的作用入手,探讨了我国冰雪体育产业链整合的发展路径。^[16]有的学者对体育旅游进行了研究,刘博等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切入点,从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利用好承德“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提供优质的科技服务保障、加大人才保障支持力度和加强文明旅游的观念宣传五方面探讨了承德市生态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17]刘晓婷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着眼点,探究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共图书馆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发展路径,即发挥总分馆制优势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运营模式与深度挖掘地方特色体育文化资源、创建特色体育文化体验空间、开发文创产品和兴办众创空间的服务内容;^[18]曾磊等以保定市为案例,基于区域协同理论、“点—轴”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后冬奥时代京津冀体育旅游节点城市应该树立品牌效应、优化协同机制、凝聚多元主体、创新营销方式以及推进产业融合。^[19]有的学者对体育场馆进行了研究,李颖等分析了近20年来京张两地滑雪场空间格局的变化特点,发现滑雪场的空间重心呈现出先向东南方向移动、又向西北方向折返的特征;^[20]张琳等认为体育建筑兼具实用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全民健身”计划、文化传承等视角入手,结合相关案例,探讨了新时代设计与建设体育建筑的原则和方向,建议体育建筑在修建时要加强艺术文化、时代文化和生态文化融入。^[21]

在竞技体育领域,佟薇等以北京冬奥会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对346名张家口居民进行社会调查,分析了张家口不同类型的居民对冬奥会影响的认知和态度,发现各种类型居民对2022年冬奥会的支持率均较高;^[22]李寒冰等以集体身份认同为视角,阐述了球迷暴力的发生机制,建议从正向疏解球迷主体情感能量、遏制比赛中诱发性情境事件的发生和促使球迷保持对暴力的紧张和恐惧三方面消解球迷暴力;^[23]张文利梳理了我国武术的演变历程和传承特征,对武术竞赛项目的设置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整合竞赛项目资源、重振武术一体化的竞赛发展模式,并进一步研发了武术竞赛项目新的比赛方式;^[24]李莉研究了近年花样游泳评分规则的变化

特征,从动作完成、动作难度和编排设计三方面分析了花样游泳未来的发展趋势;^[25]王雁红从国际规则层面分析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着陆的评分标准,认为评分标准的设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如肢体角度设置范围超出了裁判视觉判罚准确度的范围,不利于赛事中裁判员的判罚工作,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26]季彦霞探讨了我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多元共治的实现路径: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网络以及建设和完善评价、监督、问责等保障制度。^[27]

在群众体育领域,王立等基于政府规制理论、马克思消费力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了制约我国大众体育消费的因素,提出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科技+体育”与“互联网+体育”深度融合以及完善财政和税收激励政策等方式促进大众体育消费;^[28]吴晓华等对大众滑雪发生损伤的原因、损伤部位与特征以及损伤程度进行了考察,发现上肢肩、肘、腕部损伤多发生于单板滑雪运动和下肢损伤多发生于高山滑雪运动等现象,提出我国大众滑雪安全管理工作要考虑安全预警、监管、法规、教育、救援以及保险五个方面。^[29]

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绝大多数学者青睐于对武术进行研究。陈青基于块茎理论挖掘了武术的本质,提出块茎化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是武术创造的源泉,建议要注重习武人的生活世界;^[30]张晶等的研究发现当代武术的部分榫卯存在解构现象,提出文化涡旋能够提高生命塑造与“以搏塑人”的武术之间的关联度,这是当今武术文化的生存之道;^[31]白俊亚等基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从文化自觉历史和文化自觉境遇两个层面探讨了武式太极拳研究的发展道路;^[32]张琳等着眼于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分析了邢台武术文化教育传承现状,发现存在专业教师和校本教材缺乏的困境,提出邢台武术文化的教育传承要重视师资培养、开发校本教材、精选教学内容、搭建交流舞台和丰富传承渠道;^[33]张宁等以美国的“太极功夫学院”为案例研究了中华武术在海外的的发展,通过调查“太极功夫学院”的办学情况,发现存在教练资源缺乏、考核标准化欠缺和宣传手段单一等问题,并为中华武术在海外的的发展提供了建议。^[34]

在体育的其它领域,也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

究。在体育法学方面,刘志国等以乡村振兴为视角,阐述了农村体育治理能够保障群众体育权益、促进产业振兴和突破思想禁锢的现实价值,并针对目前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发展体育经济、更新消费理念、提供政策扶持、激活内生动力和引入体育人才等举措。^[35]在体育心理学方面,梁月红等依托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对河北省6所高校的406名普通大学生的调查,分析了疫情对高校学生运动心理动机和体育行为的影响。^[36]此外,徐艳艳等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整个体育领域,将元宇宙的概念引入体育当中,从体育教学、运动竞技、全民健身和体育传播等方向探讨了公众体育参与方式的变革,提出元宇宙可能对体育本质、法律法规以及道德伦理带来新挑战。^[37]

综上所述,从研究主题上看,河北省高校学者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切入点较多。在学校体育领域,体育教学、体育课程设置和体教融合是热点话题,学者们的研究涉及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健康教育教学、金课和课程思政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中多数都与体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体育产业领域,冰雪产业、体育旅游和体育场馆是热点话题,学者们倾向于对特定的地区进行研究,如京张地区、承德市、保定市等,研究重心一般放在各类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或发展路径上。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部分比赛项目在张家口的举办激发了河北籍学者的研究热情,对冰雪产业的研究显著增多,“冰雪”一词成了研究中的高频词汇。在这些成果中,学者们的研究比较务实,大多数学者能够做到以解决体育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由于河北省是我国武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学者们喜欢对武术展开研究。从内容上看,学者们的研究涉及武术的本质、武术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武术的海外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领域,学者们的研究则比较分散,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特征。其中,竞技体育涉及冬奥会影响、球迷暴力、武术竞赛项目、花样游泳和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群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消费和大众滑雪损伤等方面。当然,河北省高校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也存在薄弱环节,如在体育

法学和体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较少,视角也比较单一,研究主题有待进一步扩充。简而言之,河北省高校在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武术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方面的研究虽数量较多,但没有形成研究主题的聚集效应,在体育法学和体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需重点加强。

1.2 科研成果的产出机构分析

从产出机构看,河北省体育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主要由综合类大学、师范类大学和体育类大学展开,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体育学院、邢台学院、承德医学院以及河北北方学院等高校在2022年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科研成果的数量上,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的科研成果较为丰富。其中,河北师范大学的科研成果最多,发表中文期刊论文29篇、英文期刊论文1篇,出版专著1本。在科研成果的类型上,绝大多数高校的科研成果是期刊论文,燕山大学、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和省委党校的科研成果主要是科研报告,科研成果唯一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是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表1 河北省高校教师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

高校名称	期刊论文	专著	研究报告	政府文件	总计
保定学院	0	1	0	0	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2	0	0	0	2
承德医学院	6	0	0	0	6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10	0	0	0	10
邯郸学院	1	1	0	0	2
河北北方学院	4	0	0	0	4
河北大学	5	0	0	0	5
河北工程大学	1	0	0	0	1
河北工业大学	1	0	0	0	1
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0	0	1	1	2
河北师范大学	30	1	0	0	31
河北体育学院	9	0	0	0	9
省委党校	0	0	2	0	2
唐山学院	2	0	0	0	2
燕山大学	0	0	4	0	4
邢台学院	9	1	0	0	10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0	1	0	0	1
总计	80	5	7	1	93

与此同时,本文作者于2023年4月19日在中国知网对78篇中文期刊论文进行了检索,发现有41篇论文已经发表,占到了中文期刊论文

的50%以上。紧接着,本文将这41篇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6.2.R2),图谱的剪切方式选择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对发文机构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有些机构主要是内部的独立研究,如邢台学院体育学院、唐山学院体育部、河北师范大学公共体育教学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和河北北方学院等;有些机构之间在2022年存在合作关系,如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北体育学院与首都体育学院,河北农业大学与河北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休闲学院、南昌工学院体育学院与河北体育学院足球调研发室,河北体育学院与武汉体育学院,山东省体育科研中心、河北工程大学与天津体育学院等。从这些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河北省内各高校之间、河北省高校与省外高校之间都存在着合作关系,一些高校的非体育院系也参与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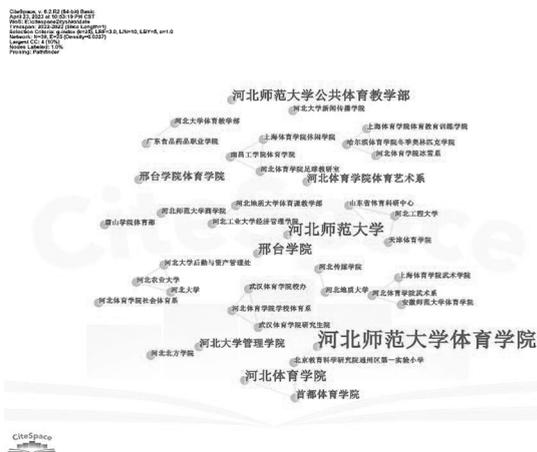


图1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产出机构关系图谱

1.3 科研成果的作者分析

从作者方面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由体育学方向的学者完成,管理学与社会学等方向的学者也完成了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在科研成果的数量上,万立江的数量最多(5个),其次是耿海天和白柳珉(3个),刘博、赵化雨、罗静、张文利、刘惠喆、刘春燕、吴立柱、张亚明、刘邦凡、王春雷和韩立明有2个,其余学者均为1个。在科研成果的质量上,有许多学者以较高的水准完成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刘春燕的《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一书将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李燕在

《体育科学》发表了《新时代体教融合的动力、困境和实施路径研究》一文；万立江有5篇论文被核心期刊教学与研究录取；徐延丽的论文在《体育文化导刊》发表；吴晓华的论文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李寒冰的论文在《体育与科学》发表；罗静等学者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后冬奥经济发展的意见》的制定作出了贡献；刘邦凡的研究报告作为建议上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

表2 高产学者科研成果类型及数量统计

姓名	期刊论文	专著	研究报告	政府文件	总计
万立江	5	0	0	0	5
耿海天	3	0	0	0	3
白柳珉	3	0	0	0	3
刘博	2	0	0	0	2
赵化雨	2	0	0	0	2
罗静	0	0	1	1	2
张文利	2	0	0	0	2
刘惠喆	2	0	0	0	2
刘春燕	1	1	0	0	2
吴立柱	2	0	0	0	2
张亚明	0	0	2	0	2
刘邦凡	0	0	2	0	2
王春雷	1	1	0	0	2
韩立明	2	0	0	0	2

同样，本文将已经在中国知网发表的41篇中文期刊论文以 Refworks 格式导入 CiteSpace (6.2.R2)，选择相同的剪切方式，对作者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有些学者在2022年度主要是自己独立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刘希佳、刘晓婷、刘惠喆、佟薇、南子春、孙义和姚冰等；有些学者之间有学术合作关系，如刘博、宋勇跃、吴振超与张宁宁，季彦霞、吕万刚与史东林，周嵩山与陈青，吴立柱与司鹏巧，国新然与田菁等。



图2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作者关系图谱

2 对未来河北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展望

2.1 持续充实研究主题

2022年度河北省高校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涉及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心理学和体育法学等诸多领域，研究主题多样。但是在每个主题下，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呈现出了显著差异，学校体育、体育产业以及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河北籍学者的欢迎，众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对体育教学方式、体育课程设置、体教融合、冰雪产业、体育旅游和武术进行了研究。这些主题或是符合国家改革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是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科研成果的产出量相对较高。本文想要说明的是，对热门领域的研究固然重要，而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心理学和体育法学等方面同样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政府相关部门或高校领导应采取措施支持、鼓励和引导学者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使研究主题更加丰富多彩。

2.2 逐步深化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可以体现出科研水平。经过本文的调查与分析发现，河北省高校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问题。如部分学者选题过大，将研究视角放在体育的宏观层面；对于体育的现状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多；研究表浅，缺乏理论深度。因此，深化研究内容是今后河北省高校的工作重心。河北省各高校应逐步加大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增加体育学学者的课题经费，严格把控课题的选题与立项，鼓励学者结合体育实践展开研究，避免泛泛而谈的情况；建立和完善体育社会科学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机制，注重对年轻学者的培养，打造一支年轻化的科研队伍，定期对学者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研素养；加强过程监督，健全奖惩机制，激发学者的科研热情。

2.3 稳步构建合作网络

当前，河北省高校体育社会科学合作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各高校或学者之间虽有合作，但仍然较少。体育社会科学具有综合性与交叉性，研究范围横跨体育学、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这便要求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

究的学者最好是拥有团队合作意识并且掌握多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各高校的领导应当采取相关措施构建省内高校之间、省内高校与省外高校之间的合作网络,鼓励不同高校之间的学者展开合作,共同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如邀请外校专家到本校举办讲座,传授科研经验;组织本校相关专业师生去外校参观、学习;举办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会议和论坛,促进不同学校之间学者的经验交流;打破学校壁垒,为学者之间进行跨校合作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

3 结语

本文收集了河北省 2022 年度 33 所高校体育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发现有 17 所高校参与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取得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其中已在中国知网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高校的研究主题较为全面,并且研究主题受到了国家需求、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社会历史文化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之后,本文又从产出机构和作者层面深入分析了这些科研成果,针对依然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即持续充实研究主题、逐步深化研究内容以及稳步构建合作网络。最后,笔者认为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筛选工作具有主观性,部分期刊论文的选题与内容处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可能会有错筛与漏筛现象;二是一些学者的科研成果尚未正式发表,无法查阅正文内容,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细微偏差。

(贾文彤: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甘海霞,石灵娟,孙义等.自然环境资源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J].环境工程,2022(07):274.
- [2] 刘惠喆.高校体育教育全链条推进模式探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2(03):94-97.
- [3] 刘惠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混合学习模式探索[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2(19):123-126.
- [4] 曹英,张天国,陈玮.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体育教学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22(12):78-80.
- [5] 国新然,田菁.体教融合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2(11):158-161.
- [6] 刘春燕.《课程标准(2022年版)》健康教育教学分析与落实[J].中国学校体育,2022(06):19-22.
- [7] 李文作.翻转课堂在高校体育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分析——评《形体与体育舞蹈》[J].中国高校科技,2022(03):112.
- [8] 徐延丽,刘春燕.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展经验、困境及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2(08):8-13.
- [9] 吴立柱,司鹏巧,林彦.金课理念下“体美融合”大学体育课程建设研究[J].高教学刊,2022(08):74-77.
- [10] 司鹏巧,吴立柱,张玉英.“金课”标准下大学体育交谊舞课程建设及实践探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2(06):5-7.
- [11] 南子春,白华,张贵婷.需求导向下运动生理学课程评价体系构建路径探析[J].邢台学院学报,2022(03):175-181.
- [12] 李燕,骆秉全.新时代体教融合的动力、困境和实施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22(02):30-38.
- [13] 韩立明,白琳娜,程琳琳.新时代深化高校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路径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2(03):182-187.
- [14] 赵旋炳,田菁.河北省体育中考改革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2(15):109-112.
- [15] 张晗,王彩凤,张智斌.冬奥会背景下河北省冰雪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策略研究[J].商业经济,2022(07):57-60.
- [16] 李子彪,王思惟,高光琪.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冰雪体育产业链的整合模式及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22(12):63-72.
- [17] 刘博,管力,宋勇跃,吴振超,马佼佼,张宁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承德市生态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旅游纵览,2022(11):139-141.
- [18] 刘晓婷.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背景下张家口市公共图书馆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研究[J].旅游纵览,2022(21):152-154.
- [19] 曾磊,陈佳.后冬奥时代京津冀体育旅游节点城市发展策略研究——以保定市为例[J].大舞台,2022(02):8-14.
- [20] 李颖,朱天龙,姚冰,裴宏伟.近 20 年北京和张家口地区滑雪场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特征[J].经济地理,2022(01):191-198.
- [21] 张琳,王志丽.文化导向下的体育建筑设计策略思考[J].建筑结构,2022(19):154-155.
- [22] 佟薇,汪永萍.张家口居民感知视角下的 2022 年冬奥会影响[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55-65.
- [23] 李寒冰,朱邱晗,魏礼壮.集体身份认同视域下球迷暴力的发生机制与消解路径[J].体育与科学,2022(01):98-103.
- [24] 张文利,夏慧斌.武术传承特征演变视阈下新时代武术竞赛项目的整合与创新[J].武术研究,2022(01):1-5.

- [25] 李莉,许新,董辉.基于近三版评分规则探析花样游泳之未来发展[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02):1-3,12.
- [26] 王雁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着陆评分标准的研究[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2(14):171-173.
- [27] 季彦霞,马国义,吕万刚,史东林.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多元共治及实现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02):232-239.
- [28] 王立,罗帅呈,郑志强.我国大众体育消费:理论探源、制约因素与实施策略[J].企业经济,2022(02):97-103.
- [29] 吴晓华,朱志强,吴璞.大众滑雪损伤特征与评价——“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安全助力[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01):17-24.
- [30] 陈青.武术本质的立体探析[J].中国体育科技,2022(07):107-113.
- [31] 张晶,周嵩山,陈青.武术文化的榫卯连接与涡旋重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02):80-85.
- [32] 白俊亚,刘洪,李建民,姜华北,花家涛.文化自觉语境中武式太极拳研究的实然与应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2(07):75-80.
- [33] 张琳,崔景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下邢台武术文化的教育传承研究[J].体育视野,2022:33-35.
- [34] 张宁,武显治,史龙龙,孙佐枫.中华武术海外发展研究——以美国太极功夫学院为例[J].中华武术,2022(03):69-71.
- [35] 刘志国,王春雷.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体育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邢台学院学报,2022(01):187-192.
- [36] 梁月红,李刚,苏新荣,韩海涛,陈帅杰,冯燕辉,高亚坤.疫情期间以自我决定理论为中介的大学生体育行为[J].山东体育科技,2022(05):19-23.
- [37] 徐艳艳,刘希佳.元宇宙技术环境下体育参与的方式变革与潜在挑战[J].当代体育科技,2022(35):154-158.

文 学

语言学研究

侯晓舟

2022年,河北省学者围绕汉语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以及翻译等多方面在语言研究上继续深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汉语语言学研究

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汉字研究、词汇研究、语义研究、语法研究、语体研究、语言与文学研究和音韵研究等,2022年,河北省各高校汉语语言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重点从词汇学及语义学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一) 汉字研究

2022年,汉字研究在疑难字的考释研究上进一步取得突破。疑难字的存在严重影响大型字书的编纂质量和利用价值。因此,考释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字是必要且十分重要的。杨宝忠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大型字书疑难字汇考”的资助下,利用“形用义音序五者互相求”考字方法,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线索,对唐宋以来大型字书收录的10个疑难字进行了考释。^[1]另外,杨

宝忠、王亚彬利用“形用义音序五者互相求”考字方法,对《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收录的部分疑难字进行了考释。^[2]讹混是指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原本不同的构形经由讹变从而趋于混同的现象。梁春胜、刘日照在《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等书录文基础上,对唐代墓志中的25例讹混俗字试作考释。该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唐代墓志疑难字考释”的成果。^[3]

除对于古代疑难字的重视外,建构内涵合理、结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深化汉字改革本体研究的需要,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理论指导与智力支持。刘晓明、关彦琦探讨了汉字改革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该研究属于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字改革的评价体系与学科影响研究”的阶段成果。^[4]

(二) 词汇研究

语言是“词的语言”,每一个词都是语言学的微观世界,词汇作为语言的构成要素,对于语法研究和语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情态动词兼具语法和语义功能,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冯

军伟对汉语情态动词“可能”从概率层面进行了语义研究。该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汉语动词及动词性结构的立场表达和立场构建研究”的研究成果。^[5]此外,冯军伟还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汉语动词及动词性结构的立场表达和立场构建研究”的资助下,对标记语“就”展开了研究。研究对于“就”从空间位移动词语法化为让步条件标记经历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总结;还讨论了作为话题标记的“就”的两种语法化演变模式。^[6]词义研究是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层隐义素是词语所含的体现指称事物内在特征的义素,能够体现词义的内部特征。商怡、武建宇对“掩映”一词进行了深层隐义素分析,该研究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辞书信息数据库的中国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7]

随着社会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词语,这些新词语在动态发展变化中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得到语言学家们的关注。在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的支持下,郭伏良、侯丽通过对173个高频新词语进行动态观测、描写、分析,绘制了历时词频发展变化轨迹,探索高频新词语的发展变化。^[8]汉语词汇的主要音节形式是双音节,但进入21世纪后,三音节逐渐成为汉语新词语的主流音节形式。曹向华据此撰写了《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研究》,该书既探讨了三音节词语的基本特点、形成与演变以及释义等语言专业问题,也有很多章节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探讨比喻造词的分析、对于网络新词语的爬梳等,别有新意。^[9]

信息化时代,字形呈现方式由一笔一画的手写,转变为整字呈现的键盘输入。这些质的变化,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陈双新、李丽探讨了新时代汉字与人的关系。研究认为,汉字字形将趋于更加稳定,人的书写能力将明显弱化,汉字规范将由字形规范转向词语规范并主要针对信息处理的需要,汉字与汉语拼音的关系更为紧密。^[10]

语言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新媒体大力发展的背景下,汉语语言研究关注到了信息时代下语言的变化与叙事方式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王梦、王会以网络暴力语言为

研究对象,对其产生、特点、传播和危害进行归纳和梳理,并提出规治网络暴力语言的具体路径。通过技术与教育等手段阻断网络暴力语言的产生与传播,营造和谐文明的网络环境。^[11]

(三) 语义与语法研究

语义和语法研究是语言学领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研究和著作接连出版。李丽云撰写著作《现代汉语动补式复合词研究》,以语义分析与语法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原型范畴、动词配价、构式语法、语法化与词汇化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现代汉语动补式复合词的范围、结构、意义、功能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考察与分析。^[12]袁世旭、郑振峰对汉语义位组合进行了理据性研究。主要从组合理据角度分析了羨余组合、矛盾组合与强理据组合、弱理据组合四种组合类型,并运用义位组合的同素规则理论研究了羨余组合、矛盾组合。^[13]付晓丽撰写著作《语篇分析实用教程》,首先论述理论基础,接着从语篇语用、词汇句法、语音等角度提供分析路径,并从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复杂语篇几个角度提供实践建议,对语篇教学有一定指导意义。^[14]

(四) 语言与文学研究

语言学的研究与文学鉴赏研究可相互贯通,语言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有利于二者的相互促进。杨金花对《唐诗七言律选》中的内容及编撰结构化进行了解读,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理论及相关文学理论内涵的理解、发掘与拓展;为诗歌阐释实践提供参照,满足当代实用性审美需求。^[15]

(五) 音韵研究

研究语音节奏和音韵现象,是汉语语言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汉语音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表现形式,承载着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尹凯以晋语疑问语气词“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古汉语的两类新型疑问语气词,并重点分析了中古汉语“麼(磨摩)”“婆”的合音形式。^[16]桑宇红、冀雪利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河北方言视角下的官话方言的渐变性与过渡性研究”的资助下,考察讨论了河北涞水方言的连读变调和轻声。^[17]

2022年,河北省在汉语语言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未来仍可从新方向、新技术角度进

行突破,希望河北省的专家学者紧跟学术前沿,不断探索研究的新视野,探寻更加科学高效的研究新方法,积极投身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撰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文章。

二、中国文学研究

2022年,河北省学者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古代文学、红色文学、乡土文学、人物思想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 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研究对象集中于名家名作等,研究视阈较为宽阔。詹福瑞和王馨一对阐释《诗经》德政思想、《楚辞》美政思想及政法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对后世的意义。^[18]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以叙事为主,使文学更贴近人民的生活。毛巧晖和张歆对元杂剧《绯衣梦》叙事的衍变及其文化进行了阐释,显示了社会情境对戏曲的知识生产的建构意义,该研究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阶段性研究成果。^[19]除作品外,对元杂剧作家的研究和考证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都刘平和鲁玥含对元杂剧家高文秀、姚守中的身份进行了考证,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曲家考证”阶段性成果。通过考证、稽考,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认识元曲家姚守中。^[20]清杂剧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张静围绕清代康熙年间一篇奇特杂剧《惜花报》展开研究,该研究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的研究成果。张静认为,在《惜花报》中,通过时空交错叠加叙事,为戏剧文学史提供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奇趣盛宴。^[21]

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面向当下开显意义,概因其不仅是文学精神,也是人生智慧。陈玉强研究了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探讨了生成文学尚简精神的话语资源,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观念史视野下的中古新兴文艺美学范畴研究”阶段性成果。^[22]同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观念史视野下的中古新兴文艺美学范畴研究”的资助下,陈玉强从发生学及观念史的视野,对“韵”字的起源、内涵建构、哲学渊

源及审美演化对魏晋六朝“韵”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进行了研究。^[23]

魏晋六朝的文学精神传于后世,影响了以后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田小军对汉魏六朝文体理论进行了研究,讨论了汉魏六朝的文体理论及相关问题。^[24]古籍考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理解文化的演变。河北省学者专家在古籍考证、人物考证和史料梳理方面产出较多成果。姜剑云和孙笑娟通过梳理史料,从为官、作诗等方面对诗人谢灵运的形象进行了有力地还原,指出部分史料误读。^[25]

霍现俊和张大江依据史实对《于少保萃忠传》所叙“土木之变”故事和编创方式进行了探讨,该研究属于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北方边患小说史稗互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二人认为,“袁彬故事”“李实故事”“哈铭故事”和“通州运粮烧粮故事”四则基本上依据“土木之变”的亲身经历者的回忆文字或文人笔记编创而成。^[26]李金善和高晨曦通过对屈赋的接受与解读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进一步认识明清易代之际学人注屈的异同,探究明末清初学人的君国情怀与情感嬗变,该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楚辞文献序跋研究”。^[27]

在古代人物研究方面,郑艳玲的《钟惺研究》是关于竟陵派领袖钟惺的一部力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钟惺研究”的研究成果。该书对钟惺的生平经历、兴趣爱好、文学思想等进行了全景式的探究,在此基础上对《诗归》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了钟惺在文学史上的价值。^[28]晚清民国词学多元而融合的发展,使得深入研究晚清民国词坛活动和词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于广杰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津门词人高毓澎的词学思想、创作风格及作品《燕赵词征》进行了研究。《燕赵词征》是对发现晚清民国词学多元而融合的发展侧面和深入研究晚清民国词坛活动和词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29]

对中国古籍的传承及整理也是汉语文学研究的重点。包得义撰写《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校证》一书,对历代著录情况、日本现存诸抄本与清末古逸丛书刻本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考察,对于我国古籍学术整理有重要意义。该著作属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藏《玉烛宝典》抄本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30]郭英德通过解读

《学文堂集》序文，结合诗文集序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议论方式，对清前期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方式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行探析。^[31]宋人对杜诗的精心研习影响着宋诗特质的形成和发展。左汉林和李新在《宋代杜诗学研究》一书中，从诗歌创作和艺术批评两个角度，探讨了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梳理了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的主要内容，较为细致地勾勒出宋代杜诗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32]

（二）红色文学

红色文学往往饱含伟大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因此受到学者关注。陈黎明坚持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思想，重评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两个基本原则，该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他认为，郭沫若提出的“有经有权”原则，对于当下重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依然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现实的有效性。^[33]

将写实基调与理想因素结合的写法，是文学史上相当一部分最受欢迎作品的共同特征。阎浩岗对置于文学史视域中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的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的中国红色文学百年史（1921—2021）”的阶段性成果。他认为“社会格局”与“政治格局”关注的区别，正是《人世间》与此前“革命历史小说”和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作品的区别。^[34]同时，阎浩岗还开展了对梁斌土地革命叙事非典范性成因的研究，该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研究”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红旗谱》并不属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类型。日常性的基调，使得它在对地主品性、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地主致富原因、革命伦理与日常伦理冲突的表现方面，呈现出诸多“非典范”特征。^[35]

田建民和赵蕾从《青年界》与“五四”启蒙的历史渊源、其所依托的文化启蒙的象征资本及对启蒙的传承与转换三个方面，对该刊的启蒙特质进行系统分析与论证。该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年谱长编编撰与家世生平资料整理研究”的研究成果。^[36]

（三）乡土文学

因其契合时代需求，坚持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乡土文学热经久不衰，一直是热门研究领域

之一。李致和冯瑶对马烽土改叙事独异性分析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解放区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他认为回溯小说《金姑娘》《解疙瘩》《村仇》的文本内容，有助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对广大农民的影响。^[37]

在乡土文学史上，部分作品因时代的局限性而产生误读。对误读误释的批判反驳，为作品正名是历代学者不断追求的目标。姜洪真选取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认为该小说最大的特点以现实主义与乡土文学叙事相融合的方式来书写抗战，也是其早年被误读和后来被“重新发现”的深层次原因。^[38]王平和胡景敏从教育历史的角度对平教会文艺教育实验进行的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乡村文艺运动研究”的研究成果。^[39]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自发表（出版）以来，一直成为文学界热议的焦点。目前对《有生》的深层意蕴的研究上却语焉不详。郭宝亮对胡学文的作品《有生》的深层意蕴进行了研究，对其写作目的、写作手法、独到之处等方面进行梳理和阐释。^[40]

（四）人物思想

2022年，孙犁日常叙事和小说研究成为热点话题，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孙犁的作品及其思想特征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振刚认为，《书衣文录》相对于孙犁的小说等文体创作，受到的关注以及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没有专门的著作和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究其原因，与《书衣文录》的书写方式有很大关系。^[41]在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学中的乡土书写研究”的资助下，杨昊和王宁结合孙犁“最喜爱”的抗战小说，以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为背景，对孙犁将时代性与乡土文化相融合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42]此外，熊权和吉媛圆细读《少年鲁迅读本》，考察孙犁如何在学习鲁迅、响应边区政府号召以及创作个性之间寻找平衡，客观考察孙犁的创作意图。^[43]《孙犁小说表达机制研究》是由李华秀所著，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成果。李华秀提出了“表达机制批评法”。该方法通过梳理作品元素，考察元素关系、元素加工手段等方式，发掘作品独特品格。她用表达机制批评法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

类型、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找到了存在于文艺作品中的精神密码。^[44]

鲁迅的作品浸润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新旧文化的冲突使得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更具有批判性。刘润涛对鲁迅的作品《离婚》的主要思想内涵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年谱长编编撰与家世生平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刘润涛从文本细读出发，考察故事时空，挖掘原型本事，并结合鲁迅创作时的思想状况，对《离婚》作出新的阐释。^[45]张素丽从语言问题角度对鲁迅的作品内容进行研究，其所撰写的《鲁迅与近现代转型期语言问题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主要聚焦于鲁迅与现代汉语转型的问题，旨在考察革命家鲁迅、理论家鲁迅、文学家鲁迅等不同层面的鲁迅与不同维度的语言命题之间的交叉纠缠关系。^[46]

陈超的诗歌创作有着自身独特的生成路径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其诗歌作品中，展现出陈超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王永祥对陈超的诗歌论的研究是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私塾教育的革废与新文学的发生”的阶段性成果。批评家和诗人陈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两者相互影响，成就了陈超在当代诗坛的独特地位。^[47]

翟崇光对史铁生新时期写作转向评述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时期美学、文学转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从史铁生的文学写作思想来看，从《命若琴弦》到《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反映了史铁生发生了较能代表其写作特质的转向。^[48]景立鹏和傅修海以厘清郭沫若诗歌文体观，解析其与历史语境、个人体验的互动过程为切入点，从文体观角度对郭沫若诗歌进行考察研究，该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的白洋淀诗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49]

阎浩岗表达了对周志强的现实主义论的看法，认为周志强的现实主义论有其现实针对性，他强调现实主义者要超越作家个人的日常经验感受，揭示社会真实处境与人的精神困境，呈现现实生活中不可化约、不可解释之物，达到哲学的真实。他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本质真实”的传统，又有自己新的发挥。^[50]虽然1993年“王朔现象”周边是众生喧哗的，但王

朔依然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导火索和重要批评对象。李建周以开阔的历史化的视野进入“九十年代文学”，重新梳理了王朔和“人文精神讨论”的关系。^[51]

（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一个具有张力关系的有机体，他们彼此追逐、相互嬉戏，共同生产文学的意义世界。邢建昌对文学批评的伦理的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知识生成机制的反思性研究与文献整理”的阶段性成果。他认为需要呼唤纯正的批评，再思何为批评、批评何为等问题。^[52]

文学理论可以指导人们系统地掌握文学的基本命题和原理，形成进步的文学观，对文学批评有直接指导作用。张柠对叙事作品形态与东方套盒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形态是可见形式，结构是潜在形式。形式分析就是发现可见形式与潜在形式之间的关联及其价值。^[53]

孟隋对网络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及其“情感支持”功能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网络小说以充满幻想的大众文化文本为主，但它呈现的幻想既是对现实匮乏的满足和补偿，也是对读者所处的现实秩序和情感结构的参照，故读者可从中获得与读者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情感支持”力量。^[54]

王永祥对《荷塘月色》的整体性解读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文教育转型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学发生研究”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为了避免碎片化的解读，且将表达技巧的分析与对作者情感的体会紧密结合，需要具有整体性解读的视野。^[55]

2022年，河北省中国文学研究在多个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总体看来，2022年度研究成果喜人，在一些学术领域也形成了特色，如陈玉强的魏晋六朝文学、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研究、王永祥的陈超研究等，显示了河北学者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参与度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强。

三、外国语言学研究

在外国语言学领域，2022年度河北省各高校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词汇研究、句法研究、语体特点、语料库建设和语言服务建设方面。研究

成果在国内外期刊中皆有发表。学者们采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如语料库、电生理学实验法、计算机算法等,不断推动着跨学科研究发展,对语言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一) 词汇研究

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外语词汇研究以多种词汇使用现象为研究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逐步丰富,结合计算语言学、大数据、语料库研究、认知语言学、实验心理学等方法,取得了一定突破。

孟占格、李楠基于半在线模型构建了人工智能英语词序排列模型和半监督 ELM 回归模型,通过实验验证了半监督在线序列 ELM 回归算法能够有效地促进传统的无监督批处理模式学习能力,该模型极大地提高了文本检索的正确性,对计算语言学的发展意义非凡。^[56]

于建平等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通过算法发展、数据知识的文本挖掘基本概念、大数据挖掘技术、结构发现和聚类四大模块分类,对前人有关情态动词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特征予以回顾总结,并对英语中情态动词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对英语中情态动词复杂语义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57]于建平等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基于语料库并采用属性偏序图法探讨了使得英语中情态动词语义合并的根可能性和认识可能性的语境特征,通过语义排歧规则为影响语义合并的语境特征提供了解决方案。^[58]

王梦通过梳理文献,指出了国内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语言变异研究、文化模式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方面的不充分,认为结合中国研究实际,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经验,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进行分门别类科学梳理,对未来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大有裨益。^[59]

行为实验及认知心理实验方法同样为当前的语言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刘佳等学者通过点探测任务行为研究方法和 ERP 电生理学研究方法,探讨了汉语中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的效价效应,对汉语中积极情绪负载词汇动态注意偏向的认知机制进行了实证性研究,证明了情绪词汇的注意偏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60]

(二) 句法与语体研究

针对多语种进行句法研究可促进对于语言结构的理解,了解语言的本质。邓太萍等人在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研究了晚期二语学习者对以名词复数为中心语的非局域主谓一致结构的句法迁移效应,发现语言输入训练能够促进句法迁移,句法学习具有可塑性和动态性特征,不仅对晚期二语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提供了理论意义且对教学任务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1]2022 年度部分学者针对语体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林茹芸、齐海娟对日本侵华时期秦皇岛港藏“滦外档”中日语公文词语使用、句法使用、语体结构方面的语体特点进行了总结,揭示了语言背后的历史本原,为近代日文档案的挖掘与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62]

(三) 语料库建设研究

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较为迅速,在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路玮,张威在 2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型中英连线口译语料库共享平台的创建与应用研究”基金资助下,对国际上首个大规模连线共享语料数据电子文本库“中英大型连线口译语料库共享平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平台对未来的开放性多语种翻译语料库建设及中国口译教学与研究有示范意义及参考价值。^[63]

(四) 语言服务研究

语言服务是 2011 年公布的语言学名词,指利用语言、语言产品和语言技术,为满足社会语言需求而提供的各种服务。王素敏、钟健对新时代我国应急语言服务资源的建设与完善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倡导,指出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资源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与数据库建设,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资源的重心在于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及产品技术开发利用。^[64]

2022 年度对外国语言学的研究在英语上有所突破,在日语研究上也有所挖掘,在外国语研究领域的探索日趋完善和丰富,对学术和实践发展皆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价值意义,更加重视语言研究对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学者们对跨学科发展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创新,更好地服务语言研究领域发展和国家发展、社会发展。

四、外国文学研究

2022年河北省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还进一步推进了对外国人物思想及其作品研究、译著和专业教材研究。

(一) 外国文学理论

“后批评”的新范式应在文学研究的学术功能和文化功能更有效地统一中充分体现文学和批评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张士民对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化转向”展开了研究,有助于更有效地反思“后批评”时代文学批评所处的困境,找到新的批评范式并创造新的知识形式。^[65]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生态批评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范式。艾米斯的后自然书写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王小会对《伦敦原野》中所展现出的后自然世界和作者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丁·艾米斯小说中的后现代生态思想研究”的阶段成果。^[66]

“后人类”是一个比较吸引人却也颇为令人困惑的概念,它是伴随着“人”这一概念的危机出现的。刘晓华对菲利普·迪克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后人类进行了研究。刘晓华将电影中涉及的后人类分为两大类型,并对电影中两种类型的后人类的表现进行了叙述式研究。^[67]此外,刘晓华还出版著作《美国后人类科幻小说身体书写研究》,着重分析了美国科幻小说对后人类身体的关注,对相关科幻小说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性的描写,作品涵盖范围多、情节描写生动。^[68]

英国文学富含现实、政治、历史等文化因素,自20世纪以来常被运用于电影艺术中。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空间叙事视域下的詹姆斯·霍格研究”的资助下,杨坤和石梅芳从英国文学改编电影中的空间与叙事关系出发,探讨二者相互作用影响,分析英国文学改编电影的创作特征中空间与叙事的运用策略。^[69]

文学作品的意义传达离不开文学评论家的解读与品鉴。王彦军和王雅萍以吉奥乔·阿甘本对于小说《抄写员巴特尔比》的解读展开研究,文章以阿甘本的解读为切入点,从“纯粹潜能”

“抵抗”和“赤裸生命”三个角度分析巴特尔比身上所展现出的生命救赎方式,寻求其成为阿甘本阐释潜能和生命政治思想绝佳例证的深层原因。^[70]

研究妖怪的本质是“探讨人本身”,是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霍君针对日本天狗形象演化中的中日文化交涉展开研究。神话人物、妖怪形象的产生源自人类对自我的认知,日本天狗的出现也与古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霍君尝试解明一种“隐形”的“互文式”交流,“细无声”地参与到日本文化的建构中。^[71]

唐元对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概念“第四面墙”和“打破第四面墙”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以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同名短篇小说《驾驶我的车》为切入点,与契诃夫戏剧《万尼亚舅舅》的演出进行比较研究。^[72]

(二) 外国作家思想及其作品

在世界文学史上,经典人物思想和作品的研究经久不衰。歌德是一位绕不开、说不尽的人物。如何理解与吸纳歌德,乃是一个如何化传统为己有的问题。孙秀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的资助下,针对雅斯贝斯论述莱辛作品以及歌德的人格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莱辛研究史和歌德研究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式——生存哲学的研究范式。循着雅斯贝斯的运思理路研究歌德的人格和思想,以雅斯贝斯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为底据,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时代意识的角度理解与吸纳歌德,二是通过与歌德的生存交往实现内在的变革。^[73,74]

文学作品中蕴含的道德思想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兴趣所在,李正栓和朱慧敏选取了罗伯特·彭斯的诗歌,并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彭斯诗歌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分别对其中的自然生态伦理、人文生态伦理、精神生态伦理和社会生态伦理进行阐述与深入探讨,阐释其伦理思想,为彭斯诗歌的伦理思想研究提供参考。^[75]

李进书透过韦尔默的后现代文化伦理思想,增进了对后现代文化的创作理念的了解。该研究由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伦理思想研究”资助。他认为这种文化中的自由化的游戏和多样化的风格培养着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政治意识,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化和艺术

与生活互惠关系的一种写照。^[76]

由于语言所固有的指称性，自我在修辞的意义上得以重建，从而展示了作为隐喻的自我同其表现形式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张文琦关注到了德曼在卢梭文本解读中对于“自我”的表达。德曼通过分析自我同反身代词之间的差异关系来说明自我的隐喻结构，并认为写作是修辞的结果，而非作者主观意识的产物。^[77]

记忆具有可塑性，在不同群体的眼中可以呈现为不同类型的记忆叙事。杨俊建针对记忆理论和美国印第安自传展开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记忆理论与美国印第安自传研究”的阶段成果。西部片的流行，导致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偏见在美泛滥，印第安人甚至因此而出现了被同化的危机。^[78]

（三）译著

2022年，在外国文学译著方面，河北省学者开展了专业论文集和大众读物翻译研究工作。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蔡宗齐发起，收录英语世界首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文心雕龙》专题国际会议的论文集《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作及修辞理论》正式出版。正如美国汉学家田安所说，它是第一部用英语写的专门评论《文心雕龙》的书籍，因而可以视作英语世界“龙学”研究的代表作，由刘卫华所译。^[79]

《太平洋探险史：从库克船长到达尔文》一书主要介绍了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人在太平洋的航行历程。本书相较于前版新加入了一个章节，它阐述了1826—1836年“小猎犬”号的探险历程。^[80]

（四）专业教材

除上述关于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文学批评和人物思想的研究外，外国文学专业教材的成果也值得关注。李正栓和申玉革在《英国诗歌欣赏教程》中谈到，诗歌难，编写此书初衷便是帮助学生理解诗歌、喜欢诗歌、创作诗歌。全书分为英诗入门和英国诗歌两部分。作者精选英国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作，通过赏析和品鉴作品，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鉴赏能力。除此外，李正栓、吴伟仁和李圣轩合著了《美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三版第一、二册）。该书所倡导的“史”“选”结合之编写方式成为同类教材的共同理念，进而成为英美文学课程教学

通行的做法。^[81,82]

2022年河北省外国文学研究继续保持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人物思想等多个研究方向开枝散叶的发展趋势。总体看来，本年度研究成果喜人，河北学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视域广阔，角度新颖，既有在旧议题上的新开拓，也有在新领域里的新发现，呈现出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景象；但仍要正视所存在的不足，如顶级期刊发表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还不够多。

五、翻译研究

就翻译研究而言，2022年度河北省各高校研究成果略显不足。相关研究者结合具体文本及其所处时代背景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等问题，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相关研究还从翻译硕士培养的角度出发，探究翻译者的学习因素问题，以期通过更有效的教学促进翻译实践过程。

李正栓和程刚以《山海经》为例，针对文本所涉及多个领域的大量术语进行研究。作者全面梳理了《山海经》大中华文库译本中的术语英译，划分为地学类术语、文化类术语等六大类别，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每一类术语的翻译策略，并以比勒尔译本为参照分析了这些翻译策略的优势与局限，以期对未来的科技典籍术语英译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83]

董洪学等学者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中学习者因素、学习环境因素与MTI教学互动的关系进行探究。作者在学习投入理论和三元交互理论的指导下，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从MTI学生的视角探讨其职业翻译能力发展与影响因素间的多维互动关系。^[84]

阎浩岗和连正在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资金支持下，针对茅盾《水藻行》的日译作者进行探究。《水藻行》发表后令日本文学批评界对茅盾和中国现代文学刮目相看。作者对中日两方面关于译本的相关史料予以搜集整理，以事理逻辑予以分析，较为明晰地阐述了《水藻行》日译本的来历。^[85]

许敏和耿强在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籍作家作品英译研究”的资金支持下，探究了特殊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接受问题。研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提出了三点启示。^[86]

2022年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还包括相关学者通过翻译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对外宣传,如李正栓所著《毛泽东诗词英译笔录》^[87],赵志刚所著《基于文化语境的〈老子〉英语译释研究》^[88],李晓朋所著《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89]等。此外,相关学者更加注重本土翻译实践者的培养工作,如朱之红所著《新文科背景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90],张娥所著《大学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探究》^[91]等。

2022年河北省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希望广大学者对本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拓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范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侯晓舟:河北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杨宝忠.大型字书疑难字新考[J].古汉语研究,2022(4).
- [2] 杨宝忠,王亚彬.当代大型字书《口部》疑难字新考[J].语言研究,2022(1).
- [3] 梁春胜,刘日照.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4] 刘晓明,关彦琦.汉字改革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研究[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1).
- [5] 冯军伟.概率算子“可能”的核心情态语义及其概率赋值手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6] 冯军伟.让步条件标记“就”的语法化及动因——兼论话题标记“就”的两种语法化模式[J].汉语学报,2022(3).
- [7] 商怡,武建宇.“掩映”词义演变中深层隐义素的核心作用[J].语文研究,2022(2).
- [8] 郭伏良,侯丽.基于语言监测的汉语高频新词语研究(2000—2020)[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9] 曹向华.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10] 陈双新,李丽.信息时代汉字与人的关系问题刍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11] 王梦,王会.网络暴力语言的危害与规治[J].青年记者,2022(4).
- [12] 李丽云.现代汉语动补式复合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13] 袁世旭,郑振峰.汉语义位组合理据研究[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2(1).
- [14] 付晓丽.语篇分析实用教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
- [15] 杨金花.《唐诗七言律选》编撰特点与价值再发掘[J].甘肃社会科学,2022(2).

- [16] 尹凯.晋语疑问语气词“哇”——兼谈中古汉语的合音型疑问语气词[J].汉语学报,2022(2).
- [17] 桑宇红,冀雪利.河北涞水方言的连读变调和轻声[J].方言,2022(2).
- [18] 詹福瑞,王馨一.先秦诗歌中政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河北法学,2022(12).
- [19] 毛巧晖,张歆.元杂剧《绯衣梦》叙事的衍变及其文化阐释[J].戏曲艺术,2022(1).
- [20] 都刘平,鲁玥含.元杂剧家高文秀、姚守中身份考实[J].戏曲艺术,2022(2).
- [21] 张静.时空交错与叠加叙事——论清代杂剧《惜花报》的艺术特色[J].中国戏剧,2022(3).
- [22] 陈玉强.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J].山东社会科学,2022(10).
- [23] 陈玉强.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
- [24] 田小军.汉魏六朝文体理论研究[J].文学评论,2022(3).
- [25] 姜剑云,孙笑娟.诗人太守谢灵运永嘉政务论衡[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26] 霍现俊,张大江.《于少保萃忠传》所叙“土木之变”故事考辨四则——兼论其编创方式[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1).
- [27] 李金善,高晨曦.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28] 郑艳玲,钟惺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
- [29] 于广杰.晚清民国词人高毓澎及其《燕赵词征》稿本考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30] 包得义,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校证[M].成都:巴蜀书社,2022.
- [31] 郭英德.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陈玉璠《学文堂集》序文解读[J].文学评论,2022(6).
- [32] 左汉林,李新.宋代杜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33] 陈黎明.“经”与“权”的辩证法——重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两个基本原则[J].甘肃社会科学,2022(6).
- [34] 阎浩岗.文学史视域中的《人世间》[J].文艺论坛,2022(4).
- [35] 阎浩岗.论梁斌的常态化土地革命书写[J].中国文学研究,2022(2).
- [36] 田建民,赵蕾.论《青年界》对“五四”启蒙的传承与转换[J].长江学术,2022(4).
- [37] 李致,冯瑶.诉苦·牲畜情结·劳动互助:马烽土改叙事独异性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9).
- [38] 姜洪真.《腹地》的现实主义抗日书写与乡土文学叙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3).
- [39] 王平,胡景敏.除文盲、作新民:平教会文艺教育构想与实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

- [40]郭宝亮.“乡土日常性”的双向突围与民间文化的探寻——胡学文《有生》论[J].文艺争鸣,2022(8).
- [41]李振刚.孙犁《书衣文录全编》日常生活叙事研究[J].当代作家评论,2022(6).
- [42]杨昊,王宁.论孙犁小说中的抗战与乡土[J].河北学刊,2022(4).
- [43]熊权,吉媛圆.从学习鲁迅到建构自我——孙犁《少年鲁迅读本》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22(10).
- [44]李华秀.孙犁小说表达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 [45]刘润涛.鲁迅《离婚》考论[J].鲁迅研究月刊,2022(3).
- [46]张素丽.鲁迅与近现代转型期语言问题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22.
- [47]王永祥.生命和词语摩擦出的诗意火焰——陈超诗歌论[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1).
- [48]翟崇光.从“虚设”到“实有”——史铁生新时期写作转向评述[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2).
- [49]景立鹏,傅修海.破体与变体:郭沫若新诗文体观探赜[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11).
- [50]阎浩岗.如何看待细节真实与个人经验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意义?——周志强现实主义论的读解与商榷[J].中国文艺评论,2022(3).
- [51]李建周.王朔与“人文精神讨论”[J].当代文坛,2022(3).
- [52]邢建昌.批评的伦理[J].中国文艺评论,2022(12).
- [53]张柠.论叙事作品形态与东方套盒结构[J].文艺研究,2022(7).
- [54]孟隋.网络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及其“情感支持”功能[J].贵州社会科学,2022(3).
- [55]王永祥.心绪起伏中的风景——《荷塘月色》的整体性解读[J].语文建设,2022(9).
- [56]Zhang Meng, Nan Li. Simulation of English Word Order Sorting Based on Semionline Mode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2022.
- [57]Yu, Jianping, Fu, Jilin, Bai, Tana, Xu, Xueping. Review and data mining of linguistic studies of English modal verbs [J]. WIRES: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2022, 12.
- [58]Yu, Jianping, Fu, Jilin, Bai, Tana, Zhang, Tao, Li, Shaoxiong. Investigation of feature causing semantic mergers of English modal verbs by approach of attribute partial order diagram [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2022, 43.
- [59]王梦.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研究及其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
- [60]Liu, Jia, Fan, Lin, Jiang, Jiaying, Li, Chi, Tian, Lingyun, Zhang, Xiaokun, Feng, Wangshu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 [61]Taiping Deng, Dongping Deng, Qing Feng, An event - related potentials study on the syntactic transfer effect of late language learne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J]. Language Sciences, 2022, 13.
- [62]林茹芸,齐海娟.秦皇岛港藏“滦外档”中日语公文语体特点和文化阐释[J].海外文摘·艺术,2022(12).
- [63]路玮,张威.大型中英连线口译语料库共享平台建设:功能与操作[J].中国翻译,2022(5).
- [64]王素敏,钟健.新时代我国应急语言服务资源的建设与完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
- [65]张士民.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化转向”[J].外语研究,2022(1).
- [66]王小会.生命共同体的别样表征——马丁·艾米斯《伦敦原野》中的后自然书写[J].外国语文,2022(3).
- [67]刘晓华.菲利普·迪克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后人类[J].电影文学,2022(19).
- [68]刘晓华.美国后人类科幻小说身体书写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
- [69]杨坤,石梅芳.空间与叙事的互动:英国文学改编电影的创作特征[J].电影文学,2022(2).
- [70]王彦军,王雅萍.潜能、反抗与赤裸生命:阿甘本论巴特阿尔比[J].文艺理论研究,2022(5).
- [71]霍君.日本天狗形象演化中的中日文化交涉[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5).
- [72]唐元.论《驾驶我的车》的“第四面墙”建构[J].电影文学,2022(17).
- [73]孙秀昌.“与歌德同在”:雅斯贝斯论歌德[J].江海学刊,2022(6).
- [74]孙秀昌.雅斯贝斯论莱辛作品的生存论根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4).
- [75]李正栓,朱慧敏.彭斯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J].外国语文,2022(5).
- [76]李进书.韦尔默后现代文化伦理思想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77]张文琦.隐喻的自我——以保罗·德曼对卢梭《那喀索斯》《皮格马利翁》的解读为例[J].国外文学,2022(1).
- [78]杨俊建.竞争、驯服与叙事:美国西部片与印第安自传对过去记忆的争夺[J].电影新作,2022(6).
- [79]刘卫华.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作及修辞理论[C].《文心雕龙》专题国际会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
- [80][美]奈杰尔·里格比,彼得·范德默,格林·威廉姆斯著,胡晓红译.太平洋探险史:从库克船长到达尔文[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
- [81]李正栓,申玉革.英国诗歌欣赏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 [82]李正栓,吴伟仁,李圣轩.美国文学史及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 [83]李正栓,程刚.“走出去”背景下中国科技典籍术语英译

探微——以《山海经》大中华文库译本为例[J].上海翻译,2022(1).

[84]董洪学,初胜华,张坤媛等.MTI 学生职业翻译能力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22(2).

[85]阎浩岗,连正.茅盾《水藻行》翻译与发表史实考辨[J].新文学史料,2022(2).

[86]许敏,耿强.特殊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接受——《一个女兵的自传》在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的传播与接受研究[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2(1).

[87]李正栓.毛泽东诗词英译笔录[M].北京:亚马逊出版集

团,2022.

[88]赵志刚.基于文化语境的《老子》英语译释研究[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89]李晓朋.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90]朱之红.新文科背景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2.

[91]张娥.大学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探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文艺理论研究

姜文振

2022 年,河北文艺理论研究在文艺批评、基础文艺理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及当代文化前沿研究等向度上开拓进取,形成了一系列既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省内各研究机构、高校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产出不够均衡的情况依然存在,表明还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者投身于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之中,以打造河北文艺理论研究的高地和品牌。但既有的研究在文艺理论研究各向度上的突破和成绩以及青年学者的不断涌现,也意味着河北文艺理论研究有着良好的前景和发展潜力。

一、文艺批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发挥文艺界人民团体的专业优势,指导文学家、艺术家提高专业水平,建设更具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在《建设新时代文艺评价体系的重要论述》^[1]中,刘宗超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评价体系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文艺评价体系建设是当前文艺事业深入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文艺评论事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文艺评价体系是文艺共同体关于文艺发展方向和规格的探究,是探讨文艺评判的系列标准,是目的、标靶、基本准则。建构文艺评价体系是为文艺行业明确规范和标准,更是为当代文艺发展明确方向感、价值观、方法论,探讨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好服务于文艺生产和社会发展。建设

具有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文艺评价体系,本质是探讨文艺的国家标准,这是个很有时代意义和历史责任感的学术话题。文艺评价体系是文艺创作的魂魄。文艺评价体系建设是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深入推进文艺界行风建设的目标和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完善的文艺评价体系正是文艺界天朗气清行业风气的重要保证。文艺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作品本位、人民立场、个人修为、时代特色。首先,文艺作品是文艺评价的坚实起点和建设目标。“文艺评价”,评价的首先是文艺作品。文艺的根本属性和独特之处在于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情性,形象性和感情性是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等具体文艺样式的立身之本。文艺作品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所以,文艺作品是评价的根本所在。文艺评价要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其次,文艺评价要坚持人民性。从评价体系来看,人民是作品的来源和接受者,优秀作品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体现的是人民的

喜怒哀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人民作为文艺作品的来源和接受者，就有一个如何塑造人民形象和如何对待人民的反馈的问题。其三，个人修为指的是创作者的素养和修养，这是文艺评价体系中的主体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持弘扬正道，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文艺公众人物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一举一动都会产生社会影响，一个时代的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德才兼备、德艺双馨始终是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其四，文艺评价要衡量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敏锐的时代感。文艺作品产生于具体的时代，时代影响艺术创造。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说明艺术家有先知先觉的艺术敏感性，通过艺术形象领时代风气之先。另一方面，艺术家也应该注重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大势，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创作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上四个方面，是新时代文艺评价体系的主要标准。其中，作品本位是评价的根本，人民立场是对文艺作品接受者的重视，个人修为是追溯到创作者这一主体因素，时代特色是对文艺评价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的衡量，这四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站在民族、时代、人民的立场，对当代文艺评价体系的系统论述，对建设天朗气清、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上宝贵的理论财富，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经”与“权”的辩证法——重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两个基本原则》^[2]中，陈黎明围绕郭沫若的相关论述，对《讲话》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在陈黎明看来，郭沫若提出的“有经有权”原则，对于当下重评《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依然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现实的有效性。坚持“经”的原则，就是要发掘《讲话》中蕴含的文艺恒常之道及其超越时空的艺术规律，此乃构成《讲话》经典性和永恒价值的基础；而《讲话》中“权”的因素，则要求在重估这一理论文献时，亦要持历史的客观态度，意识到它是马列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文艺原则的变通与灵活运用，任何超越具体历史情景的批评，均有可能导致“盲人摸象”的后果。同时，《讲话》中“经”与“权”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内具有辩证统一性，二者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坚持“有经有权”的评价原则，在当下文艺实践中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而《讲话》精神也只有在这一动态地不断发展过程中，才能够保持其恒久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邢建昌围绕当代文艺批评中的相关争议进行了关于批评伦理的深入探讨，针对当下文艺批评中存在的缺失呼吁重建批评的伦理。在邢建昌看来，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一方面，国家高度肯定批评的价值，把批评提高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高度来认识；另一方面，关于批评的批评之声不绝如缕，批评热闹的背后是精神、活力的委顿以及标准、眼光、判断力、介入性等的匮乏。在文学的热切召唤面前，批评有点儿力不从心。为此，需要呼唤纯正的批评，再思何为批评、批评何为等问题。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个具有张力关系的有机体，他们彼此追逐、相互嬉戏，共同生产文学的意义世界。阅读是批评的基本伦理，没有阅读就没有批评，阅读通向具体的分析和判断，并抵制某种外在意义的诱惑。没有理论的批评是无法想象的，会带来批评的无立场、无原则、无视点。理论不是象牙塔里的谈玄思辨，而是反思性的、怀疑的、自我作对的，也是小型的、复数的、可磋商的，作为工具箱而存在的。以这样的理论做底色、背景和工具，批评将有能力以文学性和理论性的双重视域打开文本、体验在场、形成判断、引领风尚，与文学一道完成对可能世界的塑造。^[3]

西方当代文艺批评的新进展也引起河北省理论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在《美国当代文学批评

的“政治化转向”》^[4]中，张士民指出，美国文学文化的精髓是它的政治性，彰显的是文学与文化相互建构的互动。在此意义上，所谓的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转向”实乃不断政治化的刷新操作，是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辩证循环。因此，僵化的不是文学批评的政治性，而是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研究范式。鉴于文学和批评在美国的繁荣得益于对其政治属性和属性政治的结合，“后批评”的新范式应在文学研究的学术功能和文化功能更有效的统一中充分体现文学和批评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

“历史观”是后现代主义时期批评家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在《后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历史观批判》^[5]中，王志亮对西方后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地辨析与讨论。王志亮认为，与后现代艺术批评几乎同时兴起的新表现主义，因为倾向回归往昔的历史，于是立刻成为后现代艺术批评的批判对象。意大利批评家奥利瓦以超前卫之名，强调艺术家回归绘画媒介和个人内在性的创作方式。这类“向后看”的历史观受到其他批评家的批判。哈尔·福斯特、本雅明·布赫洛、克雷格·欧文斯等后现代批评家从精神分析的“退行”、历史主义的非历史性和保守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等方面，批判了支持新表现主义话语的历史观。围绕历史观问题展开的这场后现代艺术批评之争，揭示出西方艺术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时的历史阵痛。与此同时，诸如绘画的历史意义、艺术的终结等问题都在该语境中被提示出来。

王志亮还根据彼得·比格尔、克雷格·欧文斯和本雅明·布赫洛批评文本讨论了文学批评中“讽喻”的视觉转向问题。王志亮认为，本雅明曾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使用的讽喻概念，经过诸多学者的阐释后，在后现代艺术批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和发挥。彼得·比格尔在1974年的《前卫理论》中，开始把讽喻概念用来解释前卫艺术的美学特征，在接下来的十年，讽喻成为后现代艺术批评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本雅明讽喻理论的视觉艺术转向过程，其中本雅明的理论也被后现代化了。彼得·比格尔建立了讽喻与蒙太奇之间的联系，建立了讽喻的视觉化和前卫艺术面孔；克雷格·欧文斯

通过杂糅本雅明、保罗·德曼和罗兰·巴特的理论，建立起讽喻的解构主义面孔，并指出所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即是讽喻；本雅明·布赫洛将讽喻概念与本雅明后期思想进行关联，对此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塑造了讽喻的政治化面孔。无论是欧文斯还是布赫洛，他们二人对讽喻的阐释最终都落实到对美国“图像一代”作品的阐释之中。讽喻成为确保“图像一代”作品具有文化意义的核心概念。^[6]

二、基础文艺理论研究

历史上，文学与理论关系的紧张向来备受关注。文学对理论的怀疑、抵制引发理论对自身的反思。邢建昌认为，从表面看，文学话语和理论话语似乎是相抵触的。文学话语既是概念的又是形象的，是所指的又是能指的，是逻辑的又是超逻辑的。这些特征，使文学话语承担起了创造意蕴内涵中的感性世界的任务。文学的世界是形式的世界，又是意蕴的世界。而理论的话语则是概念的、逻辑的，理论的展开是理性的运思过程。这样一来，在意蕴内涵中的文学世界与概念的、逻辑支撑的理论世界之间的确构成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常常被认为是文学指责理论的理由。但文学与理论的矛盾关系并非不兼容、非同一性的，而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智慧融通的。在精神深处，文学和理论不仅不矛盾，还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文学需要理论吗？理论的合法性根据何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究文学与理论的关系。文学与理论同源共生，缺一不可，它们都根植于对人之存在的关怀中。晚近虽然出现了文学理论的理论化，即理论的去文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与文学的分离。事实上，文学与理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交融。文学不仅可以承担理论的功能，理论也可以是文学性的书写。而没有理论的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好的批评是有理论的，也是富有文学性的。批评因理论而进入文学，并反思自身的经验，宽容他人的信仰。^[7]

在《理论与文学的相互生成——读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8]中，邢建昌通过对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深入读解，对理论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邢建昌认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对文学理论的知

识生产具有某种示范性。伊格尔顿认为，唯有唤起新异感觉的文本才有资格称为“文学事件”。策略即符号化策略，表现为形式和内容边界之间连续不断的运动。历史、现实、意识形态等作为策略化过程中的潜文本存在于文学的世界里。策略使文学摆脱了外在世界的纠缠，获得了自我指涉性。伊格尔顿的探讨说明：真正的理论不是对文学的剥夺，而是文学性的发现。理论与文学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生成，共同丰富了文学的世界。伊格尔顿的文学观即是充满文学性的，他在“文学是什么”的讨论中终结了那种定义式的文学本质观。他展示的是理论反思、怀疑和批判的功能，以及勇于接受文学现实挑战的心态。他努力在守护一个流动的、敞开的、多维的、悬而未决的、不可被规约的文学世界，对于文学的自我指涉、符号特性、形式策略、乌托邦功能等情有独钟。事实上，伊格尔顿在指出了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等这些文学属性之后又立即解构了它们，因为文学属性一旦固化也就走向了反面。因此，“文学是什么”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依然需要结合时代的“急难”做出文学性的回答。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范式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式”概念就成为文论界用以讨论、分析、反思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高频关键词。但是，人们在“范式”概念及相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中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分歧以及模糊之处。产生这种差异、分歧、模糊之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以归之于将 paradigm 翻译成了“范式”这个容易让人产生理解偏误的汉语词。库恩所使用的 paradigm 一词，强调的是它的典范意义，强调的是作为典范而存在、具有范例意义的个案。它的生成和存在影响乃至决定了常规科学的基本面貌。常规科学从“范式”那里获得的不是-整套抽象的、必须遵守的规则、规范，也不是一套现成的概念范畴体系、思想观念、方法论系统，而是主要从中“默会”出某项常规科学工作应如何着手、如何展开。“范式”就是以“范例”为标志、由科学家共同体所共享的一种更大的理解框架，它把相对较小范畴的理论和研究组织在一起。“典范”就意味着“规则”，“规

则”不需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就存在于“典范”之中。但是，在汉语语境中，“范式”特质的丰富性使得人们常常不仅不易清晰地区分“范例”与“规则”，并且人们经常在“规则”的意义上将“范式”混同于源自福柯的“知识型”。实际上，“范式”与“知识型”之间既有明确的区分，又有密切的联系。任何类型的“知识型”的生成、转换及其间所发生的知识“范式”之转移，都有其确定的社会现实、文化思想及社会学依据，就此而言，以特定的“知识型”为根据、以具体“范式”样态呈现的知识都具有其鲜明的建构特质。社会现实与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的多重关系与关联，使得作为知识生产之根据或规则的“知识型”与“范式”也可在理论观照中获得对其多重层级的把握并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型”与“范式”的关系，类似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范式”与这一“范式”内理论与知识间的关系，亦类似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知识型”体现为复杂多维的话语关联，表现为在特定时空中的知识、科学、思想对于具体知识之生成发挥作用的“历史合力”；而“范式”则以“规则”的方式规范引导知识生产的实际过程，它往往要求人们以它为样板、模具，在它所包含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规则内进行知识生产。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知识生产的历史现实中，作为“典范”的“范式”往往会发挥极为重要的知识构建示范引领作用。从对于知识建构所可发挥的具体范导、制约、影响等作用的角度讲，“知识型”是生成性的，“范式”则有其更显在的建构性；“知识型”是内在的、隐含的，“范式”则是外显的、直接的；“知识型”在知识的构建中形成了其确切的内在范导机制，而“范式”则往往发挥了其外在而直接的规范甚至制约作用。^[9]

在中国现代性文论知识的建构历程中，文学理论的“自性”生成于对“文学之所以异于非文学的特质”即“文学性”的体认之中。尽管存在着“功利”“审美”“启蒙”“革命”等各种知识范式，但在那些以作家群体为主导、致力于以文学创作去发挥“启蒙”人生、改造“国民性”、推进社会革命等各种理论表达中，人们更多的是从文学的社会价值的层面去定位文学

的,即使有时明确地说要给文学下“定义”,其“定义”的目的也是说明文学之功用或价值。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关于“文学的特质”、“文学性”的理论探究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出版于1929年的《文学概论》中,王耘庄提出,“文学的特质”“就是文学之所以异于非文学的特质在哪里的的问题”。王耘庄关于这一意义上的“文学的特质”问题的提出,几乎是与雅各布森同步的。王耘庄对当时已有的一些关于文学的界说如章炳麟、罗家伦、马宗霍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关于“什么是文学”或“文学的基本规定性是什么”的“学术”上的争议,但在关于“文学的特质”之争论的背后,是新旧文化与文学观念之间、不同派别的文学观念之间的理论纷争与对抗。这种纷争与对抗由世纪之交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论从“常识”层面还是从理论知识建构层面,关于“文学性”(或文学的特性、特征、特质、艺术性)的争论或不同表述,都实际上反映着一种话语权力的争夺和对文学的限制性要求。围绕着“文学性”(或文学“特质”“特征”“特性”“艺术性”“社会性”乃至“艺术价值”“文学价值”)的理论论争之焦点并非“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因此,在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被作为汉语翻译词汇进入中国之前,“文学性”一词已经在中国文化、文学艺术领域被使用了几十年,它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提供了必要的“自性”保障。它在文论批评中持续的存在,意味着在人们的观念深处,“文学之所以异于非文学的特质”是始终存在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著述越来越多地被译介进来,人们关于“文学性”的理论内涵的解释似乎逐渐趋向于一致,但在使用“文学性”概念时,人们还是表现出明显的“为我所用”的实用倾向。在现代性批判与文论知识型的后现代转换中,“文学性”在文论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已不复存在,它以更为多样的状态弥散到了各种文学、艺术、文化的新形态之中。中国现代文论中关于“文学性”/“文学特质”的知识表达及概念使用表明,作为一种文本类型,文学有其基本的规定性,体现着文学自身成其为文学的应然与实然的双向要求,也是确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之“自性”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10]

三、古代文论研究

2022年河北文艺理论研究者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魏晋六朝的文论美学,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在《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11]中,陈玉强对魏晋六朝美学中的“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他认为,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揭示“韵”的审美分野现象,是基于对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学理考量,旨在统一性之外探求差异性,以呈现“韵”的复杂面貌。文艺美学对“韵”多层涵义的参与性建构及选择性使用既存在意境融合,也存在审美分野,且后者要早于前者。经过考证,现存佐证“韵”字始于先秦及汉代的文献或不可信或存疑,至三国曹魏时期才出现对“韵”的释义,以之为“音和”。晋人品评人物舍声言韵,将“韵”指向抽象的人物气度,以不和谐的放旷怪诞为大韵;其后南朝画论与文论形成了“舍声”与“即声”论“韵”的审美分野。谢赫《古画品录》所论之“韵”不是指形式的和谐美而是指形象的生动传神之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汉代元气说而是魏晋玄学的形神之辨,它契合的是中国美学传神写意的理论体系。刘勰《文心雕龙》中“韵”字有33处,基本没有脱离声韵范围,其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刘勰固守“韵”的本义,呼应了当时重视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他忽视“韵”之新义,由此形成了他在韵论上的历史局限性。文论对“韵”之形上性的探讨至宋代才有突破,随着余意之韵在文论中的出现,“韵”在文论与艺论中才走向意境融合。

尚简精神是魏晋六朝文学所凸显的鲜明特质。在《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12]中,陈玉强指出,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乃面对天地之间繁复纷纭的情、景、事、理之时的一种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态度,它面向当下开显意义,概因其不仅是文学精神,也是人生智慧。以简合道配德的先秦哲学以及魏晋清淡直指核心、言约旨远、辞约旨丰的言语策略,为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提供了话语资源。刘勰《文心雕龙》在繁简辩证观之外,标举“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形成了别出一枝的以简驭繁观,

从而使“文约为美”超出特定的文体规范而达臻普遍性的文学精神。在观念史视野下追溯刘勰以简驭繁观的生成,可知易学是其理论渊藪,而佛教色空观念也与之存在若即若离的隐秘联系。

《文心雕龙》的海外研究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英语世界的“龙学”,以马克·奥利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于1907年在敦煌发现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为开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标志性的研究成果,除了《文心雕龙》的多种译本、专题研究、《文心雕龙》相关的博士论文、期刊论文外,最令人瞩目的是“龙学”专题会议的召开。1997年4月11—12日,由美籍华人学者蔡宗齐发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筹备并召开了英语世界首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文心雕龙》专题国际会议。参会学者中不乏著作等声名显赫的“龙学”家和汉学家。2001年,收录本次会议论文的论文集《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作及修辞理论》出版。正如美国汉学家田安(Anna M. Shields)所说,它是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引者注)用英语写的专门评论《文心雕龙》的书籍,因而可以视作英语世界“龙学”研究的代表作。全书由十篇论文组成,既可以作单篇论文的解读,合起来又是一部多角度研究《文心雕龙》的理论著作。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及批评传统”,主要探讨《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建构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思想基础”,主要研究《文心雕龙》所受的思想影响。第三部分“创作过程”,主要阐释《文心雕龙》的文学创作理论。第四部分“修辞艺术”,主要分析《文心雕龙》的修辞理论。第五部分是张少康的《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综述了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现状。虽然以上每篇文章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它们似乎吸收了其研究对象《文心雕龙》的系统连贯性——“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这组文章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呈现英语世界“龙学”研究的概貌,而且能够发现英语世界“龙学”研究的三个突出特点:交流对话的学术视野、对理论前沿的密切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

方法。虽然《中国文心》一书中的学术观点与国内“龙学”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但由于我们有着共同关心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各种差异和分歧之间完全可以形成健康的张力。共鸣与失调、赞同与分歧之间的互动,可以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从而激发更多的学术创新^[13]。

四、西方文论研究

近年来,孙秀昌关于雅斯贝斯哲学美学的研究受到学界关注。2022年,在雅斯贝斯哲学美学研究中,孙秀昌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在《雅斯贝斯论莱辛作品的生存论根源》^[14]中,孙秀昌指出,雅斯贝斯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剧作家、评论家莱辛视为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唤醒者,并将其列入《大哲学家》第二卷。在专论莱辛的文字中,雅斯贝斯结合莱辛的生平与创作阐发了孕生其作品的生存论根源。具体而言,莱辛作品的生存论根源主要涵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意志与人生自觉,二是不幸遭际与男子汉气概。在雅斯贝斯看来,莱辛是一位敢于直面“临界处境”实现自我拯救的生存个体,他在经历“无知”“眩晕”“畏惧”“良知”之类的“本源运动”后,终于在“爱”“信仰”“想象”之类“实现了的绝对意识”那里获取了从事“绝对行动”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将刻骨铭心的苦难与失败转化成了见证纯然真理、表达本真信仰的“密码”。从这个意义上说,莱辛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独具人文幽趣且恒放人性光辉的密码语言。从根底处看,雅斯贝斯是与其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为底据来诠释莱辛的,他将莱辛的作品视为其生存性向的直观呈现,从而为莱辛研究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式——生存哲学的研究范式。

在《“与歌德同在”:雅斯贝斯论歌德》^[15]中,孙秀昌对雅斯贝斯关于歌德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的读解阐释。雅斯贝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陆续发表了两次关于歌德的演讲,这两次演讲都强调理解与吸纳歌德的时代精神处境问题。在雅斯贝斯看来,直面以虚无主义为底色的时代精神处境,德国人究竟是背弃歌德继续沉沦于虚无之地,还是神化歌德耽迷于偶像崇拜的幻境之中,抑或是断然地返回生存意识,以便在与

传统保持内在联系的过程中将歌德视为引导我们赢得属己的未来的路标，这是一个关乎德国人、欧洲人乃至全人类命运与前景的大问题。基于这种深重的时代危机意识，雅斯贝斯吁请当下的德国人通过与歌德的生存交往实现内在的变革，进而在化传统为已有的过程中承担起自由选择、自我超越、自我生成、自我教育的责任与使命。孙秀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怀着殷切的期待渴望着获救。他们纷纷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在德国古典时期“打开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之门的第一人”——歌德。尽管歌德所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相距甚远，但是他那超越时代的灾难意识使他成为正身处现实灾难之中的每个生存个体的同代人。因此，我们今天仍有接受歌德教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雅氏在演讲中呼吁德国人带着时代的难题向歌德询问，希望我们运用“理解-描述”的方法谛听歌德的心声，尤其是通过与歌德的生存交往实现内在的变革，进而在不断地理解歌德与化传统为已有的过程中走出时代精神的困局。雅氏就如何实现内在的变革提示了如下三点：第一点，“我们通过再教育的‘手段’并不能全然实现内在的变革，因为内在的变革根本无法被设定与筹划”。第二点，“重要的是此时此刻”。第三点，“内在的变革要求我们清晰地理解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处境——我们身在其中的人类的处境和德国人的处境”。雅氏所期待的“新的接受歌德的方法”乃是一种“理解-描述”的方法，这种方法旨在重新唤起歌德涵淹于作品背后的生存意识，以便让我们不断地透过他的作品去理解其整全的人格，进而通过与歌德的生存交往实现内在的变革，最终让歌德以其活的精神帮助我们赢得自身的未来。

在《斯威登堡的精神分裂过程与其通灵术：雅斯贝斯论斯威登堡（下）》^[16]中，孙秀昌系统阐释了雅斯贝斯关于斯威登堡的相关论述。雅斯贝斯是从精神病理学-心理学的视域检视斯威登堡的，在他看来，斯威登堡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时刻，正是他出现种种幻觉的时刻。斯威登堡对出现于此类幻觉中的种种超自然异象的描述“总的来说乃是单调、重复、乏味的”，是因为此类的描述旨在传达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观念”。这种“古老观念”的韵致，就是深藏于斯威登堡心中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观念。受这种观

念的影响，斯威登堡出现了种种幻觉并亲历了种种超自然异象。雅氏主要举证了斯威登堡描述过的三类幻觉：①与死去的人进行交流。②对超自然领域的地形进行描述。③对《圣经》经文隐含意义的理解。当雅氏从精神病理学-心理学的视域对斯威登堡的自我描述再作解读时，他则从中读出了另一种意味。在雅氏看来，“通灵”能力的韵致在于，它是一种“超人的洞察力”。正是凭借这种特异的能力，斯威登堡可以看见大众无法看见的“超验世界”，并能够与其中的神灵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斯威登堡的全部经验，说到底都是其心灵图像的外化与投射。语言是与思想同在的，任何一种思想的经验一旦被人们用言辞表达出来，它就进入了人类精神天空下的敞亮之地，成为一种可在人与人之间彼此传达与交流的东西。就此而言，斯威登堡的通灵经验是人类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斯特林堡、斯威登堡，还是荷尔德林、凡·高，雅氏所关注的这些精神分裂症艺术家都比世俗实存（大众、常人）更敏锐、更痛切地感受到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断裂，并以各自的方式投身于缝合其间裂隙的志业。

毕日生关于阿兰·巴迪欧美学思想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在《艺术真理是始于事件的“艺术构型”——阿兰·巴迪欧的艺术真理观》^[17]中，毕日生指出，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类性”事件哲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哲学，一种过程哲学。巴迪欧的艺术真理是在其事件哲学的视域下，在对艺术与哲学“非美学”关系的重新构想中展开论述的。巴迪欧“不合时宜”地叫板一切当代版本的“哲学终结论”，他哲学的雄心就是以“回归柏拉图”的姿态，让当今哲学“再向前迈进一步”。巴迪欧对“何谓哲学”有自己的看法。他回到古典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中，并从真理的角度来定义哲学。巴迪欧的真理哲学是向柏拉图或笛卡尔真理程序的一次回归。巴迪欧讲的真理是偶然的、特殊的，是不时发生的事情。真理是主体对事件的忠诚，事件是一种绝对偶然发生的“新”的东西，这样真理就把主体推到一个未经尝试过的领域，总是“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相信某事”（巴迪欧），独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在其“类性”事件哲学视域中，巴迪欧展开了对艺术与哲学关

系问题的探讨。他在《非美学手册》提出艺术与哲学的第四种关系，一种生产性的关系图式——“非美学”关系图式。在巴迪欧关于艺术与哲学的“非美学”关系构想中，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既具有“内在性”（immanence），又具有“独一性”（singularity）的。人在艺术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宣布了对这一艺术事件的“忠诚”，使艺术真理得以产生。进而言之，在艺术事件发生后，形成了一系列“艺术构型”，艺术真理由此产生。艺术事件引发了艺术的构成，艺术事件通常是一组艺术作品，是一个独一的多。在“艺术构型”的约束之下，“作品在‘后事件’的维度上组成真理”。巴迪欧的诗学思想用最简洁的方式可以概括为：诗既是哲学的条件之一，又是艺术真理产生的场所；诗是与哲学的对抗中来确立自身，诗的真理的自体是思想本身；诗歌是对真理的探索，而非对世界的“模仿”和“表现”，诗是一种真理呈现的“事件”；诗的真理就是作为“事件”的诗歌的语言实践本身，诗是语言沉默的行动。换言之，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是一个思想事件，是一个真理事件。诗歌本身生产艺术的真理。巴迪欧的真理观及其艺术真理的思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其类性事件哲学立场出发，他几乎全部的哲学努力就是证明和呼唤真理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五、当代文化前沿问题研究

在2022年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当代文化现象及其相关前沿问题是河北省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其研究关涉到后人类、网络小说及当代电影等多个方面。在《“赛博格”：后人类时代的身体范式与审美隐喻》^[18]中，王亚芹认为，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体外进化的历史，后人类时代则是技术主导下身体内部的演变史。在后人类的技术革新中，人类身体使得技术逐渐成为世界、社会和个体自身的存在方式。后人类时代关于人类身体景观的想象层出不穷，无论是赛博格还是人工智能，都是以人类的身体作为中介进行改造的范式。特别是人机合一的赛博格，正在用机器人身的“超体”行动践行着一种新的身体转型和审美隐喻。在机器与身体、肉身与符号、遗传基因与信息流之间的界限被僭越的情况下，新的美学视域也同时被开启。如果说“人类时

代”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基本局限在人类世界的话，那么“后人类时代”则将整个世界和不同的学科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出现了各种异质事物共同生存的图景。其中的“赛博格”作为后人类时代最主要的身体存在形式，其发展充分体现了技术与人类的融合，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技术乌托邦的价值中立性立场。后人类时代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技术化的存在，根据技术对身体的不同影响，我们可以把后人类身体分为“具身派”（embodiment）和“离身派”（disembodiment）两大类。与此相应，赛博格身体也可以分为“具身化”的人机混合形态和“离身化”的身心分离形态两种主要范式。我们已经从强调征服自然和释放感性无望的纯粹审美主义，转变为后人类时代自然、社会、机器与身体共同生成的“审美共生主义”。这里所说的“审美共生”既不是像传统人文主义那样局限于人类中心的建构，也不是要抛却一切传统价值去确立肉身的本体论地位，而是致力于人类和动物、人类和机器、人类和世界之间彼此的相互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类时代所强调的“审美共生主义”，本质上意味着身体的敞开与延伸，意味着与具身世界的交织互融，它是审美精神嬗变的必然趋势。

在《网络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及其“情感支持”功能》^[19]中，孟隋指出，网络小说以充满幻想的大众文化文本为主，但它呈现的幻想既是对现实匮乏的满足和补偿，也是对读者所处的现实秩序和情感结构的参照。通常，网络小说文本与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与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会在“情感结构”上保持相似性，这样读者便可以从中获得“情感支持”的力量，这种情感支持力量与读者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比如被激励、被启发、被确认身份（比如获得优越感和认同感）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小说的现实感是由读者的阅读生产出来的。网络小说中的幻想对读者而言具有“多义性”，它可以“接合”不同读者的个体经验，进而有效地为读者提供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各种快感和意义。因此，网络小说虽是充满幻想的大众文化文本，但是它不可能完全地“架空现实”，而且恰恰相反，优秀的作品

中总是预留了现实的位置, 尽管这里面的“现实”可能是抽象的、被浓缩的、被拔高了的现实。

杨宇静关于当代电影的文化现象解读也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在《电影〈芙蓉镇〉中的食物叙事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世俗伦理》^[20]中, 杨宇静认为, 谢晋电影《芙蓉镇》之所以被反复谈论, 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它解释历史、重述大众感性经验、想象未来的方式, 是经由人性、道德等世俗生活叙事实现的。而和世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恐怕要算吃的问题, 因此食物在《芙蓉镇》的世俗生活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米豆腐是电影《芙蓉镇》中最具文化表征意味的代表性食物形象。电影中多次出现米豆腐, 每一次出现都表征了创作者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的某种思考以及对乡土秩序的物质想象。首先, 米豆腐的生产过程展示了勤劳朴实为核心的乡土伦理观念; 其次, 米豆腐的消费过程建构起一个乌托邦化的乡土社区; 再次, 米豆腐生意从被禁到复出确立了乡土伦理的恒久正确性。实际上芙蓉镇上新的乡土秩序的核心和未来与农民无关, 秩序核心的后代军军身上凝聚的是现代性、物质欲望、权力的多重诉求。正是这些诉求内在瓦解着乡土伦理, 使得 20 世纪 80 年代承载了乌托邦想象的乡土乐园潜藏着危机。米豆腐生产、经营、消费的叙事逻辑, 展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告别革命时, 对乡土乌托邦的深情想象, 而米的表征则呈现出普通百姓对生存权利的关切。《芙蓉镇》里的酒则通过对个体生命精神情感空间的隐喻性呈现, 实现了对革命更内在的解构与反思。电影对酒的表征, 展示出情感诉求、肉体欲望的人性自然与革命规训之间的矛盾。这就内含了一种政治运动与世俗伦理之间的博弈。借米豆腐、米、酒的表征, 《芙蓉镇》展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反思革命的内在逻辑, 即通过对乡土秩序、生存权利、情感欲望的肯定。这种用世俗伦理反思历史, 并想象未来的方式, 一方面构成 20 世纪 80 年代启蒙的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乌托邦想象内在的悖论性。

在《转型期情感叙事的政治逻辑及内在裂隙——从电影〈牧马人〉的再次走红谈起》^[21]中, 杨宇静认为, 不同时期观众对《牧马人》中乡情、爱情、爱国情的接受情况, 凸显了 20 世纪 80 年代情感叙事的内在政治逻辑及其中蕴

含着的裂隙。《牧马人》对乡情的强调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 许灵均的悲剧就像一场天灾, 他的“重生”则证明了人是灾难的救赎者, 而不是灾难的制造者, 以此完成新的社会秩序的调整。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 许灵均从一个被劳动者启蒙的人变成了一个启蒙劳动者的人, 革命年代建构起的对体力劳动和乡情温暖的崇尚也逐渐崩塌。《牧马人》中的爱情带着恒久价值的光环, 配合转型期的世俗伦理重塑, 弥合革命创伤, 确立了一种以“家”为核心的道德高地和社会新秩序, 借助“家”的稳定, 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合法。在《牧马人》中, “质朴的乡情、纯真的爱情、劳动的热情”, 最后都“融汇成真挚、深厚的爱国之情。”许灵均的爱国情之所以感人并引发热烈讨论, 在于它拒绝了资本主义的物质诱惑。在许灵均眼中, 富足的物质也许可以满足人的口腹之欲, 但它是奴役人的, 而不是滋养人的, 无法给人提供精神抚慰和满足感, 只会带来身心的异化。与之相比, 社会主义的中国拥有广阔美丽的山川、真诚质朴的人性、积极奋进的精神, 可以给人生带来价值感和方向感。《牧马人》对资本异化的警惕和对乡土温情的讴歌有其内在的悖论性, 这决定了其醉心乡土温情只能是暂时的逃避, 在长久的历程中, 终会暴露自己的无力。

(姜文振: 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刘宗超. 建设新时代文艺评价体系的重要论述[J]. 中国文艺评论, 2022(1).
- [2] 陈黎明. “经”与“权”的辩证法——重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两个基本原则[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6).
- [3] 邢建昌. 批评的伦理[J]. 中国文艺评论, 2022(12).
- [4] 张士民. 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化转向”[J]. 外语研究, 2022(1).
- [5] 王志亮. 后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历史观批判[J]. 艺术设计研究, 2022(1).
- [6] 王志亮. “讽喻”的视觉转向及其三副面孔——基于彼得·比格尔、克雷格·欧文斯和本雅明·布赫洛批评本文的考察[J]. 中国文艺评论, 2022(10).
- [7] 邢建昌. 文学需要理论吗[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5).
- [8] 邢建昌. 理论与文学的相互生成——读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 [9]姜文振.“范式”概念溯源及其与“知识型”的关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10]姜文振.中国现代文论“文学的特质”/“文学性”的命运[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3).
- [11]陈玉强.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J].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12]陈玉强.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J].山东社会科学,2022(10).
- [13]李卫华.交流·前沿·跨学科——从《中国文心》看英语世界“龙学”的特点[C].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五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 [14]孙秀昌.雅斯贝斯论莱辛作品的生存论根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4).
- [15]孙秀昌.“与歌德同在”:雅斯贝斯论歌德[J].江海学刊,2022(6).
- [16]孙秀昌.斯威登堡的精神分裂过程与其通灵术:雅斯贝斯论斯威登堡(下)[J].语言文学前沿,2022(11).
- [17]毕日生.艺术真理是始于事件的“艺术构型”——阿兰·巴迪欧的艺术真理观[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18]王亚芹.“赛博格”:后人类时代的身体范式与审美隐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19]孟隋.网络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及其“情感支持”功能[J].贵州社会科学,2022(3).
- [20]杨宇静.电影《芙蓉镇》中的食物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的世俗伦理[J].文学与文化,2022(3).
- [21]杨宇静.转型期情感叙事的政治逻辑及内在裂隙——从电影《牧马人》的再次走红谈起[J].文化研究,2022(03).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张志勇 马吉兆

2022年河北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立足燕赵,直面学科内诸领域前沿问题,扎实掘进,勇于创新,在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将本年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河北学者发表的论文、论著等相关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总结、梳理如下:

一、古代诗歌

(一) 先秦诗歌研究

本年度关于先秦诗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詹福瑞、王馨一《先秦诗歌中政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一文,通过阐发《诗经》中的德政思想与《楚辞》中的美政思想、政法观念,追溯、梳理了德法共治理论和实践在商周、汉、唐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策略的实施以及“德政”“美政”对当代治国兴邦及个人修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1]

《诗经》学研究的成果有李娜《汉魏〈诗〉学发展与〈诗经〉名物释义》,文章立足于汉魏《诗》学的发展,通过梳理《诗》中名物释义的脉络,总结出其演变轨迹是由随文释义至独立阐释、从伦理政治表达到语言文字训诂,最后到名物本体疏解,以此呈现经学早期发展的基本状况

及汉魏《诗》学发展对唐代《毛诗正义》成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2]此外,唐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及其研究现状》亦对《诗经》的研究有所涉及,通过《大雅·思齐》与《小雅·节南山》分析了《诗经》中的瘟疫书写。^[3]

在明清之际众多的《楚辞》注本中,陆时雍与周拱辰传世的《楚辞》注疏均有较高价值。李金善、高晨曦《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一文指出,陆时雍与周拱辰对《楚辞》的注解及思想倾向存在明显差异,文章通过对陆时雍及周拱辰的创作背景、因身份而造就的创作上的情感歧点进行分析,得出前者的《楚辞疏》中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而后者的《离骚草木史》中却不隐君主之过,有愤慨狷急之情,并赞扬屈子之“死谏”。^[4]张启惠《钱澄之〈屈诂〉的文本阐释与注释特征》一文指出钱澄之《屈诂》文本训释遵循“各从其是”的原则,其章句阐释更加贴近屈原作品的情感本质,主要体现在文献征引以《诗》学、《易》学为主,对于前代“无次序说”的辩证继承和“以情注骚”三个方面。^[5]

(二) 两汉诗歌研究

本年度关于两汉诗歌的研究成果不多,岳洋峰《汉代乐府诗“风雅通歌”的演唱形态》一

文,通过论述两汉时期乐府诗所存的“风”“雅”之辨的情况,及“风雅通歌”的演唱体系、演唱形态的确立,得出两汉的乐府诗在歌辞、演唱、类目的组合上均存在“风雅通歌”的形态,并成为两汉乐府诗演唱特征与形态的体现,而这一形态在给新生俗乐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传统雅乐地位的下降。^[6]

(三) 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姜剑云、孙笑娟《诗人太守谢灵运永嘉政务论衡》一文通过对谢灵运永嘉诗歌的深度涵泳和细读,以诗证史,考证分析其在永嘉太守任内巡视调研、规划督导、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实绩,揭示谢灵运永嘉诗作正是其作为太守的“工作日记”,还原出谢灵运受民众尊重爱戴的良吏形象,有力地否定了前人关于谢灵运在永嘉政绩乏善可陈、只顾游山玩水的固有评价。此说有助于全面认识谢灵运的真实形象,深入理解谢灵运之所以成为后世诗人、官吏崇拜对象的原因所在。^[7]

(四) 唐代诗歌研究

本年度唐诗领域研究较为活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唐代诗歌题材内容研究、诗人生平考证研究两方面。

1. 诗歌题材内容研究

中国古代有大量涉及灾害题材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近年来,古代文学中的灾异文化书写研究热度持续上升,河北省学界亦出现了一批研究不同时代灾异相关诗歌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唐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及其研究现状》一文按照朝代顺序,系统全面研究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瘟疫书写,涉及不同朝代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其中亦涉及有唐一代诗歌瘟疫书写研究。该文指出,“诗歌中的瘟疫书写从唐代起逐渐增多。《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中有300多首和瘟疫相关的诗歌,张说、张九龄、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杜甫、高适、韩愈、白居易等都写有关于瘟疫的诗歌”,^[8]唐代瘟疫相关诗歌研究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此外,张静《唐前自然灾害诗歌文献整理与考证》^[9]一书,主要针对唐前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相关诗歌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考证,其中重点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注重揭示自然灾害诗歌文献的思想内涵,彰显唐前自然灾害诗歌文献的史学

价值。

对唐诗驿路书写的研究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进展。吴淑玲《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一文认为,唐代文化观念开放,视夷狄为兄弟,但中原中心的观念并没有消退,在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中,唐代诗人以中原中心为比照,写出了走向边域对中原士人内心的冲击。该文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原中心所起的作用,诗人们在边域书写中更多关注他们所不适应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给唐诗描写带来了陌生美、狞厉美、感伤美,形成了唐诗边域书写与一向被认可的高华爽朗的唐诗主基调不一样的风格。^[10]

2. 诗人生平考证研究

诗人生平考证方面,吴淑玲等利用墓志等材料对唐代诗人卢纶生年做了深入考证,并据之对卢纶部分诗歌作了更为顺畅的解读,结论令人信服。其论文《卢纶生年新考及卢纶诗作中生年诗句新解》根据卢纶父母结婚时间有力驳斥了卢纶生于737年、739年、748年等旧说,并综合诸多材料论证卢纶实生于天宝元年(742)。借此分析卢纶诗作中与其生年有关的诗句,如“八岁始读书,四方遂有兵”“童心幸不羁,此去负平生”“是月胡入洛,明年天陨星”“三湘衰鬓逢秋色”等均可获顺畅解读。^[11]

(五) 宋代诗歌研究

本年度宋代诗歌研究扎实推进,在诗学思想研究和诗歌内容研究两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成果。

1. 诗学思想研究

左汉林、李新《宋代杜诗学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宋代诗歌创作学杜的阶段性及其特征,探讨杜诗对宋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宋人学杜的成就和局限;总结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的主要观点,从诗歌成就、艺术渊源、体裁特征、主体风格、对仗、用典等不同方面,全面总结了宋人对杜甫诗歌艺术的认识,较为完整、详细地勾勒出宋代杜诗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12]

2. 诗歌内容研究

宋代诗歌内容研究成果,首先体现于对宋代诗人诗歌个案的研究。沈童《从唐宋诗之变看梅尧臣悼亡诗的意义》一文选取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的悼亡诗为研究对象,以唐宋诗之变为主要切入点,探究梅尧臣别唐变唐、勇于创

新,多方面开创宋诗新艺术范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内容,从平淡的风格和审美理想、广博而日常化的题材、以文为诗的破体文体特征三个维度,概括分析得出梅尧臣悼亡诗的特征与意义,揭示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典型意义。^[13]

唐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及其研究现状》一文已于上文有所表述,其中研究亦有涉及宋代诗歌部分。该文统计指出,宋诗中的瘟疫书写比重相较唐诗已有明显提高。

(六) 辽金元诗歌研究

本年度辽金诗歌成果较少,较为引人瞩目的是徐艳丽的元代乐府诗研究。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代乐府诗研究述论》以元代乐府诗为切入点,以十年为一阶段,将研究成果划为自觉期(20世纪90年代)、开拓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展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并针对当前元代乐府诗研究缺乏宏观层面的系统性观照的研究现状,提出对元代乐府诗文体和乐体研究的深入研讨将是元代乐府诗研究的重点。^[14]徐艳丽的另一篇文章《郝经乐府诗辑考及其乐府诗创作研究》把视角聚焦到郝经的乐府诗创作做个案研究,作者从郝经的乐府诗辑考入手,考察其乐府诗题、体式内容及风格等要素,探究郝经乐府诗的继承与新变及其在乐府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15]

(七) 明清诗歌研究

本年度对于明清诗歌的研究聚焦于对几位诗人的个案研究。

石瑤是弘治、正德年间文坛盟主李东阳的得意门生,被视为茶陵派殿军,是创作个性较鲜明的一位明代诗人。李浩、段睿《〈熊峰集〉版本源流考》为治畿辅学及明代文学史者提供了可靠参考^[16];李浩、方艺融《突破“茶陵正宗”——疾病与石瑤的文学创作》则结合具体诗文分析了疾病对石瑤文学创作动机的强化,题材内容的开拓,产生的全新的生命意识等,认为病痛所致的身心折磨实乃理解《熊峰集》思想内容和创作风格的关键之一。^[17]李志萍《禅魄诗魂:论龚自珍诗歌的佛禅意趣》提出龚自珍诗歌以“自贵其心”和“普度众生”为哲思内核,分别从佛禅符码、佛思灵光对龚自珍诗歌狂剑怨箫的意象、通俗意深的朴素语言进行研究论述。^[18]

明清两代诗学理念的研究有孙欣欣论文《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该文论述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以“养性情之中和的编选宗旨、得风雅性情之正的选诗特色”在明中期的诗歌复古思潮中弹出异响,客观上为中晚唐诗在明清两代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

二、古代散文研究

(一) 先秦散文研究

本年度先秦时期的文学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诸子散文所蕴含的诗学思想研究与先秦诸子著作的文献整理考证方面。

对诸子散文的思想研究聚焦于儒、道两家,特别是许春华在多篇论文中通过对“闻”“乐”“兴”“仁”等关键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之考察厘定,进而对孔子儒学、诗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闻”:“乐”与“仁”的对接及境界形态——论孔子儒学“哲学的突破”的多样性》一文揭示了根源于内心之“闻”于“乐”犹如“兴”于“诗”,打开了“乐”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认为孔子儒学对“诗”“礼”“乐”同等看待,皆与“仁”思想相通,其“哲学的突破”路径是多样性的。^[20]《“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一文指出“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并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21]许春华与王欣合作的《“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从《论语》中的诗学、诗教文献切入,指出孔子诗教以“礼义”为选取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思想结构,获得了“仁”之本质规定。故“诗”与“礼”“乐”一样,都是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形塑孔子儒学的君子人格,实现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22]许春华等《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面向——〈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的比较》则将《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孔子对《诗》《乐》所做工作的记述进行比较,总结出记述所体现的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不同面向,是理解孔子儒学与汉代儒学

不同旨趣的诗学维度。^[23]《“诗”与“儒”——荀子论诗思想旨趣探奥》一文对荀子的诗学思想进行了剖析,认为荀子以“圣人之道”“先王之道”对“诗”之主旨及《风》《雅》《颂》各个部分意旨的重新阐释,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学诗学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战国晚期儒学诗学的价值取向,与孔孟之阐释均有所不同,更注重以“圣人之道”“礼义”阐释“诗”之意旨,更为突出“诗”之经典的权威性与真理性,这为推动“诗”获得“经”的地位,由先秦儒学的思想形态转换为汉儒的意识形态,作了思想上的积极铺垫。^[24]

本年度河北学者在先秦诸子著作的文献考证、还原方面亦有可喜创获,为今后从文学角度认识、研究先秦诸子散文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王玉环的著作《日藏梅泽本〈老子〉古本研究》对梅泽纪念馆所藏日本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老子》河上公注钞本进行了系统且细致的研究;^[25]其《日本近现代河上公注〈老子〉研究》一文则对近现代日本学者所展开的河上公注《老子》研究进行了考察。^[26]吕庙军的《清华简〈汤在啻门〉诸子思想交融研究》对收录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六篇简文中的第五篇《汤在啻门》一篇进行了较为细致地释读与文献性质考察,指出其文献性质及思想交融性较为复杂——该篇在商汤和伊尹君臣问对之事中蕴含了早期五行说、黄老道家、儒家等思想。故其可能属于先秦诸子的思想母体,并不归属于某一学术学派,当形成于战国早期之前。^[27]

(二) 秦汉散文研究

本年度河北学者对秦汉散文的研究涉及董仲舒及其思想研究、历史散文的叙事分析、特定学人的文献文化史考察、史志书目的注解著作研究等方面,内容较为丰富。

对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儒董仲舒的研究反映了河北学者对古代燕赵大地所孕育的优秀学人之关注,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探索。2022年,程志华^[28]、白立强^[29]等人的研究虽主要关注点在董子哲学思想,但对从文学视角认识董仲舒及其政论散文、赋等文学作品也有一定借鉴启示意义。

赵玉荣、李世勇的《从昭君出塞故事的多重书写看历史叙事中的后见之明》从叙事学的

角度展开分析,探究历代对昭君故事的层累性书写背后所体现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阐释者对其进行的意义建构。该文通过对《汉书》《后汉书》中所记载的昭君出塞本事之解析比较,指出在两者的昭君叙事中,昭君的人物工具属性逐渐弱化,个体意志和女性声音逐渐增强,其差异性来源于叙事者所在时代、立场所赋予的不同的当下视角透视。^[30]

王充是东汉典型的通才型学者,其著述《论衡》二十余万字,历来被认为是辑佚、校勘、研究周秦两汉文献的渊藪。李浩的《王充阅读渠道新探——基于文献文化史视角的考察》将王充的阅读行为置于两汉时期书籍流通与接受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回答了前人对出身于“细门孤族”的王充如何得以接触海量书籍以写作《论衡》的疑惑。该文认为班氏家族的丰厚藏书拓展了王充的学术视域,是其能够建立独特思想体系的重要契机;洛阳书肆的“众流百家之言”对其影响深远,急剧扩充了《论衡》的篇幅,并助推该书“文重”“形露易观”“不能纯美”的文学风格之形成;返回会稽后的吏员生涯则令王充得以寓目乡邦文献及与职务相关的各类图书,丰富了《论衡》的写作素材。^[31]

此外,近代学者姚明辉所作《汉书艺文志注解》是最早成书的详注《汉志》之著作,姚氏以其审慎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小学功底,使《汉志注解》成为一部注解简明扼要、考证精审有据的著作。杜志勇的《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综论》对其成书过程、版本流传、注解体例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考证,并提炼出姚氏作注的四个特点:一为疏通文义,不强解说;二为设课所需,倾向文学;三为重序轻目;四为以古鉴今。^[32]

(三) 魏晋南北朝散文、赋文及文学理论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逐渐渗透,对文学创作及发展等进行主动反思的文学理论文章、著作亦集中涌现。本年度河北学者在魏晋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成绩较为显著。

田小军的著作《汉魏六朝文体理论研究》探讨了汉魏六朝的文体理论及相关问题。内容涉及曹丕、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论,对诗、赋、骚等各种文体的源流、正变、功能等进

行了梳理和必要的考辨,从识才、辨体、摹拟、创新等几个方面,探寻古代文体理论的潜在体系,是对汉魏六朝文体理论的系统性研究。^[33]

陈玉强的《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揭示了“韵”的审美分野现象。作者指出晋人品评人物舍声言韵,将“韵”指向抽象的人物气度,以不和谐的放旷怪诞为大韵;其后南朝画论与文论形成了“舍声”与“即声”论“韵”的审美分野。分别考察了谢赫《古画品录》、刘勰《文心雕龙》中“韵”论的哲源及内涵,认为《古画品录》所论之“韵”不是指形式的和谐美而是指形象的生动传神之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汉代元气说而是魏晋玄学的形神之辨,它契合的是中国美学传神写意的理论体系,而《文心雕龙》中的33处“韵”字,基本没有脱离声韵范围,其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中和”学说。^[34]陈玉强的另一篇论文《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在学界当前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覆掘隐,将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先秦哲学、魏晋清谈勾连脉络,继而点出与佛教色空观念的隐性关联。该文以《文心雕龙》为例,在观念史上追溯了刘勰“以繁驭简”文学精神的理论渊薮,在学理上阐释了尚简精神与中国美学精神契合处所在。^[35]

李卫华致力于西方学者研究《文心雕龙》的学术成果的译介,为国内学界了解、借鉴西方学者的“龙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其译著《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作及修辞理论》是由美国汉学家蔡宗齐发起,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筹备召开的英语世界首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文心雕龙》专题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是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用英语写作的专门评论《文心雕龙》的书籍。^[36]

(四) 唐宋散文研究

本年度河北学者对于唐宋散文的关注较少,较有新意的是刘振英的《宋代语体文的特色及引用修辞理论的归纳、应用》。文章指出宋代语体文的发达是宋文的独特现象,语体文是宋人道学绝艺的载体。从文章学理论之引用技巧上来谈,南宋陈骙结合诸如《左传》《国语》《诗经》《尚书》等经典文献中的引用文例总结出“二用”“六体”的理论。理学家朱熹更是在讲

学话语中表现出客观的文章学思维,其论辩语体文中的引用艺术,既显示了宋代理学的个性特征,又是用文章学思维构想出的新颖、活泼的讲学话语,其引言证事、引言释义、采综群言等引用方法蕴含着宋代文章学的智慧,是讲论艺术和行文技巧的统一。^[37]

郝艳杰《从“三文”看公文写作》则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将古文创作所需的文风、文脉、文气运用在现代公文写作之中,从内容、形式和表达三个角度对公文写作进行总结,同样也是对于古文创作的创新性研究。^[38]

(五) 元明清散文研究

本年度河北学者对元明清散文的研究延续了上一年的发展态势,总体上比较活跃,且呈现出与文献学的密切联系。与文献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对于河北地区方志的研究上。王明好《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研究学术史回顾与评价》对清代畿辅方志、畿辅通志以及畿辅艺文志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39]李朝杰、金景芝《明清沧州方志石刻文献考述》和李朝杰《廊坊方志金石文献考述》,对河北沧州、廊坊地区的方志文献进行了研究综述。其中《廊坊方志金石文献考述》一文,以《中国地方志集成》中所收廊坊方志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中的金石文献,不惟划分类别、统计数量,还注意与总集、别集对照,突出这些金石文献在校勘、辑佚方面的重要作用。作者指出,发掘地方志中的金石文献,目的之一仍在于正讹、辑佚,这也是最直接的功用。毋庸置疑,方志金石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从地域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秉持一贯的义例和书写传统的地方志,集中体现了人们通过追述过往,实现对既定秩序的认同、传递和传统的延续,也昭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40]

三、词曲研究

本年度词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集、词谱的研究方面。从研究的时代定位来看,主要集中在清代中晚期。从研究单位来看,河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在此方面成果更为突出。

(一) 词人词作的研究

《燕赵词征》是晚清民国时期津门词人高毓澎编纂的一部词集,收晚清民国时期十位燕赵词人的创作。于广杰《晚清民国词人高毓澎及

其《燕赵词征》稿本考论》对高毓澎的词学思想和词作风格进行研究,并对其编纂的《燕赵词征》展开深入探讨。该文对学界了解高毓澎其人并透过《燕赵词征》窥见质朴雅健的燕赵词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词坛风貌和词学理念具有重要意义。^[41]

(二) 词谱文献的研究

词本是合乐的文学样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依声填词”的传统逐渐难以付诸实践,词的创作多依据字声格律,并兴起了“格律谱”的词谱创作。《九宫大成》促使清中叶的词家开始反省“格律谱”的不足,重新确立“音乐谱”的重要地位。江合友《〈九宫大成〉与清代中期的词谱制作》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文中以许宝善《自怡轩词谱》、谢元淮《碎金词谱》为例,对受到《九宫大成》影响而创作出的词谱进行了研究探讨。此外,举秦燾《词系》为例,对清代中期词谱创作产生的新变做出考究。文章指出,清代中叶词学家们受《九宫大成》影响而对词谱音乐性的重视,影响了后世尤其是晚清民国词人的词学思想,对于词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此研究对了解清中晚期词学家的创作理念及词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2]

(三) 散曲研究

本年度河北学者对散曲较少关注,唯有吴树亮、王树平所作《论北曲源于金末元初市井俗曲》一篇论文。北宋末年为全新市井俗曲音乐体系形成的关键,是北曲得以形成的蓄积期。作者从北曲与前代市井俗曲之关系辩证入手,对北宋中期、北宋末年、金末元初三个时期北曲的发展体系进行论述,提出北曲即源于金末元初的市井俗曲。^[43]

四、小说研究

在小说研究方面,明清小说仍然是研究重点,同时也不乏一些学者在唐五代以前小说研究上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一) 唐五代以前小说研究

尹策《志怪小说与魏晋文学》一文指出,志怪小说与史书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在文本互文和文本建构方式互文。史书是志怪小说孕育的母体,先秦史书中含有丰富的志怪内容。魏晋史学的独立与发达促使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大量涌现,

而后史书征引志怪材料也成为普遍的现象。志怪与史书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凭虚与真实,志怪故事看似荒诞的叙事中亦包含着史实质素。^[44]张启惠的《〈玄怪录〉的诗化特征》认为唐人文言小说传奇集《玄怪录》虽为小说,却具备了诗歌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诗笔、诗情、诗境三方面。其中,诗笔包括韵散结合、词采清丽,叙述婉曲、细致生动,玄虚怪异、亦真亦幻三部分,诗情包括抒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抒情情节的推进、抒情主体的诗化呈现三部分,诗境又分物境、情境、意境三部分。^[45]

(二) 明清小说研究

本年度明清小说仍然是河北学者小说研究的重点,其中经典名著是研究热点。蔺九章的《论〈水浒传〉一百八人的武士身份——兼谈“文士”在小说中的形象类型》别出心裁地从“武士”的角度解读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位人物,并结合武士的基本元素进行论证,主要包括:武器、武艺、武略、武胆、武德,而其最本质、最灵魂的属性当是血性,认为《水浒传》的主题当为“血性说”;论文另外分析了小说中的“文士”形象类型,体现了水浒人物研究的新思路。^[46]

霍现俊的《金瓶梅》研究在本年度收获颇丰,其《〈弇山堂别集〉的史学意识对〈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影响》一文论证了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体现出的史学意识、思维方式或对《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安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论文从《弇山堂别集》“同姓名人物”著录情况、《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三种类型以及《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意图和功能三个维度进行分析。^[47]其另一论文《金瓶梅词话的剧曲功能和意图》分析了《金瓶梅》中的剧曲,认为剧曲对揭示人物性格、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点染环境氛围等有重要作用。霍现俊还对《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研究,《论〈金瓶梅〉〈红楼梦〉中被侮辱谴责的下层女性形象》一文以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的下层女性为中心,从侮辱手段、被谴责的原因及结局、叙事立场、叙事态度等角度,探讨了《金瓶梅》《红楼梦》中下层女性书写之异同,进而探讨了《红楼梦》如何借鉴从而又在整体上超越了《金瓶梅》。^[48]

清代志怪小说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吴卉《神秘的消退：清代历史杂事、地理博物类志怪的叙事特点》分析了由汉至清，同样面对奇异的题材，志怪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品格却渐趋消磨褪尽，表现出志怪不怪的风格。这既是由于志怪作者在记录、写作小说时的不同志向，也因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世界认识逐步清晰，知识性和理性汇聚，自然导致的“无怪”倾向。^[49]

此外，元伟对清代笔记进行了研究。《乾嘉笔记的撰述话语及其意义指向》一文指出乾嘉笔记的话语包含的要素，指向了不同的意义层面，并进行了具体分析。“见闻”表现了笔记撰述的“纪实性”或曰“实录”原则，“所得”或“意会”蕴含了笔记的“创作性”特征，“随笔”折射出笔记的文体形态，而“偶有”与“积久”两个时间词的组合则指向了笔记的成书机制。从笔记创作史的视角看，此类撰述话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过程，至清代尤其是乾嘉笔记中而实现了“凝定”。^[50]

五、戏曲与说唱文学研究

（一）戏曲研究

本年度的戏曲研究在戏曲文献学、戏曲史（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中都取得可喜的成绩。

戏曲文献学是探究戏曲文献形态特征、生成演变及整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郭英德《论戏曲文献学的学理内涵》一文分别针对戏曲文献的本体认知、价值指向和功能旨趣，从求真、可靠、适用三个角度详实地论述了戏曲文献学的学理内涵，为戏曲文献整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理论指导。^[51]

本年度杂剧研究成果丰硕。高文秀、姚守中是钟嗣成《录鬼簿》中的元杂剧家，惜其身份信息模糊不明。都刘平、鲁玥含《元杂剧家高文秀、姚守中身份考实》考证翔实、史料丰富，通过爬梳大量方志、传世作品、碑刻、庙记等文字记载，稽考高文秀和姚守中行迹、仕宦、族谱及身份信息，为高文秀的演艺地位和姚守中为姚燧族侄身份勾勒出扎实的文献线索^[52]。此外，毛巧晖、张歆合作的《元杂剧〈绯衣梦〉叙事的衍变及其文化阐释》梳理了《绯衣梦》在形成、演化过程中，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更新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于“善恶有报”的核

心母题之外，进化出了“新女性形象”的反封建时代话语，为国家话语对传统叙事的渗入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53]张静《时空交错与叠加叙事：论清代杂剧〈惜花报〉的艺术特色》通过剖析凡人与秘境花神的奇遇、交错时空的美人和歌舞汇聚的情节，分析出时空交错叠加叙事手法的超时空特性和陌生化审美效果。^[54]

（二）说唱文学研究

本年度的说唱文学研究在理论研究和作品研究两方面都有所斩获。

民间文学口述史作为民众讲述历史言说形态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咏唱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歌谣，其讲述的过程就是表述历史价值观的过程。张琼洁《民间文学口述历史活动的言说机制与价值观念研究》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言说历史的方式、言说机制和价值内核，确立了民间文学口述史的文学真实和工具价值，为“何为历史”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阐释空间。^[55]

孙越《聊斋俚曲〈琴瑟乐〉新论》从音乐、文学、文献三个角度切入考论《琴瑟乐》的编创者和编创方式，同时分析庆大本《琴瑟乐》的题材内容、说唱体制和情节设置，论证了“蒲松龄”为佚名作者的作伪署名，将《琴瑟乐》追溯至《金瓶梅》题材小曲演变发展的一环^[56]。倪金艳《讲述者的口头表演——论孟姜女传说的共时性》从“民间性”角度切入，以平民思维审视人物道德，塑造了带有狂欢色彩的孟姜女人物形象。^[57]

六、文学与文化研究

本年度河北学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将触角深入到不同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华文学经典海外传播与演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孟姜女传说作为古代民间故事的经典题材之一，不仅在本土流播甚广，在海外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倪金艳《朝鲜李朝时期汉文典籍〈燕行录〉中的孟姜女书写》以横跨明清两朝的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记录为切入点，剖析孟姜女书写的文本意蕴和在朝传播，为国内的孟姜女研究提供了“揽镜自观”的丰富材料依据。^[58]

唐朝沈既济《枕中记》中的“黄粱一梦”元素在日本同样也有传承和演变。王培、鲁波、

杨奇《变异学视域下“一枕黄粱”故事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选取了军记物语《太平记》、能乐谣曲《邯鄲》、芥川龙之介小说《黄粱梦》和三岛纪由夫戏剧《邯鄲》四个典型文本,分析“一枕黄粱”故事的日本化过程,为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参考。^[59]

另外,包得义所著《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校证》一书将研究目光投至日本所藏《玉烛宝典》抄本,亦颇值得关注。隋杜台卿所撰《玉烛宝典》是中古时期出现的一部岁时民俗文献资料汇编,共十二卷。该书在元代以前代有学者著录于书目文献之中,在类书中也多有征引,但至迟在明末便已亡佚,然在日本却保存有多个早期抄本。包得义的著作即以日藏《玉烛宝典》抄本为研究对象,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研究,具体探讨《玉烛宝典》的著录与版本、结构特点、引书情况以及文献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下编为文献整理,比较分析日本尊经阁文库本、内阁文库本、依田利用考证本等古抄本和清末黎庶昌刻印的古逸丛书本之间的版本源流关系。^[60]

(张志勇: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吉兆: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詹福瑞,王馨一.先秦诗歌中政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河北法学,2022(12):146-161.
- [2] 李娜.汉魏《诗》学发展与《诗经》名物释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64-74.
- [3] 唐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及其研究现状[J].天中学刊,2022(01):87-94.
- [4] 李金善,高晨曦.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33-39.
- [5] 张启惠.钱澄之《屈诂》的文本阐释与注释特征.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
- [6] 岳洋峰.汉代乐府诗“风雅通歌”的演唱形态[J].人民音乐,2022(07):63-67.
- [7] 姜剑云,孙笑娟.诗人太守谢灵运永嘉政论论衡[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66-74.
- [8] 唐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及其研究现状[J].天中学刊,2022(01).
- [9] 张静.唐前自然灾害诗歌文献整理与考证[M].北京:地震出版社,2022.
- [10] 吴淑玲.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J].中原

文化研究,2022(05).

- [11] 吴淑玲,宋波.卢纶生年新考及卢纶诗作中生年诗句新解[J].保定学院学报,2022(06).
- [12] 左汉林,李新.宋代杜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13] 沈童.从唐宋诗之变看梅尧臣悼亡诗的意义[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03).
- [14] 徐艳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代乐府诗研究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22(04):119-130.
- [15] 徐艳丽.郝经乐府诗辑考及其乐府诗创作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84-91.
- [16] 李浩,段睿.《熊峰集》版本源流考[J].图书馆研究,2022(01):122-128.
- [17] 李浩,方艺融.突破“茶陵正宗”——疾病与石珪的文学创作[J].古典文学研究,2022(02):123-146.
- [18] 李志萍.禅魄诗魂:论龚自珍诗歌的佛禅意趣[J].名作欣赏,2022(02):119-121.
- [19] 孙欣欣.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32-39,174.
- [20] 许春华.“闻”：“乐”与“仁”的对接及境界形态——论孔子儒学“哲学的突破”的多样性[J].社会科学战线,2022(12).
- [21] 许春华.“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J].哲学研究,2022(06).
- [22] 许春华,王欣.“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
- [23] 许春华,Hou Jian.孔子诗学思想的两种面向——《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的比较[J].孔学堂,2022(04).
- [24] 许春华.“诗”与“儒”——荀子论诗思想旨趣探奥[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
- [25] 王玉环.日藏梅泽本《老子》古本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
- [26] 王玉环.日本近现代河上公注《老子》研究[J].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22.
- [27] 吕庙军.清华简《汤在啻门》诸子思想交融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2(02).
- [28] 程志华.关于董仲舒评价之评价[J].衡水学院学报,2022(06).
- [29] 白立强,魏彦红.元机:董仲舒“贵元重始说”之公羊凭依及其理论开显[J].孔子研究,2022(05).
- [30] 赵玉荣,李世勇.从昭君出塞故事的多重书写看历史叙事中的后见之明[J].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2021.
- [31] 李浩.王充阅读渠道新探——基于文献文化史视角的考察[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
- [32] 杜志勇,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综论[J].中国方志馆研究,2022,4.
- [33] 田小军.汉魏六朝文体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34] 陈玉强.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J].深圳

-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2).
- [35]陈玉强.魏晋六朝文学尚简精神的生成逻辑[J].山东社会科学,2022(10).
- [36](美)蔡宗齐编,李卫华译.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作及修辞理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
- [37]刘振英.宋代语体文的特色及引用修辞理论的归纳、应用[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院报,2022(02).
- [38]郝艳杰.从“三文”看公文写作[J].办公室业务,2022(07).
- [39]王明好.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研究学术史回顾与评价[J].玉林师范学院院报(哲学社会科学),2022(01).
- [40]李朝杰.廊坊方志金石文献考述[J].档案天地,2022(06).
- [41]于广杰.晚清民国词人高毓澎及其《燕赵词征》稿本考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40-47.
- [42]江合友.《九宫大成》与清代中期的词谱制作[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04):135-142.
- [43]吴树亮,王树平.论北曲源于金末元初市井俗曲[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2):115-121.
- [44]尹策.志怪小说与魏晋史学[J].铜仁学院学报,2022(04):18-24.
- [45]张启惠.《玄怪录》的诗化特征[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04):87-93,127.
- [46]蔺九章.论《水浒传》一百八人的武士身份——兼谈“文士”在小说中的形象类型[J].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22(01):75-82.
- [47]霍现俊.《弁山堂别集》的史学意识对《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影响[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2(06):98-103.
- [48]霍现俊.论《金瓶梅》《红楼梦》中被侮辱谴责的下层女性形象[J].红楼梦学刊,2022(02):164-182.
- [49]吴卉.神秘的消退:清代历史杂事、地理博物类志怪的叙事特点[J].蒲松龄研究,2022(01):151-160.
- [50]元伟.乾嘉笔记的撰述话语及其意义指向[J].北京社会科学,2022(08):46-55.
- [51]郭英德.论戏曲文献学的学理内涵[J].文学遗产,2022(05).
- [52]都刘平,鲁玥含.元杂剧家高文秀、姚守中身份考实[J].戏曲艺术,2022(02).
- [53]毛巧晖,张歆.元杂剧《绯衣梦》叙事的衍变及其文化阐释[J].戏曲艺术,2022(01).
- [54]张静.时空交错与叠加叙事:论清代杂剧《惜花报》的艺术特色[J].中国戏剧,2022(03).
- [55]张琼洁.民间文学口述历史活动的言说机制与价值观念研究[J].民间文化论坛,2022(02).
- [56]孙越.聊斋俚曲《琴瑟乐》新论[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2(05).
- [57]倪金艳.讲述者的口头表演——论孟姜女传说的共时性[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02).
- [58]倪金艳.朝鲜李朝时期汉文典籍《燕行录》中的孟姜女书写[J].中国语言学研究,2021(02).
- [59]王培,鲁波,杨奇.变异学视域下“一枕黄粱”故事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J].散文百家(理论),2022(01).
- [60]包得义.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校证[M].成都:巴蜀书社,2022.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致 李翔菲

2022年度河北省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参与度高,学术成果丰硕,鲁迅研究、土改叙事研究、保定作家群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刘润涛和李浩的鲁迅研究、阎浩岗和刘起林的土改叙事研究、杪楞的网络文学批评、刘大先的当代作家批评都值得特别关注。

一、文学思潮与现象

202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作为中共历史上经典的文艺政策文件,正确理解《讲话》格外重要。陈黎明借鉴郭沫若“有经有权”原则重评《讲话》,认为郭沫若提出的“有

经有权”原则,对于当下重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依然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现实的有效性。《讲话》中“经”与“权”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内具有辩证统一性,二者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坚持“有经有权”的评价原则,在当下文艺实践中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而《讲话》精神也只有在这一动态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才能够保持其恒久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1]王海泉则对2021年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解读,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新时代文艺工作总任

务,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即坚定文化自信总要求及创作使命、创作导向、创作要求和创作任务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学创作“为了谁”“写什么”“怎么写”“谁来写”等核心问题,建构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理论格局。^[2]

期刊报纸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对于文学意义的生成具有特别价值。田建民、赵蕾聚焦于《青年界》这份期刊探讨了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与新变,指出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创办的北新书局,以思想文化启蒙为旗帜,围绕新潮社和语丝社这两个新文学社团组织起庞大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这种人际关系资源与文化号召力与影响力,构成了其稳定的社会文化的象征资本,使得《青年界》能够在不同文化话语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青年界》对五四启蒙的传承不是复制或重走《新青年》的启蒙之路,而是在启蒙的方式与内涵上进行了从激进到温和、从激情到理性、从群体到个体、从“立国”到“立人”的调整与转换,从科学救国转换为养成科学生活,从反抗旧宗法家庭转换为表现人伦亲情的难以割舍,从激情批判转换为理性的建构。^[3]刘相美、张洁洁则特别以《解放日报·文艺》为例分析了的革命话语下的文学传播,认为创刊于1941年的《解放日报》是一份肩负革命政策宣传使命的报纸。《文艺》专栏成为大量知识分子进行文学传播实践的场所,形成了一个“小众化”的传播场域。“小众化”的传播场域在一定程度上为延安文学样式开辟了新的道路,但与“大众化”文艺方向的现实需求到底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改版后,逐步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达到战时传播的需求及政策宣传的目的。^[4]

晋察冀文学思潮与创作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存在,也是近年来河北学者关注较多的领域。郑立柱探讨了晋察冀边区戏剧的特点,认为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戏剧,在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中具有独特优势,对动员民众支持、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边区戏剧的独特优势和巨大作用,源于其革命、娱乐、艺术的多重属性。革命属性决定着晋察冀边区戏剧应服从和服务于现实需要,成为中共革命的有力推手;娱乐属性与革命属性相互依存、交融共生,

但也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一面。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晋察冀边区戏剧在高扬着革命主旋律的同时,也兼顾了戏剧的娱乐属性和艺术价值,使革命、娱乐、艺术三重属性维系着某种程度的动态弱平衡。^[5]王平则以戏剧《穷人乐》为个案探查了晋察冀边区专业剧团与村剧团之间关系。晋察冀边区名剧《穷人乐》是抗敌剧社主导下完成的一个“命题剧”,但在以《晋察冀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评价中,抗敌剧社的主导作用被弱化。深入历史细节可探知:创造模范村剧团的需要,整风运动的时代背景,加之抗敌剧社一些行动违背“沿着群众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的原则,使其功劳被有意隐去或弱化。过度批评专业剧团和过度赞誉村剧团均是出于证明群众“能”的需要而做出的历史性安排,这一安排有效推动了乡村文艺运动大发展,也产生了明显弊端:专业剧团手脚受到一定束缚;村剧团陷入创作热情高涨而创作能力有限的尴尬局面,落入新的模式化、教条主义窠臼。^[6]

当代文坛创作的新趋势也是学界关注焦点。近年来,杪楞一直试图探查网络文学的内在规范性,《媒介技术迭代与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一文关注到技术迭代与网络文学的价值表达困境,指出伴随技术迭代,网络文学的价值表达遭遇了新挑战。一是平台的“再中心化”与互联网“去中心化”追求背道而驰;二是技术迭代催动网络文学内容发生变化;三是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和大众文化的消遣娱乐挑战文艺的价值坚守,网络文学要防止“技术至死”和“娱乐至死”。^[7]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当代地域文学的叙事转换问题,王婧娴、苑宇轩分析认为从古代立足于中原意识下的“边缘书写”到当今凸显各地方独特个性的“区域书写”,这种改变标志着当代地域文学作家通过书写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展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当代地域文学叙述多元人文生态的实质是“对中国文明断裂的焦虑以及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抗”,因而这两种叙述视角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地方多元文化的呈现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在“地方”中发现“中国”成了新的文化表达方式,这使地域文学在当代的创作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8]

二、鲁迅研究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论的传统,也是鲁迅研究

中最具底蕴的研究范式。2022 年度鲁迅研究在的鲁迅生平和作品重读方面颇有创见。刘润涛详实地考察了鲁迅的家世，周氏家族的名声显赫的祖先查无实据，其资产状况也属于绍兴社会的中产阶级，结合太平军入绍以前，福彭桥周氏正途出身的上层绅士仅周以均一人，周家的联姻对象大多属于书香门第、乡下名绅、尚未发达或已经衰落的官宦人家可判断，周氏家族在明清绍兴社会属于中产阶层，始终未能跻身巨姓望族、读书世家之列。而太平军入绍虽对周氏家族的经济水平、社会地位造成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强化了三个台门房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未改变其中产阶级、里坊大户、经商本色、书香传家的整体特点。^[9]在分析小说《离婚》时，作者还结合鲁迅当时与许广平、朱安的关系，以及在创作《离婚》前一日还再次购买《近代的恋爱观》等行迹，认为小说无疑是对“婚姻以真正恋爱而成立”这一现代婚姻观念的文学表达。《离婚》故事发生在绍兴乡下，具体时间在 1900—1908 年，而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故事原型——章运水离婚事件和鲁迅、许广平二人于 1925 年 9 月底确定爱情关系这一时间点对《离婚》的创作心态也有所影响。^[10]

鲁迅作品文本细读方面，刘玉凯的《鲁迅的〈风筝〉与“精神的虐杀”》一文认为《风筝》中“没出息的孩子”这个说法显然来自直贺直哉的《清兵卫与葫芦》。鲁迅通过《风筝》旨在表现人道主义，强化一种成人对于儿童的责任思想。鲁迅通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现了一个影响人生的大主题，即人生“精神的虐杀”的悲剧根源在于强制人服从的等级制度。^[11]赵蕾重读《明天》，认为小说是鲁迅应罗家伦约稿为《新潮》杂志的“妇女解放”专题所作，其创作动机和主题意向与“五四”运动后新的妇女解放热潮紧密相关；文本以单四嫂子为叙事线索，揭示出旧中国妇女问题背后封建礼教与蒙昧国民性的大罗网；作者借助叙事冲突、叙事镜像和叙事隐喻制造叙述张力，建构其关于内外世界差异的意义指向。^[12]李浩则以作家对文字特有的敏感，重读《狂人日记》，提出鲁迅的文字几乎绝无修饰，取消比喻，并有着极重的推敲感；相比在着色上用力，鲁迅更致力于文字背后所深刻、所延展的层层含义，《狂人日记》是其小说中

“言外之意”和“未尽之意”最多的一篇，如作品小序采用文言文的写法，暗含封建传统之坚固。鲁迅个人的审美趣味也与其语言的“枯瘦”感有所关联。^[13]焦振文则在重新审视了鲁迅批评梅兰芳这一“事件”，指出鲁迅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对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有过多“批评”。梳理鲁迅的戏曲批评，不难发现，他对梅兰芳的批评既非仅仅针对梅兰芳，也非针对中国传统戏曲，亦不单纯为了批判国民劣根性，及提倡“树人”的主张，实则源于他一以贯之的“崇力尚俗”的美学思想。^[14]

三、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茅盾、老舍、丁玲、郭沫若等经典作家的创作包括小说、诗歌等都有值得关注的成果。茅盾研究方面，辛玲、黄乔生聚焦于茅盾思想的考察，《“互助”话语影响下沈雁冰对妇女解放的思考》指出互助论是沈雁冰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吸收的话语资本。互助论能够涵盖沈雁冰话语资本的基本要素，沈雁冰借由这一理论将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探讨引向实践领域。互助论所蕴含的弱者联合、个人主体性发挥和道德提升等涵义，满足了沈雁冰对妇女解放实践途径的想象。他立足于新的话语资本，以互助论为指引，为婚恋关系设定了新的原则，并且重新诠释了“家庭服务”的概念。^[15]两位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通过对《野蔷薇》的分析，又分析了“大革命”落潮之后茅盾思想状态，认为茅盾通过反思自己的革命历程，对“五四”时期形成的个性解放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随之对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避居日本期间，一种革命“旁观者”的身份方便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总结刚刚经历过的革命运动，扫除革命者中残存的封建思想、促进阶级觉悟成为刺激他创作的主要动力。茅盾在《野蔷薇》中并没有提供先锋的描写手法或塑造带有国民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他在此作品中创造的独特意义在于“展现了具有忧患意识的创作者在面对社会动荡时敢于进行文化批判和自我批评的勇气”，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家国意识”，从全局上表达了协调“群”与“己”关系的愿望。^[16]阎浩岗、连正围绕茅盾《水藻行》的翻译与发表的经过及相关事实存在的争议进行辨

析,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查证、相关人士的寻访以及推测,认为山上正义作为译者的可能性最大。^[17]

老舍研究。马云注意到老舍在抗战期间的西北之行对其创作的影响,认为老舍抗战期间的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空前震撼和精神洗礼,从老舍记录西北之行的纪游长诗《剑北篇》可以看到大西北精神像一股新鲜血液潜入到老舍的心中,影响着后来抗战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在与大西北文化精神的对比中,老舍深刻反思了北平市民文化存在的问题,并产生了以大西北文化精神融入北平民间以改造北平传统文化路径思想。^[18]2014年,浦爱德英译《四世同堂》手稿被发现,赵武平和毕冰宾分别依据此手稿回译后16段,补足原作结尾缺失的遗憾,不过两个译本之间及译本与原文之间的风格和内容差距很大。傅光明、夏玉珊对此进行细致比较,认为赵武平采用老舍词汇表和逐字直译法,部分地还原了20世纪40年代老舍的语言表述和文本风格,但译文表达不准确且翻译腔严重;毕冰宾为满足目的与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当下北京日常普通话为参照,较为成功地还原了小说的京腔京韵,但由于语言的时代差异和译者主体性的凸显,毕译本也与《四世同堂》原文存在一定距离。^[19]

其他作家研究。刘相美对丁玲创作中的女性主义进行再思考,指出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20]景立鹏、傅修海和马春香则对郭沫若和田间的诗歌创作进行再思考。前者指出,郭沫若的文体实践既表现出强烈的破体冲动,又包含着自觉的创体意识,在二者的互动中实践着“五四”

时期对新诗形式的探索。郭沫若的新诗探索始终紧扣时代,呈现辩证开放的文体观:“《女神》时期”是自由与自律的辩证,“左翼时期”是自我与他我的辩证,“颂歌时期”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的诗歌文体探究与时代、个体之间的扭结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郭沫若的新诗写作在过分迎合历史的同时,也导致其对新诗文体本体的迷失。^[21]后者则将田间诗歌创作置于“诗言志”这一理论传统中审视,认为“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理论主张,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者的感情与思维活动取向两方面提出了要求,强调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同时,重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田间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诗歌无疑是“诗言志”观念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开出的新花,他在对时代进行记录和号召的同时,不断尝试将叙事融入抒情诗歌之中。^[22]此外,高露洋探讨了穆时英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民族主义转向,穆时英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产生密切联系,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广泛介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理论和主张与创作实践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进行呼应,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多重表达。通过梳理穆时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接受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对于民族主义文学海派书写的呼吁,窥探穆时英创作的多重面向,思考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广泛影响及其内在的理论困境,其叙述掺杂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民族主义增添海派色彩,使得民族主义话语呈现多个侧面。^[23]

四、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

刘大先紧密追踪当代文坛动态,发表一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作家作品批评文字,涉及文学批评、小说、散文。关于何向阳的文学批评,刘大先认为何向阳的文学观念以人格作为核心,其直接来源无疑是张承志,但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之时,孔子等人的知行合一在人格塑造上堪为后人不断地回眸造访;同时,现代人文主义观念也对何向阳的文学观带去直接影响。何向阳对理想人格的勾勒“不仅在于对创作的期待,更在于自身批评者的身份”,她的诗性的批评鲜明地体现了批评者自身的创造性与个性表达,尤其在对于女性主义和自然与生态问题这两个时代热点上。何向阳同时具有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创作者两重身

份,这两重身份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共同体现了同一个写作者的目的——“以心换心”,关注人及其生活。^[24]

关于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刘大先认为《十月的革命》聚焦于家族人物的生存与生命体验,在土地与人之间构成一种互文的关系,并在蛮长的篇幅中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乡土文化的方方面面,它对乡土文化的经验性细节的记录和如同民俗学的文字让文本具有了浓郁的文化意味;同时,小说通过对土地的讴歌、对土地的感情的抒发,彰显出“人民”这个将自己塑造为历史主角的群体的顽强深厚生命力,超越了一般的家族史与抗战题材小说。当“东北文艺复兴”从一个戏谑式的提法变成一种官方的话语,就必须进行双重建构——重新书写那块土地及其人民所经历的曲折历史,重新建构当代东北的人文形象,并从中塑造出一种独属于东北而又具备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精神。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无疑在这个意义上对重写近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农民挣扎、奋斗、抗争与觉醒做出了自己的尝试。^[25]

在批评王威廉小说集《野未来》及中篇小说《你的目光》时,刘大先分析了王威廉的“在以人为主体”的诗学观念,指出王威廉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综合写作的态度。他将科幻的元素纳入到这些文本中,视之为现实的组成部分,由此写一种从现实问题生发想象而产生的微型思辨文本,借此讨论“如何面对野蛮现实,如何想象人文的未来”这一话题。“目光”“生命”与“记忆”这三个关键词自然而然地进入视野之中。王威廉在这几部文本中表现出一种文本形态的试验,对语言和文学本身关系的进行重新思考,诠释了自身提出的未来诗学——在以人为主体的同时,文学不应该有任何的框架,既要突破过去观念,也不应被未来的幻象所误导,展示出自己葳蕤多姿的样貌。^[26]

陈福民的散文随笔集《北纬四十度》出版后,刘大先肯定了这部作品兼具文学与历史、认知和审美两种功能,其优秀之处不仅在于用通达晓畅的笔法重述历史,更在于提炼出贯通一气的线索,显示出卓然独创的见识,整体上完善了中国的文化版图。同时也敏锐捕捉到当陈福民意图用文学呈现历史时表现出的“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无法消融的困惑,进而提出

用文学书写历史时,应该保有“主体站立在现实与生活之上的自信与自觉的态度”。^[27]

土改题材小说和十七年文学研究成绩斐然。李致、冯瑶分析了马烽土改叙事的独异性,认为农民通过土改实现政治“翻身”后,农村社会生活变动首先延伸到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层面,牲畜情结、阶级觉悟和新型劳动关系(变工互助、合作生产)的龃龉与磨合成为马烽关注和思考的对象。马烽创作于1948—1949年的《金宝娘》《解疙瘩》《村仇》三部小说借助斗争地主诉苦、牲畜情结和劳动互助等土改话语元素,将土改工作中流行的翻身解放、变工生产等话语具象化、文本化。马烽在文本中直面农村土改革命深层,同时也形成了作家土改叙事的基本逻辑和叙事价值。^[28]阎浩岗则聚焦于土改题材革命叙事的丰富性。《陈纪滢、姜贵土地革命书写的真实性与艺术缺陷》一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台湾作家陈纪滢《获村传》和姜贵《旋风》两部小说的艺术性,指出陈纪滢和姜贵出生于农村,他们作品中以早年经历为素材的叙述显示出现实主义的艺术功力,但最后有关土改的部分因无生活基础和政治宣传动机主导,土改干部与积极分子形象均被流氓化,既违反了历史真实,也缺乏艺术真实性。^[29]在另一篇文章中,阎浩岗则分析了三部具有“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特征的小说: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和陈学昭的《土地》。这三部小说在人物塑造、创作方法与情感表达方面更多显示出“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特征。《地覆天翻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地主形象的叙述缝隙,“恶霸地主”吴二爷被直接写出来的恶行都在日常范围内,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而转述的背负了诸多人命的恶行,却也难免让人匪夷所思能瞒过村落里的大多数人。《江山村十日》的作者虽意在歌颂土改,却因为对所有情节和细节作“本质化”处理,其实录式写法保留了许多当年土改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样貌,但对人性的复杂性的关注和挖掘上却又不深入。《土地》中则流露了许多作者的人道情感,对笔下人物都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而不完全根据阶级出身确定“敌我”。^[30]刘起林通过周立波小说钩沉出十七年文学中的南方审美话语的深层存在,指出周立波小说呈现出“侧面表现”的特征,既展现了南方

本土话语与政治中心话语相碰撞时的精神人格特征、思想观念状态与文化融合本相，又深层次发掘了南方本土话语接受政治中心话语的话语阐释场景、意义解读路径和价值认同逻辑。以周立波小说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南方审美话语具有艺术经典性，有力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层次感和丰富性。^[31]

《人世间》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后，梁晓声也成为本年度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阎浩岗从文学史层面重审《人世间》，认为作品虽然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年代感，但作品中的“历史”并不像狭义历史小说及“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是与人物并列的主角，或像“新历史小说”那样作为“修改”或颠覆的对象，它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行动的依据与命运的巨大影响源，而不再以人物命运表达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见解或情感态度。梁晓声在文本集中演绎了“人民至上”的观念，这让他对“社会格局”和“政治格局”投注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而这种区别，正是《人世间》与此前“革命历史小说”和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作品的区别。^[32]刘起林则分析了梁晓声小说中“好人文化”观，指出梁晓声将小说创作与社会评论并举，以“好人文化”作为思想系统的核心价值理念，首先起源于他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观察与思考。在他的“亲情小说”系列、“边境小说”系列和对特殊年代的艰难处境的书写中，梁晓声表达了对“好人文化”的人生体验，视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为“好人文化”的价值后援。“温暖的现实主义”是梁晓声在此理论上为自己确定的一条审美道路，旨在“以文学塑新民”，《人世间》全面体现了他的文学信念和“好人文化”观。^[33]

此外，郭宝亮对胡学文《有生》整体审美性和丰富的乡土文化样貌的分析^[34]，杨一森、张洁洁对张炜在家族系列小说中呈现出的对女性意识在男性视角下进行着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演变的探析^[35]，景立鹏关于昌耀20世纪80年代地方性经验与诗歌空间的建构研究^[36]，也都各有己见。

五、河北文学研究

保定作家群研究取得令人瞩目成绩。孙犁研

究方面，高露洋考察了孙犁的工业题材小说，指出孙犁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受到关注，而其工业题材的创作却被长期忽视。孙犁不仅积极关注、培育工人作家，自己也主动申请到工厂体验生活，并在艺术上另辟蹊径，最终在工业题材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方面多重视角立体地表现工人生活的整体，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角度确认工人在时代中的地位与价值。^[37]赵振杰考察了孙犁的文学史地位变迁，视孙犁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流变的镜像，认为从20世纪40—60年代的“超阶级的‘同路人’”，到80年代的“‘老八路作家’中的‘纯文学家’”，再到9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其在文学主潮当中的地位一直具有某种边缘性和矛盾性。“阶级性”与“同路人”、“老八路”与“纯文学家”、“革命文学”与“多余人”，两组截然相反的概念并置使用，一方面呈现出孙犁在不同时段内一如既往的暧昧性和复义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孙犁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间的互文关系。^[38]熊权、吉媛圆则以孙犁《少年鲁迅读本》为中心梳理了孙犁对鲁迅的接受情况，孙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时语境下从军入伍，呼应边区政府号召而参与、推动晋察冀文艺运动，他是亲历并书写抗战历史的“革命人”，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孙犁将鲁迅成长史中种种暗流均干脆利落地化为鲁迅参加革命的动力，将位于“五四”启蒙时期充满矛盾与深度的复调鲁迅剪裁为单一的爱国救亡面貌。孙犁对鲁迅的宣传、普及带有明确的政治意义，甚至为了达到爱国救亡的宣传目的违背“五四”思想去解释“自由”。孙犁在《懒马的故事》中不自觉显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关注点和革命话语之间的缝隙，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远离鲁迅式的忧愤深广，以时代与个人相结合的“颂歌”汇入边区文艺潮流。^[39]也有研究强调了孙犁抗战小说与乡土文化融合的文学史典范意义，杨昊、王宁认为孙犁将时代性与乡土文化相融合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深远。在抗战风云下，乡土的风物、习俗以及文化性格生发出新的内涵。孙犁的小说之所以能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离不开乡土文化赋予的力量与风采。他的小说诗意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乡土文化的时代内涵，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40]

梁斌研究方面, 阎浩岗分析梁斌土改题材小说的非典范性, 认为梁斌的《红旗谱》与《白毛女》《暴风骤雨》等“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有明显不同, 即它的日常性基调。《红旗谱》的非典范书写范式同样延续到梁斌另一部土地革命叙事的文本《翻身记事》中, 此文本虽因经过“文化大革命”异常强化的意识形态灌输规训, 但仍表现出非典范性, 如对非恶霸的普通地主的子女的有限度的同情, 对地主本人的日常化处理, 对解放区“新村霸”存在的客观揭示和地主农民关系的复杂性及农民的“农民性”。梁斌土地革命叙事非典范性的最主要成因在于他对生活细节写实的坚持, 此外, 他有意追求作品流传后世而不以宣传鼓动为第一要务, 这个主观追求也让他的文本创作与别人同类题材“不一样”。^[41]宋少净则分析了《红旗谱》所折射的作家史诗意识, 认为梁斌在《红旗谱》中以超拔的历史意识构建了一个多重意蕴的锁井镇。第一重意蕴是评论界所熟知的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世界; 第二重意蕴是自明朝始的家族历史记忆, 其中冯家大院和古钟都具有深厚的象征意味; 第三重意蕴追溯至遥远的人类远古记忆, 展现洪水和土地的集体记忆, 使锁井镇有了创世意蕴。三重意蕴的交织展现了梁斌卓越的史诗意识。《红旗谱》也因此担得起“史诗”的称号。^[42]

其他作家研究方面, 魏雪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对徐光耀进行了访谈, 访谈经整理并于2022年5月征得徐光耀同意后公开发表。访谈主要围绕《平原烈火》“亲历式”写作的纪实与虚构、作家创作意图、创作心理以及小说修改和评价等方面创作展开。在访谈中, 徐光耀强调他的写作以及对读者、对历史、对真实的态度, 都与他写通讯报告的经历有很深的关系。《平原烈火》的创作也体现了徐光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平原烈火》是描写抗日战争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 徐光耀以其在宁晋大队期间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 小说主要人物形象、主要事件几乎都来源于真实的历史, 战争生活细节描写生动逼真。^[43]张越则通过《徐光耀日记》还原和反思了十七年文学的“深入生活”的创作原则, 指出十七年文学的核心特色与原则突出表现为“深入生活”, 2015年出版的《徐光耀日记》不间断地记录了一个部队出身的青年

作家从1944年到1957年的生活、思想、工作经历, 鲜明地体现了“深入生活”。但从日记可知, 徐光耀“深入”的生活最终未能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与动力。这是个体创作所限还是时代通病, 主动而充满先决意识的现实生活观察与被动且沉浸式的生活体验分别会如何影响文艺创作, 文艺路线与实际创作之间应该把握怎样的距离与互动关系, 由此进入思考范围。^[44]

此外, 陈超诗歌和李春雷报告文学也有相关研究成果。王永祥分析了陈超诗歌特色, 认为陈超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诗歌评论家, 更是一名优秀的诗人。陈超的诗歌创作有着自身独特的生成路径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其少而精的诗歌作品中, 展现出陈超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批评家陈超和诗人陈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两者相互影响、相互锻造, 成就了陈超在当代诗坛的独特地位。^[45]李春雷作为新世纪以来唯一两度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河北作家, 袁学骏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对李春雷创作进行了总结与概括, 即既要勤走、深入生活, 又要深入观察世界, 同时不断进行创新, 用笔力创造奇迹。^[46]

五、小结

2022年度, 河北现当代文学研究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 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前沿性得到延续, 学术梯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鲁迅研究、红色经典和土改叙事研究、当代作家作品批评继续保持着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地位, 刘玉凯、马云、田建民、刘大先、郭宝亮、刘起林、李浩、杪楞、陈黎明等人积极参与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争鸣, 刘润涛、王永祥、景立鹏、辛玲等学术新人保证了河北学术研究领域的队伍稳定性, 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积极参与当代文坛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文学批评紧扣时代需求, 紧贴主旋律, 不断在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发出河北声音, 发展势头强劲。当然, 当代文学批评队伍的团队建构意识不强, 文学批评的地域主体性和自觉性有待加强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李致: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翔菲: 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

参考文献:

[1]陈黎明.“经”与“权”的辩证法——重评《在延安文艺座

- 谈会上的讲话》的两个基本原则[J].甘肃社会科学,2022(06).
- [2]王海泉.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精神向度——学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J].上海文化,2022(06).
- [3]田建民,赵蕾.论《青年界》对五四启蒙的传承与转换[J].长江学术,2022(04).
- [4]刘相美,张洁洁.革命话语下的文学传播——以《解放日报·文艺》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2(04).
- [5]郑立柱.主旋律与弱平衡:多重视角下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戏剧[J].广东社会科学,2022(04).
- [6]王平.《穷人乐》创演主体历史地位弱化追因[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01).
- [7]杪樱.媒介技术迭代与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J].网络文学研究,2022(01).
- [8]王婧娴,苑宇轩.从边缘书写到区域书写——论地域文学的当代叙述转换[J].当代文坛,2022(04).
- [9]刘润涛.鲁迅家世考[J].现代中文学刊,2022(04).
- [10]刘润涛.鲁迅《离婚》考论[J].鲁迅研究月刊,2022(03).
- [11]刘玉凯.鲁迅的《风筝》与“精神的虐杀”[J].保定学院学报,2022(05).
- [12]赵蕾.基于历史现场、文本细读对鲁迅《明天》的再解读[J].保定学院学报,2022(03).
- [13]李浩.《狂人日记》中的“言外之意”和“未尽之意”[J].阅读与成才,2022(02).
- [14]焦振文.探寻鲁迅戏曲批评的美学基点——也从批评梅兰芳谈起[J].鲁迅研究月刊,2022(01).
- [15]辛玲,黄乔生.“互助”话语影响下沈雁冰对妇女解放的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
- [16]黄乔生,辛玲.恋爱故事包裹下的“自由魂”——以茅盾早期创作《野蔷薇》为中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
- [17]阎浩岗,连正.茅盾《水藻行》翻译与发表史实考辨[J].新文学史料,2022(02).
- [18]马云.从《剑北篇》到四世同堂——西北之行对老舍抗战小说的影响[J].抗战文化研究,2022.
- [19]傅光明,夏玉珊.翻译策略的限度与适用条件——老舍《四世同堂·饥荒》两个回译本对比研究[J].东吴学术,2022(01).
- [20]刘相美.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
- [21]景立鹏,傅修海.破体与变体:郭沫若新诗文体观探赜[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011).
- [22]马春香.“诗言志”语境下的田间抗战诗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13.
- [23]高露洋.论20世纪30年代穆时英的民族主义转向[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2(03).
- [24]刘大先.理想人格及其话语建构——论何向阳的文学批评[J].当代作家评论,2022(03).
- [25]刘大先.从自然到历史——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的风俗与革命[J].当代作家评论,2022(04).
- [26]刘大先.目光、生命与记忆——王威廉与未来诗学[J].当代作家评论,2022(03).
- [27]刘大先.中间地带的“甬脱叙述”——论《北纬四十度》的空间感觉、文明论与文史表述[J].当代作家评论,2022(02).
- [28]李致,冯瑶.诉苦·牲畜情结·劳动互助:马烽土改叙事独异性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09).
- [29]阎浩岗.陈纪滢、姜贵土地革命书写的真实性与艺术缺陷[J].厦大中文学报,2022(0).
- [30]阎浩岗.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部土地革命题材小说[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2(05).
- [31]刘起林.周立波小说与十七年文学的南方审美话语建构[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
- [32]阎浩岗.文学史视域中的《人世间》[J].文艺论坛,2022(04).
- [33]刘起林.1990年代背景与梁晓声“好人文化”的历史生成[J].当代文坛,2022(01).
- [34]郭宝亮.“乡土日常性”的双向突围与民间文化的探寻——胡学文《有生》论[J].文艺争鸣,2022(08).
- [35]杨一森,张洁洁.启蒙路途中心女性形象的现代性演变——以张炜家族系列小说为例[J].河北学刊,2022(02).
- [36]景立鹏.昌耀80年代诗歌的地方诗学与空间生产[J].新文学评论,2022(03).
- [37]高露洋.别开新声:孙犁的工业题材创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13.
- [38]赵振杰.孙犁:“在”而不“是”的文学“边缘人”——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孙犁文学评价史反思[J].当代作家评论,2022(04).
- [39]熊权,吉媛圆.从学习鲁迅到建构自我——孙犁《少年鲁迅读本》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22(10).
- [40]杨昊,王宁.论孙犁小说中的抗战与乡土[J].河北学刊,2022(04).
- [41]阎浩岗.论梁斌的日常化土地革命书写[J].中国文学研究,2022(02).
- [42]宋少净.幽深的锁井镇:梁斌史诗意识的投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13.
- [43]魏雪.徐光耀访谈录——《平原烈火》及其他[J].新文学史料,2022(04).
- [44]张越.《徐光耀日记》中“深入生活”的工作与文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13.
- [45]王永祥.生命和词语摩擦出的诗意火焰——陈超诗歌论[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01).
- [46]袁学骏.李春雷:勇攀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高峰[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新闻传播学研究

张芸 郭毓娴

2022年河北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与往年相比研究方向更为精细多元,分析角度新颖丰富。专家学者们紧跟新闻传播事业的变革,追踪学科发展前沿,围绕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总体来看,本年度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研究视域更为宽广,既聚焦报业、广播电视和网络新媒体等新闻传播业界的创新实践,又关注算法、数据新闻、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趋势,同时,在新闻传播教育、媒体融合、新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继续深耕;第二,研究维度更加精深,理论研究的现实观照性更强,探讨新闻传播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现实问题,国际传播、公共传播、健康传播等领域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一、新闻传播实务

2022年,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催生传媒新业态,对新闻传播业带来深刻影响,引发系统性、结构性变革。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回应业界实践,既有对河北省新媒体传播、节目创新、重大主题报道的实证研究,又有对年度现象级传媒景观的深度剖析,具有前沿思维和鲜明的在地化特征。

(一) 报刊出版与广播电视

袁玉瑾等认为,“即时新闻”是互联网时代新兴的新闻传播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新闻传播发展的一个方向,加强“即时新闻”的研究意义重大。导向性、新闻性、区域性、移动性是区域“即时新闻”的基本创办原则。在凝练短小、去粗取精、准确真实、语态创新、标题冲击力、复合传播、多渠道齐发等方面下功夫,掌握其技巧,是区域“即时新闻”编辑的重要基本功。^[1]

马笑楠等认为,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文化类

节目面临多重需求变化:传统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审美融合趋势加剧,节目更新迭代能力有待提升,受众对社交媒介情感需求日益增强。IP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文化类节目在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及文化产业布局方面形成持久影响力。本文从文化IP定位、强化营销意识,形成特有产业等角度探讨文化类节目IP的开发与运营,助力文化“出圈”,在融合与创新中寻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之路。^[2]

沈静等认为,系列纪录片《人生一串》的“烟火气”审美打破了以往美食符码认同范式,在空间层面表现为烟火人间的他者化,在视听层面表现为平民语态的具象化,在意境层面表现为日常情态的景观化。《人生一串》采取平实化叙事与独特的视角,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建构了后“舌尖”时代崭新的符码认同。《人生一串》秉持新媒体运营理念,采取独播与定制的一元传播模式、巨量反馈与互动的弹幕形态、引发话题与热度的跨平台运作,实现了传播模式的创新。《人生一串》为我国后续纪录片创作带来一定的创新启示。^[3]

樊拥军等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澳门之味》系列纪录片,其从引人注目的活色生香美食文化切入,状描现实烟火景观中美食创造者不辞艰辛、乐观自信的生活和故事,展示他们敬业乐群的智慧情怀和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从而生动地呈现出澳门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品格风貌,打开了澳门形象的崭新视野,同时带给大家诸多人生感悟和启示。^[4]

金强等以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直至2022年2月4日冬奥会开幕式前,约六年半时间内《人民日报》对北京冬奥会主题的报道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内容覆盖面广泛,报道内容具有趣味性,对大众冰雪活动、绿色办奥、科技发展助力等内容均有涉及。在报道对象方面,有关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运动员的报道处于次要地位,占据首要地位的是筹备工作,报道对象多样

化,涉及志愿者、普通人、城市建设、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内容。^[5]

沈静、景义新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迎接党的二十大首批重点节目片单入选作品《山水间的家》为研究切入口,认为节目以采用“山水小分队”实地探访模式,呈现穿行于山水间的田园风貌,体验生生不息的乡土文明,礼赞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共享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宜居之家,引发平安喜乐温暖家园的情感共鸣。文章认为,节目以全新视角展现中国乡村十年巨变,重构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故乡意义,开辟了一条讲好中国乡村故事的创新路径。^[6]

马瑞等以《吐槽大会》这一广告显性植入的成功案例为参考对象,分析这一现象级综艺中的显性植入广告内容,重点探讨了广告显性植入的策略。总的来说《吐槽大会》的显性植入策略就是将广告植入“娱乐化”,运用多样化的植入方式以及风趣幽默的广告语言,缓和受众对广告的不满情绪。^[7]

李琳等认为,中国动画想要切实为全球范围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受众所理解,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高语境特征对传播与接受过程产生的影响,让国产大型动画发挥出其应有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功能。在进行国产动画的创作时,内容上要寻找适合被中国动画表达和使用、同时具有共同价值与现代价值的文化符号;表达上则要为相应的文化符号利用影像语言打造相应的直观表达方式。^[8]

张晴认为,在当下受众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河南卫视利用陌生化和差异化的制作理念和方式,在节目内容的文化内核上,从古至今、从内至外盘活中国故事;在节目形式上大胆革新,利用多元架构、技术赋能、独特的叙事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在节目传播上,采用互享共赢理念,线上覆盖、现实拓展构建圈层传播,从而实现品牌溢价。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讲述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利用鲜明的文化符号、传播流量、情感元素,从共享到共情、从情感到精神,传递了家国情怀、祭祀礼仪等人文哲思。^[9]

张弛等以河北广电大型直播特别节目《今日河北》为研究对象,探寻主流媒体在重大主题宣传报道中的主题视角、叙事结构及宣传效

能,以期在未来能继续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并其他媒体提供借鉴。《今日河北》通过旖旎的河北风光、翔实的发展数据、温情的报道视角,对河北之美、河北之先、河北之强予以充分报道和展示,进一步彰显主流媒体在重大主题宣传报道面前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0]

(二) 新媒体与媒体融合

马笑楠等分析了竖屏叙事的特点,试图在竖屏语境中引入“在场”理论,并在移动社交环境中探索新闻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旨在为竖屏新闻纵深发展提供借鉴。新闻事件发生后,社会大众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新闻事件讨论中,如弹幕、评论以及录制视频等多种方式,也是以这种表演的形式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连接,发出“我在现场”“我在参与”的呼声,形成对新闻事件的二次、多次甚至是“病毒式”传播。^[11]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手机及网络的普及使各类新媒体平台加速聚合,话语权不断下移,媒体信息平台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反转新闻层出不穷。金强等认为,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反转新闻的出现容易造成舆论生态和价值判断的短暂混乱。新闻失真和舆情偏转,对新闻公信力的破坏亦显而易见。基于反转新闻的破坏力,金强等重点探讨反转新闻的成因、传播特点及负面影响,并在国家、媒体、公众三个层次提出了规避策略。^[12]

韩雪认为,地方主流媒体正呈现出生态平台化的趋势。市级新闻传媒中心已不能再单纯作为一个内容输出者,而应该是内容生产的组织者,多媒体内容的整合者,区域中心新闻的整合平台、分发平台。在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邯郸新闻传媒中心积极稳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以媒体融合形成宣传大平台,以融合思维推进部门做大项目制,以平台建设融合社会大资源,在融合跃升中全面提升媒体影响力。^[13]

陈琳琳等认为,鉴于新媒体环境下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党报新闻评论话语的故事化、亲民化、情感化特征实际是一种新媒体生态下主流媒体的应变与创新,这也是社会经济、媒介技术和新闻生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新媒体时代,党报要进一步增强受众意识、社会意识,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

大主流思想舆论。^[14]

夏世奥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传统媒体需要与新媒体融合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新媒体也需要不断与其他行业进行结合,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视听领域中,微电影和短视频都是媒介融合的新兴产物,在融合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媒介融合的方法去解决,只有双方的优势不断互补才能更好地反推媒介生态良性发展。^[15]

胡洋认为,连载短视频通过段落式的高潮迭起的叙事结构,成为提升用户黏性的有效手段,满足了平台方和创作者双方的发展需要,很快在短视频平台上取得了长足发展。连载短视频在事实上延长了短视频的长度,是用户的视频内容消费从长到短再到长的过程,是短视频内容长短融合的过程。但这种从短到长的变化并非用户兴趣的简单轮回,它说明“短”并非短视频用户的本质需求,高潮迭起的内容、强烈的感官刺激,才是用户的本质需求。对于用户本质需求的认识,不仅有助于短视频的持续发展,也可以为其他媒介形态的发展提供借鉴。^[16]

丁伟认为,可视化在提供精准信息、呈现现实场景、多介质传播等媒体融合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时效性不强、精准性欠缺、水平有待提高、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主流媒体应从丰富形式、依托技术、研究需求、强化思维、探索应用等方面发力,不断开展可视化新闻报道的实践探索,将可视化战略作为提升内容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17]

金林等提出,长城新媒体集团的《我们的“全村福”——河北206个深度贫困村脱贫影像志》专题报道,为河北省每个深度贫困村拍摄“全村福”,并为部分贫困户拍摄全家福,用影像资料记录脱贫巨变,通过融媒体专题的形式,以思辨视角解读“脱贫攻坚”这一重大主题,生动且更具人文性,在“同题作文”中脱颖而出,既有效引导了社会舆论,又为脱贫攻坚工作留下了第一手影像资料。^[18]

陈瑞瑞认为,作为纪录片与短视频融合的产物,微纪录片天然具备传播与营销属性,是纪录片发展的新路径、新突破。而要想发挥微纪录片的“先锋作用”,就需要尽快完成选题视角的多

元化、生活化、平民化转向,创作手法的时效性、全景化、明快化转向,以及表现方式的沉浸式、社交化、多线化转向,以增强微纪录片发展的环境适应性、市场贴合性和受众吸引力,充分释放融合新生态下微纪录片的创新效能,以助推整合纪录片行业转型发展。^[19]

(三) 媒介经营管理

张玮等提出,新媒体的传播模式和变现逻辑与传统媒体有着较大不同,其带来的海量信息资源与庞大的受众群,为行业报经营的延伸、扩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但同时,由于行业报优势资源开发力度弱、新媒体变现实力不足、多元化经营人才缺乏等问题,对其转型发展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对处于向纵深融合中的行业报来说,应当在把握和利用好自身优势资源和新媒体平台的基础上,紧跟用户需求,不断创新经营模式,为私域用户和媒体建立强连接关系,以此创造更多业务可能,构筑良好的经营环境。^[20]

杨利光认为,传统媒体、新媒体逐渐融合,形成相互整合的新趋势。在这一形势下,受众范围不断扩大,消费者的媒介需求得到大大满足。但同时也暴露出整合营销理念尚未更新、模式较为陈旧、产品类型单一和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因此,相关单位或企业应转变信息传播思路,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分众定向,做好多元媒介的交叉管理和创新,以满足社会受众差异化的信息需求,加快我国传媒行业的改革进程。^[21]

赵兵认为,强化正面宣传的到达量、阅读量、点击量,迫使新一代采编人员研究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把“重要的”做成“必要的”,把“有意义”做成“有意思”,以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可视化为重点,用心用情制作有品质、有格调的精品。同时坚持全媒为本、导向为先、内容为王、技术为要、改革为重,努力建设新型主流媒体。^[22]

张玮等指出手机媒体虚假广告泛滥的原因,不仅仅基于单纯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广告主的利益驱使、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足等表层问题,主要因素还是来自手机媒体背后的终端服务商、运营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深层复杂的利益交织。各方主体要充分认识到手机媒体虚假广告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技术、法律等多方力量

有机融合,从源头根治手机媒体虚假广告。〔23〕

孙荣欣、张芸以近年来全国自媒体“三假”(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典型案件为重点,深入解剖案例,并实地调查了河北省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基层自媒体“三假”治理情况。认为增强自媒体“三假”监管治理效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消除监管“盲区”,实行平台注册地和自媒体属地分权管理;清理行业媒体驻外机构,严查“李鬼”媒体;依托先进信息技术,推进智能化监管治理;密织监督举报网络,筑牢安全“防火墙”;密织监督举报网络,筑牢安全“防火墙”。〔24〕

(四) 新技术传播

王亚莘等提出,随着媒介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在传播实践中被遮蔽的媒介“物质性”逐渐显现,再次引发了关于人与媒介技术、社会如何相处的思考。视障人士在“数字盲道”的无障碍阅读中,一方面被技术重塑,另一方面亦在重塑技术。无障碍阅读技术协商的过程,也是不断生产协商技术的过程。人自身与技术在不断交互重塑着彼此间复杂的耦合性。这些都为未来持续提升视障人士的无障碍阅读体验提供了思考。〔25〕

商建辉、董子尧提出,相对于手机、电脑等智能媒介而言,元宇宙是一个建立在更加复杂的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型虚实融合的数字世界。在未来的元宇宙中,每个用户都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之中,在虚拟世界中获得自己的虚拟化分身,在元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用户甚至可以在虚拟数字世界中生存,但元宇宙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形态的变化,同时也使得人类的传播实践发生相应的变化。〔26〕

杜宏艳认为,在5G+VR逐渐被常态化应用于传媒领域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空间混淆、价值异化、受众依赖等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提升媒体运用的责任意识,促进5G+VR技术对沉浸式传播的合理打造。一是受众的主观思维引导是重中之重。5G+VR技术的私人定制化与移动性增强特点使得受众媒介使用更为便利,但也应当引导受众对技术的正确认知与了解,促使其对5G+VR的合理使用。二是应当对技术持有者加以管理。从管理层面需要对各大技术开发商、媒介平台、科技中心等进行科学规范管理,促使其在注

重商业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27〕

王亚莘等以数字新闻学为理论视角,聚焦数字环境下新闻回应中凸显的情感化趋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新闻业态的演进,数字时代的新闻回应愈发兼备事实延伸与情感延伸的双重功能;新闻回应日渐将情感作为关键的回应资源;新闻回应的情感唤醒、情感分享、情感接力中形构着日趋复杂的新闻情感网络。〔28〕

王密卿等将研究视角放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提出数字技术的出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新思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信息进行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动态采集存储,对非遗进行系统性识别、专业化分类,建立非遗基因信息库。同时,利用VR、AR等技术向群众展示非遗,用数字化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动态过程进行动态、立体、清晰的记录,通过数字复原、数字集成、数字勘测、数字解读等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29〕

(五) 新闻传播教育

白树亮等立足智媒时代背景,主要探讨了智媒思维与创新框架的关系重构问题,围绕完善培养体系、壮大师资队伍、推动实践创新等三个维度,探索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着力将学生培养成全媒化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使得新闻传播学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媒介实践的现实需求。〔30〕

韩立新等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体系出现了多点融合的复杂局面,人才培养陷入“全才困境”,学科边界更加模糊。相关学者需要从问题出发,重新思考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建设。而媒介实验室应成为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成为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理论知识融合的重要手段和方式。〔31〕

袁婷婷通过对在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中,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级别为B级及以上的24所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新闻传播技术类相关课程进行考察。认为开设技术课程存在技术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日新月异的技术更迭之间等关系问题,且面临技术的不断更迭演变和传媒业态不断转型导致的技术学习等挑战。袁婷婷认为首先要调整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式;其次要整合资源,实行校内自建或校企合作;再次要实行校媒合作,协同培养。坚持专业型课程为主、技术

类课程为辅,朝着应用型方向培养人才。^[32]

王秋菊等选择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采用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中外智能传播研究的学术场域、研究议题、发展演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自2016年以来智能传播引发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智能传播研究集中关注了人工智能在新闻业的应用、人机关系与技术伦理、人工智能应用中的风险应对及防范等议题,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中外智能传播研究也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趋向。^[33]

杨晓娟认为,新闻传播学经典文献的阅读与学位论文的写作密切相关。它是获取学术问题意识和灵感的捷径,也是帮助学生提高论文写作手段和方法的重要途径。第一,精读熟读经典文献是开展论文写作的捷径;第二,精读经典文献是获取学术问题意识和灵感的捷径;第三,高质量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工作至关重要;第四,经典文献阅读可以帮助同学们提升写作的手段和研究的方法;第五,学术经典文献可以提升学术信仰与开阔视野。^[34]

彭焕萍提出,首批国家一流线上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锚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靶点,秉承“大思政”理念,不断强化课程立德树人功能;通过虚拟教研室形式,锻造跨区域的教学“大团队”;强化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度,创建多元化共享“大平台”教学模式,在“教、用、学”方面做了一些课程内涵建设的探索。^[35]

二、新闻传播学理论

2022年是传播学研究走进中国的第40年,面对时代赋予的新任务和业界发展的现实需求,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回应现实、回溯本源,如何重新理解媒介、创新国际传播理念、增强公共传播的服务性和影响力等成为鲜活的研究议题。

(一) 社会化媒介

白贵等基于目前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共情传播的发展现状,以“央视新闻”抖音号为案例,探讨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共情传播与表达的路径创新,同时探讨了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转型。他们认为首先要加强新媒体技术赋能,增强互动性创新传播转型;其次要挖掘主流媒体优势资源,推动新媒体

矩阵传播转型;再次要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优秀文化主线,关注衍生品的蓄力传播转型。^[36]

张萌认为,依随社交媒体的发展,用户社交生活的多方面都被编码和量化为元数据,而社交媒体平台上无处不在的元数据使得用户面临潜在隐私泄露风险。此外,液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流动性,强弱关系可以随时相互转化,用户对社交隐私管理需求随之提升。政府应发挥舆论带头作用,对隐私失范的平台组织及个人施压,督促落实清朗规范的社交网络空间。社交媒体平台应不断完善隐私管理模式,以用户可理解的方式公开隐私政策和条例。个人应该积极对社交隐私进行管理和必要的数字化节制,以防给网络技术权力者留下漠视隐私的印象。^[37]

胡洋认为,连载短视频在事实上延长了短视频的长度,是用户的视频内容消费从长到短再到长的过程,是短视频内容长短融合的过程。但这种从短到长的变化并非用户兴趣的简单轮回,它说明“短”并非短视频用户的本质需求,高潮迭起的内容、强烈的感官刺激才是用户的本质需求。对于用户本质需求的认识,不仅有助于短视频的持续发展,也可以为其他媒介形态的发展提供借鉴。^[38]

张雅明等基于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问题性使用密切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错失恐惧水平高的个体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更容易产生智能手机成瘾、低头症等非适应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此外,错失恐惧还会提升个体的线上易感性和压力感,降低其自尊和幸福感等。错失恐惧是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控失败的影响因素之一,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行为和心理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9]

(二) 国际传播

白贵等认为,我国“战略传播”理论应与自身国际传播实践相适配,也应根据当下国际传播语境优化既往传播实践。应对既往国际传播进行战略优化,自觉规避美国推行的“战略传播”的“霸权主义”逻辑与陷阱。在传播理念上要立足“对话”,避免单向性“说服”;出发点和归宿则应是尊重多元、寻求“有限共识”,并以此超越“地方性”分歧;在话语表达上应聚焦“人文”,分享故事,实现“现代性”“共情”;在政治实践上,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将

“中国故事”的“地方性”经验转化为国际借鉴。我国“战略传播”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以“对话”为核心的国际传播新范式。^[40]

王臣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热点,对外传播能力是对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检验。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把握对外传播视像化建构的新理念、总结中国抗疫故事的视像化实践经验,通过培育新视觉生产力、科学设置议题、建构“讲故事”情境、重构人文向度、用主题影像凝聚全球共识,可以达到与受众语境置换、情感共鸣、意义融通的沟通目的,这对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让全世界及时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41]

贾锐等从复调传播角度探讨了中国海外文化传播的策略。他认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海外文化传播的支持。复调传播策略有助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主体和受众友好互动、平等协作,表现双方文化的相互尊重。通过中西方动态的话语沟通,中国海外文化传播发展迅速,在传播平台、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等方面运用复调传播策略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42]

金强认为,目前国际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风险因素外溢明显,更要求对外传播做到有的放矢。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也不能搞大锅饭、大包揽,对外传播应在盘活存量的基础上寻找增量。要进一步规避粗放型管理和运作,加强专业化和精细化,将国别传播和文化传播进行协调统一,从领域精准传播到专业精准传播,从人员精准传播到项目精准传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43]

(三) 公共传播

彭焕萍等认为,“饭圈效应”已由粉丝化群体扩散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饭圈效应”的扩散逻辑亟待廓清。在当代偶像工业资本与社交媒体平台的裹挟之下,“饭圈”群体的文化实践方式已经变成围绕偶像展开数字劳动和线下应援的狂欢仪式。^[44]

苏敏认为,城市想象对城市建设有着重要影响。雄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作为特殊的个案,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苏敏提出以象征性节

点、公共空间的连通以及多种形式的沟通为途径,形成多种想象共生性的存在,影响城市建设和发展。总的来说,以想象多元、文化流动、文化共生三个方面揭示雄安新区城市想象的内在机制,为实现城市想象的共生融合和推动城市形象和谐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45]

杨英新结合社会心理学保护动机理论,分析防灾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阻滞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推动防灾科普短视频实践。防灾科普短视频要适度唤起公众的灾害严重性感知,塑造“恐而不惧”的中等恐惧感。这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警惕防灾科普短视频过度娱乐化和奇观化,把握严肃知识与娱乐化表达、视觉现实与心理现实的平衡点;二是通过多种表现形式调适灾害严重性感知;三是动画形象和情节要依据受众特征设计,避免一味低幼化叙事;四是防灾科普短视频传播常态化。^[46]

商建辉等基于内容分析法,考察了新浪微博官方媒体账号发布 HPV 相关报道时使用的不同主题框架与用户在线疫苗情绪表达的关系。研究发现,官方媒体最常使用医疗框架,而最少使用责任归因框架。医疗框架和救助框架下用户疫苗情绪偏向积极;而冲突框架和利益相关框架下用户疫苗情绪偏向消极。本文回应了用户卷入度对于框架效应和疫苗接种态度的交互影响,对健康传播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47]

刘娜认为,舆论的适度娱乐化有利于信息传播与情绪释放,但过度的娱乐化将解构严肃议题,甚至产生错误的价值导向。因此,在对舆论娱乐化的引导中,政府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各方应压实自身责任,个人应加强主流价值观建设,三方形成引导合力,共同打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舆论生态。^[48]

牛童等以《河北日报》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疫情防控期间《河北日报》新媒体矩阵疫情报道的传播策略优势,为主流媒体提升新冠疫情报道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提供有益建议。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在疫情报道中应始终肩负党媒责任,做疫情防控期间的权威发声者;注重建设性新闻报道传播,有利于凝聚同心抗疫合力;利用数字新技术创新内容呈现形式,提升媒体传播价值力;构建媒体平台互融互通的新媒体矩阵,放大媒体传播集群效应。^[49]

张京京等利用 2017 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营销对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用网络对外推介或开展电子商务的网络营销,可以显著提高乡村旅游经营效益,且具有很好的稳健性;网络营销的效益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增加游客人均消费而非接待人次实现的;对于低分位点即经营状况相对较差的乡村旅游经营者,网络营销的效益提升作用较大,因而网络营销具有经营效益“拉平效应”。^[50]

(四) 乡村传播

李冰、柴艳萍认为,乡村广播的从“离场”到“返乡”,是多媒体时代乡村广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重要体现。乡村广播具有广播内容的可控性、广播时间的自主性、广播形式的本土化以及广播空间的公共性等突出优势,新时期发挥好乡村广播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作用,就要强化对乡村广播的管理,加快乡村广播的软硬件和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村民参与乡村广播的主体作用,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各类节目。^[51]

田瑾等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了乡村文化品牌传播媒介的系统。他们认为对于乡村这一独特的地域空间文化,首先,视觉形象系统的传播需要更具情感性和识别性,明确新时代品牌定位的核心价值,建立信息的沟通与传达;其次,乡村文化品牌定位、受众分类、营销与流通媒介构建迭代循环,破圈尝试新的媒介社交与传播方式,避免信息茧房的束缚;再次,发挥视觉信息传播的优势与功能属性,加强互联网智媒传播的广泛性、独特性,再现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52]

陈娟等将研究视角放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涉农媒体的“破圈传播”,以《央视农业》入驻哔哩哔哩为切入口,《央视农业》进驻哔哩哔哩是主流涉农媒体转型与融入青年文化社区的一次重要尝试,圈层的破壁、交往的融合让更多青年群体深入了解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但也难免伴随潜在的冲突与斗争。涉农媒体仍需遵循“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真正做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方可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大业,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53]

姜书婷等认为,“三农”自媒体平台在强化

乡村舆论引导、提升乡村治理成效和重构乡村产业模式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在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应正视“三农”自媒体的功能优势,找准“三农”自媒体平台的坐标定位,拓宽“三农”自媒体平台的应用空间,全面激活和发掘乡村资源,滋养乡村文化,营造全新“三农”舆论传播生态,使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力量。^[54]

景义新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基层社区问卷调查。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传播力、服务力亟待提升,可以通过有效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合发展,加强平台融合、宣传融合、服务融合,使两个中心在关心服务群众、教育引导群众中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最终将两个中心共同建设成为县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心、服务群众的中心,释放两个中心融合发展的最大效应,打通群众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融入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55]

杨雷等提出,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推出全媒体电商直播节目《冀有好物》,为河北打造县域特色品牌聚力造势,推动河北好物乘“云”走四方。节目展示了河北焕然一新的乡村面貌,助力乡村振兴。以电商直播为路径,擦亮了河北县域文化名片,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践行了“智慧广电”理念,拓展了全媒体电商话语表达主体,提升了电商直播公信力,形成了广播电视节目在全媒体时代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典范。^[56]

李妍认为,互联网的勃兴改变了传播话语权,三农自媒体在技术赋权与国家战略目标的推动下得以蓬勃发展。三农短视频采用身体叙事的传播策略,通过各大短视频平台作为传播渠道,盘活乡村经济的同时也丰富了乡村文化。但是,乡村短视频领域固有的问题以及农村自媒体人的弱势也逐渐暴露出来。三农短视频流量至上、经济价值至上的传播模式影响了三农媒体人自我身份的建构以及短视频身体叙事的策略。而倡导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三农自媒体人的传播素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57]

杨秀国等提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书屋功能的局限性愈加明显,数字化建设势在必行。但囿于书屋结构和传统乡土文化,农家书

屋数字化建设仍有较大空间。信息化建设不足带来的新旧媒介场域的数字隔阂,结构性脱节引发的供需失衡,建管分离导致的功能弱化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农家书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建立长效发展机制:畅通信息网络环境,培育阅读主体;突破科层逻辑运行悖论,资源配置对接群众需求;搭建公共精神场域,推广移动阅读服务。^[58]

丁立捷等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媒体深度融合的双重战略驱动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为基层社会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平台。在此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实现传播力的跨越式提升,需要从基层治理、信息传播、媒介平台和市场经营等多重视角创新发展,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以实现引导与服务的有机融合,以泛内容化模式提高内容生产能力,以关系营造思维增强媒介平台吸引力,以自身造血机能增强蓄积发展的内生动力。^[59]

三、新闻传播史论

2022年河北省新闻传播学的史论研究更加突出地域特色,深度挖掘河北丰厚而独特的新闻史资源,形成很多视角新颖、史料翔实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晋察冀日报》宣传特色、办报思想等的系列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强化了研究优势。

商建辉等认为,作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之一,《晋察冀日报》不仅讴歌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业绩”,而且批判了“有害倾向和错误思想”,在反迷信宣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晋察冀日报》的反迷信宣传语言上贴近群众,通俗易懂;宣传方式灵活,避免直接说教。边区老百姓的迷信思想得到初步遏制,科学文化水平有所提升。^[60]

土地革命时期,列宁党报思想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且在中央苏区进行了本土化的传播与践行。商建辉等对此展开研究,他们认为通过对列宁党报思想的传播与实践,中央苏区的党报不但实现了自身党性的增强、对群众革命活动的有效组织、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推动、党报群众性的巩固等本土化办报成果,而且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为中心、因时顺势的办报之路,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斗争。^[61]

魏海岩等指出,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由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构成。基本读者是诸道长官,扩散型读者包括诸道幕职人员,支郡、县的官佐,诸道长官门客等。状报读者群构成特点由中唐以后特殊政治形势决定。读者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发挥有直接影响。在政治领域,状报基本读者数量少影响了诸道长官政治反馈的积极性和政治舆论的形成;在文化领域,读者构成制约状报成为诗歌创作新题材、民间修史的新史料。^[62]

张金凤以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在全面抗战时期发表的1034篇社论为文本基础,运用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从组织传播、政治传播等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提出,《晋察冀日报》积极进行新文风的建设,并且形成了特殊时期、特殊区域中的《晋察冀日报》社论文风。《晋察冀日报》积极地通过扩大发行、建立读报小组、冬学读报、讲报等方式推动社论的阅读,促进边区军民对其思想和建议的接受。不仅对晋察冀边区有直接影响,还对整个敌后根据地产生了辐射作用,是中共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63]

李慧民认为,民国石门电台的发射机数量及总功率远超华北各地电台的平均水平。接收广播的收音机均为华北广播协会推荐产品,其装置固定了电台广播频率,限定了收听范围。所有收听户必须登记备案审查,收听户被分为甲乙两种标准收费。电台播出节目和时间,根据情况变动均有不同调整。广播栏目主要分为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商情行市、文化娱乐等。广播节目分为转播和自播两种形式,在转播为主的基础上,石门电台曾增设五类自播节目。广播收听率关联着收听费和广告费,为了努力增加电台收入,扩大电台收听户,在如何提升广播收听率上,电台编播人员费尽心机,曾推出一系列提升收听率的改进举措。^[64]

刘相美等提出,革命话语形态下,《解放日报》副刊作为传播媒介,不断调适自身并致力于实现受众完成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的时代任务。丁玲任主编时期,《解放日报·文艺》在一定程度上使延安成为知识分子众声高唱的“公共领域”,带动了延安地区文学艺术的

繁荣。在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因政治形势和战时条件的影响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出党的文艺政策对文学发展走向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延安文学的面貌特征。^[65]

王禹洁等认为,成舍我作为近现代新闻史中独树一帜的报人,其报刊观念既受到西方报刊理念影响,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从道德自律角度形成了一套阐述报刊伦理、记者道德操守的伦理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成舍我坚信报刊是文化运动的先驱,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态度和修养,才能够完成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及成为“社会的向导”。^[66]

立足现实、服务实践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目標指向和价值所在,快速更迭的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媒介生态不断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出新命题。综观2022年河北省新闻传播学研究,虽然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但是,对于新闻传播业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关切仍显不足,相关研究较为零散,还需强化前沿性、系统性、引领性。为加强自主学科体系建设,新闻传播学研究应找准关键核心问题,拓宽研究视野,增强学术研究的学科特色和理论穿透力。

(张芸: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郭毓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参考文献:

- [1]袁玉瑾,刘玉军,刘锦岳.区域“即时新闻”的编辑规范与技巧[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10):57-60.
- [2]马笑楠,王禹洁.转向·破壁·再生:文化类节目的IP开发与运营路径[J].青年记者,2022(22):76-78.
- [3]沈静,韩雨坤,胡姿娆.符码认同范式突破与传播模式创新——后“舌尖”时代《人生一串》对美食类纪录片的开拓[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2(03):27-31.
- [4]樊拥军,王国焱.烟火美食景观中的澳门文化精神与崭新形象——《澳门之味》纪录片的传播意义评析[J].声屏世界,2022(22):78-80.
- [5]金强,王瑞环.《人民日报》北京冬奥会筹备阶段报道分析[J].海河传媒,2022(05):43-49.
- [6]沈静,景义新.《山水间的家》:谱写中国乡村十年巨变的壮美赞歌[J].电视研究,2022(11):45-47.
- [7]马瑞,白会会.浅析网络综艺中显性广告植入的优化策略——以《吐槽大会》为例[J].采写编,2022(03):180-181.
- [8]李琳,武文岩.国产大型动画的全球化创作视野与海外传播策略[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10):88-90.
- [9]张晴.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创新性表达路径探析[J].视听,2022(08):18-20.
- [10]张弛,吴燕林,杨雷.主流媒体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策略——河北广电大型直播特别节目《今日河北》的探索[J].传媒,2021(23):71-72,74.
- [11]马笑楠,贾乐蓉.基于竖屏语境的新闻叙事“在场”趋向研究[J].青年记者,2022(06):37-39.
- [12]金强,莫冉冉.新媒体背景下反转新闻现象、问题及其规避[J].新闻论坛,2022(05):22-25.
- [13]韩雪.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中做强地方主流媒体——邯郸新闻传媒中心稳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践[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09):105-107.
- [14]陈琳琳,王灿发.新媒体时代党报新闻评论的话语创新[J].新闻战线,2022(11):54-57.
- [15]夏世奥.微电影与短视频的融合发展路径探析[J].声屏世界,2022(16):100-102.
- [16]胡洋.连载短视频发展与现存问题的研究[J].传媒,2022(03):55-56,58.
- [17]丁伟.以可视化为重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J].中国报业,2022(17):23-25.
- [18]金林,孙文娟,李遥.重大主题新闻报道的融合创新实践——以长城新媒体集团《我们的“全村福”》为例[J].传媒,2022(15):59-61.
- [19]陈瑞瑞.融合新生态下微纪录片发展的三大转向[J].传媒,2022(07):76-78.
- [20]张玮,孙双双,陆静.融媒体时代行业报经营策略研究[J].传媒,2022(16):39-42.
- [21]杨利光.基于媒介融合背景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营销策略[J].文化产业,2022(09):7-9.
- [22]赵兵.建设新型传播平台:媒体深融的“关键一招”[J].传媒,2021(20):26-28.
- [23]张玮,张燕,郑海燕.互动传播视域下手机虚假广告成因及治理[J].当代传播,2022(03):92-94,100.
- [24]孙荣欣,张芸.自媒体“三假”监管治理调查分析及对策建议[J].青年记者,2022(17):83-85.
- [25]王亚莘,单琪,潘文建.在断点相遇:“数字盲道”中视障阅读的技术协商[J].出版发行研究,2022(06):79-83.
- [26]商建辉,董子尧.传播视角下元宇宙中身体的在场、离场与回归[J].新闻论坛,2022(01):9-11.
- [27]杜宏艳.沉浸式传播的技术赋能与责任重构——基于5G+VR技术的讨论[J].传媒,2022(21):77-78.
- [28]王亚莘,单琪,庞瑞灿.“新闻回应”的情感转向:基于数字新闻学的审视[J].传媒,2022(08):87-89.
- [29]王密卿,张瑞民.雄安新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J].文化产业,2022(35):157-159.
- [30]白树亮,和曼,彭焕萍.媒介分析视角下智媒思维与创新

- 框架的关系重构[J].海河传媒,2022(05):18-22.
- [31]韩立新,袁婷婷.技术知识如何融合:基于媒介实验室的考察[J].中国出版,2022(18):27-32.
- [32]袁婷婷.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技术类课程建设路径研究[J].中国地市报人,2022(09):88-90.
- [33]王秋菊,陈彦宇.多维视角下智能传播研究的学术图景与发展脉络——基于 CiteSpace 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传媒观察,2022(09):73-81.
- [34]杨晓娟.论新闻传播学经典文献阅读与学位论文写作[J].采写编,2022(03):148-149.
- [35]彭焕萍.“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建设理路与实践[J].青年记者,2022(07):84-86.
- [36]白贵,张红光,杨雯雯,任青青.央视新闻抖音号短视频新闻共情传播的路径创新——兼谈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转型[J].新闻论坛,2022(05):62-66.
- [37]张萌.液态社会中社交隐私管理的模式与规范[J].青年记者,2022(19):89-91.
- [38]胡洋.连载短视频发展与现存问题的研究[J].传媒,2022(03):55-56,58.
- [39]张雅明,卞先洁.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问题性使用的深层反思[J].新闻知识,2022(02):19-23.
- [40]白贵,邸敬存.国际战略传播:如何超越“地方性”话语局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11):57-63.
- [41]王臣.对外传播视像化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视角[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89-94.
- [42]贾锐,马志民.复调与对话: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策略[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3):36-40.
- [43]金强.“一带一路”跨文化精准传播刍议[J].对外传播,2022(07):18-21.
- [44]彭焕萍,刘念念.“饭圈效应”的特征、扩散及其逻辑[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153-160.
- [45]苏敏.多元·流动·共生:视觉修辞视角下雄安新区的城市想象[J].新闻研究导刊,2022(16):54-56.
- [46]杨英新.防灾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心理审视[J].青年记者,2022(20):48-50.
- [47]商建辉,赵昱.HPV 疫苗报道的框架效应探究——以微博情绪表达为例[J].青年记者,2022(22):50-52.
- [48]刘娜.舆论泛娱乐化现象的生成与引导研究[J].采写编,2022(12):111-113.
- [49]牛童,姜书婷.后疫情时代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策略研究——以河北日报新媒体矩阵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2(21):92-94.
- [50]张京京,刘同山,钟真.网络营销提升了乡村旅游经营效益吗?——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2(03):67-83.
- [51]李冰,柴艳萍.乡村广播: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一种可行路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2(03):32-36.
- [52]田瑾,王晓华,王轩等.乡村文化品牌传播媒介的系统研究[J].大众文艺,2022(18):220-222.
- [53]陈娟,王方正.乡村振兴语境下涉农媒体的“破圈传播”——以《央视农业》入驻 B 站为例[J].青年记者,2022(22):97-99.
- [54]姜书婷,宋兆宽.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三农”自媒体的优势与运行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2(12):92-94.
- [55]景义新,聂秋雨.融入基层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传播力服务力调查分析[J].现代视听,2022(12):17-20.
- [56]杨雷,朱良志,李木子.《冀有好物》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传播路径[J].传媒,2022(07):70-71.
- [57]李妍.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短视频身体叙事分析——以抖音新农人计划为例[J].今传媒,2022(05):35-38.
- [58]杨秀国,郭晓敏.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的瓶颈及突破策略——以石家庄周边区县为例[J].出版广角,2022(18):77-80.
- [59]丁立捷,许可.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力提升的多重视角[J].传媒,2022(10):26-28.
- [60]商建辉,高洁.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反迷信宣传[J].青年记者,2023(01):106-108.
- [61]商建辉,董子尧.中央苏区报刊传播与践行列宁党报思想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2(10):29-32.
- [62]魏海岩,彭翠,宋伟龙.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构成特点及影响[J].国际新闻界,2022(07):158-176.
- [63]张金凤.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社论研究(1937-1945)[D].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 [64]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电台广播节目与收听费刍议[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02):1-7.
- [65]刘相美,张洁洁.革命话语下的文学传播——以《解放日报·文艺》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2(04):28-32.
- [66]王禹洁,陈立平,李滨.成舍我报刊观念的中国文化底蕴[J].青年记者,2022(03):107-108.

艺术学研究

孟庆军

综观 2023 年河北省艺术学研究成果,在新

时代的发展态势下,艺术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思

想理念、认知角度、探索方向明显有着科学、新颖的突破和追求,在不同的艺术种类中,开拓进取的同时对优秀的艺术形式、艺术作品有着深入挖掘和经典传承。在美术、设计、书法、音乐等领域,紧随时代发展要求,响应社会发展号召,以严密的理论探究、真实有效的实践探索,丰富和完善了艺术学研究的进展。

一、美术类艺术探究及理论分析

在美术领域的研究主要探索了新时代语境下,不同学科的专业表现,对具体的美术方向的教学模式、实践体验、审美内涵、理论创新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在艺术层面,通过与美术相关的多方面探讨,对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是本年度美术类艺术探究的重点。

(一) 美术类艺术探究

李鹏克、张敏探讨了创新教学模式、传承陶瓷文化。^[1]认为,陶瓷在我国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表现形式、装饰工艺和方法,制作经验代代相传,大学生在陶艺学习过程中,可感受独特的文化和地域特色,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准,这将有利于陶瓷工艺与设计的创新发展和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吴新、吴东升对中西雕塑教育目标比较进行了研究。^[2]认为,在向西方模仿和学习过程中,不可盲目追西,跟随其大搞雕塑的材料和观念探索,而应当停下脚步,审视中国雕塑教育的实际,结合我国古代丰厚辉煌的雕塑史及文化史,重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雕塑教学体系,并由此完成中国雕塑教育的重要转型。

姜妮、杨静探讨了新时代语境下动画民族性表达的转型之路。^[3]认为,独具韵致的民族性表达向来是动画创作的至高追求,国产动画在经历了大量的摸索、模仿,并被诟病“长达30年缺失民族性”之后,通过梳理国产动画民族性表达不同时期的方法、效果与问题,针对当前“传统文化改编热”这一现象,尝试厘清“传统文化”与民族性表达的辩证关系,在深入分析“传统文化”的表达优势与层次之后,提出新时代语境下动画民族性继承的当代意义和民族性表达的现代转型之路径。

苑振威进行了当代美术中太行山意象的审美

研究。^[4]阐述了太行山在当代美术作品中的美感与精神内涵,探析太行山题材美术作品审美风尚的成因。认为,太行山的意象在不同作品中所呈现的美感和意蕴不同在于自艺术家审美体验与审美表现的差异性。通过对作品的艺术风格与文化意义的探索,寻找太行山如何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乡愁情感、一种思想境界的载体,为“山”的审美内涵带来新的契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推究事物的道理。

段冬玲的文章探讨了中国公共雕塑的时代命题。^[5]认为,公共雕塑艺术的动态发展是社会政治与历史巨变的直接反应。对社会问题高度敏感并保持深刻自省的艺术家有责任以介入社会问题的自觉性参与公共雕塑艺术创作和研究。在中国持续向世界开放、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和乡建计划蓬勃开展的时代潮流中,如何在大众文化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唤起民众深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公共雕塑艺术的重要课题。

祁凤霞、赵婷、祁悦探讨了新媒体时代下河北梆子的动漫表现研究。^[6]认为,近年来动漫工作者不断吸取戏曲艺术养料,积极探索戏曲元素与动漫艺术表现相融合的新形式,使中国带有戏曲元素的原创动漫作品大放异彩。动漫产业对推动河北梆子的传承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对河北梆子创新发展进行深化研究,并借助新媒体为这些原创戏曲动漫作品提供新的创作平台和传播途径。

王永瑞、张云哲、田晓菁开展了抗美援朝宣传画图像学研究。^[7]认为,抗美援朝期间宣传画作为宣传动员的重要手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艺术家通过宣传画激励战士、动员民众、揭露敌人;在统一思想、激励战士、批判敌人等方面都体现了特殊的效能。

(二) 美术类理论分析

吴迪进行了新时代推动传统艺术创新传承策略研究。^[8]认为,在世界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互联网信息海量传播的今天,要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通过学习体验传统艺术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理想、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要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载体,宣传传统艺术,推动中国传统艺术走出去。借助新媒介、新思路进一步加强传统艺术保护,

实现传统艺术的创新传承和创造性发展,真正让传统艺术焕发生机,使其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新科探讨了“民族艺术学”研究的理论路径及其学科建构。^[9]认为,对“民族艺术学”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民族艺术学”研究理论路径:对象论的“民族艺术学”强调其研究对象是民族艺术;方法论的“民族艺术学”强调用民族学的方法或理论研究艺术;整体论的“民族艺术学”强调作为统辖各个民族艺术分支学科的综合体;一般论的“民族艺术学”则强调对抽象的“民族艺术”自身的起源、特征、类型、发展等普遍性规律的研究。

魏姝俊进行了高校民间美术与非遗研究专业田野调研。^[10]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高校的人文传统、人才培养、信息平台、研究机构、场馆设施等都能为非遗的研究发挥灵活多样、跨界融合的作用。高等院校应加强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教育中的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将这些流传到现代的丰厚遗产,从跨学科角度做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必将为当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戴增钧进行了绘画中的视觉隐喻——对当下绘画的思考。^[11]认为,作为一种纯视觉艺术形式,绘画所承载的叙事性远没有文学来得直接、深刻。因而,叙事本非绘画所长,视觉语言的个人化建构也许才是绘画追求的目标。对于绘画路上的潜行跋涉者,绘画语言和绘画方式的选择既不应出于路径依赖,也不应出于流行风尚的导引,终归还是要遵从内心,依循表达意图之需要。

邹永新、孙珊探讨了开展当代美术实践教学的意义。^[12]认为,美术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教育方式,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能够让人掌握专业的美术创作技能和绘画作品鉴赏能力,而且对于人们的艺术修养水平、智力开发以及艺术审美能力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代美术教育与实践》一书系统深入地从美术教育的个人目的、社会目的及美术教育对个体和社会

作用等方面阐述了美术教育的价值功能和意义,对当前准确全面认识美术实践教学具有重要启发。

二、设计类艺术探究及理论分析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交叉学科的融合与创新,设计在教育教学和生活需求方面越来越重要,基于当下设计学科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对不同人群、不同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开发成为设计领域的重中之重。

(一) 设计类艺术探究

刘荣伶、刘红灵、张萍探究了基于场所体验式美学的建筑空间设计。^[13]认为,场所体验式美学空间是从形态化空间出发,运用新的视觉化展现方式所营造出有特点的建筑空间。体验式美学比较注重人的情感体验,习惯用图像化的方式,将视觉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在空间中采用不同的设计方式,多样的形态构成、装饰等,将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与整体的空间氛围融合在一起,突出场所的文化以及空间形态之美。

沈焕焕、刘利刚、郭永久以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蒙空间为例进行了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儿童室内活动空间设计探析。^[14]认为,当下我国室内儿童公共活动空间数量较少,且多关注于职业培训、快餐式娱乐、专业教育等,使得儿童发展需求难以通过多姿多彩的游戏方式获得心理满足。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室内活动空间,将教育与娱乐同儿童相结合,形成主体性、娱乐性、教育性的儿童室内多元活动空间。寓教于乐的儿童室内活动空间,更加利于儿童的身心成长需求。

陈强、刘宜滨、梁慧慧、王洪耀、于英丽、黄卓民、王曦、高洁、杨永进行了滦河铁桥文化景观探究。^[15]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工业遗产文化景观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桥梁遗产的功能、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只有尊重、继承历史文化,以科学的观念保护、再开发,才能充分发挥桥梁自身特点,结合相关领域的开发探索,才能使文化景观设计得到合理发展和实现。

郭永久、王依凡、周丹以河北省赤城县全家窑村为例进行了河北省近郊乡村旅游与文创产业艺术化发展研究。^[16]认为,将文创艺术化设计融入乡村旅游的多个环节,以文化为母体,乡村旅

游为载体,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艺术化融合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乡村文化的重要举措。

刘维尚、李然、王安琪以毛泽东诗词为例进行了诗词意象在红色旅游文创中的应用研究。^[17]认为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在我国革命历史中,涌现了大量具有优秀文化遗产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不但能够描述当时的革命情况,更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卓越功勋和历史情怀。作者探讨将诗词意象转化为形象,并运用于红色旅游文创中,最后生成具有诗词意境的红色旅游文创设计方法。为红色旅游文创提供一个新思路,也为诗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契机。

刘月林、李嘉玲、赵玲玲探讨了基于发光织物的交通指挥手套智能交互设计。^[18]认为,当今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基于交通情境交互关系模型,快速获取交警与驾驶者交互行为中的痛点和不足,分别进行产品的功能和交互设计,绘制产品造型草图,并得出最终的设计方案。发光织物的交通指挥手套能有效优化交通指挥效果,对缓解交通堵塞情况、减少交通事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杨艳玲、徐鸿进行了西柏坡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创新设计路径研究。^[19]认为,西柏坡红色文化是一种经典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根基、创新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无论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抑或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作者提出了针对西柏坡文化创意产品的若干具体创新设计路径,通过设计实践论证这些方法的可行性,为以后拓展西柏坡文化创意设计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其他红色文化形成自己的特色提供了借鉴的思路。

戴佳瑞、戴佳琦进行了河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开发与营销策略研究。^[20]认为,各大博物馆作为推动馆藏资源与普通大众有机连接的纽带,文创研发已然成为博物馆的核心工作之一,近年来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不断涌现,使博物馆具备了传承与创新精神的生活之地。将古老的文物对话崭新的时代,让文物真正投入文化市场的浪潮从而实现“活化”,强化自我发展意识,发掘文化资源;在文创开发的道路中严格把控开发尺度,在商业市场中坚守传承初心,是当下决定每一所

博物馆文化传承发展能走多远的必要命题。

杨雅君进行了冀南皮影戏造型与工艺创新开发研究。^[21]认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饱含邯郸地区文化内涵的冀南皮影戏,其造型、工艺创新与传承需要广开思路,尽可能地带动整个冀南皮影逐渐发展壮大,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冀南人民甚至全世界面前,传承民族传统,责在当代、功在千秋,为即将失传的邯郸市非遗贡献积极力量,从可视化审美造型入手,参与非遗的保护与创新性传承。

石彦君、冯诚、申艳芳以《影视服装设计》为例进行了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研究。^[22]认为,电视剧的人物造型设计不仅能够展现出影视作品的外在特征,也能够传达出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同时也能够展现出影视剧所要向社会传递的文化价值。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下,服装设计师要遵照历史的发展特性和时代的发展情况展开创新型的设计,要在延续传统服饰特征的前提下进行设计创新,以此来贴合现代人们的审美需要,同时能够为广大的影视剧观众带来更加新鲜的视觉体验,实现服装设计领域的深入发展。

(二) 设计类理论分析

丁满、程语探讨了产品色彩感性工学设计研究现状。^[23]认为,产品色彩能够激发用户的情感意象并影响其购买决策,是目前情感化设计中的重要研究方向。感性工学是目前产品色彩的情感化设计的常用方法。作者从技术方法、研究内容和未来趋势三方面对产品色彩感性工学设计进行了综述,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各类非线性技术为主,根据研究对象和任务目标结合其他方法,具有综合主观判断与客观标准的趋势。

欧新菊、晁露露、杜爽、贾子婷进行了“新国潮”设计要素对受众关注度的影响研究。^[24]认为,基于关注度研究“新国潮”风格,利用字体、色彩和符号的画面要素,从多维度探究其设计风格特征,不仅能够深化设计风格研究,也为跨门类设计研究提供了某种方法意义上的启示,同时,通过研究总结“新国潮”画面的理论范式,以更好地为设计师提供设计策略。

徐鸿、杨艳玲探讨了基于立体造型材料探索纸艺的多重应用。^[25]认为,纸立体造型艺术除用于书籍、服装以及建筑等方面,还可用于产品的包装设计,也可运用纸立体艺术理念进行设计,

使包装更具趣味性与艺术性。纸立体造型艺术设计在其他领域的创新应用能促进行业的创新发展,对现代艺术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义,未来应探索纸立体造型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李福成、刘毅探讨了工艺美院风格。^[26]认为,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现代审美生活,进入到社会大众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诸位开创者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兼顾精英艺术的形而上与实用艺术的形而下的融合发展模式,并且对社会性审美教育,以及促进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审美趣味的提升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杨博以《视觉》为例探讨了基于视觉传播的创意设计研究。^[27]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视觉传播逐渐与其他领域交叉融合,发展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也让视觉传播设计的图形语言变得更加丰富,其表达方式和表达重点都发生了深刻变迁。对视觉传播的创意设计研究,有助于设计者创意性思维的理解和提升,为后期的视觉传达设计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张文娟围绕效仿、延续与嬗变对清末民初磁州窑青花装饰进行了探析。^[28]认为,磁州窑青花代表了北方最大体系的民窑面对时代社会变革中所作出的应变反映,在社会变迁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承接并发展了磁州窑艺术,丰富了磁州窑艺术的文化内涵,初步实现了瓷业的发展与振兴,体现出民窑的生命力,为磁州窑青花绿彩和青花五彩瓷绘品种的创烧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丁卉探讨了传统艺术纹样在建筑装饰艺术设计中的运用。^[29]认为,传统艺术纹样不仅是我们的民族美学的体现,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艺术纹样各有特色,同时又融合不同民族以及文化地域的特色形成式样不同的立面形态。纹样的载体和所使用的群体之间也会有相应的影响,也间接地促进纹样结构与组织形式之间的变化,因此在现代的建筑装饰中采用传统艺术纹样进行室内空间的点缀。

张逸、史超然、李丽娜、刘馨野、陈凰嘉以蔚县剪纸工艺为例进行了地方民间手工艺融入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探析。^[30]认为,

融创式教学模式可促使学生成为民间手工艺传承发展的共同体,对地方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与传承会产生积极影响。作者对地方民间手工艺融入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究。分析民间手工艺引入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的必要性,以蔚县剪纸工艺为例介绍了融创式教学模式的教学实施过程。

三、书法艺术探究及理论分析

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较,一直以来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突出成就,在传承艺术经典的同时,也在发扬着优秀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书法艺术探索中,各书法艺术家、教育学者对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非凡贡献。

刘宗超的文章《淡雅简约的点线世界——丁申阳的草书艺术》^[31]认为,草书艺术是书法艺术中最为抽象、最为抒情、最为个性的体式,丁申阳草书形成了独特个性面貌,丁申阳的草书风格的成熟与当代书法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步。在不断深入传统、重温经典的过程中,他的草书创作也在不断完善与深化。草书需要用生命投入,用丰富修养和阅历涵养,才能把天地万物之“变”和人生感悟融入抽象的草书体势之中,使“天”与“人”合一、“书”与“人”合一,真正使草书创作成为书法家生命和时代特色的自然流露。

傅振余的《对高等院校书法教育教学浅谈》^[32]认为,近些年来,高等院校的书法专业迅速发展,书法教育教学近四十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已经形成了健全完备的学科体系建构。书法专业的教育方向和目标因学校的性质和师资特点而各有不同。高等院校书法教育必须明确培养人才的角色定位,不仅要培养书法的技术性人才,还要培养中国书法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高等院校书法专业应严格按照学科规律、有步骤地实施教学。高校书法专业课程的设置要在遵循学科特点和规律的前提下,经过科学的设计,凸显基础性,科学性,规律性。在综合类高校开设书法选修课是进行审美教育的一种形式。

四、音乐类艺术探究及理论分析

随着知识的更新和社会的变化,河北省音乐

艺术的研究有着显著的进步。音乐艺术的开发与探索在专业技术和艺术层面均有着卓越成就,对音乐艺术的教育、改革、创新以及作品赏析,在本年度的艺术学研究中有突出成果。

(一) 音乐类艺术探究

马玉峰、吴思宇的《1949—1979年我国钢琴音乐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33]认为在1949—1979年期间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受当时社会环境背景的影响,在题材、体裁和创作技法等方面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和声技法的探索与运用中,最主要的追求目标就是实现五声性旋律与西方七声自然音调式及大小调体系和声结合的水乳交融状态。在大量至今仍经常上演的经典作品中,音乐的展开性与织体的钢琴化方面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五声性旋律内涵更好地融入多声创作,五声性旋律与各类同主音调式交替、同音列调式交替、复合调式、多调性的结合状态相比于早期钢琴音乐更加自如、深入,复杂和多元,既保障了和声进行的动力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和声的民族化提供了众多成熟经典的范例。

马玉峰探讨了我国早期钢琴音乐五声性旋律的和声处理技法。^[34]认为,如何将我国的五声性旋律与西方的和声技法有机结合,将西方的多声部组织手段真正为我所用,既能保持风格的协调性,又兼顾和弦色彩的丰富性,以及音乐进行的动力性,是作曲家在创作中一直思考并不断解决的问题。在我国早期钢琴音乐创作中,作曲家在和声民族化方面所做的各种有益探索与尝试,给之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伯洋、李傲爽进行了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低音提琴的演奏与合奏初探。^[35]认为,贝多芬交响曲中的低音提琴声部对当今低音提琴演奏者来说仍十分具有挑战性。作者围绕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中的一些低音提琴困难片段,结合自身的演奏实践,给出了部分指法、弓法建议,并论述了如何运用“偷弓子”与扩展把位等演奏技巧来解决作品中极易出现的演奏问题。通过总谱分析,明晰了作品中低音提琴声部与其他声部间存在的关联,帮助乐团低音提琴演奏员理解这些关联可提高合奏质量。

杨子江进行了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提高手风琴教学的有效性研究。^[36]认为,手风琴教学是一

门演奏型的课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和音乐学科素养,在教授手风琴这个长期的过程中,手风琴教学要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有效性,依据学生灵活的思维和内在的学习兴趣,提高手风琴教学成效。要求教师引进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手风琴演奏技能,在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下,形成鉴赏能力、演奏能力,提高音乐学科综合素质。

韦建斌、王志辉的《传统的延续与音景重构——冀东鼓吹乐传承人的音乐叙事》^[37]认为,“鼓吹乐”的特定时间与空间概念,流传至今影响广泛,历经千年传承,在不同地区、文化、族群景观等因素影响下,其发展通过“裂变”形式,在中华大地上以不同的音乐形态进行着,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一套具有本土底色的演奏观念、演奏技法和旋律形态。从社会、文化身份整体视角,对乐本体、乐人、乐事间互动关系进行学术阐释,不仅有助于传统的延续,而且对传承人的培养、非遗保护工作推进、乡土文化推广有重要影响。

张伟的《河北省高校抗疫文艺作品的调查与影响力分析——以原创歌曲为例》^[38]认为,文艺抗疫之道在于,以作品凝聚人心共克危难。作者对河北省高校抗疫文艺作品全面搜集、梳理、归纳文艺创作的种类、数量、内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的原创歌曲为例,分析抗疫歌曲的创作特点,阐释抗疫文艺的实践意义,总结抗疫文艺的重要作用,以期进一步探究这些实践成果融入高校课堂思政教学的可行性。

韦建斌的《浅析明末清初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路径》^[39]认为,早期天主教音乐在传入的过程中做了很多中国化尝试,其中国化的历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天主教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近年来,我国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在神学思想建设、教会礼仪表达,以及教会建筑、绘画、音乐艺术上,倡导中国风格,弘扬中华文化。

邓博探讨了上海道教音乐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表现形式。^[40]认为,上海道教音乐具有细腻委婉、典雅清新的音乐特色;跨地域性的文化特色;地域性的民俗特色,在理论、曲目、演唱(奏)技巧等多个方面长期保持着原传道教音乐

的形态,是中国古代宗教音乐研究的重要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二) 音乐类理论分析

齐易的《“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学校传承体系建构刍议》^[41]认为,自20世纪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建立至今,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教育内容都处于从属地位,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本民族音乐文化占据学校教育主体地位的潮流相悖。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需要我們继续努力。为了守护和光大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之根,更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勇敢承担起传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责任。

齐易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地方文化精英与冀中“音乐会”的传承保护。^[42]认为,冀中“音乐会”具有“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性质。在维护和传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工作方面,民间乐师与社会活动家两种类型的地方文化精英各自努力而形成的合力,是冀中音乐会的文化生命力至今仍较为健旺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创造性传承保护工作,保证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冀中音乐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仍然顽强地生存发展下去。

韩启超的《百廿回眸——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史》^[43]认为,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经历了百廿春秋,重视乐教的办学情怀和规范的、体系化的音乐普及教育一直持续不断,闪现于各个历史阶段、各个专业和各个层级的教学体系中。而专业的师范音乐教育从1931年起,半个世纪前两度辉煌的办学历程,承载了燕赵大地的乐教情怀,给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与继承。

马磊的《教育改革背景下音乐教学创新分析——评〈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理论与改革探究〉》。^[44]认为,新时代背景下,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音乐的美育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无论音乐教育如何改革创新,最终都是为人才培养、音乐事业发展而服务的。因此,音乐教育工作者既要紧跟时代发展,又要做好文化传承,推动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韩梅、李茜蒙、李聪、姚德鹏探讨了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研究。^[45]认为,音乐教育

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重要应用之一,音乐教育现代化建设则是人工智能的重点发展方向。不仅是乐谱、音像资料,教学、教案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展示,实现其综合性和交叉性。传统音乐教育与人工智能的相互作用、融合必将带来更为广泛的、实用的学习效果。

韩宏宇、刘杨进行了新文化发展背景下河北传统音乐、艺术文化的传承探索。^[46]认为,河北地区要重视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开辟多元途径进行非遗文化项目的科学传承。并且要不断地更新理念,学习经验,在丰富的艺术文化实践中,总结河北传统音乐、艺术文化传承的有效策略,打造河北非遗艺术文化发展新格局,促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科学系统的保护,持久良性的发展。

李伟伟以邢台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为例进行了音乐非遗文化走进高校课堂的实践研究。^[47]认为音乐非遗文化进高校课堂的探索已经展开多年之久,这项工作对于非遗艺术的传承保护、深化高校教学改革,构建“音乐非遗高校教育生态循环系统”均有着良好的推进作用。民间艺术能重获旺盛的生命力,高校音乐非遗文化教育也可以彰显其更加富有地方特色的独有魅力。

(三) 舞蹈艺术探究及理论分析

刘丽珺、周星探讨了“修辞论”美学视角中再看燕赵民间舞蹈文化的审美特性。^[48]认为,“修辞性”是指燕赵民间舞蹈文化审美特性具有“修辞”结构与效果的内部特性;“修辞论”,是运用修辞理论去分析文化审美特性是如何重塑舞蹈文化样态。作者在分析河北地域代表性舞种及其审美特性时,运用“修辞关联性三层次”的研究方法,由表及里,递进式阐释舞种审美特性的形成,是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以此形塑燕赵民间舞蹈的文化话语权,以其“具体本文”去象征地阐释文化和历史。

赵爱芳探讨了舞蹈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素质培养的意义。^[49]认为,我国高校舞蹈教育的实践过程是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大学生对艺术的感知水平和舞蹈素质综合能力。高校舞蹈教育作为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场所,能够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提升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王莹、程红进行了“燕赵三绝”之井陘拉花艺术传承发展研究。^[50]认为,井陘拉花作为河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舞蹈之一,在审美特色和艺术魅力层面独树一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发展下,井陘拉花艺术也要走出自身的特色之路,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创新,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保持艺术生命力和风格特色,彰显深厚的文化价值。作者从激活井陘拉花创作动力、强化井陘拉花教学开展、拓宽井陘拉花人才培养渠道、增强群众井陘拉花艺术实践等层面进行探讨,为井陘拉花的艺术传承注入新的思路,提供新的方法,促进井陘拉花的良性发展。

五、反思与展望

近些年,河北省对于艺术领域不同门类、不同方向的探讨日趋成熟,在整体的分析与研究中也正在逐步地深入、完善,但其中也还存在部分弱势和不足。从宏观角度来看,各艺术类别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断的探索,寻求更加深刻、合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将优势和特色部分发扬光大;促进新兴的、冷门的艺术内容快速发展,以形成生命力更加强大的艺术体系。针对具体的艺术专业,充分加强教学研的一体化开展,深入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今社会的主流和生活所需,遵循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参考优秀的发展经验,调整原有构成,推进学科建设,以便更好地提高艺术价值,彰显时代意义。

(孟庆军: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李鹏克,张敏.创新教学模式 传承陶瓷文化——评《当代艺术语境下的陶艺教育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5).
- [2]吴新,吴东升.中西雕塑教育目标比较思考[J].美术,2022(5).
- [3]姜妮,杨静.新时代语境下动画民族性表达的转型之路[J].电影文学,2022(22).
- [4]苑振威.当代美术中太行山意象的审美研究[J].大舞台,2022(3).
- [5]段冬玲.介入和参与:中国公共雕塑的时代命题[J].艺术评鉴,2022(7).
- [6]祁凤霞,赵婷,祁悦.新媒体时代下河北梆子的动漫表现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19).
- [7]王永瑞,张云哲,田晓菁.抗美援朝宣传画图像学研究

- [J].大众文艺,2022(17).
- [8]吴迪.新时代推动传统艺术创新传承策略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7).
- [9]张新科.“民族艺术学”研究的理论路径及其学科建构[J].贵州大学学报,2022(4).
- [10]魏姝俊.高校民间美术与非遗研究专业田野调研[J].民艺,2022(3).
- [11]戴增钧.绘画中的视觉隐喻——对当下绘画的思考[J].美术观察,2022(7).
- [12]邹永新,孙珊.开展当代美术实践教学的意义——评《当代美术教育与实践》[J].中国教育学刊,2022(8).
- [13]刘荣伶,刘红灵,张萍.基于场所体验式美学的建筑空间设计[J].建筑结构,2022(2).
- [14]沈焕焕,刘利刚,郭永久.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儿童室内活动空间设计探析 以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蒙空间为例[J].室内设计与装修,2022(3).
- [15]陈强,刘宜滨,梁慧慧,王洪耀,于英丽,黄卓民,王曦,高洁,杨永.滦河铁桥文化景观探究[J].现代园艺,2022(2).
- [16]郭永久,王依凡,周丹.河北省近郊乡村旅游与文创产业艺术化发展研究——以河北省赤城县全家窑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2(9).
- [17]刘维尚,李然,王安琪.诗词意象在红色旅游文创中的应用研究——以毛泽东诗词为例[J].包装工程,2022(10).
- [18]刘月林,李嘉玲,赵玲玲.基于发光织物的交通指挥手套智能交互设计[J].包装工程,2022(12).
- [19]杨艳玲,徐鸿.西柏坡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创新设计路径研究[J].工业设计,2022(6).
- [20]戴佳瑞,戴佳琦.河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开发与营销策略研究[J].科技传播,2022(5).
- [21]杨雅君.冀南皮影戏造型与工艺创新开发研究[J].大众文艺,2022(20).
- [22]石彦君,冯诚,申艳芳.古装影视剧的服装设计研究——评《影视服装设计》[J].毛纺科技,2022(5).
- [23]丁满,程语.产品色彩感性工学设计研究现状[J].机械设计,2022(7).
- [24]欧新菊,晁露露,杜爽,贾子婷.“新国潮”设计要素对受众关注度的影响研究[J].包装工程,2022(20).
- [25]徐鸿,杨艳玲.基于立体造型材料探索纸艺的多重应用[J].中国造纸,2022(6).
- [26]李福成,刘毅.工艺美院风格:中国现代审美生活与美育的开端[J].美育学刊,2022(2).
- [27]杨博.基于视觉传播的创意设计研究——评《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意与表现》[J].传媒,2022(24).
- [28]张文娟.效仿、延续与嬗变——清末民初磁州窑青花装饰探析[J].中国陶瓷,2022(3).
- [29]丁卉.传统艺术纹样在建筑装饰艺术设计中的运用[J].建筑结构,2022(16).
- [30]张逸,史超然,李丽娜,刘馨野,陈凰嘉.地方民间手工艺

- 融入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探析——以蔚县剪纸工艺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22(2).
- [31]刘宗超.淡雅简约的点线世界——丁申阳的草书艺术[J].中国书法,2022(2).
- [32]傅振余.高等院校书法教育教学浅谈[J].中国高等教育,2022(Z1).
- [33]马玉峰,吴思宇.1949—1979年中国钢琴音乐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J].中国音乐学,2022(4).
- [34]马玉峰.中国早期钢琴音乐五声性旋律的和声处理技法[J].音乐研究,2022(2).
- [35]于伯洋,李傲爽.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低音提琴的演奏与合奏初探[J].黄河之声,2022(13).
- [36]杨子江.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提高手风琴教学的有效性研究[J].当代音乐,2022(11).
- [37]韦建斌,王志辉.传统的延续与音景重构——冀东鼓吹乐传承人的音乐叙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2(1).
- [38]张伟.河北省高校抗疫文艺作品的调查与影响力分析——以原创歌曲为例[J].当代音乐,2022(4).
- [39]韦建斌.浅析清末民初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路径[J].中国宗教,2022(11).
- [40]邓博.上海道教音乐 浓郁的地方色彩 丰富的表现形式[J].中国宗教,2022(7).
- [41]齐易.“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学校传承体系建构刍议[J].中国音乐学,2022(1).
- [42]齐易.地方文化精英与冀中“音乐会”的传承保护[J].音乐生活,2022(4).
- [43]韩启超.百廿回眸——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史[J].人民音乐,2022(11).
- [44]马磊.教育改革背景下音乐教学创新分析——评《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理论与改革探究》[J].中国教育学报,2022(10).
- [45]韩梅,李茜蒙,李聪,姚德鹏.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亚太教育,2022(1).
- [46]韩宏宇,刘杨.新文化发展背景下河北传统音乐、艺术文化的传承探索[J].黄河之声,2022(11).
- [47]李伟伟.音乐非遗文化走进高校课堂的实践研究——以邢台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22(3).
- [48]刘丽珺,周星.“修辞论”美学视角中再看燕赵民间舞蹈文化的审美特性[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2(1).
- [49]赵爱芳.舞蹈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素质培养的意义[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S1).
- [50]王莹,程红.“燕赵三绝”之井陉拉花艺术传承发展研究[J].黄河之声,2022(24).

历史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

马超 陈静 马腾

一、考古学研究

2022年度河北省考古工作以主动性科研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为主,全年主要考古项目共计44项,其中主动性科研考古项目17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27项。全力推进“人类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社会”等考古中国重大工程项目;助力雄安新区建设,持续推进雄安新区考古工作;推进燕国、中山国和城市考古工作;基本建设工程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加强多学科应用,提升科技考古含量;课题研究稳步推进,扎实做好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加强对外宣传交流,提升河北考古影响力。

(一)“人类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社会”等考古中国重大工程项目

1. 泥河湾人类探源工程

(1) 阳原新庙庄遗址

新庙庄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浮图讲乡新庙庄村,1984年在泥河湾盆地组织旧石器专题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22年对2号地点开展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因时间限制,发掘仅完成堆积上部上文化层的发掘,发掘深度12米(整体剖面厚度24米),包含两个自然层(第⑤层、第⑥层),文化层厚度约6米,出土编号石制品、动物化石约8227件。石制品原料以硅质灰岩、白云岩、玄武岩以及石英岩为主,类型主要包括

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石钻、废品、断块等。第5层上部发现少量石叶、小石叶石核、小石叶以及以小石叶为毛坯加工的琢背刀等石制品，体现出石叶技术的典型特征。

2022年发掘在传统新庙庄遗址文化层之上，新发现确认一个文化遗物丰富的文化层，该文化层发现典型的石叶技术制品，进一步丰富了新庙庄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序列。该文化层初步测年结果显示超过距今4万年，这一阶段是早期现代人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扩散的时期，该遗址发现的超过4万年的石叶技术制品，也是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石叶技术制品，对探索华北地区石叶技术起源、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该遗址石叶技术制品与小石片石器技术制品共存，未发现细石叶技术制品，与目前华北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石叶技术与小石片石器、细石叶技术并存在状况明显不同。该遗址发掘揭露的石器技术特征推断，华北地区很可能存在一个石叶技术与小石片技术并存的文化遗存，由此可以构建起华北地区小石片石器-石叶技术-石叶石器与细石叶石器-细石叶石器（船形细石叶-楔形细石叶）的完整序列，将为探索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的演变与石叶、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发挥重要作用。

（2）蔚县暖泉饮涧沟旧石器时代遗址

暖泉饮涧沟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盆地内，该盆地为四面环山的山间断陷盆地，其间蕴含丰富的早期——晚期人类活动遗存，是研究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和行为模式的重要区域。该遗址发现于2019—2020年度的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中，2022年度的发掘工作是在2020年发掘区域的基础上进行的扩方发掘，采用旧石器考古通行的发掘方法对该遗址重点堆积区域进行系统发掘，全面获取早期人类在该遗址留下的文化遗物。在发掘过程中同步采集年代和环境分析样品，用于孢粉、磁化率、生物标志物、 $^{26}\text{Al}/^{10}\text{Be}$ 测年等分析工作，为复原古人类生存年代和环境背景打下基础。2022年共发掘20个水平层，每一水平层厚度主要为10厘米，部分遗物较密集层位，发掘厚度为5厘米。出土编号标本总计1444件，其中石制品484件，骨骼910件，牙齿化石50件。2020—2022年饮涧沟遗址共计出土编号标本3403件，

其中石制品1310件、骨骼1964件、牙齿化石129件。

暖泉饮涧沟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早期人类活动遗存的范围（泥河湾层），获取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系统采集了测年样品和环境测试样品，在重建遗址及区域古环境、研究中更新世期间人类石器技术发展、动物资源利用以及探索人类行为适应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项目

（1）武安赵窑遗址

赵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赵窑村，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发掘仰韶时期壕沟1条（段），商代灰沟2条（段）、房址16座、灰坑78座、陶窑2座、墓葬42座、石砌水道1条、战国花土坑35座。

新确立的赵窑遗址分布面积达到110万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包含有仰韶早期（后岗一期）、仰韶晚期（大司空文化）、龙山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早商、中商、晚商、西周、东周、汉代时期的遗存，基本涵盖了从仰韶早期到汉代冀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尤其是夏商周时期遗存基本一脉相承。仰韶早期的环壕聚落，是河北省目前发现最早，也是后岗一期文化最为明确的环境聚落。商代聚落初见端倪，等级较高，主体时代为洹北商城时期。遗址多次出现“矢”族族徽标记，赵窑遗址可能是“矢国（族）”的核心区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期花土坑，应与军事活动有关，与赵窑遗址处于关键的军事咽喉位置相关。

（2）平泉东山头遗址

东山头遗址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台头山镇大营子村北，于1990年河北省文物普查时发现，地表散布有陶片和石器，经勘探确认遗址面积17500平方米。2022年发现方形石围、石棺墓、长方形碎石堆、封石、堆塑、船形石堆、T字形石堆、弧形石堆、大石块石堆、燎祭、灰坑、石块陶片条带、圆形石堆等，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

该遗址是河北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遗址，本年度发掘初步了解了牛河梁遗址周边区域红山文化晚期早段祭祀遗址的形制、构造，丰富了红山文化晚期中小型祭祀遗址资料。遗址反映出的规

模、营建方式等也为红山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3) 红山文化调查

开展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调查范围 40 余平方千米,勘探面积 15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发现红山文化晚期早段祭祀遗址一处,出土筒形罐、石器、玉环等遗物,丰富了红山文化研究内涵。

3. “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社会”考古研究项目

(1) 崇礼邓槽沟梁遗址

邓槽沟梁遗址为河北省首次发现的龙山时期城址,2022 年对龙山晚期石城东南瓮城区域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整个发掘区内从早到晚发现五处城门系统,各阶段城门系统基本由瓮城、墙体通道(瓮城道路)、城门通道等结构构成,最晚期还发现有马面设施。此外还发掘灰坑 2 座、窑址 3 座。发掘区内出土遗物不多,陶器 8 件、石器 20 件、骨器 8 件、陶片 20 余袋。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绳纹最多,其次为素面、篮纹,常见器形有正装釜手鬲(部分口沿摺压花边)、夹砂绳纹罐、夹砂小罐、敛口瓮、双耳罐、豆、杯、碗、陶拍、陶环等。常见石器有石斧、石核、石镞、石片、石饼等。骨器有骨簪、骨针、骨锥等。遗存文化面貌与河套地区永兴店文化因素相近,年代为龙山晚期。

揭露的早晚五个阶段的城门系统,基本揭示了邓槽沟梁遗址龙山晚期石城东南瓮城区域城门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对了解邓槽沟梁遗址龙山晚期石城城门系统的发展过程意义重大,对于研究北方地区史前城址的分布、城防结构形态、史前筑城技术的传播和融合提供了新材料。该遗址龙山晚期出现的石城为河北省内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城”,意义重大,其性质应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为研究张家口地区史前时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有助于加深对冀西北地区文化发展序列的认识。

(2) 尚义四台遗址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面积 15 万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2022 年在 2021 年发掘区北侧、西

侧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揭露房子 17 座,出土陶器残片、磨制石器、细石器、骨角器等 300 余件。根据地层、测年、遗物特征,将遗存本年度发掘的遗存主要分为三组。

第一、二组遗存,美国贝塔放射性实验室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 15 个万年左右和 10 余个 9000 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浮选的植物目前主要发现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组合指示这一时期是森林——草原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食草类动物在周围活动频繁。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种类有蚌、螺、蛙、鱼、雉、鸟、鼯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孢子、鹿、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能存在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也表明四台先民的产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其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其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尚义四台遗址已入选“2022 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3) 康保兴隆遗址

兴隆遗址位置属于蒙古高原的东南缘坝上地区,是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的交汇处,其文化内涵与近些年发掘的内蒙古化德县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张家口尚义四台遗址相似,但其共时性或延续性有别,这一类文化遗存代表了新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区域文化的空白。本年度最重

要是在遗址南部探沟 TG1E 处, G5 的下部填土内发现年代明确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堆积。遗物主要为新石器时代, 出土重要文物标本有陶器 63 件、石器 299 件、骨角蚌器 195 件, 另有动植物、残留物、测年、土壤微形态等样品 650 余份。

本年度发掘初步了解了遗址北部和东部边缘区位置, 为以后全面揭露聚落奠定基础。在遗址外围的环境考古工作也提供了遗址存续时期湖泊环境证据, 收获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石器、骨角器和陶器, 极大丰富了文化内涵, 也为开展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资料。

(二) 助力雄安新区建设, 持续推进雄安新区考古工作

1. 容城南阳遗址

南阳遗址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昝马台镇南阳村南, 2022 年共布探方 28 个, 探沟 4 条。目前共计发现各类遗迹 128 处, 其中夯土墙 3 段、踩路面 2 处、灰坑 111 座、火坑 1 座, 路 3 条、灰沟 3 条、井 3 口、灶 1 座。出土各类小件共 43 件, 包括铜、陶、骨器等。

基本可以确定, 南阳遗址由两座城址构成, 城址的上限为战国晚期, 其主体文化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燕文化因素, 为探索东周时期燕国南部城邑“易”提供重要线索。南阳遗址的考古工作揭开了雄安新区城市考古的序幕, 是雄安新区两周、汉代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和范例, 进一步推进白洋淀区域先秦时期生态环境演变、人地互动关系研究工作。

2. 雄县古州城遗址

古州城遗址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鄭州镇, 2022 年对古州城 3 号遗址及周边进行了勘探与发掘, 勘探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出土遗物多为残块, 主要见有砖、瓦、瓦当、陶瓷器、铜钱, 其中有大量青棍筒瓦、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另外, 还出土有石碑刻与多件佛教遗物残件: 铜小佛像、汉白玉莲花座(显庆四年)、石造像(武平六年)等。

综合分析表明, 3 号遗址极有可能为唐代莫(鄭)州官寺——开元寺南山门遗址。发掘显示, 3 号遗址叠压在“内城”南墙之上, 3 号遗址的发掘为“内城”南墙的变革以及“外城”城墙的营建年代提供了有力参照。唐代官寺——

开元寺遗址的发现, 是古州城考古新发现, 也是古州城考古研究新的突破口, 将为古州城及唐代州城官寺的研究提供新资料。

3. 容城城子遗址

城子遗址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贾光乡城子村, 南拒马河的右岸, 是一座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的古代城址。2022 年共发掘 600 平方米, 主要针对城墙、环壕水系、城内遗址区进行了解剖和发掘, 共清理灰坑 14 个、灰沟 3 条、道路 2 条、窑址 1 座, 出土遗物主要为白釉瓷片。根据文献记载, 容城建制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早期, 其后历经数次省废和复置, 宋以后本址逐渐废弃。对地理志中容城地望的考证, 也将其指向城子遗址所在地。通过梳理近几年城子遗址的考古发现, 主要遗迹现象集中在战汉至唐宋时期, 并且以战汉和五代北宋两个时期为重, 宋以后城墙开始废弃, 建设活动基本停滞。出土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的容城历史相印证, 基本证实城子遗址即为容城旧治。

城子遗址的系统发掘, 重点关注城墙结构、环壕水系等重要节点, 提供了清楚的地层和年代证据, 详细的城墙结构和环壕水系的信息, 为燕南地区中小型战国城邑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新材料。

(三) 燕国、中山国考古和城市考古工作

1. 涑水张家洼遗址

张家洼遗址位于河北省涑水县明义镇张家洼村周围, 2022 年度的发掘集中在垒子河东岸的台地。通过考古发掘, 基本明确了发掘区台地的主体遗存分布情况, 台地面积约 7 万平方米, 本年度的发掘集中在台地西部边缘和北部, 西部边缘遗迹较单纯, 主要是西周时期居址和零星龙山时期灰坑, 中部、东部为龙山时期居址和西周早期的墓葬, 发掘区有零星战国时期的堆积。发掘区台地取土活动频繁, 破坏较严重, 地层堆积相对简单, 残留的地层近水平。本年度共清理墓葬 11 座(含瓮棺葬 1 座)、灰坑 53 座、水井 2 眼、沟 1 条。发掘获得各类文化遗物二百余件, 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雪山二期文化遗存。遗迹仅有灰坑和灰沟, 器型主要有各类罐、鬲、甗、瓮、盆、杯等。既往京津冀地区雪山二期文化遗址发掘不多, 也缺乏有序的多学科研究。本次发掘极大地补充了雪山二期文化研究的缺环。

张家洼遗址 2022 年度的发掘, 填补了环燕山地区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空白, 据此可以更好地认识本地人群的变迁与流动, 为研究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当地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化、发展和产业经济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同时, 对于周代的国族分封、人群迁徙与土著人群的聚落差异也提供了新的佐证。本年度的发掘确认, 张家洼遗址西周早期的不同台地上的人群族属差别较大, 西周时期遗存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 殷遗民遗存次之, 典型周文化遗存十分罕见, 所发掘墓葬的葬俗与 2021 年发掘的西周早期墓葬葬俗有巨大差别, 种种迹象显示, 在直线距离 1.5 千米的两个台地上的同时期人群, 族属可能不同。

2. 行唐故郡遗址

故郡遗址位于石家庄市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 自 2015 年起持续发掘, 多项考古发现填补空白。2022 年考古工作主要围绕第 V 区南侧断崖处、第 III 区北部地层破坏区、M92 周边及故郡城址东环壕西侧展开, 发掘面积 400 平方米, 遗存时代包含新石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及北朝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清理新石器时期灰坑 6 座、灶 1 眼、灰沟 1 条, 考古学文化属于后岗一期。春秋晚期遗存仅有水井 1 眼, 另有战国、北朝遗址多处。在实验室内对二号线车马坑三号线进行发掘, 清理出车轮及车舆局部, 车舆表面漆绘并贴附贴金兽形铜饰件, 其形制结构与四号线近似。此外还对杂殉坑 (M92) 进行了打包提取工作, 为后续实验室考古发掘与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故郡城址环壕内侧区域的发掘, 深化了对城址历史沿革、文化内涵新的认识。环壕内部区域发掘数量较多的灰坑等遗迹, 时代为战国中期, 与居址第三期年代相当, 出土有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 当有高等级建筑的存在, 进一步明确了居址、墓地与城址的相互关系。另外北朝时期灰坑、水井等居址类遗存的发现, 为故郡城址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内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实验室内二号线车马坑和三号线的发掘与保护, 为故郡遗址及东周时期车马形制结构及车马制度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故郡遗址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 是鲜虞——中山国的早期阶段的代表性遗存, 体现出北方戎狄族群与华夏文化参半的文化属性, 对于建立和完善鲜虞——中山国考古

学文化序列, 探讨东周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3. 大名府故城遗址

大名府故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以大名县大街镇大街、御营、双台三村为中心, 以南门口、东门口、北门口以及铁窗口为四至, 面积 26 平方千米, 始建于前燕建熙元年 (360)。2022 年 I 发掘区位于大名府故城遗址内城北墙体东部 (今大名县大街镇双台村东北 700 米处), 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通过考古发掘, 揭露内城墙体南北总宽 24 米 (包括主墙体以及 3 道增补墙), 其中主墙体横截面整体呈“梯形”, 墙顶残宽 6.5 米, 底部残宽 12 米, 残高 2.4 米。此外, 清理元—明时期墓葬 15 座、灰坑 5 座、灰沟 3 条; 宋—金时期灰坑 7 座、道路 1 条、灰沟 1 条; 晚唐时期灰坑 6 座; 北朝时期墓葬 1 座。出土可复原器物 200 余件, 质地可分陶、瓷、骨、石、蚌、铜等。II 发掘区位于大名府故城遗址内城城壕东侧河堤处, 发掘面积 300 平方米, 前期考古勘探根据堆积与走向判断为河堤, 经考古发掘清理确定了为夯土墙体, 横截面整体呈“梯形”, 墙顶残宽 11.5 米, 底部宽 20.5 米, 残高 1.7 米。

通过对大名府故城 I 发掘区内城墙体以及其南北两侧地层堆积、文化遗存的揭露与解剖, 初步推断出大名府故城遗址内城城墙的始建、使用、废弃年代, 厘清了内城城墙在各时期的功能发展脉络, 正式确定了北宋时期北京大名城的城市主体布局与东京汴梁城相似, 均为受“皇权至上”观念影响的三重城, “回”字格局, 属于都城级别城市, 为北宋时期中原文化的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实物资料。II 发掘区首次确认了内城东侧曲尺形夯土墙体的性质, 通过对其局部揭露, 基本可以确定为城垣性质的夯土墙体, 该段曲尺形墙体连续不断, 已勘探出的总长度近 2500 米, 结合其为城墙遗存的结论, 大名府故城遗址除了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垣外, 可能存在着第四重城垣, 根据地层关系初步判断其始建年代与内城年代相近或稍晚于内城, 为今后研究大名府故城遗址历史沿革与平面布局的结合提供重要信息,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宋时期大运河文化分布及都城制度、四京城市群格局、宋辽军

事对峙、水运与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张北元中都遗址

元中都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县城西北15千米，遗址保存较好，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相套而成，东西约2900米，南北2964米，总面积约8.6平方千米，方向177度。

2022年度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共清理各类遗迹33处，其中建筑基址4座、灰坑11个、灰沟10条、柱洞8枚。出土编号标本647件，以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其中黄釉琉璃脊饰9件、绿釉琉璃脊饰16件、黄绿两色釉琉璃脊饰24件、黄釉琉璃瓦件11件、绿釉琉璃瓦件52件、黄绿两色釉琉璃瓦件270件，另有泥质灰陶砖80件、泥质灰陶瓦38件、石构件9件、瓷片16件、铁器14件、铜构件108件。另外，出土未编号砖瓦残片18218件，共计18865件。在考古发掘的同时，对元中都宫城东半部区域进行了全面普探，对宫城东半部原有编号的建筑基址进行了重新核准，新发现一批重要遗迹，为元中都遗址宫城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四) 基本建设工程和其他考古工作

2022年基本建设考古项目27项，累计考古调查行程约700千米，勘探面积约6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

1. 隆尧柏人城遗址

柏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城西12.5千米的双碑乡境内，北邻泚河，三面环岗，城墙全长8000余米，城郭面积约4平方千米，城址总体保存情况较好。柏人城始建年代不晚于战国晚期，城内文化层厚度可达3米，秦汉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2013年，柏人城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柏人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保存比较完整，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2022年发掘面积共780平方米，发现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等各类遗迹240余处，出土各类遗物残片逾3万件，发现“柏人”“柏人城”等陶文数十片。发掘区南部，发现多个夯土遗迹，2个水井，灰坑数量较少。发掘区北部，除有2个水井外，遗迹以灰坑为主，数量近200个，坑内堆积多见自南向北、从高到低倾斜，表明其垃圾来源应为南侧居住区。

数量较多的戳印和刻画文字的发现，如“柏人”“柏人城”等，明确了两汉时期的柏人城是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在遗址南部边缘的灰坑H99中，发现了丰富的与骨器生产相关的遗存，出土了较多的经过人工切割的骨料和骨器生产废料，可以确认此处存在制骨作坊，以上这些发现为认识柏人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和遗址使用、功能分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始资料。

2. 邯郸市南上宋遗址

南上宋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东部，通过调查与走访当地群众，明确南上宋遗址所处位置为漳河故道。考古勘探确定该遗址瓷器集中分布于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平面分布无规律，深度约自2.6—3.2米。南上宋遗址出土遗物有瓷器、铁器、砂器和陶器残片等，以瓷器为大宗，共出土瓷器1195件，主要为化妆白瓷及个别黑釉瓷。化妆白瓷以碗、盘、盏产品居多，此外有少量钵形盆、钵、行炉、器盖等产品。黑釉瓷仅1件瓶类产品。根据瓷器产品的总体特征来看，均系同期磁州窑场产品。

考古发掘发现漳河故道的东岸及相关遗迹，明确了河道位置，成为今后此段漳河故道考古工作的立足点。此段漳河故道可与历史上众多文献记载互证，如正史、地方志书、唐代至明清的诗词歌赋等，为唐宋邯郸县治的方位提供相关信息。初步明晰北宋时期磁州窑水路运输情况：自漳河沿岸磁州窑场启运，沿线经磁县、成安、邯郸、永年、曲周等县，向北可连通滹沱河水系城市群、向东北可连通御河周围城市群。遗址出土瓷器时代单纯，均为北宋中期偏后产品，具有重要的断代价值，为研究北宋时期治理漳河的重大历史事件提供实证资料。研究此段漳河故道与同期的黄河、洛河、清洋江、御河、柳沟河、李阳河、泚河、滹沱河、唐河的关系，可考察相关制瓷窑场的水路、海运联通。

3. 蔚县李家庄-古家疃墓群

李家庄-古家疃墓群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杨庄窠乡李家庄村及古家疃村之间，东南距代王城遗址约3千米，2022年共完成13座战国墓葬的发掘工作，已发现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墓葬普遍埋藏较深，部分可达十几米深，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和骨蚌饰等各类遗物470余件组。其中陶器种类有鼎、豆、壶、盘、匜、三足

带耳罐、盆、舟、鉴和贝等；铜器有铜鼎、铜墩、铜罍、铜剑、铜削刀、铜铃、铜车书、铜衔、铜环、铜鹤嘴斧、铜戟、铜戈、铜镞等；玉器包括穿孔玉片、玉龙虎型饰、玉琮和石圭等；骨器有骨管、骨镞和蚌饰等。

本次发现的墓葬年代为战国早中期，总体文化特征与晋文化，尤其是晋南和晋东南区域文化面貌大体一致，但同时出土的三足双耳罐、丁字形骨器和鹤嘴斧等北方文化因素遗物，体现出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此外，墓葬本身存在一定等级划分，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出土数量众多的玉石器和铜器，对了解当时的玉石器加工和铜器铸造技术都有重要作用，该项工作是近年来东周考古的重要收获，获得了一批蔚县盆地最为系统的战国早中期的墓葬资料，对研究东周时期代地文化特征、列国文化关系及北方民族的华夏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课题研究和学术成果

1. 课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该课题的实施将全面解决定窑多年积压资料的整理与报告出版问题，基于定窑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分期标尺，将极大地促进定窑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也会为河北省其他窑址的研究与利用工作提供借鉴，推动河北省陶瓷考古高质量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河北崇礼太子城金代行宫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全面整理2017—2020年太子城遗址考古资料，形成考古发掘报告。在考古资料 and 各项检测报告基础上，完成太子城遗址综合研究专著，为宋金元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提供新资料，为金代中后期遗存断代研究提供标尺，为后奥运时代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考古和多学科数据支持。

其他已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北行唐故郡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2015—2020年”、重点项目“中山国灵寿城遗址相关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一般项目“雄安新区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及分类保护研究”、“河北迁安爪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泥河湾盆地旧石

器时代文化序列构建与研究”、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人类起源、地质及环境背景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2. 学术成果

《金帝夏宫——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1]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2022年张家口奥运村西侧，201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太子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太子城是国内首座金代行宫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4.32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墙外有护城河。城门仅确认南门1座，门外有瓮城。城内钻探与发掘共确认建筑基址72座、道路22条、排水沟4条、井2眼、灰坑9座。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鸱吻、脊兽、频伽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绿釉建筑构件、鎏金龙形饰、瓷器等。本书中每件文物均配有文字说明，分别介绍它的出处、时代、尺、形制等，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地进行展示，将文物信息最大限度地传达给广大读者。

《盐业考古与古代社会研究》^[2]盐业考古是我国的新兴考古学研究领域，是我国考古学发展进入新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发展尤为迅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盐业考古与古代社会研究：手工业考古·黄骅论坛：以盐业考古为中心论文集》收录了2021年在黄骅举行的盐业考古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充分反映了最近十年来我国盐业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盐业考古理论研究、盐业历史研究、传统制盐研究，以及冀鲁地区、江浙地区、川陕地区等地的盐业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成果。

《邺城文物菁华》^[3]本书为邺城出土文物专辑，所选文物标本主要包括两方面：发掘出土文物和非发掘出土文物。其中，发掘出土文物均为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调查、发掘所获；非发掘出土文物，主要为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历年采集、征集品。

全书分为六个单元：魏武雄才，崭新都城（曹魏时期邺城）；民族融合，文化激荡（西晋十六国时期邺城）；技艺荟萃，规划超群（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京畿寺院，宏伟伽蓝（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佛寺）；中原佛都，邺中样式（邺城佛教造像）和巍巍陵墓，艺术殿堂（东魏北齐

时期陵墓群)。

二、博物馆学研究

2022年河北省博物馆学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教育理论与服务实践、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与实践、博物馆藏品保护与整理、博物馆文创产品开放与利用四大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范围比较全面,科研水平不断提升,论文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突出,为推动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硕的实践成果。

(一) 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

在《博物馆条例》等制度和规定中,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已被列为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2022年,河北省博物馆学专家结合博物馆开展的系列教育活动就如何强化青少年培训、激发青少年潜力、培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进行了讨论,促进博物馆在青少年人格塑造、知识积累、道德提升、民族认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海慧以邯郸市博物馆小讲解员培训为例,探讨了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引导式教育与自主性学习。^[4]文章首先梳理了2006年至2014年以来邯郸市博物馆在小讲解员培训方面的实践,由于时间短、内容单一、可持续性较差,项目发展陷入瓶颈。2015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博物馆条例》,其中第三十五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制定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社会实践活动的政策措施”的提出,让邯郸市博物馆重新启动小讲解员培训项目。为加强培训效果,制定《邯郸市博物馆小讲解员管理手册》,并由暑期短期培训转成常年培训,运行模式从单一的课堂教授走向多元培训模式,培训内容从单一的文物讲解到文博情感培训、展览鉴赏及自主文物解析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在该项实践基础上,总结了博物馆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最主要的三条经验。一是教育项目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二是尊重孩子特点,鼓励自主学习,让孩子在持续的、优质的博物馆经历中汲取养分;三是发挥教育人员引导者的作用,循循善诱、步步引导,搭建起博物馆与孩子们之间的良好关系。

王晓阳以河北博物院品牌社教服务项目“博物馆里的动物世界”为例,介绍了项目理

念、方案设计、准备与实施等,探讨了多元智能理论视阈下博物馆幼儿教育的项目路径,强调了博物馆在激发幼儿潜能、拓展幼儿视野、培养幼儿想象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在项目设计方面,融入多元智能发展理念,以“动物”为线索,链接自然、科学、艺术、音乐、语言、历史、民俗等元素,依托展览环境设置情境,将讲解、互动、表达、游戏、故事、体验等方法融入项目形式,让幼儿在“玩”的过程中,发现博物馆的奇妙之处,拓展丰富的发展潜能。在内容设计方面,精选“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大汉绝唱——满城汉墓”两个基本陈列中的动物形象文物,根据其特点分成“猛兽历险记”“神兽幻想记”“萌物总动员”“人与动物缘”四个章节。每个章节又由“猜猜我是谁”“和我比一比”“我来大揭秘”“我们聊一聊”等趣味版块组成,通过探索式游戏、趣味性教学、故事式交流使各版块内容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智能的全面发展。在优化实施、合理评估的基础上,河北博物院编辑出版了《博物馆里的动物世界》,并摘得“2020年天津市十佳优秀科普图书”“2020年河北省优秀科普作品”两个奖项。

(二) 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与实践

2022年底,全省登记注册的博物馆208家,共举办各类展览1063个,开展社教活动4473场,观众数量1730万人次。理论研究方面,河北省学者撰文总结了本省曾获得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展览的成功经验,就中小博物馆的策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陈列展览中重文物轻资料、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观念。

胡佳佳梳理了自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举办以来河北全省荣获该项荣誉的9个精品展览。^[6]自1997年始,全国文博系统每一或两年进行一届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比,截至2022年,已成功举办19届,评出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200余个。文章梳理了20余年来获得该奖项的9个来自河北展览,分属河北博物院、西柏坡纪念馆、邯郸市博物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磁州窑博物馆、蔚县博物馆、承德博物馆7家文博单位。这些精品奖陈列均为基本陈列,无临时展览。从展览内容看,除了西柏坡纪念馆为近现代革命建设类陈列,其余8个展览皆为古代历史类陈列。指出,获奖展览基本具备

以下特点：一是陈列主题鲜明，特色突出；二是内容设计创新性强，立足地域文化；三是展品挑选得当，发挥馆藏优势；四是艺术设计创新协调，合理运用现代技术；五是让观众考虑，充分发挥教育职能。建议，一是均衡差距，鼓励和引导非文物系统、非历史类陈列参评；二是策展时要注重创新，要有前瞻性，合理利用新技术，立足地域文化；三是加强精品陈列展览后续的文字性解读，撰拟相关研究文章。博物馆通过陈列让文物诉说历史，传承文化，通过“十大精品”推介活动的普及和完善，促进博物馆陈列会越来越越好。

吕庆元、马思远以“乾坤方圆——沧州博物馆馆藏钱币精品展”为例探讨了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如何激发展览活力。^[7]认为，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多数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在举办展览时存在思路保守、目标不明确、内容单一化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中小博物馆可从展品资源、展览内容、展览平台、策展人员素质四个方面入手“破题”。资源方面，要打破无珍贵文物不成展览的观念，拓宽展品选择面，充分利用现有馆藏文物资源；内容方面，要优化展览结构，充实展览内容，贴近日常生活，展览主题、展品、展品说明、讲解词等的内容要能为观众搭建起展览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桥梁；平台方面，要开放展览平台，拓展宣传途径，激活社会资源，在策划展览时应充分考虑观众的意见，通过激活社会资源，创造开放的展览平台，来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人员方面，要注重人才培养，借助馆外力量，提高策展水平，博物馆可以将热爱文博事业、有意愿助力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社会人士作为人才“外援”，引导他们参与到博物馆的策展及其他事务当中，并积极搭建互动平台，让馆内工作人员在与馆外文博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中取长补短，夯实自身的知识基础，提高业务水平。

（三）博物馆藏品保护与整理

藏品保护是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维护藏品质量，控制降低质变速度，对藏品的劣化进行综合防治的过程，保护藏品的实质是保持藏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河北省学者围绕古籍、非遗等内容从不同角度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进一步活起来。

古籍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类型，古籍文献历经悠久岁月，其自身材质相对脆弱，因而古籍的保护和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宋莉洁以此为立足点，对古籍文献资源的整理保护与开发利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8]提出，保存并开发利用古籍文献能够帮助当代人们建设道德标准、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因而需要通过加强古籍文献的整理、建立严格的古籍文献保护制度和培养古籍文献保护的专业人才等途径共同发力，加强古籍资源的保护，为古籍的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古籍文献的价值，古籍文献存放单位可采取多种方式，如开展古籍文献的“有序阅读”，由专人将古籍进行整理和维护后在展示柜中以原件或图片、影像资料等形式进行展示，既保证博物馆中古籍文献的安全，又能够让参观者一睹千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古籍的真容；再如可加快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充分利用数字化图书所具有的存储场地小，便于古籍文献的展览、管理、利用和传播方面的优势，为人们在阅读方面提供更大的便利；另外还可推进古籍文献的现代化，降低语言习惯、流行词语的不同给现代人造成的阅读古籍文献的障碍，用当代人能够读懂的幽默、当代人能够认识的语句解释那些在当代人看来晦涩难懂的文本，从而保证其开发出符合现代需求的价值。

由于得不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即将失传的处境，对此朱云玲进行了分析和研究。^[9]认为，由于民间文化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难以进行有效确定、原创性很难确定、其公共文化产品属性与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三方面原因造成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深入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面临着“现代化”的强烈冲击，无形中压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建议，一是加大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专项保护体系和保护机制，实行对民间文化艺术作品的无限期保护；二是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体系，加强后期的管理、监督和评估等重要工作，将效果评价作为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管理，建立相应的机构来组织和推动申报、评估、监督和实施，并建立起配套的专业行政管理

体系和定性定量评估体系；四是测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的实施效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测试，使各项规划和措施真正得到落实；五是加强人员管理，相关人员应清晰地认识与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并将自身专业的知识技能以及管理手段进行合理应用，以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正确的态度面对工作，以此有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长足稳定发展。

（四）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与利用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通常以文化和创意理念为主导，将博物馆文化元素和符号分析转化成设计要素，借助更符合现代生活的新形式，将博物馆文化元素展现给大众，并探求其使用后对精神层面的满足。2022年河北省学者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在研究中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设计出多款文创产品，为博物馆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赵钊、张翔以博物馆文创产品为对象，分析了其跨界创新的路径。^[10]文章首先对文化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接着指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研发存在的行业发展不平衡、产品创意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进而提出跨界合作的必要性。认为，跨界合作一方面可以在保持文物特征的前提下，提升文创产品内涵，同时还可以拓宽文创产品线，融入市场导向和市场化思维，增加文创产品的实用性。最后，文章结合4I理论提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跨界创新设计路径，一要坚持趣味原则（Interesting），趣味性的设计可以使受众对产品的接受从被动转为主动，引发消费者共鸣；二要坚持利益原则（Interests），既要兼顾消费方所需求的物质、信息、服务、功能、心理满足等利益，也要维护生产方口碑知名度、市场转化率、传播范围等利益；三要坚持互动原则（Interaction），产品要贴近受众，将消费者作为一个主体，使其与联名产物之间进行互动交流，产生一定的情感共鸣，通过深层次的思考领悟产品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四要坚持个性化原则（Individuality），要针对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开展深入调研，在充分理解双方品牌内涵和受众特点的基础上，细化消费者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从而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助力博物馆设计出特色鲜明、种类齐全、品种

多样、优势突出、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体系。

杨艳霞的硕士论文以布尔斯提出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选取张家口博物馆中特色的文化和藏品，提取其文化符号，通过重复、夸张、组合等设计形式，形成符合现代美学的图案。^[11]文章通过对我国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的文化衍生产品的共同特点及不同点进行剖析，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调研分析法，归纳出一种符合其特点的设计程序与方式进行实践，完成设计方案并加以应用。文章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对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和方法进行界定；第二章主要介绍所需要的相关理论与基本概念；第三章对博物馆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剖析，对当前博物馆IP文化衍生品的设计理念进行了归纳；第四章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张家口博物馆的IP文化衍生品进行设计定位；第五章进行张家口博物馆IP文化衍生品的设计实践。文章认为，博物馆文化衍生品应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非营利性”到“经盈并存”、从“单向传输”到“双向互动”，应立足馆藏文化资源、将文化势能转化为消费势能，顺应市场趋势，跨界融合发展。设计方法上，作者提炼出对典型藏品图案的运用、对传统纹样的运用、标志建筑外观的运用、文字重组、藏品图像的立体处理、对典型藏品功能的转化、对典型器物造型的运用、艺术联名等八种方式，为今后博物馆衍生品的设计提供了广泛思路。

2022年河北省博物馆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尤其是不少论文紧贴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提出新的建设管理模式和路径，描绘出河北省博物馆发展的新场景，为探索博物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贡献了力量。但同时也应看到，博物馆学研究在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博物馆的国际交流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全省博物馆学术研究水平不均衡的现象较为突出，接下来，呼吁全省博物馆学术研究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为不同地区学者搭建互相沟通交流学习的桥梁，带动全省博物馆学研究共同进步，取得更为突出的研究成果。

（马超：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陈静：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
马腾：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

- [1]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金帝夏宫——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 [2] 黄骅市博物馆等编著.盐业考古与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邺城文物菁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 [4] 林海慧.引导式教育与自主性学习——博物馆与青少年的沟通密码[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12).
- [5] 王晓阳.“博物馆里的动物世界”幼儿教育项目的设计与实施[J].中国民族博览,2022(3).
- [6] 胡佳佳.河北地区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试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2(2).
- [7] 吕庆元,马思远.谈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如何激发展览活力——以“乾坤方圆——沧州博物馆馆藏钱币精品展”为例[J].文物春秋,2022(3).
- [8] 宋莉洁.古籍文献资源整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J].山西青年,2022(4).
- [9] 朱云玲.对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式的深入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28).
- [10] 赵钊,张翔.跨界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研究[J].艺术品鉴,2022(6).
- [11] 杨艳霞.张家口博物馆 IP 文化衍生品设计研究[D].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硕士论文,2022.

中国古代史研究

魏建震 冯金忠 陈瑞清

一、中国古代史综合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综合研究方面,戴建兵主持出版了《中国环境史》,其中《先秦卷》《秦汉卷》《魏晋至宋元卷》《明清卷》对中国古代环境及其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1]董劭伟等出版了《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共收入论文 21 篇,内容包括古代典籍研究、古代著作人物研究,此外还有从思想、文化角度对古代的身体观、音乐理论的研究成果。^[2]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康振海任主编的多卷本《燕赵学术思想史》出版了《辽宋金元》(上)、《明前卷》(中),对辽宋金元时期、清代前期的燕赵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3]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方面,戴建兵等发表了《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4],许倩发表了《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力》^[5]等论文。

二、先秦秦汉史研究

2022 年,河北省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五帝时代与夏文化研究、西周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秦汉史研究等诸多方面。

(一) 五代时代与夏文化研究

在黄帝研究方面,沈长云发表了《黄帝的史迹、形象及其演化》一文,对黄帝历史进行

了研究与阐释。^[6]关于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方面,张渭莲、段宏振发表了《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对应须谨慎》一文,认为《史记·五帝本纪》开列的五帝世系结构存在不确定性,“考古学文化具有某些模糊性”,二者“相互对应中存在偏差与谬误”。^[7]

在夏代历史研究方面,沈长云发表了研究论文集《寻找夏朝——夏代史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共收论文 35 篇,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关于“夏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论述夏朝在历史上的存在、夏代国家起源、“夏族”概念等基本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夏的地域问题,提出夏朝分布地域主要在古河济之间,并对禹都阳城、禹画九州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三部分利用新出土铜器铭文探索大禹治水的真相;第四部分对早期国家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8]此外,在夏史研究方面,沈长云还发表了《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对夏朝早期国家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9]

(二) 周朝历史研究

在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方面,沈长云发表了《也谈义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从铭文内容、器物形制、铭文字体等方面论证了义方彝和令方彝应该属于成王时期。^[10]在西周史实研究方面,张怀通发表了《〈世俘〉与武王献俘盟誓典礼》一文,对《世俘》记载的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的献俘礼行了研究,认为其中四月庚戌日武

王献酋、献人、献馘的献俘仪注，与小孟鼎记载的献俘仪注一一对应。由“誓”“告”等字词，以及祭祀对象祖、天、稷、社、水、土、百神看，这是武王率领诸侯在上下庶神面前的盟誓仪节。^[11]在西周职官研究方面，张怀通发表了《克钟与清华简〈摄命〉“伯摄”职责考论》一文。^[12]

在春秋战国历史研究方面，何艳杰发表《赤狄新考》一文，试图以赤狄相关新出材料为基础，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赤狄的渊源、文字、联盟首领称号和基本社会分层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13]马立志发表《春秋梁国史补考三则》一文，利用古文字资料对春秋梁国史进行了补充考证。^[14]

在春秋战国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洪猛发表了《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及其族属》一文，认为玉皇庙文化结合时空位置定位和文化来源等认识来看，该文化位于桑干河谷邻近的西区当系代戎部族的遗存。^[15]关于战国长城的修建，沈长云发表了《从战国长城的修建谈到华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一文，认为长城最早出现在战国前期，具体地点则是在内地。到战国后期，始有北边长城的修筑，乃是位于西、北方向的赵、秦、燕修筑的北边长城，其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族胡人的侵袭。这三个国家的长城连成一线，正适应了我国华夏民族构筑共同地域的需要。由于我国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几个国家北边长城的修建亦正构成了我国华夏民族的北部边界。^[16]关于赵国的埋葬制度，张渭莲发表了《东周赵国的埋葬制度》。^[17]

（三）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诗经》研究方面，陈晨发表《〈诗〉简读札三则》一文，认为安大简《诗经·硕鼠》简 81“遘皮樂=或=”“遘皮樂=土=”、简 82“遘皮樂=蒿=”中的重文符号皆应从《毛诗》读三遍。阜阳汉简《诗经》简 S014“印其離”当从《毛诗》读；上博简《民之父母》引《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有密”句应该读为“夙夜謀命有密”。^[18]在《诗经》与孔子思想研究方面，许春华发表《“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一文，认为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底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

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19]在孔子思想与《诗》学研究领域，许春华等发表了《“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一文，认为孔子诗教是对周人诗教的哲学变革。孔子诗教以“礼义”为选取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思想结构，获得了“仁”之本质规定。“诗”与“礼”“乐”共同实现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20]在荀子诗学思想研究方面，许春华发表了《“诗”与“儒”——荀子论诗思想旨趣探奥》一文，认为荀子以“圣人之道”重释“诗”之“志”及《风》《雅》《颂》的意旨，主张“近其人”“好其人”的学诗态度，反对“不知统类”“术谬学杂”的学诗方式，批评子思、孟轲一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无论是为儒学学派“清理门户”，还是确立“儒”之正统，“诗”都是荀子评判的价值依据。^[21]

在孔子儒学研究方面，许春华发表了《“闻”：“乐”与“仁”的对接及境界形态——论孔子儒学“哲学的突破”的多样性》一文，认为根源于内心之“闻”，超越了“耳”之“聪（听）”“目”之“见”，打开了“乐”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是“人而不仁如乐何”的具体呈现。孔子儒学对“诗”“礼”“乐”同等看待，皆与“仁”思想相通，其“哲学的突破”路径是多样的。^[22]在儒学研究方面，秦飞发表《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一文，认为“让”作为儒家仁礼思想的精神要义，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也是礼治要抵达的至德形态，尤其是“让天下”的思想，可谓孔子内圣外王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极致表达。^[23]在孔子思想研究方面，秦飞发表《浅论孔子之道及当代启示》。^[24]

在老庄思想研究方面，李振纲发表《〈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一文，认为《老子》首章开宗明义道出老子道论三个基本问题：一是道言之辨，从道言关系诠释了“道”的形上本体意义；二是有无之辨，从“有”和“无”的关系揭示道之超越性、实存性及其统一性；三是道物之辨，用“众妙之门”

隐喻道生生不息的本源性及道生万物、万物尊道的道物关系。这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命世界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一个生命终极关怀的问题。^[25]王素芬发表了《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一文，认为“道”和“德”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具有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德”是“道”赋予包含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自然本性。庄子之“道”与“德”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其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26]

在先秦其他诸子研究方面，李振纲发表《论荀子哲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一文，认为孟子、庄子思想在荀子哲学建构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荀子天道观对宗教之天、德性之天的剔除及与道家自然观的纠缠；性善、性真、性恶善伪的观念差异与相互连结；道德反省、审美直觉向认知理性的转向。^[27]此外，刘振英发表的《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一文，就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变通进行了论述。^[28]

在《周易》思想研究方面，聂民玉发表了《〈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生成“三论”》一文，认为《周易》是一部讲生命哲学之书，“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还有一个词那就是“仁”字。“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生”。对“生”问题视域的展开，《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29]

（三）秦汉史研究

2022年，河北省史学界秦汉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汉简研究、董仲舒研究和有关文物考证方面。

在汉简研究方面，丁义娟出版《肩水金关汉简法律资料辑录与研究》一书，该书利用肩水金关汉简，在继承前人对西北边塞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汉代弱水中下游（今额济纳河）流域的边塞包括肩水塞、橐他塞、广地塞的部遂设置和肩水塞部分机构与人员驻地及其移动情况，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30]贾丽英发

表了《里耶秦简“产子课”及“徒簿”反映的徒隶生活》一文，认为里耶秦简“徒隶产子课”“春产子课”是对徒隶生育率的核查，显示此时徒隶的生活状态与后世“诸妇人在禁，皆与男夫别所”之罪囚的情形不同。隶臣、城旦、鬼薪身份的徒隶，既可有黔首身份的妻，也可有徒隶身份的妻，男性徒隶与女性徒隶之间确实存在婚姻关系。隶臣妾活动相对自由，或为庸取钱，或市贩得利。^[31]在简牍学研究方面，赵宠亮发表《新莽简牍所见数字特殊写法起始时间补议》。^[32]

在董仲舒研究方面，程志华发表了《关于董仲舒评价之评价》一文，认为历史上学界对董仲舒的评价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化。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评价均具有偏执。评价董仲舒应坚持“人文性”“历史理性”“学术界限”“开放性”四个原则。^[33]白立强、魏彦红发表《元机：董仲舒“贵元重始说”之公羊凭依及其理论开显》一文，认为“天、元”作为董仲舒哲学思想中的两个范畴具有内在统一性，其区别在于：天为结构性向度，元乃功能性向度。元既是天大化流行的无形之机，也是天之时空展现的内在动力，亦为天道轨制之大原。^[34]秦进才发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源流考》一文，从西汉罢、黜与罢黜字词的举例入手，考察其含义所指，探索“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变迁，探寻“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演变，探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词组的出现与传播。^[35]

在汉代文物研究方面，秦进才发表了《西汉群臣上麟刻石解疑》一文，对前人对西汉群臣上麟刻石的疑问进行了解疑。^[36]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

2022年，河北史学界发表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的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2部，涉及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教育史、史学史、文献整理等方面。其中，社会史研究成果较为集中。

（一）社会史研究

2022年，谷更有、王文兵合作推出了专著《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研究》，显示出作者研究视角从较宏观意义的乡村社会向微观意义的村落的聚焦。该书选取“村落”和“乡村治

理”两个关键词，旨在分析以此为对象的历史世界，即“以村民自身为中心的历史世界”和“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世界”。作者指出，唐代以后，村落的家乡化和乡村的政治化是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从村落角度来看，家乡化使其成为村民的地缘共同体，宋以后因宗族性强化，很多村落还成为血缘共同体；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了强化赋役，破坏或利用村落共同体的过程。以往的研究更多地站在政权的角度，以观察者的身份，研究乡村社会和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和治理成效，但却忽视了生活于其中的村民的感受。如果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参与”的方法，深入村民的生活世界中，以他们的角度来认识当时的村落社会和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就会对当时的历史产生新的理解。^[37]

邢铁《唐宋时期家学传承研究》一书是作者研究家产继承问题的延伸。我国古代家学是家传的专门学问，最初专指经学，鉴于唐宋时期的历史实际，该书把家传的文学、史学和技艺也归入了家学的范畴。全书五章共25万字，王昊指出，该书主要内容与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梳理了唐宋时期的家学传承方式和地域、学科特征；其二，阐释了唐宋时期的家学传承在士庶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其三，归纳了唐宋时期家学传承过程中所显示的遗传规律。^[38]

佛教经典《金刚经》自被译出之后，便广受世人重视。张开媛指出，唐代社会对此经的关注度极高，延续了唐以前的《金刚经》信仰。唐代社会的《金刚经》信仰表现出较为世俗化的特点，各阶层人士对《金刚经》加以敬奉，信受、奉持、广为人说，将其视为佛教偶像，以求获得庇佑。唐人崇信《金刚经》，具有积极入世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金刚经》俗文学作品，即《金刚经》灵验故事集和《金刚经讲经文》。前者是记载《金刚经》护身功能的故事集，后者以片面化取义的方式，对《金刚经》经文做出世俗化解义。这两类俗文学作品均吸纳了入世观念，使唐人对《金刚经》的解义和使用从利身需求出发，关注生命、报应等来自个体的主观诉求，使《金刚经》在唐代的接受，体现出入世化倾向。^[39]

先秦儒家经典文本中的中原中心主义表现为强调“中国”的正统地位和对“夷狄”的排斥。

唐代文化观念开放，视夷狄为兄弟，不排斥四夷，但中原中心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退。吴淑玲指出，在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中，唐代诗人以中原中心为比照，写出了走向边域对中原士人内心的冲击：一是耳闻目睹的环境差异带来的异域感觉使士人体味到的与中原中心的疏离；二是远离熟悉的人际关系之后所带来的陌生、寂寞、恐惧和孤独；三是抛荒置远后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强烈的心理落差。^[40]

唐代藩镇在京置邸，称上都留后院。唐大历十二年（777）改为上都进奏院，为各州镇官员入京时之寓所，并掌章奏、诏令及各种文书的投递、承转。魏海岩等指出，唐代进奏院状报之读者由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构成。基本读者是诸道长官，扩散型读者包括诸道幕职人员，支郡、县的官佐，诸道长官门客等。状报读者群构成特点由中唐以后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读者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发挥有直接影响。在政治领域，状报基本读者数量少影响了诸道长官政治反馈的积极性和政治舆论的形成；在文化领域，读者构成制约状报成为诗歌创作新题材、民间修史的新史料。^[41]

（二）政治史研究

近些年来，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全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与之前主要侧重于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等层面相比，这一阶段体现向社会史转变的趋向。河北故事，又称河朔故事，它以节度使父死子继为核心，是河北藩镇区别于顺地藩镇的主要特征。冯金忠指出，张天虹所著《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一书广泛吸纳英语、日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较强的国际视野，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吸收社会学的方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在历史研究中，以社会流动为视角并非张天虹之首创，但将社会流动引入唐代河朔藩镇研究，并将其作为核心议题，加以系统全面阐释的，张天虹则是第一人。该书探讨河朔藩镇的社会流动，以被研究者的代际的仕宦升降为主要研究对象。该书社会学转向的另一大特色是量化分析（即所谓“描述性统计方法”），这也是该书在河朔藩镇社会流动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方面。^[42]

在“河北故事”研究方面，李佳哲从文本

起源的角度指出,“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43]

唐代武后时期的明堂乐章是唐代唯一付诸明堂祭祀实践的歌辞。刘万川、曹向华指出,它与唐朝之前及贞观时期的明堂乐章在篇章结构和措辞用语等方面均大不相同,其异变之处既是武后朝礼乐改制的体现,也是武则天出于政治上自我宣示的考虑。《皇嗣出入升降》这一篇章的增加,是武后集团与李氏集团斗争的体现;乐章结尾增加的宫、商、角、徵、羽等五音之章,也折射出武后不泥于古制、重视明堂布政功能的认知。武后明堂乐章与贞观时期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武后乐章曾在明堂祭祀中实际奏唱,而贞观时期未建明堂,乐章的创制纯为理论勾画。^[44]

(三) 经济史研究

土贡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和最高统治者进献土特珍品等财物的经济现象,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和最高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的。陈丽指出,土贡制度执行的好坏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相关联。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之土贡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土贡从体现统治者权威的象征,渐变为中央和地方争夺财政权力的手段,最后又回归皇权至上的工具。而唐宋时期地方土贡的发展恰恰见证了这一时期的变化。^[45]

(四) 民族史研究

吐蕃是唐代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政权,与唐王朝关系密切。唐后期吐蕃国力强盛,一步步侵蚀唐西部边疆,而征兵制度是保证其国势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张旭对吐蕃的征兵制度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汉文古籍中,吐蕃按户征兵的制度称为大调集。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mksham chen pho的字面意为大行政管理,具体行政措施包括清查户籍、制作户籍册和征调应募者等行政措施。吐蕃大行政管理的最后环节是按户

征兵,前期行政措施包括清查户籍和制作户籍册。^[46]

(五) 教育史

南朝时期各类思想交织复杂,玄学及佛学势力上升。吴洪成、张美玲指出,南朝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同时,兼及玄学、文学、史学、律学及数学的发展。中央官学教材以《三礼》《孝经》《论语》《周易》《毛诗》等儒家经学教材为主;私学除了采用儒学经典外,尤其重视道家学派和易经的教学;南朝蒙学教材《千字文》为教材史上的杰作。南朝教材呈现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化的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47]

(六) 史学史

温玉春指出,刘知几《史通·六家》将“诸史”的体例划分为了六家,贡献巨大,但不足之外也很多、很明显。首先,其划分对象是“国史(正史)”,但是“已有”还是“可有”,较为模糊;其次,其划分并非一次,而应是三次;最后,其划分结果有划分不充分、划分结果有遗漏、对本质概括不足的弊病。^[48]

(七) 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玉烛宝典》是隋代河北籍学者杜台卿编纂的一部岁时民俗文献。此书按月为次,详细记载了我国中古时期传统时令、民俗以及相关的文人诗咏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但《玉烛宝典》在国内约于宋元以后亡佚,幸赖日本保存有其书之古代钞本。包得义《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校证》一书以日藏《玉烛宝典》抄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研究,具体探讨《玉烛宝典》的著录与版本、结构特点、引书情况以及文献学、民俗学等的价值;下编为文献整理,比较分析日本尊经阁文库本、内阁文库本、依田利用考证本等古抄本和国内古逸丛书本之间的版本源流关系,选定质量较优者为底本,整理出了一个可供研究使用的通行本。^[49]

唐代墓志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价值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是一个宝贵的资料库。梁春胜等指出,唐代墓志中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他和刘日照合作完成的《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一文选取了25例加以考释。^[50]

2014年出土、2019年发布的唐代吴兴郡夫人沈和墓志看似寻常,但其中颇有不合常情之

处。其夫秦守一墓葬超越规格，亦令学界困惑。曾智安结合二者，在重新释读沈和墓志的基础上，认为其背后实则刻意隐藏着该家族和唐玄宗时期一段与宫廷斗争相关的政治背景，是为历史潮流中的一道独特水文。^[51]

四、辽宋金元明清史研究

2022年河北省史学界在辽宋金元明清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共出版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尤其在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方面都有重要成果推出，现择其大要，综述如下。

（一）经济与民族研究

关于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姜锡东认为宋代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对象、生产工具至少有45项发展，其中农业至少有15项，手工业至少有30项。宋代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超过前代，但也存在不少局限性。制约宋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7项，明清时期只有农业技术和热兵器2项超过宋代，其余5项没有重大突破。明清虽然在生产力总量、在技术上，特别是在种植作物引进上超过宋代，但因生产工具没有重大突破，甚至在重要工具上倒退，人口剧增，导致人均生产率和发展质量低于宋代，整个社会陷入停滞和保守状态。^[52]

关于宋代官户的活动范围，廖寅认为宋代城市的服务半径大概是三十里，这也刚好是城区与城外当天可以往返的距离。宋代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迁徙成为时代潮流。官户占有半程空间大部分土地资源，是官府主要的合作共治力量。同时，官户还占据社会领导权。半程圈外的官户则越来越少，使半程圈外某种程度上成为“揽户”和“土豪”的世界。^[53]关于宋元水晶问题，孙斌认为宋元时期的水晶产地主要在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西亚地区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其主要在中原王朝的宫廷和民间流通。水晶在宋元时期日常生活、居住装饰、医疗医药和宗教生活中均有广泛用途，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物资。^[54]

关于农牧业问题，王昊认为宋代江浙地区的蚕桑专业户集中在高地区域，对更多的普通农家来说，从事蚕桑丝织业是由于自然环境限制而不得已放弃粮食生产，向市场寻求出路，他们大多数仍是以维持基本生计为目的，与明清时期追求

利润扩大化生产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宋代江浙地区的蚕桑专业户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的高地，而明清则集中在自然条件优越的杭嘉湖平原一带。^[55]关于元代苜蓿种植，张英冉认为元代既有野生苜蓿大量生长，也有广泛的人工种植，大都等城市也种植苜蓿。元朝政府重视养马，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在元代得到了高度重视。养马业的发展，推动了官方苜蓿种植园与专职种植苜蓿的官吏出现，表明苜蓿的种植管理水平达到了新高度。^[56]关于元代的马政，朱建路指出元朝始终没有设立牧监养马制度，遇到战争往往从民间和买、拘括马匹，和买是给价钱，拘括即强制征收。由于南方马匹不适应北方气候，所以和买、拘括马匹主要在北方进行。和买、拘括马匹成为元朝马政的常态，俨然元朝政治的晴雨表，它抑制了民间养马，激化了社会矛盾，给社会发展带来恶劣影响。^[57]

关于货币问题，孙斌、姜锡东对西塞山钱币窖藏来源进行了探讨，指出西塞山窖藏出土金属货币来源不仅有鄂州军资库，还应包括湖广总领所贮藏的其他金属货币。南宋晚期，货币因战争而流通不畅、经常性贬值与军费的货币化税收引起了货币供需的不均衡，货币的供应量大幅过剩，大量金属货币退出流通领域、“沉淀”在政府管理机构中，这是西塞山得以累积巨量金属货币窖藏的主因。^[58]李金闯认为，宋代以绢帛为价值尺度来衡量经济犯罪中的赃值，并对照律条量刑定罪。铜钱和铁钱两种铸币与绢帛的折算价格有过多次调整，铸币与绢帛折价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物价变化的趋势。^[59]梁松涛利用《亥年新法》等资料，对西夏晚期禁止铜钱外流、销熔、过度储藏等钱禁问题进行梳理，认为西夏至迟在中晚期已广泛实行钱禁。与中期相比，西夏晚期的钱禁明显趋严，其原因主要与西夏周边民族关系的变化、频繁的战事及西夏经济的崩溃相关。^[60]关于金代军须钱，刘施伟认为金末战事不休，军费支出不断增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金朝政府采取了增加赋税的办法，军须钱成为重要税种。金末军须钱的敛财本质并未改变，且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百姓负担深重，更恶化了流民问题。^[61]

关于清代国家治理，杨泽宇认为清代常平仓发挥着储粮备荒、赈济灾民、借贷便农、平糶粮

价的重要功能。作为维护封建政权政治经济稳定的制度机构，常平仓的建设运转和功能发挥受到封建社会制度设置、管理模式、吏治情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也使常平仓的兴衰与清朝封建统治的兴衰相始终。^[62]同时杨泽宇还对长芦直隶总督对长芦盐务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清廷不断对长芦盐务的管理因时因地进行调整，从最初制度的探索，到直隶总督长芦盐政双轨管理模式的形成，到最后直隶总督总管盐务，直隶总督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屡次多变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咸丰十年（1860年）为管理模式变化的重要分水岭，既有时代的影响，也有清廷主观的意志。^[63]

关于新经济文献的研究，刘晓莹、孙继民对芷兰斋藏《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纸背文书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批康熙年间奏销册残件现存内容为部分县以及个别府的奏销情况，对研究清前期奏销册格式以及奏销制度运行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64]郭兆斌认为龙门账是在三柱式、“捞锅底”式和四柱式等中国传统结算方法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结算方法。当时商业活动使用的记账法仍是中国传统的收付式记账方法，并未产生西式复式记账法，商号依靠严密的簿记组织和体系来防止错讹、核查账务。^[65]高雪莹对《集宝册》进行了研究，认为《集宝册》反映了清代胜芳镇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口外、东北等六地粮食的长途贩运，共涉及水路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66]

关于民族史研究，杨永亮、于海指出在与中原社会的军事、经济活动中，北方游牧民族加深了对中原文明的理解，也逐渐学会了对中原文明进行评价，还进一步反思中原文明的优缺点，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近世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67]陈瑞青、吴玉梅对昔里铃部墓志铭中西夏文“大”字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宜解释为“大人”，而应译为“父亲”。昔里家族是长期生活在肃州一带的沙陀族，和我国古代呼父为“大”的区域相吻合。将西夏文“大”字释为父亲，不仅有助于理解墓志西夏文字的真实含义，而且丰富了西夏语料。^[68]朱建路对元末明初濮阳唐兀杨氏家族进行了研究，指出西夏遗民唐兀杨氏家族在元末分为两支，一支留居濮阳的杨崇喜避乱于大都，一边编订《述善集》，一边积极准备兴复崇义书

院；另一支其侄杨冀安曾任元朝固始县达鲁花赤，迁居宿州灵璧县，较早投降朱明起义军，后官至高位。在元明易代中，杨氏家族虽非勋贵，明哲保身，保持了家族文化不坠，是色目人融入新朝的一个样本。^[69]此外，朱建路还对正定元代《金公塔铭》进行了考释，指出包括《金公塔铭》在内，龙兴寺在至正六年（1346）八月刻立三块碑铭，撰文者为大食人，书丹者为蒙古人，篆额者为汉人，碑主为汉人或汪古人，体现了不同民族在真定的交流与融合，说明不同民族的僧俗之间、官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在元代北方是普遍现象。^[70]

关于清代民族问题，方玉权指出宗人府空室是清代对犯罪皇族执行圈禁之刑最重要的专门处所，其收纳对象在性别上绝大多数为男性，在群体类别上起初只针对宗室，雍正十二年（1734）才扩展至觉罗。宗人府空室的管理制度在雍乾两朝较为粗疏，此后逐渐严格，“监狱化”色彩渐趋浓重。清中后期，宗人府空室在管理上出现规章日益完善与实际运作愈加废弛的矛盾局面，造成其惩戒作用甚微。^[71]关于土尔扈特部人口问题，内玛才让认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被清政府安置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塔城、额敏、博罗塔拉（即今博尔塔拉）、伊犁等地。然而，接踵而来的痘疫、饥困、气候变化、复生痘疫等因素，致使彼时“人困马乏”的土尔扈特部众雪上加霜，造成人口减少。^[72]

（二）政治与军事研究

关于政治事件，汪圣铎考察了“元祐诉理”哲宗亲政后的否定、宋徽宗初期的肯定以及蔡京主政后的再否定过程，深化了对北宋后期政治认识，解答了“元祐党籍”中为何纳入许多非元祐党人的疑问。^[73]

关于宋代职官，廖寅、李大秀认为宋代社会同时存在着“平民化”与“泛官化”两种趋势，大约从徽宗朝开始，进纳、军功等假官逐渐增多，到南宋更是泛滥成灾，富人基本上都拥有假官头衔，呈现出“泛官化”的趋势。宋代社会泛官化的内在动力是社会垂流加速，外在动力则是官场“过呼”风气的诱导、蔓延。^[74]关于宣徽使，廖寅、荆鹏超认为北宋宣徽使看起来既像本官，又像职名，还像差遣，这种怪诞表象

源自唐宋制度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多种内在矛盾。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怪胎，既没有像多数内诸司使那样阶官化，也没有像枢密使副、三司使那样差遣化，同时还带有较为浓厚的“旧时代”皇帝私家属性，可说是始终彷徨于新旧之间。^[75]关于察访使，芮丰认为熙宁年间新设察访使，负责到各地检查督促新法执行。察访使的设置背景和时间从侧面印证了变法重心从制定法规向地方实践的转变，其区域差异化的职权特征表明了变法中不同区域变法推行程度的差异。^[76]关于体量安抚使，芮丰、钱毓山认为体量安抚使作为派遣专使的一种，始于宋仁宗时期，主要负责赈济灾民、安抚地方等政务。在特殊条件下，体量安抚使也有监察、统军等权力。体量安抚使的职能同安抚使较相似，但体量安抚使设置更随机，在设置地域上差异也较大。^[77]

关于辽、夏、金职官，肖爱民认为辽朝早期诸帝举行柴册礼后上尊号，而景宗以后诸帝则依汉制即位时便上尊号。相对于谥号和庙号，辽人较为重视尊号。圣宗以后的尊号中都有“孝”和“天”字，前者反映了辽中期以后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后者反映了“神道设教”、君权神授的政治内涵。^[78]关于金代六部尚书，张又天指出金代六部尚书是分掌六部事务的长官，其兼官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金朝的政治特色。金初六部尚书的兼官情况带有深刻的“女真旧俗”烙印，反映出金初六部体制发展的不完善。在官制汉化改革逐渐完成和内部局势趋于稳定后，金代六部尚书的职权实现正常化，此时的金代六部尚书兼官现象可分为“量才而授”和“品职分立”两大类型。^[79]

关于西夏职官，梁松涛、周龙龙对西夏“安排官”进行了研究，指出“安排官”为西夏经略司属官，除负责对客商敕禁物的搜检外，还参与对地边官财物及地方司法事务的管理。西夏榷场的职官设置有：榷场使、安排官、拘榷官、巡检、管勾、大小局分等，西夏经略司对榷场进行直接管理，经略司在地边官财物的运转上有着重要作用。^[80]周云飞对西夏三司法度文书进行了研究，指出文书的内容是西夏天庆年间三司因人员缺乏需从地方抽调以办理公务等事宜，是中书发予地方的下行文书。这件文书有利于明晰西夏中后期中央与地方机构间都案、案头的抽调迁转

等问题，为研究西夏官吏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81]陈瑞青、郭兆斌对西夏编甲文书进行了研究，指出文书反映的西夏军抄编甲，既不同于乡里组织中的里甲制度，也不是军队中的军事编制单位，而是西夏军队季校时，按照十抄一甲原则，编成的过录单位。^[82]

关于明清制度史，时亮认为吏部司官是明代吏部官员群体的主干和中坚力量，其选任与迁转特点鲜明，富于规律。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的最大特点是多于本部内升用，且吏部司官本部内迁转规范有序，大致依次在吏部稽勋、验封、考功、文选四司内，按司官各级职务主事、员外郎、郎中循次迁转；由其他衙门转任者、迁往地方者，亦有规律可循。文选郎中与稽勋主事作为吏部司官头尾，前者的迁出与后者的迁入在本部内空间有限，故拥有不同于其他吏部司官的特点。^[83]章豪指出为限制中书省权力，朱元璋采取设置通政使司等系列举措。洪武十三年（1380），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坐谋逆死，朱元璋随即撤销中书省并永久废除宰相制度。虽然中书省在明初仅存续了16年，但期间官员的升降、变动乃至中书省自身的权力变化都与“星过文昌”这一异象有所关联。朱元璋废除中书省是其权力膨胀的必然结果，而在此过程中，天象起了导火线的作用。^[84]屈斌指出清廷对番地的行政治理经历了一个从“汉化”式的行政变革到专管专辖的“分治”变化过程。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对汉、对“藩”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一项独立的治理政策。也正因为此，嘉庆年间青海办事大臣与陕甘总督及其地方官员围绕“厅”的监管权陷入持续的权责之争。^[85]

关于法制史研究，任一乐指出宋代规定儿童是指15周岁以下的人，他们在定罪量刑和接受惩罚时享有很大的受优待权，年龄越小的儿童享受的优待越大。宋代遵循前朝优待儿童的惯例，对犯死罪的儿童很少适用死刑，更多的是用罚铜代替。官府对儿童减免刑罚的相关举措是宋代法制文明建设中“轻刑化”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关注弱势群体的儒家仁爱思想。^[86]关于宋代缓狱制度，张高彬指出宋代规定或要求各级司法机构暂缓审理和执行，这种现象可称为“缓狱”。缓狱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迎合

天道、维护统治、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司法中的明德慎刑、礼法相合的特点。^[87]关于宋代狱空奖谕制度，严兴认为北宋中前期以前对狱空的奖励方式主要为“降诏奖谕”，不涉及实物奖励。自神宗元丰三年（1080）王安礼狱空事件后，政府对取得狱空政绩的有关人员进行分等奖励，奖励涉及降诏、转官和实物三个方面内容。徽宗时期通过滥赏鼓励官员造成狱空，导致了徽宗朝的狱空密集化现象。南宋立国以后，对狱空的奖励逐渐回归到学士院降诏奖谕的模式，转官和实物奖励逐步退出狱空的奖励内容。^[88]

关于军事战略研究，张静认为澶渊之盟后，辽对北宋的驻防成为常态，在辽宋边境驻防的军队数量大、种类多，保障了辽朝的国家安全，是其边防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89]王晓龙、侯天霖认为陈桥兵变主要凭借殿前司军队发动，侍卫亲军被裹挟加入，并非全军一致的行动。兵变行动过程曲折复杂，只是因为顺应了五代以来军士骄悍之气才得以成功。建立北宋后，赵匡胤调整军制，抑制武将，加强军队控制，基本结束了五代以来“以兵威强制天下”的混乱局面。^[90]

关于军事制度与管理，王青松对“提举兵甲巡检公事”进行了研究，指出“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是宋代特有的军事职官，其机构为提举兵甲司。该职创立于太宗时期，成形于真宗时期，一般由重要州府长官兼任，负责对内弹压，侧重维持治安，即所谓“专捕盗贼”“专督盗贼”。其管辖范围在州府之上，有的是路级军事机构，也负责数州军事事宜，对辖下都监、巡检、县尉、使臣，均有统领管辖权。提举兵甲巡检公事不是巡检，而是高于巡检的军事职官设置。^[91]田锦茂、贾文龙指出，宋代军用符节制度既继承了前代相关制度，又在“重文轻武”的时代氛围中多有创举。宋代军用符节主要有调兵符、传符和门符三类，这些符节是宋代皇帝剥离将领的调动指挥权、保证军中通信的秘密性、维护重要地点和场所安全的重要手段。^[92]

关于明代军事制度，宋坤对新发现的嘉靖年间西安府所辖各州县攒造的三类勾军回答文册进行了研究，认为明中后期不同州县对同一类回答册的登载文式存在不同。地方里老在勾军过程中，需要承担信息清查、根捉逃军、解卫补伍等

一系列最基本、最繁重的工作。明中后期对逃军的根捉主要由军士原籍所在地的里长、亲邻、佃户负责，且可跨府根捉逃军。^[93]章豪认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捕鱼儿海之战前，明廷在沿边地区设立了大量卫所，分属山西行都司、北平都司、大宁都司统辖，这些卫所多位于长城外，与洪武五年（1372）之前所设卫所相比更凸显了“防边”的作用。与洪武五年（1372）岭北之役前“大开大合”的北伐策略相比，岭北之役后明廷对北边的经略方式应属“保守的经略”。这种保守、稳固的边防战略为明廷经略辽东、降服纳哈出、捕鱼儿海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4]程彩萍认为明代以卫所制度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军有定额的军事体制，然而随着军户世袭制的废弛，军人大量逃亡，卫所士卒出现了严重缺额。明代中后期在九边兴募兵制，招募对象中有一类为土人。土兵具有天然的作战优势，又有保护家园的迫切愿望，其招募最先盛行于陕西一带，后扩展到辽东。由于明廷往往选其精锐编入卫所，原来为土民者被迫脱离土地，甚至远赴别卫、背井离乡，由此引起土人不满，自愿应募者减少。加之训练无素，导致土兵战斗力下降，未能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最终“辽人守辽土”“土人守边”的设想落空。^[95]

关于清代水师研究，王宏斌、张军桥认为清代福建沿海六府无不按照朝廷旨意，严格划分了内洋与外洋，明确了水师官兵的水陆汛地。按照划分标准，凡是邻近海岸和内河的水域，以及邻近设立府厅县机构或重要驻军的岛屿岛岸的水域，均划入中国的内洋或外洋，纳入地方文官、水师官兵的行政或军事管辖范围。^[96]王宏斌还指出无论是御史巡台制度还是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对于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各有特点，但就加强政治控制来说，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比御史巡台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97]

（三）思想与文化研究

吕变庭主编的《燕赵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萃编·宋元卷》2022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全四册，350万字，收录宋元时期燕赵大地科技文献，涉及宋元名家宋敏求、刘完素、李杲、王好古等人的相关著作及注释研究成果，汇总同一专题文献出版，便于本领域研究人

员的使用。^[98]

贾文龙、王晓薇主编《出土宋代砖志辑释》一书2022年11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宋代墓砖284种,其中北宋276种,南宋8种。所收砖志依逝者卒年和葬年的时间为序,下以解题形式简要介绍墓砖名称、文献形态、卒葬时间、文献著录、出土情况或收藏地点等相关信息,并对拓片加以释文、标点,辅以简要注释。出土宋代砖志,信息丰富,形式多样,为研究宋代人物、行政区划、军队番号、社会救济制度等提供了宝贵数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99]

梁松涛、王晓龙主编《出土宋代买地券辑释》(全二册)一书2022年11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两宋时期买地券268种(其中北宋129种、南宋139种),买地券拓(图)片280张。所收买地券根据逝者卒(葬)年的时间为序,下以解题形式简要介绍墓砖名称、文献形态(含书法字体和行数字数等)、卒葬时间、文献著录、出土情况或收藏地点等相关信息,并对拓片加以释文、标点,辅以简要注释。该书为研究宋代人物、行政区划、丧葬风俗、民间信仰和地域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00]

关于史学思想,崔壮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一则以五代相续为正统;一则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一则以五代为闰统或无统;一则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一则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01]时培磊、纪海龙认为,《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的编纂大量采择了墓志碑铭、私人传记和地方志书等材料。在编纂环节,史官采取增补、回避、阐幽发微、订正讹误等方法,使得文臣传在行文方面比史源材料更为端方谨严。在人物评价方面,虽受史源影响,但文臣传不主一家之说,力求全面公允。透过文臣传的编纂可知,明朝实录的纂修,对于民间史学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102]关于清代学者戴震“背师”问题,乔志忠认为戴震曾经拜江永为师,江永在天文历算学

上有极高造诣,推重西学,不同意“西学中源”之说,受到当时学界主流的排斥和冷落。戴震于乾隆十九年(1754)进京之后,将从江永处学到的天文、历算等知识,反用于阿附“西学中源”说,投靠主流学界和官方以谋求名利,做出许多践踏学术底线的行为,这是无可辩解的背师行径。^[103]

关于明史编纂,南炳文、张磊认为清官修《明史·西域传》中列有专传的“沙哈鲁国”,竟是子虚乌有。许多明清权威史籍不记其国,而且有确凿的资料证明《明史》及若干史籍认定的“沙哈鲁国”所在的两个地址本身即不能成立,那里的政权名称一清二楚。《明史》及若干史籍对“沙哈鲁国”的误记,其由来和形成的具体过程亦有迹可循。^[104]同时,南炳文、张磊还指出张明鉴和张鉴是元明之际的两个历史人物,先后归服于朱元璋部下。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存在对二人抑扬不当的书写误差。在清官修《明史》中,也存在将二人误为一人的错误记载。^[105]

关于宗教,鞠贺指出菩萨信仰在辽朝极为流行。尽管八大菩萨的形象经常组合出现,但在辽朝的菩萨信仰体系中,以观音、弥勒、普贤、文殊和地藏五位菩萨为主。诸菩萨信仰的流行程度,与其本身的宗教意涵、佛教信徒的精神追求以及部分佛教经典的流布情况关系密切。而由于密教兴盛,辽朝菩萨信仰还体现出明显的密教化倾向。菩萨信仰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辽朝佛教义学的发展,并在信徒间形成了践行“菩萨道”的风气。^[106]张重艳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北宋端拱二年(989)西行僧人智坚文书进行了研究,指出为了弘扬密宗菩萨戒,年仅24岁的智坚西行,路经敦煌,将密宗菩萨戒修行仪轨和受斋仪轨传授给敦煌受菩萨戒僧人和居士。^[107]

冯金忠、张帅利用阻原《聚圣岩公据》对金代全真教在河北的传播进行了研究,指出至晚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全真教已在河北北部传播,其传播区域呈现多向度分散特点。^[108]同时,冯金忠还利用高阳碑刻对清季民初的天地门教进行了研究。^[109]关于医药史,杨小敏认为在宋代及以前的社会发展中,药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才获得了比较稳定的行业地位。特别是在宋代,无论是固定在城镇商业街区的“药家”“药

铺”，还是流动贩卖生药的“市人”，都得到了官方的政策鼓励和医家的专业关注。药商与医家、药家的相互联结，表明中国古代的“医药分家”实际上是分家而不分业。药商作为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润滑剂”，至宋代形成了既与医药家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自我发展之路。^[108]黄超群认为，西夏时期的医药用具有度量衡器、制药器、贮盛器、服药器和治疗器五类，这些器具根据其使用特点由不同的材质制作而成。西夏对医疗器具的使用虽多与宋同，但从品质、数量、种类来看，其与中原地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医学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状况。^[109]周云逸认为，《伤寒蕴要全书》对伤寒的探讨，以症类证、以方相从，代表了明代中期伤寒类证研究的最高水平；对时疫的病因、症状及治法的阐释，已开吴又可《温疫论》的先声。该书列有专篇阐释 198 种伤寒药物，开创了伤寒专科本草的新领域，对其后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明代本草专书有着广泛的影响。^[110]

(魏建震：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金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研究员；
陈瑞青：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戴建兵.中国环境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 [2]董劭伟等.《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A].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3]康振海.燕赵学术思想史·辽宋金元(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康振海.燕赵学术思想史·明清卷(中)[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
- [4]戴建兵等.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1.
- [5]许倩.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3-1.
- [6]沈长云.黄帝的史迹、形象及其演化[N].光明日报,2022-5-7.
- [7]张渭莲,段宏振.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对应须谨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0-24.
- [8]沈长云.寻找夏朝——夏代史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9]沈长云.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J].齐鲁学刊,2022(1).
- [10]沈长云.也谈义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6-23.

- [11]张怀通.《世俘》与武王献俘盟誓典礼[J].古代文明,2022(3).
- [12]张怀通.克钟与清华简《撮命》“伯摄”职责考论[J].晋学研究,2022(11).
- [13]何艳杰.赤狄新考[J].殷都学刊,2022(1).
- [14]马立志.春秋梁国史补考三则[J].古文字研究,2021(00).
- [15]洪猛.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及其族属[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16]沈长云.从战国长城的修建谈到华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17]张渭莲.东周赵国的埋葬制度[A].述而作论: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22.12.
- [18]陈晨.《诗》简读札三则[J].简帛,2022(2).
- [19]许春华.“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J].哲学研究,2022(6).
- [20]许春华,王欣.“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21]许春华.“诗”与“儒”——荀子论诗思想旨趣探奥[J].燕山大学学报,2022(6).
- [22]许春华.“闻”:“乐”与“仁”的对接及境界形态——论孔子儒学“哲学的突破”的多样性[J].社会科学战线,2022(12).
- [23]秦飞.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J].东岳论丛,2022(11).
- [24]秦飞.浅论孔子之道及当代启示[A].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第六辑),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25]李振纲.《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26]王素芬.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27]李振纲.论荀子哲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J].管子学刊,2022(1).
- [28]刘振英.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J].衡水学院学报,2022(1).
- [29]聂民玉.《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生成“三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30]丁义娟.肩水金关汉简法律资料辑录与研究[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31]贾丽英.里耶秦简“产子课”及“徒簿”反映的徒隶生活[J].文史,2022(4).
- [32]赵宠亮.新莽简牍所见数字特殊写法起始时间补议[A].简牍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22.
- [33]程志华.关于董仲舒评价之评价[J].衡水学院学报,2022(6).
- [34]白立强,魏彦红.元机:董仲舒“贵元重始说”之公羊凭依及其理论开显[J].孔子研究,2022(5).
- [35]秦进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源流考[J].秦汉研究,2022(1).

- [36]秦进才.西汉群臣上醮刻石解疑[J].邯郸学院学报, 2022(1).
- [37]谷更有,王文兵.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38]王昊.唐宋家庭家族史研究的补阙之作——邢铁教授《唐宋时期家学传承研究》评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39]张开媛.唐代《金刚经》俗文学作品的入世倾向[J].邯郸学院学报,2022(3).
- [40]吴淑玲.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J].中原文化研究,2022(5).
- [41]魏海岩,彭翠,宋伟龙.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构成特点及影响[J].国际新闻界,2022(7).
- [42]冯金忠.“河朔故事”研究的社会学转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1-12.
- [43]李佳哲.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6).
- [44]刘万川,曹向华.武后明堂乐章异变与武周政治[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45]陈丽.地方土贡在唐宋时期的变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2).
- [46]张旭.吐蕃按户征兵制度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3).
- [47]吴洪成,张美玲.南朝学校教材初探[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48]温玉春.论刘知几《史通·六家》对史体的划分[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49]包得义.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校证[M].成都:巴蜀书社,2022.
- [50]梁春胜,刘日照.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51]曾智安.新出唐代吴兴郡夫人沈和墓志释读订正发微[J].华中学术,2022(3).
- [52]姜锡东.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J].中国社会科学,2022(7).
- [53]廖寅.空间与权力:环城半程空间与宋代官户的活动展开[J].社会科学战线,2022(12).
- [54]孙斌.巧夺天工,灼灼其华——宋元时期水晶的产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J].宋史研究论丛,2022(1).
- [55]王昊.宋代江浙蚕桑专业户生计探略[A].魏明孔,戴建兵.中国经济史评论[C].2022年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56]张英冉.元代苜蓿发展初探[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9).
- [57]朱建路.元朝和买、拘括马匹及其社会影响[J].经济社会史评论,2022(2).
- [58]孙斌,姜锡东.从西塞山钱币窖藏看宋蒙(元)战争对南宋货币经济的影响(1234—1279年)[J].历史教学,2022(1).
- [59]李金闯.论宋代以绢计赃的折价变化[J].宋史研究论丛,2022(1).
- [60]梁松涛.西夏中晚期的钱禁[J].西夏研究,2022(4).
- [61]刘施伟.论金末军须钱的征收[J].辽东学院学报,2022(4).
- [62]杨泽宇.论清代常平仓与国家治理[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6).
- [63]杨泽宇.从“兼管”到“兼任”:论直隶总督对长芦盐务管理模式的转换[J].荆楚学刊,2022(2).
- [64]刘晓莹,孙继民.纸背文书所见清康熙二十三年江西奏销册初探[J].邯郸学院学报,2022(3).
- [65]郭兆斌.龙门账性质及起源新探[J].邯郸学院学报,2022(1).
- [66]高雪莹.清代民国时期胜芳镇粮食转运研究——以《集宝册》为例[J].邯郸学院学报,2022(1).
- [67]杨永亮,于海.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J].宋史研究论丛,2022(2).
- [68]陈瑞青,吴玉梅.西夏“父亲”的另一个称谓——从小李钤部墓志铭谈起[J].西夏研究,2022(3).
- [69]朱建路.元末明初濮阳唐兀杨氏家族事迹考略[J].西夏学,2022(1).
- [70]朱建路.《金公塔铭》所见元代北方的民族交往与交融[J].西夏研究,2022(4).
- [71]方玉权.“皇族监狱”:清代宗人府空室考论[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10).
- [72]内玛才让.试析乾隆朝土尔扈特部东归后初期人口减少的原因[J].西部蒙古论坛,2022(2).
- [73]汪圣铎.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J].江西社会科学,2022(4).
- [74]廖寅,李大秀.论宋代社会的泛官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22(6).
- [75]廖寅,荆鹏超.彷徨于新旧之间:北宋宣徽使新论[J].江西社会科学,2022(3).
- [76]芮丰.衔命而出:北宋熙宁察访使再研究[J].西夏研究,2022(2).
- [77]芮丰,钱毓山.北宋体量安抚使考论[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22(6).
- [78]肖爱民.辽朝皇帝尊号的特点及辽人重视尊号原因探析[J].宋史研究论丛,2022(1).
- [79]张又天.金代六部尚书兼官现象考论[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22(4).
- [80]梁松涛,周龙龙.再论西夏的“安排官”[J].中华文史论丛,2022(3).
- [81]周云飞.西夏三司法度文书再研究[J].西夏学,2022(2).
- [82]陈瑞青,郭兆斌.西夏军抄“编甲”问题辨析[J].西夏学,2022(2).

- [83]时亮.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特点考论[J].历史档案,2022(2).
- [84]章豪.“星过文昌”与明初中书省的人事变动及机构调整[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6).
- [85]屈斌.“厅”与清代中期甘边番地治理政策的演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1).
- [86]任一乐.宋代儿童犯罪治理析论[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22(1).
- [87]张高彬.急中有缓:宋代缓狱初探[J].西夏研究,2022(2).
- [88]严兴.宋代狱空奖谕制度变化探析[J].西夏研究,2022(2).
- [89]张静.辽对北宋驻军防御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22(2).
- [90]王晓龙,侯天霖.陈桥兵变与宋初军事政策的转向[J].军事历史,2022(5).
- [91]王青松.宋代军事职官“提举兵甲巡检公事”初探[J].军事历史,2022(5).
- [92]田锦茂,贾文龙.兵中秘钥:宋代军用符节管理制度研究[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2(6).
- [93]宋坤.明代州县勾军问题的新认识——以新发现明嘉靖年间西安府勾军回答册为中心[J].军事历史研究,2022(5).
- [94]章豪.岭北之役后北边卫所设置与关外经略[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22(1).
- [95]程彩萍.明代北边士兵的招募及其生存境况[J].历史档案,2022(1).
- [96]王宏斌,张军桥.清代福建内外洋考[J].社会科学研究,2022(4).
- [97]王宏斌.清代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考[J].台湾历史研究,2022(1).
- [98]吕变庭.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典籍萃编·宋元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
- [99]贾文龙,王晓薇.出土宋代砖志辑释[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
- [100]梁松涛,王晓龙.出土宋代买地券辑释[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
- [101]崔壮.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J].史学理论研究,2022(1).
- [102]时培磊,纪海龙.《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编纂探析[J].史学史研究,2022(2).
- [103]乔治忠.戴震“背师”问题析论[J].史学月刊,2022(12).
- [104]南炳文,张磊.清官修《明史》一个极其重大的失误——该书《沙哈鲁传》所载其国子虚乌有[J].史学集刊,2022(3).
- [105]南炳文,张磊.张明鉴、张鉴的身世及《明史》误记为一人之教训[J].烟台大学学报,2022(5).
- [106]鞠贺.辽朝菩萨信仰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5).
- [107]张重艳.再谈北宋智坚的菩萨戒[J].西夏学,2022(1).
- [108]冯金忠,张帅.金代《聚圣岩公据》碑所见全真教在河北北部的早期传播[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109]冯金忠.清季民初天地门教在河北的传播[J].社会科学论坛,2022(5).
- [110]杨小敏.“医药分家”与宋代及以前药商的行业身份演变[J].宋史研究论丛,2022(1).
- [111]黄超群.西夏医药用具考[J].西夏研究,2022(1).
- [112]周云逸.明代太医吴绶《伤寒蕴要全书》的医药学贡献[J].中医药文化,2022(3).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王坚

2022年河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平稳进展,在各子学科、若干专题上研究更为细化,更加注重学术影响、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范式的变化。特别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作序的“新时代重大文化工程、出版工程”《复兴文库》,河北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也参编其中。这不仅提升了河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而且体现出新时代河北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学术使命与担当。

一、政治史研究

(一) 政治运动与思潮研究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

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复兴文库》作为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由习近平总书记作序。该文库全面梳理和精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系统反映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它的出版,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吉庆编《复兴文库》第一编第二卷《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诉求》^[1],认为,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双重刺激下,广大农民为求生存进行了不懈抗争。抗击外

国侵略和反对统治阶级压迫的思想意识，在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等重大事件中，较为集中和系统地展现出来。从其形式和内涵看，既有传统思想意识的延续，也有一些缓慢生长的新因素。

农民群众在“夷夏之辨”“守望相助”“家国一体”等传统意识影响下，先是自发抗击外国侵略者，而后跟随士绅反对西方文化的对华渗透。义和团运动时期，他们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试图形成官民一体抗击外敌侵略的局面。因自身的阶级局限与知识贫乏，农民的反抗多掺杂着以符咒防身护体等非理性的愚昧倾向。在反抗统治阶级压迫方面，农民群众在官逼民反、吊民伐罪等意识的作用下，多用宗教语言表达其社会政治理想，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同时也表达了建立理想社会的政治憧憬。

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深化和中国社会日渐趋向近代化，农民群众的思想也在与时俱变。《资政新篇》为人们绘制了一幅内蕴近代资本主义价值、有别于传统农民理想的崭新蓝图。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和对外交往方式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化和风俗方面也显现出趋新务实的意向。而20世纪初期的农民思想变动，则因应了新的时代发展潮流。

（二）政治人物研究

李鸿章、张之洞是晚清时代的重要人物，影响甚巨。董丛林辑录了李鸿章致家人的书信百余封，并进行释读与评析。所录书信以李鸿章给哥哥李瀚章、儿子李经方的书信为主，以时间顺序排列。书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军务、政事、家事。通过这些家书，我们能够察识晚清的军务政务、朝局国事、官场情状。每封书信后增加“释读”文字，对书信大意和所涉重要人、事进行解读。文献严谨翔实，释读内容丰富可信。^[2]董丛林考察了张之洞的“书生”习性与“儒臣”风格，认为，张之洞经不止一任外省考官和学政历练，回到京师后又成为“清流”先锋。光绪七年（1881）冬被授山西巡抚，开启了其疆吏生涯。在他初任晋抚的谢恩折中，因有“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的语句而备受奚落和讽刺。及至“庚子议和”，又因事被李鸿章指斥其“书生之习”不改。张之洞闻知后大为光火，激愤地以“中堂习气”反讽李氏。刘坤一等人从中

斡旋，张之洞久不能平。此乃“官书”所载，无可置疑。由此又衍生出诸多传闻，虽所述具体情节有异，但大旨上也基本相符。考其实际，张之洞终为“儒臣”的风格始终未变。^[3]

董丛林还对晚清“东南互保”进行了考察，认为，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等势力，一方面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恐惧之极。他们在列强的诱致下，以“保全疆土”为幌子，通过“东南互保”转变为列强在华有用且得力的工具。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方数省。为阻止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蔓延至自己的辖区，损害自身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美等列强相互勾结，达成所谓“互保”意向。所谓“东南互保”，名义上是稳定当时中国南方局势，本质上是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它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将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了遭受多重压迫的深渊。^[4]

张军桥对清朝同治年间将领荣全与索伦营的回归和安置进行了考察，认为，清同治时期新疆动乱波及伊犁，索伦营溃散“俄军侵占区”，荣全受命负责索伦营收拢、回归与安置。荣全边与俄交涉边清除乱匪，为索伦兵民回归扫清道路。期间，荣全多次与清廷及边疆大臣筹商。受军事、地理条件、民族关系、地方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先后选择伊犁“边境”、图尔根河、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布尔滚、布伦托海、阿尔泰山南等作为安置地。思想经历了就近整防到准备日后收复的变化。面对俄国多次胁迫和拉拢，索伦兵民坚决拒绝，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安置地“苇塘子”，体现出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5]

（三）晚清、民国改制研究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列强用鸦片贸易打开了中国大门。但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毒品走私贩运活动越来越猖獗，跨国毒枭越来越多。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认为，利用合作机制实现国际信息及时交换，可以更好地满足各国禁毒的诉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制定和签署《禁止非法贩卖麻醉品公约》。王宏斌对《禁止非法贩卖麻醉品公约》的起草与签订进行了考察，认为，该公约第一次把非法制造、持有、供给、兜售、分配

和购买麻醉品等行为规定为毒品犯罪。这是国际禁毒立法史上一项重大的突破,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禁毒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6]

清朝收复台湾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王宏斌对清代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进行了考察,认为,御史巡台制度出现于1722年,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终结于1885年,1788年初则是二者转换的节点。御史巡台制度实施了66年,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执行了97年。无论是御史巡台制度还是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对于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各有特点,但就加强政治控制来说,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比御史巡台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7]

为维护国家水域安全,清代对领海划分出“内洋”“外洋”不同区域,并设立各具特色的管理机构,其中问题错综复杂,很多未经厘清。王宏斌对晚清“外洋”词义嬗变之历史学解析进行了考察,认为,重要概念词义之嬗变蕴藏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动因。清人使用中国管辖之“外洋”一词,通常与外国战船侵入、海匪活动猖獗、海难救助和水师巡洋活动等相关。通过考察晚清与之相关的事件和活动,可以发现,中国管辖之“外洋”在《清实录》中使用频率的减少,与晚清水师职能之蜕变存在某些关联。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中国管辖之“外洋”词义之嬗变,又与西方领海观念的输入和传播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8]

王宏斌、张军桥还对清代福建内外洋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如同沿海各省一样,清代福建沿海六府无不按照朝廷旨意,严格划分了内洋与外洋,明确了水师官兵的水陆汛地。按照划分标准,凡是邻近海岸和内河的水域,以及邻近设立府厅县机构或重要驻军的岛屿岛岸的水域,均划入中国的内洋或外洋,纳入地方文官、水师官兵的行政或军事管辖范围。^[9]

赵鲁臻以明末清初火器发展的衰落为背景,通过具体的战役、战斗、演习等案例,充分结合相关战术学知识以及军队建设、训练理论,对于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晚清军队战术、训练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与分析,尽可能还原出湘军、淮军与新建陆军这些晚清重要军队的战术训

练细节。他还运用各种图表详细梳理、分析了晚清湘军、淮军与新建陆军学习“西器”“西法”之后所发生的战术及训练上的变化,并且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探究了晚清中国军事落后以及军事现代化步履维艰的思想文化成因。^[10]

刘宏对庚子年间《辛丑条约》谈判中列强的武力恫吓进行了考察,认为,在1900—1901年庚辛议和谈判中,列强始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其中,武力恫吓又与“惩凶”、赔款、停止科举考试等议题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揭露了德英等列强在议和谈判中实施武力征服的凶横与残暴,揭示了列强武力征服对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11]

二、抗日战争史与解放战争、共和国史研究

(一) 抗日战争史研究

把增强对中共与普通民众的勤务抗战进行了考察,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政策的感召下,广大民众踊跃奋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作为广大民众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呈现方式,战时勤务虽更多的是一种幕后工作,却因其遍及男女老幼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在中共赢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足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抗战”。同时,由根据地有关村庄记录的支差勤务账册等资料可以显见,战勤工作堪称抗战时期中共群众路线成功实践的鲜活例证,并以其在“需求——组织——落实”运转中所彰显的“正义之战”力量,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12]

郭晓辉、肖红松对日伪的华北粮食统制进行了考察,认为,粮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日本自局部进犯华北至战败,对华北粮食的统制经历了“日满华经济提携”指导下的农粮调查、“增棉保粮”政策下的粮食开发及贸易统制、“重点开发”及封锁掠粮、服务“决战体制”下的行政收买及武装掠粮四个阶段。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本质是维持华北沦陷区的“兵站基地”作用。日伪对粮食进行殖民性开发、劫掠式收购、差别式配

给,掠夺强度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囿于华北农情实况和各界抗争现实,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结局。^[13]

张永刚以晋察冀边区阜平县为中心对抗日根据地的公安工作进行了考察,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为了保障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公安工作。阜平县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长期驻地,其公安工作运行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决定了锄奸反特必然要成为公安工作的中心任务。为了更好完成这一任务,根据形势变化,阜平县逐步构建起专业性 with 群众性相结合的公安工作队伍,以检查、调查、武装拘捕、政治感化与转化等不同手段来防范应对奸特活动,并对群众开展锄奸教育。此外,阜平县牢牢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不断充实公安干部队伍,建立健全加强党的领导的相关制度,并持续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差。这些举措有力打击了奸特活动,维护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为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4]

郑立柱对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戏剧进行了考察,认为,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戏剧,在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中具有独特优势,对动员民众支持、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边区戏剧的独特优势和巨大作用,源于其革命、娱乐、艺术的多重属性。革命属性,决定着晋察冀边区戏剧应服从和服务于现实需要,成为中共革命的有力推手;娱乐属性与革命属性相互依存、交融共生,但也存在着相互排斥一面;戏剧的艺术价值与革命属性如何取舍,二者关系如何处理,在晋察冀边区长期存在分歧和争论。总体而言,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晋察冀边区戏剧在高扬着革命主旋律的同时,也兼顾了戏剧的娱乐属性和艺术价值,使革命、娱乐、艺术三重属性维系着某种程度的动态弱平衡,从而使其在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工作,为中共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15]对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戏曲改革与民众动员,郑立柱认为,全面抗战初期,由于与民族战争的形势格格不入,被称为“旧戏”

的传统戏曲曾一度受到排斥。但在抗战动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文艺界逐渐认识到戏曲在民众动员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开始了对传统戏曲的利用、改革与创新,抗战戏曲开始出现。最初的抗战戏曲,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采用旧的形式而渗入新的内容,虽满足了抗战动员的需求,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为解决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边区戏剧界开始整理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抗战戏曲进入“新瓶装新酒”阶段。抗战戏曲在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配合与推动了各项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民众的思想教育与政治动员。在抗战戏曲蓬勃发展、影响日渐深远的同时,传统戏曲依然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二者在晋察冀边区的博弈也是随处可见的。^[16]

张瑞静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教育政策进行了多维思考,提出,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都是穷乡僻壤,教育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平衡。为了提高广大民众文化水平,唤醒其抗战和爱国意识,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依据,确立了抗战救国的教育方针,从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推广以及干部教育等方面,创造性地实施了具有本土化和地方化的教育政策,促进了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提高了其文化水平,为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17]

樊孝东以五公村“土地合伙组”为个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与绩效进行了分析,认为,1943年,一场延宕数月的严重旱灾加上“五一扫荡”后日伪政权的横征暴敛,将冀中抗日根据地腹地饶阳县五公村的部分贫苦农户置于水深火热之绝境。1944年3月,村东头打绳副业组的4个农户决定成立土地合伙组,并订立章程,采取土地入股、农副结合的合伙经营方式来寻求进一步突破。从合伙组的实际发展来看,虽然经历了退组风波,但是这一阶段的生产与经营总体上是成功的。退组风波后,合伙组确立了相对稳妥的发展策略。五公村土地合伙组的发展实践对于根据地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均产生了一定启示和影响。^[18]

李翠艳以河北抗战史为例对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行了初步反思,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区域抗战史研究日益兴起，成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向纵深和细微发展的一个新领域。顺应抗战史研究学科化的趋势，全国许多省、市、县甚至乡村抗战史研究愈加繁盛。加之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方法在抗战研究领域的普遍应用，使区域抗战史研究自成体系，呈现新的特点：一是抗日战争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二是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新视野与聚焦点，三是宏观叙事与微观呈现有机结合与转换的研究方法。^[19]

许益菲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为例对日本所藏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了初步探析，认为，深化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需要加强对日文档案资料的使用，从他者的立场和视角，丰富我方历史。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整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涉及日本近代以来政府政策、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的大量档案。其中，涉及中共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档案资料，主要以日军的对共调查资料和对共作战资料为主。这些日方档案资料从他者视角呈现了中共和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地区发展的历史位相，蕴含着党中央的理论政策在华北地区实践的历史线索，对丰富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关资料和深化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有着重要意义。^[20]

张淑生、吴云峰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开展了春耕运动。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春耕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春耕运动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健全春耕组织领导体系，成立了春耕委员会；加强宣传动员，提高干部、群众春耕热情；为群众补充生产资料，带领他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加强根据地武装力量，努力为春耕运动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春耕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量荒地开垦，旱田改造成水田，粮食产量得到提高，为抗战赢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1]

（二）解放战争、共和国史研究

罗志斌、戴建兵对抗战胜利前后晋察冀军区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进行了考察，认为，纪律严

明是人民军队的政治特色和优良传统。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晋察冀分局针对军区部队存在忽视群众工作、纪律松懈、入城纪律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加强纪律建设，通过开展纪律教育，纠正错误思想、强化纪律观念；严格纪律管理，消除违纪现象、凝聚战斗力量；健全入城纪律，弥补制度漏洞、巩固铁的纪律。晋察冀军区部队的纪律建设保障了扩大解放区、抗日反攻作战任务的顺利实现，为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22]

代雅洁对 1949 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进行了考察，认为，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23]

吕志茹对集体化时期京津冀协同治理海河进行了考察，认为，集体化时期在海河流域的治理上，京津冀进行了广泛的协同合作，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的修建开始，到“大跃进”时期大规模的水库建设，再到人民公社时期的根治海河运动，在治理规划的出台、治理顺序的安排，再具体到施工中劳动力分配、机械材料保障以及移民安置等各方面，各地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种水利建设上的协作打破了地域界限，为统筹规划、综合治理、联合施工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统一领导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及保障，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兼顾整体利益则推进了河流治理的顺利进行。^[24]

吕志茹、王超还对海河流域的水利机构变迁与事业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海河流域最早的流域管理机构萌芽于顺直水利委员会，后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两机构在引进技术、勘探测量和编制规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由水利部直接领导，流域治理工作快速发

展。海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后，全方位推动流域治水事业的进步。从海河流域水利机构百年变迁中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中国水利事业正处于从传统治理到引进西方技术再到自身快速发展的轨道中，流域管理模式是水利机构变革的基本方向，依靠群众治水的举措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水利事业大发展的坚实基础。^[25]

三、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 区域经济史

刘秋根、刘新龙对晚清民国时期北部边疆甘草市场及国际贸易进行了考察，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北部边疆先后至少有 66 个县、旗出产甘草，形成西北、东北两大产地带。在甘草市场体系中，产地市场以草厂形式存在。中级市场在西北先后有归化城、河口镇与包头，在东北有郑家屯、赤峰与奉天。甘草起初以祁州、禹州为高级市场，并较早加入沿海贸易。北洋开埠早期，甘草输出港长期以烟台为主，天津为次。1898 年前后天津取代祁州甘草集散地位并于 1902 年后迅速成为北部边疆最大甘草终点市场。1931 年受抗战影响，甘草终点市场呈现天津、大连、营口三足鼎立态势。自 1863 年以来，甘草出口长期以日本、中国香港等东亚地区为主，仅在一战期间短暂转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甘草作为北部边疆大宗药品，其自身市场体系与国际贸易变迁也是港口腹地研究的重要个案。^[26]

刘秋根、刘新龙还对晚清民国时期旅粤山西药号经营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中叶以后，山西药号在穗港设分号者先后达 25 家，其主要业务是采购广药供应祁州、禹州、百泉药会，其毛利润率远在 30% 以上，次要业务是销售北药与参茸。在山西药号总分号组织中，驻广分号按祁州、禹州冬春药会行程安排采办，同时以此为节点借贷并接收总号汇款。山西药号驻广分号的运输任务主要委托货栈、报关行、运输公司代理，青岛、济南是广药北运重要中转站。驻广分号作为山西药号经营重心所在，其运营过程中所体现的为祁州、禹州药会服务意图与货款管理分离规则对了解药材长途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民国后期受战乱影响，山西药号驻广分号转以供应京津市场为主，成立帐庄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上海的汇兑中转作用也逐渐凸显，展现山西药号适应经济

格局变化的策略调整。^[27]

刘新龙对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资金管理进行了考察，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总分号组织实行收支两条线资金管理模式，具体表现为总号向每一地分号拨付采购资金并接管销售收入。该项模式建立的直接原因是分号本为配合业务开展所设，采销功能被拆解组成链条不可分割，没有独立地位必须服从分号经营、总号核算分工定位；根本原因是票号提供强大金融后盾，山西药号总分号收支往来与票号存放款汇兑业务结成共生关系，参与平祁太标期结算；总号再通过账本、书信与汇票所组成的账目体系加以监督维持。民国时期票号相继歇业，山西药号驻天津分号取代总号成为资金管理实际核心，整体层面上的资金管理模式已经混乱。收支两条线是山西药号发展壮大重要因素，对学界理解传统企业制度乃至晋商长途贸易之盛具有重要意义。^[28]

肖红松、王永源对 1912 年至 1937 年间白洋淀地区的棉业发展与乡村集市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民国时期白洋淀地区的棉花种植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缓慢而有限的。与此同时，棉纺织业广泛普及，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新式机器推广使用且伴有棉纺织工厂的建立。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的综合作用促进专业棉市的兴起与发展，加之便利的水路运输，部分集镇物资集散的功能日益凸显。这一过程的整合，既是白洋淀地区集市发展的历史面相，也反映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侧面。^[29]

肖红松、王永源还对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与民众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苇席业是白洋淀地区的一种支柱产业，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其发展的基础条件，农家维持生计的需要、销售市场的拉动以及政府减免税收等是促其发展的社会因素。多种因素促进苇席业兴盛发展，其产量可观、销售率高、销售范围广。作为一种支柱产业，苇席业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它关乎席民生活，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规模较大。苇席用途广泛，是普通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材料，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苇席业带动了民船运输业、席栈、席店等行业的兴起，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30]

蔡禹龙对 1926 年至 1937 年间北京北海公园

的溜冰大会进行了考察,认为,老北京溜冰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朝,当时的人称之为“冰戏”“冰嬉”。到了清朝,这种运动上升到国俗的高度,北海的庆霄楼、漪澜堂、五龙亭,南海的瀛台及先农坛等地成为帝王娱乐消遣的溜冰场所。民国时期的北平,溜冰运动盛行一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自设溜冰场。中山公园、中海、南海及北海的漪澜堂、五龙亭等处也有溜冰场。其中,北海公园漪澜堂溜冰场举办的溜冰大会影响较大,从1926年至1937年连续举办了12届。^[31]

(二) 货币金融史

胡莹、戴建兵以担保制度为视角对民国时期合会的风险规避进行了考察,认为,合会是我国古老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民国以前,合会主要由会首担负完全责任,缺乏完善的风险规避机制。民国以降,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变化,合会不仅受到会首责任过重、轻会权利缺乏保障、运行周期较长、官方监管缺失等传统风险因素的影响,而且还面临自身规模扩大与成员间熟识程度降低、乡村危机加剧等新的风险因素的威胁。为达到风险规避的目的,合会广泛利用了担保制度,一方面凭借保人担保和殷实铺保实施风险转嫁,另一方面依靠实物抵押担保和混合担保进行风险控制。通过这些举措,充分凸显出合会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有效促进了合会风险应对途径的拓展和风险处置功能的强化。整体而言,担保制度的盛行在合会风险规避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应被忽视,同时还须客观、理性地看待其局限性、金融功能的演进以及金融近代化等问题。^[32]

四、社会史、思想史、环境史研究

(一) 社会史

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1912年,国际护士会(ICN)倡议各国医院和护士学校定每年5月12日南丁格尔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并定为国际护士节。范铁权、陈星以“南丁格尔纪念日”的引入对中华护理学会对护士形象的塑造进行了考察,认为,民国时期,南丁格尔纪念日被中华护理学会移植至近代中国,成为医界的一个重要节日。中华护理学会极力提倡南丁格尔纪念日,对医院、护士学校等开展纪念活动予

以明确规约和指导,通过规定时间、空间布置、仪式安排等多手段塑造护士形象,通过演讲、戏剧、歌曲等多形式的应用,强化民众对南丁格尔的认同。中华护理学会宣传并推广南丁格尔纪念日,使其由抽象意义的舶来品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纪念实践,而护士形象正是在南丁格尔纪念活动中得以逐渐确立。^[33]

科学团体是知识分子为传播学术、加强学术交流的重要组织形式。“科学救国”是近代以来的重大主题。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高举“科学”的大旗,各类科学团体相继产生。范铁权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团体资料汇编》,收录中国近代科学团体文献收录图书139种,期刊16种。涉及中国科学社、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二十余个团体的工作报告、机构概况、会务、会员名录、机关刊物、专刊等。资料以学科分类,图书在前,刊物在后,按时间顺序编排。这些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科学体制化形成过程、科学团体的组织体系建设、近代科学的职业化过程,深化近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均有所裨益。^[34]

科学是现代社会的第—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V·布什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报告和附件中广泛地讨论了政府和科学的关系,与疾病作斗争的办法,扩大就业机会,修订专利法和税法,如何培养和选拔人才等问题,它既是一份科学政府的文献,也是一份科学社会学的文献。徐凡对1945年至1949年间中国科学界对布什报告的译介与反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发表之初,中国科学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与解读,并结合报告思考了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題。在《发展应用科学十年计划》中,中国科学家试图用布什报告的理念去组织中国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由于布什报告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用“基础研究”这一概念取代了长期使用的“纯粹科学”。^[35]

地方史料是指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个人保存的有关描述某一特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时期状况的文献,包括档案、图书、报刊、方志、笔记、回忆录、家谱、地图、照片、碑刻、影像等。地方史料不仅可以用于进行该地区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研

究价值,还具有建构城市记忆,促进文化传承,加强资政育人的现实功能。戴建兵以正定为中心,对海外近代中国地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之下,目标迥异的外国人跨海而来,并进一步深入中国内陆地区。正定是华北地区外国人实地接触、直接观察中国的重要一站,因此也成为他们记录中国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及至近代,与正定相关的海外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各类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就是公私收藏机构所藏的典籍文献。正定地方的自然、历史、宗教、习俗等都是他们考察的对象。海外所藏与正定相关的文献种类和数量都较为丰富,适时进行相关海外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仅有助于拓展正定地方历史的研究视角,亦可从全球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回望中国本土社会,从而促进地方文献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36]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曾指出:“研究其(商铺)成败得失,以至一厂一店的经验,正是近代经济史的任务”。卢忠民主要利用一手五金商铺账簿资料,来构筑商铺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如发展历程、商帮、经营与管理、利润多寡、员工收支与生活,及其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之关系等,对1917年至1940年间北京五金商铺进行了考察,就既往研究中关于商业阻碍工业发展、普通店员与学徒生活困难及受东家欺压等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该成果总结行业成败的经验教训,为当下我国商业发展及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历史动力与借鉴。^[37]

(二) 思想史

李敏对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进行了考察,认为,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

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38]

李敏还对民国初年初等学校教育的“文学”纠葛进行了考察,认为,民初新式学校教育延续清末以日为师的整体趋势,“文学”观念受知识资源与教育理念等因素影响,呈现复杂的纠葛状态。小、中、师范等初等学校,定位于普通国民教育,不同人对“文学”的意涵、性质及取舍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学制虽确定小学以上国文科以“涵养文学之兴趣”为要旨,但在实际教学中,在国文科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同时,也有人质疑国民教育中“文学”的适用性。受西学影响而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在编撰体例、材料取舍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这些问题正是19世纪以来,“文学”概念受不同知识资源影响,随时代而变化的特点在教科书中的表现,影响着教育与学科的发展。^[39]

张子康对1935年日本儒道大会与孔裔赴日风波进行了考察,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反日运动高涨。在此种局势下,日本儒教界趁汤岛圣堂重建落成之机,举办了一次空前盛大的儒道大会,配合日本政府标榜的“中日亲善”的对华政策,以期达到笼络中方人士、消弭中国反日情绪的目的,甚至还有将孔裔据为己有的企图。日方通过外交手段与孔家、山东省政府、南京中央政府经过半年的交涉,几经风波,最终如愿使孔裔代表史无前例地渡海赴会。然而此次大张旗鼓的儒道大会,使得日本进一步利用孔子及孔裔的企图暴露无遗,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外交效果,更招致了国民政府的警惕与中国社会的抵制。^[40]

徐凡对1931年至1937年的“科学救国”思潮进行了考察,认为,“科学救国”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对“科学救国”寄予厚望。中国科学界在肯定科学能够救国的同时,驳斥了其他一些急功近利的救国口号。在社会压力之下,科学界对“科学救国”的途径产生了分歧。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孰轻孰重,各方争论不休。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努力下,各方暂时达成了共识。九一八事变后“科学救国”思潮的新变化,突出反映了科学与

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41]

(三) 环境史

徐建平、翟砚辉对 1921 年东北鼠疫传入与直隶省的应对进行了考察,认为,1921 年直鲁交界发现的鼠疫,是由东北传入的,疫病被发现明显滞后。最初各方反应及时,直隶省府与内务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合办方式,与津浦路局及鲁省联合防疫。疫病向直隶北部蔓延后,直隶则以自办为主。疫病发生在严重旱灾之后,且面临“内防扩散、外防传入”的状况,在北洋防疫处主导下,直隶最终扑灭疫情,其施行的“吴桥交河调查法”“分县派员调查措施”,以及根据疫情走势对组织和人员的调整等自办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疫病救治过程中,直隶省政府承担了防疫主责,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不过也反映出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还需要增强基层社会对近代科学防疫思想的认同。^[42]

徐建平还以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资源为切入点,对京直地区的地貌与气候、水资源分布及特点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京直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原因及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方政府通过完善水务机构,培养水务人才,加大水政执法力度,调处水事纠纷,建立水利会等措施加强了对京直水务的管理;通过水利测量、农田水利工程、防洪水利工程、航运水利工程、水利枢纽工程等水利建设,促进了京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该成果深化了京直地区水利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43]

(王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武吉庆. 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诉求(《复兴文库》第一编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2] 董丛林. 评析李鸿章家书[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2.
- [3] 董丛林.“八表”之语、“书生”习性与“儒臣”风格——张之洞的一个侧面[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 [4] 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J]. 历史评论, 2022(3).
- [5] 张军桥. 荣全与索伦营的回归和安置[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2(1).
- [6] 王宏斌.《禁止非法贩卖麻醉品公约》的起草与签订[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 [7] 王宏斌. 清代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考[J]. 台湾历史研究, 2022(1).
- [8] 王宏斌. 晚清“外洋”词义嬗变之历史学解析(1862—1911)[J]. 史学月刊, 2022(2).
- [9] 王宏斌, 张军桥. 清代福建内外洋考[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4).
- [10] 赵鲁臻. 危机下的变革: 晚清陆军战术及训练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1] 刘宏. 铁血的强权: 庚辛议和谈判中列强的武力恫吓[J]. 晋阳学刊, 2022(3).
- [12] 把增强. 中共与普通民众的勤务抗战[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2(5).
- [13] 郭晓辉, 肖红松. 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2(3).
- [14] 张永刚. 抗日根据地的公安工作——以晋察冀边区阜平县为中心的考察[J]. 党的文献, 2022(4).
- [15] 郑立柱. 主旋律与弱平衡: 多重视角下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戏剧[J]. 广东社会科学, 2022(4).
- [16] 郑立柱.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戏曲改革与民众动员[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3).
- [17] 张瑞静. 华北抗日根据地教育政策的多维思考[J]. 社会科学论坛, 2022(5).
- [18] 樊孝东. 冀中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与绩效——以五公村“土地合伙组”为个案的分析[J]. 社会科学论坛, 2022(5).
- [19] 李翠艳. 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刍议——以河北抗战史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 2022(5).
- [20] 许益菲. 日本所藏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关档案资料探析——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 2022(5).
- [21] 张淑生, 吴云峰. 抗战与生产: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J]. 党的文献, 2022(3).
- [22] 罗志斌, 戴建兵. 抗战胜利前后晋察冀军区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J]. 红色文化学刊, 2022(4).
- [23] 代雅洁. “组织”的力量: 1949 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J]. 民国档案, 2022(1).
- [24] 吕志茹. 集体化时期京津冀协同治理海河研究[J]. 河北学刊, 2022(3).
- [25] 吕志茹, 王超. 海河流域的水利机构变迁与事业发展[J]. 中国水利, 2022(15).
- [26] 刘秋根, 刘新龙. 晚清民国时期北部边疆甘草市场及国际贸易[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2(4).
- [27] 刘秋根, 刘新龙. 晚清民国时期旅粤山西药号经营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7).
- [28] 刘新龙.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资金管理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5).
- [29] 肖红松, 王永源. 白洋淀地区的棉业发展与乡村集市(1912—1937)[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 [30]肖红松,王永源.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与民众生活[J].史学集刊,2022(3).
- [31]蔡禹龙.民国时期北海公园的溜冰大会(1926—1937)[J].北京档案,2022(4).
- [32]胡莹,戴建兵.民国时期合会的风险规避研究——以担保制度为视角[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2).
- [33]范铁权,陈星.“南丁格尔纪念日”的引入:中华护理学会对护士形象的塑造[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34]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团体资料汇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
- [35]徐凡.中国科学界对布什报告的译介与反响(1945—1949)[J].中国科技史杂志,2022(2).
- [36]戴建兵.海外近代中国地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以正定为中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37]卢忠民.北京五金商铺研究(1917—194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38]李敏.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J].学术研究,2022(5).
- [39]李敏.民国初年初等学校教育的“文学”纠葛[J].文艺理论研究,2022(1).
- [40]张子康.“乘桴浮于海”——1935年日本儒道大会与孔裔赴日风波[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0).
- [41]徐凡.九一八事变后的“科学救国”思潮研究(1931—1937)[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
- [42]徐建平,翟砚辉.1921年东北鼠疫传入与直隶省的应对[J].近代史研究,2022(6).
- [43]徐建平.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政研究(1912—192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世界史研究

汪鹏 倪世光

一、2022年世界史研究总体状况

河北省世界史学科在2022年继续稳步发展。与往年相比,稳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主要研究领域仍然集中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史三个学科方向;第二,研究队伍仍然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的学者为主体;第三,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趋势继续保持,学术成果数量与往年基本相当,形式上以论文为主。发展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高水平论文出版,特别以倪世光发表在中国社科研究领域的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为典型代表;第二,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古典文明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

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骑士制度和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是河北省世界史学科的传统优势领域。长期以来,倪世光深耕于此,有一系列的高水平成果出版。2020年,倪世光就有长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他再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章,探讨了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贵族观念问题。^[1]倪世光认为,西欧中世纪世俗贵族的社会地位、身

份特征、思想文化都与封建制度相关联,且往往以骑士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贵族是骑士群体的主体和核心成员,其思想观念左右着骑士文化的内涵。倪世光指出,贵族的社会责任观念是其所处社会地位和所承担社会职责的反映,表现在社会思想文化中。贵族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等内容,在13—14世纪产生的三部骑士规则文献中有较清晰的阐述。他通过对《骑士守则》(*Ordene de chevalerie*)、《骑士规则全书》(*Libre del ordre de cavayleria*)和《骑士规则读本》(*Libre de chevalerie*)这三部原始文献的梳理,分析了从思想观念层面看到的中世纪中、后期贵族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大致范围,以及贵族履行社会职责应达到的高度标准。倪世光进一步指出观念上的骑士规则对贵族社会责任意识的塑造作用,认为骑士规则是在封建法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浓厚基督教观念的行为标准,它在赋予贵族极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同时,力图从他们内心建立起社会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修为,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面对社会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西欧中世纪的历史,更深层次认识中世纪贵族的思想和文化。

倪世光和牛姗姗对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制度做了军事角度的多维考察。^[2] 作者认为,采邑制度是西欧封建社会的重要内容,对社会诸多方面产生了综合影响。采邑以制度形式出现是与军事改革联系在一起,直接的目的是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因而,其军事功能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作者从军事角度讨论了采邑的三方面功能,分别是组建骑士军队、支付服役报酬和调动指挥军队,并指出采邑是组建骑士军队的基础,也是提供骑士军费的主要形式,同时分封采邑还建立了骑士军队内部的基本组织结构。作者认为,分封采邑组建骑士军队是西欧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西欧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采邑的军事功能逐渐显现出难以克服的弊病。采邑形式的多样化,也蕴含着使土地与军队建设脱离的潜在因素。

2022 年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在古典文明领域也取得了较多的进展。刘秀英和宋耀武对希腊古典时期智者口语传播的历史价值做了梳理,并讨论了其当代意蕴。^[3] 作者认为,智者以口语传播“三艺”“智慧”中的修辞与雄辩术为介质,通过口语传播过程中演讲、习明纳教育模式的创设与使用,传播了广场文化,实现了培养雅典城邦公民个人生活、政治素养言说与雄辩能力的教育目标,开启了人性伦理价值观探索。智者职业教师凭借口语传播的演讲模式,教化城邦公民共同生存的契约、信仰与理想。在口语传播过程中采用的探究精神与逻辑思辨相统一的主体间交流的习明纳模式,通过引导、争鸣、反诘等口语表达技巧,促进了对话式学术研究的传播与升华。作者指出,身为职业教师的智者以传者的身份,充分展示了自身的经典“智慧”,实现了培养雅典城邦公民个人优质生活与政治继承者之教育目的。智者职业教师注重人性伦理价值观呈现的人本与自由主义倾向,成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思潮的思想基础。

张琳对希腊化时代的犹太人希腊化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学术史梳理。^[4] 作者指出,对比近东其他民族,关于犹太人希腊化的史料相对丰富,学者关于犹太人希腊化研究成果可观。古代近东诸民族很少有和犹太人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犹太人的希腊化具有代表性,它为近东民族如何应对希腊化、如何调适本土文化及如何延续民族

认同提供了范例。作者从“希腊化”这一名词的概念谈起,讨论了 19 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流派,并对未来的犹太人希腊化研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作者认为“希腊文化东渐”与“希腊文化西来”并非义同形异的话术表达,而是不同情境下以希腊或东方为视角的转换。在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下,被征服的东方民族感知到希腊化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威胁,有意识地强调民族传统与价值。犹太人同样如此,采取类似或创造新方式重申并强化身份认同,努力表达犹太人在异族世界的优越性。犹太人希腊化的特殊性在于犹太教。希腊化时代的近东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选择、过滤和修整是一种文化常态,不限于希腊化时期。从某种程度而言,“希腊化”是理解犹太历史与文化的一种视角而非研究的目的。

许礼捷和贾瑞霞讨论了罗马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帝国政府的战略调整和行省的治理问题。^[5] 罗马从奥古斯都到哈德良,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繁荣稳定统治。作者指出,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最明显地表现为贯穿罗马崛起的军事扩张传统被终止。军事政策转变也导致皇帝与元老阶层之间关系恶化。与对外军事战略调整相对应的是哈德良在帝国各地的巡视与行省治理。不同于以往统治者在帝国都城中枢处理政务的方式,在哈德良统治的 20 余年时间里,有一半是在巡视行省的旅途中度过,除了阿基塔尼亚、卢西塔尼亚、克里特、昔兰尼和科西嘉外,皇帝的足迹几乎遍布帝国全境。这种管理方式的革新,让统治者能够更有针对性且高效地处理各地区存在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矛盾。军事战略调整和行省巡视与治理是哈德良时期最具特色的变革,罗马放弃军事扩张传统,转而注重防守的和平策略,为罗马集中精力应对帝国内部问题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霍君在东方古典学的视域下探讨了日本天狗形象的演化和这一过程中体现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6] 作者经过详细的资料考证后指出,日本妖怪天狗形象的出现与作为消灾驱魔的“天狐”有密切关系,而处于这一关系底层的是密宗文化由中国向日本的东传,特别是“六字经法”的传入。结合日本天狗诞生的文化背景因素,可以

说不仅在其诞生，而且在其发展的重要节点上，中国文化都参与其中。在日本天狗的形象变迁中，东传至日本的中国文化起到了“地基”的作用。首先，日本天狗身上天然具有的“邪鬼”与“反佛法”的特征，通过密宗文化东传这一角度，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天狗可从“天狗道”解脱的构想来源于中国本土化的佛教思想。这一特征的出现，为今后天狗转变为守护神提供了前提保障。再者，中日两国天狗能糅合一起，关键在于对人内面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中日古代文化交涉范式中的“隐形”和“互文式”交流。

三、世界近现代史

李会芳以16世纪著名的肖像画大师荷尔拜因的作品为切入点，讨论了16世纪英国的时间观念问题。^[7]作者指出，中世纪的英国处于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带有强烈末世论色彩的线性时间观中，形成了一种重未来、轻现世的禁欲式时间观念。中世纪后期的战争、瘟疫和社会的动荡使欧洲人的信仰产生动摇，同时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新世界的发现也打开了欧洲人的心智。作者认为，艺术自始至终都与人类的时间焦虑有着密切联系，艺术常常以一种空间的形式来体现人类对于时间的思考。一幅成功的艺术作品周围总是弥漫着画家、作品，以及观众所代表的不同时间观念之间的碰撞、沟通和理解。肖像画的出现和流行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时间观念发生急剧变革的产物，肖像画的形式、内容和表现手法处处凝结着人类对时间的思考和实践。作为北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者，荷尔拜因在英国时期的肖像画真实地体现出这个时期英国人在时间观念上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作者从世俗的时间、物化的时间和艺术的时间三个方面分析了英国人时间观念的变化，指出作为一种高度精细的现实主义艺术，荷尔拜因的肖像画是16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时间观念的艺术化表达。勤勉劳作的日常时间受到肯定，以物质财富作为个人时间价值的衡量标准，以艺术对抗死亡等现代时间观念都在荷尔拜因静物式的肖像画中得到体现。以世俗时间取代神圣时间，以物质充满瞬间，以艺术蔑视死亡，荷尔拜因的肖像画从另一侧面注解了资产阶级崛起时代的新型时间逻辑。

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宋晓丽讨论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公共外交的历史演变和特点。^[8]作者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公共外交重在防止智利国内反美主义和共产主义抬头，保护美国在智利的经济利益，并防止智利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维护美国在南美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对智利的公共外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新闻宣传、公关活动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展开，呈现为一种典型的“战略化模式”，着眼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推行对外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作者总结出，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智利的这种公共外交政策，经历了智利本身政局变化的四个阶段，具有高度灵活的特征，是对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外交手段的有益补充，同时存在的干涉政策和公共外交之间的互相冲突，也变相削弱了美国对智利公共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美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巩固和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独霸地位，排除其他域外国家染指拉美。美苏两极对峙时期，美国利用公共外交大打意识形态战争，拉拢拉美公众的民心，对抗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扩张。

同样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刘京从1945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入手，剖析了原子能国际管制机制的创设及其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走势的影响。^[9]1945年12月的美、苏、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既是战时盟国定期磋商机制的延续，也是原子能这一影响国际政治新因素的产物。从《华盛顿宣言》到“科恩-帕斯沃尔斯基草案”的出台和围绕其展开的一系列争论，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筹备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历程。美国的原子能提案成为各方讨论的基础。会议达成的《莫斯科公报》，确定了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设立程序、组织、工作人员性质、工作范围及分阶段工作原则。然而，尽管三国希望就原子能问题展开讨论，但不愿新设立的机构对各国的权力进行限制，尤其是对各自发展核武器造成束缚。莫斯科会议的召开是二战结束后美苏英缓和关系的重要尝试，它的召开及《莫斯科公报》的发表，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了美苏仍能就重要问题达成妥协，但也表现出大同盟关系破裂、美苏关系恶化的趋向。

四、区域国别史

2022年河北省区域国别史方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东地中海区域和拜占庭史研究领域。王向鹏的专著《东西方视域下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研究》是国内关于东地中海区域和十字军战争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10]国外学术界关于十字军研究长期以来普遍存在军事史研究与政治、文化及其他领域研究相割裂、缺少互通的痼疾。该书尝试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注重整体宏观的把握,从地中海东西两个区域、三大文明的视域之下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不是单纯陈述史实、研究军事,而是以十字军及其军事为焦点和抓手,广泛辐射到与其相关的各个领域,力求全面展现这个时代西欧封建社会及地中海东岸发展演进中的主要特征。成果的结构并非线性,设立多个相关联专题,有机联系,形成逻辑,综合阐述。此外,作者还注意了文献资料的细致筛选、比对,将前沿研究与历史文献恰当结合,既有微观视角的研究,也有宏观视角的观察与探讨,创新价值较大。

郭云艳以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为例,对丝绸之路上的拜占庭货币传播和文化融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1]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索里得及其为原型制作的金币和金片出现在中国、蒙古和中亚等地,说明这种类型的金币曾在这些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复制。影响拜占庭金币东传途径和使用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中亚地区政权特别是嚧哒和突厥政权的更迭。7世纪初,为远征波斯,伊拉克略一世以大笔金钱作为条件拉拢西突厥可汗,才使得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大量进入突厥人辖下的中亚和东北亚,并由此大量进入中国。该类型金币深受草原上突厥统治者的欢迎,被大量仿制。在仿制时,拜占庭钱币上的人物形象得以保留,但在细节上被稍做改变,融入了当地统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作者进一步指出,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形制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并非特例,它是5世纪后拜占庭金币涌入中亚及东方其他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缩影,也是拜占庭文化沿丝绸之路向东方的传播与融合的缩写。

郭云艳的另一篇相关领域的文章,以嚧哒人和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为主题,探讨了嚧哒人对丝绸之路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12]嚧哒人

在拜占庭史料中被称为“白匈奴(the White Huns)”,是公元5到6世纪中叶控制中亚地区的强大政权,地处要冲,与东西方文明都有密切联系,后被突厥和波斯联合消灭,逐渐在史料记载中消失。作者指出,自5世纪中期起,由于嚧哒的强盛,它与拜占庭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一起构成了从东地中海及至中亚地区的三大强权,彼此之间互动频繁,在军事冲突与和平结盟之间往来变化,影响着此时的东西方交往。嚧哒与拜占庭的民间商贸往来仍在继续发展,两地间的信息传播渠道、人员往来渠道、文化沟通交流都比较畅通。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材料,论证了嚧哒汗国在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5世纪晚期嚧哒汗国的政治与军事胜利,不仅改变了周边的政治格局,还推动大量西方金银币向东传播,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兴盛,丝绸之路的贸易因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张子康对1935年的日本儒道大会与孔裔赴日事件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1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并大肆尊孔宣孔。1935年孔裔孔德成以国民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前往日本参加汤岛圣堂复兴儒道大会。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作者通过对日本原始材料和相关档案的调查,经过较为审慎的考证,还原了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对该时期的中日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日本举办1935年的儒道大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对华的外交政策,笼络中方尊孔的人士、消弭中国的反日情绪,甚至还有逐步控制孔家,将孔德成占为己有的企图。此次儒道大会正处在多重且复杂历史节点上,表面上中日尊孔势力相互呼应,实际上却是为拉拢孔家而明争暗斗,正与此时“中日亲善”甚嚣尘上,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全面侵华同步进行这一颇为吊诡的中日关系相对应,加之掺和了孔裔身份及庙产改革以及尊孔读经论争等问题,使得儒道大会及孔裔赴日在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该事件加速了国民政府尊孔之风的盛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则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孔立场,抗拒日本对孔子的利用。日本此次活动对华外交的目的完全落空。正如鲁迅所指出,国民政府的尊孔不过以孔子为“敲门砖”巩固其统治,日本同样的行为只会被

视为一种竞争而非“亲善”之表现。

五、小结

综合以上梳理,2022年河北省世界史的研究稳步发展,传统优势领域有顶尖刊物高水平论文发表,新的研究领域也在继续拓展,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为主,学术专著、教改论文、教材等形式的成果数量较少。第二,专业研究队伍薄弱的情况仍未得到改善。当前,河北省范围内设有世界史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院校仍然仅有河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两所,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高端人才引入不足,学术梯队处于新老承接的阶段。第三,世界史学科的专业学术刊物严重不足,历史学类的专业期刊数量也很少,不利于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

(汪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倪世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倪世光.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贵族观念[J].中国社会

科学,2022(10).

[2]倪世光,牛姗姗.西欧封建采邑军事功能的三维审视[J].河北学刊,2022(1).

[3]刘秀英,宋耀武.希腊古典时期智者口语传播的历史价值及当代意蕴[J].新闻爱好者,2022(4).

[4]张琳.国外犹太人希腊化研究述论[J].古代文明,2022(3).

[5]许礼捷,贾瑞霞.哈德良时期罗马帝国的战略调整与行省治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8-8.

[6]霍君.日本天狗形象演化中的中日文化交涉[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5).

[7]李会芳.16世纪英国的时间观念及其在荷兰拜因肖像画中的体现[J].美术,2020(10).

[8]宋晓丽.冷战时期美国对智利公共外交的历史演变及特点[J].拉丁美洲研究,2022(1).

[9]刘京.1945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与原子能国际管制机制的创设[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10]王向鹏.东西方视域下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1]郭云艳.拜占庭货币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融合——以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为例[J].历史教学,2022(2).

[12]郭云艳.嚧哒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兼论其对丝路经贸往来的重要推动作用[J].历史教学,2022(12).

[13]张子康.“乘桴浮于海”——1935年日本儒道大会与孔裔赴日风波[J].近现代人物研究,2022(10).

管 理 学

管理科学研究

魏杰

一、2022年管理科学研究总体状况

2022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丰富,中外文成果数量大幅增长,研究内容更具多样性,主要分为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两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又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总体来看,2022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管理科学研究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选取相关理论,运用不同研究方法,丰富了企业层面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其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企业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

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各个企业都会涉及管理和决策问题。对企业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从2022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河北省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小组访谈、案例研究、二手数据等方式获取研究所需数据,结合相关理论对企业的组织、技术创新以及人员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层面的研究,为企业解决运营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参考。例如,《产业互联网环境下中小制造企业绩效服务化研究》以及《“适应”还是“破坏”?CEO外部继任对企业业绩影响的边界条件跨层次研究》等研究都对企业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探讨。

第二,管理科学研究分析了社会热点问题。管理科学是指以科学方法应用为基础的各种管理决策理论和方法的统称。因此管理科学的相关研究一直致力于解决实践中的管理决策问题。近年来,随着亚马逊、京东、淘宝等大型平台商的出现,网上购物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重要消费方式,大量企业也开始在电商平台销售产品。因此,通过平台商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时,如何优化决策才能使企业、平台商和消费者实现共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研究得到了更多关注。从2022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学者已经结合实际问题,对平台企业和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基于电商平台的最优销售模式和退款保证策略研究》《数据重构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京津冀人力资源系统韧性评价与治理》等。

二、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理论作为管理领域的一个学派,是以运筹学、系统工程、信息技术等理论和技术手段,从操作方法、作业水平的研究向科学组织的研究发展,同时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成果,进而形成的一种现代组织管理学。其特点是利用有关的科学工具为管理决策寻得一个有效的数值解,侧重于定量研究。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就管理科学的一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决策与对策理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预测理论与方法、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以及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八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一) 一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Pan等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全球危机期间心理健康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在全球危机期间,心理健康与亲社会行为具有相关性,主要是个体文化和集体文化之间的不变性。^[1]

李子彪、王韬、聂永川等从科技进步贡献率视角研究了京津冀地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三地之间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探索了京津冀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过

程中发挥的贡献和作用。^[2]

徐双军、李岩松、曹胜昔等以河北省健康建筑项目为例,从技术体系特点、成本预期、促进企业转型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健康建筑的新业态特征,从标准体系、政策引导和科技创新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健康建筑新业态高质量创新发展路径。^[3]

Zhao等基于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了新冠疫情期间危机责任对中国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危机责任和危机应对策略是新冠疫情期间影响组织声誉的重要因素,危机责任对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组织的危机应对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4]

严翠玲和申益嘉阐述了大数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应用及表现,探讨了大数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不足,并提出应采用科学化的决策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实施。^[5]

(二) 决策与对策理论与方法

赵文燕、张世哲和师柳柳针对装配线设计或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因场地或成本原因导致的工作站数量不易变更的问题,研究了具有工作站数量约束的多人工作站混合装配线平衡问题,并设计了一种结合差分进化的多目标混合遗传算法对该问题求解。^[6]

张志颖、聂迎春和刘鑫运用模糊测度研究了产品模块与可选服务模块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产品模块与可选服务模块的相关关系越强,客户越在意重视度较高模块的质量和功能,可选服务在方案配置过程中越重要。^[7]

Xing基于当前建筑业的发展现状,研究了城市环境污染下建筑企业运营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协调管理。研究发现:在运营管理方面,建筑企业应关注产品质量,改进和优化绿色建筑;在资源协调管理方面,建筑企业应继续深化绿色建筑的概念。^[8]

Xing和Xin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企业运营成本,建立了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分配模型和优化算法,对不同规模建筑企业的生态管理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国建筑企业的环境管理和建设能力中,建筑企业的整体环境竞争能力水平并不高。^[9]

范梅玉、杨庆舟和王强以河北省国有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组织公平对知识共享行为

的影响。研究发现：组织公平、组织嵌入对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嵌入在组织公平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10]

陈娟、曹鑫鹏和鲁斌基于碳约束机制，构建了多种碳约束机制下的微能源系统模型，采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对不同约束情景下的系统进行成本优化，通过对规划区域进行算例仿真，得出了不同约束机制下系统优化结果。^[11]

段晓晨、董茹萍和郝晶晶以西阜高速公路为例，通过综合运用 PSO、BPNN、FIS 和 BIM 三维技术实现了对交通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的估算和投资方案的评选。^[12]

孙微、王豪和李世勇基于几乎不可视与完全不可视两个信息水平，建立了成本-收益模型，研究了部分服务员同步多重休假的 M/M/c 排队系统中顾客的止步行为及系统定价策略。^[13]

代建生和刘悦考虑了商品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销售努力对商品需求的影响，刻画了期权契约下零售商关于实物和期权商品采购及销售努力的联合策略，并设计了协调供应链的期权契约和促销成本分担机制。^[14]

Zhang 等基于连续性盘点的 (S, s) 库存管理策略，研究了一个具有服务器休停和不耐烦客户的排队库存系统，并通过算例分析给出了系统参数对该系统性能指标、最优策略和最优成本的影响。^[15]

(三) 评价理论与方法

本年度的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企业评价研究、区域及产业经济评价研究和信用及价值评价研究领域。

1. 企业评价研究

刘鑫、吕荣杰和薛有志基于中国特定管理情境，探索了影响 CEO 继任来源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情境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 与高管团队成员的相似性有助于外部 CEO 继任者发挥“适应性效应”，提升继任后企业业绩。^[16]

Ma 和 Hao 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EPU) 是否会加剧企业的财务约束，以及金融发展是否会减轻 EPU 对财务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EPU 导致企业财务约束水平显著上升，金融发展缓解了 EPU 对财务约束的影响。^[17]

杨勇、冯博和曹井柱探究了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面临的重要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面临的悖论问题越来越复杂，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也越来越复杂与抽象化。^[18]

冯雪莲和郑楠从财务学视域探讨了对赌协议“股权回购”的财务治理效应，分析了对赌协议“股权回购”对各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利益纷争，并提出对于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条款的价值取向和实践中财务处理要点。^[19]

于强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 5 年中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算，并针对存在的质量和效率问题，从提升河北省装备制造业的规模效益、行业运行效率以及优化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20]

董香兰从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决策权和退出权角度分析了现行主动退市制度，并分析了在主动退市实践中企业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情况，通过对策建议为主动退市制度的完善和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提供借鉴。^[21]

张志颖和康凯针对产业互联网环境下中小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水平低的问题，研究了绩效服务的目标、路径、能力和实施决策问题，弥补了现有研究过分强调“可用性”的缺陷，以及现有研究过于关注企业策略和产业发展层面的不足。^[22]

高素英、陈雨婷和马晓辉以服务化转型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旨在确定服务价值实现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数据能力、顾客参与程度以及服务质量系数是多方主体共创服务价值的关键影响因素。^[23]

2. 区域及产业经济评价研究

杨宾宾、魏杰、宗义湘等基于熵值法，以河北省作为实证对象，测算了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分维度发展指数。研究表明：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按照发展实力可分为较强、中等和较弱三个梯队。^[24]

宁金辉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融资租赁规模，并会显著减少重污染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25]

苏锋在中国经济“双循环”和“数字化”双重转型背景下,给出了中国动画产业发展对策,其一是解决动画内容创意、动画发行渠道、动画质量提高等关键节点问题,其二是解决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落地。^[26]

侯孟阳、邓元杰和姚顺波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27]

郭子雪、杨雅旭和贺泽芳提出了一种基于概论语言语集改进 TODIM 法的评价方法。从快速响应时间、物资质量、成本控制、企业服务和企业内外部条件五个维度,构建了应急物流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28]

Shi 等将投入产出模型与结构路径分析相结合,构建了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行业的隐含能源分析框架。发现 2018 年 ICT 行业隐含能源为 216.22 万吨标准煤当量,75.1% 的 ICT 部门的隐含能源间接来源于金属冶炼等非 ICT 部门。^[29]

贾冀南、郭晓磊和王金良构建了包含生产生活、农业绩效、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五个维度的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其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各地发展水平差距较大。^[30]

程亮和杨风云就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激活区域内创新资源,布局整体联动等形式做了可行性分析和研究。分别论述了京津冀共同体现状、启示、能力分析和如何构建等实际问题。^[31]

李涛、李国平和薛领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多情景设置模拟 COVID-19 疫情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疫情对交通运输业的直接影响来自出行管制,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需求不会随着疫情管控措施解除而立刻增加。^[32]

祁红梅以 2010—2019 年中国 29 个省份数字经济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 DEA-MI 动态指数模型与 Dagum 基尼系数对各省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 Malmquist 指数整体表现出先升后降趋

势,29 个省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 Malmquist 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33]

俞会新、吕龙凤和卢童基于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水平、就业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等四种中介路径。^[34]

季文光、李志伟和许峰对渤海西岸附近海域重金属时空变化及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铜 (Cu)、镉 (Cd)、砷 (As) 元素含量均未超过 I 类水质标准,重金属按照超过 I 类水质标准的超标率由高到低排序是铅 (Pb) > 锌 (Zn) > 汞 (Hg)。^[35]

季文光、崔娟敏、成福伟等采用 DPSIR-KRUSKAL 与模糊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北省 2010、2012、2014、2016、2018 年 168 个县 (市、区) 建立了土地生态安全 DPSIR 传导与影响框架。^[36]

陈艳春和李佳丽研究了如何准确测度港口经济贡献并把握政策工具对其影响。并提出了以下措施:以整合提升港口的规模、效率、技术、管理和服务,提高直接经济贡献;以提升基础设施为突破,降低全物流链成本,提高间接经济贡献。^[37]

陈艳春、杨添天和杨继成针对京津冀地区数字化和绿色化的阶段特征,建议实施以制造业数字化为突破,以产业技术对接为导向,构建适宜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环境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38]

韩楠和罗新宇构建了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设置六种情景方案,模拟预测其对北京、天津和河北碳达峰时间、峰值及减排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单一措施情景下,环保情景对北京碳减排作用最显著,而节能减排情景则是实现天津与河北碳达峰的最佳发展模式。^[39]

王韶华、赵暘春、张伟等基于 STIRPAT 拓展模型,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运用通径分析揭示了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制度干预等因素对京津冀碳排放的影响机理。^[40]

李子彪、王思惟和高光琪分析和比较了我国当前冰雪体育产业链现状和高质量发展间现存五大矛盾。提出了产业链整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及高质量发展下我国冰雪体育产业链纵向整合、横向整合和跨链整合三种整合

模式。^[41]

3. 信用及价值评价研究

刘霞和刘畅以 2014—2019 年度“一带一路”参与企业为样本,构建了“一带一路”组织污名化评价体系,对组织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找到了关键影响因素。^[42]

段洪波和冯茜基于 5E 审计理念,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5 个角度,构建了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H 县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43]

刘霞和刘畅论证了“形式、事实、价值三维评价标准”的内在逻辑与应用可行性,结合疫情跟踪审计的双重属性,构建了疫情跟踪审计评价标准逻辑框架和疫情跟踪审计三维评价体系。^[44]

宫兴国和陈晨以 2015—2019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研发投资异质性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商业信用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商业信用与探索式创新投资存在倒 U 形关系,与开发式创新投资存在 U 形关系。^[45]

王雪莲、李嫒、高凯凯等采用构念积储格技术(RGT)对订阅型在线知识付费产品用户进行访谈,通过访谈数据的内容分析,厘清了该产品消费情境下用户体验价值的本质构成及其基于“属性——利益——目标”MEC 层级结构的价值达成路径。^[46]

许艳静和朱建明基于信息源可信理论,从诚信度、专业性、吸引力方面构建了接包方中标绩效影响因素模型,探讨了诚信度、专业性、吸引力对中标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诚信保证、联系认证、能力等级和专业身份影响接包方中标绩效。^[47]

Li 等采用最优尺度分析法识别了国内外航空公司投诉与时间因素的关联特征,构建了基于民航旅客服务评价(CAPSE)指标的航空公司服务质量度量(ASQM)模型。^[48]

Wang 等以全球工程新闻记录(ENR)中的中国建筑企业为样本,从环境信息披露(EID)指南变化的角度,设置了 2008—2014 年和 2015—2019 年两个时间段。结果表明:EID 与财务绩效在第一阶段呈负相关关系,国际化对 EID

与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随时间变化由负转正。^[49]

李素英和谢明明以 S 高校为例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赋权的基础上,应用灰色关联系数评估 2016—2020 年 S 高校预算管理绩效,发现 S 高校的预算管理绩效水平整体上较差,未达到合格水平,并提出了 S 高校的发展建议。^[50]

Guo 和 Zhang 运用 CiteSpace 和 Gephi 从研究概况、知识库、学科结构、研究前沿四个维度对“区域旅游绩效”主题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现有关于“区域旅游绩效”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构建模型、探索影响因素、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51]

(四)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刘涛和康凯基于投资者视角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投资中的风险进行了分类,给出了相应的缓释手段。研究表明:不良资产证券化区别于一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主要特征是现金流回收中较大不确定性,应探索提高现金流回收率的技术和方法。^[52]

孙丽文和李少帅针对风险情景下的人工智能,从主导范式、能动主体、核心愿景、规制体系 4 个维度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信任机制模型。研究发现:责任式创新能够为风险情景下的技术信任提供方向指示和行为准则并成为主导范式。^[53]

治丹丹和任亮以区块链出版平台 Pluto Network 为例,剖析了现行同行评议社会韧性、结构韧性、制度韧性等风险挑战,探究了全程化、网络化、整体性韧性治理效能升级路径。^[54]

(五)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陈俊龙和唐秋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共享共赢的我国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指标体系。研究发现:2018—2019 年中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效率呈上升趋势,并且规模效率对我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效率制约明显。^[55]

于会萍和宛玲基于 Re3data 平台元数据对科学数据存储库的发展态势进行多维度分析和讨论,研究发现:科学数据存储库内容格式、存储库类型划分更加多样,存储库技术框架、元数据标准、数据服务形式呈现出多元形式并存的局面。^[56]

姚立根、梁伟思、赵婷等基于知识资本理

论、三螺旋理论,建立了协同创新视角下企业价值增值理论模型,并采用 AHP 法对包含四个一级指标、二十四个二级指标的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权重。^[57]

陈义忠、乔友凤、姚澜等基于土地利用碳足迹模型,对比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碳足迹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等因素与碳足迹水平之间的响应关系。^[58]

赵文燕和张傲通过考虑消费者对产品估值和交付时间敏感性两方面异质性,研究了零售商的 BOPS 定价策略,分析了 BOPS 渠道便利性、交付时间和退货率等因素对实施 BOPS 效果的影响。^[59]

李峰、王科和赵毅以我国 30 个省(区、市)2006—2019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直接和溢出的双重促进效应。^[60]

张维冲、谭琪、孟浩等选取带有新闻聚合功能的网站,批量获取了网站汇聚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新闻数据,并进行了主题抽取、主题分析与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相关新闻报道近一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碳排放、碳交易、低碳、碳汇等几大主题备受关注。^[61]

(六) 预测理论与方法

王林、王志华和赵杨基于 SOR 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了视觉知觉线索、质量安全线索和时间线索三个层面的七个条件与感知愉悦、感知信任的交互组态效应对执行意向的影响机制。^[62]

Jin 等针对特定人群,对心理问题与工作态度、工作参与度、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进行逻辑推理,建立理论模型并绘制全模型图,探讨了以职业价值观实现为指导的 POTI 的个体差异,并构建了个体差异预测模型。^[63]

任峰和龙定洪运用扩展的 STIRPAT 模型分析了广东省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建立了经鸡群算法优化的快速学习网 CSO-FLN 预测模型,对广东省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并将预测结果与 FLN、ELM 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以验证 CSO-FLN 模型的优越性和有效性。^[64]

(七) 复杂性与复杂系统

赵斐、李鑫和郭明采用控制限维修策略判断是否执行最小维修、预防性维护或故障更换,然后综合考虑系统退化状态和备件状态,分析了可能的更新事件进而计算各事件发生概率,利用更新报酬理论构建费用——时间率联合决策模型。^[65]

黄春萍、文雯、章静敏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了在线互动影响下的跨界营销效应的行为模型,用实验方法模拟企业引导视角下激励因素、情感引导因素、网络特征及综合引导策略如何通过在线互动对跨界营销效应的演化产生影响。^[66]

李子彪和李晗以共享单车为例,构建了以功能树形式呈现的技术系统功能结构;并引入时间维度构建随机佩特里网模型,从稳定概率、库所繁忙率和变迁利用率三方面反映技术系统演化的主要功能要素,通过仿真计算不同条件下各功能模块变化对技术系统的影响。^[67]

孙丽文和李少帅基于多层次分析框架,构建了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模型,根据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社会技术范式和社会技术场景特征,把系统演化分为技术保护期、积累探索期和战略发展期。^[68]

Han 等利用人口、富裕和技术回归模型分析了 2000—2019 年中国航空碳排放的时间序列演变规律,并利用对数平均除法指数模型分析了航空运输收入、航线结构、航空运输强度和航空能源强度对我国航空碳排放的影响特征和程度。^[69]

程慧和贾广宇基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制度——组织——技术——人才”四个层面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模型,厘清了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所面临的困难和不足,形成制度赋能、组织赋能、技术赋能和人才赋能的优化策略。^[70]

邹鑫、王仁锋、张立辉等建立了描述 DTCTP-RPSL 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从约束规划角度提出了求解此问题的 CP 模型,发现 CP 模型的性能优于 MILP 模型和遗传算法。^[71]

赵巧芝利用我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技术创新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莫兰指数为正且不断上升,

“高——高”和“低——低”类型发挥着主导作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对本省份技术创新有显著的驱动作用，而空间溢出效果不明显。^[72]

段晓晨、钱睿和徐达基于系统动力学，分析了高铁区域水、动植物环境与建设投资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通过建立评价系统流程图进行了SD动态仿真模拟。^[73]

刘维庆、张浩和项志芬利用传染病模型，模拟了风险传导机理，通过调整不同参数探讨了风险传导速度与范围的变化情况，为管理者实施风险决策提供参考。^[74]

段晓晨、鲍默、孟春成等运用案例分析法识别海外铁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并构建了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等方法建立了海外铁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评估模型，并针对风险等级较高的技术风险及政治风险等提出相关防范建议。^[75]

Li等提出了一种基于链路节点的用户均衡模型来描述用户在RS和TS程序存在下的决定，从而预测这两种模式和现有政策（如汽车限制和警戒线收费）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集成RS和TS可以显著减少总行程时间。^[76]

Zhang等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分析了海南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近20年来海南省旅游开发效率平均值为0.7435，以三亚为代表，海南海口市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77]

黄春萍、毛璐、娄云莹等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二维复合变量对联盟组合规模进行测度，从组态视角分析联盟数量、伙伴重复性、联盟组合管理能力对联盟组合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获取多条高创新绩效提升路径。^[78]

（八）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

张艳丽、许龙和王建华基于管理学和系统动力学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构建了绿色创新视阈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驱动机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受到政府规制、组织管理和技术因素等多种因素的驱动。^[79]

倪志宇和曹群分析了当前精准医疗帮扶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精准医疗帮扶的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省、县、乡、村”四级联动精准医疗帮扶模式以及进一步优化精准医疗帮扶

路径。^[80]

张培和杨惠晓从数据资源如何重构传统资源要素视角，分析回答了数据驱动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维度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由此引发数据重构的组合类型和创新价值路径等问题。^[81]

李小青和李秉廉基于Web of Science中SCI-E和SSCI数据库1999—2020年的研究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从多方面对数字化创新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科学计量分析，揭示了数字化创新的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明确了数字化创新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82]

李媛媛、陈文静和王辉在界定宏观导向类、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类和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将宏观政策、中观网络和微观企业相结合，深入挖掘资金网络和知识网络特征在科技金融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83]

程慧和贾广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协同关系、职能关系、参与方式、参与困境和参与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完善了农村治理体系。^[84]

周瑾、邢玉莹和张聪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政策环境对乡村人才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分析，发现政策执行面临着立体化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主体间协作执行困难以及环境生态限制重重等掣肘因素。^[85]

程慧和秦晓依利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框架，明确政策自身缺陷、政策执行主体复杂性、对目标群体重视不足以及政策环境因素的限制，导致了环境政策执行“一刀切”现象。^[86]

孙佳勇、宋亚军和李海军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导向，分析了高质量发展下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与成本会计核算的关系，探讨了商贸流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创新的策略思路。^[87]

张超、陈思和兰宗敏基于2009—2016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品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空间差异。结果发现：地方品质的提升不仅显著促进本地地区的创新发展，还对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88]

三、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就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运筹与运营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金融工程、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研究、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数字化平台研究六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一) 运筹与运营管理

赵立三、王嘉葳和刘立军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税收杠杆对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调控作用,揭示了税收杠杆调控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作用机制。^[89]

李兴旺、陶克涛、张敬伟等回答了TMT竞争战略主导逻辑作为“管理工具”为什么能够发挥实践功效的作用机理,从理论上挖掘和释放主导逻辑作为管理工具的潜在价值。^[90]

Mao等通过研究公众和政府调整战略选择的动态过程,构建了新冠肺炎疫情下恐慌购买事件发展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后悔理论描述了公众在恐慌购买情境下对物品的感知价值,描述了谣言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恐慌购买事件的演变过程。^[91]

(二) 工业工程与管理

李向东、何有龙和耿立校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工业互联网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分析国外工业互联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92]

刘小艳、苏炜和刘景芝分析城镇化、技术升级与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互动关系,为制定物流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政策提供理论依据。^[93]

王英辉、吴济潇、赵书润等构建第四方物流与运输型物流枢纽整合模型,通过案例分析了第四方物流整合运输网络与第三方物流运输网络的成本优劣,为第四方物流的规模化运营提出建议。^[94]

赵莉琴、高敏和刘敬严以2005—2017年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区位熵和就业密度分析城市的物流业发展现状,运用PSM-DID分析高铁通车后对沿线城市物流的聚集

影响。^[95]

欧阳恋群和黄帝介绍了仓储、装卸、包装、车辆运营、各种运输方式、车辆路径规划及相关的法律要求、交易条款、保险、报关手续、出口单证等内容,提供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所需的知识。^[96]

(三) 金融工程

张岳和易福金实证研究了数字技术对中小银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前期难以实现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赋能作用。当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跨越阈值后,数字化转型将对中小银行产生明显的红利效应。^[97]

金浩、安明和刘德民从竞合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了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机构竞合关系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双方各关键参数和惩罚约束对二者合作稳定性的影响,利用数值仿真对模型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98]

王荣和叶莉探索了金融科技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且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有更加显著的提升效应。^[99]

李小青、何玮萱、霍雨丹等通过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100]

随力瑞和金浩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可以基于地理和经济联系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101]

(四) 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研究

张跃先、张星和崔航探究了内、外部激励对顾客契合的影响机制,以及内、外部激励间是否存在“侵蚀”效用。研究发现:内、外部激励间存在“侵蚀”效用,激励措施不能单独通过顾客参与作用于顾客契合。^[102]

吴树芳、高梦蛟和朱杰在构建用户社交网络的基础上,利用不同时间窗口的兴趣波动幅度计算关联用户的兴趣主题稳定度,并基于网络节点

信息和连接关系,计算用户间的多维相似度。^[103]

郭海玲和宋佳琳探讨了认知风格和任务复杂度对移动端视频用户学习型搜索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认知风格主要影响用户在学习型搜索任务下知识获取阶段、知识学习阶段和知识整合阶段的行为,任务复杂度对用户视频搜索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获取阶段。^[104]

李雪丽、黄令贺和陈佳星探索了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基于元分析构建的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能够全面地展示影响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的因素,为社交媒体平台功能完善和服务优化提供理论指导。^[105]

周颖玉、柯平和刘海鸥探讨了算法推荐伦理失范动因及人机共处方式。研究表明:应正视智能算法技术的两面性,通过人本价值观与技术规范性对算法推荐技术发展进行双重引导与规制。^[106]

Yan 等针对灾后早期救灾物资短缺问题,建立了考虑公平性的 LRP 多目标模型,引入精英对抗学习、非线性逃逸能量、多概率随机行走三种改进策略,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验证了 LRP 模型和混合元启发式算法的有效性和性能。^[107]

(五) 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梁林、段世玉和李妍构建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系统四维指标体系,评价了 2019—2021 年京津冀人力资源系统韧性现状。研究发现:从韧性治理看,北京、河北和天津适用的治理策略分别是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108]

杨春江和陈亚硕探究了领导的辱虐管理对员工继续留职工作的影响。研究表明:领导的辱虐管理会负向影响员工的留职,员工的愤怒和宽恕在领导的辱虐管理对员工留职的负向影响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109]

刘海鸥、马士锦、周颖玉等利用分布式数据库、哈希函数、时间戳、共识机制以及非对称加密等区块链技术,构建包括数据层、网络层、合约层、共识层、应用层的“1+N”分布式创客空间,形成高校学生、学院、校外合作企业等多主体协同的环链式创客空间人才培养机制。^[110]

徐姗、张昱城和张冰然等全面检验了挑战性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静态模型中挑战性工作要求通过工作专注度和放松作用于工作——家庭增益;在动态模型中挑战性工作要求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均通过减少员工工作专注度和放松度,进而降低工作——家庭增益。^[111]

胡望斌、张亚会和焦康乐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对认知视角下公司创业研究文献的数量变化、期刊分布、研究设计以及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分析,从组织、团队和个体层认知表征及其认知前因和认知结果构建认知视角下公司创业现有的研究框架。^[112]

(六) 数字化平台研究

魏杰、舒伯灿和卢静会研究了制造商的最优销售模式选择和制造商与平台商的退款保证策略。研究发现:在制造商同时选择两种销售模式情况下,当转售和代理模式下客户满意度都较高时,制造商始终倾向于提供退款保证而平台商始终倾向于不提供退款保证。^[113]

郑文、史可和朱静宜引入三阶组合信息对应度量:信息接受度、信息差异度及信息损失度,构建了封装 Consumer/Seller/Platform Agents 的 O2O 平台交易模型。结果表明:组合信息对 O2O 平台交易量、平均交易满意度、总利润与总交易成本产生影响。^[114]

周晓珺、潘宏亮和周耿在系统解析平台所有者锁定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成长机理的基础上,探讨了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的成长风险,并从多归属策略、收入多元化等方面提出了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成长风险的规避策略。^[115]

潘宏亮探索了创业者角色冲突对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基于知识的关键能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业者角色冲突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创业者角色冲突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116]

邵同、魏杰、常美静等在传统零售商投资和不投零售服务情形下制造商的最优入侵策略。研究发现,传统零售商投资零售服务会提升制造商以代理模式入侵的门槛,且制造商的入侵策略受消费者对线上产品的估值折扣影响。^[117]

Wei 等基于一个高质量产品制造商、一个低

质量产品制造商和一个平台商所组成的供应链,在考虑自有品牌溢出的情形下,研究了平台商的自有品牌策略和两个制造商的销售契约选择之间的交互影响。^[118]

尽管 2022 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河北省在管理科学相关问题研究上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第一,虽然 2022 年河北省在管理科学相关问题研究上发文量较多,但发表在管理类顶级期刊的论文数量较少,研究成果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大;第二,不同研究方向上的论文数量差异较大,评价理论与方法、复杂性与复杂系统、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方向拥有较多研究成果。

(魏杰: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Pan Y, Vieira J, Pärnamets P, Jangard S, Cheng X, Zhang Y, Olsson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s associated with prosocial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omparison of Swedish and Chinese samples[J]. *Emotion*, 2022.
- [2] 李子彪,王韬,聂永川,李银生.京津冀区域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2.
- [3] 徐双军,李岩松,曹胜昔,李春柳.健康中国背景下加快推动我国健康建筑新业态创新发展的思考[J]. *建筑经济*, 2022(6).
- [4] Zhao C, Wang F, Fang W.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to the reputation of Chinese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during COVID-19: An extension of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 [5] 严翠玲,申益嘉.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评《大数据与农业应用》[J]. *中国农业气象*, 2022(1).
- [6] 赵文燕,张世哲,师柳柳.具有工作站数量约束的多人工作站混合装配线平衡问题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22(4).
- [7] 张志颖,聂迎春,刘鑫.面向可选服务的产品服务系统配置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22(6).
- [8] Xing Y. Optimization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resource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method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under urb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2022.
- [9] Xing Y, Xin Q. Management cost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2022.
- [10] 范梅玉,杨庆舟,王强.组织公平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以河北省国有企业为例[J]. *运筹与管理*, 2022(10).
- [11] 陈娟,曹鑫鹏,鲁斌.不同碳约束机制下微能源系统多目标优化决策[J]. *电力科学与工程*, 2022(7).
- [12] 段晓晨,董茹萍,郝晶晶.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方案智能决策方法研究[J]. *铁道工程学报*, 2022(5).
- [13] 孙微,王豪,李世勇.部分服务员休假的 M/M/c 排队系统中的顾客行为及定价策略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2(3).
- [14] 代建生,刘悦.公平偏好和销售努力下供应链期权契约协调[J]. *中国管理科学*, 2022(7).
- [15] Zhang Y, Yue D, Sun L, Zu J. Analysis of the queueing-inventory system with impatient customers and mixed sales[J].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2022.
- [16] 刘鑫,吕荣杰,薛有志.“适应”还是“破坏”? CEO 外部继任对企业业绩影响的边界条件跨层次研究[J]. *管理评论*, 2022(3).
- [17] Ma H, Hao D.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2.
- [18] 杨勇,冯博,曹井柱.中国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动态演化——基于阴阳平衡的哲理分析[J]. *管理学报*, 2022(6).
- [19] 冯雪莲,郑楠.财务视域下对赌协议“股权回购”条款的价值选择[J]. *财会通讯*, 2022, (24).
- [20] 于强.河北省装备制造制造业竞争力现状与提升路径[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 [21] 董香兰.主动退市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J]. *财会通讯*, 2022(22).
- [22] 张志颖,康凯.产业互联网环境下中小制造企业绩效服务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
- [23] 高素英,陈雨婷,马晓辉.价值共创视角下制造业服务企业价值实现路径研究[J]. *财经理论研究*, 2022(5).
- [24] 杨宾宾,魏杰,宗义湘,王俊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J]. *统计与决策*, 2022(2).
- [25] 宁金辉.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融资租赁[J]. *当代财经*, 2022(6).
- [26] 苏锋.论中国动画产业发展模式的双重转型[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 [27] 侯孟阳,邓元杰,姚顺波.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10).
- [28] 郭子雪,杨雅旭,贺泽芳.基于概率语言术语集改进 TODIM 法的应急物流供应商评价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22(6).
- [29] Shi J L, Li C, Li H J.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s ICT sectors: from the embodied energy perspective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22.
- [30] 贾冀南,郭晓磊,王金良.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J]. *农业经济*, 2022(8).

- [31]程亮,杨风云.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研究[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22.
- [32]李涛,李国平,薛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经济发展的模拟仿真分析[J].地理科学,2022(2).
- [33]祁红梅.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的动态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2(3).
- [34]俞会新,吕龙凤,卢童.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有效劳动投入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2(5).
- [35]季文光,李志伟,许隼.基于时空变化及分布特征的海域重金属污染评价[J].山东农业科学,2022(8).
- [36]季文光,崔娟敏,成福伟,张坤,林永会.基于 DPSIR-KRUSKAL 的河北省土地生态安全模糊聚类评价[J].江苏农业科学,2022(6).
- [37]陈艳春,李佳丽.河北港口资源整合与区域经济贡献提升策略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6).
- [38]陈艳春,杨添天,杨继成.数字创新驱动下京津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策略[J].宏观经济管理,2022(5).
- [39]韩楠,罗新宇.多情景视角下京津冀碳排放达峰预测与减排潜力[J].自然资源学报,2022(5).
- [40]王韶华,赵暘春,张伟,刘晔.京津冀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达峰情景预测——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41]李子彪,王思惟,高光琪.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冰雪体育产业链的整合模式及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22(12).
- [42]刘霞,刘畅.组织污名化对“一带一路”企业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2022(20).
- [43]段洪波,冯茜.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以河北省 H 县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44]刘霞,刘畅.疫情跟踪审计三维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财会通讯,2022(3).
- [45]宫兴国,陈晨.商业信用、市场地位调节与异质性研发投入[J].会计之友,2022(2).
- [46]王雪莲,李娜,高凯凯,郭子秀.订阅型在线知识付费产品用户体验价值的层级路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2-4-15.
- [47]许艳静,朱建明.混合众包接方信息源可信对中标绩效的说服效应[J].管理科学,2022(3).
- [48]Li L, Wu Y, Han R, Li C. Airline service quality: a variance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complaint statistics. Journal of Serv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022(15).
- [49] Wang Ge, Du Q, Li X D, Deng X P, Niu Y L. From ambiguity to transparency: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2(4).
- [50]李素英,谢明明.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J].会计之友,2022(11).
- [51]Guo W, Zhang X. Regional tourism performance research: knowledge foundation, discipline structure, and academic frontier [J]. SAGE Open, 2022(1).
- [52]刘涛,康凯.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探索、风险和改善途径[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53]孙丽文,李少帅.风险情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信任机制建构与解析[J].中国科技论坛,2022(1).
- [54]治丹丹,任亮.社会·结构·制度·功能:同行评议韧性治理的四维路径——以区块链出版平台 Pluto Network 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1).
- [55]陈俊龙,唐秋.基于三阶段 DEA-Malmquist 方法的中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效率测度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2(3).
- [56]于会萍,宛玲.科学数据存储库的发展态势与推进策略[J].图书情报工作,2022(15).
- [57]姚立根,梁伟思,赵婷,黄新月.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理论模型构建与评价指标设计——基于协同创新视角[J].财会通讯,2022(16).
- [58]陈义忠,乔友凤,姚澜,牛云飞,杨灵芝.城市集群土地利用碳足迹时空分异及响应特征[J].环境科学与技术,2022(4).
- [59]赵文燕,张傲.考虑交付时间和退货等因素的零售商 BOPS 定价策略[J].商业经济研究,2022(17).
- [60]李峰,王科,赵毅.互联网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空间计量的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22(3).
- [61]张维冲,谭琪,孟浩,史胜安,祝娜.变革视域下碳达峰碳中和发展图景——基于媒体报道的量化分析[J].情报杂志,2022(10).
- [62]王林,王志华,赵杨.基于 fsQCA 的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构型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 [63]Jin H, Pang Y, Du X,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Prediction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vention Guided by the Realization of Occupational Values [J].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national, 2022.
- [64]任峰,龙定洪.广东省碳排放量测算、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选择[J].生态经济,2022(5).
- [65]赵斐,李鑫,郭明.考虑不完美维护的视情维修和备件订购联合策略优化[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10).
- [66]黄春萍,文雯,章静敏,王芷若.在线互动对跨界营销效应影响机制的计算实验研究[J].技术经济,2022(5).
- [67]李子彪,李晗.基于佩特里网的技术系统演化模型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2(18).
- [68]孙丽文,李少帅.基于多层次分析框架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22(3).

- [69] Han R, Li L, Zhang X,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coupl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aviation carbon emissions[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2(2).
- [70] 程慧, 贾广宇. 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机制探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 [71] 邹鑫, 王仁锋, 张立辉, 乞建勋. 计及软逻辑的重复性项目离散时间费用权衡及其约束规划模型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2(10).
- [72] 赵巧芝.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发展驱动力研究——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软科学, 2021(12).
- [73] 段晓晨, 钱睿, 徐达. 高铁区域水与动植物环境影响系统动力学评价方法研究[J]. 铁道学报, 2022(8).
- [74] 刘维庆, 张浩, 项志芬.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阶段风险传导研究[J]. 铁道工程学报, 2022(7).
- [75] 段晓晨, 鲍默, 孟春成, 董茹萍, 牛衍亮.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海外铁路建设项目投资风险评估研究[J]. 铁道运输与经济, 2022(7).
- [76] Li X, Cheng Y, Guo L, et al. A link-node-based complementarity model for traffic equilibrium with ride-sharing and trunk-sharing[J]. Transportation Letters, 2022.
- [77] Zhang P, Yu H, Shen M, et al.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ased on EBM model: The case of Hainan Island,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7).
- [78] 黄春萍, 毛璐, 娄云莹, 李争光. 组态视角下考虑伙伴重复性的联盟组合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20).
- [79] 张艳丽, 许龙, 王建华. 绿色创新视阈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模拟[J]. 企业经济, 2022(3).
- [80] 倪志宇, 曹群. 稳定脱贫背景下精准医疗帮扶的困境、创新与保障[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 [81] 张培, 杨惠晓. 数据重构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5).
- [82] 李小青, 李秉廉. 数字化创新研究热点演化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2(5).
- [83] 李媛媛, 陈文静, 王辉. 双重网络效应下科技金融政策创新绩效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22(3).
- [84] 程慧, 贾广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2(4).
- [85] 周瑾, 邢玉莹, 张聪. 史密斯模型下乡村人才政策执行阻碍研究[J]. 河北开放大学学报, 2022(4).
- [86] 程慧, 秦晓依. 基层环境政策“一刀切”执行逻辑与改进策略——以禁养区政策执行为例[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87] 孙佳勇, 宋亚军, 李海军. 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商贸流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体系创新探讨[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5).
- [88] 张超, 陈思, 兰宗敏. 地方品质与区域创新: 直接影响、溢出效应与空间差异[J]. 中国软科学, 2022(7).
- [89] 赵立三, 王嘉葳, 刘立军. 税收杠杆能够调控资产收益率宽幅度吗[J]. 会计之友, 2022(14).
- [90] 李兴旺, 陶克涛, 张敬伟, 贺妍婧, 李炳杰. TMT 主导逻辑从抽象概念到“管理工具”解构——一家企业竞争战略的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2(1).
- [91] Mao Q, Hou J, Xie P. Dynamic impact of the perceived value of public on panic buying behavior during COVID-19[J]. Sustainability, 2022(9).
- [92] 李向东, 何有龙, 耿立校.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外工业互联网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J]. 制造业自动化, 2022(9).
- [93] 刘小艳, 苏炜, 刘景芝. 技术升级与城镇化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机制——以物流业为例[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10).
- [94] 王英辉, 吴济潇, 赵书润, 张庆红. 基于第四方物流的运输型物流枢纽整合优化[J]. 铁道运输与经济, 2022(6).
- [95] 赵莉琴, 高敏, 刘敬严. 新发展格局下高铁对城市物流业集聚的影响[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3).
- [96] 欧阳恋群, 黄帝. 物流管理实战指南: 运输、仓储、贸易和配送[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
- [97] 张岳, 易福金. 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22(11).
- [98] 金浩, 安明, 刘德民. 数字经济下银行与金融科技竞合关系及优化路径[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1).
- [99] 王荣, 叶莉. 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路径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2).
- [100] 李小青, 何玮萱, 霍雨丹, 周健.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1).
- [101] 随力瑞, 金浩. 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4).
- [102] 张跃先, 张星, 崔航, 魏晓颖. 虚拟品牌社区中内、外部激励对顾客契合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2(2).
- [103] 吴树芳, 高梦蛟, 朱杰. 基于兴趣主题稳定性和多维相似度的社交用户兴趣挖掘[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12).
- [104] 郭海玲, 宋佳琳. 社会认知视角下移动端视频用户学习型搜索行为的影响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22(3).
- [105] 李雪丽, 黄令贺, 陈佳星. 基于元分析的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22(4).
- [106] 周颖玉, 柯平, 刘海鸥. 面向算法推荐伦理失范的人机和谐生态建构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10).
- [107] Yan T, Lu F, Wang S, et al. A hybrid metaheuristic algo-

- rithm for the multi-objective location-routing problem in the early post-disaster stage[J].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2023(6).
- [108]梁林,段世玉,李妍.数字经济背景下京津冀人力资源系统韧性评价与治理[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2(8).
- [109]杨春江,陈亚硕.认知-动机-关系理论视角下辱虐管理对员工留职的作用机制研究[J].管理学报,2022(5).
- [110]刘海鸥,马士锦,周颖玉,苏妍嫒,范力洁.基于区块链的“1+N”分布式创客空间人才培养机制构建[J].科技管理研究,2022(16).
- [111]徐姗,张昱城,张冰然,施俊琦,袁梦莎,任迎伟.“增益”还是“损耗”?挑战性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双刃剑”影响[J].心理学报,2022(10).
- [112]胡望斌,张亚会,焦康乐.认知视角下公司创业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管理学报,2022,(4).
- [113]魏杰,舒伯灿,卢静会.基于电商平台的最优销售模式和退款保证策略研究[J].运筹与管理,2022(7).
- [114]郑文,史可,朱静宜.考虑组合信息的O2O平台交易仿真[J].系统仿真学报,2022(11).
- [115]周晓璐,潘宏亮,周耿.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的成长风险及其规避策略[J].南京社会科学,2022(4).
- [116]潘宏亮.角色冲突对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J].科学学研究,2022(11).
- [117]邵同,魏杰,常美静,徐泽灵.考虑传统零售商零售服务投资的制造商入侵策略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12).
- [118]Wei J, Xu Z, How does manufacturer's self-operating channel interact with platform retailer's E-commerce brand introduction? [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2022.

工商管理研究

王冬年

2023年河北工商管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高管激励、企业绿色创新、领导者韧性、员工创造力、旅游城镇化等方面。

一、企业管理

(一) 经营管理

沈占波等分析了平台型企业开放式创新风险与治理所面临的主体间性与主体性、重内源性风险与轻外源性风险、碎片化治理实践与联动式治理需求、静态化治理与动态化演变四对矛盾焦点,提出了遵循风险可控与可治相结合的理论逻辑、他治与自治相结合的实践逻辑、硬契约约束与软契约约束相结合的规则逻辑,构建了树立风险治理新理念、发展数字化治理新技术、构造多主体参与的风险治理新格局、打造动态化风险治理新局面的“四位一体”创新风险治理范式。^[1]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边界条件。李小青等研究发现: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受营商环境的影响。当营商环境水平高于门槛值时,数字化创新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当低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减弱甚至不再显著。^[2]

马晓辉等以海尔为研究对象,探索在数字化环境影响下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演化过程,指出数字化转型企业经历探索期、发展期与扩展期三个阶段,对比三阶段商业模式创新过程发现,企业经历由平台模式向社群模式再向生态系统演化,各阶段价值创造逻辑分别呈现价值主张更新、价值网络重构和价值生态共建演变过程。^[3]王小平等研究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新实体零售业成长的微观机制表现为:以零售企业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以数字化为手段,以数据赋能为动力,以提升经济价值为目标,促进传统零售业向新实体零售业的转型升级。其实实现路径表现为从要素数据化、数据赋能智慧化到数字化治理的过程。新实体零售业成长是零售业“技术——经济范式”的表现。^[4]

吕荣杰等从人工智能应用视角探讨了服务化转型与就业技能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有助于优化就业技能结构,人工智能应用正向调节服务化转型与就业技能结构之间的关系。顾客支持类服务可以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应用在转型过程中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受限于制度约束,使得在人工智能应用

的过程中,服务化转型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明显,而非国有企业则反之。^[5]

新冠疫情给企业发展带来冲击,特别是对规模小、投入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影响尤为突出。王丽媛等研究发现:智力资本的三个维度,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均对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影响最为显著,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中介效应明显,表明智力资本有利于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组织绩效。^[6]

林妍等对环保费改税、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可持续竞争力三者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工业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显著正相关;环保费改税显著提升工业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并显著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作用。^[7]

李艳双等采用扎根理论数据编码技术对案例数据进行编码处理,归纳总结得出家族企业企业家精神以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为内核,以学习精神、进取精神、合作精神、担当精神、探索精神、冒险精神等为外延要素组合而成。企业家精神通过促进转型战略规划、执行及控制等活动驱动家族企业区域转型战略的实施。^[8]杨在军等在诠释结构惯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基础上,考虑二代涉入因素,探索其对结构惯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惯性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创新绩效;二代所有权涉入对结构惯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二代管理权涉入却能够抑制结构惯性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9]

企业是我国企业新型学徒制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完善其参与学徒制的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荣冀川等研究发现,推进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法规在制度保障方面还存在不足、产教融合企业数量分布不均、中小微企业参与学徒制保障措施不足、激励机制不完备。^[10]

为了探究跨国制造商与本土供应商的技术投资模式选择问题,张敬等构建跨国制造商为 Stackelberg 领导者的双源采购供应链模型。研究发现:在贸易信贷模式下,当贸易信贷利率较低时,本土供应商的技术投资水平更高;在纵向并购模式下,当利润分配比例处于适当范围时,跨

国制造商与本土供应商存在帕累托改进区域,且纵向并购模式优于贸易信贷模式;当关税较高时,跨国制造商的利润降低,但跨国制造商与本土供应商更可能达成战略联盟。^[11]杨栋旭等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12]

刘鑫等基于我国特定管理情境,将“组织适应论”与“组织破坏论”两种理论观点加以整合,探索影响 CEO 继任来源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情境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 与高管团队成员的相似性有助于外部 CEO 继任者发挥“适应性效应”,提升继任后企业业绩;CEO 职能背景的丰富性和继任前企业业绩加强了外部 CEO 继任者的“破坏性效应”,降低继任后企业业绩。^[13]宣杰等研究业绩型股权激励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股权激励业绩目标的内容中包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这一条件时,企业更有动机进行分类转移;业绩目标设定越高,越有可能进行分类转移。同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会抑制业绩型股权激励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4]

王荣等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且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有更加显著的提升效应;企业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在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正向的链式中介作用,“金融科技→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系数为 0.0105,企业创新绩效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其中有 0.0105 个百分点是通过该链式中介路径实现的。^[15]王薇等考察并购对目标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能够显著改善目标企业环境绩效,特别是独立董事占比、两权分离度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目标企业,并购对其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更强。并购能够促使目标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来促进其技术创新、通过降低经理人代理成本以及抑制大股东侵占来改善其环境治理效率,进而提升目标企业

的环境绩效。^[16]

邢会等研究发现：增值税改革能够通过增加优质服务要素投入等四个方面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增值税改革对所有制、生命周期、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在服务化水平改变上存在差异。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以及与服务业关联程度大的企业更明显。^[17]

支凤稳等研究指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对20项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简称CI）的需求程度不尽相同，既有共性需求，也有个性化需求，同行业竞争对手情报和创新策略情报是所有企业最迫切、最稳定的CI需求。中型、小型、微型企业的CI需求相对集中，而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企业CI需求差异明显。^[18]

（二）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

张培等提出数据驱动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要素维度要从“二维”（主体与业务）拓展到“三维”（数据、主体和业务）。分析认为：数据资源对传统资源要素的重构包括业务重构型、主体重构型及主体和业务融合重构型3种组合类型；数据驱动平台商业模式创新有3条实现路径，从供应端重构实现价值主张推动式创新、从需求端重构实现价值使用拉动式创新、供应端和需求端互动重构实现推拉结合互动式创新。^[19]平台经济作为新兴的商业模式，逐渐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同时对我国“搭便车”行为提出了新的监管要求。刘德民等以零售商、零售平台和消费者为主体，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当零售商平台定向输出信息广告投入水平大于平台非定向输出信息广告投入水平时，零售商会舍弃“搭便车”行为，消费者也会选择分享信息。^[20]

刘琳等研究发现：当知识共享成本提升时，只有当顾客和企业的参与意愿较高时才会促使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且延缓了知识共享产生的进程；当知识共享收益增加时，能够增强顾客参与知识共享的意愿并且能够加速知识共享进程；当顾客和企业的知识储备量存在差异时，这种差异会一定程度上延缓和抑制知识共享进程，相比之下，当顾客所掌握的知识的储备量大于企业的知识储备量时将更不利于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当

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的初始概率较低时，可以采用为企业制定较高的收益分配系数的方式来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产生，但是在确保知识共享行为发生的前提下，为企业分配较多的知识共享收益会延缓知识共享行为产生的速度，此时，加速知识共享行为产生的有效策略是为顾客分配较多的共享收益。^[21]

在线互动对于提高跨界营销效应具有重要作用。黄春萍等研究表明：激励强度正向影响跨界产品的销量绩效，但对品牌资产绩效作用不明显，情感引导力度对跨界产品销量绩效和品牌资产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作用，网络关系有助于跨界产品的扩散及企业品牌资产绩效的提升，但网络规模的作用效果不确定，综合引导策略在整体表现上均优于单一引导策略。^[22]

伴随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已渗透到服务消费中诸多方面，人工智能信息透明与顾客契合的关系亟须探索。杨志勇等研究发现：AI信息透明对顾客契合行为存在显著积极影响，AI信任在AI信息透明对顾客契合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AI拟人化调节AI信息透明与顾客AI信任的关系，AI拟人化调节AI信息透明与顾客契合的关系。^[23]

王林等指出，以场景来触发购物欲已成为商家营销的重要手段，探究视觉知觉线索、质量安全线索和时间线索三个层面的七个条件与感知愉悦、感知信任的交互组态效应对执行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不是产生高或非高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的必要条件。实现高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的驱动机制包含1个整体解，分为4条路径，揭示了高隐私保障感知是导致高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的核心条件。非高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的驱动机制分为6条路径，且与高执行意向的驱动机制存在因果非对称关系。^[24]

郑文等通过对云南宽谷糖业有限公司的纵向追踪研究，引入战略认知构念，探讨新消费情境对战略行动演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新消费情境下新创企业的发展历程会经过单点突破、多元发展和场景延伸三个阶段，政策因素、技术因素与市场因素作为外部情境因素贯穿于上述三个阶段并驱动战略认知与战略行动的演化。战略认知包含战略重心、认知互动和战略导向三要素，

传导新消费情境到战略行动的机理体现为通过识别外部情境形成企业战略重心,经过认知互动后确定战略导向,继而明确战略行动。新消费情境、战略认知和战略行动演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演化关系。^[25]

(三) 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高管薪酬契约也广受关注。孙多娇等研究发现: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公益类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超额雇员、过度投资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员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规模越大,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过度投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越显著。^[26]

臧秀清等研究发现:高管股权和货币薪酬激励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市值管理水平,但由于货币薪酬激励并不是抑制代理成本的有效方法,因而企业不能通过提高高管的货币薪酬达到减少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市值管理效果的目标。^[27]李春玲等研究发现:问询函的监管作用确实提高了高管变更的概率,当问询函中涉及资金占用时,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增大,问询函对高管变更的监管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及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显著。^[28]刘冀徽等研究发现:具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具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能够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在降低创新风险的情形下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拥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具有较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推动企业展现更大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力。^[29]

仲旭等研究发现:战略激进度促进了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公司战略越激进,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在不同负债水平下,战略激进度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战略激进度对慢时钟行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更为重要,而对快时钟行业的影响并无明确的方向性。^[30]徐金球研究了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沪深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最优杠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冲击具有显著的去杠杆效应,上市公司杠杆率比疫情前平均下降了4.2个百分点,

债务期限温和地延长了。这种去杠杆效应在那些面临债务展期风险的公司表现更为明显,而那些经营活动严重依赖社交距离的公司并没有降低其杠杆率。^[31]

宫兴国等研究发现:战略越激进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在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正相关关系越显著。^[32]陈晶璞等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负相关,即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且中小企业较高的供应商、客户和供应链集中度均能够正向强化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33]王佳等研究发现:碳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审计质量强化了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在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下,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的缩小强化了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34]宁金辉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融资租赁规模。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减少了重污染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使其不得不选择融资租赁的方式来弥补长期资金缺口。^[35]

二、技术经济及管理

平台主导者的网络效应和赢者通吃效应致使平台依附型创业者在平台演化过程中不断面临角色冲突,创业者角色冲突势必影响到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绩效。潘宏亮研究发现:创业者角色冲突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创业者角色冲突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独占能力正向调节创业者角色冲突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管理能力正向调节创业者角色冲突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新创企业的企业年龄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36]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增强发展韧性、提升创新水平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恩极等研究发现:企业韧性水平的差异会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产生门槛效应,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低韧性企业会减少创新活动,高韧性企业会增加创新活动;企业韧性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市场化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均存在;不同韧性企业的创新收益预期、融资约束和管理层风险偏好对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37]

孙丽文等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经历了技术保护期、积累探索期和战略发展期，已经跨越技术生态位和市场生态位，并迈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社会技术范式加速形成；核心企业的发展战略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技术地景正向迁移对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需要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紧密合作与相互协同。^[38]

李国柱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耦合协调度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企业绿色创新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耦合协调度的促进效应在整体水平上呈现上升趋势。^[39]王智新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金融发展、研发创新和产业结构突破自身门槛值，数字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异质性。^[40]边明英等探讨了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41]

李小青等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数字化创新人才储备对数字化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最大，资金获取次之，资源整合和经济基础的影响相对较小；现阶段京津冀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出能力整体较弱，远低于数字化创新投入能力，且传统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数字化创新能力普遍低于北京市。^[42]孙颖等从网络关系维度、资源配置维度和信息传递维度三维并进视角构建中国科技服务企业服务创新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中国科技服务业3个维度整体保持着协调并进的发展水平，但还存在着三维内部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低的问题；中国科技服务业三维并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上体现为东部地

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态势；企业规模、企业数字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在科技服务业三维并进中作用显著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和产权性质异质性。^[43]

王薇等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44]李西文等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能力受风险投资背景影响显著。与政府背景相比，非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显著；风险投资经验越丰富越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但对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影响为负。^[45]

李延军等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股票流动性与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股票流动性对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在初创期与成长期最大，对研发投入效率的影响在成长期最大，两种影响都在衰退期达到最低，表现出周期性规律；随着股票流动性变化，其对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在初创期并不明显，但在成熟期和成长期表现为积极的正向影响，随后进入衰退期出现较大起伏和阶段性负向影响。^[46]张雨等研究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47]

科技型企业是创新活力之源，科技金融政策是创新助推之器。资金网络将企业与资金供给方紧密连接，知识网络将企业与知识元素相互匹配，两者都是企业满足创新需求的重要媒介。李媛媛等研究发现：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类和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资金网络中心度增强了资金支持类和

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导向类政策的不足之处；知识网络中心度增强了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类、专利保护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48]朱清香等研究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技术型董事正向促进了二者间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在自主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技术含量和市场导向性不同，但是都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49]

三、人力资源管理

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创业团队能否形成韧性是其存活甚至撬动未来发展的关键。梁林等立足于 15 个应对新冠疫情冲击较为成功的创业团队案例，对危机冲击下领导者韧性引领创业团队韧性形成过程进行的研究发现：领导者韧性是与危机冲击过程相匹配的个体特殊能力，表现为快速反应力、洞察决策力和反思预见力的动态组合；领导者通过塑造自身韧性，引领创业团队形成团队韧性，其中经过激活存量、开发增量和把握变量的三重修炼；创业团队韧性是在危机冲击下由领导者韧性引领形成的团队整体能力，由抵御能力、适应能力和进化能力动态构成。^[50]

关于领导者胜任素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已经有较为充分的论述，中外学者对于领导者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胜任素质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邢明强等研究指出：中高层领导者的最内层、中间层和最外层胜任素质对组织绩效均有显著影响，且三种影响的相关系数无显著差异；研究时间和文化背景会显著调节中高层领导者不同层次胜任素质与组织绩效的关系。^[51]

为了避免“一言堂”式的决策风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推行决策参与，以更好地应对激烈的环境变化。高记等分析发现：决策参与对员工建言行为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即合理的决策参与能够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对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决策参与会提升组织自尊，进而促进员工建言；对于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员工，决策参与会加重员工的自我损耗，从而抑制员工建言。^[52]员工间知识共享行为作为企业知识资源的积累和更新的重要来源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源

泉，同时员工间知识共享行为又受到组织环境、员工观念、技术环境等多方面制约。范梅玉等以河北省国有企业为例，研究发现：组织公平、组织嵌入对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组织嵌入在组织公平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53]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越来越普遍。马丽等研究发现：主动性/被动性工作连通行为分别对员工创造力起正向与负向作用；工作繁荣和情绪耗竭在主动性/被动性工作连通行为与员工创造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正向调节主动性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繁荣的关系并负向调节被动性工作连通行为与情绪耗竭的关系；组织支持不仅调节了主动性工作连通行为通过工作繁荣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还调节了被动性工作连通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54]

杨春江等对中国情境下工作嵌入效应的元分析进行了研究，发现：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具有高度的负向影响；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均能负向影响离职意愿，且前者更具影响力；两类经典测量工具对嵌入与离职意愿的关系没有明显影响，即组合量表和整体量表能够同等效度地测量工作嵌入构念；嵌入的三类力量均能显著影响离职意愿，且组织匹配效力最大；与非新生代员工相比，新生代员工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力较低；工作嵌入与各类型绩效（工作绩效、任务绩效、情境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创新行为）、员工积极态度和认知（工作满意、组织承诺、组织认同、工作投入）呈正相关关系。^[55]

失败恐惧既可抑制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亦可激励创业者付诸更大努力以取得成功。涂玉琦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分析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创业失败恐惧来源，认为：前者更多关注创业者内部，即以自我为核心评价失败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利后果而产生恐惧；后者侧重从外部人际关系考虑，即以他人为中心，强调自己与周围关系的联结变化带来的恐惧。^[56]

杨勇等遵循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对 36 万余字的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创始领导者受阴阳平衡哲学的影响，其悖论认知框架包括整体性（7 个范畴）、平衡性（3 个范畴）和动态性（3 个范畴）3 个维度；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面临的悖论问题越来越复杂，企

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也越来越复杂与抽象化,其采取的悖论管理策略也倾向整体综合化。^[57]张敬伟等以43个农村女性创业案例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探究并构建了农村女性创业者身份构建的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创业者的身份构建涉及身份感知、身份冲突、身份工作和身份实现4个阶段;农村女性在内外诱因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创业需求,但由于创业需求与个体自我境况感知存在差异,由此引发身份冲突;在个人信念和个人责任感的影响下,选择继续创业的农村女性会开展身份分离、身份塑造和身份认证等一系列身份工作,并最终通过身份巩固和身份延伸实现其创业者身份。^[58]

四、旅游管理

旅游城镇化已成为区域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翁钢民等研究指出: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虽偶有起伏但较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空间上大体呈不均衡分布态势、差异较显著,最终形成西北强势、南部次之、中部弱势的分布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59]刘静等以京津冀为例研究了科技创新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发现: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总体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但整体来看耦合协调度差异呈波动缩小的收敛态势。^[60]

程瑞芳等指出长城河北段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域,布局长城文化旅游带空间结构,有利于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和长城文化旅游新格局的形成。长城文化旅游带空间要素旅游化利用方面存在文旅资源旅游转化利用率低、文旅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文化挖掘与资源整合不足、长城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不高等问题。^[61]

梁慧超等研究了数字技术推动旅游业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指出:数字技术对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因产业链条的复杂性,数字技术的推动效果有所差异;由于能够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市场环境在数字技术对旅游业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中起显

著的正向调节作用。^[62]

降向端等认为,文旅业已经成为促使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驱动着乡村空间环境更新与创新利用。从传统村落空间环境更新利用来看,具体表现为三种主要倾向:优化乡村空间环境与风貌景观,营造村落旅游魅力场景氛围;挖掘物质空间遗产资源,打造乡村文旅的核心吸引物;利用闲置空间充实乡村旅游业态,完善旅游服务配套体系。^[63]张京京等分析了网络营销对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网络营销对不同分位点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差异化效益提升效应,发现:利用网络对外推介或开展电子商务的网络营销,可以显著提高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网络营销的效益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增加游客人均消费而非接待人次实现的;对于低分位点即经营状况相对较差的乡村旅游经营者,网络营销的效益提升作用较大,因而网络营销具有经营效益“拉平效应”。^[64]孙泽笑等以昆明市东川区为例实证研究了生态脆弱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村民环保意识、乡村旅游参与度等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较显著。游客满意度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景点丰富度、乡村旅游业收入占当地村民收入的比重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尤为显著。^[65]

张博等深入探讨我国研学旅行发展现状,对区域网络关注度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学旅行前期增长较快,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后续发展明显放缓;主动关注较少,研学旅行网络关注度呈现出季节性波动特征,相关搜索内容和搜索时间都与工作密切相关;区域发展不均衡,中部地区的关注度较高而西部及港澳台地区偏低;基地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是研学旅行网络关注度的主要影响因素。^[66]

李鹏等以青岛市为例构建了基于格网化的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方法:一是根据社会经济、人口数据空间化分析方法,进一步提出旅游资源的格网化概念及其构建方法,探讨了旅游资源格网化空间拟合模型、格网单元尺度的选取等方法。二是从主观旅游资源本体角度和客观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角度分别构建了基于格网化的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方法。^[67]

舒波等构建了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结构视角下,以粤、京、沪为首的 15 个省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渝、桂、琼为首的 16 个省份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我国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量两个方面的水平较高,但规模化、高级化的质和效益表现的水平有待提高。^[68]

(王冬年: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沈占波,代亮.失范与重构:数字化时代平台型企业开放式创新风险与治理研究[J].河北学刊,2022(1).
- [2] 李小青,何玮萱.数字化创新、营商环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11).
- [3] 马晓辉,高素英,赵雪.数字化转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演化研究:基于海尔的纵向案例研究[J].兰州学刊,2022(6).
- [4] 王小平,刘佳,韦巍巍.数字经济时代新实体零售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良品铺子”和“三只松鼠”双案例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4).
- [5] 吕荣杰,李文慧,张义明.服务化转型与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基于人工智能应用视角[J].软科学,2022(12).
- [6] 王丽媛,刘爽,姚春良.新冠疫情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3).
- [7] 林妍,李桂萍.环保费改税、绿色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可持续竞争力[J].财会通讯,2022(12).
- [8] 李艳双,李欣,朱丽娜等.企业家精神驱动家族企业区域转型的影响机理剖析[J].财会月刊,2022(4).
- [9] 杨在军,张可.结构惯性、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商业研究,2022(5).
- [10] 荣冀川,贾竞伟.中国特色学徒制中企业参与机制改革研究:以河北省企业新型学徒制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36).
- [11] 张敬,付芳源,王苗苗等.关税影响下双源采购供应链技术投资模式研究[J].工业工程,2022(6).
- [12] 杨栋旭,于津平.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J].国际经贸探索,2022(5).
- [13] 刘鑫,吕荣杰,薛有志.“适应”还是“破坏”? CEO 外部继任对企业业绩影响的边界条件跨层次研究[J].管理评论,2022(3).
- [14] 宣杰,张盛俊,高新宇等.业绩型股权激励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2022(4).
- [15] 王荣,叶莉.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路径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效应模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2).
- [16] 王薇,田卓岳,田利辉.并购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绩效?[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4).
- [17] 邢会,张金慧,谷江宁.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产业经济评论,2022(1).
- [18] 支凤稳,郑淳元,赵梦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竞争情报需求关联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2).
- [19] 张培,杨惠晓.数据重构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科技管理研究,2022(5).
- [20] 刘德民,随力瑞,卢颖.电商平台反“搭便车”三方演化博弈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12).
- [21] 刘琳,王玖河.基于演化博弈的顾客知识共享决策行为研究[J].科研管理,2022(2).
- [22] 黄春萍,文雯,章静敏等.在线互动对跨界营销效应影响机制的计算实验研究[J].技术经济,2022(5).
- [23] 杨志勇,翟少铃.服务消费中人工智能信息透明与顾客契合的关系研究:基于顾客信任和拟人化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4).
- [24] 王林,王志华,赵杨.基于 fsQCA 的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构型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 [25] 郑文,张喆,朱静宜.新消费情境与战略行动的互动路径研究:基于战略认知的传导作用[J].技术经济,2022(9).
- [26] 孙多娇,闫珍丽.激励目标异质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来自国有企业分类的经验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27] 臧秀清,傅妍,邹玥.高管激励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效果吗?来自 A 股资本市场的证据[J].会计之友,2022(11).
- [28] 李春玲,李思奇,魏晓璠.问询函监管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J].会计之友,2022(15).
- [29] 刘冀徽,田青,吴非.董事长研发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J].技术经济,2022(8).
- [30] 仲旭,路栋,博邵楠.战略激进度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J].财会月刊,2022(21).
- [31] 徐金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企业资本结构与最优杠杆率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2(6).
- [32] 宫兴国,于月莉,林春雷.战略激进、市场化进程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2).
- [33] 陈晶璞,骆良真.供应链集中度、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 [J].武汉金融,2022(6).
- [34]王佳,冯轶慧.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审计质量与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双重考虑[J].金融与经济,2022(9).
- [35]宁金辉.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融资租赁[J].当代财经,2022(6).
- [36]潘宏亮.角色冲突对平台依附型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J].科学学研究,2022(11).
- [37]李恩极,张晨,万相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企业韧性视角[J].当代财经,2022(10).
- [38]孙丽文,李少帅.基于多层次分析框架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22(3).
- [39]李国柱,张婷玉.环境规制耦合协调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非平衡面板分位数回归的研究[J].生态经济,2022(12).
- [40]王智新,朱文卿,韩承斌.数字金融是否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科技论坛,2022(3).
- [41]边明英,俞会新.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J].技术经济,2022(5).
- [42]李小青,何玮莹,李子彪等.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22(16).
- [43]孙颖,梁蕾,毛维.中国科技服务企业创新有效性水平测度与省际比较:基于三维并进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2(7).
- [44]王薇,田利辉,鲍静海.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45]李西文,杜旭,彭皓钰.风险投资背景异质性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会计之友,2022(22).
- [46]李延军,李孝文,王诗惠.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互联网公司股票流动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J].金融发展研究,2022(2).
- [47]张雨,吴先明,周伟.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18).
- [48]李媛媛,陈文静,王辉.双重网络效应下科技金融政策创新绩效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3).
- [49]朱清香,赵文辉,张蓓蕾等.自主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技术型董事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J].会计之友,2022(1).
- [50]梁林,李妍,韩提文.领导者韧性如何引领创业团队韧性的形成:基于15个创业团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多案例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22(7).
- [51]邢明强,曹鹏.中高层领导者胜任素质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元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2).
- [52]高记,段蓉蓉.决策参与一定能广开言路吗?一项“双刃剑”效应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2(11).
- [53]范梅玉,杨庆舟,王强.组织公平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以河北省国有企业为例[J].运筹与管理,2022(10).
- [54]马丽,唐秋迢.“持续在线”的连通行为如何激发员工创造力:一个双路径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22(2).
- [55]杨春江,陈亚硕,赵新元,等.中国情境下一项关于工作嵌入效应的元分析研究[J].管理评论,2022(7).
- [56]涂玉琦,郝喜玲,杜晶晶.创业失败恐惧的来源与差异性分析[J].企业经济,2022(8).
- [57]杨勇,冯博,曹井柱.中国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动态演化:基于阴阳平衡的哲理分析[J].管理学刊,2022(6).
- [58]张敬伟,李琪琪,靳秀娟.中国农村女性创业者的身份构建过程研究[J].管理学报,2022(5).
- [59]翁钢民,唐亦博,宋娜等.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2(5).
- [60]刘静,王宝林,刘朝峰.科技创新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以京津冀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6).
- [61]程瑞芳,徐灿灿.长城文化旅游带空间结构布局及发展策略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2(1).
- [62]梁慧超,任俐璇.数字技术推动旅游业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财贸研究,2022(6).
- [63]降向端,吴珊珊.文旅驱动下传统村落空间环境更新利用[J].建筑经济,2022(5).
- [64]张京京,刘同山,钟真.网络营销提升了乡村旅游经营效益吗?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2(3).
- [65]孙泽笑,赵邦宏,秦安臣,等.生态脆弱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昆明市东川区为例[J].生态经济,2022(3).
- [66]张博,吴柳.网络关注度视角下研学旅行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2).
- [67]李鹏,虞虎,李仁杰等.旅游资源网格化框架及其空间分析方法:以青岛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1).
- [68]舒波,靳晓双,程培嫻.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2(24).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

宗义湘

一、2022 年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总体概况

2022 年,河北省农经学界立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目标,把握农业经济领域前沿问题,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深入剖析热点议题,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省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研究维度来看,农林经济管理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其中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产业融合与产业发展、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数字化与电子商务、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城乡融合与乡村治理、人力资本与农民培育、农业契约与农户行为等成为河北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重点领域。

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2022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2022 年,河北省学术界就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商扶贫、扶贫绩效评价等问题展开研究。

中国扶贫战略重点由全面脱贫攻坚目标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康晗考察河北地方相对贫困治理实证,提炼出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产业技治、文化内治、社会共治、民生善治及生态法治为手段“一核五治”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从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协同治理、收入增长及法律保障六方面架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1]

我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到底怎样?各地区间的差距如何?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薛龙飞等探寻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5 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 2009—

2018 年中国 30 个省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研究区域差异,并根据 Markov 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提出要充分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合资源禀赋协调区域差异,切实实现各地区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优化。^[2]中国农村地区广阔,与日本面临着相似的“三农”问题,韩克勇等在解析了日本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八头町、神山町和西粟仓村三个典型案例的创新实践为例,得到启示:一是因地制宜选择乡村发展模式,二是构建多层次协作网络和机制,三是推动六次产业多元化发展,四是挖掘和引进创新人才,五是打造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系,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3]

农村电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可持续扶贫的新动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康凯和栾新风根据农村电商扶贫实践构建了电商扶贫供应链,考虑农户的生产努力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的销售努力,以无政府补贴为基准模型,从不同补贴主体角度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探讨了政府补贴对可持续扶贫的有效策略,为政府制定可持续扶贫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参考。^[4]此外,段洪波和冯茜探讨了金融如何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于 5E 审计理念,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5 个角度,构建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H 县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并提出改进建议。通过建立一套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可以检验依托财政贴息的金融扶贫效果,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效率性,提升资金使用成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5]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杨念和王蔚宇实证测度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状况。选取 2000—2019 年我国农业发展相关数据,通过构建涵盖农业发展、环境条件、资源条件与经济条件四大子系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结合障碍度、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度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研究得出: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障碍度较高,经济条件的最小,农业发展的适中;从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角度来看,农业发展、环境条件、资源条件、经济条件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呈极度耦合,四大子系统之间均呈现高度耦合关系。〔6〕

三、产业融合与产业发展

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2022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就乡村产业融合、不同产业(苹果、肉牛、生猪等)发展等问题展开研究。

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拓宽乡村产业发展空间的有效渠道,杨宾宾等通过构建乡村产业融合指标体系,并以河北省为例展开测度,探索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分为三个梯队,分别是发展实力较强、发展实力中等和发展实力较弱,河北省现行的乡村产业融合措施较为得当。分维度指数测算结果表明11个地级市在产业融合发展中各具特色,应依据自身禀赋,补齐短板促进多形态、多业态的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有效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7〕

我国苹果产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产效率偏低等困境,王聪聪等研究苹果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态变化及产区差异,以期促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04—2018年我国8个苹果主产区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L指数,对我国苹果环境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不同产区之间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我国苹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各产区要通过因地制宜制定苹果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借助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优势、加强果农高素质培训等方式提高苹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8〕此外,李嫣资等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分块模型(SBM)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来衡量农业效率、全

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要素。通过分析过去的农业生产力和预测影响未来整体生产的因素,有助于带来革命性的变化。〔9〕

肉牛生产是肉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赵慧峰等对不同肉牛生产系统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展开研究。基于218位中国农民和12个政府的数据构建DEA模型,对三种主要肉牛生产系统的技术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利用Tobit模型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系统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要根据生产系统的实际和特点采取措施,适用于其他系统或地区的政策可能不适用于特定情况;生产者所拥有的知识应该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行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因此,要实现可持续性,政府应充分考虑当地养殖模式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所要实施的政策的预期效果。〔10〕

在非洲猪瘟疫情与猪价低迷的双重影响下,河北省生猪产业面临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丛林等分析了当前河北省猪价低迷的主要成因(生猪产能恢复超过预期、压栏导致生猪活重偏高、市场消费需求相对疲软、恐慌出栏加剧价格下跌、进口猪肉拉低市场价格),并从养殖成本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动物疫病对养殖生产的影响、产能恢复后的不确定性影响、“分区防控”下的多重影响四方面剖析了制约河北省生猪产业发展的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河北省生猪产业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强预警,稳定市场价格;继续强化动物疫病防控;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落实“分区防控”重点工作;规划布局产业集群建设。〔11〕

四、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近年来河北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2022年,河北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用水安全、农业碳排放、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等。

目前中国农业农村工作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十四五”时期将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实质行动的五年。宗义湘和崔海霞认为与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绿色转型背景类似,中国同样面

临农业环境问题、消费升级以及 WTO 规则约束问题。因此,借鉴欧盟交叉遵守机制,将环境规制真正嵌入农业政策,切实发挥农业支持政策在保护环境、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树立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长久观、政策设计应侧重权责对等、构建可选择性交叉遵守试验区以及完善农业咨询服务等配套措施的政策建议。^[12]张桢楠和尉京红认为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生产技术是突破资源环境限制、提升小麦、玉米 GTFP 的关键,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依托技术效率的提升。^[13]周繁和王丽丽分析和评价了河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区域特征,发现河北省内区域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环京津城市、省会城市农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城市。并且从强化绿色发展意识、构建绿色发展支撑体系、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助力。^[14]

在畜禽养殖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需要关注由此带来的局部区域资源超载的风险。韩冬梅等基于“短板理论”构建了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指数,分析了 2010—2019 年中国 29 个省份的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及短板要素,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省域风险的集聚性。研究表明:耕地资源承载风险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养殖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且存在较高的风险集聚性;水资源约束是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的最大短板;养殖重点发展区域普遍资源承载风险较高,存在资源要素短缺的风险。由此提出建议:构建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长期评估和预警体系,将最稀缺的“短板”要素作为最重要的警示要素,在区域养殖规划中采取“以短定养”;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坚持种养结合是降低耕地资源承载风险的重要途径;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与资源环境协作机制,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尤其应关注风险较大的养殖重点地区。^[15]

如何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用水安全协调发展对京津冀改善生态环境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刘苗苗等通过构建粮食安全与农业用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GWR 模型,分析 1985—2018 年京津冀粮食安全与农业用水安全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及驱动力。认为京津冀粮食安全与农业用水安全耦合协

调关系有待进一步提升,各功能区内耦合协调关系发展差距较大,未来应在考虑不同地区实际差异基础上,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以缓解水粮矛盾问题。^[16]

农业低碳化是影响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方面,周一凡等探讨了如何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差异化农业碳减排政策。研究得出:农业碳排放的热点分布与农业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县域农业碳排放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农业碳排放对本地区碳排放有正向作用。^[17]侯孟阳等认为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18]

农业经济发展是农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农业产业结构、机械化程度、化肥施用强度、农村能源消费和农民收入是驱动农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玉米秸秆还田技术是我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技术模式,也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重要途径。陈柏旭等探究了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意愿并对技术采纳的补偿标准进行精准测度,有助于建立秸秆还田技术持续推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19]

五、农业数字化与电子商务

在农村互联网快速下沉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在“三农”领域的综合应用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互联网与传统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成为政策关注和学者研究热点,2022 年,河北省学者主要探讨了农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农村电商与生鲜物流协同度、网络营销助推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等问题。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产业互联网与农业产业融合的数字农业成为农业新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陆刚在构建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农业概念理论逻辑基础上,探索实践中存在的区域特色农业产业链重构、农业产业平台化集聚经营和数字技术驱动的协同联动三种融合模式,并对每种融合模式需要具备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推动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农业融合发展,需要根据当地资源条件选择并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利用产业互联网平台促进农产品标准的推广和应用,整合资

源推进农业产业互联网集聚经营,促进数字技术和农业业务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并持续完善服务内容。^[20]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刘蕾和王轶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下返乡创业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经营实现农民的技术赋能。基于2019年2139家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重聚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得出结论:加强返乡创业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大农民数字技术的培训力度,有利于返乡创业企业进一步提升农民增收效应。^[21]刘义臣和沈伟康基于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探寻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动态耦合变化规律和耦合差异来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民总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但其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最低;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稳步优化态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数字经济与农民总收入、非农收入耦合协调差异来源相似。^[22]

农村电商与生鲜物流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刘景芝等探究了不同地区农村电商和生鲜物流的发展水平。通过分析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六个省2015—2019年的农村电商与生鲜物流相关数据,计算出农村电商发展秩序程度、生鲜物流发展秩序程度,以及两者协同发展水平。^[23]张京京等实证分析了网络营销对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网络营销对不同分位点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差别化效益提升效应。研究发现:利用网络对外推介或开展电子商务的网络营销,可以显著提高乡村旅游经营效益,且具有很好的稳健性;政府应当加快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引导支持乡村旅游经营者进行网络营销,并对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的乡村旅游经营者实施网络营销技术培训。^[24]

六、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

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搞活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问题有很大研究空间。

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对农业保险、精准医疗帮扶、农业金融支持等问题展开研究。

随着国家农业保险支持政策优化,农业保险转移和分担自然灾害风险效果趋于上升。杨海钰等探究了霜冻灾害严重程度与苹果种植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倒U形关系,以及农业保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得出结论:农业保险具有分散、转移风险的作用,能显著提高参保苹果种植户的风险承受能力。^[25]牛晓耕等研究发现:农业金融支持与农业资本回报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有利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金融支持影响农业比较利益的中介变量。因此,建议通过协作推进农业减排,创新金融支持机制,实施差异化金融支持策略,发挥金融支持对农业的辐射效应,倒逼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26]

倪志宇和曹群针对精准脱贫阶段中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多数脱贫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善,部分脱贫地区存在医疗设备落后、药品不全等问题,提出农村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倪志宇和曹群提出要结合实地对口帮扶情况,并根据精准医疗帮扶的实践经验,实施“省、县、乡、村”四级联动精准医疗帮扶模式以及进一步优化精准医疗帮扶路径。^[27]范庆祝等利用CHARLS数据和Tobit模型分析发现,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说明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尚未建立起“治未病”的保健消费观。研究发现代际支持是重要的中介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意识、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在物质支持的基础上鼓励子女给予更多的货币支持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28]

七、城乡融合与乡村治理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好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城镇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当今及未来持续研究的重点。2022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乡村数字化治理、乡村地域发展、城乡差距等问题展开研究。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崔元培等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并且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29]姜书婷和宋兆宽认为“三农”自媒体可以让乡村治理走向“高效”,即从低效参与到乡村善治。^[30]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地区重要部分,其经济发展落后于京津地区,因此如何挖掘河北省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平衡区域发展是河北省面临的重大难题。徐磊等以河北省121个县(含县级市)为研究单元,揭示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且分析了乡村地域多功能之间的共生模式。研究表明: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和集聚特性十分明显。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利共生、寄生关系等多种共生模式。因此,在乡村地域发展决策中应明晰其空间分异特征,把握乡村地域多功能间的内在共生关系,从而提供更为科学的分区优化策略。^[31]马立军等分析了河北省城乡多功能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多功能空间分异表现为与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功能空间分异相反的分布。社会文化功能的分布与生态功能的分布相反,而社会文化功能的分布与经济建设功能的分布相似。农村功能模式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相关性,农村地区多功能发展条件的差异是造成集聚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2]

八、人力资本与农民培育

农业人才是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农村人力资源影响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以及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定位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相关财政投入、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如何进一步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研究空

间,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探讨了农村创业者、职业农民培育、“校村企”融合发展等问题。

农村创业是乡村振兴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动能,加大对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的培育和扶持是其中的重要抓手。张敬伟等探究农村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怎样的信任问题,如何解决不同的信任问题以及最终获得了何种类型的信任。指出农村创业者往往会遭遇源自社会制度、个体特征和互动经历3类信任问题,通过获取认同意愿、利用第三方媒介、采取可信赖行为以及进行情感沟通4类行动及其组合,农村创业者能够解决上述信任问题并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信任和/或情感信任。^[33]而且,通过挖掘农村绿色创业实践背后的理论规律得出:农村绿色创业的驱动因素包括市场、制度、自然和个体等四类;农村绿色创业呈现保守型、直接型和渐进型三种实践路径。^[34]龙海军和田丽芳探究创业者先前经验对返乡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的情境下创业者先前经验对返乡新创企业成长会产生负向影响;资源拼凑在创业者先前经验对返乡新创企业成长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且创业者先前经验负向影响返乡新创企业资源拼凑;企业经营年限负向调节创业者先前经验对资源拼凑的影响。^[35]

新型职业农民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力量。张亮和樊梦瑶深入剖析了“两新融合”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机制。从典型案例得知,“两新融合”本质上是缔结增强双方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利益联结方式,以消除土地制度障碍为前提,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基础,构建“要素融合+市场化运作+三方协作”的融合机制,最终实现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6]此外,运用多案例分析法,研究了如何多途径助力农业人才培养。并提出单一政府主导转变为与市场和社会主体协同、推动多元主体治理方式不断契合衔接、促进多元主体创新规范治理规则趋同一致、兼顾管理效率与市场效益的双重治理目标导向的政策启示。^[37]

“校村企”融合发展模式是职业院校对服务

产业兴农、培养农村专业人才的探索。基于政策需求和现实困境，黄丽颖等分析了“校村企”三方合作互动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并提出了搭建“校村企”融合发展长效机制、探索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增强职业院校对乡村产业的人力供给能力、创新乡村产业应用技术与智库服务、强化乡村振兴人才职业培训等五方面策略，以期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校村、校企合作共赢。^[38]

九、农业契约与农户行为

农户行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一旦农户作为生产者和决策者，农户的行为必然直接左右农业生产的变动，影响农业政策的效率。2022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农业契约选择、农户技术采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农业生产服务模式、农户决策等问题展开研究。

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是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快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苑甜甜等基于438位小农户的深度访谈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心理感知（农户认知和参与意愿）——外部情境（组织联结和政府规制）——行为效果模型，揭示心理感知和外部情境因素影响小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和多元路径。结果表明：单个行为决策因素并不是驱动农户有效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的必要条件，多个决策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三种提高农户行为效果的条件组态，分别概括为参与意愿主导模式、内外联合约束模式及外部情境主导模式。^[39]

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推进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户艳领和李丽红深入分析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ROC曲线检验模型效果和界定最佳预测阈值。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规模、承包土地规模、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归属认知、村庄地形、村庄类别、租金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不限于经济因素的考量。^[40]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王颖丹等研究发现，

随着交易成本降低、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农业生产性服务逐渐形成了“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的演变路径，并且农户兼业化和农户异质性也影响着该路径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参与主体收益增加、农业生产经营风险降低、契约稳定性增强都是服务模式演变带来的积极效应。^[41]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是否影响了退耕农户的消费是亟待探究的关键性问题，赵娅娅等基于河北与四川8个贫困县831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估计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的影响，并利用组间差异分析和分位数回归来探究退耕补贴到期对异质性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贫困农户相较于非贫困农户、低中消费水平农户相较于高消费水平农户更易受到退耕补贴到期的负向影响。^[42]

十、讨论与展望

2022年河北省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学者们选题紧扣时代脉搏，紧跟党大政方针，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呼应重大社会需求；学术研究范式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研究成果发表形式多样。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河北省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和潜力巨大，未来将坚定不移地把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深推进，加快大数据与乡村振兴融合，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数字乡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作为一个直面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学科，如不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则极有可能更为弱化。

目前，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的区域范围扩大，研究的产业链条加长，研究的服务面增大。展望未来，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第一，总体上应当以我为主，从核心科学问题出发，根据实际问题的性质和目标，主动结合、融合相关学科，以服务社会重大需求。第二，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凝练学科方向。要在农业经济政策评估、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减贫与发展 and 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等经典领域的基础上，向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发展和食品营养健康等领域拓展。第三，紧跟智慧农业发展潮

流。我国未来农林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数据供应的定制化、数据模型的国产化、农业机械的智能化、农业经济产业链的虚拟化、供应链的金融普惠化、生物农业数据安全的增强化等。适应智慧农业发展步伐,推进农业、农村全方位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将有利于促进生产节约、要素优化配置、供求有效对接、治理精准高效,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好服务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宗义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康晗.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以河北为例[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2(06):966-972.
- [2] 薛龙飞,曹招锋,杨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09):240-251.
- [3] 韩克勇,孟维福,汪小愉.日本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创新的经验与启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74-82.
- [4] 康凯,栾新风.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108-117.
- [5] 段洪波,冯茜.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以河北省H县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85-99.
- [6] 杨念,王蔚宇.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2(19):26-30.
- [7] 杨宾宾,魏杰,宗义湘等.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算[J].统计与决策,2022(02):125-128.
- [8] 王聪聪,周绩宏,王俊芹.中国苹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产区差异[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11):10-19.
- [9] Yanzi L, Cai C, Fuqiang L, et al. Analysis Method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Stochastic Block Model (SBM) and Machine Learning[J]. Journal of Food Quality, 2022, 2022.
- [10] Yongjie X, Jinling Y, Yongfu C, et al.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Beef Calf Produc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Hebei, China[J]. Agriculture, 2022, 12(10).
- [11] 丛林,韩璐,周勋章等.非洲猪瘟与猪价低迷双重影响下河北省生猪产业发展形势与对策研究[J].黑龙江畜牧兽医,2022(24):9-13,23,134.
- [12] 宗义湘,崔海霞.环境规制如何嵌入农业政策:欧盟交叉遵守机制经验[J].世界农业,2022(01):15-23.
- [13] 张桢楠,尉京红.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路径研究——来自河北省水、热资源限制区的证据[J].农业经济,2022(04):12-14.
- [14] 周繁,王丽丽.河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区域特征评价[J].北方园艺,2022(21):138-145.
- [15] 韩冬梅,汪刚,田晓喻.基于短板理论的中国畜禽养殖资源承载风险评估[J].资源科学,2022(10):2074-2088.
- [16] 刘苗苗,潘佩佩,任佳璇等.京津冀粮食安全与农业用水安全耦合协调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02):170-182.
- [17] 周一凡,李彬,张润清.县域尺度下河北省农业碳排放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22(04):570-581.
- [18] 侯孟阳,邓元杰,姚顺波.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10):160-171.
- [19] 陈柏旭,周颖,王立刚等.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徐水区319位农户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09):106-115.
- [20] 陆刚.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农业:理论逻辑、融合模式与条件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22(07):152-159.
- [21] 刘蕾,王轶.数字化经营何以促进农民增收?——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J].中国流通经济,2022(01):9-19.
- [22] 刘义臣,沈伟康.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动态耦合差异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2(11):60-68.
- [23] 刘景芝,苏炜,耿晓.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电商与生鲜物流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2(12):130-133.
- [24] 张京京,刘同山,钟真.网络营销提升了乡村旅游经营效益吗?——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2(03):67-83.
- [25] 杨海钰,蔡文聪,赵素彦等.霜冻灾害对苹果种植户生产要素投入影响的倒U形关系——基于农业保险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06):81-88.
- [26] Xiaogeng N, Meiyu L, Zhenxing T, et 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Financial Suppor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Compensation Rate[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1).
- [27] 倪志宇,曹群.稳定脱贫背景下精准医疗帮扶的困境、创新与保障[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120-127.
- [28] 范庆祝,吴宇凤,刘淑彦.新农合、健康异质性与保健消费——基于我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分析[J].农村经济,2022(02):117-125.
- [29] 崔元培,魏子鲲,薛庆林.“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J].宁夏社会科学,2022(01):103-110.
- [30] 姜书婷,宋兆宽.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下“三农”自媒体的优势与运行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2(12):92-94.

- [31]徐磊,王建鹏,尹士等.基于共生视角的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格局与分区调控[J].农业工程学报,2022(11):268-278.
- [32]Ma L, Xu S, Guo F, Xu L and Yin S (202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area multi-functionality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Front. Environ. Sci.* 10:773259.
- [33]张敬伟,王静怡,靳秀娟等.中国农村创业者如何构建人际信任?——基于 CCTV《致富经》创业故事的扎根理论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05):72-84.
- [34]张敬伟,靳秀娟,涂玉琦.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村绿色创业研究——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J].技术经济,2022(01):33-42.
- [35]龙海军,田丽芳.创业者先前经验、资源拼凑与返乡新创企业成长——基于“乡村振兴大调查”数据[J].调研世界,2022(12):42-49.
- [36]张亮,樊梦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两新融合”机制构建[J].河北学刊,2022(04):154-161.
- [37]樊梦瑶,张亮.多中心治理理论视阈下农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02):192-201.
- [38]黄丽颖,王秉政,李潘坡.乡村振兴战略下职业教育“校企”融合发展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2(06):49-53.
- [39]苑甜甜,王俊芹,赵邦宏.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何以有效——基于组态分析视角[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02):95-106.
- [40]卢艳领,李丽红.生态功能区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112-123.
- [41]王颖丹,王哲,王永强.农业生产服务模式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研究——以河北省滦县百信合作社为例[J].世界农业,2022(06):115-125.
- [42]赵娅娅,黄杰龙,李瑞民等.退耕补贴到期对贫困地区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07):183-192.

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

郭远远 刘灵芝

2023年河北省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治理研究,包括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研究、基层治理研究、乡村风险和治安治理研究、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研究、共享经济治理研究;二是公共服务职能和体系建设研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三是公共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制定和执行研究、乡村振兴和防治返贫政策研究、移民政策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研究;四是行政领导与反腐败研究,包括领导权威和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研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研究;五是数字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包括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数据治理研究、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安全研究、政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

一、国家治理研究

(一)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研究

韩兆柱等系统梳理了国内合作治理研究,发现国内合作治理研究大致始于2002年,时至今日,已从最初的进展缓慢的阶段发展到当前迅速推进的阶段。他们认为学者们在注重合作治理理

论阐释的同时,也关注合作治理理论的应用研究,基本形成了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治理、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等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在研究视角上,从静态分析走向过程分析;在研究对象上,关注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动机与行动策略;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合作治理案例比较研究。^[1]牛惊雷和王亮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造成社会治理呈现过程“碎片化”现象,而社会治理过程“碎片化”产生的根源是社会治理组织发生了“碎片化”。要破解“碎片化”,实现治理的整体性效果,社会治理结构的整体性重构是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结构整体性重构就是要以满足公众合理需求为目标方向,修正传统“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支点推进治理方法创新,建立协调、整合和信任机制,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张兆平等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尝试,尽管如此,新兴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非常有效的社会治理措施,健

全完善了政治体制、选举制度,保障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推进民生建设,保障了工农群众文化教育、健康卫生的社会权利;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经济,保障了工农群众的经济权利。这些措施对于新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也多有指导意义,在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高举党的领导伟大旗帜不动摇,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3]

梁瑞英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制度执行力是重要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力如何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执行力不断加强,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治理。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不仅要从价值理性上进行分析界定,对其理论和系统进行逻辑框定,而且还要在对党内法规执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有效机制进行科学设定。^[4]从动力机理角度出发,针对党内法规执行力弱化的问题,可以从制度层面、参与者、环境和资源保障层面、监督层面、目标层面等构建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有效机制,进而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5]康振海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是聚共识创伟业的巨大优势和根本保证,其中,坚持统一战线是凝聚力量的重要依据,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6]梁捍东和刘慧认为,政党协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政党协商以其独有的原则理念、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等,较好地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新时代,优化政党协商的制度机制、提升政党的政治参与水平,要健全完善素质保障机制、内生动力机制、互动沟通机制、协商监督机制,以整合政党协商资源,加强政党协商效能。^[7]刘邦凡等基于街头官僚理论提出,我国窗口执政治理现代化,可以从优化工作环境、完善激励制度和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克服谬误性执政;从完善相关法律、加强责任控制和提高行政素质等方面规制窗口期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8]

(二) 基层治理研究

姜辉和董梦晨认为,网格管理向全科网格的升级,是基层政府回应基层大量治理挑战的探

索,是政府职能在基层社会的渗透与延伸,但其又摆脱了传统的职能部门形式,代之以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可有效实现社会力量的充分动员。在全科网格下,基层政府有了更明确的责任分工和职责定位,在人员力量整合、责任落实方面有了较大加强和提升,有效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功能,发挥了“影子政府”效用。未来应进一步以全科网格助推基层治理细化深入,以全科网格解决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以全科网格强化基层社会规则意识,实现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良好互动。^[9]鲁敏等对基层政府运动式治理合法性获取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基层政府合法性拥有四种基本形态,即绩效合法性、有效执行合法性、正义合法性和权威合法性,当代中国基层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机制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合法性:一是展示绩效,提升治理认同,善用“绩效+宣传”强化合法性;二是变通工作方法,化解治理阻力,善用“真情+方法”滋润合法性;三是统筹上级要求和民众诉求选择治理内容,善用“正义+规范”争取合法性;四是巧借多种力量实现低成本运作,善用“借力+降本”巩固合法性。^[10]王立业认为,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公共行为,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深刻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氛围。志愿服务不仅可以服务于国家战略、参与重大活动、应对突发事件,而且顺应社会治理的时代需要,具有动员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志愿服务的开展需要在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地方实际,与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相融合。^[11]盖宏伟、张文雅认为,从“建起来”到“用起来”是社区智慧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亦是社区成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步。韧性治理关注全方位的耦合、全要素的整合以及全过程的融合,强调通过前瞻性、主动性以及人文性的战略行动来建构“在地”的适应优势,因而成为智慧社区应对各种叠加型、复合型治理任务的理论和现实选择。然而,建构智慧社区的“韧性”特质仍面临着数字化嵌入的运动式堆砌、数字化应用的科层制牵绊、数字化管理的传统型束缚以及数字化融合的适应性困境。走出这一困境,有效发挥智慧社区的数字化效能需要:数字化技术嵌入的适应性改造、数字化应用的能

动性创新、数字化治理的整体性形塑以及数字化能力的生态性培育,全面提升智慧社区的韧性。^[12]同时,盖宏伟、牛朝文还认为,走向“韧性”的基层社区风险治理模式需要突破治理体制碎片化、治理方式粗放化、治理议程扭曲化、治理环境内卷化的瓶颈,必须打造社区合作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水平、优化社区风险治理的议程设置、消解社区风险治理的内卷困境。^[13]

朱伟婧认为当前我国急需将数字技术融入基层治理中,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但我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数据和信息的隐私和保护问题、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个别部门存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等困境,为此,必须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基层治理中,为推动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和保障:加强顶层设计,打造数字一体化服务平台;建立多主体参与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进一步深化基层应急联动机制,健全预警预防体系;结合各人群需求特点,打造数字化便民服务平台;加强基层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完善数字化培训;完善基层服务法律体系,强化基层治理法治保障。^[14]佟林杰和张明欣认为,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数字形式主义产生逻辑在于:目标置换效应下数字形式庖代数字内容、理性选择效应下数字治理政策的执行偏差、科层节制效应下纵向压力的传导、多元化奖惩机制缺失下的激励单一性依赖以及问责机制异化下的相机策略。数字形式主义的制度困境表现为:监管机制与数字痕迹化的自反性、保障机制与数字化技术的异步性、数字智能与数目字管理的负强化、数字精准与数字鸿沟的对冲性。^[15]在另一文章中,二人认为应当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数字治理责任体系、上下对应的基层数字治理激励体系、“三位一体”的基层数字治理监督问责体系以及上下联动的基层数字治理协同工作机制,助力摆脱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束缚,释放基层数字治理效能。^[16]

(三) 乡村风险和治安治理研究

牛朝文等认为,合作协同是现代乡村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应急协调控制是破解乡村风险治理碎片化的要义。目前,推进乡村风险整体性治理,仍存在短板和不

足,主要体现在:在治理主体方面,存在着治理主体多元下的协商合作、利益整合及集体行动困境;在治理方式上,面临着国家运动式“入场”下应对策略的持续性衰弱及规则失效、乡村自治式“在场”下因应策略的资源瓶颈以及多元理性主体博弈下的公共性流失;在治理能力上,需要应对制度、技术和话语困境的挑战。实现乡村风险整体性治理,需要以完善风险治理体系为根本点,将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为着力点,将规范化建设作为关键点,最终推动乡村风险治理从“碎片化”走向“整体化”,实现现代乡村的善治。^[17]李砚忠等认为,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治安需要以“政治”引领确保方向,以“自治”激励内增活力,以“德治”教化形成支撑,以“智治”技术精准发力,以“法治”约束实现保障,推动乡村治安从传统刚性的“硬管理”向“治安社会化、社会治安化”的“软治理”转型,实现新时代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18]孙世凯、李砚忠还认为,当前乡村治安治理数字化存在主体间缺乏协作、理念匮乏、基础资源建设薄弱等困境,应加强横向综合治理的整体协力,数字化思维理念的整体融汇,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应用,推进治理方式规范化,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跨领域的治安合作模式,推动乡村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19]李砚忠、徐宁以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的乡村治安为例,认为民族地区平安乡村建设与自治体系初见成效,但触角延伸盲点多、自趋力不足以及数字治理基础欠缺等问题日渐显现。亟需以“政治”领导统领全局,以“自治”延伸治安触角,以“德治”创新乡土教化,以“智治”嵌入发力,以“法治”促进融合约束,从传统刚性的“硬管理”向“治安社会化、社会治安化”的“软治理”转型,实现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20]

此外,周鑫和贾丽莹认为在乡村治理中要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针对一些地方封建文化糟粕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村规民约中,个别村规民约内容甚至与现行国家法律存在明显矛盾,村规民约执行不平衡,缺乏行之有效监督机制等问题,必须坚持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21]王春城等认为在乡村治理中,可结合乡村振兴规划和村干部队伍状况,探索实

行一套科学适用的“基本报酬+绩效报酬+绩效奖励+村集体增收提取”村干部绩效报酬体系,省、市、县、乡镇、村各层面系统推进,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基层组织活力。〔22〕

(四)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研究

赵文浦等基于中国知网(CNKI)在线数据库截取时间段2010—2020年的已有文献进行整合梳理,围绕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趋势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认为近十年我国公共危机事件研究领域发文数量稳定增长,共有11名核心作者和13个主要发文机构,研究热点集中于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应对、传播三个方向,研究内容从基础体系架构向多领域、多对象方面演化。〔23〕崔亚杰和李丹通过对张家口“11·28”爆燃事故的个案分析发现,事故发生后政府应急管理的一系列处置措施都非常及时,但就应急管理全过程而言,应急管理的前置阶段也就是预防环节,仍存在交管部门执法不严、区域行政监管职责不明确、安监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为此,必须以应急管理的全过程视角去开展应急管理实践,尤其是加强应急管理过程中的预防,同时,加强应急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推动应急管理部门有效开展应急管理工作。〔24〕刘利永和马文斌梳理了2021年初河北省发生局部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后,地方主流媒体推送的一批点击量10万+的“爆款”融媒产品,认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地方主流媒体“爆款”融媒产品大致分为权威信息、生活服务、体验探访、励志感动、意外翻车等五个类型。未来,地方主流媒体应抓住融媒发展窗口期,持续转型;同时提高新媒体内容生产水平、多层次满足用户需求、改革新闻通联协作机制,在日益激烈的传媒竞争格局中立足、制胜。〔25〕

林顺利和蔡璟浩认为,在风险社会和治理重心下沉的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使得社会行动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愈来愈高。以新冠疫情事件为例,由于科层制的制度刚性,最初的社区应急治理处于多重掣肘之中,最终表现为模糊性治理和硬性技术识别的方式与特征。而在应急防控后期,社区应急治理则凸显出党建引领、市场参与、关系网络和技术组合四种结构性特征,重塑了社区各主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科层制所带来的诸多矛盾,其通过多种策

略促进社会关联,这在科层化的形式之下补充了应急治理体系的实质化内容,推进了治理有效的现代化进程。〔26〕翟艳等提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要构建多维治理的韧性社区管理模式,通过管理服务升级、周边资源整合、环境设计优化、智能设施系统配置、社区志愿服务加强五个方面建设社区韧性,进而成功应对未来突发风险。〔27〕李明泽认为,“口述历史”是当下颇为重要的一种传播现象,尤其是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口述历史节目通过“严肃厚重+明快轻松”的多元化叙事风格和“过去+现在”全景式叙事方法,深入挖掘人物元素,推动权威专家从幕后走到台前,具有补充历史、以史为鉴的作用。〔28〕

(五) 共享经济治理研究

刘淑娟认为,共享经济迅猛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必须改革政府监管方式,完善适应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体系,鼓励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才能使共享经济发展行稳致远。〔29〕骆艳青认为,近年来我国共享经济不断发展,从业人员持续增加,共享经济用工关系呈现出用工形态灵活多样、从业者特别是服务提供者的从属性有所减弱、对网络平台的依赖性较强等特点,对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冲击,主要表现在服务提供者与网络平台劳动关系的认定率很低、相似案件的司法实践认定结果并不统一、配送外包公司的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认定更加困难等等。为此,必须确定类型化规制的法律思维,对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做扩大化解释与理解,加快相关法律的修法、立法工作。〔30〕麻新平认为,共享经济在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便利和实惠的同时,也给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带来冲击与挑战,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空白,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知情权、个人信息安全及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消费者维权渠道不通畅,需要完善市场准入、平台责任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打造多元化协同监管治理体系,构建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实保障到共享经济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31〕

二、公共服务职能和体系建设研究

(一) 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

康振海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创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以“八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任务,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根本遵循,促进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历史性转变。^[32]覃志红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课题。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需要为目标,需要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需要坚持以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为保障。^[33]田翠琴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逐步构建起以“四梁八柱”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拥有制度刚性规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以强化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有力举措确保生态文明制度全面实施。^[34]左守秋等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在此基础上充分展现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交流与合作,利用新媒体技术广泛传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努力增进国际生态话语认同,不断提高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世界话语权。^[35]王彦坤认为,要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塞罕坝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加自觉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让美丽中国愿景早日变成我们美好生活的现实。^[36]

(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郭广伟等认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新型智慧城市的物联网开放体系架构、城市开放信息平台、城市运行指挥中心和网络空间安全体系四个建设重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耦合性,尤其是能够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实现创新性跨越式发展。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则可以有效整合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各个环节,构建更为完

备和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市民多元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37]刘志华等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进程,并对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等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强化有效供给,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衔接,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资金支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38]孙可等认为,公共艺术设计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融合有利于拓宽地域的发展前景、培养自我发展的能力,契合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并以河北省秦皇岛市为例,认为河北省公共艺术存在忽略城市建筑环境关系的合理性,缺少地缘文化、公众意念的表达,审美教育、价值导向凸显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参考先进城市公共艺术项目工作思路流程,文化服务、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共同发展。^[39]

彭东立和张成林认为,目前河北红色文化发展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存在差距,在技术创新、满足受众需求、文化产业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必须从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治理体系、坚持文化创新、注重红色文化区域发展平衡、融合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及共享发展理念等几个层面着手,进一步挖掘区域红色文化发展要素,推动河北红色文化健康、良性发展。^[40]黄逸超等认为,河北省内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河北省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应当重视促进红色文化在传承中创新,促进各地纪念馆与当地政府、高校不断加深合作,各地基层党组织推进党建品牌建设;高校组织大学生进入各地纪念馆参加实践活动,搭建多媒体展览平台;纪念馆推广红色文创产品用以日常维护工作;推出红色旅游线路,激活当地经济发展活力,助推乡村振兴。^[41]樊建庆和赵俊红认为,河北红色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面临保护机制缺失、传承链条断代、低俗消费盛行等问题,必须深刻理解河北红色文化的内涵,不断充盈其时代内涵,重视健全保障体系,在多方联动下,开拓渠道、永葆活力。^[42]

李研等认为,河北省长期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但是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

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方面还面临诸多问题,如资源有效整合不足,文旅产品水平较低;乡村空心化问题严重,“非遗”传承面临危机;现代都市文化盛行,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等。为此,必须丰富非遗文化内涵,开发多样化“非遗”项目,大力推进“互联网+非遗”模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协同发展。^[43]张艮山等基于藁城宫灯、石家庄丝弦、井陘拉花几个案例,认为在数字技术背景下,要加大对传承人故事的影像记录,加强对传承人的数字化保护,丰富石家庄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多样性,进一步推动石家庄非遗文化的推广与发展。^[44]王密卿等认为,要做好雄安新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就要尽快构建非遗数字化保护规范标准,同时搭建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设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统筹、指导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云平台建设;组建整合科研和技术力量的专业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路径。^[45]宋振源等认为,可以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时空再现、利用数字影像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传播等途径,加强非遗文化数字化建设。^[46]

三、公共政策研究

(一) 政策制定和执行研究

王春城认为,天价彩礼等婚俗问题已从私人事务演化为公共问题,单纯依靠社会的自省、自觉、自治很难达到预期的改革成效,需要政府采用合理有效的政策工具并实现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发力来推进婚俗改革。对全国首批婚俗改革实验区中河间市的个案研究发现,通过基层政府与社会各界努力意愿与行动的密切衔接,自愿性、混合性、强制性政策工具可各尽其能、融合发力,从而实现乡村婚俗的显著变迁。^[47]娄文龙等以1991—2019年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274份住房公积金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共词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变迁以及不同时期的聚焦点,发现尽管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聚焦点发生了显著的政策内容变迁,但是一直关注于保障缴存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住房保障事

业发展。据此,应进一步在公积金缴存覆盖范围、利用效率和监督管理方面完善公积金政策,加强其政策保障性,并完善信息化建设。^[48]鲍坤瑶认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女性参与政策过程的比例不足、妇联的权威性不够以及参与渠道的不畅通都使女性丧失了平等参与政策过程的机会和能力。为此,必须完善女性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法律制度,加强女性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加快建设女性通过网络参与政策过程的平台与配套机制,有效提升我国女性政策参与水平。^[49]

王春城等认为,由于基层政策执行活动的属性、特性及惯性,在特定的管理环境、模式和条件影响下,随着工作负荷的不断加大、管理举措的不断加强与政策资源的不断追加,政策执行取得的增量政策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出现弱化与衰减。处于政府科层体系末端和服务管理群众一线的基层政策执行机构,受到源自上级的“权力性压力”、源自受众的“责任性压力”、源自多元考核评估的“机制性压力”,并在压力处境中滋生积极迎合或消极自保的“自利性动力”,最终在外因和内因双重作用下陷入“内卷化”漩涡,并以政策执行的目标置换、内容模糊、方式异化、效果侵蚀等形式表现出来。可构建“刚性”要求与“柔性”规范相结合的治理框架,通过权力合理归位、明晰管理尺度、把握问责力度、调适行政文化、校准施策伦理等治理举措,矫正各方主体行为逻辑,使基层政策执行摆脱“内卷化”困局。^[50]文宇杰等通过对河北省Q市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贯彻落实所形成的一系列实施办法、细则、工作规划而形成的政策体系进而对其政策执行过程评估分析得出,Q市“限塑令”政策从提出到执行存在机构设置的层级差异,从贯彻文件到具体实施存在政策的非均衡性,为尽可能减少“政策阻碍”现象的发生,需完善政策内容的完备度与可操作性,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调整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偏差,持续优化政策环境。^[51]崔俊鹏等以河北省B市现存厕所问题为例,通过借鉴和改良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把B市存在问题厕所的原因归结为厕所革命政策本身、政策环境、政策执行人员以及农户4个方面,并提出完善标准,细化准则;注重宣传,营造环境;加大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提

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4条优化路径。^[52]史艺萌等基于衡水地区“一提一补”试点村的实地调研数据,就“一提一补”政策实施后农户节水意愿问题进行 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研究区域农户文化程度偏低,老龄化较为严重;78.1%样本用户节水意愿偏低;年龄、节水农户对补贴标准的评价分别在0.1、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节水意愿;单次水量减少导致减产的认知在0.0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节水农户意愿;“一提一补”水价政策的执行效果逐渐衰减,农户响应疲软。为此,必须完善提价与补贴标准、认真贯彻落实节水政策。^[53]

(二) 乡村振兴和防治返贫政策研究

郭广伟等认为,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步出现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文明时代到来,深深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在城市文明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促成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实现城乡之间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54]王春城等认为,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55]曹雪彦和黄勇以石家庄为例,认为要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切实防止返贫和新致贫,就需要从强化协调联动、提高帮扶成效,强化督导、将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结合,以集中力量发展产业为重点,制定防返贫一揽子行动方案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和制度,为实现

全面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56]段洪波等认为,金融扶贫通过政府、金融机构联动,以“造血式”扶贫模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5E审计理念,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5个角度,构建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河北省H县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H县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可持续性评价等级均为“优秀”,公平性评价等级为“良好”,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信贷覆盖率、续贷意愿率有待提升,贷款项目稳定性、贫困户满意度有待提高,金融机构参与度、政策培训力度有待增强。为此,必须多措并举提升信贷覆盖率和续贷意愿率,精准对接产业扶贫,提高贫困户满意度,多角度创新金融扶贫路径、增强金融机构参与度。^[57]

(三) 移民政策研究

檀皓举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我国移民法律制度的演变和人才引进政策的现状发现,我国现行移民法律规范缺失移民等相关概念的法律定义,整个移民法律规范体系尚处于较为稚嫩、零散的状态,其规范目的与人才引进政策的实践需求不相适应。在未来的移民立法与人才引进政策的实践中,助力对外开放、维护国民利益是重要目的和价值追求,构建移民法典是逐步完善移民法律规范体系的最终目标。^[58]唐勇等认为,近年来,我国在运用司法路径治理非法移民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仍存在司法协助环节薄弱、司法理念存在定位偏差、司法实践环节经验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国家合作,强化司法协助;培养人才队伍,转变司法理念;依托部分边境地区构建经验平台。^[59]

黄伊霖分析了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认为从联邦成立以来,加拿大移民政策一直不断调整,从最初允许移民自由出入,到以种族主义为导向的选择性移民政策,逐步过渡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积分制移民政策。这些政策的设立与调整,取决于加拿大特殊的国情,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素,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服务加拿大的

国家利益。随着加拿大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为了更精准地匹配劳动力市场的空缺,解决人口老龄化、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正朝着更加精细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60]王子立根据不同时期移民政策的价值取向将新加坡移民政策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自由移民时期、限制移民时期、选择移民时期、积极移民时期和适度限制移民时期,认为新加坡继续引进高技能和创新的外国人才的大方针没有变,只是随着经济形势、国内民意和本国公民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度限制移民。^[61]

(四)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研究

李砚忠认为,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62]李砚忠、苗源源基于万有引力公式,采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最新城市面板数据,计算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总强度及三次产业经济流强度,并对影响经济流强度的变量因素加以对比,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双核心、两端化”,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单核心、多中心、C形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的形态特征。进而围绕引力模型中的影响变量,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经验,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亟须形成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京津冀城市群“GDP”有量有质,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推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有序有畅,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改革,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纵横一体,进一步打造网状交通体系,从而实现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高水平、全方位的协同发展,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新动能。^[63]李砚忠、王涛还认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顶层设计的政策目标存在偏差,“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实践中更多呈现为“京津廊”发展。因此,亟须由“京津廊”到“京津雄”再到“京津冀”,实现循序渐进的协同发展。^[64]代群艳认为,虽然京津冀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已经大步前进,但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突出、科技人才分布不均、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资源分

布空间失衡等问题。为此必须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京津冀三地政府一致努力,加强科技创新信息交流平台建设,整合高科技产业布局,构建多元协作体系,完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推进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进程。^[65]邹娜等认为,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区域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核心动力。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发达经济区的人力资源协同开发经验,需要实施加快京津地区人才一体化合作推进、营造人力资源创新生态环境、加大引才育才力度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策略,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大进展。^[66]杨永君认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抓住“牛鼻子”,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实施“两翼”带动,深入推动重点区域协同发展;要落实功能定位,扎实推进“三区一基地”建设;要拓展协作范围,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协同发展;要夯实关键支撑,不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和协同创新。^[67]《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省廊坊市加快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典范城市的做法,包括发挥区域优势,在服务支持重大国家战略中加快发展;锚定重点工程,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发展高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68]

四、行政领导与反腐败研究

(一) 领导权威和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研究

杨杰认为,领导权威维护方式具有思想立本、韧性立身、勤学立位、情怀固位、平衡理位和潜力助位等方面特点,同时存在主观决策与客观实际、主观研判与矛盾根源、放任自由与和谐仁治、滥用权力与恩惠施用,以及主观帮扶与群众诉求呈现错位等方面的误区表现。为此,要通过坚持立德树人、构建用人体制机制、制定合理议事机制、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和坚持以情感召等对策措施对领导权威维护方式进行有效扶正。^[69]刘雪丽和张道明认为,中西方领导权威理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概念界定、内容组成、来源基础和影响效力四个方面,现代领导者应融合中西方领导权威实践中的合理之处,以中西方领导权威的共同理论来源为基础,通过以德树威和以法护威相结合、以能促威和以情固威相结合、以勤增威和以专显威相结合、以绩立威和以新强威相结合、以廉助威和以信扬威相结合,维护和巩固领

导权威。^[70]

梁瑞英认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如何,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当前党员干部在加强党性修养方面还存在党性教育方式老化、内容空泛、程度浅化和部分党员干部信念淡化等现实问题。为此,应该加强内部“知情意行”四个心理阶段修养,构建党性科学评价机制、党性教育培训机制、党性场景营造机制和党性平台搭建机制等外部机制,有效促进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提升。^[71]刘格等认为党员干部要提高基层调研工作水平,在推进调研工作时,党员干部要敢于发问、敢于质疑,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针对性的调研方法;对发现问题要分步分阶段解决,及时建立问题台账,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水平;更要积累有效经验和做法,及时总结并转化为群众工作方法和抓落实的能力。^[72]柴文砚等认为信访干部要提高法治思维水平,需要坚定法治信仰,践履法治行为;贯彻以人为本,弘扬法治的精神;强化学习培训,夯实法律基础;坚持谦抑原则,明确职权范围;打造高效政府,塑造法治形象;聘任法律顾问,健全决策机制;完善廉政监督,强化责任追究。^[73]

刘扬等以河北省部分乡镇干部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相关材料,并运用统计学的单因素分析法比较不同分组间的差异,研究表明乡镇干部公共服务能力中工作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在年龄、薪资、等级方面无显著差异,和行政级别的高低没有相关性,但以主任科员为分水岭,乡镇干部的公共服务工作专业技能掌握程度得分均值明显提升。^[74]温瑞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培养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同时对农村干部队伍提出了加强理论学习、丰富知识结构、提高政治素养、提升工作能力等多方面的要求。但是,当前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知识不足、能力欠缺、教育培训机制不完善、后备人才储备不充足、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综合素养,加强人才引育以配强干部队伍,完善激励机制以提高待遇保障。^[75]

(二)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研究

商植桐等认为,勇于自我革命以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建党防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整风整党反腐,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廉政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反腐倡廉体系建设逐渐完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新时期开展新形势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厚植理想信念根基,营造廉洁政治文化氛围;牢筑反腐败制度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制约基层“小微权力”,促进党风社风良性双循环;完善健全党外监督机制,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主体作用。^[76]张彦台认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廉洁文化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启示。党在西柏坡时期廉洁建设的思想渊源是“忧患意识”;核心内容是“两个务必”;时代主题是“清醒赶考”精神;内在动力是“自我革命”;重要保障是“人民监督”。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西柏坡时期的廉洁文化思想,总结借鉴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全力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工作,夯实新时代廉政建设思想根基。^[77]

商植桐等认为,当前国内地方反腐败评价体系存在评价体系构建的全面性和权威性有待改进、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目标性有待强化、廉政评价结果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有待考证等不足,要进一步在科学性规范性上下功夫,让评价体系深入人心;在优化评价指标体系上下功夫,确保体系协调畅通运转;在评价结果反馈运用上下功夫,确保体系常态有效运行。^[78]王润一等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下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逻辑体现出迫切性、必要性、伴随性的特点,其在实践过程中应遵循基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实效性、基于民主政治权利的协同性、基于民主政治问责的责任性等逻辑要义,只有如此才能够最大化发挥审计监督功能,加快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79]晋惠娇等认为,随着我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廉政档案建设工作取得硕果的同时,也面临着档案内容不全面、利用率低、信息技术手段不充分、缺乏联动机制、队伍建设专业水平低等多重问题和挑战。为此必须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对廉政档案软硬件的投资力度;完善干部廉政档案信息工作模式,畅通各主体联动机制;构建干部

廉政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做好动态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廉政档案管理制度,确保信息真实可靠;完善廉政档案信息安全体系;提高廉政建设队伍专业水平。^[80]

五、数字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

(一) 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数据治理研究

韩兆柱等认为,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对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概念引介、理论溯源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且现在正处于数字政府深化发展阶段。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系统关注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共享、信息公开与公众满意度、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国外数字政府经验研究以及数字政府建设评估六大关键议题;对数字政府概念的理论概括与实践总结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重要基础;信息共享、平台驱动、多元主体关系、绩效评估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主要方向;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大势所趋。^[81]白献阳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全面梳理了政府数据治理的概念内涵、框架模型、治理内容(政策法规、组织机构)以及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的挑战等研究主题,研究发现政府数据治理研究中很多观点尚未形成共识,需要在概念内涵、治理领域、治理政策与组织、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82]

杨玉楨等认为,智慧政府必将对服务型政府改革和多元协同格局带来重大推动力,智慧城市与智慧政府的有机结合也将为中国进入智慧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因此要充分重视大数据在政府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善于利用大数据辅助政府决策,及时主动地开放,共享政府数据,实现政府数据资源价值利用的最大化;要重视人才在智慧政府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培养合格的智慧政府服务人员,保障智慧政府高效运转。^[83]金福子等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逻辑,以浙、湘、黔、云4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状况分析,研究发现:逐级研制模式下理想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靶向偏差的关键伏笔;府际博弈下执行主体的趋利选择是政策落实偏差的根本诱因;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与业务服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政策供需偏差的主要表现;社会场域支撑薄弱是政策执行未及偏差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从

政策防偏、执行纠偏、服务治偏、环境消偏四个方面进行矫正。^[84]白翠芳等认为当前京津冀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仍存在缺乏顶层设计、创新扩散不足、社会文化变迁挑战巨大等障碍,为此必须加强区域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以公共服务协同场景化应用为突破口,促进区域数字化创新实践的交流扩散,以促进面向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85]

(二) 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安全研究

陈兰杰等采用文献调研法,在重新厘清并界定开放政府数据的公共价值的内涵与功能基础上,全面梳理价值网理论及其模型并分析了其对开放政府数据的适用性,通过分解开放政府数据过程,认为基于价值网理论的开放政府数据公共价值实现模型构成要素包括政府数据搜集部门、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政策制定和技术支持部门、第三方数据服务机构(竞争者)、开放政府数据用户(包括企业和个人用户)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开放政府数据公共价值实现模型,可为研究开放政府数据公共价值、开放政府数据政策制定、开放政府数据实践工作提供指导。^[86]盖宏伟和牛朝文认为,智慧城市数据隐私保护困境主要体现为:数据收集的过度化、大数据处理的加密缺失化、大数据交互的泛滥化以及大数据隐私侵犯的可及化。其生成逻辑主要源于:城市全景监控与数据资源商品化的负效应、智慧服务吸纳隐私与数据处理黑箱化的压力、异构稀释隐私保护与数据隐私边界模糊化的挑战、隐私观念流变与数据保护基础空洞化的阻滞。走出智慧城市中数据隐私保护困境需要推进数据隐私保护法治化,健全智慧城市隐私保护的法治之维;加强数据隐私保护技术创新,建构智慧城市隐私保护的技术之维;打造多元共治的数据隐私保护体系,深化智慧城市隐私保护的制度之维,消解“知情——同意”框架异化的困境;夯实智慧城市的数据隐私保护基础。^[87]

(三) 政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

佟林杰等认为,网络谣言不仅会引发社会恐慌、破坏社会秩序稳定,而且会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和破坏政府公信力,具有传播信息的技术伪装性、信息衍生性以及传播隐蔽性等特点。根据网络谣言在自媒体时代的新传播特征可以将其传播模式归结为单向线状传播模式、多向网状传播模

式以及滋生性伞状传播模式。我国网络谣言治理面临信息传播媒介的自组织性、个体异质因素介入导致多向性信息变异以及网络谣言监管体系相对薄弱等困境,为此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协同治理机制、健全网络媒体和平台的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优化以技术为核心的网络谣言监管机制以及构建社会公众信息素养的培育提升机制。^[88]

王军、吕广旭等基于微博等社交平台,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案例,利用数据挖掘、聚类方法对情感进行分析与分类,构建了网民情绪分析模型,可帮助相关部门利用社交平台数据精准判断热门话题,更好了解热点事件下民众情绪变化,做好舆情管理,还可以通过设定阈值提高发现虚假、暴力、诱导等内容信息在民众间的传播程度能力,及时进行疏导和管控。^[89]

(郭远远,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
刘灵芝,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 [1] 韩兆柱,肖家杰.国内合作治理研究:历程、现状与展望[J].学习论坛,2022(05):61-70.
- [2] 牛惊雷,王亮.从“碎片化”到“整体性”重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22(02):121-128.
- [3] 张兆平,任文青,李丽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治理[J].邢台学院学报,2022(03):90-94.
- [4] 梁瑞英.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执行力提升机制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04):121-124.
- [5] 梁瑞英.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有效机制研究[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22(02):18-21.
- [6] 康振海.在凝聚共识中开创复兴伟业[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4.
- [7] 梁捍东,刘慧.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创新完善政党协商机制探析[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1):74-80.
- [8] 刘邦凡,栗俊杰,王闻珑.街头官僚理论视域下我国窗口执政治理现代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128-135.
- [9] 姜辉,董梦晨.全科网格的“影子政府”效应与基层社会秩序优化[J].领导科学,2022(04):120-123.
- [10] 鲁敏,付祎然,刘文亮.基层政府运动式治理合法性获取机制研究——基于T市H镇2018—2020年相关案例的实证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02):24-34.
- [11] 王立业.将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07.
- [12] 盖宏伟,张文雅.从“空间嵌入”到“业务融合”:建构智慧社区韧性的向度与进路[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

(05):5-16.

- [13] 盖宏伟,牛朝文.从“刚性”到“韧性”:社区风险治理的范式嬗变及制度因应[J].社会科学文摘,2022(04):102-104.
- [14] 朱伟婧.基层治理数字化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三晋基层治理,2022(05):31-34.
- [15] 佟林杰,张明欣.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制度困境及消解策略[J].理论导刊,2022(04):65-71,92.
- [16] 佟林杰,张明欣.基层数字形式主义及其条块协同治理[J].学术交流,2022(08):148-159.
- [17] 牛朝文,赵怀宇,盖宏伟.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现代乡村风险治理[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79-87.
- [18] 李砚忠,徐宁.新时代推进乡村治安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J].探求,2022(01):65-73.
- [19] 孙世凯,李砚忠.乡村治安治理数字化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业与技术,2022(19):169-171.
- [20] 李砚忠,徐宁.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治安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为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63-70.
- [21] 周鑫,贾丽莹.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规民约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124-129.
- [22] 王春城,成军,王振艳.构建村干部绩效报酬体系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基层组织活力[J].中国财政,2022(12):58-59.
- [23] 赵文浦,张鹏,王娟,赵晨阳.基于Cite Space科学知识图谱的公共危机事件计量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2(04):27-34.
- [24] 崔亚杰,李丹.试论我国应急管理过程中“预防”的缺失问题——基于河北张家口“11·28”爆燃事故的个案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04):136-148.
- [25] 刘利永,马文斌.突发公共事件中地方主流媒体“爆款”融媒产品分析[J].新闻世界,2022(02):17-20.
- [26] 林顺利,蔡璟浩.从“治理失灵”到“动员有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社区应急治理体系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06):3-13.
- [27] 翟艳,姜明昊,谢慧,吴美艳.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构建多维治理的韧性社区策略探究[J].学会,2022(09):25-32.
- [28] 李明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口述历史”节目的传播价值探析[J].声屏世界,2022(01):61-62.
- [29] 刘淑娟.共享经济发展中社会治理创新研究[J].经济论坛,2022(02):138-145.
- [30] 骆艳青.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J].经济论坛,2022(01):147-152.
- [31] 麻新平.共享经济背景下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J].经济论坛,2022(02):132-137.
- [32] 康振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理论实践贡

- 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3.
- [33]覃志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特征新要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3.
- [34]田翠琴.加快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步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3.
- [35]左守秋,王雪凝,王宝林.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世界话语权提升路径探究[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2(01):1-5.
- [36]王彦坤.传承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3.
- [37]郭广伟,董志霄,杨英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耦合互动研究[J].城市开发,2022(10):110-111.
- [38]刘志华,姜瑞云,李焱,郭广伟.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2(10):45-47.
- [39]孙可,桑懿,陈帅,王舒.公共艺术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融合发展研究——以河北省秦皇岛市为例[J].大众文艺,2022(05):10-12.
- [40]彭东立,张成林.基于新发展理念河北红色文化发展路径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04):18-22,74.
- [41]黄逸超,丁立磊,李明伟.河北红色文化传承路径创新探索[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35):93-96,189.
- [42]樊建庆,赵俊红.河北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03):116-120.
- [43]李研,吴红娜.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22(08):65-66.
- [44]张良山,刘旭东,陈枫.新媒体时代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继承和推广策略探究[J].文化产业,2022(28):141-143.
- [45]王密卿,张瑞民.雄安新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J].文化产业,2022(35):157-159.
- [46]宋振源,张文婷,刘俊燕,郭丹,梁会芳.加强非遗文化数字化宣传助力“文化衡水”建设[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06):189-190.
- [47]王春城.乡村婚俗改革合力的形成:政府干预边界与政策工具协同——基于一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案例研究[J].学术交流,2022(11):139-150,192.
- [48]娄文龙,刘清,梁铖卉.我国住房公积金政策变迁量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共词和聚类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2(06):47-54.
- [49]鲍坤瑶.政策过程中的女性公民参与[A].第十二届公共政策智库论坛暨“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秦皇岛: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22:29-33.
- [50]王春城,张廷廷.基层政策执行“内卷化”:理论逻辑、发生机理与治理向路[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06):74-83.
- [51]文字杰,张瑞娟.从“我行我塑”到“塑战塑决”——Q市“限塑令”政策过程及修正策略研究[A].2022 社会发展论坛(昆明论坛)论文集[C].昆明: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能学习与创新研究工作委员会,2022:75-79.
- [52]崔俊鹏,李婧鑫.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下B市厕所问题分析[J].中南农业科技,2022(05):141-144.
- [53]史艺萌,王军,苑紫彤.“一提一补”水价政策中农户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2022(02):94-96.
- [54]郭广伟,申文杰,杨英法.城市文明时代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2(11):107-109.
- [55]王春城,刘欢欢.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J].行政论坛,2022(02):81-88.
- [56]曹雪彦,黄勇.后扶贫时期防返贫的长效机制与制度建设研究——以石家庄为例[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01):45-48.
- [57]段洪波,冯茜.财政贴息金融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以河北省H县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85-99.
- [58]檀皓举.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移民与人才引进法律政策:评述与展望[J].特区经济,2022(10):137-140.
- [59]唐勇,王开明.我国治理在华非法移民司法路径的思考[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22(01):123-128.
- [60]黄伊霖.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出入境观察,2022(06):86-89.
- [61]王子立.新加坡移民管理与移民政策[J].中国出入境观察,2022(05):84-88.
- [62]李砚忠.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2(01):151-160.
- [63]李砚忠,苗源源.基于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比较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78-91.
- [64]李砚忠,王涛.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的经济流强度与隶属度分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64-76.
- [65]代群艳.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2(26):79-82.
- [66]邹娜,曹冠龙.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04):1-6.
- [67]郑建卫,杜若楠.河北:牵住“牛鼻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N].河北经济日报,2022-12-2.
- [68]中共廊坊市委宣传部.河北廊坊 加快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典范城市[N].人民日报,2022-12-21.
- [69]杨杰.领导权威维护方式研究[J].领导科学论坛,2022(05).
- [70]刘雪丽,张道明.中西方领导权威理念的差异与相融之道[J].领导科学,2022(03):109-112.

- [71]梁瑞英.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机制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07):9-11.
- [72]刘格,张静.党员干部提高基层调研工作水平路径探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8):109-111.
- [73]柴文砚,丁万星.提高信访干部法治思维水平的八项措施[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07):216-217.
- [74]刘扬,赵宇轩,纪宇洁.乡镇干部公共服务能力调查与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2(10):95-96.
- [75]温瑞,冯雪梅,王鹏,谢昊,曹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现状及改进对策[J].乡村科技,2022(19):14-17.
- [76]商植桐,胡康倩,张明宽.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与时代启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24-28.
- [77]张彦台.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探析[J].观察与思考,2022(09):104-112.
- [78]商植桐,胡康倩.中国境内地方廉政评价体系的建构及优化对策分析[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2(06):12-16.
- [79]王润一,张依萱.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下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逻辑探究[J].南方论刊,2022(08):64-66.
- [80]晋惠娇,王颖,杨少卿,郭宪章.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干部廉政档案建设的路径研究[J].南方论刊,2022(12):54-57.
- [81]韩兆柱,赵洁.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和趋势[J].学习论坛,2022(01):67-76.
- [82]白献阳,邝苗苗.政府数据治理研究进展[J].文献与数据学报,2022(01):119-128.
- [83]杨玉楨,翟怀技.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政府建设的优化路径[J].科学发展,2022(11):23-29.
- [84]金福子,孙立达,卢衍航.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多案例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03):38-50.
- [85]白翠芳,王勃,苏炜.京津冀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探索[J].中国国情国力,2022(04):62-65.
- [86]陈兰杰,贾佳琪.基于价值网理论的开放政府数据公共价值实现模型研究[J].甘肃科技,2022(05):71-74.
- [87]盖宏伟,牛朝文.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城市数据隐私保护策略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38-49,126.
- [88]佟林杰,余欢.网络谣言传播特征、传播模式及消解机制[J].河北企业,2022(11):96-98.
- [89]王军,吕广旭,卢加奇,王小英.基于聚类方法的突发公共事件网民情绪分析[J].现代信息科技,2022(13):98-100,105.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金胜勇

2022年,恰逢“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名称正式更定,学科内涵得以深化,研究范畴得以拓展。河北省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虽然仍以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为核心,但已呈现出由点及面、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利用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2022年度的学术论著论文进行主题检索,可检索出河北省学者的专著8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包括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学术论文63篇。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理论研究”“资源管理”“事业建设”“工作实践”“技术应用”“文献学研究”六个领域,反映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学人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不断探索学科建设、发展与创新工作实践,积极为河北省发展赋能助力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收获。

一、理论研究

任何学科的理论基础都是其学术体系的立足

之基,深刻影响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长远发展。2022年河北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研究包括理论创新、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理论研究三方面。

(一) 理论创新

基础理论是学科根基与发展重心,它随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随社会发展和事业进步而不断创新。金胜勇等对收集的“图书馆学概论”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内容进行分析,构建课程思政元素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理想信念、品德修养、专业精神、个人发展4个一级元素,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15个二级元素,道路认同、理论认同等35个三级元素。^[1]宁冬云阐释了经典读物“一书多体”的内涵,并对其在公共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中的积极作用进行分析,指明了“一书多体”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最后结合全民阅读,从多方面提出公共图书馆“一书多体”经典阅读推广策略。^[2]魏明坤等构建基于语义关联的图书馆数字

资源聚合框架,从数据集、知识表示、语义检索三个层面揭示出数字资源元素、结构、层次等方面的映射关系,实现数字资源个性化知识服务。^[3]赵永莲通过分析人书分离模式的发展、内涵及其影响,揭示人书分离模式推广应用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人书分离模式的实时策略的建议。^[4]王超等对里昂·卡诺夫斯基阅读研究理论历程与思想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和思考,总结其对我国阅读研究与阅读推广工作的启示。^[5]支凤稳等在刺激——机体——反应(SOR)和计划行为(TPB)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到中小企业的有效样本,提出构建影响中小企业竞争情报的理论模型,以期为我国CI共享实践与后续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6]徐建民等利用改进D-S证据理论,将微博用户历史博文的可信度转化为证据,融合证据生成用户的信任区间,利用决策树算法实现对不可信用户的识别,能够提升识别效果。^[7]王旭依据评价科学理论、话语权理论和传播学理论,融合多源异构数据,依托于相关分析、集成因子分析、熵权法、TOPSIS法以及二维映射法优势,从多指标、多要素、多方法融合、比较和评估视角进行评价实证研究。^[8]于欢、肖宗花分析基于“医学生学业周期”的全流程阅读推广模式设计思路,对“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阅读推广理念进行阐述,并开展基于“医学生学业周期”的全流程阅读推广模式实践的讨论。^[9]宁冬云通过调研分析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典型案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热点、观看影视资料等方面挖掘文献检索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并将课程思政融入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实践。^[10]黄先涛结合《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第二版)》中对城市社区建设的论述,指出基于城市社区服务的医院图书馆建设管理应从加强自身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专业队伍的角度出发。^[11]

(二) 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梳理领域知识结构、明晰主流研究项目、掌握学科的发展趋势与方向。李素云、白献阳从文献时间趋势、作者合作社会网络、机构合作社会网络等方面分析中国知网中2015—2020年核心期刊和CSSCI的“图书馆管理”研究主题文献的总体情况,揭示近

年来图书馆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12]赵超凡等从学科领域、作者合著、研究主题、演化趋势四个维度对国内外中小企业竞争情报研究进行对比,探析国内外中小企业竞争情报领域的研究特点、发展趋势与差异。^[13]赵鸿玉、王旭采用核心主题词检索策略,研究“五计学”知识产出的跨学科广度、知识流动的跨学科广度和演化特征,提出增加图书、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载体进行跨学科深入研究。^[14]常颖聪、黄思慧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与威胁进行梳理,提出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紧密结合新技术,突显图书馆已有优势,资源、服务、教育、空间四位一体的有机生长的发展策略。^[15]黄民理针对数字出版迅猛发展时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机遇与挑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图书馆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的发展策略。^[16]张雪英等对《国家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丰富图书馆体验:美国国会图书馆2019—2023战略规划》的文本内容与核心要素进行对比解析,发现我国国家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重视重点项目实施、文化遗产保存和科学研究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战略规划在用户服务、数据驱动、营销宣传等方面将对我国图书馆规划有所启发。^[17]张收棉、金胜勇利用“表征空间”这一概念,对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空间所承担角色进行剖析,根据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所要传达的意义与价值,提出其在理念、功能与形式方面分别表征公平、记忆与现代性,指出这三种表征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发展趋势。^[18]周环、苏莉娜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中国图书馆学报》被WOS数据库所引用文献,研究发现《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渐扩大。^[19]王喜明、杨新明就学科更名之后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学科定位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建议学科研究向“信息范式”转移,积极融入信息化事业。^[20]费建梅分析我国工业遗产档案方面的文献,发现我国工业遗产档案研究存在理论与技术研究失衡、研究主体分布失衡、研究深度不足的问题,提出要注重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同步发展、研究主体均衡分布、深度挖掘工业遗产档案的建议。^[21]

(三) 其他

王廷山根据河北省高校图工委 40 年来工作实践,从三个方面对河北省高校图工委工作的主要特点进行总结,并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发展形势和要求,展望河北图工委未来的工作和发展方向。^[22]刘君君以《图书馆建筑论集》为例,探讨李明华关于人文、绿色的图书馆建筑理念及其精髓所在。^[23]张行研究了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女性图书馆学家——冯陈祖怡和陈颂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探寻这一时期女性图书馆学者学术研究特征。^[24]曹玉、锅艳玲等运用文本分析法,比对新旧《档案法》文本语气的调整、新增条款文本用词的选择和内容的内涵,结合《“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文本中彰显以人为本理念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诠释了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对档案工作者、文件形成者、非国有档案所有者、档案捐赠者、档案利用者、社会公众等主体的人文关怀理念。^[25]曹明帅等人利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国内 2009—2021 年产业竞争情报相关文献,归纳出了产业竞争情报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服务、过程、风险预警和具体产业的产业竞争情报等研究主题。^[26]支凤稳等利用文献调研与主题分析法,系统梳理了国内 2001—2021 年竞争情报风险预警的相关文献,归纳出了竞争情报风险的概念、来源、风险预警信息收集与分析等相关研究主题,探究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27]

二、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中占重要地位,其主要研究内容围绕信息组织、信息传播和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三方面展开。

(一) 信息组织

陈辰等系统梳理我国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历程,将规范控制发展历程分为思想酝酿、起步实施、稳步深化和变革探索四个阶段,从名称规范控制理论研究、标准规范和实践发展三个维度对各阶段发展情况进行全景式扫描。^[28]王荣群等归纳并总结国内外数字图像元数据的研究现状,选择不同类型的图像数据库调查分析其图像的元数据元素,将数据库内图像元素与数字图像相关的元数据标准对照分析,提出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

素集的改进建议。^[29]史海燕等在对信息组织经典方法介绍的基础上,介绍经典方法在网络环境下的拓展与应用、文本信息自动组织以及信息组织的新方法。^[30]孙玲玲等通过调查发现,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存在保护意识淡薄、保护机制尚未健全、缺乏新技术支持与运用、数字化档案建设嵌入不足等问题,提出应用数字赋能新技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保护与利用机制的方案。^[31]刘霞等通过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资源收集整理工作政治特性、前端性、阶段性、多样性的思考,提出建立针对性的收集、责任和保密制度,划定收集范围,明确不同来源、不同载体、不同门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资源收集方式和方法。^[32]

(二) 信息传播

在当前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在关注信息传播创造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如何管控其对政府、企业等社会主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时机借力发展创新,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刘海鸥等探析推荐系统中信息茧房导致的负面影响,结合用户画像技术中的多标签分类算法,对推荐系统用户的兴趣标签进行分级,构建多维特征标签体系,提出基于用户画像的多样化标签推荐方法。^[33]鲍玉静等对河北省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情况进行调研,提出“重视红色经典阅读指导工作,联动构建红色经典阅读生态环境,形成基于资源与读者为一体的推广模式,构建长效学习推广机制”等可行路径。^[34]冯学赞等通过调查分析,提出农学类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体系和策略。^[35]刘晓岚以防灾科技学院为例,结合了大量灾害信息传播的案例研究,建构较为完整的灾害信息传播理论谱系,且其经过发展,拥有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和代表学者等诸多代表性成果。^[36]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对舆情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舆情进行监测有助于相关舆情管理部门对舆情信息传播进行有效引导,促进舆情事件良性发展。苏妍嫒等从宏观层面解读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研究总体发展脉络,立足复杂动力学建模与舆论生态系统理论,介绍网络舆情现有研究在传播行为特征、演化影响因素、观点生成涌现、舆情传播扩散等微观层面取得的进展及研究展望。^[37]宋红剖析突发公共

事件与社会意识之间的本质关系,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实行性质鉴别与价值管理,结合结果导向和代入式新思维,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助力。^[38]龚致富与姬静怡研究发现多元化信息在短时间会出现裂变式传播,并探索医院网络舆情管理模式,以期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39]王方正和刘涵以微博这一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化媒体代表为例,提出此类平台应该从媒体的联通性、情感性和建设性三个维度进行公共文化氛围的构建与信息传播路径的创新。^[40]孙玉河等针对突发事件的特点,构造 AHP-TOPSIS 模型,并从主体强度、民众关注度、政府引导力度三个维度建立了突发事件舆情监测指标体系。^[41]王丽华等从网络谣言的民众关注点入手,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网络谣言,提炼出以“情绪宣泄”为核心的 12 个民意关注点,分析和总结新冠肺炎网络谣言民意关注点的演化过程。^[42]张丽君等人在分析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研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阐述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探索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措施和解决途径。^[43]

(三)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锅艳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价值与开发研究》一书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价值为切入点,探寻档案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坐标,结合机理分析和案例讨论,将档案化建设和数字化开发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价值实现的主要路径,设计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系统的框架。^[44]贺伟、李辉通过 TRIZ 的创新方法将专利信息提取为权项结构流、技术问题流、功能/效应/价值流、功能模型流、属性流等不同的信息结构流,构建专利与创新方法相衔接的桥梁性信息结构模型,将专利法律性文献信息转变成面向不同技术路径识别的权利地图,培养企业提升战略机会识别能力。^[45]迪莉娅着眼于利用开放数据超越传统政企合作边界融入多元主体,分析我国公共服务开放数据协作利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46]耿强等分析高校档案利用模式演变,提出基于完善档案信息的关联与调取机制、完善档案利用内控机制、提高多元利用主体参与度、建立“一站式”档案利用平台四个方面构建“基于信息化的一站式档案利用模式”的建议。^[47]段艳红通过梳理媒资档案的

发展脉络,提出应提高管理意识、注重战略布局贯穿始终、进行科学规划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内容产业合力发展、培养人才技术、硬件软件发展并驾齐驱。^[48]刘璐森等对正定县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研究,提出红色档案资源活化利用应以科技创新引领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研学红色档案追寻习近平正定足迹、以红色档案资源涵育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以红色档案资源助力乡村文化场馆建设。^[49]庞帅基于社会记忆视角,分析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特点和对其进行保护及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采集加强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保存管理、促进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完善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保障机制四个方面保护及开发的建议。^[50]冉华、张楠总结古籍开发利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提出健全制度,落实资金保障;多措并举,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建设人才梯队;开展深度整理,促进古籍挖掘利用;提升古籍宣传水平,扩大传播和影响力等对策。^[51]

三、事业建设

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档案事业的建设进程既体现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关系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2022 年,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档案事业的建设仍然是河北省图情档学科研究的热点,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发展战略研究、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以及其他五方面。

(一) 发展战略研究

发展战略指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目标、方法和策略,它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李颖、刘畅通过分析近五年我国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的特点,结合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强调未来我国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应注重突出地方特色、深化破圈与跨界的协同合作、以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推动档案宣传活动的创新、以关注“两侧”提升档案宣传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力。^[52]张金峰在加快档案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针对档案数据协同治理面临着顶层设计缺失、制度体系不完善,主体协同意识不强、职责

权属待优化,档案数据资源分散、数据规模庞大等困境,提出要强化档案数据协同治理顶层规划、增强档案数据协同治理意识、积极探索档案数据治理新技术。^[53]吴秀红、田静从制定长期设计规划、创新数字资源产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拓宽社会合作模式、建立服务评价系统等方面对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空间建设提出建议。^[54]支凤稳等基于元宇宙技术的档案展览模式相关研究及我国档案展览发展现状,以集成新型信息技术为底层支撑,驱动感知层、数据层、场景层和服务层运行,构建全新的档案展览模式。^[55]庞帅通过探讨《数据安全法》对档案数据的影响,分析其在安全保护意识淡薄、档案数据安全制度不完善、档案数据安全法治体系不健全、档案处理过程中档案数据安全等问题中发挥的作用,提出要提高档案数据安全保护意识、加强档案数据安全制度建设、完善档案数据安全法治体系和监督体系措施。^[56]在另一篇文章中,庞帅基于系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界定科技档案数据监管的内涵,论证科技档案数据监管的意义,构建贯穿科技档案数据生命周期的科技档案数据监管体系,进一步分析科技档案数据监管的内容。^[57]屈萌认为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是建设高素质馆员队伍的迫切需要,建设学习型公共图书馆应包括角色转换、学习理念、学习动力、学习环境、制度建设、团队建设六个元素。^[58]支凤稳等研究发现,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对CI的需求程度不尽相同,同行业竞争对手情报和创新策略情报是所有企业最迫切、最稳定的CI需求,揭示我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竞争情报需求的特征及内在关联。^[59]兰月新等通过研究明晰网络舆情风险监测机理,构建网络舆情传播核心要素指标集,研究基于常态建模的网络舆情异常数据感知方法并提出风险计算方法。^[60]

(二) 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尚宏雁基于《“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提出建设共享平台服务中心应坚持人民立场,倡导红色档案资源共享;成立合作组织,构筑成员联系网;自愿、平等、互惠,创新合作机制。^[61]徐红昌构建了科研人员科研数据共享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科研人员数据共享在用户认知、数据、社会

环境、平台方面影响因素。^[62]韩曾丽等介绍微信公众平台馆藏资源推荐体系建设情况,探讨了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推荐体系建设策略,为业界开展资源推荐、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参考。^[63]刘海鸥等为破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形下政府数据共享面临的隐私泄露、权责不清等痛点问题,在剖析数据共享现状困境的基础上,将区块链理念引入政府数据共享的研究范畴,以期完善政府数据开放体系和共享机制,强化政府舆情引导与数据开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双向发力。^[64]

(三)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参考决策、文旅融合等多种服务。顾润德、任婕等利用扎根理论整理访谈语义信息,分析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志愿服务影响因素并构建作用机制理论模型,认为管理体系、场域生态、感知反馈、自我评估、外部环境、参与收益、参与成本影响图书馆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并从志愿者招募、培养、保障、激励提出高校学生图书馆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提升路径。^[65]李英等总结图书馆文旅融合的研究现状,分析其价值取向,指出图书馆文旅融合主要包括的三种模式,并对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策略提出建议。^[66]何寿峰等在归纳分析公共图书馆开展决策咨询服务现状及服务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河北省图书馆的决策咨询服务现状及不足之处,并探讨提升河北省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要通过提供精准化决策咨询服务、建立用户动态档案形成顺畅的沟通机制等路径。^[67]读者荐购图书是读者参与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杨新明从“读者决策采购”在国内图书馆领域实施的内蒙古图书馆“彩云计划”、南京图书馆“陶风采”、浙江图书馆“U书”快借等案例出发,总结案例实施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和存在的文献类型单一、经费难以控制等问题,剖析“读者决策采购”的实施环境及实施路径。^[68]徐红昌等基于体验经济发展背景,体验营销应运而生,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提出图书馆可引入体验营销理念,通过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关联体验等体验营销路径,塑造图书馆良好、独特的品牌形象,使其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保持竞争优势。^[69]徐红昌等基于数智时代图书馆服务中的资源、空间和用户三个基本要素间的关系转变为各种大数据间的关

联,认为图书馆服务模式应从以“资源”“空间”为核心,发展到以“用户”为核心,实现服务模式和路径的创新升级,因此要构建和落实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和路径,精准对接用户需求,为其提供“感知有用”的服务^[70]。

(四) 专业教育与人才队伍建设

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中,宋立平、卫心雨在分析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培训方案设计模型在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中的适用性,提出了以馆员需求为中心、以培育目标为指南、以方案设计为依据的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路径,促进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的可持续发展^[71]。卢玉娟从人员的综合素质入手提升档案管理水平,将其作为设计方案的主要依据,提出要进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明确人员奖惩制度的方案^[72]。

图书馆、档案馆在高校育人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王晓谦、孔炜义在“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等教育背景下,从高校校史档案资源的具体育人功能出发,从完善机制、奠定扎实根基,丰富形式、提高育人质效,技术引领、提供重要支撑方面探究实现高校校史与育人相结合的实践路径^[73]。夏一雪以情报学为例,运用 Citespace 对情报的概念、流程、系统/体系等内容,开展学科知识可视化教学实践,在知识可视化理论下,构建可视化教学模式,把科学知识图谱作为可视化教学路径,提升学科教学中知识传播的表达力和知识创新的穿透力^[74]。冯赵建、吴屹萱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赋能互动”的用户界面、“高质高效”的组织管理、“富有智慧”的技术选择构建四维度模型,挖掘高校智慧图书馆“沉浸式”创新创业意识培育功能;打造“沉浸式”平台;优化专业团队驱动融合;升级技术支持创造“沉浸式”氛围4个维度,探索高校智慧图书馆服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路径^[75]。孔哲等采取网络问卷调查法,研究京津冀公办高校图书馆的育人服务现状,发现高校图书馆在育人服务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从丰富育人内涵、扩大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育人服务制度、构建育人服务体系等方面优化育人服务工作^[76]。张慧敏、张海滨就当代大学生学术素养的基本内涵以及当前高校在学生学术素养培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介绍

“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对学生学术素养培育的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人才优势^[77]。张云鹏等通过分析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的策略,以缩小各个高校间信息素养教育的差距,从整体上助力提升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水平^[78]。

王景文等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阐释了阅读治疗师的角色形态、理想角色的素质结构、领悟角色及其学习支持系统等,并结合实际从专家角色与大众角色维度对实践角色进行细分与探究,以便阅读治疗师在职业生涯中找准角色定位,实现实践角色的适度转移和有效调控^[79]。赖信含在分析高校数字化教学档案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要优化高校数字化教学档案管理流程,强化数字化教学档案数据中台建设,健全高校数字化教学档案安全体系^[80]。

四、工作实践

2022年河北省学者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工作实践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档案管理、资源建设、信息服务三个方面。

(一) 档案管理

不同行业的档案资源各有特色,也存在着多样化的问题。张晓春探讨火电建设项目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点,提出从重视档案、提高归档意识、夯实管理重制度、具体实施抓细节方面提高项目基建档案管理水平^[81]。董晶晶基于新形势下自然资源档案管理工作长期性、易变性、重复性、时效性的特点,针对创新意识淡薄、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相关机制不够完善、档案信息化建设不足等问题,提出积极创新档案管理理念、注重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进行信息化建设、注重档案业务规范化建设优化的方案^[82]。赵惠芹提出勘察设计单位要充分利用电子档案的优势,保证档案的完整性与安全性,实现数字化档案管理、落实现代化管理方法、强化信息化档案数据库的建设、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83]。祁铭研究水利档案管理保密工作必要性,提出建立健全水利档案管理保密工作责任制、制定水利档案管理保密工作制度、进行水利档案管理的保密管控、加强水利电子档案管理保密工作、加强水利档案保密宣传培训的方案^[84]。董惠等认为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价

值,应从人员优化、路径技术优化、路径制度优化、路径安全工作优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水平。^[85]张颖、张冬夏提出,要从强化精准扶贫档案管理意识;强化组织保障,规范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加大部门合作力度,强化业务指导方面提升。^[86]王静茹基于用人单位视角,通过将当前机要转递与EMS标准快递转递两种毕业生档案转递方式进行比较,认为机要转递应作为毕业生档案转递的首要方式、EMS标准快递可以作为辅助转递方式的毕业生档案转递规范化管理建议。^[87]宋百千认为企业组织对合同档案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合同档案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合同档案利用率低,应该建立完善的合同档案管理体系、完善合同档案管理工作流程、完善的合同管理网络体系来改进工作。^[88]陈世清等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城中村改造快速推进,新地名层出不穷取代了老地名,应探讨如何与时俱进将地名档案传承下去、利用起来;应丰富地名档案工作内容,全面夯实地名档案管理基础,积极开发地名档案信息资源。^[89]陈凤颖基于县级档案数字化技术应用标准缺乏统一性、人才匮乏、不能实现资源共享的数字化管理现状,提出要将数字化技术应用标准统一化,提高档案管理人才的质量,合理应用网络技术实现资源共享。^[90]

在人事档案管理上,林雨指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员流动量大,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暴露出信息处理速度慢、管理人员负担重等弊端。应转变人事档案管理理念,优化人事档案管理体系建设,加强对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人事档案管理的安全性。^[91]董晶晶从信息技术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和分析,探讨信息技术应用于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中的策略,提出促进档案管理规范化、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水平、提高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合理配置管理资源的建议。^[92]张静艳针对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管理配套政策法规不健全、档案管理人员缺乏、档案管理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提出从压实领导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业务培训方面改变现状的方案。^[93]

卢玉娟基于医院行政档案的社会性、历史性、原始记录性等性质特征,提出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创造良好工作环境,提供

管理保障;注重管理人员培训,深化服务意识;档案编研开发利用,保证数据可靠性;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共享的方案来改进医院行政档案管理工作。^[94]王泽蓓针对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统一文件标准、建立文书档案管理系统、提高信息化能力的方案。^[95]刘同、张策认为医疗科研档案管理作为医疗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医疗科研人员的归档意识不强、医疗科研档案归档率低、医疗科研档案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应从强化医疗科研档案归档意识、档案管理与科研工作同步进行、明确医疗科研档案归档范围、提高医疗科研档案的完整性等方面推进医疗科研档案的信息化管理。^[96]莘雪梅等将PDCA质量管理方法引入无偿献血档案管理中,实现档案资源分类汇总,便于血站对业务系统查询检索功能,降低档案翻阅使用率,延长原始档案保存时间。^[97]穆歌认为后疫情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应是数字化、移动化,而目前存在档案信息利用不充分、档案资料有偶然随机性、信息收集难度增大等问题,应建立与企业有关的档案管理制度,科学应对后疫情时代档案管理模式的变化。^[98]刘宁针对体系建设、机制运行、考评内容、管理手段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公立医院医德档案管理工作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医德档案管理体系,完善考评机制、增强考评效果的方案。^[99]申峰分析医院档案保管封闭、管理制度不健全、档案服务被动、信息化水平较低、使用和服务资源有限的问题,提出提高管理意识,明确档案建设目标;完善管理制度,促进制度精细健全;创新管理方式,加强档案人才培养;引入大数据技术,提高信息化水平的方案以推动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发展。^[100]

在高校的各类档案管理中,梁杰认为构建高校后勤系统档案信息化模式可以保证档案的完整性、提升档案的归档率、提高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提高档案的利用率;高校应规范电子文件的收集手段和方法,对传统纸质档案进行电子化处理,同时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完善硬件设施。^[101]王珊等针对档案资料收集力度不够、档案载体的形式多样、档案数据资源分散孤立、电子档案利用规则不完善、档案利用能力不足的问题,强调要加强收集力度、加强档案规范管

理、严格按照程序归档、保证档案归档科学规范、申请充足的经费和库房、加强开发利用。^[102]

(二) 资源建设

在各类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既要关注资源的选取方式,也要关注制度管理、技术应用及平台建设。李琳基于数据治理视角,指出高校图书馆在未来应注重电子教材资源版权、资源获取、设备、费用等,并要提高数据意识、成立专职部门、完善制度体系、关注技术发展、寻求联盟平台等。^[103]刘丽华、魏小贞对澳大利亚8所名校图书馆收藏的灰色文献从类型与主题分布、组织与揭示方式以及服务与版权保护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网络调查,指出我国应将灰色文献融入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核心内容,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开展精准服务,构建灰色文献的前瞻性资源体系,加强灰色文献版权意识。^[104]杨新明等针对高校图书馆馆配市场混乱的问题,从评价指标的选取、指标权重分析及实践指导意义等多方面分析高校图书馆馆配商评价指标体系,明确高校图书馆馆配商选择应重点关注的评价指标,建议下调政府采购招标中折扣的评分比重。^[105]王雪荣剖析大学文库建设时在资源获取、人员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文库构建和文库利用方面对其创新性和成功点进行分析,认为大学文库需注重特色构建,不断将传统技术与新兴技术结合。^[106]景雪认为地名档案部门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多渠道、多方式开发利用地名档案,保护弘扬地名文化遗产,重视地名档案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地名档案文化产品的研发,丰富地名文化宣传方式,推动地名各项事业全面可持续发展。^[107]岳红博、王伟红指出档案安全管理文化是档案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档案安全管理文化、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是保证安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的有力举措,也是推动档案安全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文化建设应该注重把握实质,规范行为,训练养成;明确责任,完善机制,审核评估;多措并举,点滴渗透,合力共育。^[108]杨青等提出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档案管理,完善管理工作;提升人才素质,扩大人才队伍;加强信息保护,筑牢安全防线的建议。^[109]张轩等认为读者荐购是动员读者参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

措施,读者荐购存在着读者参与率低、荐购功能不完善、荐购盲目等问题,在对图书馆荐购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探讨基于PDCA循环理念的读者荐购流程,并提出了相关建议。^[110]

(三) 图情档信息服务

在信息素养服务研究中,黄令贺提出信息素养是大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核心,要从大学生学习、求职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培养信息素养,帮助大学生提高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111]黄令贺等人还利用扎根理论,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孕妇的健康信息意识的质性资料,归纳总结影响孕妇健康信息意识的基本范畴,构建孕妇健康信息意识影响因素理论模型。^[112]魏小贞等以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现状、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出发,发现居住地类型、受教育程度、群体影响等6个因素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影响,提出要借助重视老年数字素养教育、继续推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等举措帮助提高中老年人数字素养。^[113]余设华等以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河北农民的数字素养现状为切入点,梳理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高校的人才和资源优势,从培育内容和培育对象方面提出提升河北农民数字素养的对策建议。^[114]允尚姿和白钟男从网络传播时代的背景出发,针对媒介素养产生的问题,重点分析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措施。^[115]

在高校图书馆服务中,李素娟针对新兴智能技术在高校智慧图书馆体系构建与智慧化升级过程中的应用,就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数据和信息安全问题,强调从制度和技术方面采取措施保障智慧化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数据信息安全。^[116]刘平等结合我国大学生当前创新创业的现状,从用户信息需求、知识管理、文献保障等角度出发,提出面向大学生“双创”需求的技术竞争情报服务策略,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117]

在用户信息服务研究中,黄令贺介绍信息、信息服务、信息用户和信息用户研究等概念,从研究选题、研究设计、质性资料收集方法和量化资料收集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信息用户研究的类型和步骤。^[118]王者鹏就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这一问题,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当前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现实瓶颈、关键

规则展开论述。^[119] 佟林杰和赵怀宇通过从社交媒体的用户个体、运营商等五个维度入手研究,发现用户个体和运营商直接影响对社交媒体用户隐私关注,信息数据间接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关注,技术保障、社会监督则起到调节用户隐私关注度的作用,并针对上述研究发现从个体、运营商和政府三个主体提出建设性建议。^[120] 李颖遵循从理念、制度、行动三个层面对档案开放进行研究,认为应树立与数字时代发展同频的档案开放意识,强化协同融通的档案开放观念,坚持与人民同心同向的档案开放思想;构建有效衔接且关系顺畅的档案开放制度框架,以制度创新丰富档案开放制度体系的内容;面向增量档案应在借力中形成合力,面向存量档案应注重通过情境分析破解瓶颈。^[121] 张倩通过对实际工作的总结与思考,提出确定档案征集范围要在固定框架下兼顾灵活,确定征集方式要在严格流程中兼顾灵活,确定征集线索要在明确思路中兼顾灵活的观点。^[122] 安玉洁从舆情应急资源管理控制、舆情应急资源调配传递、舆情应急过程效果价值方面设计应急能力结构,引入过程能力指数(Cp)来检测舆情服务应急能力水平,建立3层次、14维度的图书馆政府舆情服务应急能力结构模型。^[123]

在阅读推广服务中,屈萌从代际阅读的内涵入手,分析公共图书馆开展代际阅读推广服务的社会价值及问题,并提出提高代际阅读服务意识、培养代际阅读服务专业人才、重视代际阅读馆藏与空间建设、搭建代际阅读推广传媒平台的解决措施。^[124] 刘海涛以“双高计划”建设为背景,根据“阅读推广+”自身特点与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目标、定位、职责、功能和作用等方面的相似性,判定“阅读推广+”在高职院校具有适用性,分别从读书会、思政教育、跨界合作和线上平台四个角度出发,提出图书馆“阅读推广+”新服务范式。^[125]

刘玉华等分析中医药卫生科技查新咨询服务的特点,以河北省医学情报研究所为研究对象,从查新机构到基层卫生机构普及查新知识、丰富数据库资源等五个方面论述中医药卫生科技创新咨询服务发展。^[126] 刘玉华等在分析生命周期和项目生命周期结构的基础上,将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实施和成果转化对应于医学科研项目

生命中的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并在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科技查新咨询服务内容。^[127] 顾玉青和赵俊玲梳理全民阅读推广中复杂多元的社会资源,把握各社会力量的特点和作用机制,从图书馆视角切入,介绍图书馆整合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合作的思路和方法。引导图书馆在善用各类资源的同时,实现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并通过案例分享,提供实践抓手。^[128] 朱丹等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结合社会老龄化现状和国家发展战略开展的“数字反哺,智慧助老”实践活动,从活动的目的意义、策划实施、分析启示进行讨论,结合问卷分析,总结实践活动的社会反响。^[129] 彭兆祺采用网络调查法、文献调查法和电话访谈法对高校图书馆的无障碍基础设施、辅助设备、文献信息资源以及残障用户服务网站栏目等内容进行调查,提出要提高对残障用户的服务意识、配备并完善无障碍设施及设备、丰富残障用户适用的馆藏资源、加强图书馆网站信息无障碍建设等建议。^[130]

五、技术应用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2022年,河北省学者重视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研究,着眼于分析各种技术对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探讨技术在相关工作中的合理使用以及对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利用等。

(一)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李宇佳和王益成在探究学术新媒体信息流转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学术新媒体用户需求与分层画像,理顺学术新媒体用户画像步骤,构建基于用户动态画像的学术新媒体信息精准推荐模型。^[131] 李金泽等将LDA主题模型与K-means算法相结合,利用LDA模型实现文本潜在语义的识别,运用SVM算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聚类分析,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动态识别模型。^[132] 张建勋和董旭对2016—2021年数字化工作进行总结,展现数字化工作探索历程,分享文物数字化实践经验方法,在今天的文物保护维修、科学研究、展示利用和安全监管等方面具有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133] 刘凤等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大数据赋能地方政府治理展开研究,发现存在当前公众需求数据碎片化、信息技术更迭频繁影响

决策科学性,协调、整合、信任三大机制分散导致治理结构混乱,多元治理主体“各自为战”产生“信息割裂”等现实问题,进而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以回应大数据赋能地方政府治理需求。^[134]周海澎等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档案信息化面临着纸质档案的局限、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的缺失的问题,提出更新管理理念、实现数据集中管理、完善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的建议,旨在档案工作使更加客观、科学、有效。^[135]赵惠芹结合大数据分析方法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现状,针对成本控制、时效性、人文情感等方面问题,提出引进先进的设备与管理技术、建设档案全文数据库、提高服务质量、利用可视化分析提高档案资源的可理解性、采用语音引擎实现档案数据智能提取的提升策略。^[136]贾东月针对我国电子健康档案建设起步晚、覆盖率低、信息孤岛严重、共享率低、信息获取能力低、民众认知不够、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不到位的问题,提出电子健康档案云共建、电子健康档案云计算、电子健康档案云共享、电子健康档案云利用的建设途径。^[137]

(二) 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利用

邓铭琪等在生态学共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共生舆情的质参量兼容性、发展水平和发展潜能分析共生效应作用机理,提出基于 logistic 的共生模型,结合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仿真实验,阐释共生效应对共生舆情的影响效果及其影响路径,并通过实证验证该模型。^[138]李宇佳、陈为冬依据用户体验相关模型构建学术微信公众号用户体验效果指标体系,调查学术微信公众号用户主观感知体验。^[139]鉴于传统关键词抽取算法缺乏精准语义信息、准确率低等问题,李雪山、刘鹏鹏等提出 Bi-TextRank 算法以改进铁路科技文献关键词的抽取效果。^[140]李媛通过内容分析法得出第三空间图书馆创新服务建设的基础维度,剖析出传统图书馆服务存在的问题和第三空间图书馆创新服务建设维度的具体内容,提出第三空间高校图书馆服务建设、空间再造是转型基础,文化和休闲服务是建设重点,智慧多元服务助力促进教育科研职能的发展。^[141]郑向辉以电子档案单套制的发展趋势为切入点,对区块链模式在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指出电子档案的安全性是电子档案在数字化平台中存储与传

播的前提与基础,而区块链模式的应用可以提高电子档案管理的安全性,促进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142]宋辉宇分析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档案信息化水平滞后、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滞后、档案人员队伍建设滞后的问题,提出要应用区块链技术优势在档案管理中保障档案信息安全,并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加快政策落地。^[143]王晓东等探究利用分布式数据库,实现电子档案的不同类型数据的统一存储、统一管理,采用数据库分片技术实现数据库的水平扩展,解决数据量随时间快速增加时所遇到的存储空间瓶颈、从数据存储检索信息需消耗大量计算资源、数据传输导致网络流量过大等诸多问题。^[144]赵惠芹为通过对 BIM 技术档案存储依据不明确、无法正确存储与传输、档案管理人员业务短板等问题进行探析,提出明确存档依据、构建存储与数据传输标准、提升档案管理人员业务素质等方法和公路工程建设 BIM 技术档案管理的设想,展望通过推进公路工程档案信息化进一步促进 BIM 技术发展。^[145]

(三) 其他

李雪丽等针对已有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利用 CMA3.0 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偏倚分析和效应值分析,探索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146]马建红等针对现有专利技术主题演化的不足,提出运用 MW-LDA 的专利技术主题提取方法,多角度改进词汇权重并构造复合权值,优化 LDA 模型生成特征词的过程,使其更适用于专利文本。^[147]徐杰和郭海玲对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分析、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趋势外推预测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层次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进行相关研究。^[148]田杰等通过网络调研,发现国外林业期刊网站服务栏目类别全面、内容丰富,同时有侧重性;国内林业期刊网站栏目设置及内容单一,对作者的专项服务不突出,论文增值服务还需更加全面,在新媒体应用、内容实效性、个性化服务方面有待加强。^[149]孙若阳等分析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文创发展现状,探究元宇宙技术为数字档案文创带来的发展机遇,并基于此借鉴博物馆数字藏品的创作发行模式,构建数字档案文创生态体系。^[150]刘春燕提出智慧图

书馆建设可以借鉴元宇宙的理念,提出加快推进文献资源数字化、加快健全信息基础设施、构建用户创作模块、发行数字货币、构建更广范围公共服务平台等对策。^[151]周鑫等在梳理元宇宙现状历史和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从发展趋势和风险隐忧两方面探析国内外元宇宙研究进展和研究热点。^[152]李勇从元宇宙的起源及概念入手,阐述元宇宙核心价值及技术支撑,剖析元宇宙在各国发展的进程及特点,在应用方面针对元宇宙对文旅行业的契合以及元宇宙为文旅行业发展带来的改变,对未来元宇宙及文旅元宇宙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153]

六、文献学研究

(一) 文献学理论研究

刘金柱、王俊认为古典文献学对发掘和利用我国古代典籍以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对于历史源流、分类、阅读及收藏等内容的介绍,总结出古典文献学具有为现代人完善自身提供参照、厚植现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根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现代意义。^[154]

郭英德认为戏曲文献学是探究戏曲文献形态、演变及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并指出戏曲文献学的基本原则的内涵:求真是对戏曲文献的本体认知,强调探究戏曲文献的本真;可靠包含追求文献自身的可靠、文献整理方式和整理成果的可靠三层意义;适用是指戏曲文献的功能旨趣,充分保证其可靠性。^[155]祝金梦指出“共建共享”理念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分析并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其优化路径,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公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拓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渠道,降本增效;结合监管制度实现公众规范性参与,借助精细化制度保证其可持续性。^[156]王建楠、刘晴对承德地区三所图书馆的馆藏民国文献进行实地调研,分别对三所图书馆的馆藏民国文献从文献来源、文献规模、种类与特色、保护及利用措施进行梳理,发现图书馆对民国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由于人员、资金等因素尚未开展,并从人才培养、数字化建设、阅读推广等方面提出图书馆在民国文献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157]。

王建楠、孙玲玲明确建设承德地区图书馆民国文献数据库的必要性,指出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建设时应包括民国文献整理和分类、电子书扫描和制作、繁简字体的转换以及数据库的发布和利用等多流程,解决了民国文献“藏”与“用”的矛盾,提高了馆藏文献的服务水平。^[158]

(二) 文献工作研究

闫佳慧对管庭芬的生平、交游以及藏书等进行概述,从管庭芬的藏书思想、版本学思想以及校勘学思想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藏书思想注重藏书种类丰富,促进书籍共享,版本学思想强调融会贯通,准确鉴别,校勘思想主张尊重古书原貌,随校随补。^[159]赵维敏将鲍廷博题跋作为研究对象,对鲍廷博的生平、交友、题跋的内容以及其表现形式进行研究,从题跋角度对鲍廷博的人生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总结了鲍廷博题跋的特色及其藏书思想、刻书理念等,展现出鲍廷博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保护与传播方面的重要贡献。^[160]张妍对陈嘉谟的《本草蒙筌》进行研究,论述了在之前的本草学史概要及发展过程,从写书背景、版本、体例等几个维度对该书进行介绍,辨析药物生长条件、储藏条件等与药物质量之间的关系,对该书中延年益寿药物及其药性与功效进行统计,还对该书征引情况进行统计。^[161]任文京介绍詹锓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指出詹锓强调古今中外并重,形成了独有的校勘主张,同时肯定了詹锓重视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162]戴建兵、吴景平等针对海外中国近现代文献的收集整理发表了个人看法,利用系统或零散的海外文献进行历史书写,并解读其意义,对以正定为中心的地方史料进行征集整理与研究利用,从正定地方的自然、历史、宗教、习俗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有助于拓展正定地方历史的研究视角,对促进地方文献的研究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163]

(金胜勇: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金胜勇,吴彰丽,刘培硕.“图书馆学概论”课程思政元素体系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22(06):51-59.
- [2]宁冬云.基于“一书多体”的公共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4):115-121.
- [3]魏明坤,滕闻轩,冯昌扬.基于语义关联的数字图书馆信

- 藏资源聚合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05):185-89.
- [4]赵永莲.技术驱动下图书馆人书分离模式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1):87-93.
- [5]王超,赵俊玲,郑雅丹.里昂·卡诺夫斯基的阅读研究及启示[J].图书馆建设,2022(05):59-65,72.
- [6]支凤稳,张萌,刘贺.竞争情报共享的影响因素——来自中小企业的证据[J].情报科学,2022(12):96-103.
- [7]徐建民,王恺霖,吴树芳.基于改进 D-S 证据理论的微博不可信用户识别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2(12):99-112.
- [8]王旭.多元融合视域下中国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114-131.
- [9]于欢,肖宗花.从“学业周期”角度构建全流程阅读推广模式——以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02):8-10.
- [10]宁冬云.“课程思政”融入文献检索课教学实践与探索[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03):76-79,91.
- [11]黄先涛.基于城市社区服务的医院图书馆建设管理研究——评《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第二版)[J].现代城市研究,2022(06):134.
- [12]李素云,白献阳.国内图书馆管理研究热点及趋势(2015—2020)——基于 Ucinet 的可视化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22(02):62-72.
- [13]赵梦凡,支凤稳,彭兆祺,马小琪.国内外中小企业竞争情报研究——基于 ITGInsight 的对比分析[J].情报科学,2022(10):123-130.
- [14]赵鸿玉,王旭.开放科学背景下跨学科研究的知识流动特征与演化趋势——以“五计学”研究为例[J].情报科学,2022(04):107-117.
- [15]常颖聪,黄思慧.基于 SWOT 分析的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发展策略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02):25-32.
- [16]黄民理.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22(05):5-11.
- [17]张雪英,牟玲玲,柳贝贝.中美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对比分析及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8):47-52.
- [18]张收棉,金胜勇.公共图书馆的表征空间及其再生产[J].图书与情报,2022(06):113-120.
- [19]周环,苏莉娜.《中国图书馆学报》论文被 WOS 数据库引用情况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22(06):85-89,84.
- [20]王喜明,杨新明.“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图书馆论坛,2022(06):11-19.
- [21]费建梅.我国工业遗产档案研究综述[J].档案天地,2022(04):25-30,59.
- [22]王廷山.河北省高校图工委 40 年工作回顾与展望[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1):52-53.
- [23]刘君君.建设人文、绿色的现代图书馆——评李明华先生《图书馆建筑论集》[J].新世纪图书馆,2022(08):90-94.
- [24]张行.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学家学术思想研究——以冯陈祖怡、陈颂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22(03):53-59.
- [25]曹玉,锅艳玲,常家源.论新时期档案事业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基于新《档案法》的文本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2(02):66-74.
- [26]曹明帅,支凤稳,马小琪.我国产业竞争情报研究现状与展望[J].图书情报导刊,2022,7(12):56-64.
- [27]支凤稳,郑彦宁,赵梦凡等.竞争情报风险预警:研究回顾与框架构建[J].情报工程,2022,8(06):56-65.
- [28]陈辰,杨幸然,宋琳琳.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发展历程及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4):75-84.
- [29]王荣群,李婷,魏蕊.图像数据库元数据元素集调查研究和改进建议[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03):15-21.
- [30]史海燕,郭海玲,张鑫,锅艳玲.信息组织[M].科学出版社,2022.
- [31]孙玲玲,关利革,张淑红.数字赋能视域下,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整合与保存研究[J].兰台内外,2022(26):19-21.
- [32]刘霞,崔红霞,张新,袁浩,刘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资源收集整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J].档案天地,2022(07):53-56.
- [33]刘海鸥,李凯,何旭涛,姜波.面向信息茧房的用户画像多样化标签推荐[J].图书馆,2022(03):83-89.
- [34]鲍玉静,徐若彤,侯涤非.河北省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现状及阅读推广路径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2(05):59-62,82.
- [35]冯学赞,周贵连,马宝珍,谢志霞.从读者获取和利用文献的习惯谈农学类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策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08):1026-1034.
- [36]刘晓岚.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探索与实践——以防灾科技学院为例[J].科技视界,2022(07):65-68.
- [37]苏妍嫒,张金纯,张亚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学模型综述[J].现代情报,2022(12):160-177.
- [38]宋红.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价值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22(08):161-168.
- [39]龚致富,姬静怡.融媒体时代医院网络舆情现状分析及对策[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04):54-56.
- [40]王方正,刘涵.后疫情时代社会化媒体公共信息传播路径[J].传媒论坛,2022(14):29-31.
- [41]孙玉河,张鹏,张正东,赵晨阳,贾南.基于 AHP-TOPSIS 法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预警研究[J].情报探索,2022(07):51-58.
- [42]王丽华,夏一雪,杨露露,金冬雪.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冠肺炎网络谣言民意关注点研究[J].情报探索,2022(04):77-83.
- [43]张丽君,陈淑敏,张苗苗,李姣.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及应对机制研究[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

- 报,2022(4):42-44.
- [44] 钢艳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价值与开发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04.
- [45] 贺伟,李辉. 基于专利信息分析“五流”模型的战略机会识别研究[J]. 情报杂志,2022(01):81-87,148.
- [46] 迪莉娅. 我国公共服务开放数据协作利用的问题研究[J]. 图书馆,2022(08):28-33.
- [47] 耿强,王珊,孙勇. 档案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重构高校档案利用模式的思考[J]. 档案天地,2022(06):42-47.
- [48] 段艳红. 浅谈新时期广电行业媒资档案的管理与开发[J]. 档案天地,2022(07):51-52.
- [49] 刘璐森,李娟,董金英. 正定县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活化利用新模式及当代价值研究——以农业专家黄春生档案创新利用为例[J]. 档案天地,2022(12):61-64.
- [50] 庞帅. 社会记忆视角下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保护及开发探究[J]. 北京档案,2022(10):30-32.
- [51] 冉华,张楠. 文化传承视域下图书馆古籍开发利用探析——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4):24-28.
- [52] 李颖,刘畅. 近五年我国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探析与未来建议[J]. 北京档案,2022(08):26-28.
- [53] 张金峰. 新形势下档案数据协同治理实现路径探析[J]. 档案与建设,2022(08):25-29.
- [54] 吴秀红,田静. 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体验空间服务创新探究——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1):47-51.
- [55] 支凤稳,孙若阳,云仲伦. 元宇宙:档案展览模式与路径的新探索[J]. 档案与建设,2022(09):32-36.
- [56] 庞帅. 基于《数据安全法》的档案数据安全研究[J]. 档案天地,2022(04):40-42,56.
- [57] 庞帅. 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的科技档案数据监管体系探析[J]. 兰台世界,2022(08):30-35.
- [58] 屈萌. 试论学习型公共图书馆的创建[J]. 兰台世界,2022(S1):73-74.
- [59] 支凤稳,郑淳元,赵梦凡.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竞争情报需求关联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02):111-120.
- [60] 兰月新,张丽巍,王华伟,赵丽娟,段海鹏. 面向风险监测的网络舆情异常感知与实证研究[J]. 现代情报,2022(03):102-108.
- [61] 尚宏雁. 建设共享平台服务中心大局——河北省馆藏红色档案异地跨馆查询利用平台建设纪实[J]. 档案天地,2022(05):7-10.
- [62] 徐红昌. 扎根理论视角下科研人员科研数据共享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06):102-107.
- [63] 韩曾丽,赵蕾霞,田蓁子. 基于微信的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推荐体系建设——以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为例[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02):56-58.
- [64] 刘海鸥,周颖玉,王海英. 基于区块链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模型研究[J]. 现代情报,2022(10):79-89.
- [65] 顾润德,任婕,陈媛媛. 高校图书馆学生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提升路径[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06):16-23,30.
- [66] 李英,李肖峰,王一诺,陈兰杰.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策略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4):96-101.
- [67] 何寿峰,郭巧玲,李笑寒. 河北省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提升路径研究[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5):35-38+22.
- [68] 杨新明. 基于案例分析的“读者决策采购”实施路径探索[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3):26-30.
- [69] 徐红昌,潘荣,张静茹. 基于体验营销理念的图书馆品牌形象塑造路径[J]. 图书馆学刊,2022(06):31-36.
- [70] 徐红昌,许士娟,薛国晔. 数智时代图书馆新型服务模式构建及路径研究[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2):48-52.
- [71] 宋立平,卫心雨. 基于培训方案设计模型的高校图书馆馆员培训路径探究[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3):81-85.
- [72] 卢玉娟. 浅谈医院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J]. 档案天地,2022(01):59-60.
- [73] 王晓谦,孔炜义. 高校校史档案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 档案管理,2022(01):73-74.
- [74] 夏一雪. 基于文本大数据的学科知识可视化教学探索与实践——以情报学为例[J]. 现代情报,2022(02):104-116.
- [75] 冯赵建,吴屹萱. 高校智慧图书馆“沉浸式”创新创业意识培育研究——基于四维度模型[J]. 图书馆学刊,2022(10):40-44.
- [76] 孔哲,张媛,廖文颐,马志华. 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现状分析与优化建议——以京津冀部分高校图书馆为例[J]. 河北科技图苑,2022(03):59-65,25.
- [77] 张慧敏,张海滨. 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对学生学术素养的培养路径探讨[J]. 大众文艺,2022(08):127-129.
- [78] 张云鹏,赵莹,李团业等.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及其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J]. 模型世界,2022(25):106-108.
- [79] 王景文,张丽丽,王艳,庞敏. 角色理论视域下高校阅读疗法角色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4):5-12.
- [80] 赖信含. 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高校教学档案的构建研究[J]. 档案天地,2022(08):49-50,43.
- [81] 张晓春. 火电建设项目基建档案管理工作重点刍议[J]. 云南档案,2022(04):62-63.
- [82] 董晶晶. 新形势下自然资源档案管理工作优化分析[J]. 兰台内外,2022(07):31-33.
- [83] 赵惠芹. 信息化时代勘察设计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研究[J]. 办公室业务,2022(01):75-77.
- [84] 祁铭. 水利档案管理保密工作路径探析——以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为例[J]. 档案天地,2022(05):61-62,20.

- [85]董惠,杨洋,张磊.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路径[J].黑龙江档案,2022(01):45-47.
- [86]张颖,张冬夏.精准扶贫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档案天地,2022(06):55-56.
- [87]王静茹.用人单位视角下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方式的思考[J].黑龙江档案,2022(06):34-36.
- [88]宋百千.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实践[J].档案天地,2022(05):57-58.
- [89]陈世清,郭自恒,蔺森.关于做好新时期地名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J].档案天地,2022(12):50-51.
- [90]陈凤颖.县级数字化档案管理的应用现状及未来前景研究[J].档案天地,2022(10):56-58,20.
- [91]林雨.数字信息化在人事档案管理中的应用[J].档案天地,2022(08):54-57.
- [92]董晶晶.基于信息技术视角下事业单位档案管理要点探讨[J].办公室业务,2022(01):113-114.
- [93]张静艳.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管理探讨[J].档案天地,2022(11):63-64.
- [94]卢玉娟.浅谈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医院行政档案管理工作[J].档案天地,2022(09):53-54.
- [95]王泽蓓.大数据时代医院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优化探索[J].档案天地,2022(07):41-42,33.
- [96]刘同,张策.浅谈医疗科研档案的管理[J].档案天地,2022(05):63-64.
- [97]莘雪梅,李赛男,刘佳.浅谈PDCA管理模式在无偿献血档案管理中的应用[J].档案天地,2022(07):61-62.
- [98]穆歌.后疫情背景下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变化研究[J].档案天地,2022(05):59-60.
- [99]刘宁.以党建为引领强化公立医院医德档案管理工作的探索与实践[J].档案天地,2022(06):59-61,11.
- [100]申峰.医院档案精细化管理的应用分析[J].兰台内外,2022(01):22-24.
- [101]梁杰.构建高校后勤系统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探析[J].档案天地,2022(01):36-38,35.
- [102]王珊,耿强,唐伟.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档案规范化管理的思考[J].档案天地,2022(04):35-39.
- [103]李琳.数据治理视域下高校图书馆电子教材资源建设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6):86-93.
- [104]刘丽华,魏小贞.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灰色文献建设研究——基于对澳大利亚8所大学图书馆灰色文献的调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1):72-78.
- [105]杨新明,李飞,尹苗苗.高校图书馆馆配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22(01):98-104.
- [106]王雪荣.大学文库的构建与利用探讨——以河北大学“坤舆文库”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22(06):10-14.
- [107]景雪.关于推进地名档案文化建设的思考[J].档案天地,2022(05):52-54.
- [108]岳红博,王伟红.档案安全管理文化建设探析[J].档案天地,2022(07):34-37,21.
- [109]杨青,刘汶源,郭敬蕊.社会保险档案数字化建设的问题及优化措施研究[J].档案天地,2022(12):57-60.
- [110]张轩,齐德玲,曾德华.基于PDCA循环理念的读者荐购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2(09):141-143.
- [111]黄令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程[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04.
- [112]黄令贺,于金平,郝梦坤等.基于扎根理论的孕妇健康信息意识影响因素探索性研究[J].晋图学刊,2022(02):1-12.
- [113]魏小贞,刘丽华,武琼.从智能手机素养看中老年人数字融入之困[J].图书馆研究,2022(03):119-128.
- [114]余设华,谭密,高福宁,刘美珍.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河北农民数字素养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6):63-68.
- [115]允尚姿,白钟男.网络传播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教育措施[J].大学,2022(16):103-106.
- [116]李素娟.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及其基础性安全问题[J].才智,2022(05):157-159.
- [117]刘平,董素音,蔡丽静,李伟,赵淑君.“互联网+”视野下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技术竞争情报(CTI)服务策略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2(07):131-132.
- [118]黄令贺.信息用户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08.
- [119]王者鹏.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构建与实施——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J].图书馆,2022(01):1-7.
- [120]佟林杰,赵怀宇.社交媒体用户隐私关注影响因素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118-121,142.
- [121]李颖.档案开放研究:理念、制度与行动[J].档案与建设,2022(03):36-39.
- [122]张倩.谈谈档案的征集范围、征集方式和征集线索[J].档案天地,2022(10):28-29.
- [123]安玉洁.图书馆政府舆情服务应急能力结构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2(06):64-73.
- [124]屈萌.公共图书馆代际阅读推广服务研究[J].兰台内外,2022(26):70-72.
- [125]刘海涛.“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策略与范式研究[J].图书馆学刊,2022(08):75-80.
- [126]刘玉华,杨振儒,张秀菊,赵晓冬,翟俊霞.河北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开展中医药卫生科技查新咨询服务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医药导报,2022(12):190-193.
- [127]刘玉华,杨振儒,张秀菊,赵晓冬,翟俊霞.基于医学科研项目生命周期的科技查新咨询服务模式构建[J].中国医药导报,2022(20):194-197.
- [128]顾玉青,赵俊玲.社会资源与图书馆阅读推广[M].北京:朝华出版社,2022.

- [129]朱丹,魏小贞,刘丽华.“数字反哺,智慧助老”实践活动分析与启示[J].河北科技图苑,2022(02):25-29.
- [130]彭兆祺.高校图书馆障碍用户服务研究——对124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调查[J].图书馆学刊,2022(08):68-74.
- [131]李宇佳,王益成.基于用户动态画像的学术新媒体信息精准推荐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22(01):88-93,101.
- [132]李金泽,张鹏,王娟,何巍,兰月新.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动态识别模型与应对策略研究[J].情报科学,2022(05):73-83.
- [133]张建勋,董旭.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信息建设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 [134]刘凤,袁菲,王晓端.大数据赋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2(02):16-20.
- [135]周海澎,陈业佳,马成.基于大数据的高职院校档案信息化建设路径选择[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3):74-76.
- [136]赵惠芹.大数据分析技术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应用[J].办公室业务,2022(09):128-130.
- [137]贾东月.大数据时代电子健康档案云服务建设研究[J].黑龙江档案,2022(01):66-68.
- [138]邓铭琪,兰月新,夏一雪,卢金富,温志韬.基于logistic的网络舆情共生效应与仿真研究[J].情报科学,2022(03):126-135.
- [139]李宇佳,陈为东.学术微信公众号用户体验效果及优化策略研究[J].现代情报,2022(02):117-129.
- [140]李雪山,刘鹏鹏,李子林,赵占芳.融合注意力机制的铁路科技文献关键词抽取研究[J].铁道学报,2022(12):65-72.
- [141]李媛.第三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内容体系实证分析[J].晋图学刊,2022(01):35-44.
- [142]郑向辉.区块链模式在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中的使用[J].黑龙江档案,2022(01):223-225.
- [143]宋辉宇.应用区块链技术保证档案信息安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02):30-32.
- [144]王晓东,常海军,王征.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体化档案管理研究[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22(04):218-221.
- [145]赵惠芹.公路工程BIM技术档案存储探索与实践[J].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学报,2022(02):77-80.
- [146]李雪丽,黄令贺,陈佳星.基于元分析的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2(04):97-107.
- [147]马建红,王晨曦,闫林,姚爽.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专利技术主题演化分析[J].情报学报,2022(07):684-691.
- [148]徐杰,郭海玲.数据分析方法[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 [149]田杰,张菁,石文川.融媒体背景下国内外林业期刊网站服务功能调研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05):629-637.
- [150]孙若阳,支凤稳,彭兆祺.元宇宙技术赋能数字档案文创发展研究[J].浙江档案,2022(08):38-41.
- [151]刘春燕.智慧图书馆实践探索:一个元宇宙视角[J].大众文艺,2022(14):148-150.
- [152]周鑫,王海英,柯平,盛译瑶,刘海鸥.国内外元宇宙研究综述[J].现代情报,2022(12):147-159.
- [153]李勇.元宇宙文旅数字化发展新机遇[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 [154]刘金柱,王俊.试论古典文献学的现代意义——评《中国古典文献学》[J].中国教育学刊,2022(12):135.
- [155]郭英德.论戏曲文献学的学理内涵[J].文学遗产,2022(05):19-30.
- [156]祝金梦.多元与协同:社会力量参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路径研究[D].河北大学,2022.
- [157]王建楠,刘晴.承德地区图书馆民国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13):118-121.
- [158]王建楠,孙玲玲.承德地区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调查研究[J].兰台内外,2022(07):55-57.
- [159]闫佳慧.管庭芬文献学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22.
- [160]赵维敏.鲍廷博题跋研究[D].河北大学,2022.
- [161]张妍.陈嘉谟《本草蒙筌》研究[D].河北大学,2022.
- [162]任文京.师前贤而不泥古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锓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03):25-35.
- [163]吴景平,汪朝光,金以林,戴建兵,宋佩玉.中国与世界:海外中国近现代史文献的收集、整理[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5-25.

河北专题研究

河北经济建设研究

高智 梁世雷

2022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河北省社科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紧紧围绕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紧跟理论前沿,把握时事动态,积极开展全省经济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积极推进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探索。从研究领域看,既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与行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又包括京津冀经济协同、科技与经济融合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等交叉领域。从研究视角看,既注重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战略引领,又注重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从研究方法看,既重视相关经济理论引用,又不乏实证分析方法应用。总体上看,在研究内容上有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在研究视野上有突破,在研究成果上有价值,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致力于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实践,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数字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对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

(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陈春生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贯穿始终。要坚持系统观念,善于运用系统思维进行总体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沿着全要素精准发力、多领域协同联动、全方位系统集成路径整体推进。要系统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做到统观长远与当前、融合宏观与微观、连通目标和过程、协调速度与质量、兼顾公平与效率、统筹发展与安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效应。^[1]

刘国华等指出,从新发展理念角度看,河北省经济发展存在增速放缓、增长乏力、动力不足、开放不够等问题。因此,推动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实力;要推动供给侧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要实施扩大开放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促进城乡、区域及产业协调发展;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

付浩楠采用熵值-TOPSIS法,对河北省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在不断增强,但创新滞后仍是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为此建议: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强化科技创新经费支持;二是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机制,拓展科技创新融资渠道;三是重视科技创新与经济质量升级协同,形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合力。^[3]

王冰等认为,绿色金融对河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应营造绿色金融发展良好环境。一是发挥部门间协同效应和绿色金融高效配置资源作用,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政策协同机制;二是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引导资源流向绿色经济产业;三是推进绿色金融直接融资,提升绿色金融债券融资审批效率;四是完善绿色金融风险保障机制,提高企业参与绿色保险积极性。^[4]

韩泽初从高效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三个视角,探究了河北省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河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具体到三个维度影响效应不同,高效发展最大,协调发展次之,创新发展最小。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绿色信贷监管,引导资金流向;二是推动绿色

金融产品创新,丰富投融资渠道;三是重视消费者作用,加强绿色观念宣传。^[5]

刘静认为,民营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应加快推动河北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坚持解放思想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二是完善政策供给提振民企发展信心;三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四是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五是推进民营经济融入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六是引导民营经济积极应对“双碳”约束;七是构建政商“亲”“清”关系。^[6]

霍姿诺等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指出,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河北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建议:一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引导财政资金使用方向,改善财政资金使用结构;三是发挥财政与金融关联效应,强化双方部门、政策与监管联动,实现财政金融良好互动;四是加大财政对科技支出投入力度,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7]

程亮等指出,河北省紧邻京津地区,人才储备较为雄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人才链和产业链融合不充分仍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从政府举措、科研经费、人才结构、人才引进等方面入手,完善人才链与产业链“双链”融合制度。^[8]孙明辉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推动河北省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一是要构建区域产业链集群,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对接融合;二是培育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三是充分发挥雄安新区、廊坊北部区位优势,承接好北京首都圈辐射。^[9]

(二) 数字经济发展

杨光宇等认为,释放数字经济巨大潜能既需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发现创新机会、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需要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制度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前沿技术加速突破,集中力量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二是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是有效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10]

孟娜娜等研究指出,京津冀城市群在规模总量、发展质量上已形成数字经济集群发展优势,

为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京津冀城市群视阈下推动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发挥城市群内“比较竞争优势”,持续打造数字经济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营商环境;三是建立关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发挥关键要素集聚效应。^[11]

曹晶晶等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共消费表现出消费主体由被动“需要”向主动“想要”转化、消费客体由丰裕“类型”向品质“服务”升级、消费环境由传统“消费”向“绿色”过渡的数字化特征。因此,通过公共消费数字化升级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下路径:一是技术引领,以数据智能助推消费升级;二是结构改革,以供需改革助推消费升级;三是环境建设,以环境治理助推消费升级。^[12]

刘元指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有利于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政府职能全面发挥、促进治理现代化和升级治理能力。建议在数字河北建设过程中,继续发挥政策、环境、区位优势,做好数字经济布局和统筹,要坚持产业创新发展方向,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引领与转移相结合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要做好人才培养与优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13]

刘倩运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就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中介效应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河北省应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应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培养力度,加快科创平台建设,营造良好科创环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14]

(三) 县域经济发展

彭建强指出,河北省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立足各地县域特色产业基础优势,加快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新兴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区域特色产业链群式集群化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充分发挥开发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优化开发区功能形态、提升发展能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开发区打造成县域经济的

增长极、对外开放的主窗口。要加强新技术赋能引领、新业态模式创新,打造县域人才高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5]

乔轶娟等认为,河北省紧邻京津,县域区域约占九成,县级区划数量较多,农村经济占比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全域经济实力提升至关重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河北省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继续完善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三是建设高端长链制造业产业集群;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金融服务水平。^[16]

袁旭梅等基于社会网络关系分析视角,对河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河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已形成“多中心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格局,但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整体网络密度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不仅要提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而且要着力提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密度和稳健性。^[17]

贾淑军指出,发展乡村产业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多年来,河北省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河北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突出优势特色,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创新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培育乡村新型服务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8]

祁文辉认为,实现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是基础和关键。打造更高水平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对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把握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优势特色,优化县域产业结构,着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本地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通过科学研判定位、加强龙头企业引领、强化科技创新、打造特色产业平台、创新“双招双引”等举措,不断优化产业集群发展路径。^[19]

二、产业和行业发展研究

提升产业与行业发展水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战略转型的内在要求和核心任务。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一) 现代农业

张波指出,建设农业全产业链是发展乡村产业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推动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因此,要通过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和政策保障等措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

彭建强指出,河北是农业大省,也是全国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必须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大力发展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精品农业、特色高效农业。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1]

王妹娟等认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对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要建立农业科技系统多级联动工作机制,形成纵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支撑链条;要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高效率转化;要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生机制,有效激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活力。^[22]

王宁认为,以农业科技创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应重点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强化农业发展相关企业政策支持,提升其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二是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农民为辅助,构建完整科技创新链条。^[23]李军峰等认为,河北省以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应加强农业机械研发,提高农机购置补贴,加大农机化培训力度;应狠抓种子工程,提高种子质量;应加强农业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研发应用,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力度。^[24]

王亚飞等研究指出,河北省都市农业旅游发展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源整合与产业融合不够、项目同质化严重、缺乏品牌效应、经营服务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推进都市农业旅游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积极发挥政府规范、引导及支持作用;二是开发富含地域文化色彩的农业旅游产品;三是注重都市农业旅游生态可持续发展;四是整合区域资源建设河北都市农业旅游品牌。^[25]

张红程等认为,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双疫情影响下,河北省生猪产业发展形势更趋复杂,转型升级任务愈发艰巨。要实现稳定产能、降本增效、优化升级发展目标,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健全产能调控机制,夯实稳产保供基础;二是构建新型配方结构,有效降低饲料成本;三是健全良种繁育体系,打好种业翻身仗;四是健全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五是强化防疫体系建设。^[26]

关于种植业发展。郭佳玮等认为,推动河北省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加大政府引导推动,加强科技引领支撑,强化龙头企业牵动。^[27]郭丽华等指出,助推鲜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应采取“品种为基础、技术为保障、标准为引领、品牌为依托、市场为目标”战略。^[28]尹翠霞等认为,促进河北省板栗高质量发展,应加快品种更新换代,推广现代栽培技术,加大智能装备研发,壮大加工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品牌,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实施科技强栗行动。^[29]

(二) 先进制造业

张金杰指出,河北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应突出抓好五项任务:一是聚焦重点领域,着力打造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二是加快建设数字河北,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三是提升现代服务能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共生;四是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建设各具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五是汇聚先进要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30]

阎东彬等指出,河北省应顺应发展趋势,抢抓发展机遇,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实现

产业链再造和竞争优势重塑。具体来看,一是补断点、疏堵点、治痛点,让特色产业链高效“转起来”;二是延上游、牵下游、重创新,让特色产业集群加速“长起来”;三是抓龙头企业、育“专精特新”、促数字化升级,让特色产业链内核“强起来”。^[31]

郑艳艳等认为,河北省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如何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目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二是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的高品质发展;三是完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四是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品牌企业;五是加强教育,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培养人才。^[32]

边明英等基于协同视角,研究了河北省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问题。结果表明,河北省制造业在发明专利比重和硕博人员投入比例方面相对较好,但在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投入强度、科技活动人员投入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新产品出口能力和新产品劳动生产率方面普遍不足。为此,建议从三方面提升河北省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是创建高效的人才流动机制;二是开拓多元化区域融资体系;三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33]

关于制造业行业发展。马志超等指出,河北省是钢铁大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通过提升技术效率、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推动产能域外转移、选择合适的市场营销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等,推动钢铁企业国际化。^[34]肖阔等认为,河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但食品工业发展滞后,农产品增值能力低,应通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强人才培养等措施,加快推动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35]

(三) 现代服务业

1. 冰雪产业发展

李会霞等指出,河北作为冬奥会举办地之一,抓住用好冬奥机遇,大力发展冰雪产业,是如期交出“两份优异答卷”的关键之举,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题中之义。推动全省冰雪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应加强统筹布局,推动冰雪产业协调发展;拓宽发展思路,推动冰雪产业融合发展;加强科技赋能,推动冰

雪产业现代化发展；突出文化引领，推动冰雪产业特色化发展；强化品牌创新，推动冰雪产业品质化发展。^[36]

刘景芝指出，抢抓后奥运时代的黄金发展期，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举措，也是持续释放“冬奥红利”、加快“首都两区”建设和“两翼”发展的生动实践。河北省做好后奥运经济这篇大文章，一是要加强统筹布局，促进冰雪产业协同发展；二是要挖掘文化特色，培育壮大冰雪旅游产业；三是要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冰雪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37]

田学斌认为，河北推动冰雪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应坚持多元化、社会化方向，破解冬奥场馆财政收支平衡难题，实现场馆设施持续运营；坚持融合化、品牌化方向，统筹开发奥运遗产资源与其他要素资源，促进冰雪文旅产业整体崛起；坚持集群化、科技化方向，支持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冰雪装备器材产业核心竞争力快速提升；坚持数字化、服务化方向，加强冰雪消费模式系统创新，丰富人民群众冰雪消费场景；坚持精准化、规范化方向，加大要素保障和市场秩序治理力度，为冰雪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38]

2. 旅游业发展

关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邢慧斌等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应根据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六个方面推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抢抓历史机遇，推进区域合作；二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构；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坚持技术赋能；四是加强品牌效益，提高营销精准化；五是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六是注重生态旅游，追求健康生活。^[39]

关于提升旅游业竞争力。符茜茜等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提高河北省旅游品牌竞争力，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立足差异，定位旅游品牌形象；二是区域合作，提升旅游品牌知名度；三是科学规划，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四是错位竞合，打造特色旅游产品；五是延伸产业链，注重生态游；六是创新营销，整合营销模式；七是培养人才，提高旅游服务水平。^[40]贾冀南等认为，促进河北省旅游业良性发展，提高河北省旅

游业竞争力，一方面要增加 5A 级景区和星级餐厅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强研发机构建设，重视相关人才引进和培养。^[41]

关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武义青等认为，河北要充分运用好冬奥遗产，加快建设以体育为支撑、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载体的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动体育与健康、文化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体来看，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协调联动机制；二是强化标准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三是打造数字空间，提升智慧服务水平；四是培育壮大主体，提高市场化程度；五是打造精品线路，提升品牌影响力。^[42]

关于文化旅游发展。马志超等认为，数字经济下河北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应以创新引领文旅融合、以政策激励文旅融合、以人才推进文旅融合。^[43]李研等认为，河北省促进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应丰富非遗文化内蕴，开发多样化“非遗”项目，大力推进“互联网+非遗”模式。^[44]冯玉珠认为，河北省推动大运河饮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应制定专项规划，健全体制机制；丰富文化内涵，开发特色产品；打造特色品牌，提升知名度。^[45]阚力等认为，河北省促进陶瓷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应推动陶瓷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相融合、创新技术与创新人才相融合、陶瓷文化功能与旅游产业功能相融合。^[46]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赵桂燕指出，河北省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乡村旅游点状突破战略，即瞄准需求市场，选择战略发力点；强化宏观调控，牢抓基础建设；加强品牌塑造，引领品质发展；开展政策试点，突破发展瓶颈；加强人才“引育”，提升运营水平。^[47]郭永久等认为，河北省推进近郊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应树立“旅游+”概念，构建以乡村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体验为方式、以文创产业为载体、以艺术设计为手段的发展模式。^[48]

3. 其它服务行业发展

关于体育产业发展。宋秋喜认为，推动河北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应采取“均衡化”“智慧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路径。具体来看，一是以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进供需关系平衡发展；二是主动适应体育用品市场竞争加剧和消费升级新形势，持续推进产品“智慧化”；三是加大优势企业扶持力度，打造体育产业品牌集

群；四是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具有河北体育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49]

关于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陈素敏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物流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思路：一是搭建制造业、商贸流通业与物流业沟通平台，畅通各方沟通渠道；二是提高物流业服务水平，更新物流服务产品，吸引京津物流需求外溢到河北；三是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点，大力发展智能物流基础设施；四是打造西北冷链物流区、中部空港物流区、东部沿海港口物流区、南部制造业物流区，共同承担京津冀区域发展物流服务功能。^[50]

关于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武航等研究发现，河北省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进出口不平衡、物流体系不完善、高质量人才稀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加强跨境电商市场建设，加快跨境电商物流发展，重视跨境电商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提高跨境电商平台信任度，完善跨境电商产业支持政策。^[51]陈肖等认为，推进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应完善产业集群跨境电商物流体系，打造优势跨境电商产业链条，加强跨境电商人才队伍建设。^[52]

关于环保产业发展。吉伟卓等认为，提升河北省环保产业竞争力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政府层面合理发挥自身职能，利用环保产业市场因势利导，引导企业研发环保产品，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壮大；二是环保企业从自身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在重点市场发掘、技术研发应用、经营范围拓展等方面积极探索，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竞争能力。^[53]

三、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问题始终是社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关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产业协同和创新协同等方面。

（一）产业协同

罗静等指出，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必须紧紧抓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关键，抓紧抓实抓好承接重点任务、重大项目、重要政策，确保疏解项目能够转得来、留得下、发展好。必须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

度融合，加强京津冀区域产业互联、政策互通、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场景共用，联手京津争列国家全产业链创新提升区，共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三地要素市场一体化，加快科技要素、资质认证、市场准入和政府服务等政策共享、公认互通。^[54]

王利敏等认为，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强化开放示范带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水平，联动发展服务贸易。^[55]陈艳春等认为，数字创新驱动下京津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应以制造业数字化为突破，以产业技术对接为导向，构建适宜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环境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56]李砚忠等认为，经济流视角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发挥北京辐射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协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区域经济联系网络；缩小公共服务落差，促进人流合理均衡流动。^[57]

关于推动京津冀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郭润琦等认为，京津冀三地应优化创新资源空间分布，强化区域创新阶梯联动，加强区域产业合作，实现产业升级良性互动。^[58]李宏宇认为，应合理配置京津冀协同产业链空间布局，依托产业链布局重构跨区域创新链，从强链补链延链创链角度促进深度融合，健全京津冀“三链”融合辅助支持体系。^[59]

刘立军等认为，应提升三地科技金融市场发展的活跃度和规范度，强化科技金融生态引领功能，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实现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60]刘静等认为，提升京津冀科技创新与旅游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应推进科技与旅游系统工程建设，加速旅游业科技创新渗透，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的稳定性。^[61]

关于京津冀产业转移。柳天恩等认为，推进京津冀产业转移向深度、广度拓展，应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增强重点产业承接平台集聚优势，打造跨区域新兴产业链集群，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对接，构建有利于产业转移的体制机制。^[62]陈玲等研究指出，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第一产业在不断挤出劳动力，第二产业呈现出先吸纳劳动力再挤出的过程，第三产业则呈

现出持续吸纳劳动力的过程。^[63]孙伊凡等认为,河北省承接北京养老服务业应增进政府部门间协作,增强市场认可度,增加专业人才数量。^[64]

(二) 创新协同

彭晓静指出,河北省要立足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发掘用好京津辐射带动作用,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具体在以下四方面着力:一是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二是精准推进重点产业协同创新;三是培优做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载体;四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65]

蒋文京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攻坚克难的阶段,迫切需要推进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来应对协同发展中的难题。因此,河北省要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大力建设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中心,提升对接京津资源能力;推动创建京津冀创新联盟,加强与京津创新主体交流合作;用足用好京津资源,对标京津标准,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合作。^[66]

张继蕾认为,提高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水平可采取以下路径:一是基于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二是建立创新联盟和创新服务联盟;三是完善投资和利益分配机制;四是加强资金和制度保障。^[67]代群艳研究指出,推进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进程需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加强科技创新信息交流平台建设,整合高科技产业布局,构建多元协作体系,完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68]

黄贺林等认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吸引更多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是河北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的必然选择。河北要以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为主线,瞄准协同创新短板弱项,在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平台支撑、完善服务体系、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聚力攻坚,加快完善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体系,促进京津创新链和河北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强大动能。^[69]

李伟红认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一个重要抓手就是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多措并举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转移转化。一是要加强两链融合,让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融合对接;二是要完善服务体系,为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三是要推动人才共享,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支撑;四是要加强政策协同,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70]

张学海指出,深入推进协同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塑造河北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内容。以协同创新塑造河北发展新优势,应完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加大干部人才培养,完善协同创新平台,优化协同创新环境,持续开展思想解放。^[71]郑祖婷等基于区块链探索提出了京津冀智慧生态协同创新机制,即:搭建京津冀数字化共享平台,构建京津、京冀、津冀、京津冀组网结构,形成京津冀主体共识机制,多维度创建京津冀竞争激励机制,搭建京津冀互通平台,构建京津冀共治联盟。^[72]

宋之杰等基于四螺旋视角,提出了提升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度的建议,一是统筹兼顾各协同要素发展;二是完善区域创新环境和政策,三是加强四螺旋模式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渗透;四是密切区域间创新主体间联系。^[73]张贵等认为,多维邻近视角下推动京津冀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发展演化,应优化合作健全协同创新机制,筑巢引凤集聚知识创新要素,共生链接搭建知识合作平台,因势利导实施技术领先战略。^[74]

陈玉玲等研究指出,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要素富集,但科技创新要素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导致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梯度差异过大,创新链链接不足。因此,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必须优化区域科技创新要素空间分布,一是加快京津冀科技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二是构建开放的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三是实现京津冀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融合。^[75]

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从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创新型人才引进与培养、创新型企业培育与发展等维度,对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和实践。

(一)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田学斌指出,必须从战略发展需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突出重点加力推进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坚持实效导向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要从顶层设计、资金投入、主体活力、科技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协同创新、高效创新。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上下硬功夫,以科技成果转化实效检验科技创新水平,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彰显科技创新实力。^[76]

刘晓倩等认为,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增加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途径。对河北而言,应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整合全省优势创新资源、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将各创新主体有机联结在一起,将分散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组织起来,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77]

王岳森认为,河北省以创新体系优化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必须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机制,搭建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对接平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必须以市场机制整合科技资源,在创新主体协作、创新资源整合、创新过程优化等方面加强探索,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必须优化科技活动组织方式,创新科技管理方式方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以技术研发继起机制强化创新动力。^[78]

牛晓耕等指出,全面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积极性,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供给与高效率转化,必须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评价指挥棒作用。为此建议,一是完善组织实施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改革;二是完善管理监督机制,规范科技成果评价行为与过程;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科技成果评价双方内动力;四是完善追踪服务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评价与转化双赢;五是完善培训宣传机制,强化科技成果评价指挥棒作用。^[79]

杨兆廷指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河北省要深刻认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加快推进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激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一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提升创新支撑力;二是用好政府引导基金,激发创新活力;三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创新保

障力。^[80]

白玉芹指出,科技特派团可以有效推动科技人才下沉,解决企业科技难题,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因此,河北要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推动科技特派团创新发展。^[81]牛晓耕等认为,河北省以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应在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打造科技创新平台标杆、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级、完善运行机制与服务体系等方面聚力攻坚,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82]

白玉芹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创新文化是区域和国家科技竞争的软实力,河北省要积极培育创新文化,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激发强劲创新动力。一是提高创新意识,形成敢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文化;二是打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为创新创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三是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体系,激发创新潜力和活力;四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83]

(二) 创新型人才引进与培养

聂学臣指出,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必须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培养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培养队伍。要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积极构建人才发展新格局。要用好用活各类创新型人才,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服务保障,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84]

马文才认为,建设创新型河北、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才。河北要立足实际,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加快培育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要在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在发展核心产业和产业集群中培育科技精英。要改革科研体制,为科技创新人才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85]

王建强指出,抓住用好各种宝贵机遇,在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把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美好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关键是要加快构建起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要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端科技人才培养,抓好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建设,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在燕赵大地上形成科技精英荟萃、创新活力充分迸发的良好局面。^[86]

(三) 创新型企业培育与发展

牛晓耕等认为,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内生动力。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研发投入体系,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保障力。要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做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完善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硬实力。要遵循创新型企业成长规律,推动形成创新型企业市场化选择机制、培育机制。^[87]

苏凤虎等指出,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引领能力,在突破关键技术、促进“两链”融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河北省必须加快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以科技创新催生发展新动能。一是要明确重点,确定优先培育领域;二是要优化路径,完善梯度培育体系;三是要强化服务,加速企业成长;四是要创新体制,提升科技创新动能。^[88]

张学文等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一项专门税收优惠政策,对鼓励企业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增强创新创造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河北要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精准分类施策”,细化拓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积极推进企业研发平台建设,构建完善的政策全流程服务体系,最大限度释放企业创新创造活力。^[89]

王军等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创新主体,在促进经济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创新动能不足、研发投入强度较低、创新人才匮乏等问题,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应基于创新视角,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完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二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三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强化人才培育与引进。^[90]

五、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内在要求,是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必由之路。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重点围绕河北自贸区建设和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对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梁世雷指出,河北是沿海省份,区位优势独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和任务,必须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围绕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以高水平开放平台为引领,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高能级开放枢纽为支撑,推动海陆统筹联动开放;要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要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91]

翟丹丹认为,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河北形象,彰显了中国道路河北实践的成功,并给河北带来丰富的奥运遗产。河北要充分利用冬奥遗产,推动高水平开放。对外要在“一带一路”机遇下,以“冰雪”为品牌扩大开放;对内要大力发展冰雪经济,打造冰雪示范省;同时要利用“冬奥红利”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示范区。^[92]

刘益星等认为,“双循环”背景下推动中国(河北)自贸试验区发展,应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增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联系;应积极稳外资稳外贸,扩大服务业开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应有序推进自贸区金融改革,构建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应注重改革与开放并重,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吸收创新人才和技术流入。^[93]

李耀龙等指出,“双循环”新格局下,河北自贸区要发挥好政策先行先试优势,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一是制度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加紧融入国内大循环;二是做强做大产业链,带动贸易链延伸,加快形成“1+N”产区融合发展模式;三是聚焦重点领域,探索河北自贸区改革创新样本;四是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打造精准招商、精准服务的营商环境。^[94]

赵立斌等基于生产网络视角,提出了河北对接“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价值链升级;二是构建以河北企业为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三是大力发展数字

技术,通过价值链数字化改造促进转型升级;四是注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升级;五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样板。^[95]

杨华指出,开发区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开放是开发区的天然基因。河北要全力推动开发区扩大开放、拓展合作,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一是深层次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与京津产业合作,打造京津产业外溢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承接地;二是推动跨区域高效协作,加强与先进地区交流联系,探索省际开发区合作交流新模式;三是培育壮大国际合作园区,全面提升国家级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开放能级,积极融入国际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96]

2022年,河北经济建设研究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高水平报刊发文量不足,特别是顶级核心期刊发文量还比较欠缺;二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研究不足,特别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还有待强化;三是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应用性的研究成果不足,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还亟待突破。

(高智: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梁世雷: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陈春生.把系统观念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N].河北日报,2022-06-15.
- [2]刘国华,王笑艳,牛文佳,王路辉.新发展理念下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
- [3]付浩楠.河北省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3).
- [4]王冰,张扬森.绿色金融对河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J].海峡科技与产业,2022(10).
- [5]韩泽初.绿色金融助力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J].上海商业,2022(6).
- [6]刘静.促进河北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J].经济论坛,2022(1).
- [7]霍姿诺,高思帆,安冬,张天慧,张琳.河北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基于固定效应模型[J].中国产经,2022(8).
- [8]程亮,刘杰,梁婷婷.河北省人才链与产业链“双链”融合制度完善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9]孙明辉,郭倩倩,常胜利,王春霞,秦颐.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河北省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研究[J].中国储运,2022(5).
- [10]杨光宇,张丽琴.把握数字经济潜能释放的关键[N].经济日报,2022-03-13.
- [11]孟娜娜,蔺鹏.京津冀城市群视阈下河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究[J].河北金融,2022(7).
- [12]曹晶晶,李宣,乔莉楠.公共消费数字化升级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路径[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16).
- [13]刘元.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河北建设的驱动研究[J].商业观察,2022(7).
- [14]刘倩.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J].河北企业,2022(11).
- [15]彭建强.做大做强县域经济[N].河北日报,2022-08-03.
- [16]乔轶娟,张洪玮.河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质量与市场,2022(19).
- [17]袁旭梅,魏福丽,张旭.河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关联及其影响因素[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1).
- [18]贾淑军.加快培育壮大乡村产业[N].河北日报,2022-09-09.
- [19]祁文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N].河北日报,2022-08-26.
- [20]张波.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N].河北日报,2022-06-01.
- [21]彭建强.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N].河北日报,2022-05-06.
- [22]王妹娟,杨越冬.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N].河北日报,2022-06-29.
- [23]王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助力乡村振兴[J].新农业,2022(7).
- [24]李军峰,韩佳利.科技创新推进河北省农业现代化空间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2022(12).
- [25]王亚飞,王玉潇,王若男.欧美发展经验视角下河北省都市农业旅游发展研究[J].对外经贸实务,2022(7).
- [26]张红程,路剑,孟宪华.2021年河北省生猪产业发展形势分析及后期展望[J].北方牧业,2022(4).
- [27]郭佳玮,吴世景,闫薇,曹爽,刘悦.河北省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2).
- [28]郭丽华,尉京红,马蕴菲,孟燕辉.河北省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形势及高质量发展建议[J].中国蔬菜,2022(3).
- [29]尹翠霞,李敏,宋丽华,白少昆,王晓夕,张新仕,王桂.河北省板栗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2022(4).
- [30]张金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N].河北

- 日报,2022-11-09.
- [31] 阎东彬,赵宁宇.聚焦优势特色产业 着力延链补链强链[N].河北日报,2022-05-06.
- [32] 郑艳艳,齐士博.河北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2(10).
- [33] 边明英,毛丽芹,张玉欣.协同视角下河北省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J].对外经贸,2022(8).
- [34] 马志超,王欢欢,张杰.“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北省钢铁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J].河北冶金,2022(8).
- [35] 肖阔,李逸波,王颀.河北省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22(1).
- [36] 李会霞,段小平.抓住用好冬奥机遇 大力发展冰雪产业[N].河北日报,2022-01-26.
- [37] 刘景芝.加快推动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22-04-06.
- [38] 田学斌.推动冰雪产业做大做强做优[N].河北日报,2022-08-26.
- [39] 邢慧斌,李君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大舞台,2022(1).
- [40] 符茜茜,赵婷.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旅游品牌竞争力策略研究[J].旅游纵览,2022(4).
- [41] 贾冀南,张如月,李凯伦.基于改进耦合协调模型的河北省旅游业协调性评价及对策研究[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
- [42] 武义青,姚丽芬.充分运用好冬奥遗产 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N].河北日报,2022-04-13.
- [43] 马志超,李志红,武婉玉.数字经济下河北省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22(2).
- [44] 李研,吴红娜.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22(8).
- [45] 冯玉珠.河北大运河饮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旅游纵览,2022(2).
- [46] 阚力,罗慧敏.河北省陶瓷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旅游纵览,2022(3).
- [47] 赵桂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北省实施乡村旅游点状突破战略研究[J].旅游纵览,2022(5).
- [48] 郭永久,王非凡,周丹.河北省近郊乡村旅游与文创产业艺术化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22(9).
- [49] 宋秋喜.“十四五”时期河北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经济论坛,2022(5).
- [50] 陈素敏,刘瑛莹,陈志敏.协同战略环境下河北物流产业发展思路[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2).
- [51] 武航,刘璞,王东平,王印华.河北省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52] 陈肖,王彦梅,王瑞华.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2(8).
- [53] 吉伟卓,谷亚红.河北省环保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22(4).
- [54] 罗静,高智.举全省之力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N].河北日报,2022-02-25.
- [55] 王利敏,王东波.新发展格局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J].商展经济,2022(4).
- [56] 陈艳春,杨添天,杨继成.数字创新驱动下京津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策略[J].宏观经济管理,2022(5).
- [57] 李砚忠,王涛.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的经济流强度与隶属度分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58] 郭润琦,李思淼,陈玉玲,李晓晨.京津冀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对策研究[J].山西农经,2022(11).
- [59] 李宏宇.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协同融合的路径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2(2).
- [60] 刘立军,刘义臣.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J].经济问题,2022(8).
- [61] 刘静,王宝林,刘朝峰.科技创新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6).
- [62] 柳天恩,王利动.京津冀产业转移的重要进展与困境摆脱[J].区域经济评论,2022(1).
- [63] 陈玲,李瑞杰.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中国科技产业,2022(9).
- [64] 孙伊凡,陈丽莎.河北省承接北京养老服务现状及对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11).
- [65] 彭晓静.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N].河北日报,2022-09-07.
- [66] 蒋文京,贾芳丽.河北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中的思路与举措[J].河北企业,2022(8).
- [67] 张继蕾.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路径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1).
- [68] 代群艳.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困境及其破解[J].全国流通经济,2022(26).
- [69] 黄贺林,孔慧珍.加快完善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体系[N].河北日报,2022-07-22.
- [70] 李伟红.多措并举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转化[N].河北日报,2022-03-02.
- [71] 张学海.以协同创新塑造河北发展新优势的对策探讨[J].时代经贸,2022(10).
- [72] 郑祖婷,姜艳茹.基于区块链的京津冀智慧生态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生态,2022(9).
- [73] 宋之杰,杨楠.基于四螺旋视角的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度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74] 张贵,孙晨晨,吕晓静.多维邻近视角下京津冀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6).
- [75] 陈玉玲,温泽昕,路丽.京津冀科技创新要素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2(1).
- [76] 田学斌,洪帅.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力度[N].河北日报,2022-05-25.
- [77] 刘晓倩,牛建高,牛晓耕.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 提高科

- 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N].河北日报,2022-01-26.
- [78]王岳森.以创新体系的优化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效[N].河北日报,2022-09-09.
- [79]牛晓耕,曹楠楠,牛建高.以评价机制改革助推科技成果高质量供给与转化[N].河北日报,2022-10-16.
- [80]杨兆廷.加快推进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N].河北日报,2022-07-13.
- [81]白玉芹.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作用[N].河北日报,2022-08-31.
- [82]牛晓耕,雷娜,牛建高.以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22-08-03.
- [83]白玉芹.培育创新文化 营造创新氛围[N].河北日报,2022-12-21.
- [84]聂学臣.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N].河北日报,2022-06-08.
- [85]马文才.加快培育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N].河北日报,2022-07-27.
- [86]王建强.为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N].河北日报,2022-08-17.
- [87]牛晓耕,牛建高,刘晓倩.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N].河北日报,2022-06-08.
- [88]苏凤虎,王素平.加快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N].河北日报,2022-09-07.
- [89]张学文,戴建兵,任丽丽.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释放企业创新创造活力[N].河北日报,2022-08-12.
- [90]王军,燕波涛,王红霞,尉肖帅,尚婷,吴发群.基于创新视角的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策略[J].企业科技与发展,2022(12).
- [91]梁世雷.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N].河北日报,2022-09-21.
- [92]翟丹丹.利用冬奥遗产推动河北高水平开放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5).
- [93]刘益星,李清.双循环经济下中国(河北)自贸试验区发展策略研究[J].对外经贸实务,2022(6).
- [94]李耀龙,王春蕊.新时期河北自贸区改革创新思路与对策研究[J].经济论坛,2022(6).
- [95]赵立斌,范鹏辉,张梦雪,孟涛.生产网络视角下河北与京津协同对接“一带一路”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22(3).
- [96]杨华.全面提升各类开发区建设水平[N].河北日报,2022-08-17.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

吴耀明 程瑞山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河北省各级领导干部和省内外学者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河北实际,围绕河北政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本年度河北政治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发表刊物层次较高。多篇成果在《经济日报》《学习时报》《党建研究》《经济研究参考》等权威报刊上发表。其二,覆盖领域较广。基本涵盖了党的建设、法治河北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政、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研究领域。其三,注重研究深度。学界和实践工作者对进一步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立法,“放管服”改革,智慧城市,财政绩效改革,基层治理等都开展了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诸多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重要成果。

一、河北党的建设研究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022年,河北省

委、省政府领导、省内外专家学者就河北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代表性成果。

倪岳峰在《学习时报》《经济日报》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9次考察河北,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河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1]坚持服从服务大局,全力以赴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落地实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加快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有效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步伐;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全面提升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水平;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做好保障改善民生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2]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倪岳峰又撰文指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河北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及时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组织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召开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作出全面部署，制定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意见，省委常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宣讲，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带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3]

王正谱撰文指出，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握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并落实到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落实到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上，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河北落地生根。^[4]

柯俊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年轻干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强调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强调要从严从实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河北省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年轻干部工作放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划推动，坚持严字当头、实处着力，制定落实一系列制度举措，大力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堪当重任的可靠接班人。^[5]

董兆伟撰文认为，河北高校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健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深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推动高校党的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6]

颜世东指出，承德市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为统领，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党旗红”活动，推动各级党委“当好领唱”，切实发挥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繁荣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做好主唱”，切实发挥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繁荣农村中的战斗堡垒和主力军作用；社会各行各业“齐声伴唱”，切实发挥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繁荣农村中的资源优势作用，共同建设繁荣新农村。^[7]

吴新叶通过对石家庄一个老旧社区的“红色物业”的调查，发现在不改变社区“存量”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党的政治领导实现了“增量”治理效应。同时，党建赋能的策略也有效提升了物业公司的治理能力，这些策略包括条件准入、资源下沉、激励与规制。领导与赋能推动了“红色物业”的企业转型和老旧社区的治理迭代。这为塑造基层治理生态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镜鉴。^[8]

孙智怡以张家口市西岔社区为例，对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建设进行了研究，指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正确指引下，依靠社区这个基层组织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作用，促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主体自主化、治理效果最大化，最终实现党建引领下的和谐社区建设。^[9]

孔令岗指出，康保县强化系统思维，通过打造智慧党建平台，建立起“1+5+10”的完备党建体系，实现对全县326个行政村党建工作的全流程、全方位管理。通过强化科技赋能，综合提升党建工作效能；通过强化参与互动，切实落地党建工作效果；通过强化需求导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智慧党建平台，建设了“互联网+党建”的党建模式，充分覆盖党建各项重点工作，真正做到了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群众放在心上，为基层党建和县域综合治理注入新活力。^[10]

张惠以唐山学院为例，对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路径进行了研究，指出唐山学院党委积极探索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深入推进夯基定向、凝心铸魂、思想聚力、优化提升、品牌培树、服务提质“六大工程”，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实施夯基定向工程，着力

增强政治领导力；实施凝心铸魂工程，着力增强思想引领力；实施思想聚力工程，着力增强发展推动力；实施优化提升工程，着力增强自我革新力；实施培树品牌工程，着力增强组织号召力；实施服务提质工程，着力增强社会贡献力。^[11]

马兵林等以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为例，对高校二级学院如何高质量开展党建工作进行了研究。指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通过开展“一流党建”创建活动探索与实践，形成“6314”党建工作思路，推进了基层党建工作上层次上水平。“6314”党建工作思路既保证了基层党建工作扎实开展，夯实了党建根基，又凝聚了师生思想行动，推动了重点工作，引领了事业发展。^[12]

李春阳等以承德医学院为例，对“互联网+”背景下开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建设进行了研究。指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既包括教师的基层组织，又包括学生的基层组织，在管理上也存在不同。为了实现不同身份党员的发展，同时做好高校的基层党建工作，打造党建品牌，需要从不同角度入手，加强探索，促进党员成长与发展。^[13]

孙克健等指出，当前高校党建品牌建设存在着品牌意识不强、品牌创建思维模式较为保守、品牌建设与中心工作融入不够、品牌创建执行力有待加强、党建品牌影响力还需再提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党支部在党建工作品牌化建设中，从学生党员全过程培养出发，做好党建品牌顶层设计；加强培育融合，突出品牌实效；丰富载体，提升党建品牌的影响力，凸显了高校党建的品牌意识，体现了高校党建的创新性。^[14]

范文龙等指出，石家庄日报社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强力推进“党建+中心工作”、“党建+媒体”融合、“党建+改革创新”等为主体的党建“1+N”融合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取得这些成绩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当好党的喉舌，把党建融入中心工作、改革发展、融合创新中。党媒要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党建带业务、以业务促党建，实现党建与业务两手抓、两促进、两提高。^[15]

二、河北法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对法治建设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件大事，主要就白洋淀流域生态立法、京津冀环保协同立法、河北自贸区法律问题、乡村振兴法治保障等问题开展，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对策建议。

（一）地方立法

周英等认为，基于白洋淀流域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其立法需求主要体现在流域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特定化、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系统化、流域水污染防治制度具体化和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制度多元化四个方面。建议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满足白洋淀流域生态安全的现实需要：一是加快水事法律革新，为流域专门立法提供充分依据；二是梳理整合相关立法，完善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为核心的政策法律体系；三是先行先试，实现白洋淀流域地方立法特色创新。^[16]

赵云海等认为，当前，京津冀地区协同立法在实践与制度层面均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囿于三地政治地位、经济体量不对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立法存在立法节奏不合理、立法内容不协调、立法缺乏法律依据、协作机制不深入等多种困境。必须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优化环境协同立法路径，坚持平等互利、梯次推进的原则立法，由松散型协同立法模式转为紧密型协同立法模式，探索构建协同立法的长效机制。^[17]

刘涛等以河北自贸区为例，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数字贸易建设的法律困境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河北自贸区中的雄安片区被赋予了打造数字商务发展示范区的重任，但数字贸易的全国性立法层级低，地方性立法缺乏细则性规定，种种法律困境亟待解决。河北自贸区应对标已加入或拟加入的多边贸易规则，细化自贸区数字贸易规则。一要强化针对数字贸易的整体性立法，借鉴国内外经验，制定适应各片区发展的数字贸易规则；二要借助雄安片区数字商务示范区的定位，

创设高端数字贸易机制及标准,对跨境数据流动贸易规则进行规范;三要针对传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发展,构建数字贸易优化监管模式。^[18]

马涛以《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为例,对地方立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乡村振兴地方立法的功能价值就在于对上位法予以具体细化、固化乡村振兴政策规定、解决乡村振兴难点问题、实现农村改革于法有据。乡村振兴地方立法最重要的功能价值,就是从本地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出发体现本地特色。2022年9月28日通过的《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紧贴河北省实际,凸显地方立法特色,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河北全面实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19]

(二)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

周旭认为,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事业中仍存在政府垄断型补偿模式塑造实效困境、以财政资金为来源的输血式补偿偏离行为初衷、针对生态补偿实效的监督考核机制缺失、宏观领域的区际协调立法不足等问题。要吸收加强流域生态补偿的市场化、填充高位阶与综合性立法、培养集体责任观与代际责任观、落实多元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方式、实现中央与地方补偿实践的互相配合等领域外经验,通过专门性与综合性法律规范的双重充实,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与补偿监管内容的综合改革与法律实现保障体系的构建,实现当地流域环境的科学治理,并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提供经验。^[20]

王康等认为河北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和修复离不开一体化治理修复,而一体化治理修复的推进离不法治的保驾护航。现阶段河北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修复过程中存在系统性、整体性法律体系缺失,一体化管理制度可操作性不强,职能部门协调性、灵活性不足,公众参与多元性、实效性欠缺等问题,在治理修复过程中应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制度层面立法统筹;制定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完善技术层面整体设计;注重各部门的整合协作,提升管理层面内在动力;健全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加强社会层面外在压力。^[21]

王浩认为,京津冀地区亟须建立雾霾联防联控

控机制,但法律对此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完善京津冀地区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中的主体机制需要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建议建立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管理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下设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构建科研中心,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以达到联防联控机制的目的。^[22]

郭雨佳的硕士毕业论文对白洋淀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完善白洋淀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是未来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向之一。在制度设计上,应率先在地方性立法方面通过扩大白洋淀生态环境标准的种类,细化相关规定,为构建该生态标准体系提供充足法律保障;在广泛公开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在明确“制定主体——制定规划——起草——制定——公众参与——审议、批准、发布”等各个环节上形成京津冀晋四省市联动,构建白洋淀流域一体化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最终完善配套措施,为白洋淀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的构建工作提供助力。^[23]

丁万星等认为,作为一个建筑大省、能源大省,河北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贯彻和落实双碳战略。在立法方面,要制定综合性法律文件与涉碳法律对接的细则,制定涉碳建筑领域综合性法律文件,填补立法空白;在执法方面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清单;司法方面探索涉碳建设工程案件审判规律,完善公益诉讼在涉碳建筑纠纷案件中的作用;在法律监督方面加强和人大代表联络,强化公众知情、参与、利益保障等权利,通过法治保障实现建筑领域的双碳目标,使建筑业的双碳战略获得全面、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法治保障。^[24]

(三) 司法与行政执法问题

伊茜卓玛等认为,京津冀军民协同创新发展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是打造京津冀军民协同创新产业技术联盟,继而全面推进国家军民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的基础性保障之一,是推进国家法律服务职能在军事法治领域的基本保障形式。京津冀军民协同创新发展法律服务平台是助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该平台的建设与发展,不只是传统实体平台的架构,还需按照覆盖军地、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得到体制、法治、经费、人才等多方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够得以形塑与

巩固,进而助力京津冀地区军民协同创新产业这一全新增长极的健康和高速发展。^[25]

班耿齐认为,京津冀三地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河北省欠发达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存在着人员配置不足、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等问题,这是影响京津冀法治一体化的重要现实阻碍。而经济文化差异、高校资源不均衡、人才交流机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则是导致这一现实阻碍的深层原因。应通过开展三地邻近基层人民法院“结对”帮扶、完善法官异地挂职交流制度、实现包含专家学者及法学实习生在内的高校资源跨区域共享等区域内协作模式提高京津冀司法协作,这是摆脱基层人民法院人才困境的有效破局思路。^[26]

贺晓伟认为,河北省在营商环境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存在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制度建设仍有弱项、行政执法不够规范和司法保障尚不完备等问题。在法治轨道上优化营商环境,一要大力加强法治教育,增强法律意识;二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地方立法体系;三要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平文明执法,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四要继续优化司法保障服务,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尤其是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保护力度,切实帮助小微企业获得实惠、取得发展,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法治营商环境保障。^[27]

刘亚等以河北省卫生监督综合执法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与执法档案数字化系统,对档案信息化在行政执法中运用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当前存在着各地各部门信息化建设缺乏互通共享,“数据孤岛”、多头重复录入;执法档案的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执法档案信息及监管相对人隐私泄露风险大;对安全性重视程度不够,抵抗外部病毒侵袭能力较低等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高数字化质量,打通堵点,建立共享机制;二是加强行政执法数字化档案的制度规范和安全维护;三是完善档案数字化管理机制,服务联合监管需求;四是优化人员组合,提升管理水平和熟练产出、使用数字化执法档案的能力;五是发挥档案数字化优势,更加科学合理规划双随机等执法行为;六是借助执法档案数字化建设契机,推动信息数据共享,助力社会信用建设。^[28]

乔新月认为,《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以来,河北省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

存在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机构队伍建设薄弱、社区矫正对象犯罪构成日趋复杂、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管理和个别化矫正需求日益增强、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社区矫正对象收监难等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强化制度优势,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二是强化机构建设,提升执法主体能力;三是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依法履职水平;四是强化分类管教,提升管理教育质量;五是强化分类管教,提升管理教育质量;六是支持社会参与,提升教育帮扶水平。^[29]

三、政府职能转变与电子政务研究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支撑,彰显了我们党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2022年,学术界对河北的政务服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急联动能力建设、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县乡政府职能改革、“互联网+政务”、数据治理、智慧税务绩效建设、智慧城市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 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杨紫微通过对我国政务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数量、实施时间、涉及方面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梳理,指出我国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建设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逐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不能充分满足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主要存在标准建设基础仍需夯实、标准体系有待持续完善、标准建设人才队伍亟待培育三方面问题。针对我国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构建多维度的标准化工作体系、培育政务服务标准建设人才队伍的发展路径,为推进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建设、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提供有力支撑。^[30]

宋颖指出,河北省通过清单式简政放权、标准化政务服务、多元化监督模式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方式,政务服务便民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仍存在权限下放有待落实、权责清单有待细化、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协调联动有待强化、智慧政府有待提升等问题,提出了放权便民、政务服务集约化,标准便民、政务服务规

范化,科技便民、政务服务智慧化,监管便民、政务服务透明化等建议,推动政府职能从重审批向强监管、优服务转变,实现政务服务的集约化、规范化、智慧化、透明化与法治化。^[31]

狄志斌认为,河北省道路运输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制度改革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思想不够解放,审批权限划转不一致;二是许可职责权限不清,监管难度大;三是信息不畅;四是体制不顺,执法乱象多。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行政许可事项划转要合法合理,对划转事项办理情况摸清底数,清理不必要或者不合理的审批事项;二是划转事项要遵循权责统一原则,强化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三是保障信息畅通,实现信息共享,切实做好政府审批与行政监管之间的许可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共享工作;四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工作,将工作重心逐步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32]

张朝玉等以河北省与周边省市为例,对疫情背景下的跨域危机应急联动能力进行研究。指出,河北省与周边省市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存在“信息孤岛”“资源孤岛”“管理孤岛”,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应急物资筹集调配不及时、整体应急联动能力不足等问题,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做好应急联动能力提升工作:一是完善应急预案体系,落实预案先行制度;二是畅通信息沟通渠道,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三是优化应急协调机制,强化应急联动制度保障。^[33]

黄锡生等指出,在属地治理运行体制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存在基层政府治理疲态和治理动力不足、流域治理效能大为缩减等现实问题,面向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再造,应当从法律定位、法定职责以及与属地政府间关系三个方面搭建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机构雏形,并以明确白洋淀流域省、市、县、乡镇(街道)四级政府的职责分工为出发点,阻断“分锅避责”的责任转嫁路径;还要从法规完善、强化协同、资金保障、信息互通、科学决策五个方面对夯实统分结合管理体制的关键事项加以明确。^[34]

樊清以河北省北部经济欠发达区域为例,对县乡政府履行经济职能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各地县乡政府要适应对农村从“输血型”向“造血型”模式的转变,要从实践中探索实现经

济职能转变的具体方式,培育农村产业兴旺的坚实基础和内在条件,推动农村不断创造自我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逐步实现农村的产业兴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35]

顾小明等以河北省为例,探索乡镇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指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多重角色,是经济政策的执行者、产业融合的推动者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但也面临权力和责任不一致、财政权力有限、就业政策不完善、基础设施缺乏系统管理等问题。应理顺县乡职责体系、拓宽财政增收的渠道、健全劳动力引进培养机制、完善基础设施管理机制。^[36]

郭惠涛等以河北省某重点工业大镇为例,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乡镇政府职能在转变的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压力型”体制下职能导向的偏差;二是“任务型”管理下干部绩效考核体系的不完善;三是“缺位”合作中治理机制的不健全;四是“条块分割”结构下乡镇权责的不对等。对此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民本位”思想观,克服“官本位”思想,提高服务意识;二是理顺县乡权责关系、合理规划乡镇机构;三是全面推进基层干部组织建设、优化绩效考核和干部激励机制;四是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优化政府经济建设职能。^[37]

(二) 电子政务研究

连青指出,河北政务服务秉承“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的理念,针对场景服务进行深层次挖掘,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提效增能。从用户视角看,仍存在着大多数个人用户对政府部门职责和业务职责不清楚、用户在使用政务服网或者小程序时体验感有待优化等问题。应从完善政务事项标准体系、全面升级核心业务系统、加强数据统筹管理和数据资产管理、建立政务服务数据协同共享机制、推进智能化服务、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政务服务提档升级。^[38]

张娟娟等认为,京津冀三地数据治理融合发展面临以下问题:三地政府之间的数据协调机制有待完善,数据共享交换和交易流通管理规范尚不统一,对三地数据实现高效聚通融造成了诸多

障碍等。对此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强化数据战略一体设计，树立共商共享共治理念；二是创新治理主体联动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三是统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数据互联互通壁垒；四是开展数据共享合作行动，打造数据融通共同体；五是协同数据交易流通规则，打造一体化数据交易市场；六是建立法规标准互认机制，夯实协同发展规则保障。^[39]

韩鹏的硕士毕业论文对石家庄智慧政务建设进行研究，认为石家庄智慧政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发展路径不明确；二是数据开放共享水平较低；三是政府内部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四是不能满足公众需求。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坚持顶层设计先行基本原则，加强政务建设规划、转型政府服务体系；二是建立基础信息协同推进体系，坚持市域统一治理、完善“掌上石家庄”；三是完善智慧政务建设保障体系，拓宽政务建设资金来源、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四是增强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扩大公众参与度、建设服务型政府。^[40]

张明等以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为例，对全流程智慧税务绩效建设进行研究。认为，为实现全流程智慧税务绩效应以“金税四期”为依托，把绩效管理诸要素融入岗责体系、渗入业务流程、嵌入业务系统，按照“计划制定——考评运行——改进提升”的管理流程，为各级管理者科学决策提供“规划图”，为各级考评者制定方略提供“设计图”，为各级执行者精准落实提供“施工图”，实现税务绩效管理与各项税收工作协同并进、相互促进。^[41]

许志坤等以河北省为例，对“大智移云物链”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指出，河北省在智慧城市建设，尤其是政务服务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仍停留在数字化和网络化上，大数据化、智能化水平仍旧不高。对大数据、云计算应用，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数据开放共享；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拓展大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强化数据精准化治理，提升河北省智慧城市管理能力。^[42]

四、地方财政问题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

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要协同推进财税与其他改革，充分发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整体改革突破口和基础支撑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2年河北省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资源统筹改革、县域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的财政政策、生态文明领域财政资金使用、县级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等研究。

朱云飞以河北省为例，对财政资源统筹改革进行研究。认为，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将传统的“资金资产”提升为系统的“财政资源”，提出“强化统筹”这一新时代要求，对于增强财政调控能力、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发挥财政治理作用，有必要强化财政资源统筹问题、构建统筹财政资源系统性框架，包括涵盖流量形式的财政资金统筹、存量形式的国有资产统筹、空间视角的财政政策统筹、时间视角的跨周期统筹等四个方面，同时做好技术和人员两大保障，以期实现“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政策一致、周期协调”的统筹目标。^[43]

在另一篇文章中，朱云飞认为，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河北省县域财政经济规模持续壮大，但受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载体、发展环境等影响，仍然存在“体量大、实力弱、结构差、不均衡”的特征。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河北县域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特色产业，优化要素配置，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营商环境和深化财税改革。^[44]

朱云飞等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河北省数字经济仍存在整体水平不高、基础支撑不牢、产业转型不快、创新能力不强、数字治理滞后等问题，亟须充分发挥财政收支、政策、管理等职能，从供需两侧发力，既在供给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壮大人才队伍，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强支撑，也在需求端为企业、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搭建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领域，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驱动。^[45]

张硕认为，河北省生态文明领域财政资金存在资金总量有待增加、结构有待优化，预算编制

准确性不高、执行完整性不足、年度间均衡性不强,资金管理使用分散、绩效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及财政部门调控手段有限等问题。对此提出了提升整合决策层级、扩大资金整合空间、系统制定整合方案、筑牢常态整合基础、增强整合内生动力、激发积极性创造力等六方面的对策建议。^[46]

陈玉璋以磁县为例,对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评审机构的作用,加强评审队伍的建设,拓宽评审工作范围,确立更好的管理模式及操作规程进行研究。指出,县(区)级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中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专业知识结构有待提高、信息化建设不够完善等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财政评审工作社会影响力;二是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投资评审绩效评价结果;三是完善机构建设,建立一支优秀的财政投资评审队伍;四是加强业务指导,提升财政评审工作规范化水平。^[47]

五、乡村治理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2022年学术界对河北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公共事务多元合作治理路径、乡村振兴人才战略、乡村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治安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展开研究。

常明等以河北省元氏县纸屯村为例,对乡村公共事务多元合作治理的新路径进行研究。认为,实现乡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纸屯村成立“村集体统管”的农民用水户协会,通过统一灌溉定价,实现了价格机制对农户节水行为的促进作用;通过协会与机井管理员合理的分工协作及薪酬制度,达到了灌溉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及时维护。“纸屯模式”提供了一种乡村公共事务多元合作治理的核心逻辑,即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监督和兜底责任,并与乡村能人通过分工与激励机制,形成“农村基层组织——乡村能人——农户”的合作治理模式。^[48]

王建强认为,近年来河北乡村仍然面临吸纳人才的普惠性和长效性政策措施不足、乡村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乡村人才能力评价缺乏科学

有效的标准、乡村人才成长激励保障不足、对乡村人才培养缺乏多元保障等问题。对此提出了加强乡村人才振兴综合管理、实施乡村人才预购与定制培养制度、加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投入、对乡村人才进行科学评价、完善基层人才的激励保障制度等建议。^[49]

潘小娟等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大量资本涌入乡村,带来了种种问题,出现了资本运作和乡村治理双重失灵失效现象。河北Y村的实践对破解这一难题有一定的借鉴。其关键在于资本和村庄建立了一种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成了“资本归市场,治理归村庄,资本促进村庄治理,村庄助力资本运作”的良性互动局面。既避免了村庄因被过分卷入市场而失去对公共性的追求,又避免了资本因被乡土裹挟而无法产生效率的问题。^[50]

康晗以河北地方相对贫困治理为例,对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扶贫战略重点由全面脱贫攻坚目标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直面贫困治理转型精细化和个性化需求,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系统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及机制对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提出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产业技治,文化内治,社会共治,民生善治及生态法治为手段“一核五治”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应从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协同治理,收入增长及法律保障六方面架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51]

李砚忠等以孟村回族自治县为例,对民族地区乡村治安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进行研究,认为,民族地区平安乡村建设与自治体系存在着触角延伸盲点多、自趋力不足以及数字治理基础欠缺等问题,亟须以“政治”领导统领全局,以“自治”延伸治安触角,以“德治”创新乡土教化,以“智治”嵌入发力,以“法治”促进融合约束,实现从传统刚性的“硬管理”向“治安社会化、社会治安化”的“软治理”转型,实现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52]

郑怡等认为,以石家庄市D镇为例,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路径进行研究,指出,目前治理中存在的党建引领效果欠佳、自治体系运转不畅、法治进程推动缓慢、德治建设面临挑战等问题,对此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巩固自治核

心, 夯实法治、德治实施基础; 二是强化法治建设, 保障自治、德治有效运行; 三是发挥德治支撑, 推动自治、法治可持续性; 四是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三治”整体效应。^[53]

2022年,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取得了新进展, 但也要看到, 这方面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弱项: 第一, 现有研究以微观案例分析居多, 而理论建构、宏观分析少, 研究成果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深度有待拓展、深化, 尤其是前沿理论成果少; 第二, 高端精品成果有待加强。在发表的文章中, CSSCI刊物上刊登的有3篇, 分别刊登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税务研究》《农村经济》上, 占入选文章数量的5.66%, 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 且未见《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政治学研究》《河北学刊》等权威刊物上刊发的成果; 第三, 相关研究队伍尚需培养壮大, 尤其是应鼓励中青年学者参与到有关研究中来, 保证河北政治建设研究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吴耀明: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
程瑞山: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参考文献:

- [1] 倪岳峰.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N]. 经济日报, 2022-11-10.
- [2] 倪岳峰.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N]. 学习时报, 2022-8-19.
- [3] 倪岳峰.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J]. 机关党建研究, 2022(12).
- [4] 王正谱. 从政治上考量 在大局下行动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N]. 学习时报, 2022-4-4.
- [5] 柯俊. 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 打造忠诚可靠堪当重任的年轻干部队伍[J]. 党建研究, 2022(5).
- [6] 董兆伟. 让高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J]. 共产党员(河北), 2022(1).
- [7] 颜世东. 党建引领聚合力 建设繁荣新农村[J]. 党建研究, 2012(2).
- [8] 吴新叶. 社区中的政党: 领导与赋能的基层治理迭代——基于石家庄一个老旧社区“红色物业”的调查[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9] 孙智怡.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建设的探索——以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岔社区为例[J]. 领导科学论坛, 2022(1).
- [10] 孔令岗. 河北康保县: 打造智慧党建新平台 画好乡村治理同心圆[J]. 农村工作通讯, 2022(12).
- [11] 张惠. 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路径研究——以唐

山学院为例[J]. 党史博采(上), 2022(7).

- [12] 马兵林, 李珊珊. 多维联动的高校党建路径简论[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2(1).
- [13] 李春阳, 王亦娜, 齐新玉.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建设的探索与研究——以承德医学院护理系“永远跟党走”为例[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41).
- [14] 孙克健, 张佰儒, 赵宏波, 冯韶华, 王文静. 高校党建“五段四维”品牌建设与创新探索——以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党支部为例[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2(4).
- [15] 范文龙, 姚文靖, 曹志超. 擎党建之旗 聚融合之力——石家庄日报社以党建“1+N”融合工程推进新闻舆论工作[J]. 传媒, 2022(13).
- [16] 周英, 刘婷婷. 白洋淀流域生态安全的立法审视与完善进路[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2(6).
- [17] 赵云海, 刘瑞. 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立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 晋中学院学报, 2022(6).
- [18] 刘涛, 安文靖. 自由贸易试验区数字贸易建设的法律困境及对策——以河北自贸区为例[J]. 新经济, 2022(9).
- [19] 马涛. 乡村振兴地方立法的功能价值定位——以《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为例[J]. 中国司法, 2022(11).
- [20] 周旭. 论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的法治完善[J]. 环境与发展, 2022(9).
- [21] 王康, 于晶晶. 河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修复法治保障研究[J].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2(6).
- [22] 王浩. 京津冀地区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之主体机制法律问题研究[J]. 秦智, 2022(5).
- [23] 郭雨佳. 白洋淀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法律问题研究[D].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 [24] 丁万星, 吴玉婷, 刘月君. 论河北省建筑业领域实现双碳经济的法治保障[J].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2022(3).
- [25] 伊茜卓玛, 张磊.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军民协同创新发展法律服务平台建构研究[J]. 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 2022(8).
- [26] 班耿齐. 京津冀法治一体化中基层人民法院人才问题的困境与对策[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27] 贺晓伟. 河北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探析[J]. 河北企业, 2022(12).
- [28] 刘亚, 杜娟, 史艳英. 探索互联网背景下行政执法档案信息化推动“双随机”综合执法[J]. 互联网周刊, 2022(3).
- [29] 乔新月. 河北省高质量实施《社区矫正法》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司法, 2022(5).
- [30] 杨紫微. 政务服务中心标准研究及发展路径[J]. 中国标准化, 2022(6).
- [31] 宋颖. “放管服”视角下河北省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2(2).
- [32] 狄志斌. 河北省道路运输行政审批改革思考与建议[J].

- 交通企业管理,2022(3).
- [33]张朝玉,李金波,孙中贤.重大疫情下跨区域危机应急联动能力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与周边省市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2(2).
- [34]黄锡生,李文卓.从属地治理到统分结合——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的应然进路[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6).
- [35]樊清.县乡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探索——以河北欠发达区域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2(1).
- [36]顾小明,鲁敏.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以河北省为例[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2(9).
- [37]郭惠涛,管心乐,杨成宇,戴龙焯,唐一铭.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研究——以河北省 J 镇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24).
- [38]连青.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论坛,2022(12).
- [39]张娟娟,韩柏,王纪晨.京津冀数据协同治理现状及思路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2(12).
- [40]韩鹏.石家庄市智慧政务建设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 [41]张明,孙玉英,高江湖.全流程智慧税务绩效建设的实践与探究——基于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的创新实例[J].税务研究,2022(12).
- [42]许志坤,张素珍,刘海云.“大智移云物链”在河北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研究[J].经济论坛,2022(10).
- [43]朱云飞.构建财政资源统筹框架体系之探索——以河北省为例[J].税收经济研究,2022(2).
- [44]朱云飞.河北县域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中国财政,2022(5).
- [45]朱云飞,袁丽蓉.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22(5).
- [46]张硕.“双碳”目标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财政资金的整合思路及具体措施——以河北省为例[J].财政科学,2022(6).
- [47]陈玉障.新时期加强县(区)级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河北省磁县为例[J].预算管理与会计,2022(6).
- [48]常明,王西琴,张馨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农村经济,2022(2).
- [49]王建强.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河北省人才振兴实践困境及策略[J].经济论坛,2022(8).
- [50]潘小娟,高红,檀阳.资本下乡与村庄治理融合的实践探索——以河北 Y 村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22(7).
- [51]康晗.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以河北为例[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2(6).
- [52]李砚忠,徐宁.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治安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为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53]郑怡,宋在金.党建引领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优化路径的研究——以石家庄市 D 镇为例[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22(4).

河北文化建设研究

梁晓晓 向回

2022年,学界对河北省文化建设的重视与关注热度不减,论著类研究成果虽有所减少,但论文类成果质量整体提升,成果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聚焦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创新阐释;二是文化产业方面侧重解决困境,达到提质增效、驱动发展的现实意义;三是文化建设上兼顾公共文化的综合提升和区域文化的个性发展;四是文化与教育方面则着重探讨红色文化立德树人的功能;五是文化继承和传播上继续体现出遗产遗迹的古为今用和新技术新手段的优化更新,以下分别加以评述。

一、文化理论研究

燕赵文化、西柏坡精神仍然是理论阐释方面

的热点,其中部分内容也有所更新,如对塞罕坝精神的释读及其当下意义的重视,体现出回应现实、紧扣时代主题的倾向,发挥了河北“艰苦创业”新文化精神提振人心的功能。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理论研究构成该方面成果的重要部分,注重挖掘彰显“中国气派”、富有中国特色的底蕴,在当代价值阐释和历史谱系梳理中厚植文化自信。

(一) 革命文化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的关注持续升温,相关研究也由面广向纵深发展,对革命文化的地位和历史性作用探析趋于深入、丰富。革命文化是构筑中华文化的红色基因,是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基石,是弘扬中国精神的宝贵

资源。李维意从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入手，总结出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即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治党兴党的精神钙质、兴军强军的精神基石、铸魂育民的精神资源。革命文化作为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集体记忆”，应着重弘扬其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为此应在铭记革命文化的光辉事迹、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铸牢革命文化的坚定自信、赓续革命文化的不朽精神这四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弘扬革命文化，并从中汲取理想信仰的强大力量，坚持用革命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1]赵雪飞考察了“赶考”精神的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他认为“赶考”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内核、为理想拼搏奋斗的意志张力、自我革新的健康密码等。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中，“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精神圭臬、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基石、领导人民实现国家持续繁荣富强的力量源泉和拒腐防变的防火墙，发挥着重大激励和引领作用。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路上，“赶考”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的航标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器和实现人民美好向往的压舱石，为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2]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割断同儒家文化观的联系，秦宁波通过综合分析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理清了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孕育、雏形、发展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阻碍了新思想新理论的发展，共产党人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保留其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并以唯物史观指导儒家思想。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研究还从国共比较视阈对比了两者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者根本利益出发点、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以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程度。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有利于在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

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3]

（二）燕赵文化研究

关于燕赵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是对河北文人燕赵风骨的阐释分析。范宇光考察了燕赵风骨的历史渊源，指出燕赵风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近代中国逐渐演变成救国存亡的精神主题，这一主题分别表现在文人书家的为人和书法上。其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反抗、忧国忧民、安稳社稷；其书法，用笔刚健、结构严谨、章法端庄，体现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特征。燕赵风骨是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精髓，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也是中国文人的风骨，为当今文人的品行和文艺创作树立了良好的典范。^[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全党全国人民应发扬塞罕坝精神，把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戴建兵认为传承好发扬好塞罕坝精神，需要深刻把握塞罕坝精神形成的历史逻辑，进而追溯精神之源，推动塞罕坝精神转化为全国人民的行动自觉。首先塞罕坝精神可溯源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植树造林的系列指示，塞罕坝精神的发展是在“艰苦创业”中守护林场，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绿色发展”标志着塞罕坝精神的形成，进入新时代，更需要传承好、弘扬好、践行好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5]安巧珍、武娜娜着重探析了塞罕坝精神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研究指出塞罕坝林场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范，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世界生态文明。以绿色发展为价值追求的塞罕坝精神，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6]

（三）西柏坡精神研究

以往对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多集中在将西柏坡精神置于时代语境中加以解读。郭建、张振杰则从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着手，探讨其精神渊源和谱系特征。论文认为从历史逻辑来看，西柏坡精神与伟大的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理论逻辑来看，西柏坡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植根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在长期革命实践形成的革命文化滋养中形成；而从实践逻辑来看，西柏坡精神源于西柏坡时期党

的伟大革命实践。西柏坡精神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其包含的“两个一切”的人民至上精神、“两个敢于”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善于”的立国兴邦精神和“两个务必”的不懈赶考精神仍然有着特殊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伟大斗争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的强大精神动力，继续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7]姚志军、姚雷探析了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和鲜活的辩证意蕴。文章认为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续延安时期相关的思想理论思考，总结升华党带领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推动中国历史转折的历史经验，凝练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两个务必”思想具有丰富鲜活的辩证意蕴，包括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钢铁纪律与优良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到底与经受考验、推动历史进步与阻碍历史车轮前进、预防贪污腐化与防止垮台失败、夺取胜利与巩固胜利、“当官做老爷”与为人民服务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两个务必”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独特贡献，也蕴涵了成功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红色密码。^[8]

（四）民间文化研究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冀皮影戏，在戏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薇在民俗审美文化的视野下研究了冀皮影戏的审美特色差异。冀皮影戏以唐山、河间、邯郸为代表，分为三支，因充分吸收民间音乐、美术、戏曲、方言、雕塑等民俗文化精华，故形成冀东、冀中和冀南不同的影戏审美特色。冀东浓郁的方言结合独特的“掐嗓唱法”自成一派，冀中的剪纸、武术、杂技等民间技艺融入表演，丰富了影戏的艺术表现，冀南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景观，为影戏提供了多样的素材。此外，各地区的民众信仰是滋养冀影戏的文化土壤，形成酬神赐福、警世劝善等影戏主题，使影戏艺术成为寓教于乐的方式之一。^[9]

近年来，随着冷门“绝学”的兴起，学界对家族文化的研究日渐丰富深入。何晓芳以岫岩满族《白氏源流族谱》即抗日英雄白承润家谱

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族谱所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白氏始迁祖崇厄力身为护军校，奉命来岫岩驻防的历史，以及崇厄力以下十三代人，近三百年勤俭躬耕、重视教育、树立良好家风的脉络。与以往专注于记述抗日英雄白承润舍家救国、铁血抗日的英雄事迹不同的是，研究将重点放在白承润的家族史上，通过揭示白氏家族于清朝有为官清廉、心系于民的前辈，抗日战争时期有以家破人亡为代价支持白承润抗日的父母、妻子、兄弟、族人，突出了白氏家族的家国情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10]

二、文化产业研究

随着经济形势的和产业环境的变化，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变化、产业融资与创新等话题备受关注，相关研究致力破除关键障碍，有效布局发展策略，为推动文化产业向好发展奠定基础。

（一）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及科技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是国外学者较早就关注的问题，相较而言，国内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辐射深度、广度均显不足。陈少峰等在梳理学界动态的基础上，重新探究了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文化的作用机制，深化了文化与科技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其研究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对不同产业和产业细分的解析重构，使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具备相互融合的物质基础，这构成科技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基本条件；审视整个产业甚至整个经济活动，可见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为，科技驱动、需求拉动，通过市场的平台作用，加速实现文化产业价值的最大化；在科技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科技渗透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等全生命周期中，推动文化企业不断提升产品内容和服务的品质，提高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从微观角度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文化的过程和模式如下：技术融入文化实现文化数据化，为文化的要素化解构和重组提供条件，而行业与科技的深度关联推动文化内容的工业化智能生产，与此同时，技术对叙事的塑造即对文化空间消费场景的再造，重塑了消费感知。最终文化产业的全链条革新，使文化产业的生产样式、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并在数据、

业务和服务三个层面形成以融合为特征的新型文化产业形态。^[11]

文创产业规模小、轻资产、重创意的特征影响着文创企业的筹资。创新传统筹资方式,对打破文创企业筹资“瓶颈”具有现实意义。李男等认为在传统筹资模式上,文创企业面临股东注资规模有限、银行筹资约束较强、上市筹资门槛较高的困境,因此可通过如下措施解决文创企业筹资问题。一是创新传统筹资模式,如在银行贷款方面可采用担保+贷款的方式分散风险,而资本市场上的新三板中小文创企业提供多种筹资渠道;二是创新财政支持模式,包括创建产业园、“投”“贴”“奖”政策组合、设置品牌支持专项资金、政府搭建综合服务平台,从而拓宽资金途径,降低其筹资成本;三是运用互联网金融,即在互联网筹资与文创产业逐步融合的前景下,可充分发挥网络众筹小额大量的新优势,及其营销、宣传功能,将文创产品、服务及时推向消费市场。此外,发展筹资租赁、质押贷款在文创产业上的应用,也可为文创企业筹资提供支持,助力文创产业向好发展。^[12]

戴佳瑞等从微观角度,着重探析河北博物院在近两年文创产品缺乏创新的设计理念、有效的营销途径以及品牌化建设和IP资源合理利用不足等短板,提出河北博物院未来文创产品发展应借助主题展览活动以展带销,搭建起博物院同受众的对话平台,健全文物推广和文化研究工作;在研发设计上,应突出文创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转变外观简单再现的设计思路,注重其文化内涵的挖掘,深化美感体验。因短期内占有高水准文创设计团队的难度较大,因此博物院还要向外寻求专业合作,开放IP资源、拓展消费领域,实现跨界联名;并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开拓线上线下多元化的营销渠道,从而实现文创产品品质和知名度的提升。^[13]

(二) 旅游文化产业

文旅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丰富和优化服务场景,提升用户体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陈则谦、李亚灿通过网络调查将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城市文旅融合场景中的数字化服务系统归纳为信息类、互动类、预约类、导览类、体验类、消费类六种类型,并借鉴场景理论,从真实性感知、价值性感悟和娱乐性感受三个主维度细化了

用户体验研究粒度,形成文旅融合场景数字化服务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以上海科技馆、故宫博物院为对象,从功能性和价值性两个层面开展用户体验研究,指出文旅融合场景中数字化服务尚存的问题,为改善这一现状,陈则谦、李亚灿认为应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数字化服务资源,注重交互体验设计,提升数字化服务的表现力,同时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强化跨场景服务的能力,从而改进服务质量,促进文旅融合业态的新发展。^[14]马志超等剖析了数字经济下河北省文旅产业融合和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当前河北省文旅融合发展还面临着管理体制制约、创新意识不足、数字文旅人才匮乏、投入资金不足等问题。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驱动下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利用数字技术,以创新引领文旅融合;二是加强顶层设计,以政策激励文旅融合;三是建设专业数字化人才队伍,以人才推进文旅融合,进而开创河北省文旅融合新态势,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15]刘嘉娜、杨馨媛从后工业时代京津冀文化旅游路线的规划设计入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基于工业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将工业旅游景区和等级景区进行联动的可能性。论文指出在压减工业产能和治理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京津冀地区可以将源自工业遗产改造的再生型文化艺术区纳入旅游路线设计中,进一步开发工业资源所蕴藏的文化底蕴,将后工业文化游览作为区域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16]

(三) 体育文化与产业

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举办推动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全面发展。如何实现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成为河北学者关注的问题。吴志敏等提出如下发展路径:保持奥林匹克传统,让京张地区的奥运遗产得以活用;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努力塑造“京张”国际化旅游品牌;以奥林匹克为主线,敢于打造体育文旅新业态、新产品;发挥“双奥之城”优势,助力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京张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将奥运遗产保护巧妙地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建设中。^[17]

如何使中国传统武术适应当下社会,实现其强身健体的当代价值的现代转化,已引发学界注意。张晶等通过武术中蕴含的身体榫卯,探究榫

卯连接所构建的武术与社会文化的初始结构,研究认为习武人巧妙地借助对象性活动、善良意志、生命塑造、师徒关系、文化拳理、抽象意蕴等独特、复合榫卯,将武术充分地与社会、文化广泛交融,形成了拥有多元支点的身体文化;武术特有的身心并育、生命至上榫卯创建了武术文化的结构框架,并以中国化的身体实践完善着结构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武术立足于文化的根基。进入当代社会后,武术自身固有的暴力、悠缓、自恋、封闭逐渐格格不入,初始榫卯结构被解构。依据文化涡旋运动规律,论文探索了武术在高速流变的社会中新的时代系泊点,提出重构新时代武术文化榫卯结构的措施。^[18]白俊亚等运用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通过深描武式太极拳研究“重现状静态论述轻研究路径设计,重自身研究轻比较互动研究、重问题对策研究轻历史经验总结”的现状,探索了其学术研究的可能路径。白俊亚等认为,在自觉文化历程层面,从技理文化出发,武式太极拳研究不仅需要继续洞悉个性同时反思核心技法,也需要重估武式太极拳当下意义;从门户传承出发,可围绕各门户流布史和各地域门户“练养用”遗产整理而展开研究;从流派价值出发,需关注“流派文化格调、文人习武之道、文明化的寻思、流派与区域社会互动”四方面。在自觉文化境遇层面,可同时从“同中异、异中同”共时性比较和“古今互鉴”的历史性参照展开研究。这一针对武式太极拳研究的思考,拓宽了太极拳学术研究新视角。^[19]

三、文化建设研究

2022年,河北文化建设研究成果集中在公共文化建设、城市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以及雄安新区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乡村文化建设日益成为焦点,相关研究既紧跟前沿又能从宏观、微观不同层面切入问题,提出对策。

(一) 公共文化建设

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才能认识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亦是如此。姜汪维、夏文斌围绕构建文化的人民主体性这一主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沿着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以人民政治保障人民文

化权利实现,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四条主线,不断促进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形成彰显人民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的人民主体性文化,以其价值理念的先进性、文明基因的独特性,以及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性,不仅扬弃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而且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精神动力。^[20]

白翠玲等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为研究对象,根据遗产本体展示、非遗展示、遗产周边环境展示等内容,分析了主要的展示方式,包括基于本体的原状展示、基于展馆和展览的灵活性展示、基于特色村镇与特色街区的社区展示、基于节庆活动和演出的活化展示及基于解说系统的多方参与展示,进而构建出融和谐性、可达性、游客认知度为一体的指标体系。研究指出长城(河北段)文化公园保护发展存在展示主体呈现结构不平衡,展馆以静态展示为主,古村落展示载体系统化不足,解说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为此应探索形成特色突出、互为补充的综合展示体系,分类增强展馆展示载体建设,完善古村落展示要素体系,加强自导式解说和居民展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21]河北段大运河融汇了隋唐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肖潇、安娜的《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河北篇)》一书全面梳理了河北段大运河的历史演变,系统介绍河北运河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剖析河北大运河遗产现状和问题分析,为河北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提供思路和策略。^[22]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进者,如何在不同应用场景深入发挥其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英等从价值与功能、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等方面,梳理了图书馆文旅融合研究现状,并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在国家战略、图书馆事业发展、国际经验等多个维度的价值取向。根据公共图书馆和旅游业对接和协同的形式、过程、机制等不同,作者指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可分为渗透融合、重组融合和延伸融合三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可通过创新政府指引机制、创建激励和监督机制、

科技赋能应用场景创新机制、开发文创产品及服务,来拓展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品质,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资源功能与价值,实现先进文化的高效传播和共享。〔23〕

(二) 城市文化建设

对城市文化建设的研究呈现出细微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某些细小领域的关注趋少,越发注重城市品牌的打造和城市品质的提升。魏尔雅等以保定市为例,着重探析如何通过开发保定市红色文化资源来打造“文化保定”品牌这一问题。他认为保定市是河北省著名的革命老区,蕴藏着丰富多样的红色遗址、红色人物、红色故事和红色文献,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在城市文化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其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和独特优势未得到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在品质之城建设中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应增强保定红色遗址的生命力、提升保定红色遗址的传播力,提升红色人物的传承力,用心、用情、用力讲好红色故事,通过建设红色文库,举办讲座沙龙和主题展览,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的措施用好红色文献等,整合和激活红色文化资源,充实城市文化内涵,涵养城市文化品位,建设保定文化品牌。〔24〕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严重削弱了城市的地域特色,许多城市老街区的公共空间逐渐呈现出效能与活力低下和认知度弱化导致的可读性、使用性差等现象,如何保护老街区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痕迹,延续城市文化基因是城镇建设中被持续关注的热点。王泽焯等结合环境认知理论,在城市存量发展背景下以秦皇岛市具有历史文化遗迹的老街区为研究对象,针对15分钟生活圈内的公共空间进行场地优化更新设计。文章指出道南老街区存在街道狭窄、公共空间稀缺、文化特征相对薄弱的现象,为此应提取具有早期工业文化特征的元素,通过功能性植入手段再造具有共同文化形态的微空间,与现有的珍贵建筑遗存相互关联起来,使之转化为贯穿公共空间的显性和隐性的文化秩序,借此唤醒城市活力,增强城市的文脉特征和可读性,重构人地关系,使其公共空间适应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场景。〔25〕

(三) 乡村文化建设

文化是乡村最根本的属性之一,也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和灵魂。郭永久等在对国内外乡村旅游业与文创产业的研究现状进行论述的基础上,以

河北省近郊乡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资源丰富、条件优越、民俗文化多样、环境日益改善的发展优势,及缺乏整体规划、特色不突出、营销意识淡薄、资金不足的问题,运用“旅游+”的核心概念,提出以乡村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体验为方式、以文创产业为载体、以艺术设计为提升手段的近郊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模式。论文以河北省全家窑村的设计实践,不仅论证了上述文旅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也为河北省近郊乡村旅游与文创产业艺术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建设构想。〔26〕农家书屋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为农民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数字技术的推广,使传统书屋的改造升级更加迫切。杨秀国、郭晓敏以石家庄周边区县为例,指出当下数字化普及的媒介环境倒逼农家书屋迭代升级。但信息化建设不足带来的新旧媒介数字隔阂,农家书屋所提供服务和农民实际需求脱节,建管分离运营方式导致的功能弱化等问题亟待解决。据此,论文提出应建立农家书屋的长效发展机制,即畅通信息网络环境,培育阅读主体;突破科层逻辑运行悖论,资源配置对接群众需求;搭建公共精神场域,推广移动阅读服务。〔27〕

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的集萃,与乡村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高玉敏从乡风文明视角探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论文认为乡村文化的振兴光靠外部输血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根本上从内部发力,构建一套多方联动、强效推进的“内生式”建设机制。“内生式”建设机制的核心在于“以文化人”,深挖文化根脉,唤醒乡民的文化自觉,增强乡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家风家训、培育新时代好家风;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乡村儒学,烛照乡村文明的传承;将传承和创新传统耕读文化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人,全面提升人文素质,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8〕

(四) 雄安新区文化建设

文化是城市的真正灵魂,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城市是文化的集中载体,是文化发展的排头兵,影响着文化的前进方向。随着我国整体发展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地位愈发突出,因此城市文化建设成为影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高红雨、吕冬冬指出新时代城市建设应当以习近平

总书记城市文化重要论述为指导,认识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结合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应当注重雄安传统历史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地区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雄安新区的建设须总结以往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文化创新打造“未来之城”,培育人民性、生态性、包容性、创新性的优秀城市文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旗帜打造城市建设示范区。^[29]如何探索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和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做好雄安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是部分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王密卿、张瑞民在分析雄安新区文化遗产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前提下,指出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意义。研究认为当下应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一个网络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具体可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构建非遗数字化保护规范标准,同时搭建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二是设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统筹、指导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云平台建设;三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人才支撑,组建整合科研和技术力量的专业队伍;四是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五是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路径。^[30]

四、红色文化与教育

我国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含蕴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将红色文化融入教育,激励青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提升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

“四史”教育蕴涵了学史悟道、识史明智的重要意义,如何将红色文化同“四史”教育融合,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菅志强等认为红色文化可以为“四史”教育提供新材料、新成果、新论据,通过丰富、更新教育内容提升教育实效。因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存在碎片化的不足,“四史”教育活动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元素挖掘不够充分,以及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形式单一,成为红色文化与“四史”教育融合的现实瓶颈。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应从课堂教学、网络教育、“四史”教育实践等三方面着手,从而帮助学生学懂、弄通、做实历史知识、历史理论,学好、用好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31]

张磊结合《利用大别山红色口述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书,探讨了如何将红色文化资源应用于思政教育的问题。研究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工作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阶段,其中前期工作应围绕做好顶层设计展开,包括组建红色教育专项小组,领导全校思政教师分类整理红色文化资源,在媒体及网络平台定期推送;中期工作以落实红色教育为核心,具体为开设红色教育课程,带领学生前往红色历史遗迹开展现场教学,还可以在其他课程教学中适当引入红色文化资源。在后期工作中,学校应通过开设红色专题培训课程,制订课题激励项目和推动思政教师与学科教师交流合作,共享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的挖掘经验,从而强化教师的红色文化教育能力。^[32]

作为蕴含厚重人文历史的宝贵文化资源,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引领、斧正学生思想和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王丽媛等以红色文化的感染性、实践性、实效性为依托,深化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可通过体验和案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实践,借助网络技术提升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的实践效果,还可以开发第二课堂拓宽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渠道将红色文化与思想道德修养、基本素质结合。一方面通过主体融入,让学生和教师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另一方面通过客体融入,让思政课成为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依托,从而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意义。^[33]

五、文化保护与传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学界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讨论聚焦于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两方面。

(一) 文化传承与保护

此前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较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阐释和深刻的文化意义挖掘较少。赵博文、李克军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传承和发展进程中,有效地连接了历史与现代、时间与空间,其内容和形式历经时代的汰选不断走向适应包容,其具有的共生思想和表现形式,是坚定文化自

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兹利用的载体。他们指出以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多关注其内涵、分类、保护和开发等，但对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则关注不足。新时期，应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引领，通过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级立法，推动社区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增强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34]

冀南皮影戏是饱含邯郸地区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传承、创新开发引起河北学者的关注。杨雅君介绍了冀南皮影戏的造型特征及制作工艺上雕绘结合的民间敷彩智慧，指出在城市化环境下，冀南皮影戏造型、色彩与工艺创新开发策略应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静态皮影影人的实体保护与创新呈现；二是开发皮影特色旅游文创，包括影人实体藏品的制作和供给，提取皮影特征符号开发文化周边产品等；三是研发数字化皮影风格虚拟动画；四是利用城市空间进行皮影表演与宣传。^[35]

历史建筑的修缮是挖掘历史建筑蕴涵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高瑞宏等以邯郸市涉县红色旅游带红色建筑为例，探讨了在历史性建筑修复技术得到提高与完善的当下，如何遵循尊重历史、尊重情感的主要原则，将修缮与开发利用相结合，满足人们文化及情感层面的需求。邯郸市涉县红色旅游带包含太行军区司令部、太行区党委、八路军总部、西达兵工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旧址，形成了以赤岸为核心的军事指挥部、以西达为核心的兵器制造营、以西戌为核心的新闻媒体编辑部、以索堡为中心的边区政府、以漳南渠为载体的军民公建文化线，也是“包产到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启蒙实践基地。由于复杂的历史环境造就了红色历史性建筑之间存在着错综的历史情感联系，因此建筑修复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挖掘红色时期中的历史情感，将红色建筑的情感注入建筑的规划与修复中，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保护修复方案。^[36]

（二）文化传播研究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

口，一直是学界用以考察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效果的研究对象之一。尹宏伟依托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功能，结合知识图谱分析方法，针对孔子学院院刊《孔子学院》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描绘孔子学院从创立之初到基本发展成型的历史轨迹，并对所得文献通过主题词突变分析探寻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热点、趋势及研究情况，并采用 CiteSpace 对高频关键词突发探测功能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由高频关键词分析得出孔子学院的功能变化趋势，即呈现出从单一的汉语国际化教学机构逐渐向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机构转型，突出了文化交流与对外文化传播功能。^[37]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海外文化传播的支持。贾锐、马志民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探析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复调策略首先指在传播内容中加强世界所认同的创新性元素，用海外观众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在传播方式上表现为从传播平台和主体两方面引入差异化的叙述视角将内容向信宿传播；复调策略在传播受众效应与影响中的应用强调精分信宿进行有效传播，最大程度形成二次传播甚至多次传播。论文指出复调传播策略有助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主体和受众友好互动、平等协作，表现双方文化的相互尊重。通过中西方动态的话语沟通，中国海外文化传播发展迅速，在传播平台、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等方面运用复调传播策略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38]

长城文化的阐释和传播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使命。陈玉认为运用长城拥有的世界影响，增强中国出版的对内对外传播能力，必须从“他者”话语“阐释中国”转变为以我为主的“中国阐释”，以文化价值观为纽带进行跨文明对话与沟通，让读者大众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研究立足现阶段长城文化构建国家文化标识的政策语境，采用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以长城文化题材出版物的融合出版为案例，观察其出版传播话语实践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对长城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和对照分析，揭示了长城文化价值的内涵，从长城文化融合出版话语传播的文化话语体系、话语形态、语境视

角三个维度提出了话语传播策略。^[39]

郭学军以抖音影视类短视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支撑其传播的内在文化机制。他认为发展迅速的抖音影视类短视频建构起迥异于传统影视作品以及其他一般短视频的文化机制。它在传播群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分群和破壁特点,其分时段、分地点传播的便利,打破了发布、传播和接受的时空壁垒,大大地扩张了传播范围。在传播影像上形成主位影像和客位影像兼备的特性,在传播形态上具有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融为一体而又能加以区分的“别现代”属性。研究还指出影视类短视频发展迅猛,建构起异于传统影视作品以及其他一般短视频作品的文化机制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比如著作权问题、个人阐释准确度问题等,它们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影视短视频传播机制的发展和完善。^[40]

2022年,在河北文化建设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高质量成果,同时短板和不足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一是微观层面的应用性、政策性、可操作性研究较多,重大理论性、方向性、启发性成果较少,对全省文化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有待强化;二是区域特征明显,同时也表现出相对封闭的倾向,缺乏跨越省域、沟通全国的视野和成果;三是研究成果仍集中于传统领域,对国家发展战略着重强调的前沿领域关注不足。

(梁晓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实习研究员;
向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李维意.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精神价值和自觉弘扬[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
- [2]赵雪飞.“赶考”精神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03).
- [3]秦宁波.《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4]范宇光.燕赵文人的风骨——以近代河北籍文人书家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
- [5]戴建兵.塞罕坝精神形成的历史逻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
- [6]安巧珍,武娜娜.塞罕坝精神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
- [7]郭建,张振杰.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J].理论视野,2022(06).
- [8]姚志军,姚雷.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思想的辩证意蕴

探析[J].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2(06).

- [9]宋薇.冀皮影戏的民俗审美文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
- [10]何晓芳.《白氏源流族谱》——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叙事[J].满学研究(东北大学),2022(00).
- [11]陈少峰,李微,宋菲.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及其产业形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
- [12]李男,王岚,李冉.文创企业筹资模式创新研究[J].财会通讯,2022(18).
- [13]戴佳瑞,戴佳琦.河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开发与营销策略研究[J].科技传播,2022(05).
- [14]陈则谦,李亚灿.文旅融合场景中的数字化服务:主要类型及用户体验研究[J].图书与情报,2022(05).
- [15]马志超,李志红,武婉玉.数字经济下河北省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22(02).
- [16]刘嘉娜,杨馨媛.京津冀后工业文化旅游路线的分析与设计[J].河北企业,2022(06).
- [17]吴志敏,吴然丰.冬奥背景下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发展路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2(06).
- [18]张晶,周嵩山,陈青.武术文化的榫卯连接与涡旋重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02).
- [19]白俊亚,刘洪,李建民,姜华北,花家涛.文化自觉语境中武式太极拳研究的实然与应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2(07).
- [20]姜汪维,夏文斌.人民主体性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2).
- [21]白翠玲,雷欣,苑潇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文化遗产展示体系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2(03).
- [22]肖潇,安娜.《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河北篇)》[M].北京:研究出版社,2022.
- [23]李英,李肖峰,王一诺,陈兰杰.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4).
- [24]魏尔雅,曹森旗,刘丽斌.品质之城建设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析——以保定市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22(06).
- [25]王泽焯,李冬,栗功.具有文化认知的老街区生活圈公共空间更新研究——以秦皇岛道南街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2(04).
- [26]郭永久,王依凡,周丹.河北省近郊乡村旅游与文创产业艺术化发展研究——以河北省赤城县全家窑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2(09).
- [27]杨秀国,郭晓敏.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的瓶颈及突破策略——以石家庄周边区县为例[J].出版广角,2022(18).
- [28]高玉敏.乡风文明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四川戏剧,2022(06).

- [29]高红雨,吕冬冬.习近平城市文化重要论述在雄安新区建设中的体现[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
- [30]王密卿,张瑞民.雄安新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J].文化产业,2022(35).
- [31]菅志强,袁志玲,杨志刚.红色文化与“四史”教育融合的现实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13).
- [32]张磊.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政教育价值[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38).
- [33]王丽媛,杨昕,张彦琼.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的三重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09).
- [34]赵博文,李克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共生要素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2(06).
- [35]杨雅君.冀南皮影戏造型与工艺创新开发研究[J].大众文艺,2022(20).
- [36]高瑞宏,王璐瑶,张欢,车芸.以红色文化为中心的历史性建筑修缮方法的研究——以邯郸市涉县红色旅游带红色历史性建筑为例[J].建筑与文化,2022(03).
- [37]尹宏伟.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能力可视化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2(01).
- [38]贾锐,马志民.复调与对话: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策略[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03).
- [39]陈玉.长城文化融合出版与中华文化价值观话语传播[J].科技与出版,2022(09).
- [40]郭学军.抖音影视类短视频传播的文化机制[J].青年记者,2022(04).

河北社会建设研究

张丽

一、2022年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总体状况

2022年,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成果继续主要围绕社会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从研究领域看,主要涉及公共服务、城乡发展、人口素质与人才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学者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重点依然是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建设、人才素质的研究深度增加。从成果数量上看,较往年略高,公共服务、人口素质与人才领域的研究有所增加。研究成果质量进一步提升,公开出版的著作增多,如《新时代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研究》(郭建),《河北省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研究》(杨胜利、王伟荣),《河北省城市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创新研究》(赵鹏飞),《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李娟、傅力平、杨立明),《精准脱贫·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的案例研究》(段洪波),《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视角》(李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与实践:以河北省为例》(胡耀岭、许云清、彭丽宏),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河北学刊》《城市发展研究》《经济与管理》等核心期刊的文章也多于往年。总体而言,2022年关于河北省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保持对城乡建

设、公共服务、人口与人才发展领域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深度所有加强。

二、河北省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公共服务是河北省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等领域。2022年,学者们继续聚焦托育、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文化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一) 总体评价

李娟、傅利平、杨立明通过对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关键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基础信息与资料集成,同时也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主要基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模型,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总目标,以基础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为专项目标,构建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河北省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综合测评,并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然后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从中找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短板和障碍,最后为促进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

冯晓娟基于河北省131个县2011—2020年

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县域公共服务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县域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分类别看,县域教育、医疗发展均有助于农民增收,并且医疗的增收效应高于教育;县域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农民收入则存在负向的作用。通过采用两步法系统 GMM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旧成立。从强化财政统筹、提升县域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提升县域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几个层面,提出更好发挥县域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促进建议。^[2]

(二) 托育

随着社会变迁和家庭结构原子化,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显著增长,生育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凸显了托育供求矛盾。郑萍指出河北省托育服务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服务供给与入托需求存在巨大差距。河北省托育服务机构总体上以营利性为主、普惠性不足、服务供给模式单一、社区托育几乎为空白。提出河北省要加快建立完善托育服务体系,一是构建多层次托育服务供给网络,提高供需匹配度;二是激活人才引擎,完善托育从业者职业化体系;三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托育服务发展活力;四是构建联动长效监管机制,有效提升托育服务质量。^[3]

(三) 教育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适度集聚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故应当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着重考量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高等教育集聚的邻域关系分析表明知识存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高等教育集聚对于区域和区际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顾岩峰等以河北省为例的内部关系分析表明,河北省在高等教育资源的总体发展程度及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但反映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均等化程度的洛伦兹曲线表明,在考虑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情况下,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仍有待改善。提出河北省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应当重点加强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机械、环保、经济管理等相关产业相关专业,从学科总量、适应性结构、功能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4]

河北属于农业大省,而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力量之一,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大促进作用。董伟欣等通过对河北省农村

职业教育(“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总结出资金投入、专业设置、教学资源 and 师资力量等是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应通过拓宽资金投入渠道、根据不同区域优化专业设置、建立师资团队长效运营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教学支持服务监督机制等措施,促进河北省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5]

(四) 劳动就业

大学生在就业中受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和自身素质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所面临的压力增大,因此,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闫莹等基于对河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的调查,从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两方面,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研究。通过调查知晓大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获得的支持状况及问题,从而提出完善大学生就业创业支持网络的对策。^[6]

青年的就业创业状况不仅关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状况,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与全面发展。郭雅欣等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发现河北青年就业基本特点为:部分青年求职较难、收入偏低、工作时间较长,对就业政策知晓度低,参与职业规划培训比例较低,工作适应度、满意度较高,青年追求收入高、稳定度高、省会城市的工作,农村对青年吸引力较弱。基于此,从完善青年就业制度体系,多管齐下开发就业岗位,多措并举加强就业培训,用心用情开展就业服务,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五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7]王依娜等针对河北青年创业展开调查,从市场环境、创业意愿、创业实践、政策环境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并结合河北实际提出完善青年创业政策体系、建立健全青年创新创业协调机制、搭建创业青年实践平台、分层次加大青年创业扶持力度、发挥创业孵化基地“桥梁作用”的发展策略,为进一步优化青年创业环境提供参考。^[8]

(五) 社会保险

戴溥之等指出在我国数字经济产生新动能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一批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由此传统的雇佣模式被打破,雇佣关系模糊化,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路径出现问题。因此,对河北省新业态就业人员的现状

与保险需求情况进行分析,寻求各个因素对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影响程度,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对新业态下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9]

(六) 养老服务

河北省总体上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呈现出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并存、地区城乡老龄化程度不均衡、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等发展态势,并存在育龄夫妇生育意愿降低、促进就业政策不足、养老服务硬件设施和护理人员缺口大等现实问题。张俊桥等基于供给侧调研,提出应对路径,主要有:一是落实落地三孩生育、婴幼儿托育、普惠型儿童津贴等政策,提升生育水平;二是在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养老托育人才队伍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方面持续给力,疏通稳就业促就业堵点;三是统合养老机构、银发经济、网络平台建设和推动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确保养老服务硬件设施有效供给;四是探索实施延迟退休、发展老年大学、助推老年人“再社会化”等举措,适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10]

张丽等立足解决养老设施供需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河北省人口老龄化新形势进行研判,在大量专题调研基础上,对河北省养老设施供给状况和群体需求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养老设施供给需重点关注顶层设计存在计划性不强、部门协同性不高、缺地少房、缺钱缺人等问题,并从顶层设计和部门协作、存量资源整合与利用、居家社区机构设施网络建设、适老化和无障碍设施改造、智慧养老平台建设等五个层面,提出深化养老设施供给的路径选择。^[11]

(七) 医疗卫生

胡耀岭、许云清、彭丽宏应用公共产品理论、健康需求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和感知期望差距理论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理论,全面认识家庭医生服务的社会性和时态变动性特征,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服务主体、服务内容、资金投入等进行考察,把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制度及主要特点,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运行规律及其主要机理,并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对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广度

上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开展情况;从深度上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开展情况。^[12]

孙秀娜等对河北省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医生服务需要、需求及利用进行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对石家庄、沧州、承德3个地区2892名 ≥ 60 岁农村老年人进行一般人口学资料、卫生服务可及性和需要、需求及利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河北省农村老年人慢性病患率为79.1%,两周患病率为20.5%;两周患病就诊率12.4%,两周患病未就诊率39.4%,1年住院率26.6%,应住院未住院率46.8%,未就诊、未住院原因居于前3位均为:自感病轻、经济困难、交通不便利。不同社会发展水平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特征老年人在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及利用具有一定差异性。得出结论:河北省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呈现“高需求,低利用”现状。提出要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医疗保障制度、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卫生服务需求、优化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提升河北省老年人口卫生服务利用率。^[13]

路然等对河北省三级综合医院中药房开展现状研究,通过省级注册的三级综合医院联合校验及行政许可,对河北省40所综合医院中药房现状进行现场调查。结果表明:河北省三级综合医院中药房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配置不足,房屋设置需进一步优化,煎药室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得出结论:综合性医院应加大投入,改善中药房、煎药室环境,优化人员结构,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14]

(八) 文化

张建勋、董旭为实现对文物信息的保存、对文物本体的无接触测量记录以及对文物资源高效利用,利用图片、视频、360°全景、倾斜摄影建模、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手段对河北省900余处省级以上文博单位进行数字化采集,对2016—2021年数字化工作总结,图文并茂、直观生动,全面展现数字化工作探索历程,分享文物数字化实践经验方法,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采集方法和实现了对文物保护单位基础信息、管理信息和现状信息的记录。^[15]

姚胜等针对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基础特征进

行评估,以河北省 30 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遴选的 15 个影响因子进行因子分析,降维提取为商业服务设施、交通便利性、历史建筑规模特色、文化遗产特色和遗产修复保障 5 个方面,总体上看,关于河北省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和文旅资源的影响因子中,周边商业服务设施的影响最强,其次为交通便利性、历史建筑规模特色和文化遗产特色,遗产修复保障最弱。构建传统村落在基础设施和文旅资源两方面的评价得分体系,全面探讨不同维度下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基础差异特征,并提出相关的指导策略。^[16]

三、河北省城乡发展研究

2022 年,河北省学者继续对城市和乡村建设进行深入研究,重点围绕城市创新能力和安全、脱贫与乡村振兴、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乡村人居环境、乡村精神文明等方面展开。

(一) 城市建设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建设创新型城市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要求。董慧等选取河北省 11 个市,在调研河北省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县(市、区)分布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创新型城市。市中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研发现状,针对原始创新能力弱、县域产业布局少、顶层设计不够等问题,提出建立多元化投入体系、吸引京津创新资源、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等方面的对策和建议。^[17]

赵鹏飞基于构建的城市安全管理基础理论框架,以河北省历年城市灾害案例为分析对象,结合问卷调查结论,系统分析了河北省城市安全状况、安全管理现状、安全管理不足与问题,构建了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河北省城市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确定了河北省城市安全管理的组织、流程、制度、保障措施,最后,以河北省城市社区为例,分析构建了居民社区、工业社区、商业区、校园的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通过安全社区建设全面提升河北省城市安全管理水平,保障河北省城市安全工作有序开展。^[18]

(二) 乡村建设

段洪波选取较为典型的河北省 11 个县城的

脱贫实践作为研究案例,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为主线,采用历史背景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河北省精准扶贫工作中易地搬迁扶贫、旅游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以及健康扶贫对于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重要作用以及积极影响。^[19]

精准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实现分区调控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进而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徐磊等以河北省 121 个县(含县级市)为研究单元,从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居住生活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四个维度,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测度乡村地域功能值,运用 ArcGIS 自然间断点和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基于共生理论和共生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多功能之间的共生模式,综合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短板功能以及共生模式,实现乡村地域空间功能分区调控。研究表明:一是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和集聚特性十分明显;二是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间存在正向非对称互利共生、寄生关系等多种共生模式;三是将河北省乡村地域划分为极化发展区、主导发展区、欠缺发展区、综合发展区共 4 种一级功能区,细分 16 种二级功能区,并提出各类功能区优化发展策略。指出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功能间存在多种共生关系,在乡村地域发展决策中应明晰其空间分异特征,把握乡村地域多功能间的内在共生关系,从而提供更为科学的分区优化策略。^[20]

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现实需求,科学客观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分析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对因地制宜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蒲金芳等通过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法测度结果,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异格局,借助逐步回归、GWR 模型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显著,以中等水平为主;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双核”分布特征;年平均气温、人口密度、第一产业占比、人均 GD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

用机械化总功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率7个因素为影响乡村人居环境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且在不同分区上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得出结论: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中等水平为主,冷热点区均呈现“双核”的格局特征。^[21]

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既是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的难点、痛点,也是实际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按规律办事,抓住重点,下足功夫,方能见到成效。郭建对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多角度研究,在分析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构成及要素的基础上,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典型与发展战略,系统阐释了新时代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农民素质提升战略、农村文化建设发展战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战略、文明实践夯基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战略,提出新时代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机制。^[22]高玉敏认为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的集萃,与乡村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提出乡风文明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构建“内生式”建设机制,一是深挖文化根脉,唤醒乡民的文化自觉,增强乡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二是传承优秀家风家训、培育新时代好家风;三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乡村儒学,烛照乡村文明的传承;四是将传承和创新传统耕读文化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人,全面提升人文素质,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3]

四、河北省人口与人才发展研究

人口素质与人才发展是一个地区社会建设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原动力,是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重要支撑。2022年,部分学者对不同类型人口素质的抽样调查及数据模型分析,还有部分学者对科技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医学领域人才发展以及人口消费进行了研究。

(一) 人口素质

张秩铭等对河北省4所高校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进行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河北省部分高校的874名大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通过自制问卷和网络成瘾量表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网络成瘾状况。结果表明: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为62.0%,男生成瘾检出率为59.1%,女生为63.9%;轻度占82.5%,中度占17.0%,重度占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学生、文科类学生网络成瘾率较高;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网络成瘾率较低;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和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网络成瘾率高。得出结论:大学生网络成瘾率较高,提出学校、家庭、社会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干预和引导。^[24]

秦俊巧等对河北省高校师范生心理健康进行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河北省师范院校1214名师范生进行《症状自评量表》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师范生心理状况在抑郁、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这3个因子上检出率相对较高。得出结论:高校师范生心理健康水平较高。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师范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以全面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更好地提升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心理素质。^[25]

秦剑杰等对河北省3—6岁幼儿肥胖的流行特征以及相关因素进行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北省11个地市共6034名3—6岁幼儿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河北省3—6岁的男、女幼儿的肥胖检出率分别为23%和17.48%。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出生时体重 ≥ 4000 克,每周吃高油脂食品 ≥ 3 次,每周喝碳酸饮料 ≥ 3 次,不喜欢吃水果蔬菜,每天进行身体活动 < 2 小时,母亲肥胖,父亲不参加体育锻炼均与河北省幼儿肥胖发生呈正相关。得出结论:河北省3—6岁幼儿的肥胖检出率处在较高水平,遗传、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是幼儿肥胖的相关因素。提出需要加大对健康知识和幼儿肥胖危害的宣传力度,帮助幼儿养成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26]

梁璐瑶等对河北省3市中小学生学习营养素养进行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选取了石家庄、唐山和沧州共4464名中小学生学习问卷调查,二年级、五年级和初二年级问卷题目数量设置不同,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营养素养问卷等。营养素养问卷包括营养知识和饮食行为及技能。结果表明:3个年级学生的百分制得分

均高于 60 分，部分有关营养知识的题目正确回答率仅 4.5%；3 个年级学生的饮食行为及技能得分情况比较好，均大于 70 分；家长营养素养等均对学生营养素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得出结论：3 个年级学生的营养素养仍有待提高，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都对学生的营养素养有影响，相关部门应针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教育活[27]

（二）人才发展

做好青年民生工作是维护社会有序、激发社会活力、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条件，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蓝图愿景也对河北青年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侯贵松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河北青年发展调查，涵盖初中生、高中/职高/中专学生、大学生、农村青年、行政事业单位青年、企业就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创业青年、青年志愿者等多类 14—35 周岁河北青年，主要围绕思想道德、身心健康、就业创业、住房、消费、婚恋生育、志愿服务等领域进行研究，形成了对河北青年民生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即河北青年整体政治素养良好，身心相对健康，虽然在就业、住房、婚恋等方面面临困难，但河北青年依然能够保持乐观态度，对国家、河北以及个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并提出促进河北青年发展若干建议。[28]

杨胜利等以河北省科技人才发展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侧面对河北省科技人才的发展环境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探讨。重点对河北省科技人才现状与特征进行梳理，系统分析了河北省科技人才发展环境及特征的成因、河北省科技人才集聚机制与影响因素，通过实地调研，对河北省科技人才创业特征与创业需求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剖析河北省科技人才创业环境以及河北省科技人才政策与实施效果，提出了河北省进一步优化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的对策、结论与展望。[29]

农村实用人才对农村发展意义重大，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对河北省农业向好向快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河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探寻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王彩文等通过调研，分析河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基本情况，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情况、参与培训情况以及职业分布；河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

养基本情况，包括培养对象遴选、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培养组织与管理以及培养评价与监管，发现河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存在培养内容陈旧、培养方式缺乏创新、培养组织与管理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丰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内容、创新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形式及搭建农村实用人才管理服务平台的对策建议。[30]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是我国现阶段加强农村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重要补充，河北省已连续开展 5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31]作，规范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确保培训质量，是提高河北省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张敏等对河北省 23 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基本条件、培训管理、师资队伍、过程管理、质量控制、保障措施 6 个方面。同时，在每家基地随机抽取 2—3 名学员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学员的一般情况、对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的了解度、对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的满意度、对助理全科医生执业前景的看法及农村执业意愿。得出结论：河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的全科医学科独立设置率较低，整体培训质量欠佳，学员对基层实践基地满意度不高。提出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应加强全科医学科的设置和内涵建设，加强基层实践基地建设，规范过程管理，从而提高培训质量。[31]

（三）人口消费

青年是引领新型消费发展的主体与推动消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赵乃诗、田翠琴通过对河北青年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分析河北青年的消费现状、特征和社会影响因素，探寻河北青年消费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和发展趋势，为引导青年合理消费、科学消费和创新消费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河北青年不同群体存在较为明显的消费分层。从消费能力、消费支出方式、消费收支平衡状态到消费结构与奢侈品的消费，从吃穿住用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到消费理念与消费选择，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地区的青年都存在明显的消费差异。[32]

五、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研究

2022 年，河北学者关于雄安新区社会建设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更为多元，主要围绕在经济与

社会发展整体状况、未来人口结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产业协同、教育等方面展开。

王秦通过分析雄安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遵循“推广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区规划与建设要求,选择经济发展、绿色生产、社会发展与绿色生活4个维度,运用相关性分析与主成分分析的定量方法,提炼出人均GDP、万元GDP水耗、城镇化率、地热资源取暖覆盖率等27个社会经济承载状况的主要特征指标,构建符合区域特征、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程度的雄安新区社会经济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2014—2018年雄安新区的社会经济承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雄安新区的社会经济承载力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2.81%,尤其是2016年后新区提升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速度,2017年加大了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的投资力度,使得2018年新区社会经济承载力明显增强,较2016年、2017年分别提高37.66%、25.01%。提出了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加大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力度,推广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经济承载力提升对策。^[33]

王艳君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依据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的迁移人口特点设定雄安新区政策导向人口迁移方案,对比分析了延续历史迁移趋势的自然迁移和政策导向迁移两种方式下2020—2035年雄安新区分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结论表明:一是目前雄安新区人口已呈现老龄化态势,自然迁移方式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政策导向迁移方式下,未来老龄化有所缓解,劳动力人口抚养压力减轻,但出现少子化现象。二是两种迁移方式总性别比均呈下降趋势,性别结构有所改善,但仍存在性别比偏高现象。三是自然迁移方式下,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20年的9年升至2035年的10年左右,中学教育水平仍占主导地位;政策导向迁移方式下,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年升至13.5年,人口教育结构由中学教育水平占主导地位转为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占主导地位。提出应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优化生育政策,增加劳动力人口财产性收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宣传男女平等观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34]

徐莉等对雄安新区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实验基地进行研究。认为这样的教育体系实验基地具有示范价值,有利于在实践层面助力新区从传统“政策洼地”向“政策高地”转变,释放创新要素,打造国家级现代教育体系的高质量试验田,脱离“虹吸效应”迈向“辐射效应”,“变轨超车”赋能京津冀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将雄安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实验基地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目标,有助于进一步助推雄安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在新时代视域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概念进一步明晰,为区域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来源和实践经验参考,打造未来城市教育发展全新模式。^[35]

六、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为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机遇。2022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第8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学者们也重点在发展历史回顾、公共服务、人才发展、城市群、生态治理、科技、交通等领域研究三地协同发展程度。

武义青、冷宣荣指出八年来,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实际部门的落实推动,从战略框架的构建到远景目标的初显,从发展理念的提出到体制机制的创新,协同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包括协同发展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推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尚有较大空间、政府与市场边界尚需进一步厘清、发展政策和资源调动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拉大趋势、创新驱动能力三地形成较大差距,提出需要进一步从完善区域治理体系、优化区域空间布局、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系统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方面实现京津冀协同融合发展,积极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36]

任爱华等在产业发展、交通运输、生态治理、技术创新、开放共享五维评估指标基础上构建随机波动率动态结构模型,探索京津冀地区内部是协同发展还是虹吸效应。研究表明:从指标维度看,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和开放共享方面具有协同发展效应,而在交通运输、生态治理、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虹吸效应;从时间维度看,京津

冀地区产业发展、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开放共享方面在经济下行期其内部影响效应更强,而生态治理方面在经济上行期其内部溢出效应更强;从空间维度看,天津对京津冀地区内部溢出效应较强,而河北的溢出效应较弱,北京的溢出效应适中。提出应加强制度上的动态协同设计,综合运用多维评估体系与长效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不同指标下的中心空间结构,牢牢把握创新的长效驱动作用。^[37]

陈明华等基于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共享性和稳定性6个维度,对2006—2020年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考察;通过构建空间关联网络测度京津冀一体化水平,分析其驱动因素;基于空间网络权重对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多维度检验。研究发现: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2006—2019年京津冀一体化稳中向好,创新性和有效性协同有待提升;一体化情形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生态合作的促进作用最强;2020年京津冀一体化水平下降,民生协同发展受到较大冲击;高质量发展呈发散态势,化解民生共享难题、重视经济结构协调、强化创新协同发展是促进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收敛的有效途径。^[38]

张冀等从微观家庭经济风险视角考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能显著降低京津冀地区整体家庭经济风险并缩小区域内家庭经济风险差异,尤其是农村、中低收入和经营工商业家庭的经济风险显著下降。指出协同发展政策的影响路径存在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升级、交通一体化对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显著,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家庭支出具有显著降低效应,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辐射力度不足,仅能显著降低核心功能区和京津、环京津地区的家庭经济风险。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未来的优化和完善的路径:一是制定差异化政策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质量和效率;二是加大金融行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效率;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为支撑点,加大河北城镇化建设力度,对接京津冀协同政策。^[39]安树伟、董红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进行了中期评估,采用双重差分法,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对

比,以2015年为政策起点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交通一体化发展及产业协同发展四个重点领域的政策中期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北京常住人口规模下降产生了较明显的作用,有效改善了京津冀三地的环境质量,促进了三地交通一体化发展,但尚未对产业协同发展产生明显影响,这与政府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导向和京津冀偏低的市场化水平有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取得更加明显的效果,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需要有效提升河北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缩小河北与北京、天津的发展差距;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提高市场化水平,发挥市场在产业协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40]

李茂对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更好地推动三地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为目标,以实现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社保、文体旅游等领域更深入协同为手段,从纵向的历史梳理到横向的国内外比较;从理论的深入剖析到详细的公共服务各领域数据展示;从全面的情况描述到深刻的政策解读,通过大量的图标和实例描述将理论和政策问题具体化、表层化,从中央、京津和河北三个层面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思路,一是推动中央层面加大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供给,具体包括:做好顶层设计、理清对接清单、强化监督考核、在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先行区、加强重点地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对接合作、推动重点领域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的衔接、全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筹建京津冀公共服务投资基金;二是统筹京津支持三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具体包括:构建共赢理念、积极探索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建立京津冀人力资源共同市场、构建一体化教育统筹机制、京津需加强对河北公共服务援助支持、以京津为重点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三是河北推动促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强化组织保障、加强财政保证、构建制度保障体系、建立跨区域的信息支撑体系、创建公共服务重点领域衔接保障机制。^[41]

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是满足区域内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区域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政府驱动是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的重要特征。孙伊凡等重点从京冀两地间异地养老相关产业的合作现状入手,从地理毗邻带来的效益与心理倾向、产业建设和人力资源成本优势、特色养老服务片区的老年宜居优势、北京老年人对异地养老的意愿、北京老年人口对异地养老的态度等方面分析了河北承接北京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责任主体数量众多,在政策设计和实施同时出现问题误差;二是专业护理人员不足,技术培训不严格;三是信息获取不充分,供求不匹配。从增进政府部门间的协作、增强市场认可度、增加专业人才数量及服务素质、创造多元化服务产品供给等方面提出完善河北省承接北京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42]胡宏伟、王静茹基于组织多重制度逻辑视角,阐释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中政府驱动型治理的制度逻辑,分析认为应主要包括区域协同治理、科层制治理、政治联合体治理三种治理逻辑,同时,上述多重逻辑嵌套于“大、中、小”不同协同层面之中。进一步从大协同、中小协同两个层面,分析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的困境挑战,以及对应的多重制度逻辑原因。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基于结构功能框架,提出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逻辑调适和机制优化的重点方向:认知驱动环境适应、能力驱动目标协同、利益互补驱动系统整合、政策驱动维持系统运转。^[43]

城市群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标志和最高空间组织形式,进入新阶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迅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版图中具有突出的地位。经济流的强度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李砚忠、苗源源基于万有引力公式,采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最新城市面板数据,计算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总强度及三次产业经济流强度,并对影响经济流强度的变量因素加以对比,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双核心、两端化”,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单核心、多中心、C型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的形态特征。基于此,围绕引力模型中的影响变量,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的发展经验,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亟须形成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京津冀城市群“GDP”有量有质,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推动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要素流动有序有畅,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改革,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纵横一体,进一步打造网状交通体系,从而实现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高水平、全方位的协同发展,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新动能。^[44]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状况是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城市功能的分布和互动格局是刻画城市群协同发展和治理策略成效的重要内容。郑敏睿、郑新奇、李天乐、张路路、吕永强在阐述城市群内城市功能之间互动原理基础上,引入“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改进土地生态位模型、扩展引力模型和GIS技术,耦合构建了新的城市功能互动模型。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2016年、2019年3期POI大数据提取不同类别城市功能区,从时空两个维度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的互动格局特征,分析协同发展和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状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策略。结论显示:一是2010—2019年间城市群建成区城市功能区总面积增加1.5倍,其中混合功能区增长最快,增加1.7倍;二是北京市工业功能、商业功能正在稳步疏解,但是居住功能、科教文化功能、公共服务功能仍在聚集与强化;三是廊坊市、唐山市、天津市、保定市等中部城市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发挥了“二传手”作用,成为功能互动的主要驱动城市;四是石家庄市吸纳的疏解功能主要来源于天津市和廊坊市,具有接力特征;五是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疏解在治理策略上需要关注功能互动格局演化趋势来进行精准施策。^[45]

在当前“行政区经济”过渡为“城市群经济”背景下,城市间的创新合作成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张贵、孙晨晨、吕晓静选取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城市合作论文数构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及邻近动力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合作网络规模持续扩大,交流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呈现小世界和长尾化特征;QAP回归表明,地理相邻对合作的正向拉动作

用逐步减弱,受制度壁垒影响,合作更倾向于同级的横向合作,跨行政级别的交叉合作暂时还不明显,认知邻近对网络结构演化具有负向作用,信息化邻近性与创新网络演化之间存在正“U”形关系。^[46]范玉凤、马文秀等以经济关联性为研究重点,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城市之间的关联强度,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京津冀城市群的网络联系和空间网络结构,从而探析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动态及空间演化特征,提出为实现京津冀城市群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京津冀城市群应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释放北京及天津等城市的中心作用,通过建设“反磁力中心城市”,培育多核心新的经济增长极,通过产业分工优化、交通互联互通、公共资源共享等举措,增强城市群众各城市的吸引能力、提升网络联系效率,进而构建多中心、均衡化的空间网络结构,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一体化,实现高质量发展。^[47]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正式确立后,我国制定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并加快落实推进。殷会良、杜恒、王鹏苏、易芳馨通过综合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相关政策的实施成效,研究揭示实现双碳目标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围绕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区域协同推进双碳目标落实的整体方案和政策建议,为双碳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协同研究提供实证依据,具体包括:一是强化协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要去中心化,河北要去重型化;二是推动工业清洁低碳生产转型;三是提升绿色城乡低碳发展质量,充分发挥雄安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四是聚焦货运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五是增加碳汇提升环境生态价值;六是加快构建新型区域能源系统。^[48]

王雨枫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一是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

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二是研究地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三是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49]

人才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是重构京津冀产业链条、推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姜兴、张贵界定了产业链和人才链的内涵,通过对人才链与产业链耦合机理和演化机制的分析,构建了人才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双螺旋模型。根据构建模型,深入剖析了京津冀人才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人才分布极不平衡、产业梯度落差巨大、制度瓶颈仍需突破、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不足、协同创新合力尚未形成和高等教育资源悬殊,并从完善制度环境、优化企业主体、增强创新驱动、夯实人才基础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京津冀人才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的建议。^[50]梁林、段世玉、李妍构建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系统韧性多样性、流动性、缓冲性和进化性的四维指标体系,评价2019—2021年京津冀人力资源系统韧性现状,并根据各省市暴露的发展问题匹配针对性治理策略。研究发现:一是从整体韧性现状看,京津冀三省市的韧性均值排名为北京、河北、天津,京津冀整体、北京和河北呈上升趋势,而天津呈下降趋势,河北和天津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二是从韧性治理看,北京、河北和天津适用的治理策略分别是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51]

京津冀教育协同已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的协同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苗俊玲、甄红军、赵永生通过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和新工科协同发展的政策与实践的成效总结,深入分析制约三地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发展的因素:区域发展差别,主体主动参与意识不

足,缺乏对协同效果的考核机制,没有统一的数据平台。提出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既要三地高校建设的内部协同机制抓起,即理顺教学、科研、管理的“三环融合”机制,也要探索政府、企业和高校协同发展的外部合作机制,即建立政府、高校和企业的“三方联动”机制。^[52]

张新宁等基于2016—2020年相关代表性数据,运用对比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京津冀地区内和河北省各地市间科技投入产出的均衡性。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科技投入产出存在明显差距,河北科技投入产出落后是主要原因;河北各地市科技投入产出强度存在较大梯度差,大致以石家庄为核心逐渐向冀南、冀北减少,这是制约京津冀科技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从发挥北京辐射作用和促进河北发展两方面提出建议,以促进雄安高质量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53]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骨骼系统,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社会经济要素的交流效率,降低环境资源成本。范海玉、李汶卓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区域公平发展环境现实需要、交通一体化纵深推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深化实施,均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指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存在制度保障不充分、体制机制壁垒、投融资机制缺失、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与矛盾。基于适应区域长远发展、依靠创新动能转换、着眼绿色交通社会再生产体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用的目标导向,提出应当从顶层设计完善、体制壁垒破除、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创新、运输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实现进路。^[54]

通过对2022年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成果的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各领域研究的广泛度和深入度持续增加,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提出了一些可供学界、业界、政界参考的新观点和新建议,这点值得肯定,同时,也看出还存在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的问题,文献所梳理的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仍偏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的文章以及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文章数量略显单

薄,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核心成果有限。总之,河北省社会建设领域的研究成果仍需多领域、多学科的学者们发挥优势和贡献智慧。

(张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李娟,傅利平,杨立明.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
- [2]冯晓娟.县域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131个县的面板数据分析[J].农业经济,2022(11).
- [3]郑萍.2020—2021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河北省托育服务供需现状与发展路径[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4]顾岩峰,何森.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集聚”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与策略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06).
- [5]董伟欣,李东晓,赵一安,韩立杰.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北省农村职业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13).
- [6]闫莹,张秀君,才莹.河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社会支持调查与完善对策[J].科技资讯,2022(09).
- [7]郭雅欣,叶曼.河北青年就业发展状况研究报告[C].河北青年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8]王依娜,张义日.河北青年创业的特征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C].河北青年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9]戴溥之,郭瑜,代增辉,吕洁.河北省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研究[J].河北企业,2022(09).
- [10]张俊桥,王政文.基于供给侧调研的河北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J].西部学刊,2022(20).
- [11]张丽,李俊红.2020—2021河北省养老设施供需平衡路径研究[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12]胡耀岭,许云清,彭丽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与实践:以河北省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 [13]孙秀娜,秦殿菊,徐静,洪查理,贾兰芳,毛荣华,田建丽.河北省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及利用现状[J].中国公共卫生,2022(04).
- [14]路然,张璐芳,付玉喜.河北省40所三级综合医院中药房现状调查与监管研究[J].中国医院,2022(02).
- [15]张建勋,董旭.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信息建设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 [16]姚胜,王振坤,刁建新,马晓蕾,黄丽颖,王亚好.河北省传统村落基础设施与文旅资源评价研究[J].建筑经济,2022(S2).

- [17]董慧,师伟里.河北省城市创新能力发展现状分析[J].经济论坛,2022(12).
- [18]赵鹏飞.河北省城市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2.
- [19]段洪波.精准脱贫·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的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 [20]徐磊,王建鹏,尹士,杨静园,马立军.基于共生视角的河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格局与分区调控[J].农业工程学报,2022(11).
- [21]蒲金芳,王亚楠,刘沙沙,高阳,王数.河北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12).
- [22]郭建.新时代生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
- [23]高玉敏.乡风文明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四川戏剧,2022(06).
- [24]张秩铭,房岩,徐泽华,田翔,赵占娟.河北省高校大学生网络成瘾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22(07).
- [25]秦俊巧,李春莉.河北省高校师范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22(08).
- [26]秦剑杰,张璇,毕鑫,郑旭彤.河北省3—6岁幼儿肥胖流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22(12).
- [27]梁璐瑶,黄鑫,吕帅帅,王佳琦,张汉阳,张泽琛.河北省3市中小学生营养素养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22(12).
- [28]侯贵松,樊雅丽,李永琴.河北青年发展报告(2022)[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29]杨胜利,王伟荣.河北省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
- [30]王彩文,琚锐佳,李逸波.河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研究[J].现代农业,2022(05).
- [31]张敏,宋世彬,李术君,张金佳,钱卫国,周志山,王荣英.河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评估情况及对策建议[J].中国全科医学,2022(28).
- [32]赵乃诗,田翠琴.河北青年消费现状与社会影响因素分析[C].河北青年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 [33]王秦.雄安新区社会经济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J].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022(04).
- [34]王艳君,刘清滢,司丽丽,彭相瑜,姜彤.雄安新区未来人口结构及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建议[J].科技导报,2022(22).
- [35]徐莉,刘艳美,刘珺珺.雄安新区终身教育实验基地建设的新时代价值[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26).
- [36]武义青,冷宣荣.京津冀协同发展八年回顾与展望[J].经济与管理,2022(02).
- [37]任爱华,刘玲,刘洁.协同发展还是虹吸效应?——来自自己京津冀地区的“动态”多维评估[J].经济体制改革,2022(01).
- [38]陈明华,王哲,李倩,谢琳霄.京津冀一体化情形下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检验[J].中国人口科学,2022(03).
- [39]张冀,史晓.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效果评估——以家庭经济风险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22(10).
- [40]安树伟,董红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中期评估[J].经济问题,2022(04).
- [41]李茂.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视角[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 [42]孙伊凡,陈丽莎.河北省承接北京养老服务现状及对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11).
- [43]胡宏伟,王静茹.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中的政府驱动治理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2(01).
- [44]李砚忠,苗源源.基于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比较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 [45]郑敏睿,郑新奇,李天乐,张路路,吕永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功能互动格局与治理策略[J].地理学报,2022(06).
- [46]张贵,孙晨晨,吕晓静.多维邻近视角下京津冀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06).
- [47]范玉凤,马文秀.基于经济关联性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2(13).
- [48]殷会良,杜恒,王鹏苏,易芳馨.“双碳”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挑战、对策和政策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2(08).
- [49]王雨枫.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11).
- [50]姜兴,张贵.京津冀人才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研究[J].河北学刊,2022(02).
- [51]梁林,段世玉,李妍.数字经济背景下京津冀人力资源系统韧性评价与治理[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2(08).
- [52]苗俊玲,甄红军,赵永生.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22(05).
- [53]张新宁,刘娜,贾文学,张子清.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科技投入产出均衡性探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2(14).
- [54]范海玉,李汶卓.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J].河北学刊,2022(06).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高智 梁世雷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社会民生福祉,关系首都生态安全。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现代化建设鲜明底色,是河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核心任务。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立足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定位,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聚焦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发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等重点领域,对河北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众多有意义、有深度、有创新的理论观点和对策措施。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全面,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多元,研究成果对促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一、生态建设研究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和修复,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是美丽河北建设的核心要义,是河北省的重大政治任务。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从弘扬塞罕坝精神、首都“两区”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对生态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 弘扬塞罕坝精神

牟永福指出,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必须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方式方法上下功夫,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为此建议,一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建立塞罕坝生态要素协同治理理念、机制和体系,切实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二是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加强森林资源管护,推进合作经营,全面激发林业发展新活力;三是增强碳汇能力,继续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培育实现“双碳”目标新

动能。^[1]

王彦坤认为,传承弘扬塞罕坝精神,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接续奋斗,必须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塞罕坝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加自觉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要继续牢记使命,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继续艰苦创业,鼓足攻坚克难斗志,奋力啃下“硬骨头”,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要继续坚持绿色发展,着眼长远、持之以恒,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资源和优美环境。^[2]

徐凡指出,在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精神谱系里,塞罕坝精神彰显着绿色发展的独特内涵,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塞罕坝精神发扬光大,首先要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等维度探寻塞罕坝精神的文化基因。他认为,塞罕坝精神萌发于传统生态文明观念的滋养,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得益于崇敬自然的地域文化的熏陶。因此,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可以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激励、思想引领、文化支持,可以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强劲精神动力。^[3]

安长明认为,目前塞罕坝林场已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新的征程,由脱贫攻坚转向助力乡村振兴。未来,应总结借鉴以往实践经验,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集约节约利用资源,营造山清水秀自然生态,促进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建设产业化,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走出一条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之路。具体来看,一是坚持“生态+营林提质”同步推进,提升综合能力;二是坚持“生态+产业发展”同步提升,增强造血功能;三是坚持“生态+党的建设”同步发力,壮大“软实力”;四是坚持“生态+精神文化”同步促进,迸发创新活力。^[4]

李兢兢认为,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塞罕坝精神”的指导,离不开“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体系。因此,推动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贯彻塞罕坝精神,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践行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须根植绿色文化,以节约、效率、减排为目标,科学部署“碳达峰”和“碳中和”任务计划,全力打造低碳城市。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产业重构升级,实现经济低碳、绿色、循环发展。必须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升高质量发展内核动力。^[5]

(二) 首都“两区”建设

李会霞等指出,“建设好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张家口时提出的重要指示。“两区”建设是一项社会性强、工程量大、涉及面广、操作难度大的系统工程,要想快速实现突破,必须从基础条件和源头抓起,加强战略谋划、对症施治。一是以提高补偿、强化服务为重点,健全多元化补偿机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和满意度;二是以突出人才支撑和规划引领,为重点健全多要素支撑机制,全方位提高“两区”建设科学化水平;三是以强化资金供给和政策供给为重点,健全多层次保障机制,全方位提升“两区”建设持续发展能力。^[6]

宣宇认为,推动首都“两区”建设尽快取得更大突破,必须在推动京津冀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体制机制创新、从政策层面明确将承德市纳入首都“两区”建设的基础上,尽快完善首都“两区”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此建议,一是启动申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级试点,积极探索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的新路径;二是实施重点突破策略,根据难易程度,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各项工作。三是建立完善市场化“生态银行”机制、纵向“转移支付”机制、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和综合“生态旅游”机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张承模式”。^[7]

张伟指出,多年来,张承地区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仍存在森林资源总体质量欠佳、草场承载能力偏低、湿地面积持续减少、水土流失面积依然较

大、生态建设投入标准偏低等问题。为此,建议以建设首都“两区”为目标,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以扩绿提质增效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各项生态建设工程,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依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提升区域水源涵养功能和生态环境支撑功能,打通“两山”转换通道,走好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兴市、生态强市之路。^[8]

孙芳等利用生态功能价值模型等量化分析方法,对冀西北生态农业生态功能价值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农田生态功能价值大于其经济价值,林草地单位生态功能价值大于农田单位生态功能价值,农业结构调整对生态建设存在正外部性。因此,在首都“两区”建设视阈下推进冀西北生态农业发展,应构建“特色+优势”高效化精品农业模式、“节水+减污”集约化旱作农业模式、“乔+灌+草”空间利用综合化立体农业模式、“种+养+加”生态化循环农业模式和“产+加+销+游”一体化休闲农业模式相结合的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并建立完善相应的配套激励机制。^[9]

(三) 生态保护与修复

宋建伟等指出,承德市是河北省矿业大市,由于历史上的无序开采或盗采,形成了数量较多的以石灰岩矿、铁矿、白云岩矿、花岗岩矿为主的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严重破坏了矿区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为此,提出了典型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地质环境治理对策: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矿山恢复治理工作有力有序开展;二是强化顶层设计,明确矿山综合治理任务、目标和基本原则;三是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建则建、宜景则景”和“一矿一策”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矿山综合治理模式。^[10]

邢再亮基于对河北蔚县单侯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和土地损毁的分析,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从三个层面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分区治理方案。即:对单侯矿区矿山地下生产采矿活动的主要区域,要结合破坏情况给予综合治理。对单侯矿区地下水影响较严重区,要采取加强监测和封闭不良钻孔等防治措施。对矿井地下水和未来采空塌陷非影响区的并集区,要加强巡查监测工作,以预防为主。^[11]

刘晓辉等在分析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多样性、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利用、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空间分布等情况的基础上,针对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中出现的监测覆盖率低、专业化程度低、存在制度性缺陷等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一是贯彻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二是转变政府及民众保护野生动物多样性观念;三是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设;四是打击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利用行为。^[12]

李莹等认为,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人类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河北省非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2017—2021年河北省共发生非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案件302件,涉及野生动物141种,其中象牙、麻雀、苍鹰是涉案主要对象;涉案人员学历普遍偏低,年龄集中在30—49岁,90%以上是男性。为此,建议河北省在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地方性规章制度;针对法律盲点和重点人群,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线上线下监管,构建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13]

于淑会等以河北省平山县为研究对象,对太行山东部县域“三生”用地转型与景观生态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8年,平山县生态用地大幅减少,生产用地与生活用地增幅显著,增加的生产与生活用地主要来自生态用地。生态空间的风险加剧区位于县中西部高海拔区,未来应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深山区生态保护;生产空间的风险加剧区位于县北部及东部的低山丘陵区,未来应更关注耕地保护,加强耕地高效利用;生活空间风险加剧区主要位于县南部,未来应调整国土资源利用方式,科学规划旅游资源布局。^[14]

户艳领等认为,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为主要影响因素,实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推进生态功能区域农村土地流转,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一是积极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加强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二是多种渠道提高农户收入,消除农户土地流转的顾虑;三是健全生态涵养区域土地流转平台,完善租金的动态形成机制;四是培育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体,加强土地流转全过程动态监

控;五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的转化。^[15]

二、环境治理研究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是回应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呼声、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的迫切需要。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环境评价、污染治理等方面。

王天博指出,进入新时代,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必须以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全面提升河北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一是要坚持绿色发展思维,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的关系,大力弘扬“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二是要强化系统治理思维,统筹推动生态修复与保护,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是要注重集约低碳思维,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展高水平绿色经济;四是要坚持法治思维、严守生态红线,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经济政策。^[16]

闫顺生等研究认为,虽然近年来河北省PM_{2.5}浓度相对于2014年有了很大的降低,但是要想全省都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任务依然艰巨。为此建议:一是重视解决河北省南部局部性区域污染问题,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的邯郸和邢台两市,实施更加严格的工业排放标准,严格控制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发展;二是强力推进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三是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四是强化PM_{2.5}日常监测工作,做好重污染天气分析预警,提前制定相应防控措施;五是加强PM_{2.5}治理宣传工作,让全省人民进一步了解PM_{2.5}的危害,动员全社会力量对PM_{2.5}进行综合治理。^[17]

关于白洋淀流域水环境治理与保护。高兰等认为,改善白洋淀流域水环境,为雄安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应加强上游污水监测与防治,强化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治理,合理有序发展旅游业,做好跨流域调水与生态补水,提高居民环保意识,全面修复水域生态环境。^[18]连少甫等指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环境保护史上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财富,但白洋淀生态环境

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并没有改变,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19]

郝艳娟等依据海水水质标准,采用有机污染评价指数和营养指数评价方法,根据2018年春季和夏季秦皇岛近岸海域水质调查结果,对秦皇岛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情况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秦皇岛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主要受大陆径流和船舶排污影响,应实施严格的陆地污染源排放总量控制政策,做好主要河流和城市管网入海口环境监测,完善船舶油污水和垃圾接收处理措施,开展各种海洋保护教育宣传活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20]

刘海燕等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河北省农村生活垃圾、厕所改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得到全面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存在区域间不平衡、整治水平不高、工作进度不快等问题。为此建议:一是积极开拓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三是激发农民主体意识,调动农民的创造性;四是建立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21]

申琳等研究认为,河北省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应做好以下方面:一是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探寻适应各地区发展特点、农民普遍接受的改厕模式,推广厕所粪污无公害及资源化利用处理模式;二是统筹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模式,建立更完善的垃圾处置及分类回收体系,减轻垃圾处理的工作量;三是升级农村污水治理模式,利用技术创新提高污水治理效率,提高污水资源利用水平;四是突出农民主体作用,给予农民农村环境整治项目监督权与建议权,增强农民对人居环境整治的认同感。^[22]

赵鹏飞等在分析环境规制下河北省工业企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验证了环保机制对河北省工业企业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的方式,推动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益。因此,河北省激发工业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投资的积极性,应继续健全相关环保政策法规,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工业企业市场秩序,优化提升竞争环境;引导工业企业推进环保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继续完善公众参与的信息反馈机制,建立规范的公众参与制度。^[23]

三、绿色低碳发展研究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河北省始终坚定不移推进的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河北省社科界基于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两个视角,从绿色创新、绿色转型、碳达峰碳中和以及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绿色发展

王岳森认为,河北省要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走好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必须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一是以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运用助推绿色低碳产业健康成长;二是以系列技术集成创新促进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三是以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融合探索能源生产与消费新模式;四是以市场机制和行政调控有机结合推动绿色发展。^[24]

户艳领等指出,坚持绿色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采用面板熵值法和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河北省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河北省各地市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绿色创新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建议:一是继续加大绿色创新要素投入,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加强各市间协同,实现绿色创新发展共赢;三是对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低城市要建立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对创新驱动不足的城市要加快推动技术创新,积极引进先进创新要素。^[25]

张艳丽等就绿色创新视阈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政府规制、市场需求与竞争、绿色创新意愿、组织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驱动,其中政府规制和市场需求与竞争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动力;随着政府规制的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绿色产品创新绩效和绿色管理创新绩效积累量逐步提高。为此建议:一是加强对绿色创新的

政策支持；二是提高绿色创新的预期经济收益；三是增强利益相关者的绿色环保意识。^[26]

李凯伦等研究发现，河北省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同时经济发展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也对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健全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升数字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二是积极提高创新能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乡村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三是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创造需求；四是加快提升人力资本，为乡村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7]

苑甜甜等指出，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是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快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推动农户有效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注重培养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的意愿，通过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等为农户提供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及信息，积极引导农户进行绿色生产；二是加强政府监管，实施差别化、精准化政策引导，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农户形成绿色生产意识，提高农户对绿色生产的主动认知水平。^[28]

（二）低碳发展

赵淑芹等认为，准确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态势，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实现河北省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主动增加绿色能源投资，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从能源供给侧降碳；二是倡导简约、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工业、居民生活、交通、建筑等领域，积极推进能源消费端替代和能效改进；三是在保障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的前提下，科学合理改变农田结构、草地植物种类和生产管理方式，增加植被和土壤碳库碳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与固碳能力。^[29]

卢艳芳等指出，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善河北省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应从以下五方面着力：一是开展多层次、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试点，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标准统筹机制；二是加快制定河北省急需的地方

性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国家级标准制定；三是加快地方标准复审进程，及时淘汰落后标准；四是加强 TC 队伍建设，提高国家 TC 参与度；五是推进标准数字化技术创新，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30]

刘伟等认为，河北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推进能源发展，应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健全能源绿色低碳安全保供体系，建立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科技创新体系，同时要加快碳中和示范项目、示范园区和示范县、示范市建设，建立健全碳交易平台、碳核查标准体系和碳汇交易机制，建设完善重点企事业单位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积极开展碳封存潜力和风险评估。^[31]

耿卫新指出，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清洁能源建设，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建设，要突出发展生物质能，积极推进生物质低碳能源示范项目建设；要建立政策支持体系，确保清洁能源得到广泛推广和利用；要广泛开展清洁能源宣传普及活动，激发农民参与热情；要发挥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加快农村能源产业链创新发展。^[32]

王小玲认为，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迫切需要科技创新和人才智力支撑来破解各种技术难题。因此，应瞄准“双碳”目标，以“揭榜挂帅”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具体来看，一是探索“企业出题、政府立题、人才破题”协同机制，实现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融合；二是搭建“揭榜挂帅”产研融合平台，为人才提供“淘宝店”式服务；三是完善“揭榜挂帅”相关机制，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四是发挥“揭榜挂帅”制度优势，积极开展“赛马”式攻关。^[33]

岳志春等认为，“双碳”目标背景下推动河北省推进产业结构低碳化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加强钢铁、电力等传统高耗能行业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新能源人才和高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引进。^[34]张逸冰等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推动河北省高耗能企业发展，应充分借鉴国内外支持能源转型方面先进经验，制定出台高耗能企业退出保障

措施, 创新和发展绿色信贷体系, 避免“一刀切”地关停企业。^[35]

王汉新等运用双对数模型和岭回归方法, 对河北省电力行业碳达峰情景进行了预测分析, 结果显示, 在基准情景下, 河北省电力行业在 2035 年以前难以完成碳达峰目标; 在低碳情景和零碳情景下, 可以分别在 2030 年和 2025 年实现碳达峰目标。^[36] 逯飞等认为,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推进河北钢铁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工作, 应在做好压减钢铁产量、提高再生钢比例和推进氢冶金的同时, 以双碳目标带动超低排放改造, 以绿色物流带动无组织排放改造, 科学培育再生钢循环体系。^[37]

王欣等以唐山市为例, 研究提出了双碳战略目标下的景观规划设计策略, 一是在景观布局方面, 要建立“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系统结构; 二是在植物配置方面, 要选择乡土树种、抗逆性强树种和碳汇能力强的植物; 三是在能源利用方面, 要在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考虑优先选用新材料特别是可循环利用材料; 四是在建筑方面, 要选用绿色节能建筑作为景观建筑; 五是在交通方面, 要重视建设绿道、碧道、自行车道、慢跑道、散步道等构成的慢行系统。^[38]

四、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研究

加强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2022 年, 河北省社科界关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的研究, 包括生态安全格局协同构建、生态系统协同建设、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生态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多个方面。

(一) 生态协同建设

张孟楠等认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预警国土空间生态薄弱区, 对解决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和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预警点识别研究, 发现京津冀地区有 46 个生态源地, 有 136 条关键生态廊道和潜在生态廊道。其中, 生态源地基本位于生态环境优良的燕山、太行山山脉, 生态廊道依托源地呈交错分布, 冀中南平原地区无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并预测 2030 年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明显, 北京、秦皇岛、承

德等部分区域建设用地扩张可能威胁到生态空间。^[39]

李丽红等基于 PSR 与熵值-TOPSIS 模型, 对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承载安全问题进行了评价研究, 指出了京津冀城市群竞争力、凝聚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生态承载安全优势与短板, 并基于此, 提出了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承载安全保障的措施: 一是推进绿色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二是健全信息管理及监测机制, 构建跨区联防联控治理体系; 三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丰富现金补偿、科技补偿、政策补偿等方式; 四是加强社会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40]

张伟指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 京津冀三地在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总体上看还存在模式单一、力度不足、缺乏可持续性问题, 应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区际补偿的生态补偿制度。具体来看, 一是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河北生态补偿投入力度; 二是成立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的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专门组织机构; 三是委托第三方对区域生态资源服务价值进行统一核算; 四是设立京津冀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和绿色产业发展基金。^[41]

张楠认为, 完善京津冀生态补偿制度应从以下六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以财政资金支持为主、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二是精准确定补偿对象和确定补偿标准, 实现生态补偿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 三是建立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联席会议制度, 引导省市县区签订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构建共建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 四是协同发展绿色产业, 实现生态补偿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是加强生态补偿文化建设, 形成多元参与的良好生态治理局面; 六是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保障机制。^[42]

刘玲等认为,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审计工作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要素净化、完善区域生态系统调节机制具有重大作用。做好新时期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审计工作, 既需要创建好区域内审计长效协作机制, 构建好审计跟踪生态治理的全覆盖机制, 利用好大数据联网审计助力生态环境动

态信息的反馈效用,持续优化审计队伍保障生态环境的监管质量,同时需要京津冀三地各级审计部门协同发力,明确好自身角色定位,肩负好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优化责任。^[43]

(二) 环境协同治理

闫海波等研究指出,“十三五”以来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成果显著,但在生态环境质量、治理协同度、生态补偿机制、产业结构转型和生态环保意识等方面仍面临一些瓶颈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强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观念;二是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工程措施;三是健全区域内部生态补偿机制;四是协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五是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六是强化政治组织保障、制度法规保障、经济金融保障、人才科技保障和宣传舆论保障。^[44]

武义青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区域低碳发展速度加快,但整体低碳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而且,京津冀三地低碳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北京较高,天津次之,河北较低。因此,协同推进京津冀区域低碳发展,应按照有序、有力、有效的原则,强化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引领,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具体来看,一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逐步提高清洁能源比重;三是全面提高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数字技术赋能低碳发展;四是坚持制度协调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低碳合作体制机制创新。^[45]

武义青等指出,推进京津冀低碳经济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坚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带动产业结构绿色化、低碳化升级;二是构建清洁高效低碳安全的能源体系,深化能源结构低碳转型;三是推进交通运输体系低碳建设,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四是充分发挥北京科研优势,大力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五是加快建设完善碳市场建设,积极引导资本流向低碳、新兴产业。^[46]

王树强等基于传输通道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对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环境治理协

作促进了科技创新发展,产业结构质量、融资便利水平和政府支持力度对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具有强化作用。因此,提升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水平,应制定差异化区域环境政策,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深化地方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增加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提高人力资本发展水平。^[47]

韩楠等指出,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碳排放重点区域,其碳排放早日达峰对实现国家达峰目标尤为关键。作者在分析多情景视角下京津冀碳排放达峰预测与减排潜力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减排的策略:首先,完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立碳排放协同治理环境规制,优化京津冀碳排放协同治理制度体系;其次,构建京津冀区域低碳技术协同创新机制,积极开展低碳技术项目研发合作,共建碳排放技术交易平台;同时,建立完善配套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优化升级。^[48]

范海玉等认为,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骨骼系统,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社会要素的交流效率,降低环境资源成本。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需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远目标相适应,需要生产体系、消费体系、运行体系系统推进,需要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公众力量协同参与。为此建议:一是完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政策法律体系;二是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三是创新京津冀绿色交通建设投融资机制;四是以健全公铁联运机制为重点优化调整京津冀交通运输结构。^[49]

叶陈毅等对京津冀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京津冀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优势明显,但不同城市和企业之间差距较大;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培育需着力破解环境治理策略被动、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下、技术研发动力不足等难题。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深化绿色创新区域合作;二是实施能动性环境保护战略,注重企业长期价值培育;三是培育企业家科学冒险精神,激发绿色创新原生动力;四是优化京津冀区域营商环境,构建绿色创新优质生态。^[50]

综合来看,2022年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弱项,突出表现在“三

少”:一是研究成果数量总体上仍然偏少,尤其是高质量精品研究成果还比较欠缺;二是关于生态安全、生态文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研究偏少,而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明显不足;三是对环首都、冀中南、沿海等地区进行专项研究的偏少,专门针对城市、农村以及重点功能区域的研究仍是短板。而且,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性、方向性、实证性层面,河北生态文明建设亟须的创新性、政策性、可操作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强化。

(高智: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梁世雷: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牟永福.传承好塞罕坝精神 续写新的绿色奇迹[J].共产党员,2022(1).
- [2] 王彦坤.传承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2-23.
- [3] 徐凡.塞罕坝精神的文化基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03.
- [4] 安长明.林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以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为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5] 李婉婉.弘扬塞罕坝精神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1).
- [6] 李会霞,刘诗雯,段娅静.首都“两区”建设的基础条件、面临挑战和现实路径[J].经济论坛,2022(9).
- [7] 宣宇.加快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张承首都“两区”建设[J].中国发展观察,2022(5).
- [8] 张伟.我省张承地区生态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J].河北林业,2022(5).
- [9] 孙芳,丁玎,孟凡艳,岳中京,孟勤.“两区”建设视阈下冀西北生态农业生态功能价值测算与产业体系构建[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10] 宋建伟,朱小龙,刘硕,袁运许,夏冬.承德市典型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与对策[J].有色金属,2022(6).
- [11] 邢再亮.河北蔚县单候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和土地损毁研究[J].世界有色金属,2022(5).
- [12] 刘晓辉,李莹,蒋超楠,樊超,周肖萌.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多样性及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研究[J].河北林业科技,2022(2).
- [13] 李莹,蒋超楠,刘晓辉,周肖萌.河北省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利用状况分析及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
- [14] 于淑会,康园园,邓伟,王功明,王洪宽,邢宇华.太行山

东部县域“三生”用地转型与景观生态风险分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22(7).

- [15] 卢艳领,李丽红.生态功能区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 [16] 王天博.推进河北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J].共产党员,2022(17).
- [17] 闫顺生,李艾,张璇,孙翠先.2019年河北省PM_{2.5}污染时空特征[J].科技视界,2022(9).
- [18] 高兰,梁宇鑫,李卿,苟思斯,任怡洁.白洋淀流域水环境现状调查及分析[J].邢台学院学报,2022(4).
- [19] 连少甫,李月颖.白洋淀生态环境危机与治理的历史考察[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2).
- [20] 郝艳娟等.秦皇岛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评价[J].河北渔业,2022(11).
- [21] 刘海燕,孙佳慧,申琳,李华军.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及提升策略[J].河北农业科学,2022(4).
- [22] 申琳,孙茹雪,刘海燕,孙佳慧,李华军.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2022(4).
- [23] 赵鹏飞,郭森泉.环境规制促进河北省工业企业效益的理论及政策建议研究[J].河北企业,2022(11).
- [24] 王岳森.推动新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N].河北日报,2022-05-20.
- [25] 卢艳领,刘燕灵,武海波.河北省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变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26] 张艳丽,许龙,王建华.绿色创新视阈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J].企业经济,2022(3).
- [27] 李凯伦,贾冀南,盖一博.“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助力乡村绿色产业振兴研究[J].乡村科技,2022(21).
- [28] 苑甜甜,王俊芹,赵邦宏.农户采纳化肥减施增效技术何以有效[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2).
- [29] 赵淑芹,刘彤彤.我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议[C].第十二届公共政策智库论坛暨“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22-11-06.
- [30] 卢艳芳,马星晓,王敬.河北省碳达峰碳中和地方标准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中国标准化,2022(13).
- [31] 刘伟,罗景辉,谷岩.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河北省能源发展战略研究[J].河北省科学院学报,2022(4).
- [32] 耿卫新.大力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建设[N].河北日报,2022-06-15.
- [33] 王小玲.瞄准“双碳”目标以“揭榜挂帅”激发人才创新活力[J].共产党员,2022(7).
- [34] 岳志春,袁英培.“双碳”目标背景下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17).
- [35] 张逸冰,巨淑平,郑茹月.河北省高耗能企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10).
- [36] 王汉新,王兆云,张枫.“双碳”目标下河北电力行业碳达峰路径的情景分析[J].资源环境经济,2022(6).

- [37] 逯飞, 苏海燕, 李根利, 成雪峰, 张晓晴, 李一唯.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河北钢铁行业减污降碳协同研究[C].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2 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 2022-08-20.
- [38] 王欣, 何新红, 王智平, 夏文庆, 朱子月, 丁娱嘉. 双碳战略目标下的景观规划设计策略和思考[J]. 新农业, 2022(1).
- [39] 张孟楠, 徐磊, 张长春. 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预警点识别[J]. 林业与生态科学, 2022(4).
- [40] 李丽红, 张敏, 李洪燕, 李祯. 基于 PSR 与熵值-TOPSIS 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承载安全评价及协同发展研究[J].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
- [41] 张伟. 京津冀生态补偿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J]. 河北企业, 2022(8).
- [42] 张楠. 京津冀协同视域下生态补偿的制度研究[J]. 河北开放大学学报, 2022(6).
- [43] 刘玲, 宋伟.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机制审计探索研究[J]. 广东经济, 2022(2).
- [44] 闫海波, 赵德义.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分析[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14).
- [45] 武义青, 姚连宵. 京津冀区域低碳发展现状及转型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2(5).
- [46] 武义青, 姚连宵. 京津冀低碳经济与高质量发展[J]. 前线, 2022(8).
- [47] 王树强, 杨恒. 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2(8).
- [48] 韩楠, 罗新宇. 多情景视角下京津冀碳排放达峰预测与减排潜力[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5).
- [49] 范海玉, 李汶卓.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J]. 河北学刊, 2022(6).
- [50] 叶陈毅, 黄灿, 王上, 寇冉. 京津冀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及环境驱动因素研究[J]. 商学研究, 2022(6).